

目 录

概 述

冀鲁豫边区敌军工作概述..... 闻 娟(3)

文献资料

- 中共中央关于敌占区中党与非党的组织及工作方式的指示
(1939年5月15日) (33)
- 中共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
(1940年4月6日) (35)
- 八路军总政治部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
(1940年7月6日) (36)
-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知(第一号)
(1940年9月18日) (38)
-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
(1941年3月20日) (41)
- 中共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
(1941年8月4日) (45)
-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1944年6月5日) (50)
-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
(1944年9月4日) (58)
-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城工部的工作方针
及各地城工部工作办法的规定
(1947年4月29日) (59)
- 冀鲁豫军区关于颁发抗日同情证书的文告

(1942年1月1日)	(61)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目前敌伪工作的决定	
(1943年1月3日)	(62)
边区敌伪点线及敌伪顽分布概况(摘录)	
(1943年12月)	(68)
冀鲁豫分局关于开展大城市工作的决定	
(1945年)	(71)
第十一军分区司令部关于敌伪叛调查的材料	
(1945年5月1日)	(74)
掌握伪军工作总结	
(1945年6月)	(107)
第十二军分区司令部交际处关于最近敌伪情况的 调查材料(片断)	
(1945年6月15日)	(113)
1945年上半年敌伪顽概况	
(1945年6月)	(126)
冀鲁豫四地委四分区政治部关于目前加强敌军工作的指示	
(1945年9月17日)	(142)
第十二军分区司令部通报	
(1945年11月11日)	(145)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各级社会部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的通知	
(1946年5月16日)	(150)
冀鲁豫五地委关于贯彻开展群众性的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	
(1946年9月23日)	(153)
冀鲁豫四地委四分区关于情报工作的指示	
(1947年4月1日)	(157)
外线工作	
(1947年8月)	刘晏春(159)
冀鲁豫八地委社会部对外线工作几个意见	

(1947年9月3日)	(163)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城工部情报处与社会部合并的决定	
(1947年9月10日)	(166)
关于七地委外线工作的发言	
(1947年10月25日)	万晓塘(168)
冀鲁豫七地委汶上县对敌斗争报告	
(1948年5月15日)	(175)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蒋方逃兵招待所”组织工作条例	
(1948年6月23日)	(177)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加强敌军工作的指示	
(1948年7月)	(180)
冀鲁豫区党委社会部对目前城市工作的指示	
(1948年7月13日)	(187)
冀鲁豫区党委社会部通知	
(1948年7月27日)	(192)
冀鲁豫四地委社会部给各县社会部通知	
(1948年8月9日)	(193)
冀鲁豫区党委前梯队关于争取瓦解匪杂顽工作的指示	
(1948年9月20日)	(195)
水东地委开封支部地下工作始末	
(1948年11月30日)	张方明(200)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新形势下对敌军工作的指示	
(1948年12月28日)	(206)
冀鲁豫四地委对起义投降及溃散蒋伪土顽的态度和处理办法	
(1949年11月29日)	(208)

回忆资料

冀鲁豫敌军工作概况	李一非 黄友若(213)
------------------------	--------------

从山东到太行(节录).....	肖 华(220)
抗战时期的冀鲁豫沙区办事处.....	王乐亭(227)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河南部分城市工作的回忆.....	曹志真(234)
南进支队敌军工作概况.....	耿增泽(247)
抗战初期敌伪军工作回忆.....	杨宏碧(255)
鲁西北的敌伪军工作.....	杨大伦(257)
秘密交通线上的斗争.....	王化棠(272)
护送邓小平去延安.....	马 赛(279)
护送陈毅过边区.....	马 赛(289)
冀鲁豫军区第四(九)军分区办事处	
的对敌斗争情况.....	郭省吾(294)
我军对内黄敌伪军的瓦解和争取工作.....	萧建波(303)
开展敌伪军和敌占区工作回忆.....	李苏波(312)
湖西军分区情报站工作回忆.....	张北辰 王维基(319)
战斗在敌人心脏.....	马 东(327)
泰安城里地下工作片断.....	张文亚(333)
崔子明设巧计 争取利用伪警备队司令路文炳.....	曹龙曜(351)
运西地区的对敌伪工作.....	宋子健(353)
湖西地区敌工情况回忆.....	李汝太(382)
微山湖区的秘密交通线.....	张新华 孙新民(391)
冀鲁豫区党委军区豫鲁办事处工作概况.....	李苏波(400)
拆散敌伪叛顽向我联合进攻的一例.....	张经王(409)
可歌可颂的南线交通.....	冯占林(415)
回忆卫西工委及四县工委的对敌斗争.....	李允贤(421)
争取王天祥起义始末.....	王乐亭 李苏波(447)
与张岚峰的三次谈判.....	李苏波(457)
发动魏凤楼部起义的经过.....	杨春笑(461)
鄄城起义.....	张公干(464)

敌军工作回忆	卢子杰(470)
新乡和平解放经过	刘世英(480)
对敌伪顽斗争的回忆	马一鸣(491)
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覆灭	
.....	高千钧 杨志勇 段峰岭(597)
湖西军分区几次情报工作会议情况	刘存忠(501)
邯郸战役前的一段敌军工作纪实	陈竞波(510)
马庄交通站回忆	刘振华(512)
曹城地下三人小组活动情况琐记	殷群(516)
冀鲁豫五分区情报站活动片断	宋春和(525)
吴屯敌工站活动片断	吴天性(528)
神出鬼没 威震敌胆	程渊月(532)
忆高唐“成丰车行”秘密情报联络站	解宝成(536)
争取伪顽朱九文团起义始末	朱九武(543)
智送情报 巧护亲人	孟静明(562)
日本教官管昭投奔解放区的经过	谢保江(565)

专题资料

冀鲁豫军区第二办事处	濮阳县委党史办公室(569)
中共冀鲁豫边区委员会在开封的敌军工作	武智敏(577)
我党对张岚峰部的争取和分化瓦解工作	
.....	商丘地委党史办公室 商丘县委党史办公室(590)
我党领导和发动伪张岚峰部三个师相继起义的经过	
.....	商丘地委党史办公室 商丘县委党史办公室(599)
菏泽地区敌占区工作综述	赵永文(613)
蒋嘉宾率部起义始末	张新权(625)
长垣敌工站的建立与活动	魏怀章(632)
濮阳敌伪军工作综述	濮阳县委党史办公室(648)

里应外合 攻克莘县·····	莘县县委党史办公室(661)
横贯宁阳境内的交通线·····	宁阳县委党史办公室(671)
地下交通员的故事·····	张金洪(678)
党在朱集的地下工作·····	李敬修(685)
北兆战斗	
——快刀会由嚣张到瓦解的转折点·····	万宗文(691)
国民党军整编八十三师特务营起义纪实·····	拾立廷(695)
冀鲁豫边区敌工组织沿革·····	开封市委党史办公室(724)

概 述

冀鲁豫边区敌军工作概述

阎 娟

冀鲁豫边区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一。它位于河北、山东、河南及苏北、皖北的接合部；南跨陇海铁路，东界津浦铁路，西临平汉铁路，北缘卫河，黄河由西南向东北横穿全境，京杭运河、东平湖、微山湖纵贯南北，是联系华北、华中和华东三大战略地区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冀鲁豫地区的敌军工作是随着敌我斗争形势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建立起来的，是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在和敌人进行长期复杂的斗争中逐步发展起来的。

在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和三年的解放战争中，冀鲁豫边区党委始终把敌军工作看作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边区的敌工人员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在艰苦的斗争形势下，默默无闻地工作和战斗，经受了各种严峻的考验，表现了坚韧顽强的革命精神。他们坚持党的原则，采取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以公开的和秘密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斗争方式相结合，团结了敌占区广大群众，结成了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抗日战争时期边区的敌军工作

一、抗战初期,随着敌后游击战的发展,敌军工作也相应有所发展

“七七”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奉行片面抗战路线,其大批驻军和地方官员,在日军大举进攻面前,纷纷弃地南逃,整个华北危在旦夕!平津沦陷后,日军分三路进攻华北,冀鲁豫边区很快沦入敌手。日军所到之处,大力扩充伪军,扶植大小汉奸,妄图实行其“以华治华”的野心。

为了挽救华北危局,中共中央北方局遵照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的指示,发出“每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应该脱下长衫到游击队中去”的伟大号召。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和号召下,冀鲁豫边区各地党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八路军主力部队相继进入冀鲁豫边区,开始创建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1月初,一二九师东进纵队挺进冀南;8至9月,第六八九团、东进纵队和青年纵队、新一团及六八八团等部,发起漳南战役,开辟了漳南豫北五县;12月中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七团和第六八八团各一部,到达直南、鲁西南地区;12月21日,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率一二九师主力进至南宫,领导冀南、鲁西北地区的抗日斗争;12月下旬,一一五师六八五团挺进湖西;1939年2月16日,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一部,在代旅长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的率领下,到达直南、豫北地区,和地方武装组建了冀鲁豫支队;3月1日,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率一一五师主力一部,进入鲁西地区。于是八路军主力部队在冀鲁豫平原全面展开,迅速打开了冀鲁

豫边区抗战的新局面。

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边区的党和军队根据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认真执行了优待俘虏和争取瓦解敌伪军的政策,当时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1. 在部队内进行敌军工作宣传教育

1938年,边区根据野战政治部敌工部的指示,在安阳和新乡的敌占区建立了秘密的瓦解敌军工作委员会,主要是进行分化瓦解伪军伪组织工作及开展对日军的宣传工作。在宣传工作上,首先着重宣传我军历来重视敌军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分化瓦解敌军的重要意义,以及对敌军的政策和有关业务知识。如:如何进行战时对敌喊话,如何处理俘虏,教会常用的瓦解日军的标语、口号等。当时,敌工科经常编印对敌、伪、顽军进行宣传的标语、口号、传单。对敌军的必经之路书写“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等日语口号,并通过秘密关系把宣传品带进城,秘密散发。部队还开办了专门学习日语的短期训练班,派请日本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到营、连教日语和日语反侵略歌曲。通过学习,部队指战员大都能主动选择时机对敌喊话。一般是在对敌伪军作战中,对敌施以军事打击之后,常常附以政治攻势。有时打一阵喊一阵,每次战役中伪军都有不少缴枪投降的,有的是成批成队的缴械投降。如1940年3月,在卫东战役中,南进支队攻占六塔集,西进至五仙镇附近遇王金祥残部,经对敌喊话,敌放下了武器,我军无一伤亡,俘敌150名。

2. 处理俘虏工作

正确执行俘虏政策,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也是每次作战的一项重要任务。凡进行大的战役,部队在战前都组织俘虏收容所;小的战斗随时组织处理俘虏。俘虏处理通常进行四项工作:一是审查,把被俘人员的原来身份审查清楚;二是对俘虏进行教育,揭发敌军的反动本质,宣传我军的宗旨和俘虏政策,消除俘虏的恐惧和顾虑;三是对俘虏在政治上、生活上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四是分别处

理,愿留者欢迎参加我军,愿走者发给路费,开路条。由于我军一贯坚持优待俘虏政策,对分化瓦解敌军起了很大作用。1938年9月,由杨得志、崔田民率领我军主力一部越过平汉线向东进军,消灭了浚县一带伪军扈全禄部近万人,又北向安阳、汤阴一带,消灭皇协军李英部及该地会匪万人以上。在处理这几批伪军俘虏时,我军遵照俘虏政策,对于伪军头目,如扈全禄的参谋长徐子衡及汤阴的伪军头目等,都给予优待、教育、宽大释放,对该地区以后的工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3. 对伪军伪政府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

为开展伪军、伪政权的争取瓦解工作,1940年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和新三旅政委谭甫仁派二纵新三旅敌工科长畅宏碧和民运科长宋殿宾,打入河南滑县、浚县的伪军和平建国军第二十四路路朝元部,做内线瓦解工作。宋殿宾打入后被委任为上尉秘书,畅宏碧以化名陈宾如被委任为少校参谋。他们打入敌伪后,把该部的编制兵力、装备及行动等做了详细调查,为我军作战提供了重要情报。安阳的皇协军李英部二团团团长张实化,通过争取瓦解,与我们建立了工作关系,并给我们提供一些方便和情报。

二、冀鲁豫、鲁西区党委和军区成立后,加强了敌军工作

随着边区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1939年和1940年初,中共鲁西、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相继建立(1941年7月,两区党委和军区合并,仍称冀鲁豫区党委和冀鲁豫军区)。

1940年4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指出:加强对敌军的工作有最重大的意义,这是决定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毅力与坚持性来进行这项工作。为加强敌军的工作,必须健全军队中的敌军工作部和地方党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要抽出得力的同志担负此项工作。冀鲁豫区党委和冀鲁豫军区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建立了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敌军工

作部,委派李一非任部长。敌工部下设敌军、统战、群工三个股,黄友若、李秉宽、张经五分别任股长。由于当时战斗频繁,各分区的敌工组织缺少专职人员,一般由部队领导兼任。

冀鲁豫军区敌工部成立不久,日寇即调集大量兵力,对冀鲁豫边区进行大“扫荡”(“五·五”大扫荡)。敌此次“扫荡”使冀鲁豫地区的党和地方武装遭到严重破坏。为扭转不利形势,区党委、军区专门召开会议,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讨论了如何冲破敌人的包围封锁,扩大回旋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坚持根据地斗争,以及加强敌伪军和敌占区的工作问题。

1940年7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发出了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指出: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组织有力的伪军,对已有的伪军进行瓦解工作,削弱其战斗意志,争取伪军对抗日的同情与帮助,争取伪军反正,这是我们对伪军工作的总方针。指示要求:我们部队应不放松一切机会去争取伪军、瓦解伪军、消灭伪军……不应当把一切伪军官兵都当作死心塌地汉奸来看待,应按照具体情况配合军事消灭与政治争取。冀鲁豫、鲁西区党委、军区根据总部的要求,选派得力干部,积极开展了此项工作。

1. 开展了对会道门的争取工作

区党委和军区对待会道门采取的方针是:区别不同地区、不同对象,分别采取争取、瓦解和打击的办法,以争取、瓦解为主,以打击为辅。在争取、瓦解过程中,注意正确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由于区党委、军区和打入敌人内部的敌工人员的努力工作,有的会道门武装被收编,有的被改造,有的与我建立了关系。如阳谷县忠孝团的第七、八团,有我党打入进去担任正、副团长职务的工作人员,一些下层组织也被共产党员所掌握,有效地阻止了他们与敌伪顽的勾结,并引导会众做有利于抗日的的事情。再如对势力较强的浚(县)滑(县)汤(阴)天门会,我党先后派黄友若、刘哲民等同志前去工作。争取了总会长杨贯一和下属要员,发展了党的组织,建

立了工委及浚、滑、汤、淇四县工作团，掌握了天门会大部分常备武装和敌伪情报，并使其接受了我提出的三项条件：即不跟随日伪军到抗日根据地“扫荡”、“骚扰”，不向根据地发展势力范围，保证共产党、八路军人员进入天门会控制区域内的安全。1945年日本投降时，杨贯一率部起义，担任了我们的浚县县长。

2. 打破敌人的分割封锁，建立地下交通线

从1940年起，由于敌人对边区各根据地实行分割、包围、封锁，各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系十分困难。冀鲁豫边区地处要冲，是华中、山东抗日根据地通向太行，进而去延安的必经之路。因此，建立地下交通线，保持各根据地之间及各根据地同延安之间的联系，至为重要。为此，冀鲁豫、鲁西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特别注意抓了建立地下交通线的工作。据不完全统计，边区先后建立的主要交通线有7条，其中通往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的有4条：其一是北线，从观城起，过南乐、大名，到磁县贾壁；其二是中线一，从濮阳起，过内黄、安阳等，到林县任村；其三是中线二，从内黄起，过汤阴、浚县等，到林县临淇镇；其四是南线，从封邱、延津两县结合部起，过淇县、辉县，到林县临淇镇。通往山东分局的有2条，一条是从范县经鲁西南、湖西，过微山湖到山东分局；另一条是从范县起，经泰安、宁阳等县到山东分局。通往陇海路南水东根据地，是从民权县过路的一条交通线。在以上7条交通线中，最重要的是下述两条：

一条是从濮(县)范(县)观(城)中心区交通总站起，过微山湖到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交通线。建立这条交通线经过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这条交通线最重要的地段是从津浦铁路沙沟站西、微山湖东的彭楼，过微山湖到单(县)东中心区，过水路15公里，陆路100公里，又称湖区地段。

1938年5月初，台儿庄大战刚结束，苏鲁豫皖省委书记郭洪涛，带30多名县团级以上干部，携带电台，从延安经过鲁西南到达

泰西。沿途所到之处，要求党组织迅速建立地下交通站。泰西特委调裴毓明、周济担任交通站长，并在靠近津浦铁路附近的黄庄建立交通分站。山东沂蒙山区交通渠道的建立，意义非常重要。它可以从延安直通山东沿海区的东海边，使党政军许多领导干部安全通过。尤其在1939年秋冬，为——五师罗荣桓、陈光两首长率领部队到达沂蒙山区，提供了可靠情报。1941年后，因环境恶化，改从宁阳县通过。1938年10月，中共苏鲁豫特委就在微山湖东夏镇建立交通站，沟通鲁南与湖西抗日根据地的交通联系。1940年10月，日伪军和顽军互相配合进攻微山湖地区，企图一举歼灭抗日力量。为保存实力，暂避敌之锋芒，我党、政、军撤离微山湖区。日伪军和顽军占据这一地区后，湖东、湖西交通联系中断。1940年底，鲁南区党委指示沛（县）滕（县）边县委，建立一条湖上交通线，负责接送过往干部，转运物资。1941年1月，湖西地委派张新华到沛（县）滕（县）边县组建抗日武装，恢复湖区交通线。张新华同地方武装人员组成一个20多人的小部队，称微湖大队，协同主力部队和铁道游击队、运河支队作战，解放微山岛，一度恢复湖区交通。1942年4月，日伪军6000余人分5路合围微山岛，经激战，微湖大队同其它部队被迫撤离，湖区交通线再度被切断。此时，冀鲁豫边区和鲁南抗日根据地，在敌人的“扫荡”、“蚕食”和封锁之下，局势十分严重。沿微山湖一带，日伪军碉堡林立，沟路纵横，我过往人员活动十分困难。

为了确保这一交通线的畅通，1942年8月，湖西地委派孙新民、胡桂林分别任微湖大队政治委员和副大队长。微湖大队认真分析盘踞在湖区的日伪军和顽军的状况，认为伪军尹洪兴团驻守夏镇一带，象一扇铁门扼控着湖东交通要道，而此人表现不是太坏，便决定将他争取到我们方面来。沛（县）滕（县）边县委派共产党员刘家廉打入尹洪兴团任军医，利用工作之便对尹洪兴作争取工作。后孙新民亲自与尹洪兴谈判。在我多方工作之下，尹洪兴答应撤掉

南庄附近几个据点，双方并达成互不为难的协议。这样，湖区交通线又恢复起来，我党我军很多重要领导人安全往返于这条交通线。1942年7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中局书记刘少奇通过这条交通线由山东抗日根据地到达冀鲁豫边区，又经太行到达延安。1942年的秋天，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肖华前往驻太行根据地的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就从这条交通线安全通过。1943年9月，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前去延安出席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也是经这条交通线安全到达的。1943年冬和1945年秋，新四军军长陈毅两次往返于这条交通线。

另一条是从边区交通总站起，经内黄、安阳，通过卫河、平汉路封锁线，到达林县任村八路军总部豫北办事处的交通线，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交通线。

早在1940年5月，冀鲁豫军区建立不久，第一军分区就在安阳东部建立地下交通站，负责护送党、政、军过往人员。不久，在内黄县设立华北抗日民军办事处，负责交通联系等工作。1941年6月，八路军总部在太行抗日根据地林县任村设立豫北办事处，同华北抗日民军办事处建立联系。1942年初，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指示冀鲁豫军区要同八路军总部豫北办事处密切配合，对安阳以东、卫河以西的伪军、土匪开展争取工作，把太行到冀鲁豫、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建立起来，保证畅通无阻。1942年5月，冀鲁豫军区在内黄县井店设立沙区工作团，不久改称沙区办事处，由王乐亭任主任，统管我党在这一带的交通站和华北抗日民军办事处。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地下交通线，保障太行与冀鲁豫、冀南以及山东、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其次是搜集敌人情报，采买军需民用物资，先后购买子弹180多万发，从太行运回3000多发炮弹，还有大量药品。经过对这一地区伪军做多方面的工作，于1942年夏建立经内黄、安阳、过卫河、平汉路封锁线到林县任村的交通线。这条交通线建立后，在一年的时间内，即护送我党、政、军

过往人员近 1000 人。由于过往人员日益频繁，又于 1943 年 8 月开辟经内黄、汤阴县过平汉路封锁线到淇县泉寨村或林县任村的交通线。1943 年 8 月后，大批党、政、军人员往返于这条交通线。

沙区办事处从建立到抗日战争胜利的 3 年时间内，共护送过往干部和青年学生 4000 多人，其中包括刘少奇、邓小平、陈毅、徐向前、肖华等重要领导人。

三、加强敌工机构，大力开展对日伪军的争取分化瓦解工作

1942 年 10 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决定黄敬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11 月至 12 月，黄敬主持召开了冀鲁豫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提出全边区两大任务：第一，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第二，争取瓦解敌军，拆散敌、伪、顽、会、匪联合。1943 年 1 月 3 日，区党委做出《关于目前敌伪军工作的决定》，确定 1943 年对日伪军工作的重点放在伪军伪组织方面。同时，加强对日军的工作。要求做到：对破坏性最大的伪军，要加强进攻，给以严厉打击；对动摇者要进一步争取，使之与我建立关系；对已同我有工作关系者，要进一步加强工作，达到政治上、组织上的进一步掌握。并决定全区半年派遣 100 名干部打入伪军组织中工作。1943 年春，军区派李一非到太行山开会，向总政罗瑞卿主任汇报了冀鲁豫边区的敌军工作情况。罗主任指示：“要加强这一工作，首先领导上要重视，要提到战略高度，从政策、方针、组织、干部等各方面，发动全党的各方面力量大大加强这一工作”。区党委、军区按照罗瑞卿的指示，于 1943 年 4 月召开了全区敌工会议，区党委书记黄敬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重要指示。会议明确了当前对敌工作的政策、方针，对加强组织领导、配备干部以及当前工作的中心问题，均进行了比较认真详细的讨论。这次会议对冀鲁豫边区敌伪军工作的开展起了重大作用。从此，边区的敌伪军工作，进入一个更深入、更广泛、更有力、更有显著效果的新阶段。

在政策上,贯彻了北方局和总政关于加强争取瓦解伪军工作的指示,以及区党委拆散敌、伪、顽、会、匪联合的方针。决定边区全党加强敌伪军工作,争取伪军、伪组织的两面派。并出布告,宣布对反正起义伪军的优厚待遇。

在组织上,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区党委成立了敌工委员会,黄敬、崔田民、苏振华、李一非、谭善和、万晓塘组成敌工委员会,以崔田民为书记,李一非任副书记,对各分区敌工科做了相应调整,加强了力量。各分区政治部敌工科同时也是地委的敌工部门。部队团政治处设敌工股;营设敌工干事;连设敌工宣传员;各县都设立了敌工站,受军分区敌工科及县委双重领导,站长条件适合的一般参加县委。如鄆城县建立了区一级敌工机构,敌工人员逐渐增加到30多人,其中常住敌工分站的有10人左右。菏泽地区地、县两级敌工人员由不到100人增加到300多人,菏泽地区还增设了“东长情报站”,冯剑仇、李庆斋为正副站长,并建立了武邱集情报分站。由于区党委、军区把争取、瓦解日伪军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各级组织都加强了这一工作,形成了全区敌军工作网。

在鲁西南、豫东地区,对陇海路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取得显著成效。活动在商丘周围的我党我军,根据上级指示,先后向朱集等地派遣许多工作人员,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内部,建立数十处情报站、敌工站和联络点,在刺探敌军情报,掩护过往干部,采购军用物资,争取、分化、瓦解敌军等方面,做了大量显著有成效的工作。1941年,鲁西南地委建立了敌工委,下设敌工总站,定陶、南华、菏泽、东垣等县都设立了敌工部。其中曹考、定陶敌工部门先后派人打入敌伪内部,在分化瓦解敌人,传送情报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1942年12月,第五地委、军分区派人在民权县内黄集建立陇海路汴商敌工站。1943年春,根据上级关于将敌军工作重点转向城市的指示,陇海路汴商敌工站改为开封情报站。1943年12月,开封情报站改为开封工委。敌工站和情报站的主要任务是:瓦解日

伪军,建立地下交通线和搜集情报。1943年春,敌工站通过关系,派共产党员担任民权县人和区伪区长,接着,又掌握伪区队和各个部门,将该区管辖的6个联保会主任调换成共产党员和党的同情者。这样,名为敌占区,实为共产党所控制;被敌人破坏了的陇海路南北交通线又恢复起来。同年春夏之交,敌工站通过关系派共产党员打入兰封县伪警备队。警备队约有3000人,有一定的战斗力,其驻防地段是水东地区与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联系的必经之路。因此,争取这支队伍,对我有重要意义。打入该部的共产党员对警备队长张绍儒进行教育争取工作,有一定的思想基础后,鲁西南军分区派代表李冠卿与张绍儒进行谈判,并达成协议:①保证过往兰封的八路军、新四军人员的安全,允许八路军在兰封县城关设立情报点;②与八路军、新四军建立正常往来关系,双方互不发生武装冲突,及时为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日伪军活动情报;③八路军、新四军可随时派人到警备队任职,警备队并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部分弹药。根据协议,敌工站在兰封县城建立情报点;张绍儒在日伪军“扫荡”鲁西南和水东抗日根据地之前,均及时向八路军提供情报;警备队先后向根据地运送20箱子弹;张绍儒还任命共产党员为警备队中队长。争取兰封县伪警备队的工作取得成功。1943年春,冀鲁豫军区获悉日伪军准备“扫荡”我抗日根据地,即指示开封情报站设法搜集敌人这次行动的指挥部位置、作战计划等情报。要想得到这样重要的情报,必须进入戒备森严的开封日军师团部。情报站为此争取了具有爱国心的名妓菊红,她冒着生命危险,搞出敌人的作战计划、地图等重要情报,情报站及时将情报送到冀鲁豫军区,为根据地这次反“扫荡”作出贡献。同年5月,开封情报站负责人李冠卿等根据军区敌工部指示,积极进行争取河南省伪省长陈静斋的工作。陈静斋1944年初出席日军为发起打通平汉线南端的河南战役而召开的高级军事会议,会后,他将敌人收缩33个据点的情报提供给八路军,为扩大冀鲁豫抗日根据地起了有益的作用。

直南、豫北地区也大力开展了伪军、伪组织工作。1941年南进支队敌工科在堂邑、清丰地区派遣两个敌军工作组,对该地伪军进行分化瓦解工作,使其身在敌营,暗助我军。如1941年十六团在进攻堂邑县吕集据点战斗中,登城云梯几次架不上去,守城伪军帮我突击部队拉上云梯,还给扶好,使我突击部队顺利登城,全歼伪军。1943年5月,冀鲁豫军区建立了第二办事处(简称“二办”)。“二办”主要的任务是:搜集传递孙良诚部的情报,拆散孙部与其他伪叛顽军的联合;分化瓦解孙的司令部、八大处、兵工厂、各军、师部和直属团,最后挫败伪孙良诚部,巩固冀鲁豫边区根据地。其活动情况是:①利用西北军旧部,迅速沟通与孙良诚部的关系。孙良诚原属西北军旧部,这次孙部北犯,为壮大自己的力量,大量吸收西北军旧员。“二办”紧紧抓住这个良好的机会,积极动员曾在西北军混过事的社会名流到“二办”帮助工作,利用这些人员尽快沟通与孙部的联系。山东鄄城的张履福与孙良诚的关系甚笃。“二办”用这种关系对张履福做工作,让他认清当前形势,为自己的后路着想。张履福愿意为我军工作,并把孙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工事修筑、各部的关系、士兵情绪等情报介绍给我们。②利用“交朋友”打进敌人内部。孙良诚部的总参谋长甄纪印,掌握伪二方面军的军事大权,此人处事总好以“友情为重”。军区利用甄的这些弱点,派吴尧衢打进鄄的总参谋部。吴担任总参谋部机要科长,他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开展工作,利用合法身份,千方百计与孙部的各处、部室搭线联系、拜朋友。关系搞好后,便把我们的侦察参谋、敌工人员安排到孙部各个要害部门。③开展争取工作,共同抗日。由于张履福,吴尧衢等人的积极活动和敌伪军工作的大力开展,导致了伪二方面军的军机泄露、组织失控、指挥失灵,使孙部扫荡“蚕食”失败。1943年7至8月间,张经五代表冀鲁豫军区,与伪二方面军孙玉田进行谈判,申明了团结抗日的大义,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重任,并与其交换了电台、马匹,对伪军二方面军官兵做了大量争取的工

作。④分化瓦解敌人，拆散孙部与日、伪、顽、杂的联合。八公桥是孙的总部驻地，周围盘踞着伪叛顽杂部队，为了拆散孙部与伪顽杂的联合，军区一方面动员地方武装——县区基干队、乡村民兵，分路阻击，分点包围，准备实战；一方面分头作分化瓦解工作，使敌人各保自身，互不相顾。在攻打八公桥的战斗中，我军里应外合，经过12小时的激战，将孙的总部直属队全部歼灭。毙伤伪军数百名，俘伪二方面军甄参谋长以及官兵3200余名。我军对这些被俘人员生活上给予优待，并给他们做宣传教育工作。其中甄纪印参谋长表示愿意为我军工作。驻濮阳伪二方面军的主力王清翰军（伪五军）也同我军打通关系，并相机起义。

在泰西地区，敌人在1941年和1942年，大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重点清剿，广设据点。泰西地委为了坚持艰苦的斗争，派得力干部打入伪军伪组织内部，开展两面政权活动，泰安（西）、肥城、长清部分伪区长与我建立了联系，使形势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1941年中共泰西县委敌工部长崔子明，运用又打又拉的斗争策略，争取了泰安伪警备司令路文炳为我所用。对路文炳订了约法三章：①日寇如有大扫荡，要及时准确地给我方提供情况；②想方设法为抗日部队购买枪支弹药；③设法保护我抗日部队、干部和家属。此后，在日寇清剿、扫荡和捕杀我抗日干部、家属中，起到了及时提供情报和掩护作用。1942年，崔子明指示共产党员张文亚打入敌人内部，被委任为伪泰安县保安大队第二中队长，争取掌握了部分伪军，在两次攻打泰安城作战中作内应，使我军在攻城战斗中减少了损失。

湖西地区也大力加强了日伪军工作。1942年下半年，地委成立敌占区工作委员会，下设敌军工作站。在根据地中心地区，1个县设1个站；边沿地区，2至3个县设1个站。地委还在敌占城市徐州等地设立情报站。各站都积极开展工作了，鱼台、丰县、砀山等县均作出一定的成绩。金乡县县委敌工站先后派党员打入日军司

令部谍报队,后发展党员5人,建立了党小组。谍报队13名队员中,有9个为我们工作,3人为我掌握,连日军司令部的勤务员也被争取过来。他们曾传出大量情报。1942年12月,敌人“合围”湖西根据地时,金乡县县委书记兼县长李剑波及警卫连等部分同志被俘,经敌工和情报人员密切配合,将李剑波营救脱险,其余被俘人员在敌人准备押往周庙村去修碉堡时,谍报队人员及时将情报送出,我军在途中设伏,解救出400多名同志。

鲁西北在开展敌军工作中也作出了成绩。1943年地委、县委分别建立了敌工委员会,军分区设敌工科,科长杨大伦。莘县建立了两个敌工站。敌工站中的中共党员范永堂打入莘县伪军内部,以随从副官的名义接近匪首刘仙洲,得到刘仙洲的信任。后在伪军中发展6人入党,建立了中共地下党支部。1944年7月,在鲁西北军分区司令员赵健民的指挥下,里应外合,一举攻克被日伪称为模范县的莘县城,活捉了刘仙洲,俘虏伪军官兵2000余人。

在工作过程中,各地对伪军伪组织开展了群众性的争取、瓦解工作:一是加强对伪军伪组织人员的政治宣传;二是对已有的伪军伪组织搞“善恶录”,对其善恶行为进行登记,以争取伪军人员回心向善。对作恶多端的伪军伪人员,开展“检举死心汉奸”运动。后来,又制发“回心抗战证”和“关公证”。同时,各地发动群众加强对伪军伪组织人员家属的工作,召集他们座谈或个别谈话,号召他们订抗日协约书,通过他们争取、瓦解伪军伪人员。

与此同时,区党委和军区还加强了对日朝反战同盟的工作。1943年,朝鲜劳动党党员李明浩(当时又系中共党员)以日本关东军联络员身份,活动于陇海线的开封、商丘、徐州等地,开展反战宣传和瓦解敌军工作。日本人高木、清水和朝鲜人崔××、金××(女)在朱集日朝军政人员中也积极开展反战宣传活动。经过他们艰苦细致的工作,于1944年夏,驻朱集宪兵队翻译高××和曹县伪警备大队日本教官管昭等四人,携带长枪三支,短枪两支,到曹

县柏树园投奔我军。同年10月,日军驻朱集一四二〇部队归德特别队翻译黄智焕、金大原(均为朝鲜人)二人,各携带手炮一门,投奔我曹县基干大队。在1944年至1945年迎接大反攻的形势下,反战同盟的同志配合我军深入敌占区进行对敌宣传,印发宣传品,并争取日军士兵向我投诚。在这些活动中官川牺牲了。“九·二七”大扫荡中黑田也在战斗中牺牲。

边区的敌伪军工作,经过多年努力,使一部分伪军伪组织人员变成抗日力量,准备在适当时机起义反正,协助我解放城镇,攻克据点;一部分伪人员配合我在敌占区、接敌区开展工作,为我提供情报,采办军用物资,为争取抗战胜利作了大量有益工作。

四、加强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从1944年开始,随着国际国内抗战形势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特别是经过冀鲁豫边区军民一年多的军事和政治攻势,冀鲁豫地区的日伪军大部被我赶出了根据地,从而龟缩于城镇和交通要道及铁路沿线。为适应这种新情况,迎接边区战略大反攻的到来,冀鲁豫中央分局和军区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在普遍开展日伪军工作的同时,着重加强对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日伪军工作。

为此,1944年3月,冀鲁豫军区在濮阳召开全区第二次日伪军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将军区政治部敌工部与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合并,成立冀鲁豫军区联络部,任命李一非为部长,王乐亭、阎海清为副部长。同时决定继续在几个地方设立敌工办事处,配合军事打击,对日伪军展开强大的政治攻势。

1944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强调指出:过去的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工作,是为保存组织,度过黑暗时期,或者获取情报,购买物资;现在则是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党伪军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要求各中央局、各地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

务,准备担负起夺取所属一切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冀鲁豫分局根据这一指示,于1945年1月作出《关于大城市工作的决定》,要求全区各地委、县委抓紧当前有利形势,大力开展大城市工作。提出将城市工作的重点放在伪军警及工人、苦力身上,以便将来实现武装起义,配合大军解放城市。为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冀鲁豫分局决定各地委、县委分别成立城市工作部,并确定几个重要城市的日伪军工作分别由各有关地委直接领导,开展工作。具体分工是:济南的城市工作归第一地委领导;徐州的工作归第十一地委领导;开封的工作归第十地委领导;新乡的工作归第九地委领导;德州、邯郸、济宁、兖州、邢台、聊城、临清、兰封、商丘等城市工作,分别归第六、三、八、二、七、四、十、十二地委领导;一般城镇的工作则由县委领导。在冀鲁豫分局和各地委的领导下,从1944年初到1945年8月一年多的时间里,边区所属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均迅速开展对日伪军的瓦解和争取工作,并取得重要收获,有力地配合了边区军民的局部反攻和战略反攻。

1. 活动在鲁西南、水东和湖西地区陇海路沿线的豫鲁办事处(对外称陇海办事处),是冀鲁豫边区开展开封、商丘、徐州等城市及交通要道日伪军工作的机构。

根据中央和北方局关于开展对大股伪军和顽杂军工作的指示精神,1944年7月,冀鲁豫分局、军区抽调党、政、军干部60余名(其中县团级以上20多名),经过培训学习,成立豫鲁敌工办事处,李苏波任办事处主任。办事处机关起初设在菏泽县大杨湖村,1945年6月,迁至陇海路南水东地区太康县境内轩庄、杨集一带,改称为豫东办事处,并增派原第二十一专署(湖西)副专员牛连文任副主任。这时豫东办事处的主要任务是,联络地下工作人员,搜集商丘、睢县、柘城、太康等地日伪军情报,部署我地下工作人员打入日伪军内部做张岚峰部的争取瓦解工作。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后,办事处机关又先后移至菏泽、曹县。1946年6月,豫鲁办事

处工作结束。

为加强党对日伪军工作的领导,于豫鲁办事处成立的同时,中共豫鲁工委成立。工委在冀鲁豫中央分局领导下,负责办事处的党组织发展、党员的派遣、教育管理等。由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长李一非兼任书记,办事处主任李苏波任副书记。并由鲁西南、水东、湖西地委和军分区主要领导参加组成委员会。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1944年10月,中共豫鲁工委决定分别建立开封、徐州两个工委,直属于冀鲁豫分局和军区领导。

开封工委是在原冀鲁豫第五地委开封工委(开始称汴商工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李苏波任书记,李冠卿任副书记。开封工委的一项主要任务是开展对张岚峰的争取工作。早在汴商工委时期的1944年1月,中共开封特别支部书记姜达生到商丘伪张岚峰部,与该部团长杜新民、队长邢剑五等4名共产党员取得联系。1944年3月,姜达生又到商丘向王飞霄传达了第五地委(鲁西南)和工委指示,令杜新民利用他与张岚峰原是西北军老同事的关系,竭力争取“枪杆子”。5月,杜当上张部第十八师师长,并提拔邢剑五当上了团长,另两名同志当上了营长。第五地委又派姜显和(姜达生之弟)进入该部,任杜新民的随从副官,负责传递文书。从此,我党从抗日根据地陆续派人打入该部,从事秘密工作。1944年10月前后,冀鲁豫军区联络部、第五地委、第四地委又分别派中共党员车荫棠、桑巨人、王炳如以及党外人士李声皇等人进入开封。这一时期,受开封工委领导的基层组织,除以姜达生为书记的开封特别支部外,还有以张金山为书记的文教支部,王振海为书记的西区支部等。

1944年末至1945年初,第四军分区敌工办事处先后派李庆斋、李庆堂到开封,以开设体育用品商店为掩护,建立联络站,在开封工委领导下发展组织,搜集情报,掩护地下工作人员。1945年5月,姜达生、王宝祺(姜发展的共产党员)先后打入伪河南省警察

署,分别当上警法课长、保安课长,掌握了守卫四方城门的警察中队和发放良民证的权力,并将地下交通员王丹臣、郑文学安排当侦缉员、卫生检查员,为我党在敌占区开展活动提供了方便。

伪第四方面军司令张岚峰的司令部驻商丘,归其指挥的有伪第一军、第八军、第十九军和一些地方保安团队,共约9万人,分别驻在睢县、民权、通许、太康、淮阳、鹿邑、柘城、商丘、宁陵、虞城、永城、夏邑、宿县、涡阳、亳县等地,是河南省最大的一支伪军,对冀鲁豫边区和水东抗日根据地危害极大。尤其是当日本帝国主义走向穷途末路之时,他又窥测方向,企图在日、蒋、我三方空隙中苟延残喘,以继续保持其实力地位。为此,在日军投降前夕,把对陇海路日伪军工作的重点放在张岚峰部,更具有重要作用。

1945年6月,办事处迁至豫东后,采取争取与瓦解并重以争取为主的方针,加紧对张岚峰部的工作。办事处确定,除机关留少数同志工作外,其他全力以赴,深入敌区了解情况,传达党的指示,做好张部待机起义的准备。由李苏波、张敏到商丘与魏一博、贾子毅、王继贤等联系;牛连文到柘城了解张岚峰同国民党联系的动向;戴德去西华,淮阳之间的柳林与张部师长魏凤楼接触。李苏波、牛连文还亲自到张岚峰处,与张谈话,申明大义,劝其认清形势,识破蒋介石打内战的阴谋,加入人民革命阵线。李苏波还带领张的代表王继贤等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参观;在日军投降之际,军区派李苏波以第十八集团军总代表身份再次与张谈判,这是第三次谈判,李苏波并带有朱德总司令劝张丢掉幻想,接受八路军改编的信件。由于张岚峰对蒋介石还抱有一定幻想,要争取全体起义已不可能。因此,军区决定,凡起义条件成熟的要立即行动,以促使更多的伪军向人民投诚。张部五十六师师长魏凤楼,经我地下党员杨春芙的长期工作和叶本瑞的耐心帮助,尤其是彭雪枫、张爱萍等对他的教育,于1945年8月3日以部队拉练演习为名,率官兵2千余人起义。1945年9月至1946年初,张部的十八师、五十五师及独立团

一营在师长杜新民、副师长王继贤与独立团中校副团长、第一营营长程培兆率领下约1万人相继起义。根据冀鲁豫军区和新四军第四师的命令,起义部队经过整编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魏凤楼原是西北军冯玉祥部的军长,他率部起义,对冀鲁豫地区伪顽军产生了很大影响。

2. 在津浦路沿线,加强了济宁和徐州的工作

早在1939年,冀鲁豫区党委和湖西地委就开始不断派人潜入济宁、徐州等城市搜集情报,采购军用物资,作出了很大的成绩。1941年5月,湖西地委派专署贸易局长王志成、张振乐、李健民等5人到济宁,利用社会关系,在济宁南关外开设“复兴炭厂”。以此为掩护,在城内联络爱国抗日人士,秘密发展党员,动员爱国青年去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还设法购买了一批敌人禁运的药品等物资运往根据地。王志成亲自教育争取伪水上自卫团团团长顾维新,把他发展为中共党员,使水上自卫团为我掌握。当年秋,“复兴炭厂”和济宁城乡几个联络点遭到敌人破坏,王志成、张振东、顾维新被捕,英勇牺牲。以后,地委又派张绳武、蒋彤到济宁城内继续开展工作。在徐州,1941年由铜北县委派赵金阶、赵翼栋进城建立情报工作。1942年12月,湖西地委决定成立徐州地下工作组,赵克任组长。1943年,他们利用徐州伪政府教育部门招收小学教员之机,先后打入徐州市的教育界,以教员身份作掩护,在徐州市内开展地下工作。同时,地委派胡传锦潜入徐州,作为地委单线领导的地下党员,以帐房先生为掩护开展工作。他们在徐州发展赵翼栋、侯清泉入党,在徐州市商业界、教育界上层人士中和伪公安局内建立了一些关系,获取一些重要情报。1943年秋到1944年夏秋,我徐州地下党联络点迭遭破坏,裴盛德牺牲。1945年,湖西地委决定成立中共徐州市外线工作委员会,由地委城工部直接领导,王家襄任书记,恢复了对徐州市的工作。

3. 在平汉路沿线,加强了邯郸、安阳和大名一带的工作

1942年日寇在冀鲁豫边区的邯郸、安阳、大名之间的三角地带组建了一支伪军——东亚同盟自治军(简称自治军)。这是一支由几股当地封建地主势力、国民党残余势力、顽杂匪拼凑起来的武装。军长王天祥,副军长程希孟,下设有四个旅,分布在大名、南乐、内黄、漳河县一带,兵力近万人。这支队伍分布面广,危害较大。军区根据“自治军”的情况,派冀南一分区张瑞符(化名王殿杰)到王部一旅长李成华的一大队唐维部工作,后来王殿杰当了李成华的秘书,实际上成了李的参谋长。军区还派张符其(化名张复玉)到程道全部与上层人物建立关系,陈述爱国与卖国之利弊,指明只有爱国才有出路。劝其“人在曹营心在汉,不要做民族的罪人。”军区还通过各种社交活动,联络感情。冀南一分区桂干生司令员请李德裕到冀南根据地参观,并请他担任冀南一专署的“参议员”,以争取他们向我军靠拢。1944年在解放大名战斗中,王天祥亲自到大名发动其特务团起义,配合我军里应外合,解放了大名。王天祥在解放战争初期,被任命为晋冀鲁豫野战军二纵队六旅旅长。

这一时期,边区其他地委、军分区,在冀鲁豫分局和军区的领导下,也都加强了敌工机构,以铁路沿线城镇为重点,多方面地开展争取瓦解日伪军的工作,并收到显著效果。

所有上述这些工作,都为我军实施战略大反攻,争取更多的伪军、伪人员起义、反正,解放沿铁路线的城镇,发挥了重要作用。据不完全统计,1944年边区共攻克据点碉堡1000余个,毙、伤、俘日伪军49000余人,争取伪军反正5000余人,解放人口约500余万人,控制县城11座,鲁西南与冀鲁豫、冀南根据地连成一片。1945年先后解放县城44座,广大地区为我控制。冀鲁豫边区敌工人员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军工作

一、调整和加强了敌工机构

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军工作,伴随主要矛盾的转化和战争形式的变化,在组织机构、工作对象、方针政策、方式方法等诸多方面,与抗日战争时期相比,有了新的变化和发展。自卫战争初期,冀鲁豫区的对敌军工作机构,地方和军队有两套系统。区党委设社会部和城工部(后并入社会部),冀鲁豫军区设敌工部,各军分区设敌工科。领导不统一,力量分散。为此,军区政治部根据党中央和晋冀鲁豫中央局敌工会议精神,曾专门召开了敌军工作会议,检讨过去的敌军工作。在此基础上,冀鲁豫区党委于1948年7月,发出关于加强敌军工作的指示,要求党委加强对敌军工作的一元化领导,区党委与边沿接敌区地委、县委设敌工部、区委设敌工委员;区党委、地委敌工部,即军区、军分区敌工部、敌工科,方针政策方面的由党委领导,日常工作归军区、军分区政治部领导的双重领导关系。在部队中,独立旅设敌工科,团设敌工股,军分区基干团、县大队、独立营设敌工干事,连队士兵委员会设敌工委员。以后根据工作需要,地方与军队敌工部门又分开,区党委、地委仍叫社会部,军区、军分区仍叫敌工部、敌工科。地方与军队的基层敌工组织不变。

二、敌军工作积极配合部队作战

为使对敌军工作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发展,冀鲁豫区于1947年6月召开地委社会部长和公安局长联席会议,在总结过去工作的基础上,提出要放手使用一切力量,大胆地在敌人内部开展工作。会后,各地认真组织贯彻执行联席会议精神,在巩固原有各工作基点如开封工委、济南鲁西工委及徐州、济宁、商丘等情报站、点的基础上,在边沿接敌区,由地委选派能力强、有社会经验、政治坚

定的同志,组建敌工站,负责打入敌军内部人员的派遣,团结争取外围人员,广泛搜集情报。

1. 为部队提供大量可靠情报。由于各级党委对敌军工作的重视和各敌军工作机构的积极工作,这项工作在配合我军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947年初,冀鲁豫区党委派开封工委委员范毅到国民党整编第六十八师第三五六团协助该团团长张公干(中共党员)工作。范毅乘管理警卫班和机要文件之便,不断将敌人的机密电报、简报和电报密码等重要情报转送冀鲁豫区党委。同年,开封工委派阎凤歧打入国民党开封中统特务组织联合新闻社,先后以新闻社记者、采访主任身份为掩护,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教育群众,激化敌特内部的矛盾,使开封县警察局刑警队长罗玉卿等5名军统特务因强奸、杀人之事败露而遭枪毙。此后,他继续在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中周旋,搜集情报,掌握了敌特7个潜伏小组(点)的情况,为开封解放后肃特镇反提供了有利条件。1947年7月鲁西南战役期间,开封工委获取蒋介石于开封召开军事会议调兵增援鲁西南战场的重要情报,及时报告上级,对鲁西南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1947年蒋介石密令六十八军刘汝珍部队扒掘黄河。中共汴郑工委及时将情报报告晋冀鲁豫中央局。根据刘、邓的指示,工委负责人直接做刘汝珍的工作,使之没有执行这一命令。1947年7月,中共开封工委通过各种地下关系将开封至商丘段敌人的各种详细情报弄清,而后派曾洁光连夜送到陈锡联、彭涛纵队司令部,使我军指挥机关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取得破击陇海路的首战胜利。1947年,国民党省主席刘茂恩密谋向我豫皖苏解放区进行“围剿”。为了不失时机地密切配合行动,沟通与我地下党的情报联系,豫皖苏军区派三十团组织股长袁立荣等坐镇隐蔽在保五团,负责随时联系,并通知地下电台直报军区。当敌人的电报密码变动时,马良还亲自把密电码送到军区。保五团的两位正副团长通过刘茂恩召开的秘密军事会议获取“围剿”计划并派人送到解放

区,打破了敌人妄图吃掉豫皖苏、扫清北进障碍的狂妄企图。1948年6月,陈粟野战军攻打开封,开封工委提供了包括敌人绝密件《开封城防图》在内的重要情报,为我军迅速攻克城池提供了帮助,受到陈粟野战军司令部的表扬。此外,开封工委还争取开封的民办报纸《中国时报》,使该报社置于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之下。此报运用灵活多样的方式,把我党的主张和人民的心声巧妙地透露出来。特别是积极支持开封的学生运动,为被捕学生呼吁,秘密印刷党的文件和传单,在国民党统治的开封起到鼓舞人心、孤立敌人的效果。同时,中国时报社在掩护党的地下工作者,团结进步文化教育界人士,为解放区培养输送新闻工作干部和搜集国民党情报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2. 大力开展对敌军的策反工作。在加强情报工作的同时,我军敌工部门派遣大批人员,深入虎穴,打入敌军内部进行策反工作。同时,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先后于1947年7月23日、8月25日和11月,三次向军区部队发出指示,要求部队乘我军转入战略进攻,敌人军心动摇的情况下,结合军事打击,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攻势,从政治上瓦解敌军。在我强大的政治攻势和策反工作配合下,许多蒙受国民党欺骗的有识之士,认清国家、民族前途之所在,毅然投奔解放区。1947年9月14日,驻鄆城的国民党整编第六十八师第三五六团2000余官兵,经过我内部工作的配合,在张公干率领下起义。1947年10月17日,在第五军分区部队的政治攻势下,国民党第四绥靖区特务第二连,由副连长张福海、肖守田率领,投奔到解放区的临泽县。

为进一步揭穿国民党统治集团对其官兵的欺骗宣传,冀鲁豫行署和军区联合发出布告,公布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对蒋军及逃往敌区人员的八条具体政策:(1)凡不愿替蒋介石打内战,战场起义者,一律欢迎,并奖励有功人员;(2)凡战场自动放下武器者,不论官兵,不杀、不辱、不没收私人财物,自愿为人民服务者,政府介绍

工作；(3)凡一时被骗失足，或被迫参加蒋军、还乡团之贫苦群众，准其回家向民主政府登记自新，经村民大会通过后，恢复公民权利，并分给土地财物；(4)被迫参加蒋军、还乡团之地主，准其戴罪立功，还乡自新，依据其贡献大小，酌情分配土地财物；(5)被骗携眷逃亡蒋占区，但未参加任何军事政治组织危害群众利益之地主，准其还乡向民主政府登记，并经村民公议分给土地财物；(6)凡国民党军政人员家属能动员丈夫、儿子回家或串通敌方亲友回家者，可在法律保护下，享受其他群众同等之权利；(7)凡蒋军武装在我解放军反击下，不立即放下武器，而进行抵抗者，一律予以消灭；(8)凡死心与人民为敌，在蒋军占领时期无恶不作之坏分子，一律没收其土地财物，并于归案后交人民法庭公审，决不宽大。

政治攻势大见成效，仅黄河南各县，截止1947年9月20日，就争取敌军、敌政府机关人员1万余人投诚和登记。涌现出嘉祥县大队和第五军分区等政治攻势模范单位。他们的工作，曾受到冀鲁豫军区的表扬。1948年8月，驻丰县的国民党整编第八十三师特务营，由于营长黄幼衡对国民党黑暗统治不满，有弃暗投明之意，并在营内作了思想和组织准备。此时，冀鲁豫区党委社会部外线工作干部李祥被俘，交该师特务营看押。黄幼衡与李祥经过多次密谈后，设法与冀鲁豫第三军分区取得联系。8月16日，以野外演习为名，黄幼衡率全营433人出丰县城，在我部队掩护下到达单县曹马集，正式宣布起义，受到我当地驻军的热烈欢迎。1948年12月28日，区党委发出新形势下对敌军工作的指示，指出：郑州、开封、徐州等战略据点相继解放后，豫北新乡一带残敌已成瓮中之鳖。各地委、军分区要乘此空前有利时机，继续配合军事围攻，大力开展政治瓦解工作。据此，我军第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和四十七军首长梁兴初派李振熙的表弟冉影做李振熙的劝降工作。在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配合下，国民党守军第四十师正副师长李振清、李振熙率部投诚，新乡和平解放。

从1945年8月到1949年6月,驻河南的国民党军队师(纵队)以上规模起义8次,计3万余人,起义将领10余人;团一级规模起义6次;接受改编一个军1.7万余人。

伴随着冀鲁豫边区的全部解放,冀鲁豫区的敌军工作胜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冀鲁豫边区敌军工作的历史经验

冀鲁豫边区的敌军工作与其它工作一样,是由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在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中,边区的敌军工作积累了不少宝贵经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 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是做好敌军工作的根本保证

冀鲁豫边区是敌、顽、我三种力量激烈争夺的地带,加上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上不统一,大小封建势力你争我夺,形成了敌伪、顽、会、匪各种反动力量与共产党展开尖锐斗争的复杂局面。在这种复杂艰苦的斗争环境里,边区党委从实际出发,针对形势的不断变化,在不同阶段适时进行斗争方针的转变。比如,在军事政策上,对敌人的“扫荡”、“蚕食”、“强化治安”,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以高度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粉碎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对伪军主要从政治上瓦解,争取其由一面派转变为两面派,对死硬分子、则坚决予以打击。对既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军队,鼓励其抗日的一面,批评其反共的一面,扩大其对日伪的矛盾。对联日反共的顽军,则同对付汉奸一样予以打击。对土匪,在根据地内坚决肃清,在敌占区或接敌区,争取其走上抗日道路。对封建会道门,在根据地内严令取缔,在敌占区争取利用。对国民党的顽固势力,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此基础上,边区党委还针对敌工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具体指导,制定了对敌政策,敌工纪律,明确了敌工机构的领导关系和敌工任务。同时,对敌工人员选配条件、人员调动

管理、气节教育等都有具体的指示和措施。各级党委根据伪军的思想状况，及时地提出要求敌工机构、敌工人员通过各种渠道给伪军人员送“关公证”。此证背面印有：“身在曹营心在汉”，为其解除后顾之忧，以便更好地与我军配合，为我所用。但在解放战争时期，开始由于干部中存在和平麻痹思想，对新形势下的敌军工作认识不足，在工作中曾一度出现被动。冀鲁豫区党委根据敌人在黄河南实行重点进攻的情况，于1946年9月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开展游击战争，保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决定一方面抓紧在全体党员干部中进行形势和阶级教育，克服右倾思想，解决坚持斗争的决心与信心问题；一面组织撤出地区的干部和武装插回敌人占领区，并进一步提出：“准备全区打游击”，“县不离县，区不离区，就地坚持，不准退出”的口号。这些正确方针和措施的贯彻实行，配合我军主力，给来犯的敌人迎头痛击，也有力地促进了敌军工作的顺利开展。此后边区的敌军工作在配合大军的战略防御到战略进攻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见，各级党委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出发，及时地发出指示，制定政策，具体指导，是做好敌军工作的根本保证。

2. 敌军工作必须以军队做坚强后盾

开展武装斗争，是党和人民创建革命根据地，夺取革命胜利必须依靠的最主要的斗争形式，离开了武装斗争，中国革命将会一事无成。抗战初期，如果没有各地党领导的武装起义，没有主力部队挺进敌后，就没有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没有我军主力和地方部队、民兵密切配合，进行反“扫荡”的胜利，就没有抗日根据地的坚持和巩固，也就不能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1941年到1943年是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敌人对我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实行所谓“总力战”，连续进行“清剿”、“铁壁合围”和“三光政策”，并配合以“蚕食”、“封锁”、“治安强化运动”。再加上连续旱灾，困难相当严重。这时，冀鲁豫边区党委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和精兵简政政策，以军事斗争为中心，把军事斗争与

政治斗争、经济斗争以及思想文化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把公开的斗争与隐蔽的、合法的斗争结合起来；军事上，在敌人进行合围时，部队“化整为零”，实行主力地方化，以分散对敌之集中；在敌分兵进行“辗转抉剔”时，则“化零为整”，以集中对敌之分散。在政治斗争上，主要是对敌伪军进行分化瓦解。一般情况是，敌工以军队为后盾，军事上的胜利又以敌工提供准确的情报为前提。解放战争时期，边区敌我斗争形势呈拉锯状。1945年秋，我军第一次围攻安阳前夕，安阳城工委的任土方和张栋一起，用一个通宵绘制出安阳守敌的城防图，及时送到城外我军驻地。1947年春，刘伯承、邓小平首长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再一次围攻安阳，城工委为部队提供情况，侦察带路，收容俘虏。1949年春，四野的四十二军奉命来解放安阳，城工委将安阳守敌情况向部队首长做了详细汇报，并把绘好的地图送到部队，为部队扫清外围据点做好攻城准备提供了重要情报。5月，华北最后一座孤城安阳获得解放。实践证明，把敌工与军事斗争视为一体，紧密配合，互相促进，是做好敌工的成功经验。

3. 依靠群众，取得群众的支持，是敌军工作成功的基本条件

中国革命是以创造革命根据地，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而最后战胜敌人的。冀鲁豫边区敌军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由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革命政权、人民群众组织，这几种革命力量相配合、支持而取得的。边区敌军工作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只有充分发动群众，才能有效地开展敌军工作。边区正是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敌工人员的衣食住行才能得到解决，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有群众的保护。正如罗荣桓所指出：冀鲁豫平原虽无山地作屏障，但有成千上万的民兵，成为抵御日本侵略者的人山人海，形成一道坚不可摧的铜墙铁壁。冀鲁豫边区敌军工作之所以在复杂艰苦的环境中能够发展，其原因是成功地发动了群众。在敌军工作初创阶段，由于领导对发动依靠群众的问题，思想认识和经验不足，减租减息等群众运动没有充分开展起来。1940

年春，泰西和运西地区曾发动群众开展过借粮运动和减租减息斗争，取得很大成绩，但因当时经验不足，在作法上有“左”的偏向。1942年，刘少奇同志去延安经过冀鲁豫边区时，对边区发动群众问题作了重要指示，从而使边区领导对发动群众的意义、内容和方法，有了比较深刻的认识，统一了思想，组织力量进行周密部署。这在边区发动群众的工作上是一次大的转折。到1942年以后，边区以减租减息为主要内容的民主民生运动不断深入发展，充分发动和动员了广大群众，使广大群众在政治上、经济上得到翻身，提高了觉悟，改善了生活，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获得很大提高，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参军参战和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扩大。从而使边区的敌工形势也得到迅速好转。1948年初，国民党省主席刘茂恩和城防司令李仲辛为了加强防御，强迫开封南关市民将城墙外200米内的民房一律拆除。打入到南关镇公所的特工人员曾洁光、阎延岭等同志，发动并带领市民和商号老板数千人，扶老携幼到省府请愿，并包围了刘茂恩的小汽车，敌人不得不迟滞这一罪恶行动，从而为我华东野战军6月份攻取开封提供了有利条件。历史经验证明：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持是完成敌工任务的主要保证。

总之，冀鲁豫边区的敌工工作的巨大成就，是在党的正确方针、政策指导下取得的，是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有关敌工工作方针政策指示的结果，也是边区全体共产党员和全体军民共同奋斗的结果。边区的敌工工作对夺取边区革命的彻底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辉煌业绩，将永远载入边区革命的史册。许多战斗在敌工工作岗位上的优秀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今天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征途中，要学习先烈们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实现四化，以慰英灵。

文献资料



中共中央关于敌占区中 党与非党的组织及工作方式的指示

(1939年5月15日)^①

致各中央局、分局区委党委及八路军新四军各级政治机关：

在长期抗战中，某些区域有暂时被敌占领，亦有收复的可能。为敌人进攻的严重条件，并顺利的进行斗争，应该及时改变战区党的非党的组织方式及工作方式，因此中央提供下列意见，以作各地党部的参考：

(一)在敌人进攻下，或某地被占后，当地党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扩大游击战争，领导群众坚持斗争。

(二)党及政府民众团体的指导机关，力求短小精干，在游击队掩护下领导与巡视下层工作，并将可能隐藏的干部，分配去加强区村的领导。

(三)一切技术机关，应秘密建立在群众中，特别加强秘密交通网的建立，以保持上下联系，并进行秘密技术的训练。

(四)严重注意保存干部，不适于环境的应送到上级党部训练和派到八路军游击队中工作。无法立足的党员，可动员到军队游击队，或在安全地方开办普通训练班，收容和教育他们。在恢复联络

^① 原件未具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党员的党籍时,应加以郑重考查,防止叛徒敌探混入。

(五)加强游击队的巩固与扩大,组织强的游击队,游击队每到一处都须有党的政府的代表及群众领袖,使更加密切与群众的联系。

(六)在敌人统治较严地区,党的组织应转入非常秘密的形式,党应研究许多新的斗争方式,去反对敌人和巩固群众情绪。

(七)加强党内教育,防止张惶失措悲观动摇现象发生,相信在艰苦斗争的锻炼中,我们的工作可能更加深入与巩固,并可取得某些新的发展以至取得收复这些地区的胜利。

中共中央关于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

(1940年4月6日)

(一)加强对敌军的工作有最重大的意义,这是决定抗战胜利和引起日本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必须以最大的毅力与坚持性来进行这个工作,过去对这个工作的注意,一般的说是不够的。

(二)为加强对敌军的工作,必须健全军队中的敌军工作部和地方党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无论如何要抽出得力的同志担负此种工作。望将旅以上敌军工作部及区党委以上的敌伪军工作委员会组织状况工作状况简略电告。

(三)收集敌人的各种文件是研究工作的重要准备,请各部队、各区党委把所获敌人的全部文件,交代表带来延安以资研究。

(四)对敌宣传品的内容值得深入的研究,望各部将自己的各种对敌宣传品带几份来延安以供参考,同时延安正在印刷传单、报纸及小册子分给前方散发。

(五)对日军俘虏工作除执行总政过去的指示,凡俘虏愿意回去者即给以鼓动招待令其回队外,应注意选择少数进步分子给以较长期的训练。现决定晋东南送3名(包含杉本)、晋冀察军区送3名、一二〇师送3名最进步的日本俘虏来延安受训,以培养出日本的革命者。

(六)各部队、各党委必须总结对敌军工作的经验,在来延安代表中指定专人负责向中央报告,以便研究对敌军工作的方法,开辟对敌工作的新阶段。

八路军总政治部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

(1940年7月6日)

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组织有力的伪军,对已有的伪军进行瓦解工作,削弱其战斗意志,争取伪军对抗日的同情与帮助,争取伪军反正,这是我们对伪军工作的总方针,这是长期的艰苦工作。

(一)我们部队应不放松一切机会去争取伪军、瓦解伪军、消灭伪军,过去经验证明,凡对伪军采取积极的联络与打击的地方,则伪军在数量上与质量上均弱,反之则伪军较多较强。

(二)不应当把一切伪军的全部官兵都当做死心塌地的汉奸看待。对伪军只采取军事上消灭,而放松政治上的争取与瓦解是不对的;然而只作政治争取而放弃军事消灭,同样是不对的。我们应按照具体情况来灵活的配合军事消灭与政治争取。

(三)我们应从各方面强化对伪军的工作,选择适当的干部及当过伪军的军官和有关系的人员,加以训练派往做伪军工作。

(四)在伪军内部工作的方针,主要的不是发动士兵对军官的斗争,而是争取伪军官兵对抗日的同情,启发民族觉醒,增加其对日寇的不满与仇视,和抗日军队通消息,报告敌情,帮助抗日军队的物质资材,对日寇采取阳奉阴违的办法。但当伪军真诚帮助我们物质资材或交通工作时,不应作过多的过分的要求以致被敌发觉。

(五)对伪军反正要采取正确政策。在条件未成熟时或反正不能胜利时,或某个伪军区域有特殊作用时,不要轻易提出反正口号,而应长期埋伏,以待将来。在伪军不得已反正后,必须以最大耐心进行教育工作,不可过急;不应剥夺原来的军官的兵权,不可实

际上解散其军队，因为这样便是阻绝其他伪军的反正。对于反正伪军，不一定要编入八路军，编制不一定要很快的八路军化，而可以作为八路军的外围军，但其编制、待遇、纪律、政治工作等均与八路军有别。

(六)对伪军的宣传工作要加强。主要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帮助日本人来压迫中国人，中国同胞大家联合共同抗日等等。不要骂伪军官兵都是汉奸，绝不要提杀尽伪军汉奸军官和活埋汉奸等错误口号。对伪军家属要加强政治争取工作。

(七)对伪军的内部工作及伪军的关系等等，要严格保守秘密。这种工作应由团以上及县委以上的政治机关的一定个别人员负责进行。伪军内部不应组织庞大的抗日组织，而以短小精干为原则。

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 通知(第一号)

(1940年9月18日)

三个师,苏北指挥部,江北、二、三、四纵队,挺进军:

(一)目前我国各大城市重要港口主要铁路都沦陷于敌人之手,特别是大工业区(上海、天津等地)在敌人的统治下已经3年多了,那里一般的情况是:

(甲)工业已相当恢复,工人数量不比战前减少,这里依然是无产阶级密集的中心地。

(乙)学校都已开办,有约占全国3/5的大中学生和广大的知识分子。

(丙)伪军逐渐增加,在日寇的南进政策之下其数目还将继续增加。

(丁)城市居民的数目比战前增多,敌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集中到各大城市。

(戊)由于英军的撤退,更增加了敌人对天津、上海等地大工业城市的暂时统治势力。

(二)敌人依靠这些大城市在军事上作为进攻中国的堡垒,在经济上作为以战养战的中心,在政治上作为以华制华的据点,在文化上作为奴化敌区人民的大本营。这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官僚政客及上层的国民党员,投降日寇变为汉奸傀儡,而另一方面有广大的劳动群众、知识分子、中间阶层,是对日寇痛恨,对中国抗战积极

拥护，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主张同情。伟大的抗日力量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基础，同样是潜伏在敌后各大城市之中。

(三)党在敌后大城市中的工作，除少数地方外，还没有采取积极的方针，在长期隐蔽政策下艰苦的有系统的进行各种工作(工人运动、文化工作、统战工作、敌伪军工作等)，因之党与敌后广大的工人群众、学生、知识分子、中间阶层、敌伪军队之间形成了长期隔离的现象，甚至对敌后监狱中的同志，我们也没想尽一切方法及时的进行营救和救济，这种共产党与敌后大城市隔离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如果在抗战开始时我们由大城市退到乡村，以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这是完全正确的，那么现在就要依靠乡村打入城市积极开展城市工作，消灭党的工作与大城市隔离，不然是极大的错误，因此全党同志应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重要的任务，认识抗日战争没有长期艰苦的城市工作的配合，最后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四)为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敌后城市工作，中央有以下的决定：

甲、在全国党面前提出消灭共产党与敌后大城市的隔离，特别是与大工业区广大工人群众隔离的现象，各地党特别是临近敌后大城市的党与军队，应彻底纠正忽视与放弃敌后城市的错误，把这一工作视为是自己的全部工作不可分离的严重任务。

乙、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以上海、××、平津、平西、冀察晋、晋东南、晋西北、大青山、胶东、鲁西、鲁南、皖东、鄂中、豫东等十四处为据点，责成当地的党与军队负责分头进行，逐步开展这一工作(具体计划另电指示)。

丙、中央成立了敌后工作委员会，领导与推动整个敌后城市工作，以恩来同志负总责，康生同志副之，以重庆为推进整个南方敌后城市工作的中心，以延安为推进整个北方工作的中心，在中央局、中央分局及临近敌区的区党委，亦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各

委员会除了主持人外,须有专门人员负责进行研究与搜集培养派遣到敌后工作的干部。

丁、当开始工作时,应首先进行下列工作:

一、搜集材料,了解情况,研究经验。

二、寻找可用为开展工作的掩护居住与立足的利于交通往来的各种社会关系。

三、搜集培养有社会关系可以回敌后工作的干部,有城市工作秘密工作经验的干部,可以作掩护工作交通工作的干部;可以回到大城市参加生产的工作同志;党必须详细的调查与珍贵的使用这些干部,不让这些干部大量随便分配其他工作,把培养与派遣敌后城市工作干部视为干部工作严重的任务(干部工作指示另见第二号指示)。

戊、各地接到中央的指示后,应详细讨论决定具体计划,积极地开始进行工作,并必须将讨论结果电告中央。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关于反敌伪宣传工作的指示

(1941年3月20日)

(一)在侵华战争中,日寇是十分重视宣传战的。其进行完全战的基本方针,为分裂中国的团结,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使中国从联共抗战变而为反共降日。其宣传的主要内容,为“共同防共”,“中日亲善”,“剿共灭党”,“恢复东洋固有文化”,与“建立东亚新秩序”等。其宣传的主要方法和方式,为“虚妄夸大”,“造谣侮蔑”,“挑拨离间”,“软硬兼施”,“利用汉奸”,“诲淫诲盗”,以及“利用中国旧形式和民间形式”等等,并动员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及庞大的宣传工具与宣传机关,在各种不同的社会阶层里,在各个不同的思想意识领域里,广泛与深入地散布其灭华宣传的毒素。虽然这些完全不难为敌人的一切残酷与反动行为所自行揭破,而另一方面,我们必须估计到这些武断的宣传,在觉悟不足的群众中可以发生暂时的麻痹作用,在中等阶层中可以引起动摇,而在大地主资产阶级中可以获得应声虫,特别是在反共的宣传与活动上,大地主资产阶级是和敌寇直接、间接地配合着的。因此,我们必须更广泛与更深刻地展开反敌伪的宣传战。

(二)我们的反敌伪宣传,是整个抗日斗争的一个侧面,是服务于驱逐日寇出中国这个总的政治目的,是和敌寇的灭华宣传针锋相对地对立着的。因此,我们必须从各方面阐明“抗战到底”,“民族团结”,“共产党的抗日目的和政策”,“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

抗战中的模范作用”，“科学的教育”，“思想的自由”等等道理，并揭露敌人的暴行与灭华阴谋，以与敌人的一切欺骗宣传相对立；这便是我们的总方针。在宣传的方法和方式上，必须极力改进，以扩大其效果。由于我国广大人民的拥护抗战，由于敌国、敌军内部及敌伪间存在着许多矛盾，由于国际上广大人民的同情我国抗战，我们相信，我们能够而且必须争取这一宣传战的胜利的。但另一方面，我们的凶恶敌人，有其狭隘民族主义与武士道精神的教育，有其庞大周密的宣传组织与活动，而我们自己，又缺乏进行这个工作的足够干部与经验，便造成了反敌伪宣传战中的困难。因此，在反敌伪宣传上，还需要我们更大的努力。

(三)对敌军的宣传方针，在于瓦解敌军，但必须估计到敌军士兵的觉悟程度，不要提出过高的口号，不要把最高的政治任务具体的与宣传任务混为一谈。据此，今后必须注意：

1. 应抓紧并激动当前日本士兵的情绪，如思家思乡情绪，厌战的情绪，不满意长官打骂的情绪，以增长其悲观、懈怠的意志，削弱其战斗的力量。

2. 宣传品的文字必须是真正的日本文，形式要短小精致，印刷精美，以适合其脾胃。

3. 禁止枪杀俘虏，并给俘虏以很好的招待与慰问，愿回者则给以简短宣传后即释放之。不愿回者则给以由浅入深的逐渐启发其阶级觉悟的政治教育与训练，并分配他们些工作，注意训练一些进步的俘虏，使其帮助我们进行对敌军的宣传工作。

(四)对伪军、伪政权的宣传方针是，努力争取他们，使之同情抗日，直接或间接的帮助抗日事业，孤立日寇，使其不能建立强有力的伪军和伪政权。并且可经过他们以进行瓦解敌军的工作。据此，今后必须注意：

1. 从外部的、临时的转为内部的、长期的工作，要培养一些干部、利用一切关系进入伪军、伪政权内，秘密地、埋头苦干地、长期

地进行宣传工作。

2. 主要口号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不要帮助日本人来压迫中国人，中国同胞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等等，而不能一开始或不合时宜地提出过高的要求。须从增长其对日不满的情绪中，逐渐启发其民族觉悟，争取其对抗战的同情。在其已同情抗战中，可使其对日寇采取两面派的办法，从中给抗日军队通消息并作物资上的帮助。只有在适宜的时机，才能提出反正的口号。

3. 经常在群众中进行反对伪军、伪政权的宣传工作，使伪军、伪政权在群众中陷于孤立。

(五)对沦陷区同胞的宣传方针是：揭破敌伪所加与他们的欺骗与麻醉，揭破敌寇所用的屠杀与怀柔的两面政策，以提高他们的民族觉悟程度与警惕性。据此，今后应注意：

1. 选择忠实可靠的分子，进入敌占区的各种合法群众组织里，再谨慎地进行工作。

2. 利用敌人的残暴，以揭破其欺骗与怀柔，增加其对敌人的仇视。

3. 经常向他们报道我军的英勇战绩与抗日政权的进步法令，以增强其对祖国的热望与民族自尊心。为此，各抗日根据地应多出版专对沦陷区人民宣传的报纸、刊物、小册子等。

(六)总的讲来，今后反敌伪的宣传鼓动工作，必须注意下列几点：

1. 开展这个工作为群众工作。

2. 必须精细地研究敌人及敌人的宣传。

3. 一面应注意敌人的欺骗，一面更须注视客观现实以及敌人欺骗宣传的根据和它在群众中可能发生的影响与作用，从这方面来揭破它，击溃它，这就是宣传战的主动性。同时，应纠正公式化的作风，而注视当时的政治形势，以适合于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形而生动地表达出来，这就是宣传的具体性。在表现的方式上，最好是能

充分利用旧形式,并须根据宣传品在群众中的反映而改进之。

4. 反敌伪宣传工作的组织机构,应充实之,未建立者应建立之。敌占区的这些组织,应采取短小精干与隐蔽的方针。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的领导机关,必须加强对于这一工作的领导,并加强这一工作与其他宣传工作部门的联系与帮助。当地党组织下的各级宣传部门必须切实进行与领导这一工作。

5. 须决心抽出得力的干部来担任这个工作,并大胆地提拔知识分子干部。原有的适合于这个工作的干部不应轻易调动。此外,尚须有系统有计划地提高与培养这方面的干部。

中共中央关于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决定

(1941年8月4日)

目前敌后抗战的总方针是熬时间储力量,因此对敌伪的斗争,不能仅仅依靠我军的军事活动,更重要的是开展反敌伪的一切政治活动。对敌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便是这种政治活动的最重要部门之一。我们在这一方面,某些地区虽有一些初步的成绩,然而更多的地方还没有引起应有注意。

(一)对敌军工作

(1)日本军队不是不可瓦解的,敌后日军经过长期战争,战斗情绪已有变化,虽然这种变化不能估计过分。现在敌军在华泥足愈陷愈深。苏德战争,日本军阀南进及攻苏冒险企图,将使日本更加困难,加之我过去对敌工作已经取得一些效果等等,都是便于我对敌军展开瓦解工作的条件。

(2)对敌军工作方针仍然是加深敌兵厌战怠战情绪与思家思乡情绪,促进其觉悟,达到削弱敌军战斗力之目的。因此不应有过高要求与提出过高的口号,必须从一点一滴去做出普遍的成绩。

(3)所有敌人俘虏,一经解除武装,无论官兵特务宪兵等,一律不准杀害,对士兵可看情形决定释放或留下训练,在影响薄弱地区则以多放为宜,对军官与特务则长期留住,必要时可提出交换。

(4)确定对日侨的政策,凡系普通日侨,不没收其财产,不伤害其生命,只有军营商店及官宪企业才可施行没收,特务机关御用的组织必须取缔,对我捕获的一切敌军军官家属,在给以影响之

后，一律释放，不应要钱求赎，必要时可以交换俘虏或军用品。

(5)对突入我根据地内而暂时不能拔除的敌人据点，应与守备的敌兵及下级军官扩大交朋友的工作，利用其恐惧疲倦情绪，利用其据点中某些物品之缺乏，用送礼、写信、交换俘虏、埋葬死者等等办法建立感情作用，达到彼此暂时的局部的和平，以便利我对敌工作。

(6)应使用日本俘虏及日军中的华人、朝鲜人翻译官来进行对敌军工作，这是很有效的，应加强各地日本人反战同盟与朝鲜台湾人抗日团体的活动，在可能条件下，各战略地区创办日本工农学校、公开向敌军招生，延安日本学校成绩很好。

(二)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

(1)日寇以全力扩大强化伪军伪政权的政策是值得重视的，但由于日寇对伪军伪组织的控制加严，使敌伪矛盾加深，由于日寇南进北进的冒险，由于我在敌后坚持斗争与不断粉碎敌之扫荡的结果，使伪军伪组织不能不在照顾敌人之外，又非兼顾我们不可，因此，伪军伪组织中对我同情增多，两面派普遍出现，这就给我对伪军伪组织之争取以更多更大的便利。

(2)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扩大伪军与巩固伪军。对已组织成的伪军加紧争取工作，以便在将来必要时与对我有利时实行反正，现时应争取对我帮助及不坚决反对我们，这是对伪军伪组织的总方针。

(3)对不同的伪军须采取不同的政策，总的原则，是争取同情分子，控制两面派，打击坚决作恶的分子。

(甲)对坚决作恶分子应以一切方法使之孤立起来，离间其部属同事及日寇对他的关系，瓦解其部队，军事上加以打击，用这些方法，达到消灭或逼其就范。

(乙)对两面派则不应过分为难，应当在实际上承认其两面派

的地位,否则多数敌人是不利的,但对两面派必须采取控制政策,使他不完全靠在敌人方面来反对我,当他完全投靠敌人来反对我时,则应威胁打击之。

(丙)对同情分子必须关心爱护,严格保守秘密,以便利同情者的合法地位掩护我在敌占区活动,不论其同情程度如何,必须保持其灰色的地位,禁止向他要钱及需索资财,应当使他便于应付敌人并约定应付办法,否则给敌人摧残,使后来者望而生畏。

(4)在特殊地区例如我之交通线以及敌人势所必争我在军事上无法夺取,或夺取后不能站稳的敌之重要据点,在这些地方,对伪军伪组织应普遍进行交朋友的工作,少结仇怨,达到改善双方关系为目的。已经建立起良好关系者,则不应争取反正,即使关系平常也应忍耐以图逐渐改进,不可性急,宁让伪军占领,不可引起日寇注意,直接来控制这些区域。

(5)凡已经不能巩固且已受日寇摧残的地区,为求得保存力量,巩固民众抗日情绪起见,我应教育当地民众,善于以革命两面派的态度去敷衍敌人,不应与敌人针锋相对。从长期斗争着眼,少受一分摧残,即多保留一分元气,这是这些地区工作的基本原则。

(6)为打破敌人之军事与经济封锁,坚持长期抗战,应当向敌占之城市及据点,普遍对伪军伪组织建立关系,在建立关系中,可利用各色各样的人员,不要因政治条件限制,经济关系必须与政治关系分开,各种关系必须统一管理,避免大家乱抓。

(7)我们对伪军反正问题,应采取下面的政策,即一般的不要他们立即反正,争取长期埋伏,以待将来的有利时机,特别是成份很坏的伪军,更应劝其不要反正。只有某些深入根据地的而为我必争的据点之伪军,在可能时争取反正。再某些伪军与我秘密关系暴露,不得已才实行反正。

(8)对大股反正之伪军,可以外国军看待,不缴械不强迫改编,不剥夺军官的兵权,合则留不合则去,帮助他们进步,但不应轻易

帮助他们扩大,不看反正动机,不分对象,轻易帮助扩大的办法,结果势必上当。

(9)对伪军工作的最重要的一环,便是加强争取伪军各级军官,对高级官长亦宜加紧争取的工作,事实证明伪军军官是可以争取的,其效力也很大。

(10)关于伪军伪政权中我党组织问题,应以短小精干长期隐蔽为原则,基本上应注意吸收军官入党,但每部只宜有三五党员,切忌庞大,而党员亦不宜过严格组织生活(如支部小组会等),以免破坏。

(11)注意朝鲜侨民的工作,以积极谨慎的态度去争取他们参加反日活动,以便经过他们去瓦解日军的工作。

(三)关于我们工作机关问题

为强化对敌伪军工作,为消灭工作的混乱现象,决定采取如下的组织办法:

(1)各根据地由党政军成立统一的敌伪工作委员会,分区亦设立同样的委员会。地方党书记及军队政治部主任,均须参加此委员会,委员会的任务是总结工作经验,确定工作方针,制定工作计划。

(2)军队中的敌伪工作部,应加强受上述委员会领导,地方党应在接近敌伪的地区成立一些对敌伪工作站。

(3)在接近敌伪地区,设立敌伪工作站,除站长外分敌军、伪军、伪组织、侦察、经济等股。在工作站建立后,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应划分一下,那些交军队办,那些交工作站,那些属边境地方党(县、区、乡),以免混乱。一般的说,政府、群众团体、锄奸机关,概不管理对伪军伪组织的秘密关系,但必须继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寻找关系,把这些关系交给工作站,对伪军进行工作时,工作站必要时可用当地军队名义。

(4)党政军必须抽调得力的忠实的干部去加强敌伪工作和建

立工作站,必须加强对敌伪军情况的研究,总结敌伪工作经验。各根据地应规定专门经费给敌伪工作部及工作站之用。

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

(1944年6月5日)

(一)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不争取在日寇压迫下的千百万劳动群众与市民群众,瓦解伪军伪组织,并准备武装起义,不能配合军队与农村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过去人们以为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寇的任务,似乎只有国民党才能胜任;现在必须改变此种观点,认为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国民党已腐化达于极点,河南数十万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这是证明。仅在无我党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的地方,我党才不能负此责任。

(二)因此各局、各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日寇现在为着救死而正在向中国正面战线大举进攻。日寇正在没落过程中,西方反希特勒斗争,不久可望获胜,太平洋反攻日寇,今后必更开展。这一切给予我党以良好条件。一方面发展与巩固根据地,依据现在基础,建设比现在强大得多的军队与地方工作;又方面,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一俟时机成熟,就可使二者互相结合,里应外合地进攻日寇,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从大城市驱逐敌人的根本思想。

(三)各局、各委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改变过去不注重

或不大注重城市工作与交通要道工作的观点，唤起全党注重此项工作，认真地与细心地总结经验，研究办法，组织机关，配备干部，进行工作，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

(四)要实现这个伟大任务，必须解决下列诸项具体问题：

第一、关于思想：要进行教育，使广大干部完全了解由我党领导里应外合地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以便最后驱逐日寇的可能性、必要性与重要性，没有此种思想教育，是不能动员全党行动的。又要使干部了解：在目前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比过去有完全新的目标；在以前进行这种工作，只是为了保存组织，渡过黑暗，或是为了获取情报与购买物资；现在则是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一切努力与工作，都是为了这个目标，并服从这个目标。又要使干部了解：在目前为了这样的目标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是切合时宜的。因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与中国抗战均已确切接近完全胜利，国民党的极端腐败与我党我军在广大敌后战场的胜利坚持，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更加失望，而对于我党我军则寄以无限希望，敌占区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潮，今后必然有极迅速的高涨；目前去进行这一工作，比以前有更宽广的社会条件与群众条件，因此在以前曾经正确地不提出准备武装起义，夺取大城市的任务，而在现在就必须提出，现在如果不提出，则我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或在将来反攻时逼使我们在没有准备或准备不足情况下去进行争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斗争，使我军将来进攻城市时，没有充分与必要的内应，以及在夺取城市后，不能迅速发动群众，建立城市的革命秩序与掌管城市。又要使干部了解：为着夺取城市与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是一种长期艰苦而伟大的准备工作。由于中国特殊条件，城市武装起义，常常只有在响应城外进攻军队的条件下，即在里应

外合条件下,才有胜利可能(例如1927年上海起义),而没有城外军事行动配合的单独城市起义,是很难胜利的。因此在准备城市武装起义工作中,应该反对急躁病,反对轻率地举行武装起义,反对在没有城外我军配合条件下,单独地或者过早地发动起义,必须要有长时间和极端复杂忍耐的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与急躁的工作所能济事。又要使干部了解:我们进行城市工作的方针和一般策略,是无法秘密的,是应该向全党传达的。但是在城市与一切敌占区的具体工作计划及具体组织工作,则应完全秘密,应在党内进行关于秘密工作的教育,每个党员及干部,只应知道他们所必须知道的事,不应该知道他们所能够知道的事。

第二、关于计划与组织:各局各委应依据自己所属地区内一切大中小城市及铁路公路与伪军伪警的具体情况,拟定一个大体计划,例如如何分工负责,如何组织机关,如何配备干部与训练干部等。应该以每一个城市(大的中等的和小的),每段铁路公路,每个伪军部队与伪警组织为工作对象,都组织一个有能力的工作委员会去进行工作。大城市与大部队还可组织几个委员会分头分区去工作。此种委员会不做根据地工作,专门负责组织与指导各该城市要道与伪军中的工作。此种委员会目前可设在根据地内,或游击区内,如有安全条件,则设在城内。各局各区党委,对所属大城市、中等城市及重要铁路,应委托在自己直接指导下的工作委员会去工作,各敌占县城及小城市,则在各地委或县委指导下组织委员会去工作。对于经常调动的伪军中的每一个军或师,应在适当党委指导下成立一个委员会去工作。但是同时这种工作还应动员全党全军一切组织多头地与分路地去进行。从支部到中央局各级组织,只要它对城市与交通要道伪军伪警有办法去进行工作者,均应直接派人去工作,暂时不必统一,关系亦不必交代,如各种关系在工作中群众中碰头时,则应彼此关照协助,不应彼此争夺和抱怨。这种工作应由各级党委负责领导。但为管理方便起见,在各局及区党委之

下可成立城市工作部门,这种部门除指导和组织城市与交通要道秘密工作外,还应指导敌区城市与交通要道附近的小型便衣游击队,借此给城市工作以便利。这种部门应住在根据地比较隐蔽的地方,不要与根据地党政军混在一块。

第三、关于工作方向:由于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反对民族敌人,大局有利于我,城市与要道周围或其不远地方,又有我党强大军队与根据地,这种工作将有极大开展的客观条件。在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人民中,除开极少数死心汉奸与顽固反共分子外,大多数人能够参加或同情各种各样抗日工作的,因此我们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一切群众中,各界人民中,都要进行广泛而妥善的工作,在伪军伪警中,在工人苦力中,在伪政界、伪经济界、伪文化界中,以及在青年学生、儿童、妇女中,甚至各种秘密结社与流氓组织中都要去进行工作,但应将主要注意力放在争取数十万伪军伪警和争取数百万工人苦力的工作上,因为他们是武装起义的决定力量,而这点正是各地以前所注意不够的。我们在工人苦力中的活动与组织,应与上层统一战线的活动分开进行;而上层活动一般应是为了掩护与协助下层群众的活动。我们的活动不应与国民党组织发生任何关系,我们应在群众中揭破国民党人的反动腐败无能和只顾少数人利益不顾民族利益,肃清大城市群众中对国民党任何幻想。过去我们在大城市为情报及经济工作而建立的组织与关系,仍应进行情报与经济工作。只在可能情况下去进行一些上层活动与群众工作。为了广泛造成根据地与城市(特别大城市)和要道的交通联系,并为准备夺取城市和要道的军事出发地,应在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的人民中进行充分的工作。根据地游击战争应采取各种妥善办法向城市四周与要道两侧逐渐逼近;在那里建立隐蔽的游击区,以利城市与要道工作的进行。同时要动员城市与要道中的大批工人与革命知识分子出城参加游击战争,其中若干人准备在起义时派回去指导起义的武装斗争,以便里应外合,占领城市与要道。

重说一次，里应外合的思想，是我党夺取城市与要道的根本思想，应从这点出发去部署一切力量，布置一切工作。

第四、关于工作方法，到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方法，应从总结已有经验中取得，并应在以后的工作中不断去总结经验，将群众中创造的各种好方法普遍化。但应指出：党在内战时期在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方法，一般是错误的，是不能采用的，应该批判这种错误，以免重复。而在抗战以来，各根据地在其附近敌占区与某些小城市进行了极有效的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配合的工作，在某些大城市，也有许多好的工作。在这些工作中，其方法一般是正确的。如果将我们在敌占区与小城市的工作经验，加以适当改造，就可移用于大城市、中等城市和交通要道。各地应用心研究适合每一个地区，每一种群众，当时环境中合法与非法相配合的斗争形式。在敌占区，党的抗日团体的组织，只能秘密进行，因此应该注意精干隐蔽，严防特务分子混入。但各种普通群众组织与群众活动，就应该公开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形式去进行。例如利用已有的各种伪组织（新民会、自卫团等），或成立各种灰色社会团体，或建立纯粹的但与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社会职业机关与职业活动（茶馆、饭店、荐头房等），甚至利用工厂、工房、学校、店铺，在为了共同欺骗与应付敌人汉奸，保护中国人的口号下，成立其中所有人员某种无定形的联盟，亦是一种很好的群众组织形式。我们常看到根据地附近乡村中全村人联盟，共同欺骗与应付敌人汉奸的严密组织和分工，这种办法应该运用到城市某些工厂、工房、学校、店铺中去。应从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把群众联合起来，例如减轻负担，免除骚扰，隐藏物资，以及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均可以成为群众联合活动的出发点。而敌人对华新政策的欺骗做法，则大可成为我们和群众利用的合法口号。其次，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区各阶层人民中的极高威信，亦可成为我们城市工作的有利资本，许多人以听到我军消息，与我军建立某种联系，取得我军某种证件为荣耀者，我们

应该利用这种情形去促进人民的团结,但这在敌区是非法的,应该十分隐蔽的有限度的去利用。在目前,城市 and 要道的一切非法活动与非法斗争,以不妨碍和破坏我们的合法组织和合法斗争为限度。这点与根据地附近游击区中的合法与非法联系的斗争是有些区别的,在游击区中的合法斗争,常常是为了掩护非法游击队的活动和存在,而在城市与交通要道则相反,非法斗争常常应该服从合法斗争。在敌区的宣传工作,亦应采用许多合法形式去进行。利用各种合法的报纸,也是应该进行的,但应切实考虑其方法。在目前口头宣传是主要的,甚至可用散布流言的方法。发行非法的传单、书籍、报纸,则应有周密谨慎的组织。总之,在城市工作方法上应反对两种偏向:一是粗心大意,不负责任,大喊大叫,莽冲莽撞的冒险主义方法;一是根本不动,单纯隐藏,不去联系群众与进行群众工作的尾巴主义方法。正确方法,是在一切可能的与合法的范围内,去联系与团结尽可能广大的群众,去提高群众的觉悟性组织性,而使精干的秘密组织与秘密活动,隐藏在广大群众之中,隐藏在群众的合法活动之中。而在举行起义以前,一切组织形式与斗争形式,均应避免定型的与系统的形式,采用各种不定型的与分散的方式,以期多得胜利,减少损害。

第五、关于干部:必须有大批干部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现有在城市工作的干部及过去在城市工作过的老干部,都应设法使他们仍旧担负这种工作,但应使他们吸收新经验,并在新方针下,用新方法去工作。其次,数年来在各根据地附近敌占区的两面斗争中,已经锻炼出广大而善于进行合法斗争的党与非党干部,其中许多人是有善于应付敌人、欺骗敌人进行合法斗争的丰富知识的,有些甚至超过我们内战时期城市工作的老干部。其中许多人,是能够到城市工人苦力中及其他各种职业中立足的,应该很好地训练培养与使用这些干部。只要这些人有办法到大城市、中等城市及交通要道立足,并能进行工作,就应抽调一些出来,加以短期训

练派去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工人、农民及其他各种职业者，或党与非党干部均可。而这种干部，现在各根据地是很多的。再次，就是各根据地都有一些人经常到敌占城市经商、做工、谋事，特别是苏北与胶东，每年有数十万人到上海杭州及满洲各城市谋生。因此，应从这些人中寻找与训练出各种各样的城市工作干部。此外，在伪军俘虏中亦可训练一些干部放回去。根据地土绅到城市居住者，亦可给他以某种任务和名义到城市去活动。就是根据地中因有某种政治嫌疑而不易弄清楚者，亦可派他们到敌占城市进行某种独立活动来考察他。而在各种干部中，要特别注意培养各城各路的当地干部，外去干部应把自己当作当地干部的引路者与保育者。在根据地中，还可以找到原来在城市及要道生长与居住过的干部，加以训练派回去。总之，我们应放手使用各种各样干部去进行各种各样工作，并使各种人的各种工作都分开进行，不混杂在一起，多头的与分路的去做。但同时又必须保持党的秘密组织之精干纯洁与可靠，在一切大中小城市及铁路公路上建立起党的多数可靠据点，作为伟大城市工作的领导骨干，形成党的领导骨干与广大人民群众相结合的局面。此外，在根据地中，各级党政军民的负责干部，均应切实研究与学习城市工作，研究城市的武装起义及里应外合的斗争艺术，研究建立城市革命秩序，掌管城市及大的工商业，作为将来夺取与管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准备。

第六、关于经费：必须有大批经费去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的工作，只要不引起干部的浪费及城市工作人员的雇佣观念，一切必需的经费，是应该充分付给的。各根据地各种组织，为了进行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的必须开支，应准予报销，在各根据地预算中，应准备一笔充足的的城市工作经费。发给资本到城市与要道去做生意，以其盈利充工作经费的办法，也是可以采用的。

(五)上述各项具体问题的意见，应由各局、各委依据当地情况，加以切实研究，灵活地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并在以后工作中

加以充分发挥。只有这些具体问题完全解决，才能使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获得显著成绩，走向武装起义的目的地。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城市工作部门的指示

(1944年9月4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及五师：

(一)你们接到中央关于城市工作指示后,对该项工作之具体布置及进行情况如何,望即电告。

(二)地委以上各级党部须立即建立城市工作部,在党委与上级城市工作部领导下,专门负责管理城市及交通要道工作,不兼其他任务。其负责干部,应根据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为当前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之原则来配备,要真能负责指导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千百万群众,瓦解伪军伪警,以准备武装起义之艰巨工作。上述干部决定后望即电告。

(三)凡本地有城市或交通要道工作可作,或有可能进行其他区域城交工作之县委,应指定专人负责进行工作。

(四)各地城市工作之进行情形及其经验教训和你们工作中所遇到的困难与新的问题,望随时报告中央城市工作部。

(请军部转一、二、三、四、七师及浙东)

中共中央关于中央城工部的工作方针及各地城工部工作办法的规定

(1947年4月29日)

各中央局、各分局并转区党委，并告刘、朱、叶、杨、罗迈（请转沪港）：

甲、中央城工部自去年年底改组后，其职务已定为：在中央规定的方针下，研讨与经营蒋管区的一切工作（包括工农青妇），并训练这一工作的干部，部分党务、统战、农村、文教、顽军五组，部长由周恩来兼，副部长由罗迈担任。现城工部在中央后方，暂驻晋西北。

乙、为加强与统一这一工作起见，中央责成各地城工部亦依此方针进行工作，并规定大致办法如下：

(1)各解放区之中央局、分局下均设城工部，各解放区之区党委，其周围有蒋管区可进行工作者亦得设城工部。

(2)各解放区城工部应进行工作之蒋区范围，依战略区分，大致为：东北解放区管东北蒋管区全部，热河管热河及冀东，晋察冀管察哈尔、冀中及平津，晋绥管绥远、晋北、吕梁及大同、太原，陕甘宁管西北五省，华东管鲁、苏、皖、浙、闽、赣及青岛、济南、徐州、蚌埠，晋冀鲁豫管晋西南三角地区、豫北、豫东、济宁及新乡、郑州、开封，中原局管豫西、豫南、湖北、湖南及武汉、信阳，川工委管四川。各解放区所管蒋区范围内之区分，由各局自定。

(3)在蒋区内，我地方党所管范围大致为：上海局管长江流域

及西南各省与平、津、青岛、台湾，香港分局管华南及南洋各地，惟曾镜冰组织仍直受华东局领导，与上海局、香港分局可取联系。

(4)在蒋区工作，各解放区间，各解放区与蒋区地方党间，有互相重复及交叉之处，仍照旧进行，平行发展，不必打通，其可能发展之处，亦不必受上述二三两条的范围束缚，应力谋平行发展。

(5)各解放区在其所接近的重要城市(如长春、沈阳、平、津、太原、青岛等)附近解放区内，得设城工部派出所，并附设电台，专门联系与领导那一城市的秘密党工作，并向该城市输送宣传品。

(6)各级城工部内部的分工，依据各地需要自定之。各地瓦解顽军工作，如一向属于军区军队政治部应照旧不改，城工部只负责进行蒋区地方团队中的工作。

(7)各地城工部关于工作的报告与指示，仍须经过各级党委向上下级传达。

(8)各局各分局关于城工部及蒋管区工作之重要报告与请示应直电中央，至城工部经常工作报告与技术性的问题，可电中央后方电台转中央城工部，具体材料亦送该处，中央城工部得自行处理与答复。

丙、各地执行情形及各级城工部组织与名单，望告。

冀鲁豫军区关于颁发抗日同情证书的文告

(1942年1月1日)

发给抗日同情证：

中国抗日于兹六年，我全国军民团结奋发，坚持抗战，胜利曙光，日益接近。日寇既陷泥足于中国，又与世界三十馀国家为敌，内外交困，覆亡不远，尤复利用无耻汉奸汪精卫、孙良诚、文大可等，成立伪组织、伪军，淆乱听闻，驱使中国同胞，送往太平洋作战。本部为挽救此等误入歧途之伪军伪组织同胞，不做无谓牺牲，重回祖国怀抱，免得将来玉石俱焚，与日寇同归于尽计，特颁发抗日同情证，凡伪军伪组织同胞，持此证反正来归者，当不咎既往，准其为抗日公民，余敌反正有功抗战者，当予以褒扬，反正时携带武器弹药□□□□□以□□给价，其因环境限制□能□时反正，持此证与抗日军政机关接洽，秘密帮助抗日工作者，当予以种种便利。

切切

冀鲁豫边军区司令杨得志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一日

(中共泰安市委党史办公室提供)

冀鲁豫区党委 关于目前敌伪工作的决定

(1943年1月3日)

第一 方针

一、根据北方局对边区工作的指示,估计今后边区发展的趋势,对敌展开以政治攻势为主的全面进攻,拆散敌伪顽会匪的联合,孤立敌人,是达到坚持根据地与巩固基本区的重要环节。因此,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政策上更进一步地加强与改善敌伪工作。

二、目前敌伪工作的重点,应放在伪军组织方面。以对我破坏威胁最大的伪军为我进攻的主要对象,求得打开工作局面。其动摇者应进一步争取,改善彼我关系。已有工作者,力求隐蔽深入,达到政治上进一步掌握。

三、根据目前情况,从坚持根据地的观点来看,伪正规军对我破坏威胁最大。区党委、军区、地委、军分区应着重正规军;个别分区,如二分区伪警备队威胁最大者,应以伪警备队为主要对象;各县及网站则主要负责伪警备队、自卫团及县区伪组织工作。

四、争取伪军官有重要意义。必须转变过去那些只作下层、不敢接近上层的倾向,但深入内部工作,发展党、求得掌握,仍为伪军伪组织工作的重要环节。不能满足于拉拢联络、情报、经济关系,要大力派遣打入人员,使其成为深入内部组织工作的骨干。决定全区半年派遣100个干部党员,打入伪军伪组织中工作;即一、四地委各20名,二、三地委各15个。争取反正,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是可以的:

1、当我们必要拔去某据点时，应策动内部响应，但要考虑各种条件是否有把握，无把握的策动内应是有害的。必要策动内应时，尽量保留一部分不暴露，以便在不能全部解决伪军的场合下，仍继续埋伏工作。

2、当内部关系暴露，可能被敌人解决或遭受意外损失时，组织反正以保存力量。

瓦解伪军逃亡，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是主要的方针。对最坏的伪军，难于进行联络争取，对我危害很大的，则应大力进行瓦解，造成大批逃亡反正，求得削弱其力量，或在我大力瓦解下促其反正。造成打开局面的条件。

3、当战争形势变化，或在我军事政治进攻下，敌人内部严重恐慌动摇时，应以瓦解为主，加紧其动摇，造成大批逃亡反正，及我深入掌握的时机（我军没有力量掌握的伪军）。

4、对正在扩大的伪军区、新兵队，或正在改组调动、撤换干部时，是瓦解的最好时机，应以大力进行之。

5、在某一具体情况下，或特殊季节（如樱花前），应以日军为主，大力突击之，方针是继续加深日军厌战情绪，促进反战觉悟。要充分发挥日本反战同盟及朝鲜同盟的作用，进行工作，扩大其政治影响。

6、必须强调隐蔽政策，严格秘密工作纪律，彻底克服混乱现象，规定除敌工人员专门负责进行工作外，党政军民及一切工作人员，未经党委委托者，概不许随便与敌伪发生关系。严禁借做敌伪工作，企图索取财物及其为个人保险的卑劣行为，违者应受组织上行政上严重处分。

7、普遍实行伪家属登记。应根据去年关于建立伪属的规定，由政权系统负主要责任（主要责成区负责进行）。乡村支部应协助秘密考查，在敌区活动之游击队、武装工作队、县区武装积极配合协助。要求今年春季将基本区内伪属登记完竣；并积极向敌区、连敌

区进行登记。要求全年伪属登记达到伪军伪组织总数四分之一(以分区为单位计算)。调查登记伪属,主要是通过伪属打通敌伪关系,并要他们帮助进行宣传、调查、情报等工作。至于发动叫子索夫,瓦解逃跑还是次要的。

第二 组织问题

一、区党委、地区设敌工委员会,专门研究敌伪工作政策方针,检查总结工作及经验教训。敌工委员会不是权力机关,一切指示决定须经过党委批准后,均以党委名义发出。也不是执行机关,具体工作由敌工部门负责执行,其组织以党委的常委、军区、分区政委、主任并吸收敌工、除奸部门负责人同志参加。如政治部主任是党委常委时可兼任书记,区党委决定以崔田民、苏振华、黄敬、李一非、谭善和、万晓棠六同志组成敌工委员会,以崔田民同志为书记,李一非同志副之。各地委敌工委员会人选由地委决定,报告区党委批准。县不建立敌工委员会,县设敌工部,由县委委员任部长兼敌工分站长。

二、网站是专门进行敌伪工作的下属组织。军分区可根据情况设支部或不设。各县分站,由县委敌工部长兼分站长,直接受分区敌工科领导。县委应负责保证上级指示彻底执行,并在上级指示原则下,布置、计划、指示、检查其工作,针对具体工作对象,可以设小站,以分区级干部或强的支干任站长,直接对分站负责。分区委非经县委的介绍委托,不与分站发生关系。

三、区党委、军区、地委、军分区,可建工作团,专门进行某一大股伪军的工作,工作团书记,参加一定组织(地委或县委),如条件不适合时,指定党委之一负责领导。

四、工作队是部队进行敌伪工作的突击力量,以分区为单位,组织一个至两个,直接受敌工科领导,敌工科长兼任队长,另外得设队副、政治指导员(或政委),任务为:

- 1、深入敌区活动,进行对敌伪宣传工作。
- 2、通过各种关系,寻找线索打通敌伪关系,建立网站。
- 3、调查敌伪状况,并协助政府进行伪属工作。

4、帮助部队的日语教育及连队的宣传队工作。工作队要有固定组织,在一定地区进行长期工作。工作方式上,集中分散可灵活应用,秘密公开结合。保持几个人不公开出现,以便进行秘密工作。工作队到一定地区后,在执行总的任务下,县委有权力布置、指示、检查其工作,也有责任从各方面密切配合,给予工作上的便利与帮助。工作队负责同志如条件相当时可参加县委会。

第三 各方面关系

一、敌区一般群众工作、党的工作、据点支部工作、城市学校工厂街道工作、非武装组织之会道门、帮会,归党委负责。

二、敌工部与党委的关系:

1、部队敌工部门,是党委关于敌伪军工作的执行部门。党委通过政治部对敌工部门进行领导。

2、在伪军及伪组织中的党员及党的组织系统归党委领导,部队敌工人员及网站人员,必要时可受党委的委任领导,伪军伪组织中的党员及党的组织对党委负责。

3、伪军官及特务警察宪兵,一般不形成党的组织,采取个别领导方式。

4、士兵及无关重要之下级雇员夫役等,应直接归党委组织部领导,不与上层及敌工人员发生任何关系,以保证上层与下层中的秘密。通过党委交换情况,但不能暴露组织秘密。

5、上层党的关系,只许县委组织部长和直接负责的县委敌工部长知道,其他任何人无必要时一律不应知之,只有在具体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知道个别的或一部党的关系。

三、与除奸部门关系:

1、工作上层属于争取瓦解性质者，完全归于敌工部门。

2、同一对象(人)不能两处布置工作，必要时可以统一于一方面，如该对象是党员时，则通过党的组织布置工作。

3、所有俘虏首先通过敌工部门处理，所有逮捕来的汉奸，首先经过除奸部门处理，但有协同收集材料交换情况、介绍线索之责。

四、与侦察经济部门的关系：

1、敌伪关系，必须与情报、经济关系严格划分，不得混同。

2、同一对象必要处理两种任务时，应统一于主要方面，其次要方面通过主要方面进行工作。

3、有互相介绍关系、协助工作之责。

4、原则上能隐蔽埋伏的敌伪关系，不做一般经济情报工作，特别重要的情报例外。

第四 干部问题

一、目前敌工干部数量及其质量均差，此次精简后，各级党委及政治机构，应充分认识这一工作，对边区的重要战略地位，从各方面调查网罗敌工人才，决心调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二、敌工干部分为下列三种：

1、党员、政治上可靠者(基本干部)。

2、非党员系积极抗日的同盟者。

3、两面性的一面不纯分子(利用的)。此三种人员，使用方法不相同，但要互相联系与配合。

目前配备干部主要是第一种，二、三种应在工作中物色吸收之。

三、干部问题的解决。工作干部主要由区、地两级负责。网站干部主要由县委负责，工作干部主要由部队负责。

第五 经费及其他

一、所有敌伪工作经费(城市及敌占区工作除外)归部队统一开支报销。经费开支,以伪币为标准计算,不得强用粮票。化装便衣必须要适合敌区环境。

二、关于处理叛徒自首分子、被俘人员,及对伪军伪组织中国民党的方针,另有指示。

三、以前发过的敌伪工作方针、组织关系、各种制度,统一此项决定修正之。

①

边区敌伪点线及敌伪顽分布概况(摘录)

(1943年12月)^①

一、1941年6月底(冀鲁豫、鲁西两军区合并前)

(一)冀鲁豫区：

- 1、敌据点 31 个，兵力约 2500 人……
- 2、伪军据点 108 个，兵力约 10000 左右。
- 3、公路 29 条，长 1700 华里。
- 4、封锁沟一道，长 40 里。

(二)鲁西区：

- 1、敌据点共计 197 个，兵力约 3000 人。敌第十混成旅团分布于济南至泰安沿线，有 2 个大队分布于秦西。
- 2、伪军共约 5000 人。
- 3、顽军约 30000 人左右。
- 4、公路共计 39 条，长 2000 里。
- 5、封锁沟一道。

二、1941年12月底(冀鲁豫与鲁西合并后)

- 1、全区敌据点 207 个，兵力约 5400 人。
- 2、全区伪据点 395 个，兵力约 35000 人。
- 3、全区顽据点 78 个，兵力约 30000 人左右。
- 4、公路 108 条，长 5000 里。

三、1942年6月底

① 原文未具时间，此系编者判定。

1、全区敌据点 146 个,兵力约 5000 人。

2、全区伪据点 639 个。

3、顽军 20000 人左右。

4、公路 159 条,长 7000 里。

5、封锁沟 13 道,长 300 里。

四、1942 年底(湖西军区并归冀鲁豫军区后)

1、全区敌据点 199 个,兵力约 6300 人。

2、全区伪据点 899 个,兵力约 80000 人。

3、顽军约 39000 人。

五、1943 年 6 月底

1、全区敌据点 170 个,兵力 6000 人。

2、全区伪据点 990 个。

3、公路 168 条,长 9500 里。

4、封锁沟 82 条,长 2400 里。

5、敌变动

①进一步依靠伪军守备。

②加强前鋒段的据点守备力。

③兵力运输线变更。

④敌新兵占三分之一强。

⑤(略)

⑥(略)

6、伪军变动

兵力约 10 万余人……。

7、顽军变动,兵力约 30000 人。

8、公路 186 条,长 9500 里。

9、封锁沟 82 条,长 2400 里。

10、封锁墙增加 2 道,长 210 里。

六、1943 年底

- 1、全区敌据点 140 个
- 2、全区伪据点 1235 个。

①

冀鲁豫分局关于开展大城市工作的决定

(1945年)^①

(一)中央去年5月、6月指示及历次号召把“大城市工作与根据地的工作提高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分局对这一工作重视不够,抓得不紧,未能及时布置下去,使这一工作之开展受到不少影响,我们应急起弥补。

(二)在目前有利于我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开展这一工作更增加了新的有利条件,必须抓紧这种良好时机开展大城市工作。目前开展这一工作的主要关键是,全党同志重视这一工作,下定决心抽调一批干部建立组织。

(三)关于组织问题,分局有以下决定,望各地委讨论执行。

1、分局、地委、县委建立城市部,专门管理大城市的工作。各大城市(如济南、开封、徐州等)归地委领导(济南归一地委,徐州归十一地委,开封归十地委,新乡归九地委);二等城市(德州归六地委,邯郸归三地委,济宁、兖州归八地委,顺德归二地委,聊城归七地委,临清归四地委,兰封归十地委,归德归十二地委);一般应由县委领导,无县委者交附近县委或地委直接领导,由地委决定。

2、普通县〔即无大中城市之县〕是否设城市部由县委自行决定,不设城市部时可把县城单独划为一个区,由县委直接领导,或交附近区管理开展城关群众工作。总之,城关工作需有一定人负

① 原文未具月、日。

责。

3、地委城市部，设部长一人、干事一人到三人。为开展或突击大城市工作，城市部可增设工作队，人数由地委按工作之需要自行决定，但工作已有头绪和建立正式组织——×市工委或市委；县委城市部设部长一人、干事一人到二人。

4、大城市工作在开展初期不必求得统一领导。凡有关系的部门（如部队、政府）及地区（即这地区进行另一地区的大城市工作）均可分别进行。在工作有相当基础后，统一到那一组织或地区由分局或地委决定。

5、为了搜集经验及工作上的配合，城市部开会时或党委讨论有关大城市工作时，可吸收部队上联络处，及办事处敌工科、敌工站之主要负责人参加。

6、为从各方面开展大城市工作，在大城市的本身组织机构，特别是在我们公开活动包围下的大城市（如济南），应有党政（工商部门在内）以便开展对大城市经济斗争，经过经济工作开展大城市工作）军各种组织，以便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各方进攻。为便于市内市外的配合，在组织领导上，应把大城市近郊地区与大城市划为一个领导单位。

7、铁路线工作。目前应督促铁路线附近各县利用现地及现有的关系，开展铁路线工作，必须指定一定的人负责地委、县委城市部，亦应注意调查抽调与铁路有关系宜于开展铁路工作之干部开展铁路工作。

（四）大城市工作重点应放在伪军伪警及工人苦力身上，只有这些工作开展，才能实现武装起义内应外合的任务。

（五）关于干部问题。抽调与动员根据地干部打入城市与交通要道进行工作。如过去做过城市工作的老干部，长期在敌占区接敌区工作而又有善于应付敌人、欺骗敌人进行合法斗争的丰富知识者，原来在城市及交通要道生产与居住过的干部，及现在城市与交

通要道有可靠关系便于立足者,只要不是很红,而且政治上可靠者,不论党员与非党群众,都可加以训练派出工作。即是因抽出使其他工作受些损失亦在所不惜,否则今天舍不得抽干部到反攻时期将遇到很多困难或多死更多的人。另外,在普通县城工作者,还可抽出一部到大城市中去。再即动员城市与交通要道附近的地方党员,及可靠群众到工厂中去进行下层工作;从到城市谋生及到城市作贩运的小商人中,寻找可靠者加以训练派进工作;从伪军俘虏中亦可训练一些放回工作;根据地士绅在城市居住者亦可给以某种任务。此外,动员城市青年及各种关系,到根据地来加以训练后派回工作。除上述干部的准备外,更要特别注意培养各城各路的当地干部,从城市的内部的工作中培养干部。但对所有干部必须进行思想教育,搞清城市工作方向与工作方法,并进行群众观念与秘密工作及反特务、反奸细斗争的教育。对在内地工作干部及新发展党员也要在工作中进行普查。

(六)经费问题。要有独立的经费,在开支上必须用的得当,在不浪费、不是雇佣观念下,应充分地供给。

(七)这一工作我们经验还很少,希望各地委、县委,根据中央指示及城市工作,研究联系当地具体情况,作切实研究,并作具体计划及实施步骤,求得在最近期间将组织建立起来,并努力争取作出一定的成绩来。执行情形及经验及时报告分局。

第十一军分区司令部关于 敌伪叛调查的材料

(1945年5月1日)

说 明

- 一、钜南各县(嘉、钜、城、定、荷)暂缺。
- 二、此材料中顽军材料极不完整,而数目的估计较低,容以后补正。
- 三、此调查多为5月份以前的材料。

徐州方面

一、敌军部分:

(一)徐敌六五师团之编制装备:

65D:中支派遣军专第九九九0部队,师团长久米(少将)据说(5月初)已南调住,新住不详,师团部住北关庆云路第十中学校旧址。下辖两个旅团:

70B:旅团长村上,住宿迁,代字代号不详。下辖四个大队其分布如下:

第一三四大队队长山泽(大佐),住淮阴。

第一三五大队队长竹下(中佐),住睢宁。

第一三六大队队长行基(中佐),住海州。

第一〇六大队队长松田(中佐),住宿县。

71B:旅团长重松吉山。住徐州东南八里大郭庄(飞机场内),

代号为专单九四二九部队,现住 2000 人(内有七九九六一部分),下辖五个大队,其分布如下:

专第七九九二大队队长柿木,现住 800 人,住九里山营房(为三旅后门住一部 200 人)。

专第七九九三大队队长不详,现住子房山一部 200 人,马 200 匹,军犬 100 只。

专第七九九四大队队长不详,现住丁房子一部分 300 人(七九九六营房内)。

专第七九九五大队队长岗田,住礪山,现住东店子 500 人(七九九六营房内)。

专第七九九六大队队长炳田节,现住东店子 800 人,番号为独立五八大队。下辖五个中队其分布如下:

第一中队队长中田实八节,住丰县,共 120 人。下辖三个小队,住丰县两个,住陈腰楼一个。附山炮一门,重机一挺,轻机五挺,手炮五门。

第二中队队长不详,住肖县,现黄口住一个小队,队长荒田,其新兵 70 人,附重机一挺,迫击炮一门,轻机二挺,手炮三门。

第三中队队长不详,住大郭庄。

第四中队队长不详,住柳泉。

第五中队队长中古(大尉),住敬安集,共 100 人(4 月 27 日已撤除)。附重机一挺,小钢炮一门,轻机四挺,手炮五门。

重机中队,步炮中队(均不详)。

炮兵大队:大队长佐腾,代号专第七九九一,住堤子街,300 人,马 100 匹,装备不详。

汽车大队,大队长不详,现云龙山一部 80 人,汽车 10 辆,九里山汽车 30 辆,装备不详。

骑兵大队:大队长不详,前住九里山一部,骑兵 400 匹现移何处不详。

(二)徐敌各特种部队；

1、铁道兵——徐州警务段警务部长田中，住车站下。其人数如下：

(1)日本警务员 20 人(内 车警乘长 10 人)。

(2)中国警务员 200 人(内 车警乘长 30 人)。

(3)便衣特务 70 人。

2、铁甲车部队——甲第一四一部队队长宫藤，住新□，下辖三个中队，其第三中队队长茅野，住徐州。下辖四个分队(前为 118、119、120、121，现不详)人数车列装备如下：

(1)人数与车列——第三中队共 150 人，铁甲车五列，每列八辆。

(2)装备——每车钢炮一门，重机二挺，轻机二挺。

3、医院部队——登第一六五一部队，队长兼院长 谷铁阳(大佐)副官治山(中尉)，曹长野战附吉(上士)、通译林正明(朝鲜人)，住老机场东北角，其人数装备如下：

(1)人数——700 人，(内有登第一六五七 100 人)，女看护 40 人，工人 200 人。

(2)装备——重机枪四挺，汽车八辆。

4、宪兵队：

(1)宪兵本部：队长膳雄(少佐)，住英士街西首。下分警务、思想、□□、总务各科。计班长以上 20 人，班长以下 15 人，通译二人，便衣 20 人。

(2)宪兵中队队长小室(中尉)，住大同街。以下也分五科，计班长以上 20 人，班长以下 34 人，通译三人，便衣 30 人(前三月份老兵多调往太平洋作战，新换新兵充任)。

(3)车站派遣所——日本人七八名，中国便衣五六人，住车站下北首。

5、剿共大队——甲第一四二四部队队长□本，驻车站下北首

日本仓库内,共 40 人,其他不详(四月下旬已换甲第 15758。人数比前增多,但其详细情形尚未查明)。

(三)徐敌各种军事设备:

1、铁路:

(1)津浦、陇海两铁路,均系原有的单轨道,宽 1.57M。车头方面:徐州共有好的 10 部,坏的 20 部。

(2)通车次数及时间(略)。

(3)车站设备状况:

(1)站房位置:

①东站站房在道西出入口向东,约一华亩,下用砖砌,上用镍□沙□构成。

②西站站房在道南出入口向北,约半华亩,下用砖砌,上面是沙□构成。

(2)水塔位置:

①徐州东站四个,计机车房内二个,站北道西一个,站南道东一个,均径粗 5 米,高 5 米。

②韩庄车站北道西一个,高 30 米,径粗 10 米。

③临城站北道东一个,高 30 米,径粗 10 米。

(3)有关营房及修械场:

①车站营房:

甲、徐州站下北首一处面积约 30 华亩。瓦屋楼房 300 间是原有的。另一处在站南道西,面积 100 华亩,新花样楼房 500 间,是新筑的(1944 年完成)。

乙、临城站东北面积 2 华亩,新筑红房子约 100 间,系新筑的(1939 年完成)。

②修械厂(车头房):

甲、徐州修械厂在东站东首子房山下,面积约 20 华亩。车头房 70 座,工作室 50 间,是原有的,工人 1000 人。

乙、临城修械厂在站东敌兵房南，面积约 20 亩，车头房 10 座，工作室六间，是原有的，工人 200 人。

(4) 铁路守备情形：

① 敌军守备——铁甲车部队（详见特种部队）。

② 伪军守备——警务段组成巡道队，日本 3 至 5 人，警务段 10 人作一队，每晚 8 时出发，次日早 5 时回来，津浦陇海两线，皆外出 10 里路为界。

③ 民众守备——爱路村长每夜带村民巡逻，次日早晨向所属警务段报告，如有事故时，该村长要负责任，须受处罚。

④ 护路沟封锁墙——津浦、陇海两路两侧均有护路沟和封锁墙，但是平地挖沟，遇有山石则筑墙，一般的是沟深 15 华尺，宽 20 尺，墙高 5 尺，厚 2 尺许。

⑤ 碉堡岗楼——津浦、陇海两路两侧均有碉堡岗楼，距铁道约 15 公尺许，间隔 2 至 5 里一处。

⑥ 守备强弱——徐州、柳泉、临城等站守备较强，其他各小站守备很弱。每站两头及铁路上有跑道处，均有保安队或警务段守备，以皆无人守备。

2、公路：

(1) 沛铜公路——由徐州到沛县，长约 160 里，中经□湾、大张砦（沛伪守备）、郑集、湾集、唐沟、平山口（徐伪守备），事变前修。

(2) 徐砀公路——由徐州到砀山，长约 180 里，中经郝砦、杨楼、李庄、黄口、夹河砦、刘堤等铁路车站据点（均有敌伪警守备），1942 年修成，不常通车。

3、据点（附据点登记表）

徐州敌伪据点登记表

据点名称	位 置	敌军数目	工 事 筑 构	其 他
敌据点	九里山南	800 人	砖墙外铁蒺藜电网三尺, 门二向南开	九里山大兵房距徐西北九里。
敌据点	东房子西北	2000 人	砖墙铁蒺藜, 电网四尺, 门一向北开。	东店子大兵房, 距徐东边六里。
敌据点	大郭庄南	2000 人	土围子木桩上张电网五重, 三尺, 门二东北开。	新机场兵房, 专保机场, 距徐东南八里。
敌据点	骆驼山北	800 人	土围子, 电网高 5 尺, 外小三尺, 门二北开。	老机场兵房, 距东站二里许。
敌据点	子房山南	700 人	内砖墙四尺, 外土围子电网三尺, 二门向南开。	日本病院兵房, 距东站二里半。
敌据点	子房山西	20 人	木桩电网, 一门向南开。	
敌据点	中正街交通银行内	10 人	土围子, 电网二重三尺, 一门向北开。	敌修械所, 工人 200 人。
敌据点	南马路北, 三马路南	60 人	西石砖墙, 东、北、南三面电网五尺, 一门向南开。	敌火药库及汽车修理厂, 工人 30 人。

敌据点	堤子街南头	300 人	周围砖墙上张电网高五尺,一门向北开。	敌炮兵部队
敌据点	云龙山下北面	80 人	周围砖墙电网,关帝庙内,门一南开。	敌汽车部队
敌据点	中央公园对门	20 人	高大砖墙瓦房,门一向东。	敌师团长宿舍
敌据点	庆元路北第十中学	500 人	周围砖墙电网,二门向南开。	敌师团部
敌据点	夹河街北关	20 人	周围砖墙上有电网,楼房,门一南开。	敌师团部来军官宿舍
伪据点	北站东首	3700 人	四周砖墙内,有二门。	淮海省保安队训练处
伪据点	北站北首	50 人	四周砖墙内,有二门	淮海省保安队在海监院,淮有临时监狱
伪据点	北站南首	400 人	四周砖墙内,有二门。	绥靖公署教导团内训共人剿员。
伪据点	西关义塚北	50 人	四周土围子,围成四尺,一门向东开。	保护淮海修械所,内工人 500 人。
伪据点	公安街府内	400 人	砖墙瓦房内,门南开。	铜山县保安队。

伪据点	公安街中警察局内	400 人	砖墙瓦房内,门南开。	淮海有警察局及警察队。
伪据点	云罗山下民宅	90 人	土墙砖房,门向东开	宪兵讨伐队。
伪据点	东店子大兵房内	100 人	驻兵房。	皇军讨伐队。
敌宪兵队部	英士街西首	40 人	高大楼房砖墙头,门向西,周电网。	宪兵本部内中国便衣 50 人。
敌宪兵队部	大同街中市	30 人	高大楼房,四周电网,门向北开。	宪兵分队,中国便衣 140 人。
敌警务段	东车站下北首	20 人	高大楼房,四周电网,砖墙门,向东开。	内中国警务段 200 人,便衣 70 人。
敌据点	东站下北人马路	来往驻军不定	路南路北四处对过,四门砖墙,电网。	敌宿泊所保经部。当行事务部。
敌据点	津浦马路北段	60 人	铁路警务部内,路东路西二处,三门,砖墙,电网。	敌军用仓库及被服厂,内有工人 200 人。
敌据点	警务部内路东	40 人	驻于被服二厂内,开一门,工事不详。	敌剿共大队。
敌据点	东站月台南首	20 人	驻于站房内门向东,工事无有。	敌停车司令部。

敌据点	警务部内北门	150 人	驻于警务部内北边, 门、工事不详。	敌钢甲车队部。
敌据点	泰山北山南	60 人	驻于泰山庙内, 砖墙上有电网, 一门向北。	敌外围据点, 距徐南七里。
敌据点	北车站北西头	100	周围土围子, 电网, 二门向南开。	敌兵马粮料工厂, 内有工人 100 人。
敌据点	东车站南首天桥下	20 人	东西砖墙, 南、北、西三面电网三尺, 西南二门。	敌土木工用厂。
敌据点	三官庙东首	10 人	驻于汲水楼内, 外有电网, 一门东开。	敌水分遣队, 内工人 30 人。
伪据点	西关燕子楼	2800 人	周围砖墙, 外有水, 深三尺, 东西二门。	伪淮海省警卫大队。
伪据点	南关都天庙	1000 人	周围砖墙, 门向北, 四座碉堡。	伪驻徐州绥靖团。
伪据点	平山口南	200 人	四周砖墙, 门向南开。	伪保安队
伪据点	九里山下	500 人	四周砖墙, 门向南开。	伪保安队
伪据点	狮子庙下店北首	2000 人	驻庙内, 砖墙门向南开。	伪保安队

4、空军及飞机场：

(1)空军种类、数目及活动情形：

①空军——归华北空军最高指挥部领导，其代字、代号、人数均不详。

②飞机——新机场(大郭庄)老机场(骆驼山)两处共有飞机60架，真的20架，在大郭庄内的上河头，其余在机场的均是假的。

③活动情形——每日晚八时起飞两架，在上空巡视灯火管制，二小时始落下，在有警报前后时起飞三二架不定，视察防空设备如何？

(2)机场：

①新机场(大郭庄)

具体位置——东车站东南八里、津浦路东，饶海路南，大郭庄前，机场向南(该场系军用的，来往飞机住宿)。

面积——10000亩(原有5000亩、新开5000亩)。

跑道——宽15米，长由南到北，在场中央。

机库油库具体位置——机库60座，在场东西两侧，深2公尺，高4公尺，用洋灰钢管砂子筑成，上栽种草木很多作隐蔽。汽油库二处，在场之中心，高2公尺，深5公尺，用洋灰、砂子、铁板筑成。防空洞150座，在场之四周。

机场守备情形——敌军400人，高射重机三挺，轻机二挺，高射炮二门。

工事构筑——内外重壕两道，深2公尺，土围子木桩上张电网五道。

②老机场(骆驼山)

具体位置——东车站正东二里骆驼山下，南马路南，机场向南(该场系来往官员及通讯的)。

面积——600亩。

跑道——宽8米，长由南至北在场之中央。

机库油库具体位置——机库五座，在场之北面，油库不详。

机场守备情形——敌军 300 人，高射重机二挺，轻机三挺。

工事构筑——土围子木桩上张电网高 5 尺，外有小濠一道，深宽 3 尺许。

5、军火库(弹药仓库)

(1)位置——南马路北，三马路南，老东门里，门向南。

(2)守备——敌军 60 人，武器装备不详。

6、重要桥梁

徐州南五里，鸡嘴坝铁桥座 7 孔，守备警务段 10 人，破坏后使敌南来车 3 天不能通，阻敌南来兵力。

茅村站北 2 里铁桥 1 座 27 孔，守备警务段七、八人，破坏后使敌北来车 7 天不能通，阻绝敌兖州、临城、枣庄各地敌军不能南运。

韩庄站南四里石桥一座 5 孔、无守备。

韩庄站南二里运河上铁桥一座 3 孔。其守备有临城敌军 10 人，轻机 1 挺，手炮 1 门，兵房 1 座，外张铁蒺藜，破坏后使 3 天不能通车。

7、军事工业：

(1)修械所——南马路北，中正街东，老交通银行旧址，日本的工人 200 人(内附有造弹厂，子弹库)。

(2)汽车修理厂——南马路北，三马路南，老东门里(与火药库住一处，日本工人 30 人，常存汽车 50 辆，机器一部)。

(3)被服修理厂——东车站北首、津浦马路北段，路东路西两处，军用仓库内，日本工人 200 人。

(4)土木工用场——东车站东首，南天桥下，内堆放土料、沙、土、石、灰、电器等，守备敌军 20 人。

(5)兵马食料场——北车站北二里西阁头内堆放军粮，马料等，中国工人 100 人。

(四)附件：

1、徐州敌人分布图(略)

2、敌六五师团大队以上分布及伪淮海省行政区划图(略)

二、伪军部分：

(一)军事组织：

前为淮海省保安司令部，司令由郝鹏举兼，下辖三个旅，自前三月初伪军委会，委员改编为第七方面军，军长仍由郝鹏举任之，下辖三个师(但因缺编人数相差太多，故每县抽调伪军 600 前来受编)。住九里山之第三旅及绥靖团、警卫大队、特务团，合编为三十五师，分为 137、138、139 三个团，仍在徐州市周围住防。其组织情形如下表(略)

(二)行政组织(略)

(三)党务组织(略)

(四)政工组织(略)

淮海省政治工作团于三十二年(1943 年)七月三十日成立，总团长郝鹏举，副总团长依山，以下专有训练的政治工作人员，组成工作队，分赴各县区进行工作，每县均设分团(团长由县长兼)，区设支团(区长兼支团长)。

(五)防空组织：

淮海省警防团本部设于警察总局，总团长程鹏兼。下分四个分团，团部设于各分局，分团长由各分局长兼。

自三十二年(1943 年)开始已征自三期，每期 3000 人，共约 10000 人(各商号出一至二人)训练之后即担任防空工作，警报时听警口指挥，负责警备戒严及救护等。平时受警长指挥，担任检查、巡哨、查验防空工事，也就是义务警察而已。

(六)警务组织(略)

(七)建设组织(略)

三、叛军部分：

投敌的顽军受伪方的编制其名义如下：

- (一)淮海省剿匪第四纵队,驻防于徐州南方。
- (二)淮海省剿匪第二支队。
- (三)淮海省剿匪第七支队,驻防于邳县。
- (四)淮海省剿匪第三支队,驻防于宿县。
- (五)淮海省剿匪第一纵队,驻防淮阴。
- (六)淮海省剿匪第五支队,驻防涟水。
- (七)淮海省剿匪第九支队,驻防于碭山一带。
- (八)徐西剿匪指挥部,驻防于徐州西方。

兖州方面

一、敌军部分:

(一)兖敌独立步兵第一旅团之编制装备:

独一BS;干第一四二〇部队,旅团长浅见(少将,前任为宫下健一郎,于去年秋即调任别地去),全部共有1000人(多是新兵),经常住兖州300人,以外分布于各地区。其旅团部组织情形尚不完全,其了解情形如下:

高级副官:土田(少佐)

宣传指导班长:前田(中尉)

情报室主任:井上(少尉)

该旅团所辖各大队如下:

第一大队干第一四二四部队,大队长伊藤(大佐),住曹州。

第二大队干第一四二五部队,大队长高桥三茂(少佐),住藤县。

该大队辖以下四个中队:

第一中队队长大德,住兖州,全部100人。

第二中队队长川原,住金□,全部240人。

第三中队队长××,住藤县。

第四中队队长石川,住济宁,全部120人。

第三大队干第一四二六部队，大队长松岗，住临沂。

第四大队干第一四二七部队，大队长石黑，住枣庄。

陆军医院干第一四二二部队，该部系旅团的医院部队，大部分住东花园(津浦车站下)，另一部分住济宁城内道门口。

此外在旅团直接领导下有三个中队，轻机中队，重机中队，炮兵中队。

(二) 兖州敌各特种部队：

1、剿共大队——(特警队)甲第一四八〇部队。第一中队长宫谷义雄(大尉)，中队附关屋(中尉)。以下辖四个小队如下：

第一小队队长川工(少尉)，住济宁大文街，共 20 人。

第二小队队长小林(少尉)，住滕县共 10 人。

第三小队队长池田(少尉)，住曲阜。

第四小队队长佐藤(少尉)，住兖州(县部)。

该中队定额是九十名，现经常只有二十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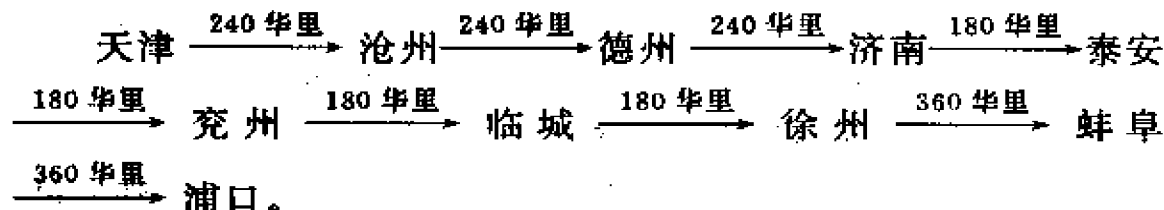
2、大山部队——该部队系前面井师团之留守部队，现有□山(少尉)，青才(军曹)及士兵五、六人，住车站事务所负责修理器械。

(三) 兖敌各种军事设备：

1、铁路：

(1) 津浦路长度——从天津至浦口共 2760 华里。

其经过各城市大车站如下：



(2) 车道宽——津浦路两轨相距六尺 2.8 寸轨宽六尺 14 分(均以六尺五码计算)。

(3) 铁道运输量：

① 车头——据统计，全津浦线共有 130 到 140 个，前后已被盟

机炸毁七、八十个，修理好的尚不及一半，由此可知其运输量日益减低。

②车次——一月份来往通车十二次，二月份减到十次（内有充济支线两次），三月份则更加减少（以上统计军用例外）。

③车皮——每次往来通车，代车皮十五六辆，代三十多辆的很少。

④充济支线——共长 60 华里，其经过之车站：兖州 $\xrightarrow{30 \text{ 华里}}$ 孙氏店 $\xrightarrow{30 \text{ 华里}}$ 济宁（该支线已于 4 月 19 日停止通车、25 日开始扒毁，其目的为了集中兵力于主要干线及补充物质上的缺乏）。

2、车站装备状况：

(1)车站位置——在兖州新东门外，距东门约 1/2 里。

(2)票房——在车站西边，共是九间石墙瓦盖。

(3)水塔——在站台南面（票房以南），相距约 1/3 里。

(4)修车厂——在车站南头，北塔北面，距票房约 1/4 里，在一个大院内，东头房七、八间。

(5)转盘——在修车厂内，车头房北面，相距很远。

3、铁路守备情形：

(1)敌军守备——站西即是东营房，内住敌人即负守备之责任。

(2)伪军及民众守备——车站南大桥下之碉堡内有伪军 20 人，车站北碉堡内有伪军 20 人，代庄碉堡内有伪军 20 人，孙氏店住伪军 40 人，此外均是民众守备。

(3)护路沟——在车道两侧，距约 15 米，宽约一丈，深约六尺。

(4)防空墙——每距十里修筑一个，在铁道两侧多是在站两头，高度能护着车头，盟机来日本车头开入掩避。

4、据点和碉堡——兖州全县共有九个据点如下：

第一区两个：牛厂、大郭庄。第二区两个：新嘉驿、滕村店。第

三区一个：颜村。第四区一个：栗园。第五区一个：薛家庙。第六区两个：王因集、泗上。

5、空军及飞机场：

(1)位置——在城东门外，铁路东边，泗水两涯。

(2)面积——南北长约一华里强，东西宽约半华里强。

(3)设备——西靠东兵站很远，场之周围未有设备，不经常落飞机(今年二月间落一次以外未落过)。

6、军火库——敌人之弹药多在东营房内保存，数目不详。

二、伪军部分：

(一)滋阳县保安队大队共辖八个中队，有三个住城内，其他均住城外各据点。每中队定额为 110 人，现仅 80 人，住城三个中队，共有轻机四挺(其它中队不详)，步枪杂牌武器。

(二)滋阳县警察局，全部共约 200 人。

济宁方面

一、敌军部分：

(一)独立第一旅团第二大队(干第一四二五)。第四中队队长石川，120 人，轻机 10 挺，重机 1 挺，手炮 7 门。另一部为干第一四二二部队(陆军医院)，现住仅一部分(大部住兖州)，以上该两部均住道门口。

(二)济敌特务部队：

1、剿共队——兖州官谷中队之第一小队(甲第一四八 0)住大文街。其组织情形如下：

估计为第七大队住济南。

小队长：川上(少尉)

扶剿工作者：宫内(宪兵军曹)中村、(宪兵兵长)，现住城外面粉公司附近，为派遣班。

侦谍工作者：八木(骑兵军曹)，歌带(陆军兵长)。

宣传工作者：下山(宪兵军曹)，黑田(宪兵上等兵、志愿兵)。

事务工作者：握本(宪兵二等兵)。

其他：长古川荣次郎(宪兵军曹)，以前分派曹州工作，现已调往八宝山工作。

以外尚有陆军 15 名(都是士兵)，摊派勤务与站岗等，以下通译共四人，金定灿(跟下山)，平川(跟中村)、李志袁、张德良(兼代勤务)。

2、宪兵队——为宪兵分遣队，队长田中义雄(宪兵少尉)，以下有小屋胜治(宪兵曹长)、久井(军曹)、佐藤(上等兵)，并有补充宪兵七、八名，通译有□河、张石等四人，住双井街。

3、兵站仓库——现住敌 100 人(都是新兵)，战斗力薄弱，武器现有迫击炮二门，重机二挺，(此地系往来敌人休息宿泊之处，故其增减不定，时多时少)。

4、连络部——部长林干代治，住黄家街(有要迁往兖州之意)。

5、警察署——署长茂木仪市，住孙家街(前内有日朝商人被征受训六、七十人，此刻是否调走未详)。

(三)济敌各军事设备：

1、公路——金济公路由济宁到金乡共长 90 里，其经过村镇如下：

济宁 $\xrightarrow{8\text{里}}$ 八里庄 $\xrightarrow{17\text{里}}$ 唐口 $\xrightarrow{15\text{里}}$ 苦水张家 $\xrightarrow{5\text{里}}$ 鲁楼 $\xrightarrow{15\text{里}}$ 胡集
 $\xrightarrow{10\text{里}}$ 大小义 $\xrightarrow{10\text{里}}$ 十里铺 $\xrightarrow{5\text{里}}$ 五里侯 $\xrightarrow{5\text{里}}$ 金乡城。

其运输情形：除天气不好外，每日均来往军用汽车。平均每天约有三四次不等(战时更多)，客车三、四天一次。

其守备情形：①唐口伪据点，内住道队一个中队，约 80 人，并有警察四、五人。②苦水张家敌据点，内住敌 45 人，并伪军一个班八、九个人(汽车路西面都是封锁沟)。

2、据点和碉堡：

(1)第二区唐庄驿据点,内有伪军 140 人,队长陈廷立。

(2)第六区二十里铺城东据点,内住伪军一个中队,并配合自卫团 60 人,共有 160 人。

(3)第四区喻屯据点,内住自卫团两个中队,刘奎□一个中队(轻机两挺),共有伪军 300 人。

自卫团长赵文超,赵景厚。该据点的建筑,有一道围墙,一道外壕,两座土楼。

(4)唐口伪据点:住伪道队一个中队,约 80 人,队长许兴荣,并有警察四、五人。

该四据点于正月二十四为我拔掉。

3、飞机场——在济宁城东关外(又名大校场),面积约 500 亩,没有任何设备,也没落过一次飞机。

4、仓库——在河西涯,内储多是布疋,粮食等物。河东兵站内前年所存步枪六、七马车(数目不详)。曹州、金乡、单县、鱼台等都由城内装运子弹。

二、伪军部分:

济宁县警备队如下表(略)

(二)充济道保安队(简称道队)

1、今年三月份以前编制如下表(略)

全部共 60 人,迫击炮四门、重机三挺,轻机 20 挺、手炮 20 个。定额每中队 108 人,现额约 80 人。

2、今年三月份以后的编制如下表(略)

(三)省警备队:第一大队共辖六个中队,全部共约 600 人,全部住邹县,济宁仅住 50 人,步枪 20 支作为留守。该大队自敌重点主义配备后,决定加强其质量,其办法如下:

1、每一个中队编一个狙击班。

2、每小队配备轻机一挺,手炮三个,步枪全部带刺刀。

3、在军事教育上,强调接近战法,以射击、投弹、冲锋、刺杀等

战术为主。

4、县保安队每中队也配备轻机一挺，手炮三个，步枪三分之一带刺刀。

5、省保安第三小队，专门训练为冲锋队。

(四)兖济道尹公署其组织情形如下表(略)

(五)济宁县政府其组织如下表(略)

(六)军警后援委员会：该会为了统一的供给军需而设(无论当地住军或过往军)其组织如下表(略)

金乡方面

一、敌军部分：

(一)编制装备：为独立第一旅团第二大(干第一四二五)。第二中队队长川原，全部共240人，轻机12挺，手炮12个。另外有一个重机枪分队，重机两挺，迫击炮一门。

(二)分布情形：

1、鱼台住敌40人，轻机两挺，手炮两个，小队长春田。

2、鸡黍集住敌12人，轻机手炮各一，主官姓谷不详。

(三)新兵来源：该中队去年原有120人，其余都是由本国增来的，时间去年十二月下旬。

(四)平时教育：着重打鞋、演习。

(五)素质：新兵有一半没打过一次仗。

二、伪军部分：

(一)金乡县保安队组织如下表(略)

(二)金乡县保安自卫团组织如下表(略)

(三)金乡剿共自卫团组织如下表(略)

该团共计650人、轻机14挺，手炮10个，自动步枪2支。

三、军事设备：

(一)据点——鸡黍集敌据点距金城35里，霍古寺伪据点。

(二)公路——金单公路长 90 里,中经霍古寺、太山庙、鸡黍集、芳桂集、十里铺等村镇,有霍古寺鸡黍两据点。金鱼公路长 50 里,中间无据点,没有守备,也没有修车场。

鱼台方面

一、敌军部分:

(一)编制装备——住鱼之敌为独立第一旅团第二大队第二中队的一个小队,队长中山,共 40 人,重机一挺,轻机手炮各二。

(二)指挥系统——该敌属于金乡敌川原中队指挥,其他不详。

二、伪军部分:

(一)编制装备——鱼台县保安队,以下共九个中队(祁保德三个在内),每个中队 70 余人,共约 700 人。共轻机六挺,手炮 7 个,其他不详。

(二)补充情形——由于我军攻势,伪之逃亡严重,刻又给民众要征兵,每保一人,均是雇佣,战斗太弱,时刻怕我打城,恐慌异常。

单县方面

一、敌军部分:

(一)编制装备——单城之敌系一个大队的一部分,大队部住于曹州,代字为干第一四二四部队。驻单城之大队长为土星(少佐),下辖三个步兵中队,一个炮兵小队。其组织如下表:

番 号	一中队	二中队	三中队	炮兵小队	合 计
主官姓名	官木 (中尉)	村月 (少尉)	官涂 (少尉)	×× (少尉)	4
人数	60人	90人	90人	40人	280人
武 器	炮			2	2
	重	1	1		2
	轻	2	2	2	7
	手	2	2	2	7
备 考	1、步枪 220 支(内有 70 支 10 度马枪)。 2、每中队辖三个小队,每小队辖三个分队。 3、一中队炮兵系老兵,其他均系新兵,内韩人华人占十分之三。				

大队部组织如下(略)

(二)临时编制——单敌每次出动,不论人数多少均按三小队编制,如出动百人左右时,附钢炮一门,重机一到二挺,轻机四、五挺,还要配超越敌三倍的伪军。

(三)兵员补充——该新兵系东北 23 次征兵,于去年 12 月补充到单城 120 人,其他不详。

(四)战时教育打骂处罚为主要,平时教育每日早晨起床后,新兵环大街跑步,老兵柔□动作,其他时间野外动作和刺杀,学科为辅。

(五)素质和官兵关系——该敌成分、质量很差、韩人、华中占十分之三强,新兵的射击刺杀技术很弱。在官兵关系上,官随时可以打骂兵,尤对新兵最利害,老兵可压迫新兵,三年兵可令二年兵刷鞋子、打洗面水,二年升曹长的管不了三年的老兵。

二、伪军部分(略)

虞城方面(略)

归德方面

一、敌军部分：

(一)归敌第四骑兵混成旅团、编制装备分布情形：

1、编制装备：

混四 KB：成第 5350 部队，旅团长小原一名(少将)，住开封。驻归德 B 第二联队为成第 5353 部队。联队长干井金雄，对外称吉林部队。下辖三个大队，其中一个大队为成第 5356 部队，大队长小池(其他不详)，共 400 人，马 700 匹(老马病马 $\frac{1}{3}$)，附炮四门，平炮二门，住道南营房内。

2、分布情形：

- (1)归德——联队部及小池大队，住道南营房内，400 人。
- (2)马牧——骑兵一个中队，住车站营房内 90 人。
- (3)刘堤圈——骑兵一个小队，队长干田，住车站营房 20 人。
- (4)其他分于东至杨集及豫东道各县各地。

3、兵源补充情形：该部敌人成份日、韩人各占一半，新兵占全数二分之一。该新兵据说系九次征兵征来，近来还逐渐增加。

(二)归敌各特种部队：装甲车一列九节(车头号码 116)，上有敌人 60 人，附以高射炮及高射机枪等，常住朱集车站。

另有装甲车两列(车头号码 114, 115)不断行驶于开封到徐州中间各站，常停于朱集车站。

(三)敌人各种军事设备：

1、铁路：

- (1)陇海铁路东至连云港，西到洛阳，单轨道，宽度 1.425M。
- (2)运输情形——陇海路原有车头 90 部，共被盟机打毁 70

部,现仅有 20 部,朱集(商邱)只有三部。现下白天不通车,夜间只通往来两次,代车皮 40 辆,开车时间不定。

(3)车站设备状况:

①朱集(商邱)站:

⊖车房——位于票房东 50 米,水塔西 50 米,该房东西长约 30 米,宽约 10 米,用砖构成。另有小型车房三处,东闸口东 10 米一处,水塔东南 10 米一处,大车房南一处。

⊖水塔——位于票房东 130 米,车房东 50 米。

⊖油洞——位于票房正东,周围有铁丝网,高四尺,用洋灰造成,比地面高一尺。

⊖营房——位于道南车站到归德中间,南北长 600 米,东西长 180 米,面积约占华亩五顷,共分四段。老营房(前营房)战前修筑,新营房(后营房)二十八年(1939)敌人修。

②马牧车站:

⊖车房——共有两处,一处于票房西 70 米,长九丈,宽二丈,墙厚二尺(票房东车站与西同),均用砖构成。

⊖营房——位于票房西北角,住敌步兵 40 人,轻机二挺,手炮二个,该房面积约五亩。

③刘堤圈车站:

⊖车房——位于票房东西 45 米各一个,均东西长四丈,高一丈二尺,用土筑成。

⊖水塔——位于票房东 30 米(现已坏了)。

(3)铁路守备情形:

①朱集——票房东 50 米处住敌 10 人,票房西 10 米处碉堡内住敌不明。票房内住敌 10 人,东闸口西路北住警务段 10 人,票房西住警务段 30 人。

②马牧——票房西北小营房内住敌 40 人。每天下午外来三名,沿铁路向东巡逻约 10 里,到大胡楼返回。车站东面住青年队

30人,队长张德林。

③刘堤圈——票房内住敌18人,便衣10人,票房西面碉堡内住警务段18人。

(4)护路沟,碉堡岗楼:

①陇海路两侧均有护路沟,宽约2丈,深约一丈五尺,每一里许路两侧均有岗楼一个,民众看守,夜间有伪军有时查岗,中间均有小草庵一个,民众二、三人。

②铁路南侧约八里有护路沟一条,每三里处有碉堡一个,无人看守,随地可以通过。

③马牧车站东到大胡楼共有岗楼十三个,白天每楼民众三、四人看守,夜间伪保安队看守。

2、空军及飞机场——该机场位于车站南一华里,车站到归德公路东沿,营房正东,归德城东北角,面积约占华亩30亩,北宽南窄成椭圆形,周围工事东西有碉堡三个,西北一个,守备兵力不多,外边有机动40个。机场中心偏北有红色房屋两间(大概是油库),无有真飞机,只有假的八、九架。

3、据点和碉堡:

(1)禹贤集据点——位于虞城东北15里堤北,现住虞伪保安队二大队之六中队80人,轻机一挺。工事构筑:东西长300米,南北长约50米,内有住民300户。围墙高约一丈,墙上修有掩体很多,每隔五、六掩体,即有大堡垒一个,另有夹皮墙道一。围墙有海沟一道,宽一丈,深八尺,壕外鹿柴一周,大围子内有小围砦,西、北两面墙上均有鹿砦,小围砦的东南角上面土堡垒高四丈,周围有枪眼。

(2)大薛庄据点——位于虞城北九里许,现住虞伪剿共队曹永年部一个中队,队长吴登云,共40人。该据点南北长约60米,东西长约50米,内住民30户。工事构筑:围墙高一丈,西、北两面有垛口,东南角有方形炮楼,其余三角均系岗屋,东有碉堡高一丈三尺,

周围有枪眼上有盖。墙外海壕一周，宽 1.4 尺，深 1.2 尺。壕外鹿柴一周，系用洋槐枝□□起来的。

(3)袁砦据点——位于虞城北六里，三面围墙均倒塌，北面为四堤。圈内修一小方城，内住虞四区区委，区长牛云山，共 20 人。该方城东西长约 40 米，南北长 30 米，大砦内有住民 200 人。工事构筑：围墙高仅二尺，系积土筑起的，从壕底计起高 1.2 尺，壕宽深各一丈。壕是两面反土的，周围鹿砦紧接壕外沿，大门前未有吊桥，系海壕未挖通的。

(4)李新集据点——位于马牧车站东 10 里，铁路北沿，现住敌 10 人，虞伪保安队七中队 40 人。

(5)潘井据点——位于虞城南 14 里，住虞伪警察所 10 人。

(6)六岔路碉堡——位于潘井西二里许，住伪保安队七中队一部 10 人，两条海子，一道鹿砦。

(7)马牧据点——位于车站正南一里，现住伪商邱保安队第六中队，队长刘从，共 60 人，住小北门里，担任马牧到大胡楼一线防务。另商邱县二区区委，区长王传×，共 90 人，步枪 40 支，住南门里路东，再少年先锋队队长张××共 20 人，住西南角闫王庙，又青年队队长杨道修 30 人，警察所 30 人，该住处系一老围砦，砖墙海沟一道。

(8)刘堤圈据点——位于车站南约半里，现住伪夏邑保安队 30 人，住北门里路东，另夏邑五区区委 40 人，区长程××，住东门里路北，再伪警察所 10 人，住与上同。凡伪军住的大门前均有小岗楼。

(9)东马庄据点——位于虞城正北约 19 里，三堤南老黄河沿，现住李××部共约 400 人，长短枪 300 支，马 80 匹，机枪无。该据点南北长 70 步，东西长 60 步、海壕二道。外壕宽一丈五，深一丈八，底宽四尺半、有木桩三行，木鹿砦一周。里壕口宽一丈七，深一丈七，底宽三尺。围墙高三丈一尺（从壕底计算），围砦四角各碉堡

一座,均无顶,共两层高约二丈。围墙上五尺远一个枪眼,墙上搭有哨棚,每二丈远有一掩体,可盛四、五人。

(10)西马庄据点——位于虞西北约20里,现住虞城伪剿共大队,队长曹××,100人,轻机二挺。该围砦南北长100步,东西长80步,门向东。壕壕一条,宽一丈七,深一丈二,底宽三尺,底上有木桩,壕外有鹿砦一周,围墙高一丈二,四角的碉堡高二丈六。

(11)李庄据点——位于东马庄西南三里,现住张××自卫团,人枪各100,轻机一挺。壕宽深各一丈二尺,底宽五尺(从底计算)。周围有鹿砦距海子沿三步,四角的碉堡高二丈二尺,门向南。

丰县方面

一、敌军部分:

(一)编制装备——为六五师团七一旅团第五八大队,专第七九九六部队。第一中队队长中田实八节(中尉)下辖三个小队,驻丰二小队,约80人,附山炮一门,重机一挺,轻机五挺,手炮五个。另一小队住陈腰楼,但人数武器不详。定额为128人,九班则每班12人。

(二)临时编制装备——每次出发扫荡,机、炮、兵三种兵配合,重机一挺,炮一门,轻机三、四挺,手炮三、四个,每人带子弹30排,但轻重炮带子弹不详。

(三)兵源补充及时间——丰南作战前共有敌兵80人,有五、六年老兵20,三年兵40人(朝人占多数),一年的新兵20人。该新兵系于去年12月由东三省、朝鲜地区征来。

(四)平时教育——打野外、班进攻、打靶(人头靶)及刺杀、跑步、学课等。

(五)官兵素质及关系——中田队长是高中生,一般兵多是中学生,官兵关系恶化,随便打骂及劳役等。

(六)敌各种军事设备:

1、据点和碉堡：

(1)常庄据点——位于城北十五里第三区，现住保安第一大队及一二两个中队，共约 200 人，轻机三挺(内一挺不连发)，手炮一个。工事构筑：海子二道，深宽均一丈。海子里原有墙高三尺，于去年 12 月在原有墙外距一米往下坐四尺又筑一道外墙，约八尺高。内外墙中间可行人，相距 20 米远有岗屋一个，砦门三个。自打史庄后，屯死二门。现只有东南一个门可以出入。周围共有 12 个炮楼(三个砦门在内)，每砦门里边有方形碉堡一个。

(2)裴庙据点——位于城西北十五里，住保安第三中队之两个分队 60 人(并有区公所 10 人)，轻机二挺，手炮一个。工事构筑：海子二道，深宽均二丈，外涯有稠密的鹿砦。内外海子中间约二丈。稠密的木桩，外海子里涯有二道铁丝网。上挂罐头盒子，墙子三尺高，四角皆有三尺高小炮楼一座，有地下室一所，内可容三、四十人。另有向南的门楼一个。

(3)张学屋据点——位于常店东北四里，住第一大队三中队之一个分队 20 人。工事构筑：海子二道，深宽均一丈。里海子外涯有鹿砦，围墙高三尺余。周围共有五个土炮楼。三尺多高，面向东，中间有高楼。

(4)常堤口碉堡——位于常店南×里许，住保安第八中队之一个小队 20 人。工事均筑：海子一道，深宽各八尺，中间有碉堡一个。

(5)张五姿据点——位于城东北十二里，住保安八中队之二个分队 60 人。三角形海子二道，其具体构筑不详。

(6)柴楼碉堡——位于城西南五里，住省保安 10 支队一大队二中队 50 人，轻机一挺。工事构筑：海子二道，八尺宽，九尺深。外海子外涯有鹿砦一周，围墙三尺余，四角四个炮楼，周围四个岗屋，中间有碉堡。

(7)皇杏园据点——位于城西南十二里(庄内)，住省保安 10 支队三大队七中队 60 人，轻机一挺。工事构筑：海子二道，外海子

深宽各九尺，里海子深宽 8 尺，外海子外涯有鹿砦，里海子内无围墙，四角四炮楼。北面两个高约四尺，南面（即地下堡垒）一尺多，周围有岗屋四个，用砖造（两棚的），三尺多高。中间有高大平楼与暗楼。有门楼方八尺。

（8）刘堤湾据点——住省保安队九支队三大队八九两个中队及区中队一部共约二百三、四十人，轻机二挺，手炮一个，工事构筑不详。

（9）凤凰寨据点——位于城西关郊外，住 10 支队二大队五中队 70 余人，轻机一挺。工事构筑：海子一道，宽深各八尺，外涯用秫秸夹一圈花篱笆。

（10）华山据点——住 10 支队一大队三中队，具体情形不详。

（11）凤凰塔、山西会馆、秦河桥据点——该三个据点均住 9 支队，其具体情形不详。（全丰县共有据点十二个，碉堡三个）。

2、公路：

（1）丰鱼公路——由城北到常店约 15 里，经过李庄^{6里}→江庄^{8里}→常店 2 里，该路沦陷前修。运输情形：常店所征粮食不断往城里运，经常通太平车。运粮食时 10 余辆大车，天热时可停于李庄休息。守备状况：

运粮时有伪一个中队护运，住德庄或李庄（常堤口例外）。

（2）丰沛公路——长 60 里，经过村镇，丰之张王楼，沛之鹿楼，沦陷前修，不经常通车，两旁无封锁沟。

（3）丰徐公路——长约 160 里，经过丰之华山，铜之闫湾、敬安、黄集，沦陷前修，不经常通车，两旁无封锁沟，亦无修车场。1922 年初修，到敬安稍停。

（4）丰碭公路——长 70 里，经鹿楼、刘堤湾、陈腰楼、周砦，沦陷前修，经常通车，来往不断停腰楼（刘堤湾不定），无修车场。

（沿各公路之据点，每日均有伪联络验路）。

二、伪军部分：

(一)淮海有保安第九纵队，组织情形如另表(附表一略)。

(二)丰县保安总队组织情形如别表(附表二略)

沛县方面

一、敌军部分：

(一)编制装备——该敌属于徐州六五师团派遣的一个中队，队长中谷(中尉)，其番号代字不详。全部共80人，附重机一挺，迫炮一门，轻机三挺，手炮四个，汽车二辆。

(二)现定额编制——定额为180人，两个中尉，队长永康、中谷，联络官远腾(中士)，及上士指导官。武器有迫击炮一门，重机二挺，轻机手炮各八。但其流动性很大，往来不定。现额只有80人，中队长一名，武器减少大半。

(三)补充来源情形——多系从满州征来，东北人很少。

(四)平时教育和官兵关系——在教育上多是刺杀，打三多野外，学攻击等。在关系上新兵当老兵的勤务，洗衣、刷鞋、打洗脸水，一点不好随便打骂。

(五)沛敌各种军事设备：

1. 据点：

(1)鹿楼据点——位于城西三十里，沿丰沛公路之中心地区，为丰沛敌伪之联络点。在此据点内分为二个小据点，小李庄、黄井，守备伪军一个中队，70人，轻机一挺，枪30支，土造40支。另一部，大队长陈桂林带一个中队住内，70人，轻手各一，土□各半。工事构筑：西头李庄有地洞，两道围沟，其余均一道，无地洞。黄井土围子一道沟，除李庄系敌伪修房子，其余皆系民房。

(2)胡官屯据点——位于城东八里，沛夏公路之中心。现住伪保安一个中队，70人，轻机一挺。夜间留30人，其余拉到庄外，怕我夜袭。一道围沟无地洞。

(3)赵圈据点——位于城南十余里,住一个中队,队长张永昌(大队长张纪辰之子),70人,轻机一挺,围沟土围子。

(4)大张砦据点——位于城东南二十五里,住两个中队150人,轻机二挺。工事构筑,一般的房子不好。

(5)鹿湾据点——位于城东南二十里,住一个中队,60人,轻机一挺,枪20支,土枪30支。工事构筑,一般房子很好。

2、公路:

(1)沛铜公路——长115华里,经过村镇:鹿湾、大张砦、崔砦、湾集、郑集、桃园、唐沟、小龟山、平山口,1922年开工,1923年竣工,后经数次复修。运输情形:经常不断一、二辆汽车通行,沛县府之车二、三日一次,有时还有军用车由徐州到沛。守备情形:沛到郑集有四个伪据点,鹿湾,大张砦住沛一个大队,崔砦住省保安二个连,垮张庄住一个连,郑集住一个营及一个机炮连,郑集到平山口有三个伪据点,桃园、唐沟、龟山每一据点30余人,平山口住伪警察一部分,往来车在郑集稍停。

(2)沛夏公路——长35华里,由沛县到夏镇中经胡官屯、王庄,1941年修,不常通车。守备伪军胡官屯住一个中队,约70人。

(3)沛萧公路——沛县至才西山35华里(再往南则不详),中经魏砦、罗庵子,事变前修,据说现破断不堪,不常通车。

二、伪军部队:

(一)淮海省沛县保安队其组织装备职另表。

(附表略)

(二)淮海省沛县警察局组织如下表(略)。

(三)沛县便衣工作队(密探队)组织如下表(略)。

铜北方面

一、敌军部分:

敬安集驻敌一个中队,队长中古(大尉),小队长岗田(少尉)、

共约 100 人,重机一挺,小钢炮一门,轻机四挺,手炮五门,归徐州六五师团派遣。

二、伪军部分:

(一)敬安集驻伪铜四区区长孙燕胜,区队长刘学武,100 人,步枪 70 支,轻机二挺。

(二)伪自卫团长孙俊起,下分三个分队,共 100 人,步枪 80 支,轻机一挺。

(三)淮海区保安队一个分队及警察局 10 人,亦住敬安集。

三、叛军部分:

(一)沛县之张××,现有 200 人,步枪 200 支,轻机 10 挺。

(二)丰县之薛××,现有 400 余人,步枪 300 余支,轻机不详。

(三)肖县之刘××,有特务连 300 余人,步枪 90 支,轻机四挺(以上三部均与耿聋子配合,经常住于新围子)。

(四)铜北之耿××,现已将该部编为铜山县保安旅(也有称徐西剿匪指挥部的),共约 2300 人,步枪 2000 支,轻枪 60 支。经常活动于郑集、五段、马武坡、崔砦、敬安集、垮张庄一带,其组织情形如表(略)

四、各种军事设备:

(一)公路:

1、郑五公路——郑集到五段长 28 华里,中经马五坡,不常通车。守备情形:五段住伪一个营,马武坡住伪一个连,郑集住伪团部及一个营约 300 人。

2、铜五公路——徐州到五段长约 65 华里,中经小龟山、坨城、周楼、戴海、前后八段,1941 年修。运输情形:敌华北汽车从五段往徐州运小麦,不断行驶,守备不详。

3、五梁公路——五段到梁砦,中经湾集、敬安集、苑楼砦,不常通车,守备不详。

(二)据点和碉堡:

1、敬安集据点——住敌 100 人，重机一挺，钢炮一门，手炮五门，轻机四挺。住伪保安一个分队，区中队一个中队，自卫团三个分队，及警察 10 人。

2、郑集据点——住伪团部及一个营，约 300 人。

3、五段据点——住伪一个营 200 人。

4、崔砦据点——住伪省保安二个连（营部也住此处）。

5、垮张庄据点——住伪省保安一个连。

6、湾集据点——住伪一个分队。

7、马武坡据点——住伪一个连 100 人。

8、唐沟据点——住伪 30 人。

9、桃园据点——住伪 30 人。

10、龟山据点——住伪 30 人。

黄口方面

一、敌军部分：

（一）编制装备——驻黄口之敌系一个小队，队长荒田。新兵 70 人，重机一挺，迫击炮一门，轻机二挺，手炮三门。属肖县指挥，其番号不详。

（二）平时教育——野外演习，测验地形，打靶等。

（三）兵员成分——百分之七十朝鲜人，百分之二十满州人，百分之十日本人，均是四期征兵入伍。

二、伪军部分：

（一）萧县保安总队第二大队组织装备如下表（略）

碭北方面

一、敌军部分：

驻陈腰楼之敌系一个小队，队长龙口，共 70 人（计老兵 50 人，新兵 20 人），轻机 6 挺，手炮 4 门，属于碭山敌大队本部指挥。

二、伪军部分：

(一) 砀山第三区 30 人，轻机一挺，长枪 20 支，短枪 2 支，住于腰楼。

(二) 砀山第三区自卫团，以下四个分队，共 100 人，均是杂牌步枪，轮流分住于腰楼、李楼两处。

掌握伪军工作总结

(1945年6月)

一、方针的提出：

掌握伪军方针提出根据以下理由：

第一、许多年以来国际国内形势于我空前有利，伪军中的两面派普遍生长，死心汉奸大为减少，如五分区×伪军500，关系即占200，造成我们深入掌握一定数量之伪军的有利条件。

第二、我们军事胜利与政治形势的开展使伪军更加动摇和依靠我们，1943年以来强调改善伪军关系，(即改进提高)，从政治上改进提高，组织上，工作上控制现有关系均获显著进步(如统计)，伪军工作由大量发展关系，改善提高，到要求掌握一定数量之伪军。

第三、国民党加强对伪军工作，大批派遣特务，掌握伪军，以为目前借刀杀人，向我进攻，以及将来的反共基地，因此要与国民党争夺伪军，也必须强调掌握。

第四、我们长期隐蔽积蓄力量的方针，在许多地方(冀南区)，执行不够，单纯军事观点，人枪主义给予伪军工作及根据地坚持方面不好影响，为此强调掌握一定数量之伪军，以贯彻隐蔽方针。

1944年在原冀鲁豫两个地区，都以掌握伪军为全年伪军工作的重点。

冀南区：打破伪军组织人员，依靠国民党中央军的幻想，巩固我党我军与发展在伪内部的思想阵地，大量开展伪军伪组织工作，

达到确实掌握一定数量的伪军。

原冀鲁豫区,大力发展伪军伪组织中的两面派,改造提高,有意识地与国民党争夺伪军求得深入掌握。

二、条件和要求:

原冀南区:

1、要使伪军在政治上在组织上都依靠我党我军,上下有投靠我党我军的舆论与要求。

2、在伪军内部要有我党的抗日和灰色的组织,要求每班中有一活动分子。

3、该伪军的拉出和潜伏,应听从我之命令,不能随意行动,但应有随时拉出之决心。

4、该伪军要有潜伏的战斗,即在敌统治下无战斗力而在其反正后,即发挥其战斗力。

5、要反正后不垮,应有大部不逃亡与回家。

6、要有在敌方隐蔽自己,巩固地位的办法,潜伏至反正时为止。

要求数字最少各县掌握一个建制中队,分区确掌一个建制大队,全区确掌伪军占伪军总数五分之一。

冀鲁豫区的要求,与冀南区大致相同,条件没有冀南区之严格,但要保证任何情况下,听我指导与指挥。

三、掌握伪军中队的过程及方法方式(希参考去年上半年工作总结报告)。

掌握伪军中队的过程,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大量发展关系,没有关系不能接近伪军,就不能使伪军了解与倾向我们。零星地建立一些关系,也还是了解与接近伪军的初步,其作用还不大,必须有大量关系的建立,才能发现与改培多数

的倾向分子,用以左右伪军受我之掌握。

由于几年来工作的开展,一般伪军中都有了一些关系,在进行掌握伪军时用不着再重新经过这个阶段,这里对发展关系的办法也不赘述。

但在以前没有打开工作门径的伪军内进行掌握工作,必须经过这一阶段,在这里我们主要采用了先打开其上层关系,取得上层关系对我的信任,撤除了下层伪军对我接近的顾忌。大量发展关系的办法,如七分区对×大队的掌握是先建立了上层关系,然后开展了下层关系。五分区掌握了某中队之先,也先打通了中队长的关系,向他表示了我不打他(只要他不作恶)的态度,使他松于戒备,对士兵出入不加约束,使我得发展大量关系。

(二)提高关系,使由替敌服务到应付敌人,暗中抗日。必须依靠艰苦的改培教育,提高抗日意识,增加其对我之信赖,克服其依赖于敌我或敌我国三者之间的两面或三面态度。此外还应了解,首先提出口头保证或给以抗日同情证,表示我相信他不是死心汉奸,以鼓励他为我工作。对于表现好,工作多,忠实于我们的关系,发给公民保证书,保证其战后可享公民权借以控制关系,使他不肯放弃既得的政治利益积极工作。

在发给公民保证书前,先经过宣传与诱导阶段,使关系迫切要求以工作来表现,对抗日忠实,然后向我要求才发给之,发给后关系得到进一步对我信任,但这样关系,还仅是限于分散的单个的无组织的状态,不能把整个关系力量有机的结合起来,

(三)进行组织工作建立伪军内部抗日性的群众组织。

为了把零星的分散的力量结合起来,成为一支坚强的力量,以求得对伪军的掌握就须要将关系组织起来。我们在伪军中组织了許多不同名称的抗日性群众组织,如三分区的杀敌复仇同盟,五分区的杀敌反正先锋队,七分区的抗日小组,以及其它分区的抗日青年团等。

关系参加了组织以后,就可以统一对他的领导,可以进一步地给予工作任务,给掌握伪军大大的推进。同时这种组织的形式不是对关系的改善提高,有的关系加入组织后不仅把自己看作一个关系,而很得意的以为自己是暗八路了,认为自己是八路的一个成员,五分区关系加入了杀敌反正先锋队,再见我干部时即较前人为亲密,工作也较以前积极更好地告诉我们伪军中的秘密。

抗日性群众组织的发展是经过了事先启发的,主要说明只有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但启发时是按照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形来诱发的,有的从杀敌反正说起,有的从个人出路说起,对于一些知识分子有的从政治斗争中共产党抗日组织的重要性来启发其要求的。组织成员自己发展组织时也曾用了巧妙的办法,他们向对象这样说:听说八路军成立有杀敌反正先锋队,加入了就成了自己人了,将来有出路,以观察对象态度,如对方同意时,就约会他去参加,对方不做表示也不暴露自己面目。

当关系有意参加组织了,抓紧其迫切的心情,进行对组织认识的教育,把组织的目的,及组员应尽的义务向他详加说明,问他是否了解,把组织的规约,信条等读给他听,问他是否能以遵守,有时还可以他不够条件,故意骗他,以考察他的决心,使他对参加组织出于至诚,为将来执行组织任务做思想准备。五分区经过这样的办法,许多杀敌反正先锋队员在日后配合军事行动时表现得非常坚决勇敢。

参加组织前,还经过关系提出申请与进行庄重的仪式。一般是关系提出参加组织的志愿书,我接受后予以批准,再经过一个审查时期,然后进行入队式。在入队式时,我先布置一个房子,打扫干净,挂上我领袖的像后,并准备一个部队代表,在关系一进入举行仪式的房子时,见到庄重的情形,在精神上先受到一个郑重其事的刺激,就会□心的进行仪式,先令他宣誓,最后我代表再讲话,面授队员证。事实证明了在这样情形下接受了队员证,参加组织的关系

对组织印象很深,这件事在他本身是一个大变化,在执行任务与工作时很为积极。相反的在二分区发展组织没启发,只向关系随便号召一句,你参加个抗日组织,关系也不好意思推脱,向我干部说你怎好就怎好,结果组织算成立了,但毫无作用。

抗日组织的组织形式,有各种不同的情形,主要是按不同的情形确定的,如我们从外线发展的关系互相间已经知道的编在一组,就发生横的关系,内部组织成员自己发展的就不发生横的关系,仅由组长保证单线领导,有的按其原建制行政系统把队员组织起来,由行政上级领导下级,但对于中上层关系的队员,则由外线只按单线领导之。

关系在参加了组织之后,感觉与我是一事人了,他们对组织寄托了很大希望,因此自动地注意对部队的掌握,有的贪污的也不贪污了,好打骂老百姓的也不打骂老百姓了,尤其是自动去团结人,培养力量以备将来应用。但有的关系操之过急表现特殊,有碍秘密的保守。

(四)建立党的组织

党的建立是对关系改培的成功,关系逐渐提高为党员,就会完全依靠我们。在他们感觉对我们更亲近,认为是一家人了,因之对我们的缺点也敢于批评建议,我们将伪军内部的主要分子发展为党员,就对伪军的掌握有了保证。

党员的发展有两种办法:一种是从抗日组织成员中发展而成的,在发展前按不同对象进行不同启发,如对青年知识分子即进行共产党远大目的,及党的艰苦卓绝斗争事迹的教育。对出身贫苦的农民,即从其被压迫受痛苦来进行启发其阶级觉悟,然后在他自身要求之下,予以发展。

另一种方法是寻找过去失掉联系的党员而未有叛党做恶之事迹者,吸收他重新入党,在进行时与地方党配合,从那里调查失掉关系分子的下场及收集其材料,这样做收效快。对于这种对象的发

展,首先要打破他悲观失望认为自己无可挽回的观念,提出党对他惋惜,允许立功赎罪,使他有信心重新振作起来为革命工作。再则揭发他怀疑党,是利用他的错误认识使他安心。

在发展党上同样进行了庄重的仪式,入党后继续加强党的教育,尤其在征收党费上每月一次,并且要缴抗币,以加强党员对党的观念。

党的组织领导情形亦颇有不同,有的自己组织起支部小组,有的仍是外线单线领导。

第十二军分区司令部交际处关于 最近敌伪情况的调查材料(片断)

(1945年6月15日)

通许县保安联队材料

通许保安联队长左学章,年40岁,东三省人。保安联队付张子英,年30岁,奉天人,行伍出身。

第一大队长刘铁贞,行伍出身。第一中队队长杨玉春,年23岁,通许人,学界出身,120余人,步枪100支,轻机2挺,掷弹筒2个——此中队系通许最坚强之中队。

第二中队长李斌,东三省人,60余人枪。

第三中队长焦起文,80余人枪。

第四中队长李维和。

第二大队长李中武,东北人。

第五中队长孟庆松

第六中队长胡庆堂

第七中队长张吉福

第八中队长王茂祥

}共240人,战斗力弱。

伪四方面军调查

一、四方面军司令部材料：

总司令张岚峰，柘城西林张人，曾在日本留过学，任过西北军团长，伪第1军长。

副司令范江浦〔范浦江〕。司令部直属一个机炮营，一个特务团。

1、机炮营长丁友使，手枪连长×××，手枪80支。机炮连炮3门，重机2挺。骑兵连马60余匹。

2、特务团长王祥〔翔〕九

	{	1 营营长王光三	
		2 营营长何村勋	
		3 营营长×××	

人900，机枪13挺。

二、第1军军长王康，参谋长张子珍，副官长王靖璜。

1、特务营长××，分骑兵连，机炮连，通讯连，驻鹿邑□平集。

2、14师师长陈扶民

	{	特务营长×××	
		53 团长杨玉坤	
		54 团长徐泉三	
		55 团长王精江	

14师共人3000，轻机16挺，炮2门。

3、15师师长张长寿

	{	特务营、56团	
		57团、58团	

该15师共人3000，轻机8挺，掷弹筒8个。

4、该10师师长刘敏礼，直属特务营营长孔庆功，59团及60

团(主官)不详,61 团长宋万杰 { 1 营营长孔庆方
2 营营长张作善
3 营营长周庆兴

全师共轻机 18 挺,掷弹筒 15 个。

三、第 8 军军长王新民,下属两个师:

1、17 师师长侯福云,年 40,柘城人。师部驻淮阳北太昊陵,汽车 4 辆。执法队 80 余人枪,驻淮阳北关。

特务营营长徐××,下分学兵连、骑兵连、手枪连、步兵连,共人 400 余,轻机 4 挺。

第 65 团团长侯文阁,柘城人,团部驻孔庄。

第 1 营营长××,分驻程寿一个连,孔庄 2 个连,共 240 人,轻机 9 挺,掷弹筒 3(个)。

第 2 营营长孙绪中,营部住万砦,4 连驻万砦,90 余人,轻机 3 挺,掷弹筒 3(个)。5 连连长×××,住李寨 80 人,机枪、掷弹筒均三。6 连驻郑集,80 余人,轻机 3,掷弹筒 3。

第 3 营营长××,住白楼,190 人,机枪 9 挺(7、8、9 连均住白楼),弹筒 9 个。

第 66 团团长刘孝礼(即刘小孩),年 30 岁,团部驻安子岭。

第 1 营营长穆××,驻柳林,人枪不详。

第 2 营营长×××,驻沙窝兵力武器不详。

第 3 营营长程法周,24 岁,商邱人。第 7 连连长××,西平人,轻机 3 挺。第 8 连连长杨金玉,43 岁,机枪弹筒各 3。第 9 连连长韩凤明,48 岁,柘(城)人,武器同上。排机炮中队长刘老三,现年 24 岁。70 人。重机 1 挺,排机炮 1 门,掷弹筒 2 个。

第 67 团团长宋彦宾,人 800 余,轻机 25 挺,掷弹筒 27 个。全团分驻黄集、代集、邵集。

2、第 18 师师长杜新民,驻商邱马木集,69 团跟随保护师部。

下属一个特务营及 67 团、68 团。67 团团长江田传。

四、伪四方面军太西绥靖军

伪师长姜廷彦，年 40 岁，大兴集人，军界出身。

副师长程俊明，年 30 岁，太北程乔人，学界出身。

1、参谋处处长连森林，年 30 岁，太东连庄人，学界出身，现调到商邱任办事处处长。

参谋长李存真，年 50 岁，五子岭人，学界出身，现调到商邱任参谋长职。

参谋主任张详鼎，年 34 岁，学界出身。

参谋刘明轩，年 40 岁，巩县人，军校毕业。情报参谋何义良，年 25 岁，南阳人，学界出身。

2、副官处处长□金钰，年 30 岁，太南大司家人，高级师范毕业。

副官主任张京席，年 34 岁，学界出身。

副官长李廷举，年 36 岁，太康人，学界出身。

3、军需处主任万养连，年 36 岁，太康人，学界出身。

少校军需张怀坤，年 26 岁，土塘集人，学界出身。姜保华，年 30 岁，大新集人。

4、军医处主任邵子俊，年 25 岁，医学出身。

上尉医官黄方义，年 26 岁，医学出身。

5、军械处主任曾现□，年 30 岁。

6、秘书处主任马纪东，年 24 岁，太康人，学界出身。秘书李广化，年 34 岁，太康人。

7、政训处主任刘子祥，太东南人，年 20 岁。

第 1 团团长江本尚，年 40 岁，芝麻凹人，行伍出身。团部直属一个特务连，连长王少清，程桥人。

第 1 营营长程慎之，全营驻老塚，200 人，轻机 1 挺，掷弹筒 1

个,其连不详。

第2营营长张□三,年30岁。4连连长张存礼,太西南张庄人。

5连连长梁义清,年29岁,太东梁堂人。

6连不详。

第3营营长×××,下属3个连:

7连连长杨××(外号杨叫驴),40岁,李彩集人。

8连连长马继成,太西北马楼人。

9连连长不详。

全营共180人,轻机1挺。

第2团团团长程慎生,年30岁,程桥人,中校团副张锡岑,年30岁,太西瓦屋张人。中校团副徐道德,年40岁,柘城人。

第1营营长张德昌,年40岁,太北特务寨人。

1连连长程慎智,年30岁,太西程桥人。

2连连长李永成,五里口之清岭岗人。

3连连长李本瑞,年31岁,太西李庄人。

全营共150人,轻机1挺。

第2营营长王修业,年30岁,明光集王庄人。4、5两连不详,6连连长李洛然,李凤砦人。

第3营营长张锡岑,32岁,李彩集人。1连连长石同道,23岁,后石庄人,游击出身。其它两个连不详。全营共140人,轻机1挺。

特务营营长黄守信,年40岁,直属师部。

第1连连长周天俊,24岁,扶沟人,行伍出身。

第2连连长赵××。

第3连连长李国选。全营共200人,轻机3挺,掷弹筒3个。

姜伪卫士队队长刘永义,年30岁,手枪30余支,轻机1挺。

姜全师共1700人,轻机13挺,掷弹筒7个。

五、四方面军剿匪独立旅

旅长韩风楼，现年40岁，西华人，曾充任西华游击大队长，现在成立，现已有一个团。

第1营营长刘干臣，年30岁，淮阳北刘楼人。第1连连长郑培德，年30岁，淮阳大郑庄人。第2连连长孙延相，年30岁，许楼人。第3连连长杜士彦，年30岁，许寨人。全营共150人，轻机2挺，驻淮北许寨。

第2营营长齐老夷，年40岁，齐老家人，流氓出身。防地驻柳林申寨，兵力武器不详。

第3营营长刘翠然，50岁，石曾刘人，地主出身，兵力武器不详。

六、伪四方面军杂牌

1、反共自卫第1团，团长黄文标，年30岁，黄岸人。团部驻乍方口。

第1营营长吴鸿斌

1连连长魏××

2连连长陈××

3连连长李华中

共300人，驻张夏亭庄

第2营营长×××，第3营营长张子谦，共400人，轻机2挺，分驻刘集一带。

2、反共第二自卫团，团长□际午，共200余人枪，轻机3挺，掷弹筒2个，驻柳林西北黄楼。

3、伪62师师长张之海，40岁，驻西夏亭（系由河西新抢张岚峰的）。

(1)第5团团团长张□天。

(2)第六团团团长杜岐山,30岁,山东人,驻西华。

(3)第7团团团长毛××,驻西夏陵〔亭〕。共1150人,重机1挺,轻机16挺,25号炮2门。

杞伪调查材料

一、伪杞县县长李祝庭,年60岁,八卦亭人,现居杞县城内南门里,学界出身,前清秀才,曾任京参议员,又任开封救济院长,反共平常。以下分:

1、秘书室秘书胡需三。

2、第1科科长张海泉。

3、第2科科长徐南绍。

4、第3科科长穆正明。

全县共分8个区:

第1区区长王绪九、第2区区长胡通甫、3区区长李清海、第4区区长黄冠军兼、第5区区长李冠卿、第6区区长杨再庆、第7区区长马立三、第8区区长徐××。

二、杞县伪保安联队调查材料:

杞县伪保安联队长由县长李祝庭兼。杞县伪保安联队副张普思,年40岁,曾任孙殿英部副官及副团长,沦陷后曾到南京受过训,现住杞城老鸡街南口。

1、直属第1中队长李世昌,50余人,枪45支,现住城内马家院。

2、直属第2中队队长王富荣,人72名,枪52支,驻城内与各机关守街。

3、第1大队大队长黄冠军,初中毕业及黄埔军校第16期毕业,曾任许昌军事科长。该人与张普思系姑表兄弟,又系顽支队长

黄冠卿之弟，县西十里铺人。

(1)第1中队中队长黄德臣，80人，枪65支，掷弹筒1个。

(2)大队附兼第2中队长马铎，年20岁，山东人，75人，枪45支。

4、第2大队长队长李振国，年30岁，当土匪出身，对我积极反对。

(1)第4中队队长李卓林，杞南风室台人，老粗出身，人枪70余，轻机1挺。

(2)第5中队队长李作同，75人，65支枪。

(3)第6中队队长陈冠英，80余人，60支枪。

5、第3大队大队长李清海，杞县东曹屯人，土匪出身。

(1)第7中队队长耿春林，杞县耿庄人，年30岁，65人，枪54支。

(2)第8中队长李剑，90余人，70支枪。

(3)第9中队长韦绍齐，人78名，枪55支。

睢县伪军调查材料

睢县县长兼保安联队长王玉珩、睢县伪保安联队副孟照华，睢县西孟楼人，现年48岁，老粗出身，不识字，善于国术。

参谋长沈云桥，现年30岁，曾充韩复榘之排长，中学文化程度。

军需主任李梦陶，现年45岁，沦陷前曾充区长，中学毕业，善于拍马。

一、第1大队长段维忠，曾任西北军连长，粗通文字。

1、第1中队长黄培信。

2、第2中队长×××，被我缴械。

3、第3中队长张心顺。
全大队250人枪。轻机枪2挺。

二、第2大队长孟照炳，全部在河堤岑被我缴械。

三、第3大队长王志田，现年40岁，睢县南口庄人。

1、第7中队长赵西永。

2、第8中队长田孝治。

3、第9中队长袁耀中。

全大队240余人，轻机5挺，现住城西愈厢铺。

四、第4大队长尚永法、在[是]去年新成立的无战斗力，3个中队，200余人，步枪18支。

五、特务大队长李作栋，睢县段其屯人，年50岁。

1、特务第1中队长李××，骑兵30，轻机2挺。

2、特务第2中队长李治清，轻机3挺，炮4门。

3、特务第3中队长史绍田，70余人枪，轻机2挺。

4、卫士队长×××，卫兵80人枪，轻机3挺。

太康县伪调查材料

一、太康县伪县政府组织调查材料

太康县长张子修，年40岁，山东省青州人，曾任四方面军第1军参谋长，对我反对积极。

1、秘书室秘书李湛春，行政股长秦广田，经理股长郑殿卿。

- 2、行政科科长朱广庆,民政股长杨东瀛,教育股长王富龄。
- 3、财政科长马耀祖,理财股长马心正,征收股长王方再。
- 4、宣传科长魏瑞品,宣传股长霍许林,情报股长李俊五。
- 5、建设科长邢绍成,实业股长张锦发,工程股长柳×俊。
- 6、军事科长魏宗琪 {
 - 训练股
 - 作战股
 - 情报股

二、太康县伪警察所所长魏宗琪

- 1、督察室督察长孟岭学,
督察员任克安
所员宋玉华,
巡官马云祥
- 2、警务系系长杨巨夫,所员×殿梧,事务员李克彬,巡官南福顺。
- 3、保安系系长张凤禄,所员崔俊英,巡官张兆吉,内勤王□坤。
- 4、警法系系长姜震,所员董静甫,巡官陈金声、警长齐纯一。
- 5、特务系系长金普忠,所员王克宜,事务员祖耀明,巡官朱玉梁。
现成立一个特务班,班长马岩,20余人,1支手枪。

三、太康县伪保安联队长张子修(县长兼),太康伪保安联队副马德成,年40岁,城内北大街路东,曾充西北军连长之职。联队部驻县政东院司法处。

军需程向阳,现年39,城北程桥人。
教官高明国,年40岁,商邱西郭庄人。
副官李春芳,年30岁,太康城内人。
秘书朱荣钦,年29岁,城内北门里路西住,河南大学毕(业),曾任后期师范教导主任。

书记刘建初,年 40 岁,太康城内南头人。

1、特务中队长黄俊德,年 30 岁,鄢陵人,行伍出身。60 余人,步枪 45 支(钢枪三分之二)迫击炮 2 门,轻重机 1 挺,掷弹筒 1 个,驻联队。

2、第 1 大队队长汤明印(字振九),年 29 岁,中学毕业,住城内扁担街路北。大队部驻南大街日本司令部。第 1 大队副曾昭青,年 30 岁,城内西街人。

(1)第 1 中队长刘兴法,年 26 岁,城东平庄人,兵混子出身。60 余人枪(钢枪三分之一)轻机枪 1 挺,驻南大街路西日本司令部。

(2)第 2 中队长赵国恩,年 30 岁,学界出身,太康西五里赵庄人。驻城内南门里博爱小学,50 余人枪。

(3)第 3 中队长任宗梧,年 20 岁,城南徐庄人,50 余人枪,驻城内口祠。

3、第 2 大队队长夏连之,年 30 岁,城东郭庄人。大队副辛建勋,年 30 岁,柘城人,大队部驻仓房院。

(1)第 4 中队长刘鸿恩,年 30 岁,80 余人枪,驻仓房院,守大队部。

(2)第 5 中队长孟金铭,年 40 岁,本城南头人,是回民,人枪 70 余,土造轻机枪 1 挺,住东门内布公祠。

(3)第 6 中队长(即第一区队)住东关,人枪 80 余。

4、第 3 大队长林在山,年 30 余岁,城东林凹人,现城内富户街。第 3 大队副李金福,年 30 岁,大队部驻联队部东院。

(1)第 7 中队长郭影,年 24 岁,本城无宁寺街人,学生出身。80 余人枪,轻机 1 挺,驻孔子庙。

(2)第 8 中队长□万金,年 26 岁,本城南顺城街人。人枪 60 余,驻县前街新会院内。

(3)第 9 中队(即第 3 区队)前已被我消灭,现驻马厂(前驻 3 区全庄)。

5、第4大队长樊天昌,年30岁,太康樊庄人,行伍。大队附郭本荣,年40岁,太(康)县郭庄人。驻大刘寨。

(1)第10中队长马德俊,年30岁,系马德成之三弟。全队共80人,钢枪三分之一,现住城内张公祠。

(2)第11中队队长刘广杰,年30岁,60余人枪,现住大刘砦(离太城25里)。

(3)第12中队队长王书俊,现34岁,城内南大街人,回民,全队50余人枪,驻西大街及西门守卫。

(4)第13中队队长王友仁,年25岁,学生出身,曾充电话员。全队70余人枪,钢枪三分之二,驻马厂寨内。此队系第四大队之特务中队,轻机1挺。

淮阳县保安联大队调查

淮阳伪保安大队长县长兼。

淮阳伪保安大队副张百堂,下辖3个中队共360余人枪,驻城内。

河南省伪保安第2联队调查

保安第2联队长侯殿卿,年47岁,陈留耿寺人。联队副李芝甫。

直属中队长李××,80余人,重机2,轻机2挺,炮1门。

第1大队长李芳藻,1中队长马明汉,2中队长李晓初,3中队长李有奇,轻机10挺,驻八里庙。

第2大队长李鹤彩,4中队长董长富,5中队长田凤至,6中队长张清峰。轻机4挺,住韩岗。

第3大队长刘顺,7中队长王兴武,8中队长孙振甲,9中队长王泽同,轻机6挺,驻开封北关。

第4大队长王郁文,10中队长何聘卿,11中队长陈振国,12

中队长王法振,轻机 3 挺,驻中牟县。

第 5 大队长宋景彦,13 中队长黄子亮,14 中队长李××,15 中队长王兆玉,轻机 2 挺,驻沟村。

特务大队长宋兼,1 中队长杨国振,2 中队长熊丕均,3 中队长刘××,190 人,轻机 6 挺,驻斗□。

附敌材料一部

注明:1、因干部缺乏,情报工作基础历史的薄弱,对敌内部了解的很差。

2、我们的关系缺乏,质量差,对敌调查材料搜集困难。

3、开封的敌人刚换防,尚未查明。

一、商丘 驻骑第四旅团及小原部队

(1)柘城驻 180 余骑兵。

(2)太康驻宪兵 8 名,机枪一挺。

(3)淮阳驻敌一部。

二、开封

(1)开封驻敌 117 师团,即中村旅团 1467 部队,兵力武器不详。

(2)兰封驻敌 1436 部队,兵力武器不详。

(3)杞县驻敌 1436 部队一部,272 名,重机 2 挺,轻机 16 挺,迫击炮 1 门,小钢炮 4 门,掷弹筒 10 个(原有及新增加),即早川部队。

(4)通许驻敌 1436 部队之一部,共人 50 余,其武器不详。

1945.6.15 于安桥

①

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敌伪顽概况

(1945年6月)^①

A、敌军情况：

步兵独立第一旅团旅团长宫下部之一九一大队，大队长伊藤次作，代字“干”，代号“一四二四”驻菏泽。在1944年12月上旬以前，一九一大队之分布，大队部同一中队，永岛次郎炮兵中队，重机枪中队。每中队有人150余，每中队4个小队，每小队3个分队。每中队有轻机枪5挺，重机枪1挺，掷弹筒5个，轻机枪每中队六至二挺，余捷克式，步枪皆三八式，炮兵中队钢炮2门，新式八二迫击炮2门，重机枪中队有重机枪4挺，轻机枪6挺，大队部有骑兵通讯队，洋马20余匹，卫生队10余人皆随大队部驻。此大队有5个步兵中队，第二中队中队长大木一男分驻曹县，分派到城武一个小队，定陶一个小队。三中队中队长1944年10月前是永岛次郎，后换于贺神，于去年12月在单西被我击毙，换土星任中队长，此中队驻单县。四中队是中队长片山次一驻鄆城。五中队中队长太山三郎驻钜野。

1月3日上午，由兖州旅团部调来新兵300名，敌人的计划新兵整训一个阶段将老兵抽走集结到旅团部，组织成机动部队对我军讨伐，新兵守备据点。由1月10日开始，敌人以押车为名陆续将老兵向兖州旅团部抽调，三五十不等，新兵零星向各中队分散，至20日止，三百新兵已换完，把一中队长本田幸一调走。

① 原文未具时间，此系编者判定。

3月15日下午,由兖州来第二批新兵150名,向各中队分散调换。在此次调老兵时组织了一个讨伐队,人员约有百六七十名,皆老兵,有二中队长大木一男任讨伐队长,遗职森田接任。讨伐队在一九一大队驻地流动,以单县驻的时间最长,配合各县敌伪扫荡。于4月23日到曹县,25日转定,现在钜野公路上掩护修筑据点。

4月12日,伊滕大队长调回本国升任陆军步兵学校教务主任,一九一大队长遗缺永岛代理。于5月2日永岛调走,有佳滕任大队长。于5月3(日)第三批新兵由兖州调来30名,将老兵换走,此时,调换已完毕,菏泽之敌人自1月至5月3日止除留一个讨伐队160名老兵,其余皆新兵。各中队编制情形无变化,驻地仍未动。此新兵操场动作不大熟练,战斗力很差,情绪不高。如4月22日敌人三县合击邓集以北地区被我军各路击退。菏泽是一路主力,敌人200伪军500,被我3个连打的溃不成军,三五成群跑到距战斗村庄十余里,城内援军出来敌勉强集合起来,敌伤亡7名,将敌人修筑据点之计划延迟一个半月。

此次调防后武器较前差些,轻机枪三分之二捷克式,步枪三分之二北支造,余捷克式,北支造是马步枪。各中队长:一中队长井上,二中队长森田,三中队长土星,其它不详,代字“干”,代号“一五七五三”。独立第十四警备队代号至锐一五七四七——一五七五五,5月30日在南阳附近编成。

菏泽之特警队于3月1日取消,(爱民部队),把人员调到济南,其原因因负责人长谷川过于暴露特务面目,很多人不敢接近。其实是虽把长谷川调走,留了三个人由公开转入秘密工作,在荷敌人的政治攻势下积极活动,暗中调查伪军的行动及言论,对可疑分子进行清内;对我军组织便衣队,伪装我工作人员以找房或有工作为名,捕捉我进步村级干部或我部队上人员;以走私利用商人到我根据地刺探军情,在根据地大量发展特务组织,布置侦察网,村村

有敌人间谍,使我军到处触到敌人的侦察网,敌人每日都可收集到我军情形。自3月间我根据地展开反特务斗争以来,普遍揭发将敌人的侦察组织搞垮。据敌人近来情报载称利用乞丐妇孺到根据地来刺探我军情。

朱集于1944年12月上旬驻敌骑四旅团一个联队,代字“成”,代号“五三五八”,另有“五三五三”、“五三五六”、“五三五一”字样。朱集营房驻联队部及一个大队,道南亳县驻一部,车站驻骑兵500,炮兵300,步兵100,派到柳河之森下大队有800余名,新兵占三分之二,豫西战役后补充的人。1944年12月下旬,朱集柳河之骑兵大部向东南开去,朱集仅留有骑兵四百,柳河留有100,皆新兵,是由在华三次侨民征兵抽来的,新兵大半是商人出身年岁很小,操场动作不熟练。

1945年2月21日,朱集之骑兵300向东南开去,柳河仍无变动,朱集仅留骑兵60,步兵。于5月1日由东南返回。敌人骑兵500名休整,于5月17日乘火车向西南开去300,向南去100余,现朱集仅有骑兵200。百十七师团代字“弘”,代号“一四六〇”,驻新乡,“一四六八”部队随同师团驻防中牟,旅团驻开封。开封有“弘”“一四六七”有“弘”“一四六九”,兰封驻“弘”“一四六九”部队。此部队分驻民权之田庄东一个中队80,野鸡岗20,分驻改成一个中队人120名,由改分到马头40,东明集驻“弘”“一四六九”邱山中队80,分到东明县40。3月22日以前新兵占三分之二,东明集八个班有新兵五个班。于3月22日将老兵抽走,调来一批新兵接防。“一四六九”部队,此次抽调老兵后,所来之新兵武器有三分之二是捷克式及套筒,三分之一的三八式步枪,机枪多半是捷克式;小孩很多,操场动作不很熟练,每星期两三次夜间野外演习实弹射击。自2月下旬开封被盟机炸后,敌人损失500,将开封城内之敌人向外疏散,中村旅部名义在开封实已移驻兰封,现兰封敌人约有800,开封敌人大部移到城西南之小庄内驻,城内仍挂着原来之牌号未动。

开封西门里城隍庙东驻“甲”“一四三三”部队，南关顺河街驻“弘”“一四六七”部队及“一五六二”部队，顺城街驻有“一五六三二”部队，砖桥街驻“弘”“一五六三〇”部队，东棚板街驻×“一八五〇”部队，新民大街驻“仁”“四二二二”部队，此处有电台一部，福音堂驻“田”“一八五三”部队。除西门里敌人骑兵于1月下旬向西开去外，余皆无变动。开封之敌建筑物被盟机炸毁很多，车站上站台票房、机器房、转盘皆成砖砾，仓库已于5月18日炸毁，现车场内停有被炸毁之车皮数百个。敌人于3月间在站台两端修有藏车墙能容40余个车皮，在两个车站中间亦修有藏车墙防盟机轰炸。

B、正规性伪军概(况)：

自我向新地区挺进以来，在豫北敌人感受很大威胁，特别是新乡阳武原武被我光复后，新乡之敌感到极大不安，加之敌人兵力东移布置海防。敌人为了弥补兵力之不足，就号召建军，把伪军战斗及技术提高，培养伪军能单独作战，首由豫北开始成立军区叫豫北军区。

豫北军区司令员张星辰，参事郑经武、马旭底。

(详见下表——编者)

豫北军区 (住开村)	军区直属情形	总务科长	张振宇	会计股什务股总务股股长范静修, 保管股长丁建章	
		宣传科长		宣运股、农运股	
		灭共科长	陈济民	灭共股长谢经委、宣传股、情报股	
		调查科长	马汉三	调查股	
		秘书科长	陈 吾	秘书股、文书股	
		卫生队长	张志明		
	第一分区司令员	全桂林	籍林县、临漳、淇县、辉县、汤阴	全, 汤阴人, 仙天妙庙徒, 有武装三千余, 皆道徒。	
	第二分区司令员	陈济民	籍滑县、浚县	陈, 辉县人, 仙天妙庙徒。	
	第三分区司令员	尚清英	籍封丘、延津、汲县	有武装三百余人。	
	第四分区司令员		籍新乡、阳武、原武		
	第五分区司令员	赵济川	籍获嘉、修武、武陟、博爱		
	第六分区司令员		籍孟县、沁阳、济源		

C、投敌之顽：

(一)1943年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委之六纵队孙性斋(1942年已投敌人), 1944年夏顽山东省府鲁西军区重委孙性斋为鲁西军区挺进二十三纵队司令。

1945年孙性斋改为十一专区保安副司令兼二十五旅旅长, 副旅长赵志卿。

传达处约有人 50,步枪 30,机枪 1 挺掷弹筒 1 个;
警卫班约有人 20,每人长短枪各一;
侦察队约有人 30,车子 30 辆;
付官处;
秘书处;
军需处;
军械处;
鸟枪队 10 余人,土炮 7 门;
骑兵连连长高洪照人马 40。
特务团团团长王茂亭
第一营营长张景吾,3 个连约有人 130 名,枪 100 支;
第二营营长孙孟普,2 个连约有人 120 名,枪 80 支,机枪一挺;
第三营营长卢怀春,2 个连约有人 70 名;
第四营营长刘芝则,2 个连约有人 100 名。
万敬斋团:
特务队队长田培义,约有人 20 名;
第一营营长孙朱桥,3 个连约有人 160 名;
第三营营长孔宪悌,约有人 40 名。
刘自安团:
传达处人 7 名;
第一营营长王××,2 个连约有人 80 名;
第三营营长赵晋卿,3 个连约有人 160 名,手提式 2 架。
另有 3 个常备队:
第一队队长刘伯仲,约有人 70 名;
第二队队长赵相成,约有人 40 名;
第三队队长尹焕卿,约有人 30 名。
沈庆余队:

第一队队长沈相基,人枪 40,轻机枪 1 挺;

第二队队长×××,人枪 30;

第三队队长×××,人枪 30。

赵志诚团:

第一营营长×××,人枪 40;

第二营营长韩嵩顺,人枪 120;

第三营营长×××,人枪 70。

曹团于 1944 年 12 月间驻仲堤圈,那时约有人 400,于 12 月下旬被我消灭。现驻娄李庄人枪约有 100。

刘伯村团于 1944 年 12 月间驻娄李庄,约有人 400,于 12 月下旬被我消灭。现仍驻娄李庄,人枪 60,轻机枪 1 挺。

补充团团郑仪之约有人 50 名。

孙全部约有人 1800 名,机枪 4 挺。

(二)1943 年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委之鲁苏皖豫边区挺进第二纵队马逢乐(1941 年已投敌人);

1944 年夏鲁西军区挺进总司令王毓文委马为十九纵队司令,新换番号不详。

五五支队长李广远,约有人 200 名,枪 180,轻机枪 3 挺,于今年 5 月中旬被我消灭;

五六支队长陈继志,支队附翟耀亭,约有人 170,轻机枪 1 挺;

五七支队马继乐,约有人 150,轻机枪 1 挺;

独立第三支队马洪图(鲁西军区去年委任),有人 250,轻机枪 3 挺,于 5 月中旬被我消灭。

马部共有人 800,轻机枪 8 挺,被消灭 400,轻机枪 5 挺。现尚有人 300,轻机枪 3 挺。

(三)虞城伪保安联队,于今年 4 月间鲁西军区保安司令部委李子仪为顽山东鲁西军区第一专署保安二十四旅旅长,副旅长魏正阳兼曹县县长。

第一团团团长李子仪兼；

直属队

传达处长韩秀珍约有人 20,长短各 20,马 20 匹；

军需处,会计 1,催征员数名；

秘书处处长 1,书记 2 人；

军法处处长王涓耿；

副官处

特务团团团长魏逊卿,人枪 30；

第一营营长刘齐轩,人枪 80；

第二营营长王敬瑞,人枪 50；

第三营营长安作玉,人枪 70。

第二团团团长乔景运,4 月间被我消灭,人枪 120；

第三团团团长曹永年,3 个连约有人 200,轻机枪 2 挺；

自卫团团团长张自卫,人枪 100,轻机枪 1 挺；

李子仪全部 700,轻机枪 3 挺,消灭 100,现尚有 600,机枪 3 挺。

(四)1943 年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委之苏鲁豫皖挺进第七纵队司令智永德,顽山东省府保安司令部于去年夏委智永德为山东鲁西军区挺进二十四纵队司令(据说现划到十一专署改为二十三旅)。智永德已于去年公开投敌,智本人不断到曹县城内与朱晓堂开会配合行动,现智之太太在曹县城内朱晓堂私宅内住。

第一团团团长逯华堂,4 个连约有人 200 名；

第二团团团长智永昌,有 3 个连约有人 600 名,已给张瑞亭；

第三团团团长张怀德,约有人 300 名,已反正；

特务一团团长刘日坤,人 200 名；

特务二团团团长智宜轩,人 200 名；

特务营营长智××,3 个连人 300 名；

保安大队长陈锡山,人 100 名；

智永德共有人 1000 名。

(五)十六专署下辖之二十二旅旅长张志刚,并任十六专署保安副司令兼菏泽县长。张志刚已于 1943 年投敌人。

第一团团团长李顺德,有 6 个连 450 名,步枪四百支,轻机枪 6 挺,是张之主力团,战斗力亦较强,自王子杰被消灭后,李兼定陶县长。

第二团团团长杨金标,有 5 个连,人员 350 名,枪 300 支,机枪 4 挺。

第三团团团长徐守珍,有 4 个连,人员 240 名,步枪 200,机枪 4 挺。此团过去 5 个连,被我消灭 2 个连 150 名,由一团调来一个连,战斗(力)很弱,情绪很低。

第四团团团长侯光学,有 5 个连,约有人 370 名,枪 300,机枪 5 挺。

第五团团团长刘东鲁,有 5 个连,约有人 200 名,枪 180 支,轻机枪 2 挺,此团战斗力最差,逃亡很甚,因大部分是鄄城人,在我政治影响下多愿回家不愿当伪军。

特务第一营营长刘顺东,有 4 个连,约有人 400 名,步枪 400,轻机枪 8 挺,战斗力最强,是张之亲信人;

特务第二营营长李科,3 个连,约有人 200 名,枪 200 枝;

骑兵连连长李凤龙,人马 80;

菏泽县政府人员约有人 150,有特务在内 60 名,电台一架;

张瑞亭电台一架,特务连约有人 60,轻机枪 2 挺;

特务第二连人约有 60,机枪一 1 挺;

智永昌团人 600 名,被我消灭 200 名。

(六)十六专署辖之十旅旅长王子杰已于去(年)公开投敌人,该逆兼定陶县长及特务团长。

直属队;

参谋处;

副官处处长李竹林；
军需处处长张希贤；
秘书处处长×××；
军法处处长李鸣生，有人枪 30；
便衣队队长林亮道，人枪车子各 30；
骑兵队队长王敬轩，30 匹马；
特务团团长王子杰兼，团附刘化文（定东刘楼人）。
第一营营长孙孟金，下〔辖〕4 个连人 400 名；
第二营营长谢荣禄下〔辖〕4 个连人 300 名。
第一团团长（亦叫二十九团）何文兴，团附马继五，3 个营，团直有特务队 30 名；
传达处人 4；
警卫处人 10 名；
副官处人 2 名；
军需主任一，会计一，催征员数人；
书记官一，文书三；
第一营营长李思江，有 4 个连，人 240 名；
第二营营长刘汉朋，有 4 个连，人 230 名；
第三营营长高寿山，有 4 个连，人 250 名。
每营部有营附一，副官 2，军需 1，书记 1，文书 1，司号长 1，特务班 12 名，传达 2 人，警卫员 6 名，看护 2 名，伙夫 2 名，马夫 2 名，马 2 匹。
第二团团长傅善伦，团附白念胜（亦叫三十团），团部及营部编制与一团同。
第一营营长李凤鸣，有 4 个连，人有 200 名；
第二营营长王西灿，有 4 个连，人有 240 名；
第三营营长杨景勋，人 4 个连，人有 250 名。
王逆全部人数 2500 名，轻机枪 7 挺，掷弹筒 5 个，已被我全部

解决。

(七)六方面军独立第一师师长杜淑下有5个团,师部及八大处驻北门里。

特务连有人150,3个排9个班,机枪3挺;

特务团团长王文灿,下〔辖〕下(3)个营,人共有500名。

第一营营长苗光斗,人有200名,3个连;

第二营营长崔××,人有150名,3个连;

第三营营长×××,人有150名,3个连。

第一团团长扈全绿,团付〔副〕李××,下有3个营,共有人600名,每营3个连。

第一营营长×××,约有人有190名,轻机枪1挺;

第二营营长×××,约有人190名;

第三营营长×××,约有人200名,轻机枪2挺。

第二团团长何发虎,有3个营1个特务连,人约有450名。

第三团团长兰全然有3个营,约有人800名。

补充团有三个营,人约有五百人(原有一个警备团已编入补充团内)。

突击队有人约70名,便衣队30名。

杜部共有人2900名。

以上投敌之伪军共有11760名;上半年被我消灭3700(名),现有人数8060名。

D、顽军情形:

顽鲁西军区司令王毓文驻阜阳,据山东省府1945年2月2日第三次省府会议关于调整鲁西部队问题及整理行政区域问题极为详细。在军事方面,省府之保安处改为军事厅,厅下分四科四室:参谋室、秘书室、办公室、会计室。总指挥部改为总司令部,司令部下分四处一室:参谋处、副官处、军法处、军医处、机要室。在行政区域方面,将成武、曹县(原十六专区)划归十一专区;濮范观(原二专

区)划归十六专署;东平汶上(原十六专区)划归二专区。每一个专署有一个保安司令部,司令专员兼,另设一付〔副〕司令。

1943年二十八集团军李仙洲委张盛泰为鲁鲁豫皖边区挺进第一纵队,自今年春鲁西军区王毓文改委张励为鲁西军区挺进十八纵队司令其情形如下:

特务大队队长黄雨亭,人枪 80,苏联机枪 1 挺;

独立支队支队长张本斌;

特务队队长孔大牙,人枪 110;

传令队人枪 20,轻机枪 1 挺;

警卫班人 10,驳壳枪 10;

第一大队长张玉启,人枪 60,掷弹筒 1 个;

第二大队长张连山,人枪 70;

第三大队长张盛标,人枪 64;

第四大队长王正言,人枪 37,掷弹筒 1 个。

张本康支队下有 3 个中队:

中队长张盛魁人枪 30;

中队长张盛桓人枪 30;

中队长张盛堂人枪 30。

王茂德支队有 3 个大队:

一大队长王念德人枪 80;

二大队长王修德人枪 70;

三大队长安谨福人枪 70。

李红粉支队有机枪 1 挺,下有 3 个大队:

一大队长朱礼先人枪 40;

二大队长孙哲生人枪 40;

三大队长董作之人枪 40;

杨洪顺大队人枪 30,轻机枪 1 挺;

王永智大队人枪 160;

张共有人枪 1000,轻机枪 5 挺。此顽老早与柳河之敌人特务头子山本有关系,暗中来往,有时公开依靠敌人。

1943 年李仙洲委之独立一支队司令石振声,于 1945 年鲁西军区王毓文委石振声为鲁西军区挺进独立五支队司令。

第一大队长石福相人枪 30;

第二大队长王田人枪 30;

第三大队长申炳田人枪 30;

第四大队长李小兰人枪 30;

第五大队长郭起云人枪 120,轻机枪 1 挺;

第六大队长董砚硕人枪 180,轻机枪 2 挺;

第七大队长×××人枪 20;

第八大队长申二娃人枪 8;

特务大队长韩占元人枪 30;

石全部枪 520,轻机枪 3 挺,被我于 5 月间消灭 100,2 月间消灭 30,现有 420 名。

E. 地方性伪军:

1. 曹州道保安联队联队长王九思兼,下有 2 个大队;

第一大队队长曹世岭兼教育长;下有 7 个中队(人约有)曹定鄆之中队已回本县,现有 4 个中队,人有 300 名;

第二大队大队长赵兴汉,大队付(附)刘宝贵下有 4 个中队,人约有 300 名;

2. 菏泽县保安联队联队长陈华亭(县长),联队付(附)李森庭,是于去年 12 月间改此番号,于今年正式宣布。详情列下。(表略——编者)

曹县之伪军自组织以来,都很紊乱,虽经几次整理都无有成功。去年黄宗伯任县长,因整理编制被朱晓堂威迫下台。朱晓堂接任县长,今春才算把组织统一,曹境所有之伪军统编入曹县保安联队内。该联队有 3 个支队 12 个大队,每大队 4 个中队共 48 个中

队,每中队人员根据点名册上是 109 名,实人数有 90 余名,共有伪军 3700 余名。因有的中队不足 80 名,多少不等,只将第三支队编制情形列下:(此材料是由伪呈报表上原表抄下)(表略一编者)

我分区 500 以上敌人伪军之扫荡约有 20 余次,只将所能记载的列下:

2 月 5 日,荷敌人 500,伪军 1500 到城北小留集以东地区抢掠,此次扫荡主要配合张志刚修筑据点,抢来粮食 20 余车,耕牛 10 余头,时间 3 天。

2 月 20 日,荷敌人 200,伪军 500,到城东北配合张志刚向我进攻,当日返回。

2 月中旬,定敌人 20,伪 500,到定城东北抢掠我粮食 20 余车,并烧民房数 10 间,抢耕牛数 10 头,3 日返回。

2 月 24 日,荷敌人 100,伪军 200,到荷东南佃户屯一带抢掠牛数 10 头,于 25 日返回城内。

3 月 8 日,荷敌人 60,伪军六面到荷西北及西南抢掠粮食 20 余车,牛数 10 头,当日返回。一连出动三次河南王嵩乾集。

4 月 17 日荷敌人 200,伪军 1200,到荷城西北高庄一带抢掠粮食 30 余车,于 20 日返回。

4 月 22 日,荷敌 150,伪军 800;同日定陶之敌人 20,伪军 300;曹县之敌人 40,伪军 1000;企图合击马集以北地区及一千王一带,当日被我全部击退,将敌人修筑据点修公路之计划全部粉碎。

4 月 28 日,荷敌人 200,伪军 1000 到定;同日曹县之敌 200,伪军 500 当日到定;次日到城周围抢掠。于 4 月 30 日到钜南掩护东沙土集之碉堡据点。

5 月 29 日,由钜南之敌人 500,伪军 2000 到曹县;于 6 月 2 日分 3 路合击李集青堤集,抢掠麦子 30 余车,烧麦一部。当日到大王集住下,掩护修筑公路据点。

6 月 5 日,定敌人 200,伪军 1000,荷敌人 150,伪军 500,企图

合击张堂一带,被我阻止,当日返回。定陶出来之敌人在王店未动,掩护修筑据点公路。

5月28日,考城之敌280,伪军800合击围攻张北彩之部队,被我击退并击毙敌人30。每次敌人出动多以抢掠为主,无有什么清剿。

在4月以前,敌伪的活动有两个重心点:一个是政治攻势军事配合,开展特务工作,在边沿区暗中按〔安〕设谍报网〔网〕,由外向根据地腹地地伸展;再重心点是抢粮,因伪军粮食缺乏,每日吃豆子生活相当艰苦。4月以后是〔开〕展蚕食分割根据地,在交通线上按〔安〕设炮楼据点,公路重新修补,确保交通之安全;加强防务,对城防工事重新修筑,挖城壕、筑炮楼。如定城单县积极修筑城防工事,陇海路北伪军各据点增设围砦,挖沟修筑炮楼,根据地南端的联伪反共态度渐渐明朗化。

敌人每次出动不像过去,在战略据点集结或靠近战略点将兵力集结好向我根据地再出动,现在的出动是以少数敌人多数伪军以突然的动作,向我根据地忽进忽退。出发时间多半是午夜,以声东击西来迷惑我们。如菏泽之敌人向北扫荡,出南门直向南扑,忽然折回向北急进,到了接近我游击区时把部队布成扇面形前进,把主力放在当中,这样主力可以随时向两侧构成包围圈策应两侧部队。每次多是以伪军为主来提高伪军的战斗力,若遇着我游击队时使用伪军,若遇着我主力部队,敌人为主伪军只是配合助威。午夜出发不经村庄及道路,利用特务引路向目的地前进。如此次掩护东沙土集,敌人及伪军驻单县之讨伐队到成武转曹县,又到定陶与菏泽敌人集结后转向钜南。敌人到钜南后按〔安〕设临时据点,并找我部队,将据点修筑完峻〔竣〕后忽然退回曹县。3月扫荡水东时,柳河之敌人忽然向我根据地扑来,尚未接近游击区就转向道南。急进,每次出发带有便衣及伪军军服,伪装伪军及我部队或工作人员,混在老百姓群中窥探我军行动,及捕捉个别人员。敌人出外扫

荡时，多半使用老兵将新兵留在家守备。

· 扫荡 11 次，共使用兵力 16120 人，内日军占 2730 人，伪军 13400 人，日军比例约占百分之二十，伪军占百分之八十。

（以下内容是平汉路、同蒲路、石太路各铁路沿线车站的编号表。略去——编者注）

冀鲁豫四地委四分区政治部 关于目前加强敌军工作的指示

(1945年9月17日)^①

为了彻底肃清豫北残敌,根据分区目前形势及敌顽动态,在解放新乡前,对敌军工作特提出以下工作意见,希研究执行。

一、工作方针

抓紧目前有利时机,协同各部门力量,大力开展对敌中下层的争取瓦解,结合清剿,孤立死不回头的坏分子,更进一步加强纪律,依靠群众开展群众性的对敌斗争。

二、几个具体工作

1、伪属工作——加强伪属工作,大量争取瓦解敌人中下层,这是目前的主要工作。(一)争取瓦解对象是因生活所迫或被抓走的中贫农无产成份,或因我某些政策“左”的措施、吓跑的误入歧途的小知识分子及其他罪恶不大的排以下干部、士兵等,其余少数罪大死硬分子,则孤立分化打击之。(二)组织力量依靠群众,开展伪属自救运动——召开群众会、伪属会等,讲明形势及我党政策,揭发伪军罪恶及其末路,给伪属指出自救办法。县、区、村、团、大队,均作具体布置,按期检查汇报总结,团、大队走一村作一村,县区结合

^① 原文未具时间,此系编者判定。

各部门,找出重点,推动一般,与目前社会部门,对逃归人员处理重点,步调取得一致。

2、清剿工作——敌人最近有计划地派出小股发展组织,掠夺群众资财,扰乱秩序,阻我工作开展,企图长期与我斗争,为害甚烈。因此有小股活动的地区,必须组织力量结合清剿,予以消灭之。在召开各种会议上,必须讲明小股敌人对群众的危害,如不消灭,群众无法安居乐业,给伪属说明儿子丈夫当小股,结仇犯法,窝小股的违法引祸。并有计划地组织群众看家自卫,秘密地由点到线建立大众情报(须注意审查成份),开展秘密群众检举,违法窝小股的亦应受严惩。各县必须有计划地组织力量,规定区域进行清剿,统一领导,规定联系。

3、内线争取工作——动摇分子无大罪恶,有争取条件的,争取其投降;其争取条件不大的,应争取临阵放下武器,消灭敌对;其罪大死硬分子则分化孤立之。

(一)采取严肃态度,给以通牒警告,说明形势及其所处之绝境,并说明我党宽大政策,是对回头的宽大,指出生死两条路:交枪投降和死不回头,令他立即表明态度。

(二)内线关系统一给他一封信,干部开展一封信运动(以个人名义经县、团、大队负责人审查后发出)。现在是缴枪投降、无论任何关系,也不准给以任何名义,或保留其军用品。投过来成股的送分区敌工科审查后,分别转送各处,枪支由原接收机关、或团、大队留用,将数目呈报分区敌工科,零星的县处理,必须呈报成绩经验。团、大队不接收不处理人员,一律送分区敌工科。

三、统一领导组织力量

1、各级党委必须将敌军工作作为主要工作之一(有敌的县份),认真计划布置,结合中心工作统一领导,指派专人(兼职亦可)负责计划检查报告总结这一工作。

2、干部配备：团、大队没有敌工干部者，或有干部不能胜任者，即由团、大队政治干部负责，连即设敌工委员（可以兼职）；边沿县□□敌工部可以兼职，但必须负责组织力量推动布置这一工作，区设敌工委员（可以兼），县敌工部最少要有一个干事，具体执行此工作。

3、工作汇报制度——定期汇报，每月三日前，县向敌工科（部）作上月月终工作总结报告。

临时汇报——工作的收获、经验、偏向、疑难问题，及时请示汇报，以便研究解决纠正。

四、政策问题

1、过去检查政策执行是不彻底的，今后应经常深入政策教育，使干部都能了解政策的意义。

2、政策执行的表现普遍的是有点右，只有个别的是“左”。所有敌工干部，要把最近社会部传达的对逃归人员处理的精神加以研究，改正过去的问题。

五、有关的几个问题

1、争取回来的敌伪人员，不经请示批准，一律不准使用。

2、今后一般的不是投诚，而是无条件的缴枪投降（杀敌立功来者例外）。

3、犯人与俘虏须区别对待。

4、散匪缴枪按俘虏看待。

新乡解放后主要的是清剿工作，对以上指示希将研究执行情况随时告知。

第十二军分区司令部通报

(1945年11月11日)

十月份敌情综合

一、顽军犯境概况

(一)顽 47 军退淮之暂一师李才桂部于 5 日支持伪顽部郭馨波部陷我太康后,复于 12 日伸抵王集乡石岗一线,即遭我阻止,无复北犯。

(二)9 日夜,顽 68 军突由朱仙镇水波渡河,配合伪顽侯、曹部进至赤仓、三里口、石岗一线,占领我通(许)城。10 日该北路伸陈(留)城,中路伸斗相□那庄一线,南路仍据通(许)城未动。14 日,该 119 师之 355 团配合土顽范薛部复陷我杞城。中南路亦推至四所楼、长智、七步、王固、晁村一线。

(三)顽 47 军之暂一师突于 13 日经淮西去顽 55 军曹福林部,于 10 时经周口进抵太城。17 日该 29 师一部,伸向王集、杨庙一线。19 日,复犯龙曲、草波,张□砦。该 81 师亦于同时挺至竹林、高贤。20 日,该东西两股会合于板木后,即配署在龙曲、板木、高贤、竹林一线按兵未动。

(四)顽 68 军 119 师之 352 团,19 日由杞县城进抵毛岗,20 日复达博集,21 日侵入赵村、马桥。该东翼之 1 营于瓦岗被我痛击后,旋即退驻刘砦,同时师部率 355 团进驻□镇,该 357 团进向于

堂一带。30日,356团之三营由刘砦、瓦岗撤至马桥、杨庄,该二营进驻马庄,为我当□即予消灭。

(五)伪三路军张岚峰部之特务团,14日由商邱增睢城,15日进驻邱陵寺,策应顽68军犯我杞城。23日该团全部撤回商邱。该军一部亦于17日伸向平岗、潮庄各一部,策应顽55军北进,并于21至23日逐步伸向长岗、马庄、韦庄、傅集一线,策应南北顽军会合后,27日全部向柘城方向撤去。

(六)犯境顽军之战术特点为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每日进逼数里至十余里,愈接近我中心区则前进愈缓,意在摧毁我根据地,不主动向我主力作战,以正规军作先,驱杂伪土顽作后续,每到一地即大举清乡,到处摧毁我群众组织,绑打我基本群众,发掘我埋藏资财,尽施其烧杀抢掠之能,并支持地主向群众赎地,倒粮倒款。

二、顽二集团军调查

顽二集团军属五战区指挥,该集团军原系西北军旧部,总司令为刘汝明,副总司令为曹福林,下辖55及68两个军。

(一)55军军长由曹福林兼代,按该军系韩复榘旧部,下辖29、74、81三个师。该74师现随集总驻许昌,81师(原属15军,15军于8月遣散后,编入该军),现随军部驻周口,29师现驻太康境内。

(二)68军军长为刘汝珍、副军长为黄敬升。该军系宋哲元旧部,下辖119、143两师。119师刘广信,下辖355、356、357三个团。143师师长崔华甫,下辖427、428、429三个团。该军之36师已于今年8月遣散。

(三)顽68军军部直属有炮、工、辎、通、特营。师直属有炮辎营及工通特连。团直属有炮辎连。每团下辖三个营,每营辖三个普通连,一个机炮连,每团迫炮10门(团直四门,每营二门)重机12至15挺(全部在营)。每连轻机四至六挺,掷筒二至四个,人数50至70名。

四、该集团军无平射炮和骑兵，更无美国租华之新式武器，士兵待遇极苦，与薛嫡系军矛盾很大。该 68 军自连遭二次痛击后，溃散将近两营，对我极为恐怖，士兵逃亡严重。

三、顽四集团军调查

顽四集团军属一战区指挥，该集团军之前身 17 路军杨虎城旧部，总司令为李兴中（原杨之参谋长，冯玉祥之旧部），该下辖 38、27、40 军三个军。

（一）38 军长张耀明，下辖 35、17、177 三师。该 35 师长为孔从舟，下辖 49、50、51 三个团，代字为“勇”。该 17 师长为赵寿山，下辖 101、102、103 三个团，代字为“智”，该 177 师长李振西，现兼开封城防司令，下辖 529、530、531 三个团，代字为“信”。

（二）该集团军全部配署在新汴路上。27 及 40 军确在何地不明。该 38 军原在开封，本月中旬据说仅留 177 师守汴，余皆北上（□□）。团直只有炮连及特、通排。营直只□□□□□□重。

（三）该军师直属有炮、辎、通营及特连、机连、三三编制。每连兵员 70 至 90 余，轻机 6 挺，掷筒三个。每团迫炮 8 至 10 门，重机 9 至 12 挺。

四、小股伪顽近况

（一）顽专区之划分，我分区境内，共划分三个顽专区。开封、中牟、尉氏、通许、陈留、兰封为一个专区，专署设开封，专员为郭××。商邱、杞县、民权、宁陵、永城、夏邑、睢县为一专区、专署设商邱，专员姓氏不明。淮阳、太康、鹿邑、柘城、西华、扶沟、上蔡为一专区，专署设淮阳，专员为田汉洲。

（二）各地之伪军及土顽，现都编成保安团，孟照华为睢县保安团长，王昌杰为太康保安团长、范景新为杞县保安团长，侯殿卿为××保安团长（列在整编中），曹茂林为××保安团长（他处尚未查

明)。

(三)已经查明之顽保安团分列如下：

1、顽七专署(淮阳)沙北支队附注：

番 号		主官姓名	兵 力
支 队 部	支队长	刘振科	600
	支队附	沈周玉	
	副 官	王洪远	
一 大 队	大队长	许万超	180
	大队副	郑玉清	
	一中队长	刘俊尝	60
	二中队长	刘振甲	50
	三中队长	刘振波	60
二 大 队	大队长	程礼景	180
	四中队长	郑玉□	50
	五中队长	□学文	60
	六中队长		60
三 大 队	大队长	白 镇	130
	七中队		50
	八中队		40
	九中队		38

2、顽杞县保安团

番 号	主官姓名	兵 力	附 注
团 长	范景新	700	
副团长	刘西汉		
一大队长	薛汝梅	200	
二大队长			
三大队长	刘西汉	300	

3、顽×保安团

番 号	主官姓名	兵 力	附 注
团 长	侯殿卿	1500	迫炮一 门重机 3挺轻 机 21 挺
一大队长	李芳云	250	
二大队长	李贺彩	220	
三大队长	刘 恒	200	
四大队长	王毓文	200	
五大队长	张从立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各级社会部 机构设置人员配备的通知

(1946年5月16日)

各地委、市委、县委：

一、关于冀鲁豫区各级党委社会部的组织问题，根据工作的需要，并照顾目前各地配备干部的困难，暂作如下的规定：

(一)区党委社会部于正副部长之下，暂设下列三科，每科设科长一人，副科长或干事一人，各科之职掌如下。

第一科为情报科，管理外线打入工作，从敌人内部，了解其政治动态及其在我区的活动情况，以达到主动的打击敌人，其主要工作是：

- ①情报干部及利用人员的使用管理。
- ②情报材料之研究处理。
- ③情报交通联络及情报工作活动费之掌握。

第二科为保卫科，管理机关保卫工作，及时的调查研究可疑分子的材料，以保证我党内外各部门组织之纯洁与巩固，其主要工作是：

- ①在各机关单位建立保卫组织，领导其工作。
- ②建立嫌疑分子的档案，经常收集材料，进行研究。
- ③社会侦察工作之管理研究。
- ④侦察制度之制定掌握，与侦察工作活动费之掌握。

第三科为研究指导科，其任务是经常的研究反奸政策，指示工

作,总结经验,教育干部等,主要工作是:

①反奸政策及上级党委保卫机关工作指示之研究传达。

②下级党委有关保卫工作的报告及典型材料,进行研究并提出指导意见。

③定期的总结工作,研究政策的执行情形,进行干部的与群众的锄奸教育。

④治安工作及治安法令之研究。

⑤其它不属于一、二两科的经常工作。

(二)地委社会部设部长一人,必要时得设副部长一人,下设干事二人,一人管理情报工作,一人管理保卫工作及研究指导工作。

(三)市委社会部设部长一人,必要时设副部长一人,相当地委的市(如济宁),于正副部长之下,设干事二人,分掌情报、保卫及研究指导工作,相当县委的市(如菏泽、濮阳、道口等),暂与县同。

(四)县委社会部设部长一人,必要时设副部长一人,下设干事一人,襄助部长进行各项日常工作。

(五)区分委设保卫委员一人,专门领导村支部的保卫干事进行工作,村支部的保卫干事主要任务为收集附近的社会情报,群众呼声及谣言等,并对一定的嫌疑分子进行侦察调查工作(但须依照权限的规定)。

(六)机关支部设保卫委员,在机关首长及支部领导下进行本单位的机关保卫工作,在工作上受当地社会部的指导,建立一定的联系,并可发展保卫员(保卫员系根据需要而设,并不是普遍的设上一套,关于保卫员的详细规定,今后另行印发)。如机关的人数过多,可经当地直属的上级党委批准成立机关保卫委员会,由行政首长、支书、组委、保委及负责干部工作之人员等组成之。

二、领导关系及权限。

(一)社会部是党委领导下的一个部门,它统一领导党政军民中的保卫工作,但具体工作,须依托具体部门来进行。

(二)党委社会部对同级政府的公安局是党内的领导关系,但重要决议应经过政府党组讨论,保证其执行,并在政府合法化。

(三)党委社会部对同级军事部门的保卫部(科)是工作上的以及政策方针上的指导关系。

(四)公安局、保卫部均应随时向党委反映情况,报告工作,对公安局、保卫部的一切工作,党委社会部均有督促检查之责任。

(五)关于打入工作的权限问题,规定各级党政机关或同志均有随时向党贡献可用的社会关系及收罗人材之责任,但派遣的权限,应严格规定,只有主观打入工作的部门(如社会部、公安局、保卫部)始可派遣,凡派往顽区进行打入者,需经地委书记或分区政治部主任之批准,凡在内地进行打入者,须经县委书记或分区政治部之批准,为了某一工作的方便,上级机关亦可依照上述手续委托县级以下的机关进行之。在特殊的情况下,来不及事先呈报地委批准时县委得负责先行派遣,然后再呈报地委核准。

(六)关于侦察、逮捕、看押及审讯等权限问题,总起来说,应该符合“保护好人惩罚坏人”原则,不应过严,亦不应过滥。但在目前大胆放手发动群众中,暂不作具体规定,以免群众的活动过分的受到限制。

上述各级社会部的组织,是建立这一工作最低限度的组织机构,望各地委、市委、县委于接此通行后,迅速配备适当干部,建立起来,开始工作,并且于6月底前将社会干部名单及简历送区党委社会部。

冀鲁豫五地委关于贯彻开展 群众性的对敌政治攻势的指示

(1946年9月23日)

一、目前状况

(一)一种作法是没有发展自己力量,打通干部群众思想,以支部群众为主体去争取瓦解,只是干部去干,到处宣传宽大,到处承认错误,有的甚至承认过去斗争全错了,把过去斗争的东西全部倒回去,不敢肯定过去对地富减租减息、查黑地、平分土地斗争的正确与有理。分工不明确,领导武装逛大圈,不下去作支部工作,发现敌人小股活动不积极清剿与调查,形成敌人到处拉牛架户,群众恐慌资敌,不敢向我反映意见。干部宽大,不解决群众问题,支部民兵埋怨“敌人占优势时,咱们人被杀、房被烧、孩子老婆没吃穿,咱有力量时宽大、反正天下是人家的。”敌人说“八路宽大不杀,夜里抓户当兵吃喝,家里又能得东西,混几天再说吧!”对悔过者不管罪过大小,回来就好,地主认为,我们把他斗走的,现又请他回来,倒地倒粮,群众向他低头请酒。

认为宽大是手腕,现在宽大以后再说。支部工作是个别接头,而不是恢复组织。内容停在评过去的功过上,没有贯彻宽大精神的具体内容,敌我不分,与敌见面称好。对已拉上关系的,满足现状,不敢斗争,不了解敌人甚至敌人有几股,内部成份,为啥投敌,都不了解。老土顽与小队长因都作了些恶,把他划在宽大圈子以外,这

些〔人〕认为宽大不着他，感到无出路也不敢回来。

(二)一种是清剿土顽建立我秩序，深入教育干部去争取瓦解。深入的宣传宽大政策，在行动中执行了宽大政策，结合实际研究政策，特别是对敌有具体仇恨的干部，从工作历史上及党的政策上检查，使其了解到党的政策合乎多数人的长远利益，放弃个人的报复思想。在支部党员里，传达宽大政策而无具体研究，对敌人的偷产拉牛，按群众要求进行了看家联防，缩小了敌人活动范围，了解敌的活动情况及根据地隐蔽小股的情报，对悔过的地主伪军，对面揭发他的错误，让他守法，向苦主认错，地主则不敢非法活动。又利用各种可以运用的力量，用秘密悔过方法侦察敌人，对协从分子给以宽大，对伪属是体贴其困难与当伪军打死不值得，然后利用伪属叫子回家使敌人内部动摇瓦解。

二、左右摇摆原因

(一)地委在领导观念上过于夸大支部党员的右倾，轻视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认为政治攻势，只能是上层的争取，对依靠支部党员群众瓦解敌人没有强调，同时不了解大城市被打后，敌人势在加强特务政策，分散到乡村到我内地潜伏。对清剿没有强调，这一点后来纠正了，敌人回来不自首，强调采用等其觉悟与动员办法，而没有认识敌人悔过自新是被迫的，放松了对敌人实行压力。

(二)多数干部是盲目的接受宽大政策，认为上级叫干的就干；片面的从右的保险立功接受政策。

(三)对支部党员民兵村干没有动员起来，大多数就没有动员。认为宽大政策是上级办的，自己摸不着底，特别是敌占优势区，支部党员更怕敌人，对宽大只是听说“兴了”，摸不着头绪。

三、把政治攻势变成为群众运动

首先把宽大政策由干部贯彻到农村支部党员中去，政策对群

众的长远利益与目前利益密切的结合着。对敌人特别是土顽的宽大，农村党员群众非常关心，处理不适当，就会脱离群众。认为宽大政策只是干部的事，群众党员不敢说话；认为支部全垮了，不用经过他，都是不对的。有党员有群众作基础才有力量，因此宽大政策要通过党，经过支部及群众来实行，要划清界限，认识宽大政策也是为了农民，认为不对地主伪军立即报复就是对不起农民，就不是为群众，是不对的。要从思想上解决个人利益要服从党的阶级的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要从过去执行政策的成效作检查，结合实际研究政策，思想不通者要继续打通。

二是要明确宽大政策的目的是为提高团结，壮大自己，瓦解敌人。自己不能发展，瓦解敌人成绩不会巩固，无论土杂顽政策已取得战绩与否，现在各县工作重点都要放在整理内部，加强支部等各种组织，依靠这个力量团结群众进行争取。在边沿区只要打开场子，要立即开展下层工作，这样才能开展工作，控制敌伪关系。单纯依靠关系过日子，是上层路线，是错误的。对支部先普遍的恢复各村党的小组（好党员），逐渐达到全部恢复，内容是评功过、评气节、贯彻宽大政策，具体讨论敌人罪大罪小，肯定斗争的正确，找出错误缺点。以此划清敌我界线，提高觉悟，加强政策观念，哪些对，哪些不对。悔过自新的地主、伪军、伪组织人员，要先向苦主低头悔过，苦主谅解，然后到政府正式悔过。要大胆的揭露悔过分子的错误，树立真理正气，使他在群众中孤立，肯定不许报复，不许倒算，不许作破坏活动，悔过分子实行这些条件，如生活无法维持给以安置，不向群众低头，进行倒算的，按新区老区半老区政策给以批评斗争，坚决保卫农民利益，坚决执行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原则。

三是进行清剿，组织联防，解决群众当前的要求与具体利益。群众反拉牛，反架户，反资敌，是迫切要求，愿意组织联防看家，只有群众起来，土顽无出路，才能更好争取瓦解。菏泽组织联防看家

以后,缩小了敌人活动范围,使××乡镇被迫与我通信,表明再不拉牛抓户,卖枪后远走高飞,不再作坏事,就是很好证明。相反的例子如考城一区,因我不能清剿土顽,土顽仍能在根据地抓户,群众情绪不安,土顽动摇的也不敢悔过;有的回来后,又回到敌人那里去了。这些地区首先应当加强清剿斗争,如果短期内我不能控制的地区,可采取让土顽秘密悔过办法与我建立关系,送情报,帮助我们□材料,便利我清剿。

四,是广泛的深入宣传宽大政策,具体分析敌人,端正政策。政攻是攻心,我不但要了解敌人的装备,更主要的是了解敌人的心,是啥成份、如何投敌的?是否我们政策上有毛病,现在有何顾虑,现在思想如何?敌人内部有何矛盾?属何系统?针对敌人具体情况,提出具体口号。地主伪顽回来悔过,首先要严肃指出他的错误。如我们政策有毛病,也可以承认。如果有的地方过去反持有毛病,造成许多敌人,这些人投敌回来低头悔过以后,也可以去掉特务帽子。

五,加强一元化领导,把□面的工作有计划有步骤的组织起来,分别急缓轻重,集中大力完成中心工作(政治攻势)。如在根据地内进行清剿、支持联防,按情报宣传宽大政策,直接服务于这一工作。党务工作干部全力恢复支部,按情报配合清剿。麦征清理优抚救济,可根据情形由财政部门或政府部门完成。

六、9月底结束政治攻势,转入正常工作。10月3号前,各县把政治攻势总结好,布置今后工作,于5号前送地委会,以便总结政攻布置冬季工作。

冀鲁豫四地委四分区 关于情报工作的指示

(1947年4月1日)

一、爱国自卫战争现已在我分区展开,并有几个城镇已先后为我军收复与解放,但是我们不要为胜利而冲昏头脑,使思想陷入和平圈内。必须认识目前战局继续拉锯一个时期仍有可能,我分区必须首先从长期游击战争作准备。

二、自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以来,我分区各级党委、各级指挥部对情报工作是相当不够的,致使情况不能及时,特别是对他们的领导关心不够,对情报关系的介绍与帮助交通的建立,也是相当差的,甚至站上负责同志三番五次去求指挥部主要负责同志指示工作,还有你推我、我推你不负责的现象。

三、由于情况来源不多和情况不能及时传递,使我们对敌斗争上增加了困难,过去一段的痛苦各地均深深感到。因此地委与分区重新敲起警钟,唤起各县、工指挥部及党委应特别重视这一工作。

四、工作要求:

(1)凡在敌人活动到的区域内,能在家存在,意志坚定,胆大而有活动能力的党员、进步群众,希直接介绍给各县情报站,并且使他在群众翻身运动中不要出头露面(分果实还是要分给),以求长期隐蔽。

(2)已建立好的地下交通与情报关系,为了长期打算,应速抓紧时间进行隐蔽教育,以便此地变质后继续工作。

(3)凡发现与了解和顽军内部有密切关系者(如顽军、顽政权

人员之家属亲友),可介绍与告知各县及分区情报部门,共同商讨对策,以便开展工作。

(4)各县区指挥部负责同志应加强与大胆对站的领导,不论过去成绩大小都应积极帮助,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之一。

(5)各级情报站负责同志应主动向各县区负责同志取得密切联系。

(6)组织不健全的县,应速抽调干部建立与健全其组织,求得有专人负责。

外线工作^①

刘晏春

(1947年8月)

一、在领导上对自己干部要大胆放手

在过去思想上束手束脚，没有对自己的干部大胆放手，这是个思想问题，必须解决。中央局指示0.5%能起作用就行，我们再不大胆放手，就是不对的。

大胆放手，就是大胆的向敌人内部进攻，放手使用一切力量，不使工作受到限制，普遍的打入敌人组织（首脑机关更好），长期埋伏在里面，要生根，不作组织和宣传工作，就是搞他的情报。

由于过去神秘化，孤立主义作祟，有些工作不大胆，同时领导上组织上也沒注意这个工作，叫谁做谁也不愿做，因之对此工作都不注意，又神秘化，且不放手，以致今天工作搞不开，长此以往，我们的工作计划就要再告落空。因此必须重视这个工作，克服过去神秘化的作风，在用人上花钱上都要放手。不怕犯错误，困难是可克服的。而且只要我们看得远，看得大，有信心做下去，对关系抓得紧，工作是会开展的。

不论在使用人员、物力、财力、争取、派遣，地区都不要受限制，只要能打进去，不管时期长短，能用什么人，就用什么人，能打入到哪里，就打入到哪里。能拉就拉，能派就派，不要限制一定干什么，今天不起作用，以后起作用也可以。

^① 这是冀鲁豫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刘晏春在地委社会部长和公安局长联席会议上的总结第4部分。

我们最高要求能派能力强的，有社会经验政治坚定的，但这是不容易的。党委能抽多少，就是多少。尽量经过党委物色，有多少人就用多少人。另外要看作这是大家的事情，都可以物色，只要大家注意就好搞。能找到一些人后，所谓打通思想是主要的。

二、关于力量的使用上大体有两种：基本力量与外围力量

这两种力量结合得好，就可把这个工作搞起来。首先搞几个站，负责组织领导，派遣工作，搜集情报，整理材料。这些人员一定要找政治坚定的。

其次站对外围使用力量有三种：一是同情分子，一是投机分子，一是敌人内部争取的。对同情的，着重政治提高，使他们长期为我使用。对投机的，因他是两面派，我们要使用他好的一面，批评与控制他落后的一面，同时也要教育提高。对敌人内部人员，用一切力量争取，开始使他被动的为我工作，以后能慢慢的主动为我工作，主要是派遣敌人内部去工作，还有一种自愿与我们工作，但他有他的立场，我们也要用，长期地把握他，使用他，与他斗知〔智〕斗点子，只是我们要在长期使用中考验警惕他，不要上他的当。

对以上这些人的使用上，抱“人尽其才”的方针，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们尽可能了解他，分配他工作。

我们使用人，凡在群众发动起来控制的，一律不用。特别是地主，这里还有他的特殊性和策略性，与群众商量，如果以毒攻毒作出成绩大，我们可以灵活，但一般不使用。

三、工作方法

甲、在敌人内部活动的方式，一定要取得公开合法，越能利用合法，越能取得信用，一般的说要拿反动面目出现。

乙、在敌人地区活动要装啥像啥，以群众面目出现。知识分子做小学教员，参加他的外围组织，也可以得到东西，不管用什么方

式,先要站住脚跟。

丙、在外部进行广泛的调查找对象,间接的找材料,活动时可以从一切组织,就是能起个桥梁作用,我们也可以找。

打入内里的干部与外边的干部,一定要规定好联络点,以免失掉联系,找的办法,等的办法都可以,并要准备培养一批交通干部。

四、几个具体问题的处理

甲、派遣党员党籍管理问题,地委是批准备案,生活管理归社会部(这里内线人员设的站例外),以后关系问题,社会部可以证明。

乙、作外线工作使用的人员,多少都有些毛病,这样与工作有矛盾,我们还要有斗争,但我们要首先明确立场和策略,了解到慢慢提高。有的能工作不能提高,我们则要策略些,当然策略要服从立场。我们不能怕麻烦,在地方上出了问题,可以用会议的方式解决,解决不了的经党委解决。一般派出人员,预先还是不说,发生问题再说,最好只要党委知道,由党委去处理,以免暴露关系。

根据过去的经验对〔要〕大胆放手,大家有关系都找,这样局面就能打开。传达县区都可以,不要限制,但我们对敌斗争的组织不要讲。

对派遣关系只要有头,可以叫他先用。以后再报告请求批准,精神主要放宽些。

丙、解决几个零星问题:

①有的地区杀敌人的逃亡战士和俘虏,在原则上说是不对的(还乡团不算俘虏),湖西放走了一个俘虏,就拐了12个人带枪过来。

②杀人权仍放在县委批准,为的怕杀着自己人。不要拿杀人多少评定是非,杀人要尽可能及时出示布告,结合土改自卫战争给群众撑腰,镇压坏蛋反动地主,有几个地方杀人了草,不出布告,是不

对的。甚至于党的领导机关盘查住嫌疑分子，不送政府公安局，以及问题未弄清楚活埋人更是不对的。

③对敌人要不要争取瓦解呢？仍是需要。特别对敌人部队武装方面。对整个工作来说，没有矛盾；会使革命工作进行的更顺利。情况常是变化的。我们要灵活，要把策略与立场区别开来。例如他要组织的假农会和各色（各）样的团体，这些团体都当地主团体来说。里边人的反动性，也有轻重大小的不同，一般都可争取瓦解的。争取前掌握要将他将功折罪，使他由怕我们走向怕群众，为群众立功，向群众赎罪。不然，争取瓦解后，群众不原谅，甚至要打死，我们要不要批准呢？这是立场问题，当然要答复群众。目前进行土改复查，对地主不争取。

冀鲁豫八地委社会部 对外线工作几个意见

(1947年9月3日)

半年来外线工作是有成绩的,但由于使用关系上观点不明确,缺乏严密的分析研究,有很多事情吃了人家的亏,上了人家的当。如××一关系就带有敌人任务,被敌利用。工作上缺乏主动而是被动等待,再加上领导上对这一工作不够重视,因此,总的方面外线工作开展不大,根据以上情况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一、外线工作任务:

1、以了解目前特情为主,结合内地侦察了解敌人潜伏我区的特务及敌人如何派遣特务对我打入、刺杀、爆炸,各种计划,我们应作长期打算,必须认识阶级不被彻底消灭,敌人特务工作仍然存在的,即使我们军事胜利以后,敌人特务工作并非随之而消灭,相反,会更加加强。

2、对关系根据不同的对象与对我忠实程度,布置一定的具体工作,象爆炸、带款、认俘虏等,甚至收买一种重要文件都可,要达到要得少办得到,而且确实,就是成绩,但必须有高度阶级警惕性,掌握我不受损失。

二、什么叫内线工作

以往对内外线没分开,因此对关系领导没方向,不明确,对内

外线认识必须明确,才能对关系适当使用与实行正确领导。

1)内线:打入敌机要部门或高级机关的叫内线。内线干部原则上不准发展组织与领导工作,一定是单线领导,斗争经验丰富者例外,但必须经上级批准。

2)外线:在敌区不在高级机关而有一般工作岗位或一定职务掩护的叫外线。外线干部可以发展,但必须经组织允许。接受这一任务在发展时要慎重注意政治条件的成熟。

三、外线工作原则

大胆使用,心里有底,站稳立场,使群众不受损失。就是说,要有明确的阶级性。对一个关系是派遣或打入,首先要慎重分析该关系的本质对我忠实程度如何,能完成什么任务,对我可能有哪些不利和损失,然后再决定对他的使用与如何领导。

四、外线人员与关系的纪律

1)不准向群众或其他人暴露秘密,倘若给无关紧要的人员暴露秘密,会间接的告诉给敌人,致使整个工作垮台,造成对革命的罪恶。

2)不准利用政府办对群众不利的事及威胁群众。

3)不准在内部发生横的关系。否则,一旦被敌破获,整个工作即行垮台。因此,对不遵守纪律的必须给以严厉处分。

4)不准利用政府行私舞弊,发现后,予一定制裁,根据不同情况批评教育等。

5)不准欺骗我们,忠实敌人,应付我们;否则,发觉后予一定制裁。

6)布置任务定期完成,因情报与有些材料是有时间性的,一过时间,整个材料便失其所有作用,甚至造成对我不应有的损失。

五、今后意见

在大胆使用,心里有底的原则下,广泛大量使用。

1)广泛使用,重点培养骨干。首先开始了解能使用的人有多少,再了解什么对象布置何种任务,当中有重点有计划的培养骨干。

2)加强分析研究,分析材料的来源与材料的可靠性,对关系使用一定防止单线使用,有其它方面的材料对照,找出材料的矛盾与真伪地方,用情况教育关系,藉此控制关系与我靠拢,再逐步使关系政治上提高一步完全为我。

3)目前形势对我极端有利,敌人内部极端紊乱,部分士气低落无斗志,对蒋丧失信心,动摇犹豫,大部地主返乡(其中有带任务的),而我们军事上节节胜利,准备成立联合政府。在此情况下,应大力进行争取瓦解工作,在争取瓦解工作中建立关系,但阶级警觉性要高。以上希各县研究执行,并将执行情形报告地委社会部。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 城工部情报处与社会部合并的决定

(1947年9月10日)^①

为适应反攻形势的发展,要求我们集中力量统一对敌,以加强对外工作的领导。决定各级城工部、军队战略情报机关(军区情报处及各分区战略情报派遣工作)与社会部合并。合并原则是原各部门干部不减少不调动,原来工作一般不变更,适当加强配备,合并后统称社会部,由社会部统一领导进行工作。

兹将合并后的编制、经费供给、领导关系等问题决定如下:

(一)区党委城工部军区情报处与社会部已合并,组织及干部配备另有通知。

(二)三地委原城工部长李廉德同志任社会部长。四地委社会部除原任正副部长外,增设副部长一人,由原地委城工部副部长耿增泽同志充任。一、六、八地委根据以上原则及具体情况合并。

(三)确定徐州、开封为工作重点,三、四地委均设立办事处,五、七地委设站统一进行各该区对外工作,办事处设主任副主任,下设城工、国军、军情、特情四科,站设站长副站长,下设城工、情报等股。

(四)办事处或站的编制供给和经费:

①办事处及站的编制。办事处以不超过35人、站以不超过20

^① 原文未具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人为限,是所组织及牲口车子的数目由地委规定,设电台的办事处及站的人数另外增加。

各办事处及站的科股,在领导上即行统一。为保守工作秘密,便利工作,生活单位及住地可根据目前工作确定,可不住在一起。

②供给。办事处或站的经常供给由地委负责。

③经费。由地委社会、城工、情报各部门今年活动费预算内统一开支,各办事处或站如有不足由区党委社会部酌予补助。

(五)领导关系问题:

办事处或站归地委社会部领导,除其主要负责干部区党委社会部得提出意见外,其余业务干部(如科长、科员、股长等)均由地委社会部依上述原则适当配备,并根据工作开展加强与充实。

办事处或站在政治上、组织上及工作上均由地委领导,但同时,要在上级党委的意图及上级业务部门的指示下进行工作,在军事情报上遇有紧急重要情报时可直接送区党委社会部,至于有关各该地区之情报即可就地报告分区。

关于七地委外线工作的发言^①

万晓塘

(1947年10月25日)

七地委城市工作的组织,从建立到现在,是在比较动荡的环境下得到今天的效果,还是有成绩的。这个成绩的来源,除了我们外线工作同志的努力外,主要还是七地委党的力量。

今天检查我们的工作,从关系上来看,数量虽还不多;从工作上来看,却配合了当地的斗争,打下了摊子,取得了经验。因此做好工作还是有条件的,问题是有些东西还不够明确。因此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以供研究。

一、今后工作的方向问题

七地委的重点是××,根据目前形势来看,思想上仍应长期打算,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成熟。

所谈×××部失望厌战情绪不大,可能是两个原因:一是我们对该部的打击不够,或者是我们了解这方面材料较少。敌人经过我们一年多来的打击,加上目前的反攻形势,敌人内部普遍的发展着消极悲观厌战失望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对国民党不满的人更为加多,甚至连过(去)反对我们的人,为了当前的利益和将来的出路,也不得不来应付我们,这说明敌人内部我们活动的空隙更大了。不了解敌人就难提出恰当的方针,在大举反攻的形势继续发展下,敌人内部悲观失望的情绪会更上升,这是我们一切办法政策的

^① 本文原载冀鲁豫区党委社会部1947年第2期《城工通讯》,万晓塘任冀鲁豫行署公安局长。

出发点,一切文章就在这样做。

我们要抓紧有利时机进行工作,具体方针是要在形势的不断发展中提出,因此外线工作,领导上主要是经常研究敌人内部的情况,抓紧趋利避害的心理,钻敌人的空子,掌握敌人的弱点,利用敌人的矛盾,发挥我们的一切有利条件,进行我们的各种工作和斗争,根据我们目前了解的情况,我们的方针应该是:

大量发展关系,放手发动群众力量,来配合当前的斗争。

在这个方针下,对我们有利的一切关系,都可大量使用,关于具体工作问题尚可分开来谈:

××的重点在于群众运动。由于过去长期的公开和秘密工作的基础,及我们党的政治影响,是可以作出一定成绩来的,只要我们有正确的领导,有适合群众当前斗争的方针,群众是可以起来的。群众对敌人有一定的顾虑,但也有一定的斗争经验和条件,因此我们应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发动起,不管商业的,工人的,摊派负担的,救济的,个人的,集体的,我们都应加以组织领导。开始我们不必过分强调政治斗争,如回教斗争是以宗教名义出现的,敌人没办法,这样把政治斗争隐蔽到日常生活斗争里面去,敌人要镇压,就更会激起群众的反对。过去这些斗争带有很大的自发性,我们还没进一步掌握和提高。应在群众的实际斗争中,整顿过去的工作基础,寻找带领群众的积极分子发展党。关于发展党的条件,第一,能够带领群众的自然领袖。第二,成份比较好的。合乎这两个条件就可以了。然后进一步根据群众要求和允许的条件下,把斗争提高——从个别到有组织,从小到大,从日常生活到反暴政。

长期埋伏的精神仍应强调提出,一般群众领袖和积极分子,不让做临时性的情报,应确定给那些积极分子一个方向,让他长期了解一定的东西,定期做汇报,不要进行频繁的联系,尽量少暴露。一般党员要与情报工作严格分开,党的支部、小组也要按性质分开。根据这个方向把组织进行整顿,在一定期间放手让他们自(己)去

搞,少给他们精神上及时间上的负担。

关于学校工作应是建立关系,了解情况,主要对象应当是原来学校里那班学生。市民、小职员、商人的子弟,逃亡地主子弟的学生一般不是我们的对象,必要时可叫出来几个训练几天,回去作为骨干。对学生工作的要求,宣传反攻形势,指出中国的前途和他自己的出路,灌输些我党政策,将来我们去了,不至跑掉,争取为人民服务,另外这些人作情报工作也是个方向。

上层情况如参议会等,能掌握到经常了解一些情况,知道那些人坏,在我一定的威胁教育下,坏的不敢很坏。制造他们内部的矛盾,便利我们发动群众,使他们不解,将来我们进去不(才)好召开群众会斗争、审判他。稍好点的,能给群众做点好事,搞点情报。总之,对这些人不能幻想过高,能做一点啥即叫他做点啥,教育他要为群众立功,即要减少自己一点罪。

情报工作,从任务上来看,有两个方面:一是配合全面斗争的战略情报,一是结合当时当地斗争的情报。从××本身来说,也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联系全面斗争及附近地区斗争的,如了解敌人的特务活动,军事行动,工作中心,施政方针等;另一种是本市斗争情报,如群众的生活情况,敌人的内部组织,各种设施与城防,敌人的暴政,群众的斗争等。

战略情报即:①政治动向,如最近敌人的党团统一,刷洗内部,以及在我攻势下内部的情绪,官兵关系,内部矛盾,总动员令在××的具体执行如何?也就是说在其一定时间的方针下,他的具体设施和每个人的表现。②战略方针,即大的军事动态,对我斗争的军事重点,及一部分可以配合当时斗争的如清剿计划、扫荡计划等。至于一些固定的组织、固定的人员,与当前斗争结合不大的,了解是比较长期的,一定时间总结一下。③大的军事调动,部队编制特点,斗争力,主要人事调动等。

国军工作,应以×××为主,××D城防部队为次,目前重点

要放在地方性及守备的部队上。具体进行，一个是要派干部去掌握，一个是要从内部去培养，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和重点应是中下层，如果没有中下层的基础，即便拉过来部队易〔亦〕难巩固。为了便于活动，发展关系，要在一定的领导机关。因此重点是连队，同时向营团旅的官佐发展，如参谋、副官、侍从、收发、机要人员等，在工作上不管拉的关系怎么样，能干到啥就干到啥，干一点就鼓励他。从他的情况出发，要了解在敌人内部工作困难。今天不起作用，有一天会起作用即好。不能起义，战场消极，杀两个敌人，鼓动交枪，送个情报也好。为什么这样要求呢？因为这样使用的关系就广了。我们过去老规定什么条件，什么要求，结果还是找不着人，一个是找到即乱吹一顿，因为不吹就不合咱的条件和要求，结果还要咱们一顿。当然我们不放弃提高，更不是迁就，而是从实际出发。

除打入掌握搞情况起义的方针外，另一方针即是瓦解破坏，各地调查一些伪属，城工部门研究下贯彻到各个地区，进行对敌人的破坏，如仓库、铁路、桥梁等。由于斗争形势的变化，国民党任何一个武装，都带有明确的阶级性，都是支持地主镇压农民的，特别是地方武装，逃亡地主、还乡团人员往往占领导地位，同时这些武装必须坏，不坏敌人就不要他，因此对我们斗争特别突出，群众对他也特别仇恨，我们对这些部队的方针，主要是分化瓦解打击，内外配合，打击最坏的，动摇瓦解分化一般的及其下层，在坚决斗争下，掌握一部分我们不能消灭的，给以情报，掩护工作，少违〔危〕害群众等任务，但（在）我有力量（之条件）下，即（行予以）打击分化瓦解消灭。对县区伪武装一般不搞两面派，×县×区掌握的伪武装，是种特殊情况，同时对党的政治影响，群众利益，也有不少损失，而且也有一定的危险性，在对敌斗争上，有特别意义。需要掌握的两面派武装，一般要外线领导，避免直接与我们发生关系，防止群众不好影响。

城市及市郊的武装小组活动，城市与乡村工作的结合问题，根

据当地敌人统治情况,敌我斗争形势来采取。

二、力量使用问题

用人的主要对象,应以基本群众为主,即成份属于基本群众范围的,政治上同情我们的,并对这些人要在政治上加强教育改造,活动能力上提高。这批人解决问题慢,解决问题小,过去我们往往不愿用这批人,不注意掌握培养这批人,但这批人确是可靠力量。

其次才是利用的一切关系,过去我们主要是用的这些人,因此在这些人身上犯的毛病也多;下边主要谈一下对这些人的使用。

我们开展对外工作的基本条件是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利用敌人的弱点,其他条件是补充这个条件的不足。很多人给我们做事,基本上是看到蒋介石不行了,想开个后门来解决他当前的问题和将来的出路;因此我们就掌握他想依靠我们的一面为我们工作,利用发挥他与敌人有矛盾的一面进攻敌人。但这些人也有不可靠的一面,需要我警惕的一面,即在敌人一定的优势威胁利诱下,他也会依靠敌人破坏我们的,我们必须分别对待,严加警惕。有的思想反对我们,反对不了的暂时应付我们,只要与我们有利,应付一下也好。

有些人过去对群众造下些罪恶。今天愿将功折罪,我们即允许他为人民立功,但在政治上必须压倒他们,做一件好事给他立上一功,折一条罪恶,使他了解这是他应当干的,不然将来人民不会饶恕他。对这些人不能鼓励太多,鼓励多了他即觉得对咱有功了,忘了他过去的罪,和你要这要那,工作是为你做的,而不是他应该做的了。

对一般的关系,过去没有错误或错误小的,是不断进行政治教育,时事教育,在其工作的努力下,给以各方的帮助,号召为人民立功,将来新中国有他一份。

我们正确使用这些人,首先即在了解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给

我们干事？能干什么？是给我们干还是搞我们的鬼？我们没有这个情况的“底”，即没有了解敌友，没有了立场和策略，这一点不仅是为了当前工作需要了解，就是为了将来改造也需要了解。

我们有些同志太老实，人家一给我们做点事，我们就唯恐对不起人家，不了解这是个对敌斗争，我们可搞敌人，敌人也可搞我们，我们往往是在人家给我们做了一定的成绩后，就失掉了警惕性，区别不出敌友。

在敌区的工作人员及关系主要应依靠他的职业来维持他的生活，我们予以必要的扶助，我们不能在敌区养大批的人。同时有些人的生活太高，我们也养不起，当然我们不是怕花钱，而是如何花的更适当，特别在今后有利的形势下，我们的钱可以发挥到更多人的身上，因此对这些人的工作，不要求过高，要以他本身条件能做啥为主，如果没有十分必要，不变动他的位置。在选择关系上应以当前的斗争为主，不应把现在能起作用的关系，调到渺茫准备将来的地区去，利用关系配合当前斗争是主要的，长期埋伏是有条件的，因为情况变化是很快的，将来还有将来的新的关系。另外对这类人的教育，不要光拿咱的东西来进行，应拿他的东西（他需要的）来教育他，从他的当前的要求思想实际出发。如×上层分子对我们同志说：“你们是为群众服务，国民党是为升官发财，我是为谁呢？”其实他给咱们工作，一个是怕群众杀他（斗争对象），一个是对国民党胜利没信心，咱们就应教育他，你只有为人民立了功，群众才能宽大你，你才有出路。有些关系教育要结合斗争批评，对忠实敌人欺骗我们的坏分子，坚决镇压，以教育别人，这就是教育要贯彻叫他们认识利害，并从怕我们逐渐引导他怕群众，你给我们工作可折过去的罪，但你危害群众，将来群众会审判你。过去我们很多敌军关系，一面给我们做点工作，一面又镇压群众，引起群众不满，形成了我们与群（众）的矛盾。

对地痞流氓，我们要少直接掌握，要间接掌握，多用他们作些

破坏敌人的事,打入要速打,不要打入区队县队里去,以防他与群众对立,不好处理。

三、组织领导问题

(前略)

外线领导的责任,在于研究情况,掌握政策,利用矛盾,所以外线领导必须经常研究每一具体情况的变化,不仅领导上几个人研究,更重要的是与自己领导的干部研究我们每一斗争。号召是否完全适应群众的要求?是否从具体环境出发?应该怎样办,办的又怎样等等,以不失时机的进行工作。

冀鲁豫七地委汶上县对敌斗争报告

(1948年5月15日)

一、汶上对敌武装斗争很好，县区队民兵都具有高度的对敌斗争情绪，加强了边沿活动灵活机动打击敌人，近来凡是敌人出扰都吃了败仗回去。以四区为例，一月之内与敌人作战大小10次。由于武装斗争较好，在城西北、北、东三方面，敌人仅在15里路以内的范围内活动。我们不断的去城附近活动，城周围村子，仅有13村我们未去过。全县共500来村，目前我们占优势的计150个村，敌人占优势的200个村，余为敌我争夺村庄。

二、对敌政治攻势与争取瓦解工作收效不小。经过我们宣传政策，特别是经过××庄与徐村战斗的释放俘虏与随捉随即教育释放的结果，引起敌人内部很大的变化。以往对我们是绝对的对立，顽抗到底，当我们宣传政策转变时，他们是怀疑的，其中较坏或顽固的则宣传：“这是八路军的手腕，要一网打尽我们……”但当我们实际执行了宽大政策，俘虏切实被释放了，回来的土顽与逃亡地主也被宽大了，未受什么处分，就引起其内部的议论纷纷：“八路变了”，“有出路了，不杀就行。”在最近徐村战斗时，有的敌军即自动的缴枪，并说若不是您上次放俘虏的话，这次还不敢缴枪。甚至过去说“这是八路军的手腕”的人，现今也有的改变了口吻说：“我们是不得已，今后看……。”总之，经过执行宽大政策的结果（宣传、释俘、具体争取等工作），敌人内部思想很紊乱，他们对国民党失望，知道国民党的前途不行。对敌人的失去人心表示悲观。敌主力与地方矛盾很多，对五军也希望，也失望，希望为他们撑腰，失望是撑

不上腰。

按汶上争取还乡团看来，第一批回来的是逃亡地主及以往被逼逃亡的村干；第二批则为罪过不大的伪保长与保丁，或伪队中之职员；第三批是派家属回来与我们接头。现接头的人不少，各种人物都有，谍报人员、策反队员都有接头者。据说，伪金乡县长的家属也送回家来了。

这工作较好的方面，是有初步的群众性（目前还有限度），可见各村村干部都进行这一工作。对回来的土顽、伪组织人员有的还能加以必要的控制（是区村组织的控制），但这个宽大政策也受到受危害的群众的反对。他们说，我们宽大的无边（这与我们的严宽未分明有关）。

这个争取瓦解工作，现需进一步提高，由专人管理，对每个要紧的人物作具体的分析研究，规定具体的对策，使之更有效的向前开展（这点已向汶上提出）。

三、敌占区群众大都经过倒粮倒地，并经敌人的过重的负担，现贫农多无饭吃，有的军属听说我们救济贷粮，有不少不远数十里而来要求救济。敌区一般是贫农无饭吃，保长地主生活好。现在汶上已向二三区开辟，采取夜间插入活动。首先，依靠亲属了解情况，摧毁敌人的村级组织；锄去敌之情报人员，除秘密的依靠亲属了解情况，进行有计划的摧毁（捉捕）外，并在随捉随放中建立敌伪关系来开展工作。目前这样作的还有效果。

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即拟向敌区地主要公粮，要出的粮食一部分机关部队吃用，一部分救济敌区贫农，以利工作之开辟（这问题尚未明确肯定起来）。

四、汶上五区是中心区，是老区，也较稳定。他们也以救灾为中心工作。缺乏明确的工作方向，是兴啥干啥，没有从具体情况出发的明确的工作方向。这问题已按我们的一般区工作精神提示了。

冀鲁豫区党委

关于“蒋方逃兵招待所”组织工作条例

(1948年6月23日)

为蒋匪正规军杂顽还乡团等武装,其下属官兵,多系强征或被骗之基本群众,不甘心为蒋贼卖命,厌战思乡情绪高涨,加以我军节节胜利,与在我党对敌之宽大政策影响下,其士气更加低落,相继逃跑投诚我军者日益增多(如最近四、六分区逃来我解放区者,即近万人之众),因之今后为了配合我军胜利攻势,贯彻我之宽大政策,大量的瓦解敌顽,有计划的扩大敌顽逃亡之缺口起见,特决定我区边沿县及必要路口(特别是敌顽杂众多的地区与逃亡中心路口)普遍建立“蒋方逃亡官兵招待所”,并颁布组织工作条例如下:

第一,组织领导和制度

一、蒋方逃亡官兵招待所,设所长工作员各一人,县招待所长由县委会敌工部长兼任,区招待所长,由区分委敌工委委员兼任,负责领导所内一切工作之计划执行与总结,而工作员应住所内,处理经常工作。

二、招待所由县、区党委直接领导,县区党委应重视招待所工作,经常进行讨论和检查,地委敌工部,则应加强对各级招待所之指导。

三、制度:招待所应切实建立登记制度、教育制度(保证每月经招待所的人都要给予宣传教育)、月报制度。(收容与处理统计和账

目报销)。

第二,工作,“蒋方逃亡官兵招待所”是专门进行对蒋方逃亡官兵(包括蒋匪正规军,土杂顽、还乡团伪组织党政人员),招待、审查、登记、宣传教育,处理迁送的机关,具体规定如下:

一、招待:对于敌方逃亡及投诚人员,无论官兵,一旦脱离敌顽逃来或经过解放区者,一律予以热诚欢迎招待食宿,并适当帮助解决其困难,不得当做俘虏或犯人看待,但亦须提高警惕,注意保守军政秘密,不要让其各地乱窜,或随便与外人来往。

二、迁送登记,要耐心详细,态度谦和,不许审问逼供。

三、宣传教育,主要对他们进行宣传解释胜利形势、我之宽大政策、土改政策、工商业政策、对蒋方逃亡官兵政策等,这是招待所最中心的工作,应抓紧进行。另外,招待所应购买必要的图书,按月订人民日报及冀鲁豫日报各一份并收集书籍一部,供逃亡人员阅读。

四、处理:

甲、原则,绝对不允许强迫参军,愿回蒋管区的发给路费,给以良好的影响,送其出境。并通知过路村庄群众,给予适当照顾,使其感恩戴德,出去为我宣传。愿回蒋军者,告以瓦解敌人方法,再来者欢迎,立功者受奖,进行对敌轮番瓦解。家在解放区愿回家者,可介绍其回家分地。家在蒋管区不回家的,可设法给予安置,介绍工作或学习,或继续进行瓦解敌顽工作。如发现可疑分子,给以必要的揭发释放。

乙、措施:为了求得慎重进行处理遣送,规定凡敌顽之士兵及下级人员,可由区招待所直接处理;而携械来归者,或排级区级以上人员,成批或集体投诚来归者,以及重大嫌疑分子,可送交县以上招待所,或敌工部统一处理。

第三，供给问题。

一、招待所不另设伙食单位(必要时可设)可依托县、区政府或大集镇镇公所等机关。招待所工作人员按党委编制内人员供给。

二、逃兵投诚人员之待遇，应执行第二类之供给制度，每人每日食米一斤十两，菜金米一斤二两，柴三斤五两，而携械来归或集体投诚之有功人员，遣送时每人增加会餐费猪肉一斤。

三、遣送路费：在解放区内，每人每日(每日按六十里计算)发给米票三斤。出解放区者，每人每日发小米五斤(可按市价折合蒋币)但不得超过三天。

四、携械者，按携械来归奖励办法给奖，而该武器弹药，各县区不得随便动用，必须按数量交军区供给部以便转报大军区。

五、办公灯油费按每月收容数报销，临时医药等费实报实销。以上费用均统一由分区供给处报销。

第四，本条例自公布日起实施，如有不适当之处，可酌情加以修改或增添，但必须经区党委批准。

冀鲁豫区党委 关于加强敌军工作的指示

(1948年7月)^①

自卫战争以来,我区经常是大战场,边沿区、游击区很大,敌军工作处于对敌斗争的重要地位。在两年的自卫战争中,在敌军工作上收到了不少成绩,如我们收到与处理了两万多俘虏,经教育改造、其中6000多解放战士参加我军,1000多下级军官留我区工作,释放回去的,在宣传我党政策与瓦解敌人上起了很大作用(如某师三个释放的战士在战场鼓动一排投诚)。在我党政策宣传教育及工作的影响下,有三五六团的起义,直接配合了战争,在政治上给了敌人很大打击。另外还有丁树本一个中队的起义;刘汝明特务营一个连的拖枪投诚等。在各地不断的政治攻势与瓦解工作中,促成敌军的逃亡和小股零星的拖枪来归的数目也不少。

但是从整个敌军工作上来检查,我们是存在严重的缺点和错误。首先在政策上犯了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表现在我们乱杀俘虏,如一分区石横杀俘虏,五分区东明杀俘虏,四分区乱杀俘虏、乱斗、乱扣押,或驱逐伪属等(严重者如四分区),这是相当普遍严重的。这种政策错误的结果,在客观上是帮助敌人巩固扩大了部队,增加了敌人的顽强性。又加土改中乱斗乱杀的错误更扩大了敌人的基础,孤立了我们自己,形成了许多地区严重的赤白对立,加深了群众的灾难,增加了我们对敌斗争的困难。其次在敌军工作领

^① 原文未具时间,此系编者判定。

导上,长期方针不明确,领导不统一(部队与地方),力量分散,许多地区的敌军工作实际陷于零乱或取消的状态。以上这些错误的形成,主要由于我们领导思想上存在着单纯军事观点与小资产阶级的报复情绪,缺乏政策思想,没有很好研究执行中央政策,不了解敌军工作对消灭敌人的战略意义。

根据中央及中央局敌工会议的精神,军区政治部曾召开了敌军工作会议,检讨过去敌军工作。为正确贯彻执行中央政策,纠正过去敌军工作上的缺点与错误,特再作以下指示:

(一)在边沿区及游击区,各级党委及部队党委,必须将敌工会议精神,少奇同志报告及此次指示,结合当地实际情况,首先从领导上进行检查、研究、端正政策,定出具体方案,然后在干部中进行传达教育,具体布置执行,其中最重要的是纠正政策上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因此在军队、地方必须普遍进行俘虏政策及土顽还乡团、伪顽家属、逃亡地主等政策教育。在教育时应结合具体情况,以执行错误政策的恶果,自上而下的打通思想,规定纪律,保证中央政策的正确执行。并有计划的、有组织的、有对象的组织党员、干部、广大群众,去广泛的进行争取瓦解敌人,建立工作关系。党的敌工部门的任务,即在于掌握政策,组织向敌人进攻,纠正党委不领导,不推动组织,只由几个敌工干部去作的现象。

(二)加强俘虏工作,要使所有干部重视俘虏工作,这是目前敌军工作的重要部分。基本方针是解消敌对和缓矛盾的方针。严格执行对俘虏的宽大政策及重申战场纪律,不论蒋匪正规军、土杂顽、还乡团,及国民党之党政伪组织人员政工特工等(除少数罪大恶极外),凡在战场上放下武器者,均一律当俘虏看待,采取宽大争取、教育改造释放的方针。坚决克服对俘虏报复、乱杀、虐待、侮辱、搜腰包等违反政策的现象,并肃清对俘虏嫌麻烦累赘,土顽俘虏不优待的思想,严禁把俘虏当犯人看待,与犯人一起拘押,违反者应予以纪律制裁,并追究领导责任。对部队、群众、民兵、公安部门及一

切干部；应反复进行说服教育，每次战斗前后作动员与总结检查，并须结合功模运动，提倡展开捉俘虏与执行政策竞赛；成为评功立功重要条件之一。现对俘虏与反正人员的处理权限与办法具体规定如下：

1、对俘虏军官、党政伪组织人员的处理：①凡蒋正规军土杂顽军之尉级以上的军官，和国民党党政伪组织人员中之区级以上（或相当于区级以上）之人员，以及机械医务等专门技术人材，一律送军区敌工部处理。有重伤恶疾或临时有使用价值之人员，经地委或分区首长批准可以释放，并报军区。而营级以上重要人员，须先经军区批准后，才能使用释放。②一般俘官眷属，可予以教育发给路费，当即释放。而高级俘虏眷属，及有特殊使用价值之眷属，可同俘官一并送军区处理之。③凡罪大恶极为当地群众所痛恨之反动俘官（包括党政伪组织人员），或重大案犯应坚决镇压者，除战斗情况外，必须经区党委批准（营或县以上的必须经区党委），交县政府公审枪决，不得随便交县区村或群众处理。而确有证据有使用价值之特务分子，或特务头子，则须送军区后转归区党委社会部统一处理。

2、对于俘虏士兵及党政伪组织下层人员等的处理，零星或整批的俘虏，一律送分区旅政统一处理，各团队及地方党政机关和个人不得处理或补入部队。须经分政处俘机关审查登记后，分别处理。

一般土杂顽、还乡团、国民党之党政人员及伪组织人员，其中老弱残废、伤病员、兵痞、流氓、土匪、地富分子等，应酌情清洗，在“不空放一个人，人人有用”的原则下，经教育优待后，授予简单自愿接受力所能及的任务释放。成份良好身体健全之青壮年，分区和旅政可集中起来建立解放大队，进行一个短时期（两周至三周）的审查教育，发动参军，然后有计划的补入部队。在零星处俘中亦须坚持以上原则分批教育，分别处理。

3、对小股反正投诚者，须调至内地短期整训，采取热忱欢迎奖励（论功给奖），与坚决编散改造的方针，不得保存原来势力和建制，干部发零用费五万元，分别功绩、品质、表现与作用，分配适当工作，或送住学，或派遣、或遣送回家。士兵中兵痞流氓成份，一律清洗，家在解放区者，介绍回家分地，在蒋管区者发路费送走，成份好的争取参军编入基干团队，营以上反正投诚者，应报军区处理。

（三）土顽问题：在我区数目及危害均很大，应成为分区敌军工作重点或主要对象；对土顽（包括还乡团）除了坚决执行少奇同志对土顽的分析认识政策方针外，更应结合端正政策检查过去具体错误，及对群众的危害，领导教育干部群众坚决端正政策。通过支部或农会教育和发动群众，动员顽伪还乡团家属，进行教子劝夫回家，开展对土顽还乡团广泛群众性的瓦解运动，要使干部和群众都懂得能瓦解一个人回来，就消灭了一个敌人，就是胜利，就是成绩，回来的要向政府登记悔过，向群众低头。然后很好安置和教育，不得歧视。但进行中必须走群众路线，克服单纯的行政任务观点，或者一回来就认为百事大吉，不闻不问现象。经过群众的动员争取，群众的审查安置，就能启发群众的积极性和责任心，自觉负责的给以教育和监督（不是控制），这样才会使群众满意，归来者安心。

为能有计划、有组织、有对象、有力量地开展对土顽还乡团争取瓦解运动，各级领导必须对本地的顽杂及其家属注意调查研究，具体的布置进行，同时要注意检查克服和防止偏向，如有的地区已经发生的只是几个干部动，不积极发动群众去作，或只对带枪的抓得紧，没带枪的就不感兴趣的偏向。

在土顽武装中，发展与建立关系，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但目的是为了瓦解消灭土顽，不能只停留在上层，或只满足于朋友关系上（开辟中上层更便于争取瓦解下层，孤立打击首要分子，上层与下层要很好的结合），应积极策动其为我工作，瓦解破坏敌人，有可能反正或带队投诚者，或起里应外合作用者，应抓紧时机进行工

作,待机促其实现。原有关系应进行一次清理,分配专人掌握。

(四)开展全面对敌政治攻势,为贯彻执行敌军政策,结合目前我军胜利形势,大量瓦解蒋顽军,应不断根据形势的发展与具体情况变化,宣传我党政策,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争取群众,瓦解蒋顽军及伪组织,孤立敌人,扩大我对敌斗争基础。决定在自卫战争两周年(八、九两月)全区大规模的开展对敌政治攻势(另有指示),你们应先作下列准备及具体工作:

1、对敌区及敌人内部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以便针对敌人情况,制定我们政治攻势的具体方针,并将你们了解的情况及时报告区党委及军区政治部。

2、在各接敌区县区及必要的地区建立“蒋方逃亡官兵招待所”(招待所组织工作条例另发),管理蒋军逃亡投诚官兵,招待、登记、审查及进行宣传教育、处理、遣送等工作,其所需食费路费,均按俘虏供给标准由分区供给处报销。

3、携械来归者不论集体或个人,均按规定给奖,由分区供给处报销,枪械妥为保存上缴,不得随便没收或少给奖金,或打埋伏。其他招待证未列入规定的武器弹药及军用器材均按一般价格四分之一发给奖金。

4、对投诚或逃亡人员的处理,应本自愿原则,绝不允许强迫其参军,愿回蒋管区的,发给路费,给以良好影响;送其出境,使其感恩戴德,出去为我宣传。愿回蒋军者,告以瓦解敌人方法,再来者欢迎,立功者给奖,进行对敌轮番瓦解。家在解放区愿回家的,可设法予以安置,介绍工作或学习,或继续进行瓦解敌顽工作。总之,应着重宣传教育,并给以良好影响与适当照顾为宜,但亦应随时加以警惕,防止敌人的反间活动。

(五)加强党委一元化的领导,建立与加强敌工组织:1、区党委与边沿接敌区地委县委,设立敌工部,区党委地委敌工部,即军区分区敌工部敌工科,由区党委地委委员任部长,原军区分区敌工部

长、科长条件适合者任副部长,成为双重领导关系(政策由党委领导,经常工作归政治部领导),区党委敌工部设政攻、俘管、联络三科,每科干事二人,及俘虏收容所一、教导队一、地委敌工部及分区敌工科设正副科长各一人,干事二人,及三至五人的工作组,必要时可设收容所或招待所,边沿区县设敌工部长一(县委委员)、干事二,负责政策、教育、组织群众性的政治攻势,并管理经常工作,区分委设敌工委员一。

前并入社会部之城工部,国军工作关系和干部,全部移交敌工部。

各级党委要认真经常研究与建立敌工部门工作,党委讨论有关对敌斗争的会议,应吸收敌工部参加,并经常听取汇报,布置工作,防止自流及随便分配敌工部作其他打杂工作的现象。

2、部队:独立旅设敌工科长一、干事二,团设股长一,干事一,分区基干团、县大队、独立营各设敌工干事一。

3、干部问题:各级党委(包括部队)统一配备解决,要下决心,舍得下本钱,争取在七月份配备齐全,具体方案是:

①尽可能从地方与部队各部门,选调过去之敌工干部,或选调适合于作敌军工作的干部。

②抽调好的班排连与区村干部,小学教员,中学生,由敌工干部开办训练班进行培养。

③部队注意连队士兵委员会敌工委员人选与培养,并在工作上经常给以指导,在七月内集中分区旅敌工科进行一次短期训练。

4、分区用最大力量在七月内建立二至三个坚强的武装工作队,须从部队与地方选调班、排、连与区村级干部充任队员,有游击战经验与政治坚强能掌握政策的营、县一级干部任队长和政委,配备良好装备提高待遇(第一类供给制度),使成为开展政治攻势与开辟敌后工作的伟大突击力量,开展政治斗争,反对单纯的军事活动与只当游击队使用。

武工队的领导,属于分区,由敌工部门负责掌握,到下面活动则由县委统一领导,武工队政委可参加有关对敌斗争之县委会议,在一定时期必须集中分区,进行短期的休整,与检查总结工作。

5、蒋方逃亡官兵招待所,县委敌工部长与分委敌工委员兼任招待所长(组织工作条例另发)。

希即具体讨论执行,并将执行情形、工作经验随时报告我们。

冀鲁豫区党委社会部 对目前城市工作的指示

(1948年7月13日)

一、目前正处在全国革命高潮与我们胜利大进军的阶段，城市群众与蒋匪内部，在我们宽大政策与军事胜利的影响下，已起了重大变化。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方面群众觉悟水平提高，认识到蒋匪败局已定，对其残酷的黑暗统治极表不满，各城市中群众性的自发斗争，正在日益发展；另一方面是相信我军胜利，欢迎我党政策，盼望我军早日解放他们。蒋介石在其军事崩溃、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对人民的统治摧残则更加毒辣。征丁、抓伕、拆房、抢粮，苛捐杂税，敲诈勒索，限价封锁，特务横行，乱捕暗杀，已使工商业倒闭，生产停滞，物价飞涨，广大市民群众痛感生命财产无保障，严重的失业，生活无出路。即使蒋匪的政府职员也普遍忧虑着生活困难，担心失业，感到前途暗淡。到处蔓延着市民抗丁抗捐（开封解放前市民发动了“塌保运动”），学生示威，商号关门歇业，职员准备便衣，知识分子投奔我解放区等自发的斗争行动。在我此次解放开封时，这种情况更加明显，由于我们正确政策的执行，给了各阶层很好的影响，群众对蒋匪烧毁民房、滥肆轰炸，无不切齿痛恨，甚而连蒋匪的职员官佐亦满口咒骂。我军进城后，群众纷纷向我控诉蒋匪罪行。河大学生未等战斗结束，即动员教授要求随我军来解放区，高呼拥护我

党我军口号，唱进步歌曲；商人市民盛赞我军作战英勇，纪律严明，保护工商业政策，商店当时即开市营业，要求实行冀钞。我们提出的口号是除战犯刘茂恩一人严行法办外，对不持枪抵抗的国民党所属各级政府官员、警察、经济文化机关一切职员，一律不加俘虏或逮捕，并欢迎安心供职，协助我军维持全城秩序，保护一切物资文件，向政府登记，听候我军处理。我们的宽大已出乎他们意料之外，都在感恩戴德，特别是中下层职员，过去对我们的盲目成见，一扫而光，后悔没有及早与我建立关系；愿回头向〔从〕善的特务分子，也了解我们的宽大不杀，而怨恨自己的历史，恐怕我们不信任他。上层分子也有愿为我们工作，对我宽大政策不摸底，虽经我军释放了蒋省府秘书长马凌甫、教育厅长王海涵等高级职员，但他们仍有疑惧，不敢出头露面。以上这是目前城市情况的基本特点，说明城市群众人心向我，也是我们开展城市工作的基本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应在这种空前的有利形势下，抓紧一切时机，大力开展工作。

二、今后工作方针与任务

说明形势，讲明政策，指明出路，就是我们目前的方针与任务。自中央颁布了土地法大纲与提出了端正政策后，对城市群众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我军解放开封后，正确执行了政策，照顾了各阶层利益，团结与教育了广大群众，认识了自己的出路，造成瓦解敌人、团结群众、争取胜利的基本条件，因此我们今后方针就是团结一切力量，反对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执行这一方针，必须善于和当前群众的切身利益、具体要求、日常生活与斗争结合起来，为各个被压迫阶层找出其个人出路。

在这广大阶层中，对我党政策感觉最灵敏，接受最快的是工人、苦力、贫苦市民、学生、知识分子，以及蒋政府的中小职员，这部分人应当成为我们的工作重点。

根据形势的发展,今后各个城市都有随时被解放的可能,今后的工作不仅是长期埋伏的问题,而且要做好收复城市的准备工作与周密的调查研究工作,这两种工作都是极端需要的,必须在组织上做具体的布置。一个城市的全面情况的调查研究,必须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具体时间各个城市工作部门应根据内部工作基础、干部条件,作具体规定后报告上来),因为我们一方面要配合城市的解放,搜索敌人的军用物资,与清查首要分子;另一方面,在收复前要防止敌人的破坏,收复后必须保存党的隐蔽力量,使党员要充分了解目前形势,不仅有暂时的拉锯形势,而且将来我们在城市建设中,还必须有一定时期的秘密工作来配合我当地政府肃清蒋匪残余,并向其潜伏力量做斗争。

在我区收复城市的情况下,应做两种估计:一种是收复后,我们短时间的占领,仍有拉锯的可能;一种是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后,主动撤出(如开封),待机收复,这样必须预先确定,在收复后,公开一两个党员或干部来配合我攻城部队司政机关工作,如果不公开一两个党员或干部,容易使全部组织秘密受到影响。例如我解放开封后,一部分党员对拉锯形势估计不足,盲目乐观,满不在乎;忙于与我部队接头活动;一部分党员兴奋的不自觉的、有意无意的暴露了面目,忘记了隐蔽自己;一部分上层关系,由于平日缺乏教育,怕当战犯被捕或被俘,有的在群众面前暴露了自己的面目;有的职业化的干部,直接找到我解放军司政机关公开接洽。结果,部队撤离,自己也不能存在,造成了敌人重占后,工作困难。我们应当很好的接受这一教训,须经常教育党员,要有长期打算的思想,非经组织允许一律不得公开或暴露自己。同时要注意,必须克服平时的单纯隐蔽不敢领导群众斗争,战时不能积极配合军事行动的右倾情绪。

三、斗争策略问题

党必须经常站在群众前面领导群众斗争,必须与群众同甘苦

共患难,但也反对拼命主义,不应把全部力量使用到一个斗争上去,以免遭受全部破坏,这是对敌斗争使用力量上必须注意的一点。另外在领导斗争中,必须善于掌握和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有效的使用一切可能使用的力量,但必须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不要被人家利用了,形成了参加国民党的某一派打击国民党的另一派,替人家当打手。这种情况,往往由于我们在思想上过分相信甚至依靠了国民党某一派,划不清界限,思想不加警惕,结果我们也往往遭受损失。另外是要警惕在斗争中某些愿意替人民说几句话的上层人物,他们是能够团结使用的,他们的号召力比较大,运用他们出头露面可以减少群众的损失,但这些人有很大的妥协性,斗争愈激烈他们动摇妥协性就愈大,对这些人一面肯定的要用,一面又要十分警惕他们中途妥协与出卖群众利益,对这些人拥护与控制要结合起来。

四、领导问题

过去我们提出来广泛的打入,而事实的经验告诉我们,广泛打入是不行的,一则容易遭受破坏,二则职业困难,供给困难,从实际工作效果来看,从根据地内出去一个人远不如在城市中发展一个人作用大,尤其是下层,因此我们再次提出今后的打入工作主要是解决领导问题,也就是强调骨干打入,数量不要多,要能够掌握党的政策。其次必须加强交通联系工作,不然长期联系不上,或联系不够,将会失去指导工作的效能,交通工作主要是添置交通干部和建立交通线。重要指示及工作情况报告,必须靠干部交通口头传达,一般情况的报告,可用书面联系,这样在敌人严密封锁检查的情况下可减少损失。

在教育问题上,城市工作干部常常感到缺乏材料,派出的领导同志更是如此。这虽有一部分道理,但主要还是我们对教材认识上有毛病,没把党的政策当成城工干部重要教材之一,不善于总结工

作,使用生动实际的斗争例子教育群众,指导群众,而单纯追求空头理论。今后我们特别强调加强城工干部的政策教育,总结工作,找出典型,去教育与提高群众觉悟,在斗争中锻炼我们的党员干部。同时必须提出秘密工作纪律,教育我们的党员,使之懂得积极活动改造环境、时时刻刻与群众联系是隐蔽化装的最好办法,离开了群众单纯隐蔽,必然会遭到失败与受到不应有的损失。

过去我们发展党员存在着两种偏向,一是工作面窄,不了解我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表现在工人苦力、贫苦市民中党的力量很薄弱,更没有把大部分学生、自由职业者和一部分中小职员很好的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但在发展党时须注意其政治面貌)。另外一种是单纯保守隐蔽,不注意发展党,不敢从斗争中去选拔积极分子与自然领袖,并且对发展起来的党,我们在领导上不经常不及时。党员本身的政治觉悟不高,存在着严重的个人成份,因此未能随时结合群众当前利益进行斗争。我们支部的建立不是按照职业部门或街道建立的,而是根据原来的私人关系,不管是工人、学生、商贩都凑合在一起,他们不能有共同的要求,也很难有共同的行动与目的。今天城市党的特点,在群众中没有发挥了组织领导作用,只起宣传鼓动作用,今后为发展与巩固我党的力量,一定把上下层工作分开,分头领导,工作上配合,使上层工作更好的掩护下层工作的活动,真正以苦力工人、贫苦市民为核心的去联合广大学生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及一切反蒋反美的同情人士,建立更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群众组织,要在短小精干的党的组织领导下去进行斗争,坚持斗争,取得胜利,配合一切有利的形势,争取全国各大城市的早日解放。

冀鲁豫区党委社会部通知

(1948年7月27日)^①

为配合8、9两月份开展大规模的政治攻势，各地、县应认真研究区党委关于开展全面政治攻势的指示，根据各地情况，有重点、有计划、有步骤的彻底执行，并注意以下几个具体问题：

一、在深入调查中，应随时注意伪军组织、伪属的动向和对我政策认识的转变，以及他们和蒋匪关系的变化和他们的要求等，加强和敌工部门联系，及时反映情况，以利确定对策。

二、特别注意建立隐蔽的点线关系，对已经争取成功或已回来的人员，应警惕他们乘隙破坏。

三、区党委对敌斗争委员会为交流情况，准备不定期的出《敌工通报》，希搜集各种典型经验和教训、成绩及收获等，作出总结，及时报告。

^① 原文未具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冀鲁豫四地委社会部给各县社会部通知

(1948年8月9日)^①

各县社会部：

根据各县报告，最近处理敌伪归来人员已获得不少成绩，发动了广大群众使大批敌伪归来人员转向守法生产，安定了社会秩序，但在执行政策上宽严分明不够。一般是不论罪恶大小，普遍的“训”了一次，对罪恶重大者多未予适当惩办，尤其是对抵抗悔过继续破坏者缉捕法办做的不够。为贯彻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政策精神，将再提出以下几点：

一、对抗不悔过继续进行破坏活动的重要匪首，如延浚边之康生田，浚县之阎德照，封丘之丁××、×××，原阳之姜本玉、杨绍恩、×××等，各县应指定专人专责从事这一工作，建立专门情报，结合地方武装或公安队；务求迅速缉捕归案，从严法办。

二、在集训敌伪归来人员中，对罪恶重大之分子应按照罪恶之大小，予以适当法办，如因影响一般敌伪人员而不宜于马上处理者，但亦不能马上释放，可分别送军区之军官收容所（住延津城集训敌伪排长以上军官）或地之社劳动感化院（判处一年以下徒刑或不宜判刑亦不宜马上释放者）或大监狱（判处一年以上徒刑者）改造教育。

三、现在羁押之罪大恶极应处极刑的匪首，应结合司法科整理，□科办理司法手续，呈请上级政府。执行重要者如□□之马鸿

^① 原文未具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哲、延津之吴萃儒等,可一面积极办理手续,一面将材料整理报来地社,以请求区党委、行署电请华北人民政府争取早日处理(此种材料各地应于最近派专人送来)。

四、一般罪恶不大之敌伪人员,仍本过去指示之精神宽大处理并进行深入教育,万勿因此而引起波动,影响社会秩序不安。

以上各点务即研究布置执行并将执行情形报来地社为要。

冀鲁豫区党委前梯队

关于争取瓦解匪杂顽工作的指示

(1948年9月20日)^①

我们听了三、七分区关于敌工工作的检查汇报以后认为：7、8、9月份以来三、七分区对于开展对敌政治攻势是有很大成绩的。但由于政策精神贯彻不够，各级组织很不健全，故执行中仍有不少缺点。为进一步的展开对匪顽争取瓦解工作，并彻底肃清在我内地潜伏活动的匪杂顽，特就河南各分区情况作如下指示：

(一)目前匪杂顽活动一般特点

河南匪杂顽以三、七分区之沿湖地区及各分区之接合部(如钜荷路沿线)为重，一般具有下列特点：

(1)在历史上，地处边远，行政力量达不到。加以地形复杂，便于土匪出没，形成土匪根深蒂固，久未剿灭。

(2)土匪的后台基本是封建地主。土匪以地主为护符，地主以土匪为保镖，狼狈为奸，威吓统治人民，在军阀时代，他们是军阀的下层爪牙；在敌伪时代，他们是敌伪的合法走狗；在蒋匪时代，他们又是逃亡地主特务、土匪及杂顽的垃圾桶。在蒋匪当道时，他便是统治人民的匪军、匪政权；在蒋匪退出时，他又是三三五五的特务土匪。

^① 原文未具年代，此系编者判定。

(3)匪顽的组成一般是以反动地主、国民党特务及凶悍惯匪为骨干,威胁一部对我不满、对我不了解或吃饭无路的农民流氓为其羽翼,在情况对他不利时,胁从者一般是要求回家不干,但因匪顽镇压残酷造谣、威胁,使一般胁从份子不敢回家,回家不悔过,悔过不交枪,交枪交坏枪,情况一有变化,他又回到匪杂顽里去。

(4)匪杂顽潜伏地区的人民对匪杂顽是痛恨的,要求我们迅速剿灭。但因匪顽手段毒辣,消息灵通、现象众多、情况不定(怕变天),故均不敢正面提出意见。匪杂顽不能剿灭,群众就更不能发动。另一方面群众不敢抬头,匪杂顽则更难剿灭,这样更便利了匪杂顽活动。

(二)对匪杂顽争取瓦解的基本方针

根据以上情况,故决定对匪杂顽的争取瓦解以至消灭,基本是采取“长期的、群众性的以政治为主的”方针。

为什么说长期的?因为这些地区的匪杂顽是有长期历史的,他们生存既有其一定的历史条件,今天消灭他也不是一天半天的事情,必须有长期的、艰苦的斗争准备。有些同志采取急躁的、不耐心的办法是不对的。

为什么说群众性的?因为匪杂顽控制群众已久,他们本身就是这一带的人(包括地主、流氓、农民)。这一带的人都和他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即使恨他、反对他,也惧怕他,不敢检举他,他们是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我们光领导上着急还不能解决问题,必须掀起群众性的反匪顽运动才能收效。

为什么是以政治为主的?根据匪顽的历史性及群众性,所以只愿军事进剿,不能解决问题,必须以政治为主,深入了解匪顽情况,具体分析,分别对待,打击首要的、孤立太坏的,争取瓦解其中间层及动摇的,这样才能收到的效果更大。

(三)几个具体问题的解决

(1)首要份子问题——我们反对两个不正确的说法,即:第一,以一个小集团为单位,找出一个首要的,如陈德三股,陈是首要的,白连臣股,白是首要的,鉴济先股,鉴是首要的;二,以一个小的地区单位,找一个首要的,如县有县的首要,区有区的首要,村有村的首要,这样将使“首要”满眼皆是,打击的面太宽了,我们意见是以一个分区为单位,由地委统一考虑(或由县政府报地委批准)。谁是首要谁不是首要,确定了目标,打击与争取才有力量,其他任何单位,不能满口首要胡乱打击。

(2)匪杂顽工作归谁做的问题——我们反对一个机械的划分法,即有的以为今天的匪杂顽已失掉领导,都被当作土匪看待,完全归公安局地方武装清剿就行;有的以为今天的土杂顽都有特务性,都要送保卫除奸部门处理;有的以为今天的匪杂顽实际都是顽军的县区部队或绥靖区等编制,应当作顽军看待,统归敌工部门处理。这些分法都不全面,匪杂顽实际上都是蒋匪的武装爪牙,失了联络就会临时成为土匪。其中可能有特务操纵,也有的组织本身全部带有特务性(如绥靖区),他们是一身而数任。必须在党委一元化领导下,各系统部门,密切配合起来开展攻势,以敌工部门进行争取,军事上予以搜剿打击,政权办理悔过安排手续,保卫部门侦查处理特务活动,武装部组织联防自卫,发动群众,双减诉苦等等,各种工作配合起来,匪杂顽才没有躲藏余地,否则,此剿彼伏,此宽彼严,匪顽利用我们的空隙,将永远清剿不了。

(3)释放匪杂顽(指俘来的)是否经过地方问题——我们反对两种片面的解释:即有的以为必须经过地方。因为部队对地方情况不了解,必须经过地方对释放人员才好安置;有的以为决不经过地方,因为少奇同志报告无经过地方释放之规定。而且匪顽说:“地方不宽大”,把他们交给地方,不是以朋友相待的道理。我们以为这些

理由都是片面的，此类匪杂顽的释放，原则上应当通过地方，因为他们不完全是顽军的性质，有些是属杀人犯、逃亡地主、多年惯匪、特务、特务嫌疑等等案件的。在处短时征询地方意见，释放时通过地方，这对于匪杂顽的处理稳定与管理上都有好处。如果说地方不宽大，那是政策思想问题，军队与地方的政策是一个，如果政策思想弄通了，军队地方都是一样的。但有些与地方关联不大的匪杂顽或某些区村政策思想尚未弄通，应尽量求得政策思想上的一致。军队地方都要掌握完整的政策，任何强调一面和片面性的东西都不允许的（释放决定权属县团以上机关）。

（4）贯彻政策思想问题——争取匪杂顽工作能否展开，主要看政策思想贯彻得怎样？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将少奇同志关于敌工工作的报告，区党委关于加强敌军工作，与展开政治攻势的指示，反覆研究，求得在领导思想上一致。然后再把这些思想逐级传达，逐级弄通，并在广大群众中、士兵中阐明我们的俘护政策，使政策为群众干部所认识、所掌握，然后才能有力的贯彻政策。如果领导上不钻研，不检查下面，了解情况，对于政策是不能贯彻的。

我们必须反对单纯索枪观点。有的地区对没枪的不感兴趣，对有枪可追的，即半夜赶上去捉住就追枪，追不出就吊打。济宁一区的某同志，就是追枪打人最利害的一个。有人说他“您这不是黑暗政府吗？”他说“就是黑暗政府”。用吊打的办法追出枪来，某些干部还说打得对。这种政策观点是极其模糊的，他只看到一支枪、两支枪，没有看到用宽大争取的办法，可以得到更多的枪。反之，你用这种办法乱搞，不光枪得不到，工作都要搞翻的，过去吃亏已不只一次了。

我们必须反对乱捉乱杀的办法。如在少奇同志报告传达之后，一个县公安局长可以自作主张枪决匪顽四人，昆山枪决负伤的还乡团员一人，南旺六区枪决俘匪一人，对于这些错误行动与思想，必须作严格清算。今后杀人必须经过区党委，领导上必须认真检查

纠正,不断的进行教育,决不能让这些无纪律、不要政府的现象继续发展。

我们必须坚决执行优待俘虏及招待匪顽士兵的规定,个别单位对于俘虏讽刺侮辱,不是以待朋友的热情而拿俘虏开玩笑,或则乱拿士兵的衣物银钱,或则对士兵不予招待,这都是不好的,都是违犯党的政策的,必须纠正。

(5)关于健全敌工组织问题——由于边沿(或某些内地)对匪顽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所以各级敌工组织必须按区党委指示配备起来,所有对匪杂顽斗争繁重的县区应建立敌工部,区委应设立敌工委员,县区敌工干部,即兼任县区招待所所长。在对匪杂顽斗争不太严重的县区,可由县委分委一人兼任敌工部长或委员,无匪杂顽地区,可以不设。

边沿必须建立蒋匪进兵招待所,组织与报销仍按区党委前发规定办法办理好进行招待工作,求得在这次战役中做出成绩。对于枪支提奖,暂规定步枪一支小米 150 斤,轻机一挺小米 250 斤,其他仍按前规定(等新规定下来时即改用新规定)。枪交到那一个系统,即由那一个系统发给枪价,依凭收据及枪支号码,统一向政府报销,枪支登记后留用。

以上各点望研究执行,并将所得经验随时报告为要。

水东地委开封支部地下工作始末^①

张方明

(1948年11月30日)

前 言

我做地下工作开始是1943年上半年,从水东分区(即睢杞太,亦即冀鲁豫十二分区)单线派出,直接属地委领导。在杞县西秘密活动,在开封、陈留、杞县各城市只作些情报工作,在杞县建立农村支部。以后确定农勤不作,进入开封(主要的)建立秘密党组织,直接属地委领导,一直到解放。

建立支部

一、当时的条件——日本鬼子后两年的统治更加毒辣,另一方面垮台现象也更加暴露在人民的面前。开封的人民,尤其是中上层正统观念非常浓厚。有些青年知识分子,上国民党区找出路(但我们也公开介绍这些人到解放区)。总之,认为国民党是正牌,对共产党认识较差。在这样的环境下我们的支部产生了。

二、发展的经过——在1944年我们是一个开封城市小组。到1945年党中央号召加强城市工作,分区成立城市部。对城市工作更加明确,对我们在城市的活动方式也有明确的指示,党员数目一天天的增加,就建立了支部。我担任支书,马忠先、李蔚人担任支委,作建立党的工作,介绍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去。

^① 这是开封第二次解放后张方明向中共开封特别市委写的报告材料。

在日本鬼子投降后，国民党来到了开封，闹的是乌烟瘴气，乱抢乱劫收。其一切反人民的行动，人民是尝到了，青年知识分子心灰意冷，对国民党有些失望了。因此我们教育青年团结，提高、培养他们对共产党的认识。我们拣条件已具备的青年，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对象吸收入党。我们为了打入河大，派支委李蔚人同志赴汉口上临时大学。三个月后他回来，河大不接收。这时支委增加了王运廷同志。各支委都直接领导了每个党员（单线），党员增加了。

在政协召开的前夕，尤其政协开会时，上海各地的进步书报杂志在开封一天天的增多，对青年的教育也起了些推动教育作用，使支部工作开展较为便利。于是，支部团结了青年进步分子，集股筹备开了小书店，名字叫“小开书店”，地址在新街口学校最多的地方。书报杂志均卖，还设有租书部。经过这个桥梁作团结教育知识分子的工作。这时活动的方式，相当大胆。对有些对象条件够了即吸收入党。

后来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环境一天天恶化，书店就关门了。又接到城市部的指示，应转变方式，每个支委与党员都职业化，能打入什么部门就打入什么部门。王运廷同志打入高等法院，李蔚人同志打入合作社训练班，分头负责工作，扩大党的影响。更注意秘密原则，发展党的组织，一切进步书报及党的文件有计划的隐藏起来。这时全支部进行了气节教育，即使遭受逮捕也应保持共产党员的气节，绝不能破坏他人，死了也是烈士。否则就是身败名裂，党是不原谅的。

194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更加猖狂，对人民的搜刮更加残暴，人民负担加重。学校特务也更加横行。于是以河大为首发生了“六二”学潮，“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提出了。以河大支委马忠先领导的河大党员动员起来，鼓动领导这个学生运动（其他各系统党的组织进步分子也一样参加领导），组织快报社及时传达消息。

但这个运动被特务分子破坏了，逮捕了许多学生。马忠先被逮捕后，由社会关系运动保释。学潮以后，开封特务更加明目张胆地迫害进步青年。因此，支部党员的活动更加秘密。强调了横的关系不准发生，不应知道的事情不必多问，每部门的党员应学习熟习自己的业务，在日常生活中更加锻炼自己，学习科学理论。

在开封第一次解放时，动员了学生上解放区，个别的撤退。国民党反动派又占领了开封，事先作了动员工作，应坚持自己的岗位，继续埋头斗争，把大批书籍运到解放区，个别同志的书籍烧掉，避免特务的搜查。这时培养的对象更加提高了认识，党组织还是发展的。

到这次解放前（即第二次），支部看出了国民党军队要放弃开封，机关学校等要东撤。就动员支部的党员留住，尽可能留住青年学生，尽可能拖延物资东运，保护器材。河大党的小组相互鼓励，拖延了500箱左右药品的东运。电话局的党员联系工友保存了一切器材与电话机。邮政局的党员团结了进步员工保持一切没被破坏，阻止了周股长等的携款潜逃。解放后两天内，通过王其梅同志派部队看守药品、电话器材不受损失。

三、中间没受到过波折。“六二”学潮时，支委马忠先被捕后保释。

四、支部党员的数目及分布情形——人数共24人，陆续撤退7人。首先是《中国时报》李有欣和四小教员张玖印的撤退；后安福麟打入时报又撤退；开封师范学生张进安、冀秉志的撤退；贾好同和河大王士杰的撤退。现有18个党员在开封市——张方明、马忠先、王运廷、李蔚人、王茂森、刘淑华（女）、陈孝萱、鲁延年、孟宪燧、李百龄、单春荣、段民乐、武永楨、王鹏凡、庞兰亭、张志远、葛永福、葛云中。

解放前的分布情形——马忠先领导河大，小组长鲁延年，党员庞兰亭、李百龄、单春荣。王运廷在伪高等法院，李蔚人为小学教

员,王茂森在邮政局,刘淑华为养正小学教员,陈孝萱为排字工人,孟宪燿在杞县临中教书,段民乐打入同乐乡当副乡长,武永祯打入伪保安司令部,王鹏凡在电话局,张志远开小诊所,葛永福、葛云中由郑州调回。

五、吸收党员的情形——采取个别的慎重的吸收,够了党员的条件,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党组织对他历史上清楚了解,经过自己写自传,经过个别关系转上来,支委开会讨论通过决定候补期。再通过个别关系谈话,宣布他是候补党员。候补期长短、秘密原则、交党费,告诉他以后不是一个普通的进步分子了,而是无产阶级的战士。

六、领导方式——采取支委分工领导,开支委会、小组会。或单线领导,不发生横的关系。支委会布置工作、单独传达文件、单独流通,看过交上来再发下去。党员若有什么意见,按个别发生关系人再提到支委会。一般的我们是采取支委集体开会、分工领导的。支委开会的地点,有的在支委的家庭,有的在禹王台,有的在龙亭湖边,有的到小饭馆的楼上。

七、与上级城市部的关系——联系在前几年较好,地委派有交通。以后交通被俘,变节,但他没破坏。以后都是我回去报告工作,听情况,接受指示回来布置工作。再就是支委李蔚人回解放区一次报告工作,但这时联系就差了。交通的人选不易,后找到人选就解放了。再就是经过进步青年送学生或进步人士到解放区。支部陆续介绍到解放区的青年知识分子有三四十人。

八、我的缺点。

①领导方式不够灵活,因此了解每个党员的思想意识是不够的,更谈不上领导他们过严肃活泼的组织生活了。

②对于知识分子党员们感觉有办法,对工人贫民则有点束手。认为教育培养他们,他们容易暴露秘密。因此有同工人贫民不敢谈、不敢吸收的现象。这是知识分子党员占多数的原因。这是知识

分子劣根性对工人贫民结合不来的思想问题。但以后由上级党指示,作下层工作,知识分子的路线停止。支部作了动员思想改造工作,但不深入,具体计划,每个党员按自己的环境关系,培养教育一个工贫对象,但做不久,开封这次解放了。

③支部对每个党员教育不够。真正从他的思想意识上进行具体的教育是不够的。就是文件的阅读,大家都看了,但检查了解程度如何,自己思想上是否提高了一步,是没有做的。

④计划性、总结性都不够。对全盘工作的计划,对党员生活意识上的改造,缺乏计划,更缺乏总结自己的与支部的经验。因此养成了老一套的作风。

⑤横的关系防止不够。我们的关系有一个时期混乱,与豫皖苏城市部个别关系掺搅着,与大军区情报处个别关系掺搅着,与豫皖苏情报处掺搅得更甚。五师从中原撤退后,掉队的同志经过个别关系,由我们送到解放区,后来更多了,成了一个秘密的介绍所了。于是撤退了某些个别同志到解放区。但横的关系还有不清的。

九、经验教训。

①吸收党员,绝对要经过了解培养提高,够了条件,经过自己写自传,表明自己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经过关系转上来支部,通过讨论,确定候补期、介绍人及入党日子。决定后,再转给关系与他谈话,告诉他从某日起,你已经是一个共产党员,不是一个普通的进步分子了,从×日起你的一切是新的一页,应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并加强气节教育,一切遵守秘密工作原则。以后应经常教育之。

②对党员的教育,应抓得紧,有全盘的计划。除进行实际的思想改造以外,文件的传阅应秘密阅看,检查读了以后对自己到底有什么帮助,起了哪些改造作用。文件的种类、数量,应有登记,毁灭时也要有登记。

③支部分工,应让每个党员在秘密活动下做调查研究工作(我

们做得很差),对自己的周围环境与所在单位,应做细致的调查,或分配党员对某个特殊专门调查,系统整理后,以供解放后参考。

④要走群众路线,锻练自己与群众结合,尤其是工贫群众。但对进步的知识分子也是不能放弃不管的。

⑤横的关系不发生,要严格执行。在某个党员身上掺搅的关系很多,应调开或介绍到解放区,防止一受到破坏即全部垮台。

⑥交通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使有些问题能很快的得到解决,对地下组织的帮助很大。我们这方面是吃了亏的,有些问题拖下去不能解决。

总之,地下活动的党员,应埋头苦干,反对英雄主义,加强自己的改造,与群众联系,以准备将要到来的局面。

冀鲁豫区党委关于 新形势下对敌军工作的指示

(1948年12月28日)^①

郑、汴、徐州等战略据点相继解放后，冀鲁豫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豫北新乡一带之残敌，已成为瓮中之鳖，内部极度恐慌动摇，而大部新收复区溃散之土杂顽伪，因失掉活动靠山，缴枪自首，插枪观望与潜伏活动者甚多。值此空前有利时机，我应积极配合军事围攻，大力开展对敌政治争取瓦解之工作，以期早日肃清我区内外残敌，稳定社会秩序，并迅速打通新郑段铁路交通，顺利支援前线，因此，特提以下几点工作，望各级党委切实研究执行。

一、四地委应即组织边沿区各县党政军民力量，主动参加十四纵所组织的对敌斗争委员会，统一行动，开展对新乡残敌封锁进攻，在工作上应将群众性的政治攻势与派遣打入工作密切结合起来进行。

1、针对敌顽内部的具体情况，运用各种方法，开展广泛的宣传战，宣传我伟大的胜利，豫北形势及我党城市、工商、土地，特别是宽大政策，晓以大义，动以利害，告以出路，发起广泛的规劝运动与救命运动。

2、通过伪顽家属亲朋叫子索夫，有计划有领导地大胆派出为我工作，策动起义投诚或配合战斗。

对敌顽下层进行群众性的大量瓦解，使其中上层将更加孤立分化。因此，不要等待，挖多少算多少，即便一枪一人也好。下层跑

^① 原文未具时间，此系编者判定。

的愈多,上层就更易争取,如长春曾泽生的起义,就是很好的范例。

二、三、五、七地委(四分区一部地区包括在内),应统一组织有关部门(敌工、社会、公安、武装等)结合军事、清剿,有计划地开展对新收复区内溃散隐蔽之土杂顽伪立即向当地民主政府缴枪自首,规定凡自动献枪自首者,予以物质奖励,并将功折罪,而隐匿武器不报潜伏活动,并继续为非作歹者,即予以武装解决,或发动群众检举,一经捕获,按情节轻重,予以处分,但要防止单纯索枪观点,或报复行为,不允许打骂、肉刑或罚款。

高度警惕国民党及不法分子隐蔽阴谋及反革命两面派政策,利用我合法名义,扩大武装,或钻入我部队内篡夺领导,待机复辟,继续危害群众,因此对于要求合法名义为我拉枪拉队伍的人,不论其动机怎样,一律不允许给予任何名义。新区扩兵应在慎重审查、个别吸收的方针下适当扩大,凡兵痞、流氓地富分子应一律洗刷。对集体要求参加我军者,应缴枪编散,不得按原建制编入我部队内。

蒋军官兵携枪来归(包括献枪自新者)优奖办法的规定:

凡现在仍有敌人存在的游击区(如新乡附近地区)与过去没有工作基础的新解放区(如三分区的沛铜及华山四分区的原武阳武地区等),为了继续扩大瓦解敌人的影响,对自动携械来归或献枪者,按华北军区通令规定数目发给奖金(附去通令一份),其他有些工作基础的新解放区,可按通令规定数目三分之一发给奖金。

形势飞跃发展,时不我待,敌顽愈动荡混乱,愈易于敌军工作的进行。各级党委及军政领导干部,应接受抗日时期的经验教训,克服取消观点,加强对这一工作的领导。另外号召敌工干部,应即放下不急之务,坚决肃清转业歇歇思想,继续努力,积极为最后歼灭当前的敌人而奋斗。

冀鲁豫四地委对起义投降 及溃散蒋伪土顽的态度和处理办法

(1949年11月29日)①

(一)情况

郑汴解放后,豫北残余蒋伪土顽内部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一月来,成股起义、投降或个别来归者约六百余人。蒋伪土顽中之大部中下级军官为后路计,带着不同的动机到处拉关系,有些是为生命、财产有保证;有些是带有野心不得已而暂时投降,或一面利用我方名义,一面进行破坏,甚至不愿接受整编条件,要求在××地区活动等。我们必须从本质上,从与各方面关系上去认识他,不要被花言巧语所麻痹。下级官佐及士兵伪组织人员,个别脱离蒋伪土顽者日甚,情况亦甚复杂。有些是有计划分散下来的,有成股插枪解散的,有个别回来进行破坏活动的,有不敢回家仍飘流亲朋家的,有了解我党政策而安心生产的。总之,蒋伪土顽来解放区后;不管成股与个别,不管有无野心,由于历史仇恨及社会制度的改变,生活习惯的不同,他们会有意无意的进行破坏活动,我们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对待,这将是较长时间必须解决的问题,否则会影响解放区的治安,使群众思想紊乱。特别是我区村干部及积极分子由于形势的转好,因新仇旧恨而激起的报复行为,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反动分子则利用这些空子,造成农民之间的屠杀,重新组织力

① 原文未具时间,此系编者判定。

量破坏解放区建设,必须引起高度注意。因此,我们的方针是坚决消灭蒋伪顽之反动武装,肃清公开或隐蔽的伪顽统治,逐渐建立革命秩序。在政策上,坚决贯彻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当前的作法(是)争取大部伪顽军、伪组织人员,向政府悔过登记,即从宽处理,检举分散其反动分子,坚决消灭成股的〔反动〕武装,根据各种不同情况,提出以下意见,希县委与团政治机关根据此精神处理。

(二)处理办法

1、县委敌工部及兵团政治部机关应利用一切关系,通告在我区活动之蒋伪土顽,停止作恶,立即投降起义,否则坚决消灭之。

2、自愿脱离蒋伪土顽,带领全部武装立功起义,志愿参加人民解放军者,保证生命财产安全,并根据现有人员听候整编。

3、在胜利形势及我大军压力下,对投降之个别或成股武装一律欢迎,亦保证生命财产安全,所有武装无条件投降听候处理。

4、对所有个别投降之尉官以上人员,一律送分区辖军官解放大队学习。自愿回家者,按蒋伪军招待办法处理,不再作非法活动。

5、所有起义投降之武装,应按指定地点听候整训,不准带枪带马自由行动,否则以违犯军纪论。

6、已经起义和投降之武装,不经分区许可,不许回村收容逃亡士兵。

7、对与我接头之蒋伪土顽,应先告以形势,指明出路,停止作恶,并说明我党之政策(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一面与我建立关系,一面利用我方名义继续作恶者,当即根据事实,写信给以警告,如不立即停止,则坚决消灭之;对其下层士兵,则大力进行争取瓦解工作。

8、对伪属应根据原家庭成份待遇,如伪属恃势作恶,有据者,应由政府依法处理。

9、对成股活动之蒋伪土顽，不管分开或隐蔽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者，坚决消灭之。

10、对个别溃散回家之蒋伪土顽，应号召其向政府登记悔过，安心生产。如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者，依法处理。

11、对溃散武装，应号召献枪或检举（奖励办法按前中央局规定执行），但溃散后隐匿不报或持枪作恶有据者，得根据情况分别处理之，但须经县委批准。

12、对新区村内公枪及私人枪支，应作组织群众保家自卫之用，不准强行索取，或捕人迫枪。

13、对在村隐蔽之蒋伪土顽、情报组织，应号召向政府自首，宽大处理。如继续破坏，侦察有据者，则分别处理之，但须经县委批准。

14、起义投降之蒋伪土顽 50 人以上者，一律送分区整训，50 人以下者交就近活动之一二团。经整训后无政治问题者，编入部队，有政治问题或不能随军活动，或有恶迹者送分〔区〕政〔治部〕处理。

15、对志愿起义投降之蒋土顽武装，一律由分政敌工科、分区办事处及各县敌工部、兵团之政治部接头，其他单位或个人，有关系后须介绍以上指定组织。但 50 人以上者必须经地委分区批准。

16、对清剿投降及献出之枪支子弹，一律登记号码分配情形，呈交分区敌工科。所提奖之粮食与缴获之枪支弹药、物资，月终送来，提奖之粮食由专署报销。

回忆资料

冀鲁豫敌军工作概况

李一非 黄友若

一、我军敌军工作的开始时期

抗战开始我军主力部队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在旅长徐海东、政委黄克诚及副旅长杨得志、主任崔田民的率领下，战斗在抗日战争的最前线。当时的所谓敌军工作，只是指对日军的工作，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对部队进行瓦解敌军的政策教育和教几句“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之类的日语喊话。部队在平型关战役后转移到晋察冀。于1938年春又回到晋东南参加粉碎敌九路围攻战役及尔后在晋东南的其他战斗。我们的工作是对敌军散发宣传品（日文）和战场日语喊话。由于当时日军正在大举进攻，气焰嚣张，工作未产生显著效果。其他部队的情况也大体相同。

1938年9月，杨得志、崔田民同志率领我军主力部队越过平汉线向东进军，消灭浚县一带伪军扈全禄部近万人，又北向安阳、汤阴一带，消灭皇协军李英及该地会匪万人以上。当时日军只据守在铁路沿线的主要据点（安阳、汤阴、新乡等地）。其他大片国土为日军指挥下的伪军及依附日军的地方反动会道门所控制，这样，伪军工作就成为重点了。在处理几批伪军俘虏时，我们根据我军的“不杀俘虏，优待俘虏”的政策，甚至对伪军头目，如扈全禄的参谋长徐子衡及汤阴伪军头目等，都给予优待、教育、宽大释放。这对该地区以后的工作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如程道合、王自全等部的工

作)。

二、冀鲁豫军区成立后的敌军工作

冀鲁豫军区于1940年4月成立,委派李一非同志为军区政治部敌工部部长。不久日寇即开始“五·五”大扫荡。由于敌我力量悬殊,我们处于战备和反扫荡的紧张情况中,当时较有基础的地方只有濮(阳)、内(黄)、清(丰)、南(乐)边区即“沙区”的几十个村庄,而且随时可能有敌情。这时区党委、军区反复讨论如何冲破敌人的包围封锁,扩大回旋区,发展游击战争,以坚持根据地斗争,讨论了如何加强伪军工作及敌占区工作。

1、开展天门会地区的工作,从一分区(民军)方面来的情况说,卫河以西(敌占区)浚、滑、汤三县天门会地区还有开展工作的条件。该会首杨贯一对我军态度较好,我军在消灭扈全禄伪军时,没有对他采取行动。他也送粮食、食品表示对我军慰劳。还有一些爱国开明士绅和进步知识分子如常仙甫、胡紫青、傅凌云等在他左右,对他有影响,于是决定,先后派黄友若、刘哲民等同志前往工作。以后这个地区的工作进展顺利,争取了总会长杨贯一等要员,发展了党组织,建立了工委及浚、滑、汤、淇四县工作团,由黄友若同志负责,掌握了天门会大部分常备武装,掌握敌伪情报,掩护平汉路交通。吕正操、杨得志同志率部队通过平汉线到太行山和延安去,在黄友若、胡紫青等同志的精密布置掩护下,得以安全通过,这在当时敌人严密封锁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的。此外,在开展对伪军、伪组织及敌占区群众工作,争取青年学生等方面都收到效果。在1945年日寇投降时,杨贯一断然率部起义,并任我们浚县县长,其部队接受我军改编并随即参加我军作战,是极为成功的范例。

2、开展卫西伪军工作,打通平汉线交通。1941年至1942年以来,日伪除对我根据地加紧进攻、“扫荡”及对交通要道、铁路沿线大挖封锁沟,筑碉堡守备。对重要据点重兵把守,对于平汉线守备

封锁尤为严密。平汉路东西,平原(包括冀南、冀鲁豫等地区)与太行山的交通非常困难。甚至大部队也难以通过。为了粉碎敌人封锁我根据地的“囚笼政策”,我们设立了“沙区”办事处,由王乐亭同志负责,与太行区协同进行工作。通过对安阳一带伪军王自全、程道合等部的工作,在他们掩护下,打通了与太行山的联系。在交通情报和物资及过往人员等方面,均在这些伪军、伪组织的掩护下,得以顺利进行。当时在平汉以东的华北平原以及华东根据地去延安及太行山的干部,都要通过这条路线前去。一些负责同志,如刘少奇、陈毅均是经过这条交通线去延安的。此外,沙区办事处还利用伪军关系,先后购买子弹 180 多万发,从太行运回 3000 多发炮弹,并经常传递大量文件等。这条交通线在抗日战争时期未出什么问题。

此时,泰西地区、鲁西南、湖西、水东地区,通过敌伪工作的开展,对坚持根据地斗争都起了重大作用。

三、敌伪工作的大开展时期

1942 年,“九·二七”大扫荡后,进攻、扫荡更加频繁,边区形势更加紧张。年底区党委召开了高干会议,提出全边区两大任务:第一、发动群众减租减息;第二,争取瓦解敌人,折散敌、伪、顽、会、匪联合。于是,加强敌伪工作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1943 年春,军区派李一非同志到太行山开会,向总政罗瑞卿主任汇报了工作,并提了一些意见,当时在太行山党校学习的苏振华政委也参加了。罗主任指示:“要加强这一工作,首先领导上要有所认识,要提到战略高度,从政策、方针及组织干部等各方面,发动全党的多方面力量大力加强这一工作。”李一非同志回来后,传达了罗主任的指示,区党委、军区决定 1943 年初夏(4 至 5 月),开全区敌工会议,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也出席了会议,并作了指示。会议明确了当前对敌工作的政策、方针,加强组织领导,配备干部以及当前工作的中心

问题,均进行了比较认真详细的讨论。对尔后冀鲁豫敌伪工作的开展起了重大作用,从此,敌伪军工作从一般对敌宣传瓦解工作,进入一个更深入、更广泛、更有力、更有显著效果的新阶段。

1、在政策上,贯彻了北方局和总政关于加强争取瓦解伪军工作的指示,以及区党委拆散敌、伪、顽、会、匪联合的方针,决定边区全党加强敌伪工作,争取伪军、伪组织的两面派,并出布告,宣布对反正起义伪军的优厚待遇。

2、在组织上,加强了领导。区党委成立敌工委员会。由崔田民同志任书记,李一非同志任副书记,宣传、保卫、情报部门的负责同志参加委员会,对各军分区敌工科作了相应调整,加强领导,各县设了敌工站,受军分区敌工科及县委双重领导,站长条件适合的一般参加县委。

3、发动对敌伪的政治攻势。全区加强对敌伪的宣传,以“一年打败希特勒,两年打败日本”为中心,用各种形式对敌伪宣传,要他们认清形势,立功赎罪,这种政治攻势又与军事攻势相结合,在我们武装斗争与政治攻势双管齐下的形势下,伪军、伪组织人员大大的动摇了。根据地及根据地周围的伪军,伪组织人员纷纷与我联络,表示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愿意立功赎罪。我们各地也派了一些人员打入敌人内部工作。

4、派遣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敌据点附近进行活动。要敌伪人员了解优待起义人员的政策,认清形势,立功赎罪,打击罪大恶极的汉奸,为民除害,振奋敌占区人心,进一步动摇伪军、伪组织人员。特别是秦肥地区武工队的活动,对打击敌伪,配合根据地斗争起了不少的作用。

通过以上工作,全区伪军据点(治安军除外)绝大部分与我建立了联系,做到通情报,配合我军军事行动,掩护交通,保护我工作人员。在我们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全区已有十几个县全部解放了。

四、在准备大反攻时期的敌伪工作

1943年和1944年以来,德、意、日法西斯在东西战场节节失利,在我军加强政治、军事攻势下,根据地伪军也土崩瓦解,或被消灭,或纷纷反正起义,投靠我军。冀鲁豫分局、军区为了积极迎接大反攻形势的到来,更加加强对大股伪军和大城市铁路沿线的敌伪工作,决定召开第二次全区敌军工作会议。将军区敌工部同情报处合并,以便统一步调,加强工作,并在几个地区设立办事处。成立军区联络部,由李一非任部长,王乐亭、阎海清任副部长,以加强这一工作。

1、“沙区”办事处由王乐亭同志负责,在原有基础上加强工作,增加骨干,全力向平汉线安阳至新乡一带开展工作,保证铁路两侧的交通安全通过,争取该地区伪军反正。

2、加强伸入在根据地最大伪军伪二方面军的工作。1943年间成立了第二办事处,由毛定原同志负责。以后毛定原同志去学习,军区敌工部同二办合并继续进行这一工作。由于我们在八公桥战斗中全部歼灭伪二方面军司令部(除伪司令孙良诚不在驻地外),其他自参谋长、副官长以下八大处长,特务团长及有关人员均被俘。我们对被俘人员做了大量工作,给予生活上的优待,分局和军区负责同志也同他们讲了话,在被俘大部分人员中起了良好作用。其中伪参谋长甄纪印表示要为我们工作,此人在西北军中有影响,决定加强这一工作。驻濮阳伪二方面军的主力王清翰(六十一军?)也同我们建立了关系,表示要为我工作并相机起义。1944年该军撤退时,相约我军进城,我们未发一枪解放了冀鲁豫边区重镇濮阳县县城。濮阳本地伪军张乘波部千余人,已有一部分起义,其他全部瓦解。自此,濮阳境内敌人已全部解决。另一部驻东明的赵云祥部,我们也有工作。后来孙良诚部调陇海线,我们在该地区工作的同志与他有联系,并将他的关系介绍给华东,他在陇海战役中率部

起义。

3、建立陇海办事处。1943年，由五分区派李冠卿同志由民(权)、兰(考)到开封一带工作，在对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中，已具有相当的基础。为了加强铁路沿线大股伪军的工作，决定设立陇海办事处，由李苏波同志负责。陇海沿线自郑州、开封、商邱、徐州均展开了工作并加强对陇海线主要伪军张岚峰的工作。由于张的反动本质，他几次动摇犹豫，未能反正。但我们还是争取其部下魏凤楼纵队及王继贤师、杜新民师起义，对配合我军主力在解放战争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使张岚峰部大部分瓦解。在解放战争中张被我军俘虏了。随着伪军工作的开展，郑、汴、商等城市工作也有了开展，在职员、学生中进行了不少工作，并发展了党员。除一部分青年到了解放区外，留在当地的同志协助我军解放接管了这些城市。

4、设立津浦办事处。由边伯民、杨宏碧、张萍等同志负责，由于这一工作时间不长，而且伪治安军十分顽固，我们未能打开局面，但也做了不少敌占区的情报、学生和青年的工作。

5、伪兴亚同盟自治军的工作。伪兴亚同盟自治军是由原孙殿英部拉出来，又拉上了平汉路两侧部分地方团队游击武装而成，军长王天祥原与我太行山有关系，1942年开向路东，我们与他联系并派干部到该部任职，以便联络。以后在敌人压力下大部分瓦解了。有一个特务团驻在大名城，王天祥及其参谋长和眷属来到我军，我们热情款待了他们。在1944年解放大名战斗中，王天祥亲自到大名发动其特务团起义，配合我军里应外合全歼大名的敌人，解放了大名。以后我们任命他为我军主力部队的旅长，并加入了党组织，解放以后任军分区司令员等职。

五、日军方面的工作情况

1943年以前，只有几个被俘日军士兵，经对他们进行了战争形势和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反动性的教育，宣传共产党和八

路军的性质以及优待俘虏的政策,启发了他们的觉悟并自愿参加反战组织“觉醒联盟”。1943年日共领导的“日本反战同盟”在延安召开会议。我们派水野代表参加,当年冬冀鲁豫“反战同盟”支部隆重举行了成立大会,选举松本俊一为支部长。从“反战同盟支部”成立后,他们的觉悟和工作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能够认真学习,主动安排工作。在1944年至1945年迎接大反攻的形势下,反战同盟的同志配合我军深入敌占区进行对敌宣传,对敌军堡垒喊话,印制散发宣传品,并争取了一个日军士兵向我投诚。在这些活动中宫川同志牺牲了。“九·二七”大扫荡中,黑田同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我们对这些在抗日战争期间觉悟过来的、同我们站在一起为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日本同志,寄予深切的悼念。

各分区的敌伪工作都是很有成绩的,在配合坚持根据地斗争,开展敌占区工作中起了不少的作用。文中记述很不充分,有待继续补充。

从山东到太行(节录)

肖 华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我曾从山东去太行山八路军总部汇报工作,横跨晋冀鲁豫四省交界处的敌占区。那是1942年秋天,山东分局和一一五师领导机关研究决定,由我前往太行山,向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汇报山东分局对敌斗争的形势和五年来的工作情况;在前往太行山的途中,就便检查一下湖西、鲁西的工作,传达刘少奇同志当年春天对山东抗战工作的指示精神。

我们处于敌后的敌后,穿越鲁西等游击区和敌占区进入太行,其间要跨越封锁严密的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在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大规模的疯狂“扫荡”之后,特别是在华北我军百团大战之后,敌人仅在山东地区就安了2400多个据点,在主要城镇及铁路干线推行强化治安运动,建立维持会,扶植伪政权,到处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加紧巡逻和盘查,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游击根据地的蚕食和经济封锁。这一路敌情紧张,要经过许多关口。与我同行的有一个警卫员和两个秘书,警卫员叫徐登坤,秘书一个是康茅召同志,一个是我的夫人王新兰同志。

我们在铁路游击队的掩护和带领下,接连走了两个晚上,随后又乘着茫茫夜色,疾速越过了津浦线。身后不断传来维持会派人巡逻的梆子声及“没有事哟”的报平安的唤声。一行人摸黑走了10余里,与微山湖游击队派来迎接我们的张新华队长接上了头。杜继伟带领的铁道游击队完成了护送任务,与我们分手。黎明时分,来到了微山湖畔,张队长领着我们跨上了预先准备好的渔船。渔船在密

如墙堵的芦苇荡里折来转去，载着我们进入了水气弥漫的微山湖里。天放亮了，水清苇碧，看得见七八里外湖中的小山，山上有敌人的碉堡。回看湖岸，周围也是碉堡林立。日本侵略者用他们的魔掌，在我们的土地上留下了多少罪恶的标志呀！张队长他们从小渔船的篷子里端出事先预备好的早餐，有干粮，有热水，有烧好的鲜鱼。这时候，我们才感到又渴又饿，饱餐了一顿。船隐藏在芦荡之中，我们必须要在船里隐蔽上一天。碉堡上那罪恶的“眼睛”，象秃鹫一样，整天搜索着湖上的动静。张队长告诉我们：“放心休息，周围群众都是我们的人，湖上的敌人有我们游击队监视哩。芦荡中水路复杂，深浅不一，敌人不熟悉水道，是不敢轻易往里闯的。”其实，在斗争的初期并不是这样。那时，湖上游击队公开活动，敌人动不动就开着汽船进行清剿，甚至狡猾地化装成渔民袭击我们。从斗争中吸取教训，我们把游击队分成小股，分散开来进行隐蔽的斗争，加之又做了大量瓦解敌人争取维持会的工作以后，日本侵略者就无能为力了。我们的游击队员都是本地渔民，对湖上的情况十分了解，依靠群众，行动自如，可以主动地袭击敌人。敌人只好龟缩在据点里，反而不敢轻举妄动了。

夜幕降临了，小渔船拐出芦苇荡，将我们很顺利地送上了微山湖西岸。弃舟登陆，走了七八里地，湖西军区司令员邓克明和政委张国华派了一个骑兵排来迎接我们。无风无月，一派漆黑，30多人骑马在弯弯的小道上鱼贯而进。因为走得急，天又黑，迷失方向，撞到了敌人的一个据点附近。领头的张队长暗夜之中，在路旁看到了斗大一块卧着的石头，跳下马辨了方向。在他的带领下，鸡叫时分，我们顺利地赶到了丰县、单县之间的湖西军分区司令部。

铁道游击队和湖上游击队是连接山东根据地和太行山根据地的重要枢纽。少奇同志3月从苏北进入山东，在山东工作了4个月，返回延安时，也是从这条交通线上秘密通过的。从表面上看，敌人是凶恶的、强大的，他们控制了交通干线和重要村镇，建立了伪

政权、维持会，到处设置了密如蛛网的封锁沟、封锁墙，严密盘查，耀武扬威。实际上，他们是空架子，当地的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八路军在根据地群众中影响很大，群众衷心拥护八路军，信任八路军，想尽各种办法保护它、支持它，这才是真正牢不可破的铜墙铁壁。这一次，我们能够从敌人的眼皮底下安然通过，真切地感受到了人民怀抱的温暖，看到了广大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坚不可摧的。

在湖西，我们住了一个星期。邓克明、张国华同志和我们一起东奔西走，听取各单位的工作汇报；同时，又由我传达了少奇同志对山东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在湖西的工作告一段落后，邓克明和张国华同志又派骑兵连护送我们向北行进。不久，赶到了冀鲁豫军区所在地，司令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区党委书记黄敬热情地迎接了我们。在这里，我们进行调查研究，了解工作情况，传达少奇同志的指示，大约用了半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下一步是要从晋冀鲁豫四省的交界处，越过敌占区，跨过平汉线而进入太行山。可以说这是最困难、最艰苦的一段行程了。通过敌占区，当然也可以采取武装通过的方式，眼下要经过平汉线，起码要一个团以上的兵力掩护，才能突得过去。为了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决定采取经过内线工作，隐蔽通过的方式。我们人少目标小，这样通过也是很安全的。从范县出发前，组织上就派来了给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带过路的敌工部部长王乐亭同志。

动身前，我们将携带的有关文件全数交给了王乐亭，由他从另外一条更隐蔽的地下交通线送走了。我们清理了身上的物品，连常用的钢笔也留下了。头两天，我们乘马而行，经清丰、过南乐，顺利地赶到了内黄的大沙窝。大沙窝是蔓延 30 余里的干旱区，到处丛生着灌木，人们的生活是艰苦的。这里离平汉铁路只有百把里地了，属于游击区和敌占区的交界处。我和王乐亭、康茅召、徐登坤都脱下军装，换上了可体的便衣。王新兰也换了装束，下面扎上了黑

腿带。头上扎起了红头绳。骑一头小毛驴，乔装成回娘家的新媳妇。王乐亭叮咛我们，一路上要尽量少开口。因为我和康茅召、王新兰都不是本地人，口音南腔北调，说话多了容易引起怀疑，容易出事。

我们以商人的身份进入敌占区。这里在敌人的严密控制下，老百姓很少往来，路上行人也很稀少，加上经常有土匪绑票、抢劫，苛捐杂税又多如牛毛，村庄里、田野上到处是一派凋敝荒凉、民不聊生的景象。与解放区、根据地生机勃勃的气氛形成了明显的对照。走在路上，我们感到心情很压抑。

进入敌占区前，我们隐了真名，各人起了个化名。我的化名叫“春涛”。进入敌占区的第一个晚上，我们住在离内黄不远的的一个房屋零散的小村落里。村里住着伪军一个小队，王乐亭通过内线，将王新兰安排在伪军小队长（这个伪军小队长是我们的内线）太太的屋里。我们4人在村里没法住，被安排在村外一间看场的小土房里。房里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土炕，炕上铺垫着麦秸。王乐亭买来几个馍馍，带来一壶冷开水，我们胡乱填饱了肚子，将棉袄裹在身上，准备在麦草上过夜。正在这里，又来了两位往来于游击区和敌占区之间做生意的商人和一个从冀南来的伪军士兵。小土炕上要挤7个人，只好横成一排儿睡，我们每人寻了一块砖当枕头。那两个商人问我们：“请问你们是干什么的？”王乐亭笑着答：“做小买卖嘛，这年月，胡乱混一口饭吃。”他怕那两个商人寻我搭讪，放砖头时给我施了个眼色，让我靠墙，睡在最里边。王乐亭自个儿睡在我们和那三个陌生人的交界处。

上炕以后，两个商人问伪军：“你在冀南当兵吃粮，有啥不好，干吗跑到这么个鬼地方来了？”伪军说：“唉，别提了，我们在冀南是配合皇军扫荡陈再道、宋任穷的八路军的。八路军可厉害啦，我们1000多人马跟八路军一接火，眨眼间，他们的手榴弹、刺刀就闪到眼前了，我们的人兵败如山倒，被人家打了个稀里糊涂，幸亏我丢了枪，跑得快，才保住了这一条活命。如今在冀南是呆不成了，我只

好到这儿来投朋友，寻碗饭吃。”两个商人补充着说：“嗨！日本人那么厉害，也不是八路军的对手，你们算什么？”

我们四人静静地躺着，听着，不敢笑，也不敢吱声。他们哪里知道，就在这条土炕上，与他们一块睡着3个共产党员，1个共青团员呀！

夜深了，王新兰同志不放心，特地从村里赶出来，悄悄地敲了敲土房的门板，唤了声“春涛。”听我答应了一声，她知道我们安然无事，才放心地回村去了。为这事，第二天早晨，王乐亭同志特别告诉新兰：“往后，晚上你1个人不能随便走动，这里是敌占区，伪军很不讲理，最容易出事的。”从这个小村庄出发之前，王乐亭又作了新的安排：“下一步要出大沙窝了，为了缩小目标，不引起敌人的注意，我们5个人得分成两路走。”在他的指点下，康茅召和徐登坤从北面一条交通线上走了，我们3人仍按原定路线行进。

黄昏时分，我们赶到了一个百多户人家的村庄。村边上是一个姓程的土围子，这家地主兼商人，是个开明士绅。为了保住产业，他虽然表面上应酬着日本人，但毕竟是具有爱国心的。我们八路军主动争取他、团结他，做了许多工作。这天晚上，地主本人外出了，由一个同我们有内线关系的管事，安排接待我们。

王新兰进了土围子，准备和七姨太一块住一个晚上。进围子之前，王乐亭悄悄地叮嘱她：“进围子后不要大意，说话要小心。七姨太有文化，见过世面，现在又是掌家的，与她接触，手脚放大方点儿，千万别露出什么破绽来。”王乐亭和我就在围子外面的另一个管事的家里过夜，他家里房子不大，桌凳齐备，炉火暖烘烘的，热气扑人，比起昨天晚上那个冷落的小土炕，好得多了。

翌日清晨，吃过早饭，我们3人又上路了。这一次不同既往，我们坐进了程家的轿车。轿车上有帘子，帘子上有明镜，三个骡子，几串铜铃，由一个专门赶车的车夫挥鞭吆喝。我望着坐在身边的王乐亭，暗暗钦佩他的精明和能干，佩服敌工部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出

色。

夕阳西下，在敌占区的第三个夜晚快要降临了。天黑时分，车子进了安阳附近的一个小村庄。这里离平汉线已经很近了，可以清晰地听到火车的奔驰声、鸣叫声。车子三拐两拐，停在一个收拾得挺漂亮的小院里。王乐亭悄声告诉我，这是一个伪政人员的家庭。

这家两口子很热情，给我和王新兰同志专门腾出了一间屋子，炕上的新棉被花色艳丽，靠里墙整整齐齐横叠了七八床。8点多，天黑严了，村外的公路上一阵响声，突然出现了一束汽车的灯光。那位伪政人员即拔出驳壳枪，镇静地说：“万一是鬼子进来了，你们迅速从窗子跳到后院躲藏起来。这里有我应付，你们放心好了。”汽车没有进村，沿公路向远处驶去了。他收起了驳壳枪，蔑视地说：“别看日本人飞扬跋扈，实际上他们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的八路军和老百姓才是天罗地网。在我们这儿，日本人是瞎子、聋子，只有挨打的份儿。”这话说得好呀！

他的太太忙着为我们准备晚饭。王新兰上去帮忙，正拉风箱时，那太太忽然凑近王新兰的耳根，悄声说道：“你大概是刚学会梳头的吧？看看，头发没裹好，掉下来了，要是在外面，这该多危险！”王新兰感激地点点头。这位太太又补充道：“下半夜动身时，我来帮你梳头呀。”吃完了饭，我们忙去休息了。

鸡叫时动身，那位伪政人员亲自带路，拂晓前赶到了临近铁路的一个村子里。铁路边有丈把深的封锁沟。他打算带我们到村公所去，村公所可以放下吊桥，使尽快通过。我们几个人转过几条街，快要走到村公所门口时，突然从一堵土墙的角上伸出一只巴掌，惊得他倒退一步，赶忙拔枪。墙后转出个汉子，一面将我们往边上的一户门里推，一面急惶惶地说：“快躲起来！日本小队长刚进村公所，正到这里查路哪！”好险呀，转过墙角就是村公所，再差上几秒钟或者我们几个人的响动大一点，就非出事不可。我们捏了一把汗，静静地躲进老乡家里，度过了这最危险的时刻。

等这一小队鬼子走后，村公所的人才偷偷地摸出来放下吊桥。在迷蒙的晓色里，我们从安阳和磁县之间顺利地越过了平汉铁路。过铁路不久，就进入了游击区。天亮了，秋末冬初的朝阳格外暖人，照得迎面的太行山清晰如画。

在敌占区的3天3夜终于结束了！这是惊心动魄的3天3夜，是我们终生难忘的3天3夜。我们踏着阳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原载《在特殊战线上》）

抗战时期的冀鲁豫沙区办事处

王乐亭

从1941年开始,抗战形势进入了极其困难的时期。正如聂荣臻元帅指示那样:“由于八路军、新四军力量的壮大,使敌人遭受严重的打击。华北的百团大战,更引起日本侵略军的极大恐慌,从而把进攻的矛头进一步指向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也趁机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比起抗战初期,敌后的斗争,是更加紧张、复杂、剧烈、残酷了。”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经过艰苦努力,开辟了从太行经晋绥通往延安的西线秘密交通线;从安阳经冀鲁豫到山东、华中根据地的南线秘密交通线。

南边这条秘密交通线以安阳、林县为中心建立起来的。1941年6月,八路军总部在林县任村设立了豫北办事处,负责建立太行至冀鲁豫的秘密交通线。办事处主任王百评对豫北地区的地方实力派作了大量的工作,争取了安阳城西孙家局所、青道会的首领,以及豫北“百里王”王自全等人,在他们的势力范围内建立起多处交通站。豫北办事处还利用地方实力派的局所组织货栈,大量收购根据地的土特产,通过秘密交通线运到安阳,再利用敌人的交通线转销北平、天津、郑州等地;又从那里换回造币纸、印刷机、电池等根据地的奇缺物品。秘密交通线还组织食盐、布匹、粮食入口供应根据地。从1942年到1945年运入太行区的布匹达15万丈,粮食达百万斤以上;运食盐,最多的一次出动230多头牲口驮运。太行区生产的军火、印刷的冀钞,也是通过地下交通线送往冀鲁豫区

的。由于豫北办事处出色的工作，办事处主任王百评曾受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表扬。

1940年5月，冀鲁豫军区建立不久，朱程司令员指出：“在安阳东部地区开辟地下交通线，对于沟通太行和冀鲁豫与华东各解放区，转送来往干部，可以缩短千里以上的路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并先后派黄世贤、侯兆璞、李业茂、杨景云等，在安阳东部的辛村、庞湾、杨奇村、北故城、沿河台等地建立了秘密交通站，负责护送党政军过往人员。开始每个交通站只有一二名脱产人员，其余为不脱产的地下交通员。不久，朱程又派华北抗日民军敌工科长孙子芳等人在内黄县理固村成立了华北抗日民军办事处，利用各种关系，接送党政军干部，开展敌占区工作，搜集敌伪情报。这就是冀鲁豫军区沙区办事处的前身，它为沙区办事处的成立，及开展各项工作奠定了基础。

1942年是敌我相持阶段。在平汉线上从石家庄到安阳驻有敌人一个混成旅团，旅团长是铃木贞次少将（后换成小松崎力雄少将）。安阳到新乡是日军24师团占领。开封、徐州各驻日军一个师团。商丘驻有日军的骑兵混成旅团。由于敌人急于打通平汉线，主力为“南进政策”服务，华北兵力不足，为了维持兵力空虚的华北，就拼命搞“治安强化”发展伪军，建立以齐燮元为总头子的“华北治安军”。他们在平汉路两侧和抗日根据地的边沿挖封锁沟，修筑碉堡，建筑高墙，企图用“囚笼政策”分割封锁根据地。对太行、太岳和冀南、冀鲁豫根据地的交通联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困难。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沟通冀鲁豫根据地同太行根据地及八路军总部和党中央的联系，解决护送干部过路问题，做好敌占区的秘密交通工作成为十分紧迫、十分重要的任务。干部过封锁线，开始是从邯郸、邢台之间的沙河一带通过，一般要先用电台约定好时间，冀鲁豫这边用一两个团的武装护送；太行那边派一个团下来接，趁黑夜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往往遭到敌人的阻击，时有伤亡。

有一次,新四旅旅长徐进成带着一些人前往太行,在铁路上遭到日军铁甲车扫射阻击,不仅过不去,领队的徐进成也被打伤了。由于我方整团的部队行动,前半夜要在敌占区穿插五六个小时,走五六十里路,极容易被敌人察觉。因此,往往我们尚未接近铁路线,敌人已做好准备,严阵以待,使我们无法通过。如果硬冲过去,则要付出很大代价。这时候,豫北办事处的齐玉坦、李德成到冀鲁豫军区,带来了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交给苏振华政委。命令指出,要开展敌占区的工作,并且一定在这一带搞个突破口,把延安经太行至冀鲁豫的南线秘密交通线打通。齐玉坦、李德成还详细汇报了敌占区的情况,认为采取化装通过是可以的。冀鲁豫军区的领导同志对总部指示和他们汇报的情况很重视,决定派联络部副部长王乐亭和五分区政治部副主任魏克仁(魏十篇)和李德成等一路到总部去,向总部汇报了冀鲁豫部队整编情况,及沿途敌情和兵力部署等。

王乐亭等从敌占区通过,有一个突出的感觉是外紧内松。平汉线两侧有封锁沟,三里五里有碉堡,敌伪军把守路口。可是路东的农民到路西种地,路西的农民到路东干活,在封锁沟中间留一些土墩,架上木板可以通行,碉堡里的日伪军看到农民三五成群的来往,也不过问。这正是我们可以设法利用的条件。

王乐亭到山西辽县麻田集总向彭德怀副总司令作了汇报,彭总指示,冀鲁豫军区要和林县任村十八集团军豫北办事处同心协力,密切配合,对安阳以东、卫河以西的敌占区伪军开展争取工作,把太行到冀鲁豫、冀南的地下交通线建立起来,使它畅通无阻。保证我们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过路的安全。王乐亭返回冀鲁豫军区传达彭总的指示,详细作了汇报。军区决定在靠近卫河的内黄井店设立沙区办事处。开始时称沙区工作团,同年8月改名为沙区办事处。其任务有三:一是建立地下交通;二是搜集敌人情报,特别是敌人准备“扫荡”的情报;三是在可能的情况下,采购军需民用的物资。为了统一领导,华北抗日民军办事处和第五、第六军分区所辖

敌占区交通站，也统归沙区工作团领导。

沙区工作团设主任，由王乐亭担任，秘书郭耀，敌军工作股股长孙子芳，交通股股长刘哲民。沙区工作团改为沙区办事处，机构有了新的发展，人员逐步增多，设办公室和敌工、交通、情报和军火采办4个科。不久，又增设了电台、警卫连和生活队等。办事处机关先后驻在内黄县井店附近的化村、理固、杨河道村。办事处主任王乐亭、交通科科长刘哲民，刘调走后是马骛（马全忠），情报科科长林亦中，后来又增加了叶纪全（化名王惠林）、张符瑛（又名张馥玉）等；敌工科科长黄友若。后来黄友若与五分区敌工科科长李苏波对调；采买科科长王言炳，后是武世洪。采买科改由军区后勤直接领导，改为军火采办处，处长是王言炳，副处长是武世洪。警卫排长袁万金。1944年春扩编成警卫连，连长许连生，警卫战士120人左右；电台台长张殿一，译电员任汝祯等10余人。

冀鲁豫军区领导对南线地下交通十分关心，在听取王乐亭汇报工作时，曾询问秘密交通工作有什么困难？王乐亭提出为了确保干部过路安全，对伪军上层人物的争取工作要做，下层人员的工作也要做。伪军官兵一是爱钱，二是爱枪。对于掩护我们的秘密交通、护送我们干部所派的护兵、马弁等人，秘密给他们开一份饷，每人每月折合45斤小米的钱。另外，送他们几支手枪，供护送我们的领导同志过往时用。过路的领导同志可坐在骡拉的轿车里，外边坐上伪军士兵，挎枪护送，这样比较安全。军区领导同意王乐亭的意见，决定拿出3支德造20响驳壳枪，送给秦芝、韩守业、王自全各1支。并由沙区办事处给每个为我们跑交通的伪军按月发一份饷。过年过节还以办事处的名义给这些伪军团队送一些礼品。王乐亭到伪军队长那里，看到他们的小孩，顺手塞给他们几块钱，联络感情。

沙区办事处开辟的秘密交通线有两条：一条是从沙区出发，在内黄县之后苇草地坡渡卫河，经过汤阴县的北五陵、任固附近，然后转向安阳县的辛村、庞家湾、白壁、崔家桥，从安阳北面越过平汉

路,再经洪河屯等地西上太行山,这是北路秘密交通线。另一条南路秘密交通线也是由沙区出发,经浚县的李聂村、小齐村、胡村,从汤阴和浚县交界处的老观咀过卫河,再经浚县的榆涧、裴庄、乔村、李黄庄一带,至汤阴县的三里屯越过平汉铁路封锁线,再经冷泉一带西上太行山南麓淇县的泉寨村或林县任村的豫北办事处。这条南路秘密交通线较北路约近100余华里。

1942年6月14日吕正操率部5000余人,从冀中绕道到冀鲁豫,休整了个把月,8月底开始由黄友若、胡紫青、李子明等安排和引导下,秘密从老官咀渡过卫河敌人封锁线。由“浚、滑、汤天门会总办事处”的中共地下党员胡紫青(任天门会武装的参谋长),进一步与总会长杨贯一商量决定,掩护吕正操率部从浚县、汤阴敌占区的接合部过平汉路。过后岗楼上的伪军再鸣枪“送行”,以佯攻应付日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华中局书记刘少奇从华中返回延安,于1942年9月到达沙区。在沙区办事处的妥善安排和充分准备下,刘少奇以大学教授的身份为掩护,化名胡服,由王乐亭亲自护送。途经辛村、崔家桥等伪军据点时,由王自全派轿车和伪军武装护送越过平汉路封锁线。达到太行根据地边沿地区之后,刘伯承师长派骑兵接刘少奇等到豫北办事处。1945年5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书记、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到冀鲁豫检查和指导工作。返回太行时,由沙区办事处交通科长马赛护送,从南线通过。到淇河渡口,发现伪军巡逻队,邓小平用“调虎离山”计将伪军引开,按原定计划涉过淇河,安全抵达太行根据地。新四军陈毅军长1944年1月,从苏北赴延安参加“七大”,途经冀鲁豫,在沙区办事处的驻地内黄县井店杨河道稍事休息后,由马赛护送趟水过卫河东岸老官咀渡口时,由交通员李志杰、老吴带路,到乔村中间站。天门会的中共地下党员傅凌云前来迎接,安排食宿休息。入夜从宜沟集穿过伪军岗楼附近,过平汉路封锁线到太行。陈毅到达沙区办事处的时

候，感慨不已，诗兴大发，挥毫写下了一首《长相思·过冀鲁豫道中》：“山一程，水一程，万里长征足未停。太行笑相迎。昼趲行，夜趲行，敌伪关防穿插勤。到处有军屯。”

沙区办事处对汤阴县五陵伪大队长石老思进行教育和争取工作。石老思的儿子石炳南玩鸟枪炸坏手指，办事处派两名医生给他治疗，痊愈后很感激。后来，刘少奇的夫人途经五陵，石炳南派伪军护送。杨勇的夫人林彬生小孩，曾住在石老思处。黄敬的夫人范瑾曾在石老思处住一个多月。石老思父子不仅为我们护送过往的干部，提供情报，还卖给弹药和医疗用品。

沙区办事处通过各种渠道，想方设法，采购了枪支、弹药、棉花、医药等军需民用物资。在井店开设了收购站。敌占区的商人和能搞到弹药的人，经常到收购站洽谈生意，秘密运来军用物资，换取抗日根据地的硝盐、花生、红枣、土碱等。有的伪军把成箱的子弹暗中卖给我们，三年多的时间通过秘密交通和采购站，共采购子弹200多万发，还采购了大批电池，磅纸、油墨、铜钱、医药、种子等军需民用的紧缺物资。这对保障部队的物资供应，支援根据地的建设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沙区办事处在开展敌伪工作中，也有极其深刻的教训。主要是对伪军头目的反动性认识不足。象王自全、程道合、程道生等是土匪流氓出身，当我们的力量强大时，他们就想依靠我们；当形势一变，他们立刻翻脸。抗日胜利后，蒋介石派马法五、高树勋两个军从新乡北上时，国民党第40军暗中拉拢并委派程道生任师长。我们派人与他谈判，要他把部队拉过来，将任命他为纵队司令员。结果他本性不改撕破脸，将我们派去的4位同志逮捕了，把张符英、陈季章、薛智3人，交给国民党反动派。还有王自全突然将沙区办事处派去工作的索慧生、李德成两位同志活埋了。对伪军中下层的打入和策反工作也做得不够，没有控制住部队的武装。成功的经验是：浚县天门会杨贯一的武装，既注意了对上层人物的争取工作，

又派人深入中下层逐步掌握了部队，抗日胜利后，终于策动这支武装正式宣布起义，在你死我活的斗争中，依靠党的政策取得了胜利。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河南 部分城市工作的回忆

曹志真^①

重新学习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蒋介石从峨眉山下来,要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各地的汉奸伪军打起“国军”的旗号,一变而为抗日的“英雄”。各大小城市的日军,拒绝向抗战有功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蒋介石一方面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进行和平谈判,一方面积极准备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当时,我刚从延安学习后到鲁西南地委四县工委工作。1946年1月,接到中共冀鲁豫区党委通知,晋冀鲁豫中央局要调我到邯郸去学习城市工作。同年2月,我到中央局城工部报到,副部长何英才和我谈了话。随后,我就到城市工作学习班学习。从冀南、太行、太岳到这里报到的一共有十几个同志,学习班的主任是赵国强。学习的主要文件是毛泽东主席的《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还有刘少奇有关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等文件。学习期间,何英才和赵国强还经常结合当时的“和平谈判”、“军事调处”和“高树勋起义”等问题与大家在一起讨论;并且结合学习了几个我党在上海地下工作经验的文件。城市工作的总方针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里应外合,夺取城市”,要善于利用“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的工

^① 曹志真曾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组织科长、豫皖苏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

作经验,紧密团结和依靠城市工人、学生、贫民等,做长期打算,争取合法存在。因为当时工作需要,学习时间只有一个月左右就结束了。有的同志被派往国民党统治区工作,有的回到原单位分配,我被留在中央局城工部工作。

在城工部机关工作情况

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部长是孔祥祯。最初只有一个组织科和一个秘书,张箴为城工部秘书,我是组织科科长。1946年下半年又设国军科,负责人是李俊成。城工部的日常工作主要是接待从国统区来的同志,听取他们的汇报,并组织他们学习有关文件。从国统区来的同志一般都写有详细的文字材料,如发展几个党员联系哪些同情分子和进步分子,还有哪些人社会关系可以利用,回去后如何开展工作等。另外,还写有自传材料。经过短暂的学习后,规定秘密联系办法,重新派遣回国统区工作。此外,根据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又陆续抽调一批适合做城市工作的同志派往敌占城市去工作,如薛凡、贺群、张凌等同志就是这时派出去的,他们分别被派往河南救济总署、许昌参议会和开封五美酱园。

为了了解各地对城市工作的开展情况,1946年6月和10月,我曾两次到冀鲁豫区党委检查工作,主要是了解各级城工机构建立和人员配备的情况。两位部长对冀鲁豫的工作非常重视,要求加强对开封和陇海线的派遣工作,并指出对国民党军队要设立专门机构,开展“高树勋运动”。

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各战场不断取得激动人心的胜利。1947年下半年,人民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阶段。这时,领导又决定我越过陇海线到豫皖苏区党委检查工作,特别指出要加强陇海、平汉线的交通要道工作,并为我配备一匹战马和一个通讯员。我带着刘伯承、邓小平、薄一波首长的介绍信,由冶陶出发,先经过冀鲁豫区党委,再到鲁西南地委。由地委书记戴晓东和

周柱安副司令员介绍,我跟随一个小游击队跨过敌人严密封锁的陇海线,在濮阳附近到豫皖苏军区,见到了吴芝圃、张国华和王幼平同志。从此,我就留在豫皖苏区工作。大区域工部孔、何两位部长也随刘、邓大军向大别山去了。

当时豫皖苏城工部有赵彤、李良两位同志,赵彤负责东片的工作(雪、商、亳等县),李良负责西片的工作(睢、杞、太等县)。吴芝圃和王幼平对城市工作都非常重视,富有城市和国军工作经验,而且在开封和西北军中还有一些工作关系或亲友关系。给我印象较深的是,王幼平决定给开封我党控制下的报纸《中国时报》几十两黄金,吴芝圃曾决定给开封工委30斤特货,换成法币解决地下活动经费问题。当时战争环境十分紧张,流动性很大,我们主要依靠一些交通点线和地下工作同志取得联系,经常跟随区党委和军区一起行动,或跟随睢杞太地委行动,有时也单独行动。李良对当时情况很熟,地方关系很多,我们手中又有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作参考,可以活动到陈留和朱仙镇附近,并能和城市地下工作组织随时取得联系。

三个战斗堡垒和一个特别支部

开封当时是河南的省会,是中国历代兵家逐鹿中原的重镇。自1943年起,我八路军前方总部就早有预见,曾派郭有义打入开封,建立由总部直接领导的情报站。1946年5月,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决定,将开封情报站加强,改为中共开封工作委员会,郭有义为书记。工委会建立后,除了继续做好情报工作外,进一步重视了城市建党和发动群众的工作,从而开辟了工作的新局面。冀鲁豫区党委和鲁西南地委所领导的地区,因为经常受到开封及陇海沿线敌人的封锁、蚕食和“扫荡”,所以他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很重视敌占城市的工作,而且在开封和陇海路沿线已有些工作基础。1942年10月,鲁西南地委抽派李冠卿为陇海情报站站长兼民兰考工委

敌工部长。1944年4月，冀鲁豫区党委为加强开封和商丘的工作，又派李苏波为汴商工委书记兼豫鲁办事处主任，李冠卿为副书记。1946年9月李冠卿被捕后，区党委又任命孟起为开封工委书记。

1946年6月，根据长期隐蔽在敌人内部的朱晦生（1926年加入共产党）汇报的情况，华中中央分局决定建立中共汴郑工委，刘鸿文任书记，朱晦生、林恒为委员。不久，因战争环境紧张，与华中分局联系不便，经上级研究决定，工委改由晋冀鲁豫中央局领导，重大问题直接向刘、邓首长请示报告。

对于陇海前线几个重要城市的工作，除了以上三个党的工委以及一些支部和小组外，还有一个长期活动在敌人心脏的中共特别支部，支部书记是许天民。1940年他们在河南周口和界首建立起党的两个秘密联络点，利用经商做掩护，在反顽斗争中给新四军五师和四师提供大量情报。这个特别支部的成员有一些打入国民党军队的中下级军官。日本投降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和接收大员向平津、华北转移，并打入敌人的指挥机关，特别支部把这些关系转到东北和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代表团领导。在解放东北和平津战役中，他们曾发挥了作用，并得到中央的表扬。

开封的学生运动和文化界的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全国人民要求建立一个和平、独立、民主的新中国。一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蒋介石集团，违背人民的意志，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悍然撕毁政协决议和停战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声言要在半年内消灭共产党。但是战争的发展和蒋介石的愿望相反，他不但在战场上节节失利，在国统区又出现了第二条战场。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爱国运动和蒋介石之间的尖锐斗争。

开封是一座文化古城，公、私立学校都比较多。开封地下党的各个组织，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加强了对学运的领导，一

些负责同志还亲自深入到各大中学进行宣传和发展组织的工作。

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了美军强奸北大女生事件,国统区各大城市相继爆发反美示威游行,有着光荣历史传统的开封进步学生纷纷响应。在文化教育界有很高威信的进步教授嵇文甫、王毅斋等人积极支持学生爱国运动。

1947年初夏,河大教授因物价高涨,生活无法维持而罢教,学生也提出“提高公费标准”的要求。5月18日,河大学生会决定组织赴京请愿团。在地下党组织的具体指导下,发动开封各校师生以欢送代表团赴京请愿的形式开展斗争。游行队伍高举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旗子,一路贴标语,呼口号,浩浩荡荡。医学院的学生,还用竹竿挑起人体骷髅标本,表示物价高涨,人民无法生活下去。这次学生请愿示威游行,在开封各阶层群众中影响很大。国民党反动当局派遣大批特务到各校活动,企图破坏这次学生运动,都一一遭到了失败。当时有数十名学生遭到了逮捕。在地下党动员各方面力量的营救下,迫使敌人不得不把被捕的同学放出来。

与学生的爱国运动密切配合,中共在文化界也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冀鲁豫区党委在《中国时报》社刚成立时,就在经济上给予援助。该报社社长系中共地下党员郭海长,利用他父亲郭仲隗(省参议员)的社会地位,展开合法活动,对于当时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起了很大的推动和保护作用。当时国民党特务抓捕学生时,他们马上就把名单在报纸上公布,并帮助学生会印刷大量宣传品,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此外,在郑州《春秋时报》任副总编辑的赵青勃,在工业专科学校教书的栾星,在救济总署的张振亚,都曾经用自己手中的笔杆子构成了反饥饿、反内战的火力网,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发挥了第二条战线的作用。

党在工人和市民中的工作

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在敌占城市工作的方针，我地下工作同志紧紧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市民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打入救济总署的薛凡，团结和领导救济总署司机员工，向美国顾问开展面对面的说理斗争。1946年初，蒋介石企图在黄河花园口强迫堵口归故，以水代兵，淹没下游解放区。几十名司机联合罢工，拒绝向花园口运送器材，并要求补发拖欠的工资，气得美国顾问暴跳如雷，最后不得不向工人让步，从而拖延了堵口的时间，有利于黄河下游人民的平安迁移。

打入郑州电讯局的周舟和王怀堂，利用合法的身份，团结电讯局的广大职工，要求补发物价津贴，反对扣发数月的职工工资，坚持罢工和怠工达数月之久，并派代表团到南京交通部请愿。这次罢工迫使西安电讯总局局长来郑州调解，斗争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1948年初，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开封古城已处在我军包围之中。国民党省主席刘茂恩和蒋介石的嫡系城防司令李仲辛仍吹嘘说：“开封固若金汤。”他们强迫南关市民将城墙外200米内的民房一律拆除，打入到南关镇公所的曾洁光、阎延岭等同志，发动并带领市民和商号老板数千人，扶老携幼到省府请愿，并包围了刘茂恩的小汽车，敌人不得不迟滞这一罪恶的行动，从而为我华东野战军6月份攻取开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敌占区城市的建党工作

经中共组织派遣到敌占城市工作的同志，根据党的“精干隐蔽，争取合法存在”的方针，在取得职业掩护后，一般都比较重视发展党员的工作。如郭有义和曾洁光在敌人内部活动达6年之久，开始是做情报工作，发展共产党员比较慎重、缓慢，党员数量很少。党的工委建立后，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形势的发展，他们在社会各阶层

和敌人的武装部队里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他们牢牢掌握住河南省保五团这支武装力量,并在其中建立起党的支部。在配合我军消灭刘茂恩地方主力部队的战争中,以及在解放开封和睢杞战役中,都起到了名副其实的别动队的作用。方敬之进入开封后,和侯连赢^①先生接上了头,同时又和驻信阳的张轸部队接上了关系,打开了上层统战工作的新局面,并发展了一批共产党员。

刘鸿文和林恒到开封和郑州后,除了对刘汝明部队做争取起义工作外,还重视在学生中和文化界发展共产党员。在短短的时间里,他们在河南大学建立了党的支部,发展了党员,使其在开封的学生爱国运动中发挥积极作用。

李冠卿等同志打入敌人心脏活动的时间比较长,他们在各阶层群众中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一些支部,起到了联系群众和孤立敌人的作用。

许天民、朱晦生和田瑞珍等同志在国民党军队中活动的时间较久,他们在中下级军官中关系较多,在进步军官中发展了一批党员,在解放战争中为我军提供了一些重要情报。

总之,我们在开封等城市的建党工作,主要是以派遣为主,几个工委的负责同志,都是从解放区派遣进去的。在日伪统治时期,中央局和冀鲁豫区党委都曾派进去一些人,军队中的情报系统和敌工部门也派进去一些人,水东地委和鲁西南地委因为和民、兰、考等县接壤,与开封等城市的社会关系较多,他们利用亲戚朋友的合法关系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发展了一批党员。

日本投降后,从大后方和西安等地也来了一些进步人士,另有十几个原来是河南省委(竹沟时期)在内黄集发展的中共地下党员,日本投降后,也陆续打入开封。所以开封的地下党是从多方面打入的,是多头领导,在秘密的环境下,彼此不发生横的关系。犹如

^① 侯连赢,大革命时期曾任武汉警卫团团长,此时任刘茂恩的高参。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城市的敌人搞得日夜不宁，草木皆兵。

由于中共在汴、郑等城市有很长久的工作历史，在群众中有很浓厚的政治影响，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都有一些失掉关系的共产党员，即所谓被敌人打散的党员，他们长期埋伏下去，一心向着党，默默无闻地从事一些群众工作。如开封的张楠，系1925年的老党员，他以中医为掩护，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曾经7次被敌人逮捕，严刑拷打审问，但表现很好。为了取得可靠的情报，从敌人最机密的机关里发展党员，也是非常必要的，如吸收崔士学、张以诚等人入党。另外，在日伪时期吸收高级知识分子胡万杰入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吸收张绍儒入党都证明是正确的，他们表现很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兵 运 工 作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于争取和瓦解日伪军工作是非常重视的，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都设有敌工部、科、股等机构。把敌伪军工作看作是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中共中央又提出要加强国军工作，中央局城工部设有国军科。1945年10月高树勋将军起义后，中央指示要开展“高树勋运动”。为了争取在豫东地区盘踞近10年之久的张岚峰部队起义，八路军和新四军先后派遣一批得力干部打入该部工作，冀鲁豫军区还专门建立一个豫鲁办事处。新四军四师于1944年秋打回津浦路西后，也曾建立雪商亳办事处，与冀鲁豫军区相配合，加强对张岚峰部队起义工作的领导。经过中共地下党员与该部进步官兵的艰苦努力和密切配合，终于争取到3个师1万余人在日本投降后英勇起义，打开豫皖苏地区的局面，给蒋介石华北大举进犯以迎头痛击。

为了争取西北军旧部六十八军的起义工作，刘伯承和邓小平首长亲自写信派刘鸿文到该部做争取工作。1949年六十八军逃跑到江西弋阳，在我地下工作同志周郁文和副军长王志远的动员

下,终于主动投诚。

郭有义领导的情报站,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扩大组织和加强领导,改为开封工作委员会之后,也十分重视兵运工作。日本投降后,他们对河南省保五团的工作抓得很紧。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城工部孔、何两位部长的直接领导下,对该部的建党、起义和配合作战等问题,曾在邯郸做过两次认真的研究部署。事实证明,该部没有仓促起义,而埋伏在敌人心脏,起地下军的作用,随时配合我军作战,这种做法是正确的。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茂恩和主力军保一团和保二团的彻底被歼,就是在保五团的密切配合和巧妙安排下进行的。还有杞县还乡团(保安团)也是这样被歼的。不但为豫皖苏解放区除了一大害,也为我刘邓大军南下和陈粟大军攻打开封扫清了道路。

对保五团的工作,必须执行正确的政策。因为张绍儒和朱广仁原是兰考和民权一带的地方武装,他们和蒋介石有矛盾,和刘茂恩也有矛盾。张绍儒在抗战初期曾和我军徐茂理部配合对日军作战,并和冀鲁豫五地委有联系。他曾因“通八路”嫌疑被日军和国民党两次逮捕,都表现很好。朱广仁在民权一带曾做过一些错事,据地方反映还有一些罪行。但在日军投降后积极向我军靠拢,表示要戴罪立功。特别是和开封地下工委接上关系之后,做了不少有益于人民的工作,表现较好。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开封工委吸收他们两人为党员,这种做法事实证明也是正确的。

情 报 工 作

在日伪统治时期,我们在开封、郑州等城市和敌伪军中已经有了一些工作基础和点线联系,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地下工作同志愈加懂得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有不少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窃取敌人的机密情报,并把情报及时地送到自己人手里,或通过秘密电波传到我指挥部。1947年7月,中共开封工委通过各种地下关系

将开封至商丘段敌人的各种详细情况弄清，而后派曾洁光日夜兼程送到陈(锡联)彭(涛)纵队司令部，使我军指挥机关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取得破击陇海路的首战胜利。

蒋介石调集大军向华北进犯时，刘茂恩也密谋向我豫皖苏解放区进行“围剿”。为了不失时机地密切配合行动，沟通与我地下党的情报联系，豫皖苏军区派三十团组织股长袁立荣等坐镇隐蔽在保五团，负责随时联系，并通知地下电台直报军区。当敌人的电报密码变动时，马良还亲自把密电码送到军区。保五团的两位正副团长通过刘茂恩召开的秘密军事会议获取“围剿”计划并派人送到解放区。因此，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一年内粉碎敌人的三次“围剿”，使豫皖苏解放区坚如磐石，打破了敌人妄图吃掉豫皖苏、扫清北进障碍的狂妄企图。

特别值得称赞的是，许天民和朱晦生在国民党军队中发展的一批中下级军官，他们受过军事训练，打入国民党指挥机关和国民党的参谋部或高级幕僚部门，获得大量重要绝密情报，及时送给人民解放军指挥部门，可以说为解放战争立了大功。如孟庆元和朱晦生在鲁南战役中，都曾亲自向陈毅军长汇报过情报，因而取得了消灭九十七军的胜利。1942年，郭有义受八路军总部滕代远参谋长直接派遣，隐蔽在开封敌人心脏。他们根据领导指示，打入的越深、越高越好。如马良同志打入到敌人的执法队里，开封城门的钥匙掌握在他手里，使林一可以不通过检查进出开封；曾洁光当了一七七师的谍报员，有了这个证件就可以通行无阻了；还有的同志当了敌人的指纹检查员，可以不费力气搞到所谓“良民证”；申鸿庆当了售票员，可以随时帮助我地下人员上火车。其他如译电员，为我们抄录密电码；印刷所的工人，还为我们偷印了城防图等，还有照像馆等处，都有我们的人，为从事情报工作提供了立足和交通等方便条件。

周郁文在解放开封前，曾随中共地下党员王凌霄(开封城防副

司令)亲自“视察”城防,在战斗打响后,又随我部队当攻城顾问。华东野战军首长对开封地下情报工作表示满意,认为既准备又详细,既有死情况,也有活情况,在整个战斗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交通站和交通线

解放战争时期,敌我双方的兵力调动都很频繁,特别是豫皖苏解放区,基本上还是一个游击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冀鲁豫虽然是老根据地,但在一些边沿地带,经常有敌人的杂牌武装和还乡团袭扰。为了加强城市地下工作与解放区的联系,如派送过往人员,输送物资,传送紧急情报等,十分需要建立安全可行的交通站和交通线,这是我们在敌占城市工作中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事实也证明,在这方面有些同志确实为党立了功,同时,遭到敌人破坏的事件也比较多。

中共开封工委为了加强与冀鲁豫和豫皖苏两个区党委的交通联络,在日本投降后,曾经建立三条过得硬的交通线:

(1)开封——兰封——三义寨——冀鲁豫解放区的曹县;(2)开封——民权——陈庄——冀鲁豫解放区;(3)开封——内黄——游击区——解放区。这几条交通线都曾发挥过很大的作用,如郭有义、曾洁光和胡万杰的家属,一些进步学生,以及豫皖苏城工部的同志等等,都是从这里安全通过的。在敌人严密封锁和关卡林立的情况下,坚持两年多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后来陈庄被敌人包围,站长陈应三和一个交通员上房与敌人打了一夜,第二天安全撤出,但陈应三因此积劳成疾而病故。在这几个交通站的掩护下,输送了大批的军用物资和过往人员,虽遇到一些危险,但始终没有遭到破坏。

另外,还有一条通往豫北到安阳的交通线。在护送进步学生到太行解放区学习时,带队人被捕叛变,牵连到开封地下党组织,以律师为掩护长期在开封做地下工作的胡万杰被捕,英勇牺牲。

此外,许天民于1941年起,在周口筹建永大皮件庄和在徐州建立的中华盐号,也对特别党支部和中共徐州工委起到很好的掩护作用。在极端秘密和经济困难的条件下,有了这样一个合法的、不为敌人注意的联络点,作为我们地下同志经常接头和落脚的地方,这是非常必要的,通过这两个商号,还团结了一些行商和坐商,使我们有了合法掩护,来往活动于敌占区感到非常方便。1946年5月,中华盐号被敌人包围,许天民等7人被抓去,但因没有搜出证据,敌人又释放了他们。

李冠卿等领导下的工委,为了打通豫皖苏和冀鲁豫两大解放区之间的交通联络工作,牢牢地控制民权县西部跨越陇海南北的仁和区的政权和武装,成为两大解放区之间的一块灰色根据地,每个联保主任都换成了我们的党员或进步分子。为了打通开封至商丘之间的秘密交通线,他们还在铁路警察中发展了共产党员,为地下工作来往活动提供了方便。

成绩、错误和体会

我党在敌占城市的工作,是按照中央关于《对城市工作的指示》进行的。每个地下工作同志对“长期隐蔽,等待时机”,“里应外合,夺取城市”的方针,心中都比较明确,不因为一时的工作胜利或战争胜利而过早的暴露自己。在敌人心脏里活动,必须把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结合起来,把非法斗争和合法斗争结合起来,把上层工作与下层工作结合起来。党的这些重要指示,深深地印在同志们的心里。如曾洁光为了找到职业掩护,当过妓女检治所的事务员,当过一七七师的谍报员,还当过南关镇公所警务员,只要工作需要,什么都可以干。李冠卿为了取得可行的情报和策反工作,两次深入虎穴,一次是到刘茂恩公馆,一次到名妓桔红家谈判,取得了可喜的效果;许天民以商人身份,活动于敌人的心脏,因而对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长期没有被敌人所察觉;朱晦生曾经以“俘虏”身

份,在徐州前线7次向我指挥部报告敌军情况;马良曾经5次携带敌人的谍报证向我解放区送交密电码…这不仅说明他们对党的革命事业是无限忠诚的,而且在工作方法上能做到胆大心细、机动灵活,十分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接受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共在白区工作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地开展了敌占区城市的工作。

在发展共产党员方面,根据敌占城市的具体情况和工作需要,确定发展对象和批准权限。如张以诚、崔士学等同志,他们工作在敌人的特务组织里,所以了解到的情况较多,得到的情报价值比较大,对地下活动的同志帮助也非常大。无数事实证明,他们是我党地下战线的好同志。又如孟庆元等同志,是从东北来的、不愿当亡国奴的大学生,立志要到延安抗大学习,朱晦生留下他们在郑州搞地下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孟庆元在徐州前线向陈毅汇报重大军事情报,陈毅立即派干部随他打入敌军内部,在鲁南战斗中立了大功。

另外,对敌人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积累和掌握的资料也比较多,所以在接管城市时做出了成绩。如对敌伪资财清查和对暗藏敌特的搜捕,以及在社会治安和恢复生产方面,都加快了步伐。但是,解放战争的迅猛发展,出乎地下工作同志的意料之外,所以在里应外合方面的工作,做的还不够及时,配合还不够密切。

这个时期最大的事件是胡万杰、查禄鑫同志的牺牲。还有朱晦生同志是在通过敌占区时牺牲的。这两次破坏问题都出在交通线上。还有朱建国等五烈士是在北平组织遭受破坏时受到牵连而牺牲。李冠卿、李铁林的被捕,未造成组织上的重大损失。他们在狱中表现很好。

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在河南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斗争是卓有成效的,地下工作者默默无闻地为党工作,作出了贡献。活着的同志值得后人敬仰,死去的烈士更将永远被我们怀念。

南进支队敌军工作概况

耿增泽

敌军工作是我军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进支队在对敌伪顽斗争中,很重视这方面的工作,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值得记载下来。

南进支队 1940 年初组成后,以原冀中一军分区政治部敌军工作科为基础,又陆续调进一批干部,组成了敌军工作科,负责组织和开展全支队的敌军工作。科长:一任靳树鸿,二任冉世英,副科长耿增泽。先后在科内任干事的有王玉奎、冯彤、郭海、张忠一、张鸣林、冯玉杰、傅金钟、常恒玉、穆连璧、张建中等。这些同志多数受过短期专业训练,有几名干事还通日语,通日语的有韩宝琛和在日本留过学的吴策。

支队所辖各团政治处,在 1940 年设敌军工作股,配备股长 1 人,干事二、三人,营设敌工干事 1 人;1940 年冬,撤销了团敌工股,改设干事 1 人,营的干事也撤销。在团、营任过股长、干事的有任允中、程洲等。连队有敌工小组,是兼职。

南支到达冀鲁豫地区后,为开展对顽、伪军和伪政权的争取瓦解工作,选择向冠(县)堂(邑)地区和清(丰)东地区派出两个工作组,每组三、五人,在顽、伪军政人员中发展建立关系,开展争取工作。根据当时斗争形势的需要,支队先后组织了 3 支武装工作队,由敌工科具体指导,派往敌我斗争尖锐、敌人分割严密的游击区和敌占区活动,配合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权对敌开展政治攻势,控制顽伪基层政权(村、保、乡公所、维持会),开展敌占区的群众工作,建

立地下抗日组织和秘密抗日武装。支队政治部选派敌工干部参加了冀鲁豫军区组织领导的反叛委员会的工作和对国民党部队的统战工作。

在南下讨逆进军中和在冀鲁豫地区活动期间,敌军工作都搞得比较活跃,取得了显著的成果。概括起来,进行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在部队内部进行敌军工作宣传教育

开展敌军工作,在部队内进行宣传教育是一项重要的任务。指战员对分化瓦解敌军的重要意义和对敌政策的认识正确与否,对开展敌军工作关系极大。因此,宣传教育的内容,首先着重我军历来重视敌军工作的优良传统和分化瓦解敌军的重要意义,再就是对敌军的政策,以及有关业务知识,如何进行战时对敌喊话,如何处理俘虏,教会常用的瓦解日军的标语、口号等。当时部队政治教材中编有敌军工作方面的专题教材,供连队上政治课时讲用。部队在战前政治动员中,都讲解敌军工作和有关敌军政策。敌工科经常编印对敌、伪、顽军进行宣传的标语、口号、传单和其它宣传材料,供部队书写标语和战时对敌喊话之用。还开办了专门学习日语的短期训练班,派请日本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到营、连教日语口号和日语反侵略歌曲。连队敌工小组和一部分干部战士都学会瓦解日军常用的日语口号。

(二)战时敌军工作

在战斗中开展对敌军的争取瓦解,进行政治攻势,是极为重要的活动。要做得有成效,必须善于把握时机,而最好的时机,是当敌军被围、面临被我消灭的时候。在这点上,我们有过不少成功的实例。1942年秋,南支二十一团攻克娄集据点的战斗中,当我突击部队冲进敌据点,敌炮楼燃起熊熊大火时,敌工干事吴策同志及时发

起组织对敌军喊话,宣传我军政策,令其缴枪投降,这些自吹效忠天皇的“武士道”们,除被击毙和烧死者外,有两名日军士兵把枪从炮楼顶上扔下来,表示缴枪投降,我战士即时在炮楼上竖起一根长杆,日本兵顺杆滑下,做了我军俘虏。战斗胜利结束后,我军为了继续扩大政治影响,动员群众将敌尸体送往敌中心据点仙庄集,敌尸体上附上我军传单,日军中队长写信给我军指挥员,说尸体收到,并表示谢意。

对顽、伪军作战中,在对敌施以军事打击之后常常附以政治攻势。我军指战员都能主动选择时机对敌喊话,有时打一阵喊一阵:“缴枪不杀、优待俘虏、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声,此起彼落,喊声不绝。在同顽、伪作战中,特别是打围歼战,每次战役敌人都有不少缴枪投降的,有的是成批成队的缴械投降。如1940年3月卫东战役,南支部队攻占六塔集西进至五仙镇附近遇王金祥残部,经对敌喊话就放下了武器,我军无一伤亡,俘敌150名。又如1941年秋,十六团在堂邑县境连续攻占敌伪据点10余处,许多据点是敌人下书举旗投降,不战即克的。这都是对敌实施军事打击之后,又适时进行政治攻势的结果。

(三)俘虏处理工作

对待俘虏,讲究政策,是我军的优良传统,是我军每次作战的一项重要任务。凡进行大的战役,支队在战前都组成俘虏收容所;小的战斗随时组织处理俘虏。参加这一工作的多是支队和团的政治工作人员。俘虏处理通常进行四项工作:一是审查,把被俘人员的原来身份审查清楚。顽、伪军常常伪装士兵或伙夫、马夫、文书而隐瞒其身份,由于反动军队中官与兵的严重对立,通过俘虏士兵不难查清军官的身份,常有士兵主动检举军官的事。俘虏军官和士兵既经查清,即及时隔离分住,以免军官煽动士兵或从中捣鬼。二是对俘虏进行教育,揭发敌军的反动本质,宣传我军的宗旨和俘虏政

策。消除恐惧和顾虑。进行这一工作的形式,或上大课,或个别教育,都做得十分耐心。三是对俘虏在政治上、生活上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已经放下武器,坚持不杀不辱,不搜腰包,并在生活上予以优待。四是分别处理,愿留者欢迎参加我军,愿走者发给路费、开路条,释放回家,有的也可返回原所在部队。由于我军一贯坚持优待俘虏,不杀不辱俘虏,不搜俘虏腰包的政策,就不断扩大了我们的政治影响,对分化瓦解敌军起了很大作用。

(四)对伪军伪政府人员的争取瓦解工作

为开展南进支队活动地区的伪军伪政权的争取瓦解工作,1941年敌工科在堂邑、清丰地区派往了两个工作组,主要工作对象是驻堂邑地区的伪齐子修部、清丰地区的伪军和两濮(濮县、濮阳)地区的顽军。主要工作是选择顽、伪军政人员中民族观念较强,通过秘密联系,进行抗日民族教育,建立工作关系,或利用矛盾,分化瓦解。要其身敌营,暗助我军,秘密进行抗日活动,如为我军搜集军事情报,掩护抗日工作人员进入敌占区活动或通过敌封锁线。待机里应外合,反正投诚,配合我军作战。当时伪清丰县警备大队张裕元部有一文书李祥亭,同我清丰工作组建立了联系,李在伪军、伪组织内部和县城关群众中又联络了一些人,同我工作组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派秘密交通传递情报,工作成绩显著。1944年清丰县城解放,李没有暴露身份,转到大名伪军中继续工作。经过培养和锻炼,李祥亭同志后来成为我党的干部。又如,驻堂邑县伪军栾省三部所属副团长杨某,1941年同我建立了工作关系,是年8月配合我十六团攻克堂邑吕集等据点战斗中,起了一定的作用。战斗结束后,杨某投诚我军,被安排到我堂邑县大队任副大队长。1941年,敌工科还物色了南支政治部民运干事刘乃武(刘世英)同志,经支队党委决定,通过刘世英的长兄刘世荣(当时在国民党四十军任师长,后任该军副军长)的关系打入顽军内部,虽然

由于战斗环境失去一段联系,但刘世英同志在顽军内部仍主动进行工作,发挥了作用。

(五)组织武装工作队

1941年,日寇对其占领区推行“强化治安”,对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分割蚕食,妄图巩固其占领区,“以战养战”,集中力兵,摧毁我抗日根据地。为了打破敌人的“囚笼政策”,战胜敌人,适应斗争形势,加强对敌政治攻势,南支先后组织了3支武装工作队,派赴敌占区和被敌人分割的游击区活动。以支队为主组成一队,郭海、刘亚东、耿增泽等先后任队长、政委;以二十一团为主组成一队,曹友荣、张少英任队长政委;以十六团为主组成一队,程洲任队长。每队有队员10余人,是由部队中选调的班、排长,副指导员、政工干事、宣传员等组成。外出活动时另配属一个武装排或班。具有短小精悍、机动灵活,既能打仗,又善于做群众工作、敌军工作和除奸工作的特点。

武工队的任务是配合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地方政权同敌人进行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斗争。如发动和组织敌占区的群众,打击小股敌人、铲除敌特汉奸;对敌伪顽军进行政治宣传和分化瓦解;搜集军事情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

这3支武工队先后派往冠县、堂邑、观城、朝城、清(丰)东、昆吾等地区,主要进行了如下活动。

(1)经常活动于敌占区,书写标语、张贴散发传单和对敌喊话。标语多是写在敌伪据点附近,敌占公路两旁建筑物上,传单贴于墙上、树上、电杆上或撒到公路上以至敌伪据点门外。这种活动在清丰等地区十分活跃,常常在一个夜晚,武工队分成若干小组到敌据点周围活动,次日天亮,敌据点所在村庄、敌占公路及其附近,标语、传单到处都是。这对当时主力部队难以活动到的敌占区和游击区群众是很大的鼓舞,对敌伪军、伪组织则起了镇慑和瓦解的作

用。

武工队还常到敌伪据点外围对敌喊话,也叫做给敌人上政治课。对伪军喊话,武工队员都可以进行,对日军的喊话,多由日本反战同盟的日本朋友进行。反战同盟的黑田勇男等,常随武工队活动,由他们对日军喊话甚为有效。1942年夏天,对清丰县山柳寨日军据点(驻日军一个班)曾进行多次喊话,敌人初则打枪扰乱,第二次喊话时日兵便不打枪,静静听我们“上课”。反战同盟的黑田和敌工干事韩宝聚还给驻山柳寨的日军写过一封信,除对其进行反战宣传外,还提出同他们交朋友,要求日军在我部队或地方工作人员通过敌封锁沟时不打枪、不阻扰,以后果然生效。武工队还通过山柳寨村维持会长的疏通,驻山柳寨的日军竟卖给我军子弹数千发。后来维持会长向我们反映,自武工队进行了上述活动以后,驻山柳寨的日军士兵普遍想家厌战,士气低落。

对伪军来说,经过“上政治课”以后,效果更为明显。伪军中开小差的、同我建立联系的,由家属传信,说她的儿子干伪军是迫不得已,一定不做坏事,希我军谅解的,同我军作战时朝天放枪的,都发生过。

(2)召开敌战区的伪村长、维持会长开会,向他们讲解抗战形势,进行民族气节教育。在他们中间发展抗日的两面派,要他们不许坑害百姓,表面应付敌人,暗中帮助抗日工作。清丰县城东五里有个五里屯,武工队常到那里活动,维持会长同我们建立了联系,给我军传送情报。又如,我二十一团攻克娄集据点时,就是通过娄集维持会长将敌据点的情况和日军活动的规律了解的一清二楚,我突击部队在头天晚上即进入离敌据点百来米的维持会院内,次日天亮伪装维持会派“民夫”给炮楼送水而向敌发起攻击的。

武工队还在敌占区召开群众会,宣传抗战形势,教群众如何应付敌人,一般都在天黑以后进行,时间不长,讲完就散,不给群众增添负担和顾虑。

(3)在伪军内部发展建立了一批工作关系。他们向我军提供情报,配合我军作战。如1941年十六团在攻克堂邑县吕集据点战斗中,登城云梯几次架不上去,守城伪军帮我突击部队把梯子拉上去,还给扶好,使我突击部队顺利登城,全歼敌军。

(4)打击小股敌人,进行一些小的战斗。1941年冬,伪军齐子修部在堂邑县桑镇新建据点,武工队曾多次对敌进行袭扰,搞的敌人心神不安。桑镇北面五、六里路有个项里村,武工队在这里遇上了从桑镇出来的催粮队,击毙了敌催粮官,缴手枪一支,催粮队狼狈逃窜,对于那些坚决与我军作对,残酷迫害群众的“铁杆”汉奸,则设法把他除掉。当时冠县、堂邑地区的伪军、伪组织对武工队甚为惧怕,流传伪军吵咀咒骂对方时说:“你小子别逞能,出门碰上八路武工队,没有好死”。

1943年,盘踞朝城的伪军文大可部四出骚扰,威胁我冀鲁豫、冀南两区联络通道的朝城、莘县地区。支队把曹支荣、张少英带领的武工队派往朝城西地区。他们经常深入敌区活动,开展群众工作,开展文大可部争取瓦解工作,打过几次小仗,甚为活跃。

(六)日本反战同盟的工作

日本反战同盟的黑田勇男和1942年在清丰张林子战斗中俘虏的日本士兵×××、娄集战斗中俘虏的×××(以后均加入日本反战同盟),一直在支队敌工科随军活动。他们协助我军做了很多工作:在部队开办日语训练班,深入到团、营教我指战员对敌喊话,编写对日军宣传的标语、传单,随武工队到日军据点喊话,对日军俘虏进行教育等等。经过我军教育,他们都有一定的政治觉悟,同我军一样过着艰苦的战斗生活,他们跟随我军活动,犹如我军战士。

1942年9月27日,日寇对冀鲁豫腹心地区进行大规模扫荡,黑田勇男等三位日本朋友随支队直属机关在范县地区被敌包围。

几次突围未被敌冲散，3位日本朋友都各持几枚手榴弹同敌人战斗，誓死不作俘虏，拉响最后一颗手榴弹，英勇殉难。几天后，支队政治部派敌工科张鸣林同志在范县某村掩埋了日本朋友的尸体。

* * *

在对敌斗争中，敌工战线锻炼出一批优秀干部，他们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不怕危险和困难、勇敢、坚定地进行斗争，有的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英勇牺牲的有冉世英、冯玉杰、傅金钟等同志。

冉世英同志在担任敌工科长时，对工作极端负责任，作风朴实，作战英勇果敢，在“九·二九”反扫荡中，不幸壮烈牺牲，牺牲时年仅23岁。1942年10月初，清丰工作组的冯玉杰、傅金钟同志在驻地留固王被敌包围，突围中被敌俘去，冯玉杰同志在清丰县城英勇就义。傅金钟同志牺牲在敌监狱中。他们都是对敌隐蔽战线上牺牲的无名英雄，应当永远铭记在我们心里。

抗战初期敌伪军工作回忆

畅宏碧

1938年8月,我在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敌工部任工作队长。当时敌工部长蔡前,派我带工作队到独立游击队(即赵谭支队,住山西陵川平城一带)帮助工作。后工作队留在部队,改建为支队政治部敌工科,我任敌工副科长。1940年初,独立游击支队改建为二纵新三旅,我任旅敌工科长。

根据野战政治部敌工部的指示,在安阳和新乡的敌占区,建立秘密的瓦解敌军工作委员会,进行分化瓦解伪军伪组织的工作,并开展对日军的宣传工作。

对日军主要是开展日语宣传,对敌军的必经之路书写“优待俘虏,缴枪不杀”等日语口号,教育部队都学会几句战场喊话,并通过秘密关系把宣传品带进城,秘密散发。有一次,宣传品被敌人收到,十分恐慌,还实行了戒严。

通过关系,争取瓦解伪军伪组织。在安阳与皇协军李英部二团团长张实化建立了工作关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情报,并给予我们一些方便。安阳伪青年团团团长赵宪章,原是我县长,被捕叛变,要求与我来往,立功赎罪,保证不做坏事。

1940年住在河南滑县浚县的伪和平建国军24路路朝元部,是国民党军投降日军的,该部的参谋长王斌,在我抗日武装太行南区游击队干过。通过关系与我联系并积极要求早日反正。为了争取瓦解这支武装,冀鲁豫军区杨得志司令员和新三旅政委谭甫仁决定我和民运科长宋殿宾打入该部做内线工作。打入后,宋殿宾委

任为上尉秘书。我以陈宾如的化名委任为少校参谋，对该部的编制兵力、装备、行动等做了详细的调查，大部分都报告了部队。但该部的路朝元和王斌的矛盾很深，争权夺利愈演愈深，发展到王斌从开封开会回来的路上被路朝元暗杀，我们打入的人员则及时的秘密撤出。

鲁西北的敌伪军工作

杨大伦

冀鲁豫三分区于1943年7月划归为冀南军区七分区,但人们一直习惯地称这个地区为鲁西北,从地理位置上讲,临清、高唐、夏津等县也应属于这个地区,实际上七分区管辖的地区只是冠县、莘县、武训(堂邑)、聊堂边(聊城西)、南峰县(朝北)、永智县(原馆陶县河东地区)以及清平县的一部分。

一、鲁西北敌伪顽军的特点

这个地区是老抗日根据地,党的基础较好,早在二十年代后期三十年代初,就有了共产党组织的活动,“七·七”事变后,党的组织有了更大的发展,抗日的民先组织,农、工、青、妇等群众组织很快建立起来,群众发动充分,抗日救国热情高。由于地处冀鲁豫三省交界,日伪统治力量相对薄弱,县城一般驻有一个日军中队(聊城经常住一个大队)和若干伪军中队以及伪警察等人员,城外据点碉堡即由伪军看守,在日军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合围扫荡时,他们才配合日军向我根据地骚扰破坏,抢粮抓人,平时即多是小股人员,在边沿区活动,不敢轻易单独深入到根据地来。

鲁西北地区除日伪军占领县城和主要交通要道碉堡据点外,还有一部分强大的顽军力量,对我根据地危害极大。原国民党抗日将领范筑先将军,1938年11月在聊城牺牲后,其所属部队一部分在共产党领导下改编为八路军,其余大部叛变,各据一方,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如盘踞在冠县桑沽镇一带的山东保安十一旅齐子

修,堂邑吴家海子一带的三十一旅吴连杰,聊西沙镇一带的六旅王魁一,还有清平、博平一带的七旅薄广三,朝城的文大可等部,他们勾结日伪军,专门对付共产党八路军,对人民群众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抢掠群众财物,抓捕杀害抗日工作人员,甚至对我派去的联络谈判人员也加以杀害。1943年6月我方派出荣连超同志,找吴连杰谈判联合抗日问题,荣是堂邑县人,曾任独立营长,分区军法处长等职,在群众中有较高威望,和吴连杰也有些私人交往,他到吴家海子去找吴,其兄弟吴连祥伪称吴连杰到附近的后哨营去了(实际上他常住临清),荣到后哨营村时,遇上刚从清平窜来的薄广三部队,随即被他们活埋。有的说被吴连杰暗杀了,一直没有下落,但肯定荣连超同志被这批顽军残忍的杀害了。

日伪顽相互勾结,共同反共是一致的,当然由于他们相互间的利害关系,也有一些矛盾,这就形成我们一方面对日伪顽斗争的复杂性、艰巨性,需要对他们的多面作战,一方面则可利用他们的矛盾,打击坚决反共作恶分子。争取中间动摇分子的有利条件。

二、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敌伪军工作

争取瓦解敌伪军工作,是我军政治工作中巩固部队、团结群众、瓦解敌人三大内容之一,军队各级政治机关都设有敌工部门,军区设敌工部,军分区设敌工科。实际上由于对敌斗争的需要,地方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也都积极的利用各种社会亲属关系,在敌伪内部发展关系或派遣党员打入敌人内部,获取情报,开展隐蔽斗争,这样就形成了分散地多头地进行工作。为了对付敌人开展的“治安强化运动”,根据区党委“关于加强目前敌伪军工作决定”的精神,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地、县两级设立了敌工委员会,由党、政、军、民负责人共同组成,统一领导,避免了过去多头分散现象,具体工作由分区敌工科负责。我是1943年8月调到冀南第七军分区政治部任敌工科长的,当时副科长何郁亭,以后何到太行山

参加整风学习由王鲁际继任，设日军干事，伪军干事，有侯冰枫、韩鸿林、杨海峰、邢邦典、孙善鸣、范利民，司务长邱保德和工作人员、通信员、炊事员若干人，还有位老同志郭策，他过去曾在专署、县任秘书，在敌工科仍称秘书，负责总管日常工作。为便于和各县敌工站的联系和领导，在冠县桑河镇附近设有科的后方，敌工科属分区政治部建制的一个科，实际上又多在地方上活动。

各县敌工站受各县委和分区敌工科双重领导，活动经费和粮票由分区供应。站的主要领导和工作人员由分区派出，部分干部由地方抽调。冠县负责人是董华、许锡三、刘振先；莘县是陈洛、曹斌、刘协俊、傅光、郝鹏；南峰县是宋雪峰、李树臣；堂邑是田志一、贾洪元、赵剑光、刘金河、闫保俄；永智县是程高峰等。各县根据敌伪据点分布情况派遣工作员，发展掌握敌伪内部关系，进行争取瓦解工作。

三、宣传党的政策发挥政治攻势威力

敌伪军工作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整个对敌斗争，争取瓦解敌伪军，保证扩大抗日根据地。对部队主要是宣传执行党的敌伪军工作政策，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中的优待俘虏政策，不虐待不杀害俘虏。教育部队战士学会几句简短的瓦解日军的口号，以便战场上宣传。到敌占区散发张贴宣传品。利用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的日本人，深入敌占区召开群众大会，现身说法，进行宣传，揭穿日军的欺骗谎言。

另一种更有效的宣传形式，即是正确的执行俘虏政策，凡在战场上放下武器的俘虏，除个别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不镇压不足平民愤者外，一律实行宽大政策，不搜俘虏腰包，不虐待俘虏，更不准杀害，经过一段教育后，愿参加八路军抗日的编入部队，不愿参加的，发给路费资遣回家。实际上有的回到了家又因种种原因回到了敌伪内部，这实际上成了我们的义务宣传员，因此一般敌伪人员都

知道我们对待俘虏的宽大政策,实践证明,不少敌伪军,在战场上被我军包围,在他们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放下武器投降过来。有的俘虏经过教育遣返回家后,改邪归正,不再给敌人干事。1944年8月1日解放莘县时,俘虏了伪县长兼警备司令刘仙洲,考虑他无直接杀害我抗日人员恶迹,决定经过教育后释放,分区司令员赵健民、政治部主任于笑虹亲自接见并请他吃饭,他一再感谢不杀之恩。他为什么这样害怕?他被俘后,我们带他到王化据点喊话,他体态肥胖行动不便,给了他一匹乘马,趁我麻痹大意,突然策马逃跑,后又被我抓回,生怕我杀掉他,并表示回去后决不再当汉奸,不和共产党作对,临走时送给他一个拐杖,实际是一根简单修整了一下的木棍,据说他到济南后,将此棍当成纪念物,没有再当汉奸。解放战争开始,国民党进入济南,他也没给国民党做事,解放后有人见他在某地开过茶馆,据莘县老百姓反映,有人见过他,一提是莘县人,喝水不要钱,以表示对莘县老百姓的谢罪。

配合军事行动,兵临城下争取敌伪人员投诚起义,也是敌伪军工作的重要内容。1944年我军集中主力消灭了顽军吴连杰的主力黄竹斋团近两百人,立即引起敌人恐慌不安,住斗虎屯的程子方团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过去曾投靠过堂邑的日军,后因不得信任,又拉出来投靠吴连杰,与吴连杰又有矛盾,想投靠共产党又因曾有投靠日本人的恶迹,顾虑重重,其住地附近又是重灾区,部队没有吃的,我抓住其动摇时机,派人联系,多次进行争取工作,终于1944年6月率官兵起义,改编为我堂邑独立团,分区派李振北为副政委(县委书记兼政委)邢先觉为副团长,这支部队在鲁西参加多次战斗,1947年升级正规军。1944年住吴家海子南边邓庄据点的宋凤歧团,仅一百多人,但修有炮楼壕沟,工事坚固,并有机枪,为减少部队伤亡,在我军围困下发动政治攻势,促其投降,后来他派副团长陈英和我们谈判,实际为了拖延时间,提出你们攻下吴家海子我们就放下武器,攻不下吴家海子就不投降,我们警告他攻下

吴家海子前过来算起义，攻下后再过来只能算无条件投降，他又推拖说个人作不了主，要和宋团长商议。第二天我们攻下吴家海子，并要吴连杰的马弁去喊话，加上我重兵压境，宋陈二人才放下武器率部投降。1944年8月1日解放莘县县城后，我们带领伪县长（兼伪警备司令）刘仙洲去西吴家、燕店等据点去喊话，告诉他们县城已解放，只有放下武器才有出路，在我重兵围困下，反复讲明利害关系，发挥战场喊话的威力，因而不费一枪一弹，就促使五个伪军中队全部缴械投降。

四、争取顽伪人员掩护我开展敌占区工作

在我公开军事力量暂时不能到达的敌占区，为开展地方工作，就要争取伪军伪人员暗地帮助抗日，教育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少做或不做坏事，不要坑害老百姓，开展“黑红点，算总帐”的宣传，讲明八路军抗日政府对伪人员都有一本帐，做了好事记个红点，做了坏事则记黑点，抗战胜利后再算总帐。对群众有义愤表现很坏的，还在据点围墙上或其家属门上贴出告示，警告他改邪归正。堂邑敌工站的联络员苏清风，1944年秋，到侯营据点，在围墙上、大街上贴了很多宣传标语，随后又向伪军喊话宣传，对敌人震动极大。他还带人到六合庄伪人员汪警察长的住宅，当面指责他做了哪些坏事。汪表示以后不再干坏事。过了几天汪就辞退伪职回胶东老家为民，不再当汉奸了。

有的则争取伪军头目建立关系或结拜个人盟兄弟，订立秘密抗日协定。堂邑县伪警备队副大队长张双岭，伪中队长李同合、王献臣、程亭山等人和我马颊河支队长李善亭同志同是堂邑县人，建立了私人朋友关系，以后又和敌工科副科长何郁亭见了几次面，交上了朋友，共同商议订立秘密抗日协定。他们保证不抓捕抗日人员，不袭击我抗日武装游击队，尽量减少对群众的骚扰，少给群众增添负担；我即保证不单独拔除其据点，抗战胜利后保证其生命财

产的安全。他们接到日军到根据地扫荡命令后,主动通知我们其行军路线,我即让开其必经之路,避免正面冲突。保持这种“和平共处”的局面,在当时敌强我弱,我公开力量暂不能到达的地区,实际上有利于我发展积蓄抗日力量,开展敌占区工作。

五、兵不血刃拔除据点

随着形势发展,要求敌伪军工作由一般的对敌伪军人员政治思想上的宣传瓦解,进一步从组织上配合军事行动,“兵不血刃,拔除据点”,因此就要在敌人内部,积极发展和建立隐蔽的抗日力量,培养革命“两面派”。一般的办法是采用“打进去拉出来”的两种形式,打入派遣工作就是选择适于在敌人内部活动的立场坚定的共产党员或革命群众,通过一些特殊关系,到敌人内部担任一定伪职,平时以灰色面目活动,长期隐蔽,以待时机。如莘县派出的共产党员范永堂到伪警备队,在两年以后的1944年8月1日解放莘县战斗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拉出来就是通过敌伪人员的亲属以及各种社会关系,晓以大义,讲明利害,争取和我建立关系,个别表现好的还发展成党员。当然司令部的情报部门,为了及时获取情报,也多采取这种形式,在敌人内部建立些关系,但敌工部门的内部关系和他们的任务不同,除特殊重要情况外,一般不要求他们送情报,以防止暴露身份,而是要他们多交朋友,积蓄力量,以待时机。

上面提到派进莘县伪警备中队的共产党员范永堂,经过两年多的活动,在伪军内部发展党员和进行大量的交朋友工作。1943年夏天,日军撤离莘县,只剩下刘仙洲的伪警备队,当时正是抗日进入反攻阶段,中央号召积极向敌人发动进攻,扩大根据地缩小敌占区,分区领导考虑能否首先解放莘县,于是找到范永堂研究能否里应外合解放县城,他表示可以并带侦察人员进城实地考察工事,绘制略图,范回城后召开党员和积极分子会议,传达了分区首长打

县城的决心及制定了相应措施。7月31日黄昏,二十二团,从张鲁集附近出发,经过徒骇河绕行向县城进发,基干团,马颊河支队向东北出发,警戒聊城方向敌人,县大队负责南门,并分割包围城外一些据点。城内关系按照预定计划,半夜在城西门迎接八路军进城,把中队长用酒灌醉,岗哨全由可靠关系担任,部队到达西门外时,用事先规定的手电灯光联系好后,城上用绳子系下两个人,首先打开城门外护城河的棚栏门,然后再打开城门的大铁门,可能由于过分紧张或其他原因,一时没有打开,部队已拥挤到城门前,只好按部队攻城第二方案,竖立云梯,爬梯入城,经过一番周折才打开大门,大部队随即入城,范永堂等人带领部队,按照当夜口令,顺利通过沿路哨位,直到伪县公署,伪新民会敌人才发觉,伪县长刘仙洲以下伪职人员全部被俘,基本没有漏网的,据守在东街原日军住地的伪军以及南门和魁星楼上的伪军企图顽抗,经过我军的猛烈进攻,均逐个攻克,城内战斗结束后,城外据点,在我军事威力震慑下,经过喊话政治攻势,也都全部投降。整个战斗不到24小时,我仅以伤亡10余人的代价,消灭俘虏伪军伪职人员2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解放了全县,这是在鲁西北抗日战争中,用一个分区的兵力,通过内部关系,里应外合,以最小代价解放全县,取得伟大胜利的典型战例。

另一个战例是1945年7月9日(农历六月初一)解放堂邑的战斗。莘县解放后,形势发展迅速,分区领导就决定下一步如何相机解决冠县、堂邑的敌人问题,当时冠县县城的敌伪军工作基础较好,而堂邑县城的工作基础相对差些,但敌人的力量却较强,城内住有一个日军中队,还有伪军保安大队,伪县警备大队和伪警察公署等伪职人员,在东关还有顽固势力江克敏的土围子,总兵力1000余人,城墙高三丈多,外壕宽丈余,注水一人多深,碉堡林立,在我没有兵器情况下采取军事强攻,显然难以取胜,也只能采取内线关系配合攻城的办法,在地方组织协助下,深入敌伪内部开展工

作,为解放堂邑县城作好准备。通过敌工科工作员楚增林的工作,选定了伪道保安大队三中队长邹荣川作为我们的工作对象。

邹荣川,莘县城内人,原是韩复榘部下的一个班长,在济宁与日军作战负伤后回家当了伪军,后升为副中队长,1944年解放莘县时被我俘获,释放后回家。原伪县警备大队副大队长刘立泉再次进莘县,他又参加了伪军,刘后又撤回聊城,任伪道保安大队长,邹荣川任三中队长,不久进住堂邑,莘县解放变为解放区,其亲属对我党政策耳闻目睹,邹是旧军队出身,为人正直讲义气,且家境贫困,邹本人又是被我俘获后释放的,对我政策也有切身体会。我敌工科工作员楚增林,原是伪警备队中队长,在伪军中与邹就有交往,又是同乡,即多次去邹家,做其家属工作,讲解抗战形势,宣传我党政策,指出其前途出路;其兄邹荣堂进堂邑将此消息传给邹荣川后,决定在东关某小铺与楚增林见面,从此和我们建立了关系,后来因楚曾在伪军工作多年,伪军中熟人较多,怕去多了暴露身分,即改为由原莘县敌工站刘协俊与邹保持联系,邹多次表示:“共产党需要我干什么就干什么,决不含糊。”当我们试问他能作些什么时,他说我有三个排,一个在大队部,两个在城楼上负责北门至东北角一段警戒,如从此登城,保证配合不打枪,请放心好了,我让楚增林、刘协俊亲自向分区领导作了详细汇报。此时抗日形势正在迅速发展,敌人妄图收缩兵力,继续负隅顽抗,就把住堂邑的一个日军中队调到聊城,这样堂邑城内只剩下了伪道保安大队,伪县警备队,以及其他一些伪职人员,名义上由县长统一指挥,实际矛盾很多,很难统一起来,出现了我攻城的有利时机,分区领导决心攻打县城并要邹荣川做好内线配合的准备工作。

7月8日,刘协俊领受分区领导要打县城的任务后,当天由邹荣川父亲邹德乐陪同,黄昏后进入堂邑县城,邹根据分区交给的任务,召集部属心腹人员李景禹、王景合、李来玉等开会研究如何配合八路军登城的具体安排并要求:一是攻城前任何人不得离开城

墙；二是攻城时一律脱掉军上衣着白色衬衣为标记；三是八路军进城后，按分工带部队奔向进攻目标。原约定部队半夜登城，由于天黑路远，为防狗叫泄密需要绕过村庄行军，直到7月9日天将拂晓，我军才到达城下。经过灯光信号联络，部队架上云梯，迅速而有秩序的登上城墙，一部分由邹荣川及其部属分头带领，迅速向纵深发展，一部分去北门清除障碍打开城门，让大部队开进城内。此时已被西北角的伪军发觉，打起枪来，我军即予还击，枪声连成一片。城内大部伪军被我俘获，部分伪军依靠坚强工事负隅顽抗，未能攻克。此时天已大亮，聊城增援的日伪军已逼近城郊，我即撤出战斗。此次战争中争取一个中队起义，俘获伪县警备副大队长以下伪人员数百人及缴获大量武器装备。敌工干部刘协俊同志在向伪军喊话时不幸中弹，流血过多牺牲。

邹荣川的内线配合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他的身份已暴露，再回伪军内部已不可能。当时我征求他的意见，以后有什么打算？他说家住城内，人口多离不开，个人有点文化，想在县城教书，就给他开了证明，要人民政府给予妥善安排，随即在本地当上了教员，解放后政治运动连续不断，三反五反，镇反肃反一个接一个，运动中有人揭发他当过伪军中队长，他说他是起义的，并有分区政治部敌工科开的证明，可是翻找证件时不知什么时候早已丢失了，他提出我是他的证明人，可我于1945年日本投降后就去了东北，先在陆军后到空军，和老根据地多年没有联系，他不知我的去向，也提不出可行线索，在没有人证物证的情况下，就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判刑三年监督劳动，当然教员也当不成了，家庭也受到连累，直到1981年才打听到我的消息并与楚增林一起到兰州找我，讲述了他的不幸遭遇，我给他开了证明，人民政府才撤销了给他的刑事判决，摘掉了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恢复了他人民教师的职务。1983年我调济空工作，1984年他已70多岁，身体还好，带着他的儿子到济南去看我，一再表示感谢党的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政策，实事求

是，恢复了他本来的历史面貌，过去虽经历了一段坎坷不平的道路，现在已过上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只要过去历史得以澄清，也就心满意足了。

堂邑战斗后，分区领导也曾考虑过内线关系，解决冠县问题，但与解放莘县、堂邑情况不同，前者都是日军撤走后进行的，冠县敌伪军工作基础虽较好，但仍住有一个日军中队，情况就复杂的多，为探讨攻城的可能性，需要与内部关系具体研究协商，并了解城内敌人的工事部署等情况，经政治部于主任同意，我决定亲自进城走一趟，我身着便衣化装为小学教员，头天晚上到城南五里铺敌工站长董华家里，第二天早饭后，由我们的内线关系伪警备队小队长宋玉修带领进城，南门由两个伪军一名日军站岗，一般情况下，伪军负责盘问搜查进入城门人员，日军不讲话，我们事前商量好，进城盘问时由宋玉修对付，我不轻易答话，到南门时宋先向日本人敬了个礼，同时向一侧的伪军主动说：“这是我的亲戚。”因为宋是小队长，又穿军装，看样子站岗的伪军可能认识他，很客气的点点头，没再说别的，我们就顺利地通过岗哨进到城内。

在南大街不远的地方，就是我们内线关系沙德馨家（又名沙二白，回族），宋玉修回警备队找来几个伪军关系，他们介绍了敌伪兵力布置，工事情况，表示愿意配合攻城，关键是日军掌握着城门钥匙，无法打开城门。这样即使有些部队爬云梯登上城，城门打不开，在部队不能迅速进城，日军发觉后不但战斗无法解决，进城部队还有被消灭的危险。原想在东城内看看敌人的工事部署，他们不同意并说街上很复杂，有便衣特务，你是外地人口音又不对，免得惹出麻烦。夜晚，查户口很严，必须天黑前出城，也不要带工事略图，免得出城被查获。宋玉修送我出城，顺利回到根据地，我把情况向于主任作了汇报，他讲城门打不开，大部队不能进城，要慎重考虑，条件不成熟，把握不大，也就没有采取军事行动。

本来冠县敌工站的工作基础是不错的，敌伪内部关系也不少，

有时竟达百八十个,当然其中也有不少一般性交朋友的关系,内线关系能否在紧要关头起作用,看来不取决于数量的多少,而在于有否机会条件,而且占据关键性的岗位,才能发挥必要的作用。

关于利用内部关系配合,拔除分散的碉堡据点的战例也不少。如聊城北的古庙据点,距县城不到20里,内部关系力量较强,听说敌人要把我们掌握的中队调到城东南去,内部党员李少卿找我们研究对策,县委决定拔除这个据点。1945年1月6日晚,由独立团程子方、李振北带三个连,到达预定地点,因灯光联系失效,李少卿从围墙爬下找到部队,然后又回去打开寨门,党员闫学旺的小队守住大门,我军顺利进入围子,其他伪军正在睡觉,还没有清醒过来,就稀里糊涂交了枪,唯有一个警察所住在楼上还想抵抗,我军警告他不缴枪即点火烧炮楼,刚要点火他们就慌了,立即把枪捆好放下来,前后不到两小时,就把伪据点干净收拾掉,不费一枪一弹,没有伤亡,获得全胜,俘获100多人,缴获各种枪支100余支。1943年至1945年,马颊河支队多次拔除堂邑境内分散据点,如支队长李善亭通过李乃武说服伪排长程孟安,趁伪中队长儿子结婚时大家喝的酩酊大醉,顺利解决了党冠公路上的闫营据点;通过伪军内部关系白凤太顺利攻克了郭关庙据点,还有拔除堂邑的谢家据点、田家据点、王盐场等据点,也都是经过内部关系配合进行的。

六、国际友人原广见

敌伪工作中的日军工作,因工作对象是日本人,由于民族隔阂,语言障碍,又无亲属社会关系可利用,工作难度自然很大,实践证明,要进行有效的工作,还是要更多的依靠被争取过来有了觉悟的日本俘虏兵。而我们主要是通过各种形式,进行一般性宣传工作,教育部队正确执行俘虏政策,对放下武器的日本士兵,一律不准杀害,不得虐待侮辱,在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情况下,还尽量找些细粮和鸡蛋改善伙食。教育部队战士学会几句简短的日语口

号,如日本弟兄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以便在战场上日军被包围时,进行宣传瓦解,减少其对立情绪和顽强抵抗。

再就是散发日文宣传品,说明日军侵略中国给中国人和日本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只有反对战争、结束战争,才能回国和家人团聚。宣传我军优待日军俘虏政策,揭穿其上级散布的八路军杀害、活埋日军俘虏的谎言,从思想上瓦解日军的战斗意志,提高其反战意识。散发宣传品的办法:一是由部队在战场上散发;二是通过邮局(靠边沿地区)向敌人内部邮寄;三是由各县敌工部带往敌区,再通过我们掌握的伪村长、伪情报员和我们内线关系带入敌人内部,或在敌占区张贴。实际上有些伪人员出于个人安全考虑,害怕敌人追查宣传品来源,怀疑其私通八路怕受牵连,往往又将我们的宣传品私下销毁,实际上真正落入日军手中的为数不多,因此我们更多的是经过“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后期改为反战同盟)中的日本人直接的口头宣传,现身说法。

日本士兵觉醒联盟冀南支部,是1941年8月在河北省枣强县卷子镇成立的,支部书记秋山良照,是日军三十二师团二一〇联队第一大队二中队机枪班的二等兵,1940年9月被我七旅二十团在堂邑城南郑家屯战斗中俘获,随后又有被俘的水源建次、成尺鬼彦、吉田、筱原、大谷等人,支部成员逐步扩大。为开展日军工作,觉醒联盟支部经常派出日本人,随分区敌工科一起活动。

原文见是派到我科的日本士兵觉醒联盟的盟员,1942年武城河西攻克十二里据点时俘虏的,据讲他是日本福冈县人,煤矿工人出身,上等兵,刚被俘时相当顽固,经过教育思想转变过来,文化不高,性情耿直,工作积极,能吃苦耐劳,懂得一些八路军的群众纪律,据介绍一次秋山良照见他吃东西,问他吃什么?他说是红枣,问他那里来的?他说是买的,追问他从哪里买的?他领秋山到村外树林里一间独屋内,那里放着许多红枣,但是没有主人,他说我到这里买的,把钱放在这里了,那里果真放着一些钱,经过教育的日本

人,能有这点觉悟,也就很不容易了。他能说几句中国话,我科有名日军干事侯冰枫,精通日语,这样可以互通思想感情,因而和中国同志相处,也很融洽。他除经常给城内日军写些争取信件和寄日文宣传品外,有时随我们一起到敌占区,通过地方同志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1944年秋季的一天黄昏,随我到聊城南阳谷县的坡里村,那个村子很大,人口多,有个天主教堂,社会情况复杂,情况属敌占区。我们考虑在这里开会影响大,当时没带翻译(日军干事),我们商量了讲话内容,拟定了一个大体提纲:首先介绍他是日本人,如何被征入伍来到中国,又如何被八路军俘获,然后讲他如何开始觉悟了,参加了觉醒联盟以及联盟的任务性质,最后讲八路军的俘虏政策和他们现在的生活情形。他讲一段日本话,我讲一段中国话,那个地方的人们见过日本人,也见过八路军游击队,但从没见过八路军中的日本人,因此震动很大。以后有人竟称我是杨翻译,其实我的日语水平是很成问题的。消息很快就传到城里,说坡里去了许多八路军,还带着好几个日本人开了个群众大会,其实只有我和敌工站的同志两个人和原广见一个日本人,不知怎么就由“两个”八路军变成了“许多”八路军,一个日本人变成了“好几个”日本人,总之这次宣传,现身说法反映不错,效果也好。用现身说法,实际活动揭穿了日军上级宣传的八路军杀害日本俘虏的谎言。

原广见和敌工科人员,住在冠县农村段庄,他穿着便衣和中国人基本分辨不出来,但老乡们都知道他是八路军中的日本人,他能讲几句中国话,也能和老百姓友好相处,见面相互寒暄,好像本村普通老百姓一样。1943年鲁西北遭到几十年未遇的自然灾害,部队提出生产自救,1944年敌工科也分了一块土地搞生产。原广见要求和我们一起参加劳动,当时生产工具就是犁耙、锄头、镢头,没有牲畜,耕地种地都是用人拉,一张犁耙需要三四个人才能拉动,他就和大家一起拉,他很卖力气,肩膀被绳子勒肿了,流了血也不叫苦不休息,还很风趣地说:“我的牛的一样”,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夏秋天气,最讨厌的是蚊子、苍蝇,还有臭虫。农村当时没有蚊帐,没有灭虫药品,有时只好点燃蓬蒿驱赶,但对臭虫没有办法。有一天他反映晚上臭虫咬得休息不好,有个同志建议说房东家有个棺材,可否睡在里面;有的说与他商量一下试试看,日本习惯是火葬,对棺材这东西是象征吉祥还是凶恶,并不象中国人那样厌恶。一商量他就同意了,他个子不大,躺在里面宽绰有余,上面盖上被单,既可通风又防蚊咬,又没有臭虫、跳蚤,第二天问他休息的怎样,他说“顶好顶好的”。他和我一起生活工作将近两年,后来他患了肝病,实际上已到了后期,出现肝硬化浮水,肚子鼓胀起来,他还很乐观地开玩笑,指着自己的大肚子说:“我的婆娘的一样,小孩里面的有”。当时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也没有好药,大家也不懂究竟是什么病,只能供给他一些白糖吃。后来病情逐步严重,就派小鬼(公务员)赵本道陪同他去分区后方医院治疗,1945年春天病逝在莘县王奉集镇寺上村的医院。1987年10月下旬,我回老根据地鲁西北,由莘县县委书记金维民、县武装部长解广荣、组织部长李体元、副部长尹蕙芹、党史办副主任陈海林等同志陪同,回到王奉集寺上村,访问了原支书王好信,及亲自埋葬原广见的许言青、王进保几位老人,说他们村上医院住过一个日本人,小个子,能说几句中国话,为人和气,可惜以后病重医治无效死去,和中国死去的伤病员一起埋葬在村南的空地上。我看了坟墓的具体位置,并建议当时在场的莘县负责人和王奉集镇的领导,要为这位帮助我们抗战的国际友人,树立一块石料的或水泥的墓碑,以表示我们的怀念并做为将来一旦日本国内亲属寻找遗骨的标志。已过去多年,我没有再回去,也不知是否已经落实。我也曾托中日友好团体帮助寻找其国内亲属,将其遗骨迁回他的祖国故土。但据说当时被俘日军士兵,都不愿说出自己真实的经历情况,因为他们认为当了俘虏不光彩,不愿让自己的父母、兄弟、邻居亲朋知道,因而多数人编造了假的姓名、籍贯、经历,这就增加了继续寻找原广见亲属的困难。这位埋

在中国土地上的国际友人原广见虽然已离开我们半个世纪,但仍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七、经验教训

鲁西北敌伪军工作开展得比较活跃,也有成效,主要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充分调动发挥了党、政、军、民、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特别是发挥当地有影响人物的作用。各级领导同志,不仅领导而且亲自参与做敌伪军工作,事实证明许多伪军伪职人员,重视江湖义气,他们相信本地有威望的领导人,远远超过对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的信赖。如分区司令员赵建民,马颊河支队长李善亭,还有其他县、区领导同志,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发展敌伪关系或打入派遣工作,上面提到的争取吴连杰部队程子方团的起义和堂邑伪县警备副大队长、中队长等人订立秘密抗日协定,都是他们亲自进行的。

日军投降后,抗战胜利了,做为日军爪牙的伪军,本应立即把部队拉过来,投诚反正,可是有的伪军却表现异常,过去认为和我们关系较好的伪军,也和我们坚决对立了,如与我们订过秘密抗日协定的中队长李同合,变得非常顽固,甚至扣留我们派去谈判的代表作战股长高喜增,堂邑敌工站长田志一,企图作为人质拒不投降。聊城县有的伪军关系也变得很坏,因此我们被迫采取军事行动,实行强攻,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伤亡。究其原因,主要是我们对国民党在敌伪内部散布的曲线救国论的流毒,对伪军中的正统思想估计不足,在与国民党争夺敌伪军工作上缺乏针对性和有力措施,这是个深刻的教训。

秘密交通线上的斗争

王化棠

冀鲁豫边区,是我华北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南部屏障,是连接华东、华中通向太行山区而达延安党中央所在地的桥梁,是日、伪、顽同我激烈争夺的要冲,因此在整个抗日战争中,这里的斗争形势十分尖锐复杂。特别是冀鲁豫西部地区,突出于平汉铁路东侧,对日本侵略军威胁很大,日寇为了“确保”其占领区,维护其铁路交通,对我根据地西部地区进行“反复扫荡”,“梳篦式清剿”,实行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0年以后,日寇在平汉路两侧和卫河沿岸大量增设据点,挖壕筑堡,对我根据地实行层层封锁、纵横分割,妄图阻止我军进击,切断我冀鲁豫同太行山两大根据地之间的联系,斗争形势更加尖锐。1940年8月我冀鲁豫一分区政治委员闻允志同志带领部队赴太行山途中,在抢渡卫河时同日寇激战,不幸壮烈牺牲;另有我军一个团,由太行山开赴冀鲁豫平原时,也在平汉铁路西侧和卫河之间的汤阴县境内,遭到敌人袭击,部队受到很大损失。1941年4月,日寇对沙区(内黄县境之黄河故道)进行的一次大扫荡,把许多村庄毁灭掉,成批地屠杀我抗日群众,粮食、什物等被劫一空,还把防风固沙的枣林砍光,妄图绝我抗日军民的生路,使沙区的抗日斗争,处于极端困难之中。这种情况已经严重影响到平原同山区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当时人员往来和物资运送,都必须大量部队掩护,劳师费时,异常困难。

为了适应当时的斗争形势,打破敌人的封锁线,1942年初,我冀鲁豫军区派军区联络部副部长王乐亭同志到沙区着手组建了沙

区办事处，大力开展了对卫河西岸地区和平汉路沿线的敌伪军工作。在安阳、汤阴、浚县等地区，开辟了通过敌占区的秘密交通线，进一步沟通冀鲁豫同太行山两大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由于我们实行了敌变我变、公开和隐蔽斗争相结合的两手策略，在不太长的时间内，便在卫河西部地区和平汉铁路沿线，打开了一个新的斗争局面，粉碎了日寇封锁、分割我抗日根据地的狂妄野心，保证了我华东、华中、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同太行山，直至延安的人员和物资的往来。

从冀鲁豫的沙区通向太行山的秘密交通线有两条：一条是从沙区出发，在内黄县之后韦草坡渡卫河。经过汤阴县的北五陵、任固附近，然后经过安阳县的辛村、庞家湾、白壁、崔家桥，从安阳火车站北面越过平汉铁路，再经洪河屯等地西上太行山，我们称之为北路交通线。另一条交通线也是从沙区出发，在汤阴县和浚县交界处的老观嘴渡卫河，经过浚县的乔村一带，从汤阴县的三里屯越过平汉铁路，再经冷泉一带西上太行山，我们称之为南路交通线。

1943年7月林南战役以前，北路交通线是冀鲁豫直接通向太行山的唯一渠道。这条交通线所通过的地区都为地主、土匪、伪军这类三位一体的地方实力派所盘踞，如汤阴县东部菜园集一带的史华生，安阳县东部辛村一带的程道合和崔家桥一带的王自全等，就是这类地方实力派的头面人物。由于史、程、王等人都在作战中被我军俘虏过，他们深知自己不是八路军的对手，也知道我们对死心踏地效忠日寇的伪军和一般伪军是区别对待的，因此他们依附于日寇，但是又不轻易获罪于我军，以便保存自己的实力。这是他们奉行的方针。我们抓住这几部分伪军的同一个特点，趋利避害，争取他们不阻碍我在敌占区的行动，取得了对我有利的结果。特别是在沟通平原和山区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上，我们有了一颗“隐身草”，行动就便当多了。

1942年以后，我党我军的许多领导干部都往返于这一条秘密

交通线上。刘少奇、陈毅、肖华、杨勇等同志都先后从这里经过。1942年秋天，刘少奇同志由苏北新四军军部赴延安时，途经冀鲁豫边区。为安全计，少奇同志说服了他的警卫人员，决定分散秘密地通过平汉铁路，由王乐亭同志具体负责护送少奇的工作。王乐亭首先向驻安阳崔家桥的伪军头目王自全打招呼，佯称有一位大学教授来自山东，要经过这里到延安去参观。要求王自全保证通过时的安全。王见我方重视，而且又是一位有学问者，于是就派了他的专用轿子车和卫队，从辛村一带将刘少奇、王乐亭等接到崔家桥，然后送过平汉铁路，直抵我太行山根据地。1943年陈毅同志也是化了装，经过这一条交通线西上太行山，然后转赴延安的。

这一条秘密交通线除了掩护大量人员通过敌人封锁线以外，还向根据地运送了许多重要物资。这些物资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敌占区采购来的，如棉花、药品、煤油以至弹药等。采取的方法是，通过伪军和有势力的商人，并使他们有利可图，将根据地出产的红枣、花生、核桃、水果等运往敌战区，然后换回上述物资。单是各种子弹就从敌占区里采购了几百万发。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在安阳县的辛店还开设过一座货栈，以合法形式经营根据地必需的物资。另一类是抗日根据地之间的来往物资，如货币、弹药、书报、文件等，采取的方法多以经商掩护进行运送。例如1944年春天，运送3000发炮弹由太行山到冀鲁豫，就是以做棉花生意为掩护，将炮弹藏在棉花中，由数辆马车载运，浩浩荡荡通过了100多华里的敌占区。途经汤阴县之任固集附近时，伪军一个小队贪图发财，前来抢劫棉花，被我将其队长当场击毙，余皆缴枪投降。此后这一带伪军再也不敢拦路抢劫了。

从冀鲁豫到太行山的南路交通线，建立较晚，因为太行山的林县以南地区（林南）先为国民党顽杂部队所控制，后来又为日、伪军所盘踞。1943年7、8月间，我太行山八路军解放林南地区以后，使冀鲁豫通向太行山的距离比较近了一些，于是便开辟了由沙区到

林南一带的秘密交通线。

1944年初，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在党校集中了大批领导干部进行整风。为了保证安全，学校迁到太行山的林南临淇镇地区，这样就使冀鲁豫和太行山之间的人员来往和物资运送更加频繁。为了适应新任务提出的要求，进一步开辟南路秘密交通线的工作，我被派到平汉铁路西部太行山边缘地区去建立交通站的工作。到这个交通站工作的共有10多个同志，我任站长。我们活动在汤阴县和淇县交界的西南山村和大柏峪村一带太行山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从这里向东出了山峪便有淇河直隔，沿着淇河一带是敌人的第一道封锁线，我们能够渡河的地方只有一个独户人家的小村——下河口。小村北面是汤阴县鹿楼镇敌人据点，这里驻守伪军一个团的兵力，小村南面是大汉奸、土匪扈全禄的老寨淇县的朱家村和庞村，下河口是在南北两个敌人据点的夹缝中。渡过河去沿着连绵起伏的丘陵，经过柴厂、冷泉、赵窑等村落，在宜沟火车站以北三里屯，越过平汉铁路敌人的第二道封锁线。过了铁路以后再沿着赵屯、师家庄、乔村一线到达卫河岸边，这里是敌人第三道封锁线。我们在这里渡过卫河的地方是五陵镇敌人据点南面的老观嘴，过河以后便进入我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这一条交通线所通过的敌占区全长约100华里，当时盘踞在平汉铁路及其西部地区的伪军比较顽固，我们的对敌工作一时难以打开局面。我们主要是依靠当地进步群众等社会力量掩护。淇河西岸下河口村王金山的家和淇河东岸柴厂村郭炳武、杨臣田两人的家是我们的重要联络点和立足点，交通站的同志都称他们是“堡垒户”。在下河口村附近过河，上游是水深不见底的“龙潭”，下游是河水湍激的险滩，这里既无桥梁，敌人又不准群众摆渡，只有王金山隐藏在家的一只小渔船是唯一渡河工具。每当我们护送干部从这里经过。王家父子便悄悄将小船扛出来为我们摆渡，有时情况紧急我们就在下游的险滩激流中徒涉，严冬深夜水寒刺骨，涉水

过河常常冻得全身麻木，皮开肉绽。在这种条件下偷越淇河，主要是依靠人的意志和勇敢，舍此而无他途。

平汉铁路东侧是伪军杨贯一的地盘，由于我沙区办事处对杨部的努力争取，给这一带的秘密交通创造了一些有利条件。1944年我们在乔村设立了一个秘密交通点，派到这里的交通员化装成伪军，把这里佯做据点，一方面负责侦察平汉铁路一带敌人活动情况，另一方面掩护我们的过往人员和物资，必要时还可以在这里落脚。

由于冀鲁豫党校从太行山到冀鲁豫平原的来往人员很多，虽然我们采取了各种形式掩护，然而时间久了也难免不被敌人察觉。1944年冬，在平汉铁路西部地区人们就发现敌人暗探在追逐我过往人员的行踪。从我们的“堡垒户”王金山和郭炳武处获悉，冷家村有敌人坐探常去下河口柴厂等地刺探我们活动情况，有时敌人还突然包围村庄进行搜查，对我交通线威胁很大。当时我们曾经准备同敌人针锋相对，对敌占区捕获敌人坐探。砸掉绊脚石。后来考虑到这样做会打草惊蛇，使交通线暴露，于是便采取了声东击西把敌人注意力从我交通线上引开的斗争策略，并且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在党校警卫团配合下组织了一支精干武装直插鹿楼镇敌人据点附近及其以北的地区活动，并且大造声势摆出围攻的姿态，果然敌人收缩了在据点以外的活动，把敌人吸引到了远离我交通线地区。在此期间，我们在交通线上采取了更加灵活多变的形式同敌人周旋，有时化装伪军跨马携枪于白昼间招摇而过，有时组成小型掩护武装在黄昏中潜行偷越，有时扮做商客或敌探巡查，有时装成夫妻走亲戚或长官送太太等各种身份，以机智勇敢克敌，达到安全通过敌占区的目的。

1944年冬，冀鲁豫军区参谋长曹里怀同志从这里经过，我带领四个交通员夜间护送。不料在渡淇河时有3人不慎落水，因为衣著湿尽气候酷寒无法同行，便由我和交通员张文林两人继续执行

任务。我们在朦胧月色下踏着茫茫雪原行进，走在前头负责侦察的张文林同志，刚刚跨过平汉铁路就同一队人马迎头相撞。当时已经来不及隐蔽，他便大声吓问：你们是谁的队伍在夜里走私，为什么违犯皇军禁令。他一方面示意我们前面发现敌情，一方面装做敌人缉私人员以迷惑敌人。果然是一股伪军运棉花，一个伪军官听到盘问竟站到路旁向张文林唯唯辩解声称：下不为例，下不为例。我们就在懵懂的敌人眼皮下通过了平汉铁路。

1945年春，邓小平同志由冀鲁豫返回太行山从这一条交通线上通过，我们采取了小型骑兵队护送。从沙区的边沿地区出发，黄昏时由老观嘴渡卫河，进入敌占区，经乔村而三里屯，越过平汉铁路又经冷泉柴厂，在下河口趟水过河而到达柏峪村。这期间，在党校参加整风的许多干部陆续回冀鲁豫去，他们身体比较弱，有些是妇女同志，不便夜间行动。我们抓住敌边缘地带敌情紧张而敌占区内部比较松散这个特点，便在交通站预备了各种化装衣物和骡马给通过敌占区的同志使用。我们在交通站化好了装，拂晓以前悄悄越过淇河，开亮以后便以各种身份在敌占区里通行了。虽然敌人层层封锁，但都无法对付我们的“七十二变”。勇敢和机智使我们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当时我曾写下两首小诗记述这里的斗争情况，一首是《淇河夜涉》：漫天风雪太行侧，淇河滩头夜寒彻，破冰横流人已去，两岸敌火空明灭。另一首是《过客》：铁楸壕堑贯南北，日寇封锁不许越，岂知太行飞将在，此处日夜驰过客。这便是南路秘密交通线斗争的写照。

由于冀鲁豫边区领导同志对联系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交通问题十分重视，并在斗争方式上给以具体指导，因此，在日寇对我根据地实行反复扫荡、层层封锁的严重形势下，我们做到了不以主力部队长期在敌人封锁线上周旋来维护交通，而以秘密、隐蔽的方式去渗透敌人的防线，达到沟通我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成功。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几年中，有数千名党政军干

部和其他人员能够从秘密交通线上通过敌占区来往于我抗日根据地之间,并且从交通线上运送过许多根据地迫切需要的物资,以支援根据地的斗争。可以说这是以很小的代价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护送邓小平去延安

马 赛

由冀鲁豫边区内黄县井店沙区办事处起,向西经浚县、渡卫河,从宜沟集西北过京汉铁路和封锁沟,再渡淇河,穿过日伪军满布的一座座碉堡、一道道铁丝网,蜿蜒曲折地 绕过许多村落,直达淇县泉寨村的太行边区交通站——这条全长一百五六十里的“汤浚秘密红色交通线”,是我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委为了粉碎日寇的封锁,于1942年12月份在豫北开辟的。

当时我在冀鲁豫军区办事处(也叫沙区办事处)担任交通科科长,经常执行任务来往在这条红色交通线上。我们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此线和太行办事处联系,传递党中央的指示和机密文件,护送从山东、苏北、冀中、冀南来的爱国青年和党的干部,到革命圣地延安去。从建线至抗日战争胜利的三年时间里,我们秘密护送了数千名同志过路,但有一次护送首长,则是我终生难忘的。

那是1943年5月初的一天下午,井店沙区办事处的王乐亭主任秘密叫住我轻声说:“不能让你休息了,有重要任务。”他郑重地告诉我,“这次任务,主要是护送两位党的负责同志过路到太行根据地交通站。”说完,就领我走进办公室,只见里面有两位陌生的人。那位男同志,有三十七八岁年纪,个头不高,但体格精悍,穿一身半旧的军装,精神抖擞,两眼炯炯有神,操一口南方语音,言谈举止豪爽、大方、亲切。那位女同志,穿一身可体的军装,齐耳短发,神态文静,笑容可掬。男同志热情地让我坐下,询问沿线敌情有什么新情况,我想了想回答说,敌人在作垂死挣扎,近来有些地段加强

了防范,王陵集驻的日伪军,已对老官嘴卫河渡口注意了。据咱们的地下联络员报告,大前天晚上有十几个黄狗伪军,在渡口两岸堤后趴了半夜,早晨还发现他们丢在那里的几颗子弹。宜沟铁路封锁线上的伪军,也加强了防守。扈全禄匪军严密封锁淇河,巡逻活动频繁……不过,都不当用,挡不住咱们通过。”男同志又说:“这次过路不光是我们两人,还有队伍、有马匹、文件,……有困难吗?”我答道:“首长请放心,我们对线路情况熟,再说我们要走的路都是选择敌人统治最薄弱的边缘交界地区,一定完成任务。”王主任严肃地对我说:“这次任务一定要安排好,把沿路可能会出现各种情况都要估计到,周密地制订行动方案,必须保证万无一失!”并问:“你准备派谁领路?”我说:“还是派交通员李志杰、老吴,他们沿线地理熟,人缘好,往返跑了几百次,都完成了任务。”首长和王主任都满意地点点头。

正说得亲切热烈,小李完成出差任务回来了,便衣布衫上挂破了一个大口子,脚上沾满泥土,汗涔涔的脸上,微露出一丝长途跋涉的倦意。这时,首长走到小李面前,亲切地说:“小李同志,很累了,快去洗洗,吃饭,吃饱了好好休息。”小李忙笑着说:“不累,不累”说罢,就转身出去了。

下午的时间,我和王乐亭主任忙于制订行动方案,对沿路几个重点地段做了多种设想。傍黑时,我换穿一身便衣,到寝室叫醒了正在酣睡的小李说:“快起来,有重要任务,今夜要护送两位去延安的干部过交通线,我带队,你领路。”小李翻身下床,满怀信心地说:“我保证完成任务!”我点了点头说:“快准备,马上要动身出发。”

我和小李一齐从屋里走出来时,办事处的前大院里,已等着20几个穿军衣的武装战士,人人都是长枪、短枪双配套,精神抖擞,整装待发,交通员老吴也挤在战士中间,院里的几棵大枣树上,拴着两匹鞍镫齐全的高头大马,还有4头驮着物件的骡子。不一会,王主任领着两位阔人打扮的人从屋里走出来,我一看,两位首

长都化了装，几乎认不出来了，穿戴全变了。男同志头戴新礼帽，身穿细布长衫，脚穿皮鞋，左手无名指上戴着明晃晃的大金镏子，完全是一派上流社会的绅士装饰。那位女同志扮成了男装，穿一身对襟的细布中式上衣，象是一位精干的随从。

队伍出发了，王主任送出大门外，又一次叮嘱我：“路上情况会有变化，要见机行事，多向首长请示。”王主任和我要扶首长上马，但男同志笑着说：“这段路不过 100 多里，我们身体满好的，还是和同志们一块步行吧！”天黑下来，我们步行出发离开井店集西北杨河道村，向西南方向快步前进。

我一直守护在首长身旁。看得出来，首长长期行军练就了一双铁脚板，他同战士们一块急行军，毫无倦意。我们很快走到卫河边。东岸，是孙步月的浚县反共自卫团的统治区，孙匪在这一带驻有一队日伪军。这些走狗们巡防卫河东岸，与我抗日军民为敌。通过这里，需要严加防范敌人。

我小声命令：部队立即改变行军队形，拉开距离，由小李带领十几个战士头前开路。我和 3 个战士牵着 3 匹骡马与首长中行。老吴带 10 名战士断后。人无声，马不嘶，鸦雀无声地在路上疾行前进。

总算还顺利，一路上，并未遇到孙步月匪军的骚扰。这是因为前些时，我军惩罚了孙步月匪军的罪行，夜间一举干掉了孙步月的河防巡逻队，敌人吃了亏，接受了教训，夜间才乖乖地龟缩在匪营里，没敢出来活动。

队伍来到卫河东岸老官嘴渡口时，夜已二更左右。我让大家隐蔽在堤后，派小李一个人先去渡口侦察渡船情况。

借着淡淡的月光，我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不大的工夫，小李急急忙忙回来向我汇报了渡口新变化的情况：整个渡口连个船影也没有，河岸栽的那根拴缆绳的木桩上，拦河横扯的那根摆渡铁丝绳也不翼而飞。听到这个消息，我一时十分着急，心想，一定是五

陵集的日伪军,为了防止我军夜渡卫河,傍黑才解去了渡河缆绳,撑起了渡船。为了掌握第一手情况,我又亲自去渡口看了一遍,与小李汇报的情况一样,仍然找不到渡船。

队伍都已来到河边。卫河翻卷着的浪花,拍打着堤岸“哗哗”直响,面对汹涌奔流的河水,我反复思考着:怎么才能渡过卫河呢?

那位首长低声问我:“附近有能趟水过河的地方吗?”我叫来小李,回答说:“有。往上游走一段,有个浅滩,可以趟水过河。”

首长听了便问:“浅滩有多远,两岸有没有敌人设防?”我一一作了回答。商量后,便毅然决定“趟水过河。”由小李领路,顺着河岸向南往上游走,悄悄来到那个水浅的河段处。

首长低声地鼓动大家说:“我们红军长征时,都是前有敌人封锁堵截,后有敌人重兵尾追,天上有敌机轰炸,在没有渡船的情况下,我们都先后巧妙地突破了乌江、金沙江、大渡河等天险,胜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一条小小的卫河,能挡住我们前进吗?不能。我们趟水过!”

大家听了动员,振奋精神,情绪更加高涨。我让大家赶紧脱去外衣和鞋袜,准备趟水过。下了水后,用脚试探着往前走。趟到河当心,水越来越深,已齐到心口了。加上河心水流湍急,走着走着,觉得脚直打滑。我紧挨着首长,生怕发生意外。首长却若无其事地小声关照大家:“要把脚步踏实踏稳,互相拉紧手,这样,河水就冲不倒我们了。”大家听了立即手拉着手,连成一条冲不倒摧不垮的钢铁锁链稳步前进,终于横渡过卫河。

来到卫河西岸,首长又关照大家赶紧把内衣的水拧干,把身上的水擦净,穿上干衣服,防止冻坏身子。豫北5月的夜间,卫河的水是寒冷的,风也是凉飕飕的。但是,同志们没有一丝寒意,心里都热呼呼的。大家穿好衣服,继续整队西行,看到河岸抽穗的麦子随风在摇头晃脑,油菜花散发出阵阵沁人肺腑的清香。

为了迅速避开五陵集日伪军巡河队的耳目,免得和他们遭遇

惹麻烦，小李想领大家从麦田地里抄近路走，好迅速斜插西北到大路。当他两脚迈进麦田还没走几步，那位首长便提醒他说：“小李同志，为什么一定要从麦田里走呢？”小李说明抄路避敌的想法，首长深情地说：“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许损害群众利益，再过一个月，这些麦子就该收割了，我们大队人马走过去，要踏毁群众多少庄稼啊！你说对吗？”小李含羞答应着，我在旁边也感到脸上火辣辣的。首长是这样爱护群众的庄稼，农民出身的我，反倒忘了提醒，平时思想政治工作做得还不够啊。小李两脚赶快跳出麦地，领着大家，顺河堤北行，扑上了西北大路。大家顺着大路急速西行，又走了一段路，便进入了天门会所管辖的地盘了。

天门会，原是豫北地区一个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群众武装组织。开初，它是为了防止土匪而建立的。后来，其领导权被封建地主豪绅篡夺了。总会会长是浚县三角村的杨贯一。全会拥有常备枪支400多支，会员自备枪5000余支，会区扩展到汤、浚、滑、淇等县，声势颇大。抗日战争爆发后，天门会被日寇威胁诱骗，成为一个类似皇协军的组织。它的上层人物大多是两面派，一方面靠日寇势力，维持他们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国民党抱有一定幻想，另一方面也和我们党有联系。因为卫河以东就是抗日根据地，他们怕我们消灭它。为了争取和利用天门会这支力量，我们党派了一批精悍的地下党员，秘密打入了天门会，建立了党的组织，班排领导权已被我掌握。我党利用这个“合法”团体的招牌，对日寇进行斗争，为我党做了各种工作，特别是为汤、浚红色交通线作了许多工作。

队伍在路上走着，知道这段地盘实际上是在我地下党控制下，思想上就轻松多了。进入汤阴县境，首长一边走路，一边关心地问起汤阴人民的生活状况和对日寇斗争的情形，还给我们讲述了岳飞抗金的故事。

黎明之前，我们来到乔村中间站，天门会我地下党负责人傅陵云很快迎了出来，我们立即商定了首长食宿休息的地方。为了缩小

目标,防止日寇白天突然来盘查,躲过日寇和天门会总会长的耳目,老傅和我把首长和那位女同志,隐蔽在一位姓姜的开明士绅家的南楼上住,把马匹、驮子分散藏在可靠的群众家里,并在远处通敌的大路口和村旁,加岗添哨,严密封锁消息。我带领 20 多名武装护送人员,轮班在姜家院内外放哨保护,好让首长在楼上安全休息。

午饭过后,我不时地在院内外哨位之间巡逻走动,当我走到姜家楼下时,首长那亲切感人的谈话声从楼上传来:“抗战已进入后期,日寇无论怎样垂死挣扎,也绝改变不了必然灭亡的命运……,只要赞成抗日,都是我们的朋友,我们都要团结,谁能为抗日多做好事,前途肯定是光明的……今天,你又为抗日救国做了一件好事,谢谢你的帮助”。一会儿,那个姓姜的开明士绅微笑着从楼上走下来,一边走一边还点头不止。我心里十分激动,首长无时无刻不在为抗日救国操心,中午也不曾在楼上休息,而是不顾长途跋涉劳累,还抓紧点滴空隙,为党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白天,平安地度过去了。入夜,我们根据以往过路的经验,趁着夜色又登程出发了。走出天门会管辖的地盘,很快便进入了宜沟集的日伪军封锁区。

这时,我的心不由地提了起来。这一段是交通线最困难的地段。这不仅因为宜沟集驻的日寇和伪军极为反动,而且日寇沿京汉铁路两边,从南到北挖了 300 余里长的大封锁沟,沟宽两丈多,沟边 5 里一堡,3 里一哨,两岸用铁丝网死死地拦着。要从这里闯过敌人把守森严的铁路和封锁沟,必须小心谨慎,考虑周到才行。前边领路的小李传话给我:京汉铁路已经不远了。

我和首长周密地研究之后,就派小李和老吴先带一些同志前头开路,尽量躲过敌哨,万一碰上敌人哨兵,要想办法把他干掉。如果枪声惊起大批敌人倾巢出动,那就糟糕了。

小李老吴接受了任务,带了八名武装战士匍匐前进,悄悄地爬

过铁路。不大一会工夫，老吴和另一位战士回来告诉我说：“我们到了封锁沟过路口处，四处搜查，并没有发现敌哨，只听得南边的岗楼里敌人正吆五喝六地喊着‘地子九’、‘天扛’！……”听了这番汇报，我暗自高兴，吆喝声和笑骂声表明，敌人在岗楼里赌得正热闹。我不由地说：“太好了！这正是通过敌人铁路、封锁沟的好时机，快！”小李立即和七名战士分别卡住铁路与封锁沟过路口的南北两侧，严密监视敌人。我保护着首长，带着队伍，悄悄穿过了铁路，又过了封锁沟口，顺利地通过了敌人的铁路封锁线。

走了一段路，进入三不管地带。首长回头看了一眼伪军的铁路碉堡，转而对我说：“我们这么多人马能从敌人眼皮底下安全通过，说明你们的工作做得不错！”首长的话语，一句句象战鼓，鼓舞我们去争取新的胜利。接着，首长又说：“如果能在这个险要的关卡，从敌人内部做好争取和瓦解工作，就会对我们这条交通线的工作更有利。”他分析了伪军内部几种人的状况，指出，伪军中除了少数铁杆汉奸死心塌地为日寇卖命外，大多数人是被迫当兵的，是不愿意真正为日寇效劳的。他们中有一些听到过我们政治宣传教育的人，甚至还有反日爱国思想、暗中倾向我们。我们就要善于利用这些条件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这一法宝，去争取他们倒向我们，以便孤立主要的敌人，最后战胜敌人。

首长的精辟分析，使同志们受到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明确了争取对象，重视了瓦解敌人的工作。不久，我地下党组织，利用敌人内部矛盾，果然把宜沟铁路封锁线碉堡里的伪军反动排长干掉了，换成打入伪军中工作的一个姓张的地下党员任排长，并将炮楼上那一部分伪军争取了过来，暗中为这条秘密红色交通线出了不少力。

走了一会，进入了汤、浚、滑、淇四县剿共七区司令部彪全录日伪管辖区，为了躲过敌人耳目，护送队伍沿着敌区边缘走，很快来到淇河边。

淇河是彪区封锁的重点。我让大队人马先隐蔽起来，仍派小李

和老吴悄悄地向淇河接近，侦察敌情。淇河东岸上，有十五六个荷枪实弹的伪军在巡河。他们南走走，北转转，死盯住这段可以趟水过河的浅滩。看敌人根本没有撤走之意，小李老吴急忙回来向我报告了情况。

那位首长问道：“附近还有地方可以过河吗？”我回答说：“没有。这一带淇河不是水深流急，就是坡陡岸高，加上还有马匹驮子，根本过不了河，上不去岸。”和敌人拼杀夺路而过吧，尚若被敌人咬住不放，引来附近敌人大批出动，那就坏大事了！情况紧急怎么办？

战士们一听说有了敌情，期待战斗的心情陡然而生，纷纷向我请战：“马科长，快下命令吧！坚决消灭敌人，掩护首长抢渡淇河！”“对！拼死也要完成护送首长过河的任务！”

首长沉思了一下，与我商量说：“若用‘调虎离山’计，很可能把敌人调走，只是要给‘调虎’的同志增加危险，你看如何！”我一听，马上高兴地说：“中。我们交通员对这里沟路地势极熟，加上夜色、庄稼深，调走敌人，安全归队没问题。”于是，决定用“计”调“虎”。老吴小李都急着要去，我考虑片刻，根据他们二人的特长，分派老吴带两名战士前去调虎，用枪声把敌人吸引到东南方向去，然后甩开敌人，迅速归队。命小李仍然给大队带路，抢过淇河。

老吴带两名战士出发了。一会儿，东南方向就“砰砰”响起枪声，巡河的敌人慌神乱了套，狼嚎似地叫着：“八路！八路！别让跑了，快追！”“与此同时，敌人的枪声也“砰砰”乱响起来。枪声向着东南方向，越去越远。

我急忙派小李领着一个大个子战士去河口侦察，悄悄干掉巡河哨兵。二人来到河岸边，看到大部队敌人走了，只留下两个哨兵持枪在站岗。小李向前一摆手，二人匍匐接近敌人。只距敌人两三步远了，前边的敌人发觉了，那个敌人正举枪射击，小李一个箭步冲上去，一刀捅进敌人心窝。另一个敌人“娘啊”一声刚喊出，就被

我们大个子战士一步赶上去，一枪托子打得脑袋开了花。

消灭了巡河哨兵，小李发回信号，大队人马趟着齐膝深河水，顺着浅滩，迅速渡过了淇河。

大队人马过河后，向西走一会，负责调“虎”的三个同志也气喘吁吁地跑着赶上大队。我看着向前行进的首长，心中暗暗敬佩。首长在危急中沉着冷静，智谋果断，敌人乖乖地听从调遣，真是一位久经沙场的“活诸葛”啊！有这样的首长指挥我们，有什么艰难险阻不能通过呢？

踏上我们太行革命根据地，我们一路紧张的心情顿时轻松愉快起来。大家歇息时又说又笑，有的嘲笑敌人蠢笨如猪，有的讥讽封锁沟、铁丝网、碉堡群不过是虚张声势；还有的边拧裤腿上的水，边议论着淇河水凉入骨。那位首长高兴地说：“同志们，如今敌人逼着我们走夜路，趟冷水，经历许多辛苦。等我们抗日胜利了，还要建设美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哩！到那时，我们出门办事就可以坐火车、乘轮船、架飞机啦。哈哈哈哈哈……”一席话，说得战士们大笑起来。

天明，我们胜利到达了目的地——太行根据地的交通站泉寨村，完成了护送首长的任务。

这时，喷薄的朝阳放射出万道霞光，东方的天际彤红彤红，把山水染得辉煌壮丽。大家的心里感到无比的开阔和舒畅。不知谁唱起来：“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大家情不自禁地随着高唱起来，首长和那位女同志，一边跟着唱，还一边用手打拍子，大家越唱越带劲，雄壮的歌声在平原山林回荡，完全忘记了长途跋涉的劳累。

临别时，首长和女同志与大家一一握手，感谢大家的一路护送，并对我说：“你们辛苦了，感谢交通站的同志们，再见！”握着首长温暖有力的双手，望着首长慈祥刚毅的面孔，我周身的热血在奔涌，激情滚滚，泪珠止不住地滚落面颊。

忍泪惜别后，我和交通站的同志走在返回井店集的归路上。看得出来，从接受任务出发，到一路行军，小李和老吴一直想知道护送的首长究竟是谁，可是，因为秘密工作的纪律，他们多次欲言又止。此刻，在完成任务后的归途上，小李紧追了几步凑近我，忍不住地问道：“马科长，我们护送的首长他是谁呀？”

“他是谁呀？”这与我刚接受任务时的心情是一样的。记得我走出办公室的时候，王主任悄声告诉我首长的名字之后，我兴奋得心咚咚直跳，一种幸福感与自豪感霎时传遍全身，一时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眼前，小李的问话再一次勾起我胸中这种庄严崇高的感情。我看着他们渴望知道的神情，笑了笑说：“他就是一二九师首长邓小平同志啊！”他要经太行回延安，向毛主席汇报华北战场对敌斗争情况，当面接受毛主席和党中央下达新的战斗任务。那位女同志就是卓琳同志。”

听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同志们高兴得手舞足蹈，脸上笑逐颜开，充满了一往无前的力量。

（戈中博整理）

护送陈毅过边区

马 赛

1944年精兵简政以后，敌占区工作统一领导，冀鲁豫军区建立了敌占区工作委员会，分管豫北安阳、汤阴、内黄、浚县、淇县等5县的工作。我们冀鲁豫军区沙区办事处驻内黄井店一带，委员会主任王乐亭兼任办事处主任，我任办事处交通科长。

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的后期，鬼子不甘心失败，正如刘帅在回忆录中说过的，在平汉路两侧和我根据地边沿又增挖了许多封锁沟，修了不少碉堡，把抗日根据地分割成“田”字形“王”字形，以铁路为柱子，以公路为链子，以碉堡为锁，企图用这种“囚笼政策”分割封锁我解放区，给地下交通联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困难，一批急待护送过路的新四军和其他地区的一大批干部被困在我沙区办事处，散居在内黄、井店、李河道村周围几个村子。路不通，人员多，情况紧急，我们交通科的同志十分着急。

初春的一天上午，我们正在抓紧待命的间隙时间学习整风文件，办事处秘书长李毅之把我叫到主任办公室，王乐亭主任扶着我的肩头，指着坐着的一位身材魁伟的客人介绍说：“这是新四军首长陈毅同志，要经太行到延安，派你去护送过路。”我一听面前的客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便兴奋地打量首长：宽脸膛，浓眉下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穿一身灰色棉军衣，打着绑腿，威风凛凛。王主任见我发愣，就拍拍我说：“这次护送任务重，敌情复杂，我们来研究一下走法。”

秘书长在桌上摊开交通图，我们围坐在一起，南北两条秘密交

通线出现在眼前：南线自东向西，经浚县老观嘴过卫河、汤阴县的师庄、大小青山，从三里屯过平汉铁路；有时也从师庄经冷泉，或从内黄县后苇草坡过卫河，经汤阴县的北五陵等一带村庄，进入太行根据地。邓小平、薄一波、杨勇、舒同等党政军领导同志就是从这条交通线过路的。北线是从内黄后苇草坡过卫河（渡口地段、过河方法不固定）经汤阴县的古城和安阳辛村、庞家湾等村庄抵达太行山。王主任征求首长同意后，手指北线说：“就走这条路。昨天，我们派去河西敌占区的人报告说：虽然敌伪在铁路口封锁加严，但城外各伪军据点无甚变化。”我问：“咋个走法？”显然已经研究好了，王主任说：“这次是化装过线，陈毅同志扮成阔商，骑骡子，你当帐房先生骑单车跟随，路上你称首长为王先生，化名王梁父，是去太行做生意的。”陈毅同志说：“你们熟悉情况，我是服从命令听指挥哟。”引得我们都笑起来。

护送任务落在我一人肩上，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因为我南线比较熟，遇有情况好应付，走北线则心里没底。王主任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说：“有内线协助，到接头地点有人接你们。为了缩小目标，首长的警卫员另从别的路线护送。”

第二天一早我们出发了。首长长袍大褂，头带礼帽，围着长围巾，脚穿皮鞋，一派社会富商的打扮。太阳升起的时候，我们已赶到内黄后苇草坡卫河口。河面闪着粼粼波光，河水拍打着堤岸哗哗直响。面对滔滔奔流的河水，我们环顾四周，焦急地等待渡船。一位船工手点竹篙，撑着小船悠悠穿来。蹬上船板，船工问：“去什么地方？”我警惕地回答：“上安阳城，做生意”。小船平稳地在水里滑行，片刻，已经看得见对岸聚集的人群，听见喧哗的嘈杂声。下了船，我们向西北疾驶10余里，来到敌人盘踞的古城。首长问：“据点有多少人，多少枪，对伪军的争取工作做得怎么样？”我说：“只有二三十人，属土匪局队长秦芝管辖的地盘。伪军一是爱钱，二是爱枪，我们为了争取一部分人，秘密给为我们跑交通的伪军按月发饷，每月折

合四十五斤小米的钱,秦芝就是一个。军区首长还决定送三支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给秦芝、韩守业、王自全各一支。逢年过节,还以办事处的名义给这些伪军团队送一些礼,过往的干部人员未出过事故。”首长听了连连点头。为了赶路争取时间,我们避开古城秦芝巡逻队的耳目,没有进城,拐弯插向村外的小路,直奔白璧北务村东南角堡垒户郭庆安家。

这段路程比较远。路上,首长关心地问这一带的伪军情况,老百姓的生活,我一一作了回答。当问到这一带地下工作的情况,我说我们和敌伪以卫河为界,河西伪局子、伪据点、土豪多,关系复杂,内部矛盾很多。日本兵驻在城里,很少出来。伪局上层人物多是两面派,明里讨好鬼子,暗中也应付我们,领饷钱,为我们办事。首长说:“这个办法好嘛,但不要掉以轻心,敌人的反动本质会使他们啥子事都干得出来的。”我聆听首长的教诲,不住地点头。

中午时分,我们到达郭庆安处。郭是北务的一名绅士,有抗日爱国之心,对我们的工作经常给予支持和帮助,因此,经过我们进一步做工作,他的家就成了我们地下交通线护送干部和物资的一个过往联络点。这次,郭亲自出面迎接我们,热情地准备了午饭。饭后,我们向郭庆安详细询问了周围和城里鬼子活动情况,他都一一作了回答。当问到崔家桥头目王自全的情况时,郭庆安沉思片刻说,王自全此人刁滑,是这一带一大恶霸,不过对我们,他还是有些顾虑的。由于他在抗战初期被我军俘虏过,深知自己不是我军的对手,也知道我们对死心塌地效忠日寇的汉奸与一般伪军是区别对待的,因此,他不敢胡来,同时他的内部也有我们的人,会帮我们说话的。

郭知道任务紧迫,也不挽留,骑上车就带领我们直奔伪据点崔家桥王自全司令部。路上,车上下颠得厉害,我的心也不由地提到嗓子眼,此行不是往老虎嘴里钻吗?王自全是土匪头子,一切行动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有奶便是娘,丝毫不讲信誉,万一翻脸出事

咋办？我再三向郭庆安叮嘱说：千万要保证安全，不能出丝毫问题。我又告诉他，王自全要问，就说我们是从东边过来的商人，名叫王梁父，去西边做生意。不一会，我们来到王自全司令部。只见大门口哨兵持枪站立，带班的来回走动，荷枪实弹，样子好不威风。我取出给王自全的信件，向门卫一亮，说“找王司令”，就大摇大摆进了大门。一个带班的士兵领我们到会客室，勤务兵端来了洗脸水，沏上茶，郭与带班的一同向后院走去。大约一个多小时后，王自全的参谋长到会客室对我们说：“司令忙，抽不出身，特地派了一名贴身护兵送你们。为避免途中麻烦，我们开了一封通行证明信。”我们告辞出来，扑上大路向西进发。

由于有护兵领路招呼，我们顺利过了平汉铁路，护兵完成任务回去了。主要危险区已经过去，我一路紧张的心弦陡地松弛下来。我们继续赶路，突然，迎面走来四个斜背枪的伪巡逻兵，狭路相逢，前进已不可能；后退会引起敌人的怀疑。我目视首长，见他神态自若，大手向前一挥，我立刻明白了，依然蹬着自行车紧打车铃，摆出一副急急赶路的样子。一个高个子伪兵横枪拦住我们的去路，喝问：“慢走，从哪来？”我下车答到：“崔家桥王部。”伪兵一听是王司令部，口气软了几分。问：“干什么去？”“找石大队长有要事。”“有信吗？”“有！”我掏出王自全的信，伪兵一见大信封上落有司令部的大红字，再看我们的举止派头，没敢接信，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

通过这次敌人的盘查，我不敢再有丝毫放松。行至洪河屯西边，老远看见十几个青壮汉子骑马挎枪迎面向我们走来。我紧随首长缓缓前行，做好了战斗准备。人马离我们很近了，我们刚想问，对方领头的两个跳下马问我们：“从哪里来呀？”我们按事先约好的话说了一遍，他们上下打量“王先生”，又耳语了几句后，向“王先生”敬礼说：“首长，我们是太行办事处的，特来迎接你”。啊，到接头地点了。我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到了实处，高兴地和他们一一握手。首长伸出有力的大手向我告别说：“谢谢你们了，回去路上要多加

小心,再见!”目送首长高大身影渐渐消失在路的尽头,我心中涌起一股幸福的暖流,久久地滋润我的心田……

(戈中博整理)

冀鲁豫军区第四(九)军分区 办事处的对敌斗争情况

郭省吾

办事处的建立

1942年4月间,区党委宣传部长张玺同志通知邢宣理、郭省吾两人去卫南县委所在地,作了以下的指示:

为了开展游击区活动,巩固根据地,建立冀鲁豫边区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要成立滑县、浚县、汤阴、淇县、汲县、延津、封邱等七县办事处兼军区四分区办事处。其主要的任务是:

一、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和争取团结友军及社会上层人士,共同抗战;

二、开展对敌伪军工作,分化瓦解敌人,经常搜集敌、伪军的情况;

三、建立冀鲁豫边区与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地下交通;

四、购买医药和军需品。

张玺同志宣布:邢宣理同志为办事处主任,郭省吾同志为副主任兼秘书长。

张玺同志谈话后,办事处机构不久即迅速建立起来。初建时人员不多,党支部书记由郭省吾同志担任。办事处大部分时间随部队活动。到了1942年冬,因组织变动,改为第四军分区办事处。地委和军分区领导都很重视这一工作,为适当对敌斗争的需要,扩大办事处机构,增添了秘书李连修、曹肖荣、唐纪、庞俊生等同志;负责交通方面的有冯占林、刘振华等;供给人员郭光涛、赵鲁、刘德昌

等,共 30 余人。同时,还有一个警卫排,有 30 多个战士,机枪一挺,步枪 30 余枝。办事处全面工作,由邢宣理同志负责,因为他是当地人,在人事和地理上比较熟悉,着重做友军和社会上层人士的工作。郭省吾、李连修同志分工做敌伪军、交通和一些内勤工作。1944 年邢宣理同志调走,郭省吾同志为主任,后又任命李先贤、李连修两位任副主任。李先贤同志对地下交通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形势的好转,办事处经常单独驻在孟庄、杨兆、东猛虎寨、袁屯一带,故当地群众也称为卫南办事处。四县办事处建立后,分区办事处就不兼七县办事处了。

坚持卫南县对敌斗争

1941 年以前,卫南县的前身为滑县、长垣、封邱三县,工委会书记为李振亚同志,原属六地委领导,地委书记是赵紫阳同志。

卫南县所辖范围为:滑县以南、西南的大部,长垣、封邱各占一部分。此地是我冀鲁豫边区和四地委的西南大门,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故也是日寇和国民党军向我抗日根据地发起进攻的前沿部,处于首当其冲的位置。

卫南县第一任书记为李明远同志,第二任书记为张泽民同志,组织部长刘建国同志,宣传部长最初是尚子端同志,后为李峰同志,基干大队政委郭省吾同志,副大队长孙玉廷同志。

卫南县第三任县委书记为赵振邦同志。第一任县长耿廷舟同志(卫南县马兰集人,1942 年冬敌人扫荡时牺牲),第二任县长贾清泉同志,第三任县长王彪同志。

卫南县我地下党力量原来较为薄弱,工作发展也不平衡,1941 年以前只是在瓦岗集、马赵庄、青岗集、上官村、王堤、白社、王庄一带和东杏头、小庄等地我地下党的工作基础较好的村庄活动。以后建立了抗日政权和武装,根据地才逐步发展壮大起来。

这一地区土匪之多,历来是有名的。加之国民党反动政府苛捐

杂税繁多，人民生活濒临贫穷破产绝境。如土匪李旭东，十八支队阎希孟、李小孩（李荣卿）、王振远等，都是土匪武装。还有顽军和杂牌军队杜椒（国民党专员）、王太公（国民党豫北游击司令兼滑县政府县长）、封邱县八支队王森（兼封邱县长）等，各据一方。至于伪顽区公所和小股土匪武装，更为比比皆是。这些混杂势力时刻发生分化和新的组合，朝秦暮楚，其番号和身份令人难以捉摸。他们打着中央军的旗号，自封“司令”，多如牛毛。这些家伙不打日本，却到处搜刮民财，抢劫掠夺，闹得民不聊生。当地群众给顽军阎希孟部编了一首民谣：“十八支队，吃饱就睡；走到那村，翻箱倒柜。”他们经常杀害抗日群众和民主进步人士，群众怨声载道。这些顽军大唱“曲线救国”论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断和我军磨擦。1940年以后，日寇由于发动太平洋战争，深感兵力不足，对国民党政府以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提倡“渝宁合流”。顽军一时纷纷投降，成为豫北大部分之伪军。

1943年，蒋介石密令原四十军军长庞炳勋（后为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投敌，编为汪逆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晋冀鲁豫剿共军总司令，孙殿英为副总司令，共约2.3万余人。驻扎在开封、新乡、安阳等地。由于庞、孙的公开投敌，在豫北活动的顽杂部队、反动政府、特务也公开投敌，被庞、孙收编为伪六军，任命原国民党专员杜椒为军长，李旭东为副军长。下辖七个旅，一个特务团，一个保安队，共1万余人。除外，伪一方面军所辖的四十军、新五军，则大部驻铁路沿线。

日寇为了进攻和蚕食我抗日根据地，于1943年夏令伪六军杜椒部向我四分区大举进犯扫荡。首先侵入我卫南县，其军部驻大范庄，第三旅扈全禄部驻孟庄、第四旅王国藩部驻瓦岗寨、第五旅李效忠部、第六旅兰灿然部驻耿庄、焦虎等村，特务团何化甫部驻马赵庄，保安联队牛英德部驻周道村，一时我卫南县大部地区被敌伪占领。

我办事处配合卫南县委、卫西工委，并利用社会关系、伪顽军内部关系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上报分区司令部，在冀鲁豫军区指挥下，由四分区政委张国华同志、副司令兼参谋长赵东寰同志率领十六团、二十一团、三十二团、骑兵团、新四路及地方部队，组织实施了讨伐伪六军的战役。

我军经过焦虎、耿庄、袁庄战斗，给予伪军李旭东、李效忠部以极大打击，计俘敌 2000 余人，缴获机枪 30 余挺、步枪 2000 余枝；瓦岗战斗俘伪旅长苗星子、团长申泽远等 1500 余人，缴获机枪 20 余挺、步枪 1000 余支；孟庄战斗，除扈全禄带 10 余人逃窜外，全部被歼。秋季，我军又利用敌伪矛盾，争取了伪军兰灿然部暂时中立，以利我部队向伪六军军部大范庄大举进攻，经过一昼夜激战，歼敌 1000 余人，并迫使杜椒、李旭东率伪六军残部溃逃至卫河以西。此次战役历时数月，先后歼敌 8000 余人、缴获机枪 80 余挺、步枪 8000 余支、子弹数 10 万发。为揭破王太公真投敌“假抗战、真反共”，经常杀害我工作人员，和侵占我抗日根据地的反动面目，我分区部队又于 1945 年 1 月 23 日，经何庄战斗，将顽军王太公部两个大队约 2000 余人歼灭，使其不能进犯我根据地。这样，我军又控制了卫南县、封邱县、延津县、浚县大部地区，扩大和巩固了我抗日根据地。

开展敌伪军工作 搜集敌人情报

卫南战役的胜利，我军俘虏了许多伪军大小头目，经过教育后，予以释放。这就为以后开展敌占区工作，争取、利用、瓦解伪军和上匪武装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

开封至郑州、新乡、汤阴，为日寇三十五师团驻守，其中新乡驻一个联队。伪一方面军司令部也驻在新乡。其下辖伪四十军、新五军驻铁路沿线。敌人推行“强化治安”方针，巩固其占领之点线，又

时常向我抗日根据地扫荡、烧杀和蚕食。

1943年秋，伪六军第四旅被我歼灭大部后，通过地下党的介绍（汲县白何村张梦九同志和伪旅长王国藩是儿女亲家），和我办事处建立关系，王国藩派他的侄子王培成（后培养为我军干部）亲到我分区司令部报告敌情，首长们亲切接见了。以后，他们主动供给我们情报，并让我军干部张明林、苏义去其部队工作。王国藩的家在我太行山根据地石豹头村，易被我控制，同时又有其亲家张梦九同志的不断教育。经过我干部的一段时间教育后，王国藩令其侄子在李源屯小老婆处设立地下交通联络站。经常用骡拉轿车护送我干部过铁路线，去太行山根据地（原太行山塔岗口一个伪军据点，即为王部下辖。）1943年冬，军分区派侦察科长郭子青（化名王占有），打入王国藩部任参谋，常住新乡办事处，建立与掌握了新乡、汲县、开封之敌情，后来直到郑州以南之驻马店都建立了情报站（后属地方党组织领导）。负责地下交通的是张耕田同志。

1944年春，通过我新四路司令李静宜同志与伪六军一旅旅长张体安建立了关系（张与李是同乡朋友）。我军事先派人去该部约定时间，叫该旅主力团长赵庆功在夜间去袁屯村相见，李静宜同志和他谈了话。结果，他答应接受我工作人员去改造军队，并供给我情报（张体安和赵庆功系我豫西根据地人，其家属均在我控制之下。）事后，我们即派唐纪、庞俊生同志打入该部，进行改造工作（交通员为张廷田同志）赵庆功于1945年冬，在我军包围形势下，又经积极说服，终率其一部起义。

1943年6月份，通过苏班枣村之苏子英（该地当时为游击区）和延津县民众自卫团团团长贾子和建立关系，我办事处派孙英同志打入该部，帮助、教育贾本人和改造其部队。一年多来，经过与四县工委、四县办事处、新四路等领导同志对贾子和及其上层人物多次教育，特别是掌握和利用了该部与伪顽军王森、王太公、李荣卿等部的矛盾；同时，我又与日军、伪四十军、国民党特务的不断战斗和

反复斗争，终于教育了贾子和及其队伍，在1944年7月于卫南县黄塔村起义。我分区首长命名该团为延津抗日自卫总团，任命贾子和为总团长、苏子英为副团长，汪子成为参谋长。该自卫总团活动于延津县一带，后编为我分区四团，打了不少胜仗。

办事处建立初期，首先注意做好抗日民族统战工作，在社会上层人士、友军中广交朋友，利用各种关系，进行革命活动。如办事处开始时，邢宣理同志利用和王震远、李荣卿是乡亲、朋友关系，有着不少往来，他们提供了关于伪六军的活动情况；王震远还接受了我工作人员，帮助其工作。我办事处还积极争取、团结当地上层人士，对士绅张道生、崔雨亭、阎敬亭等和顽杂军王震远、李荣卿、李银清（十八支队副司令）、李长泰（十八支队一大队长，经李益三同志介绍建立关系，后起义编为我新四路一个游击大队）等，进行交往，宣传我党我军抗日政策。他们在伪六军进犯我卫南县抗日根据地时，供给我军一些情报，并掩护我干部活动。

在分区和地委的领导下，在四县工委、卫南县委及部队的配合、帮助下，我们先后建立了滑县、长垣、延津、汲县、淇县情报站（也叫敌工站），布成情报网。这样，新乡和各县敌人的情报，基本上当天可得到，及时地报告部队和政府，为打击敌人和开展地方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1944年春在分区开会时，分区领导表扬了办事处的工作。

地下交通工作

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线，维护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通往太行山抗日根据地至延安地下交通线的畅通，保障我党我军干部往来的安全和中央文件的及时传递，除了浚县、汤阴县交通线之外，分区办事处配合卫西工委从滑县、延津、汲、淇边区开辟了第二条地下交通线。交通站设立在延津之马庄、老刘庄。由四县边区委先后选

配了孔庆堂、孔宪德、张智松、牛才、王洪宪、张华、张吉祥、赵玉山、吉庆祝、周山岭、赵勤、张法等十多个交通员。

这条路线从东向西的地点是：老刘庄、班枣、（以下为敌占区）小屯、庞寨、东郎庙、梨园、下马营、塔岗车站南头（过平汉路），再经过昌河沟，就到了太行山设在塔岗的交通站。

这条线最大的困难是渡卫河和过铁路。渡卫河主要是孔宪德、牛才同志负责，他们利用地方社会关系作掩护。过铁路主要是孔庆堂、张智松同志负责，除利用地方上的社会关系外，孔庆堂同志还在铁路卡口处和一伪军排长建立关系，以作掩护。办事处最初派冯占林、刘振华同志（并带领祁存义同志）负责交通站，后地委派王东亮同志任站长。由卫西工委配备了沿线交通员赵玉山、孔庆堂、张智松等六七个同志组成。该线除接敌区外，在卫河两沿、汲县境内铁路两边、塔岗三处建立了交通小站，以供来往人员隐蔽食宿。

交通线建立后，护送往来的干部有三种办法：一是采取武装护送。如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去延安；军区政委苏振华同志带领整风干部队去太行山，都是办事处先派干部到敌占区掌握情况后，用武装护送过境的。1945年秋，罗荣桓、滕代远等20多名领导同志从延安经太行到冀鲁豫边区也是从这条线走的，沿线两边用武装接送（其家属和随行人员由地下交通接过来。）

二是由交通员护送干部。这是大量的，有时交通员带武器直接护送过铁路。如1944年冬，由刘振华同志带枪涉水过河，直接送一首长到太行去延安。

三是若沿线敌情紧张，为领导干部的安全考虑，从汲县的李源屯伪六军四旅旅长王国藩小老婆家派出伪军和轿车，直接护送过铁路，到太行山边沿的塔岗口。

这条路线坚持使用到抗战胜利，一直没有出大问题，共计护送干部约2000余名，为冀鲁豫、华东、华中、冀南各地的干部和首长

过路去太行、延安，保障了安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特别是中央文件的传送，交通员想了各种办法，克服了许多困难。渡卫河，有时坐船，有时用一筏箩，两边拴着长绳，人先浮水过去，被护送人员或文件置于筏箩内，再接过去，胜利地完成任务。

罗滩战斗

1944年9月，我主力部队活动到外线打击敌人，伪六军杜椒部窜扰、扫荡我卫南、延津、汲县边沿之班枣、于庄、老刘庄一带。伪特务团何化甫部千余人进占我罗滩村。当时分区办事处带一个连（山东泰安一个连）驻郭辛庄东边双沟，得到这一情报后，立即召集四县游击大队副政委刘耕夫同志和该连连长、指导员商量，根据敌我兵力之悬殊，决定伺机歼灭其一部，打跑这部敌人，以达到不让敌人抢劫掠夺之目的。我办事处住地离罗滩村还有10里路，部队当即跑七八里，先到郭辛庄西头空地，向西北五里许之罗滩村，观察地形，再由刘耕夫同志带个连顺路沟向北罗滩村进攻，郭省吾同志带山东泰安这个连由罗滩村东边利用沙荒、柳棵地接近、主攻敌人。战斗首先由泰安连打响，用六〇炮射击敌前沿，然后在机枪掩护下，甩手榴弹，冲入村内。在南面的连队也发起进攻。激战20余分钟，我两连各歼敌一部，共计俘敌70余人，缴获步枪60余支，手榴弹、子弹和其他军用的物资各一部（其中，四县游击大队俘敌20余名，缴枪20余支）。由于罗滩村战斗的胜利，伪六军的其他部队因不知我军有多少部队，也随之将已抢劫来的粮食、物资丢掉，逃跑到卫河以西。

军需物资的采购工作

四军分区给办事处有个采购军需物资的任务（采购枪支、弹药和医药等）。办事处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这项工作主要由分区

后勤处派李树枫股长常住办事处,利用伪军关系,经常来往敌战区,到各医院、商行购买了不少药品及其他军用物资,悄悄运往分区,以补充部队的部分需要。

办事处 3 年来,在上级党委和首长的直接领导下,在有关地方党委和部队的配合支持下,做了不少工作,同时也存在不少经验教训。现在回想起来,十分亲切,对过去在一起战斗的同志们,深为怀念。办事处于 1946 年奉上级指示,转交给四地委敌工部。

我军对内黄敌伪军的瓦解和争取工作

萧建波

1941年“四·一二”大扫荡以后，我沙区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只剩下很小的一块，南起冯村、海头，北到姜村、草坡、野庄、西自潘井、槐林、王尉，东止顺河、王什，方圆不足百里。敌人为了困死、饿死我沙区抗日军民，在沙区周围增设了几十个据点。在沙区北面新增设的据点有：大、小故县、东、西永建、陈、杜流村，张、乔岳村及高堤、渡村、流河等。敌人的大本营在东庄。

东庄敌人的番号是东亚治安军一路军，军长李英。军下辖三个旅，其中一个旅与军部同驻东庄。这个旅下辖四、五、六三个团，分别驻在东庄、高堤、渡村三个据点，三个据点呈犄角之势。各小据点绕东庄而立，各据点之间遥相呼应，形成一条貌似坚不可摧的封锁线。在敌人残酷的封锁下，我抗日军民的生活及活动更加困难了。

为了恢复和扩大我沙区抗日根据地，冀鲁豫军区党委指示我们，要积极开展敌伪工作，在伪军内部建立关系，争取伪军投诚或为我们送情报，瓦解敌人，打击汉奸和顽固分子。当时，我在五分区政治部锄奸科工作，军分区给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对付沙区北部的敌人。

初 建 联 系

大故县据点的伪队长叫许群英，他是伪四团团团长冯好学的外甥，河北临漳县人，土匪出身。据点原有20多条枪。后来，我分区的一个姓张的司务长叛变投靠了许群英，并带去了七、八条枪。姓张的这个小子投敌后死心塌地的为敌人卖命。因他家在我中心村

王尉村,对我军队活动、内部情况及地方党员,干部都比较熟悉。所以,他常常在半夜三更带着敌人到我中心村抓人,弄得我很多地方干部和党员不得安生。我们决定要除掉叛徒,保护地方党组织及群众的安全。

许群英在大故县建据点,主要是靠他的一条椽杨春帮助才撑起来的。杨春是一个小地主,当保长,据点上的给养有些也靠杨春接济。由于许群英是外地人,人生地不熟,据点上的很多事务他都托杨春代办。但是,杨春对我们交办的事情却推托敷衍,故意拖着不办。

有一次,我军分区的特务连去大故县要粮食,杨春不给,特务连就把他捉来了。杨春怕挨枪子,就托他的侄儿杨文庆到分区来讲情。杨文庆是政法大学毕业的高级知识分子,是个有点小名气的绅士。他自命不凡,开始很傲慢,引经据典,高谈阔论,为其叔叔杨春开脱罪责。我们拿出杨春支持敌人建据点、组织汉奸武装以及经常指派人到我根据地抓人抢东西的罪证,杨文庆在铁证面前害怕了,他知道按八路军惩办汉奸条例,他的叔叔就该枪毙。杨文庆软蛋了,我们就向他讲明我们党的政策,汉奸只要能知错改错,重新做人,可以从宽处理,立功可以折罪,杨文庆表示一定要劝其叔叔改过自新。

我们约定,必须让许群英亲自来谈判条件,然后领人。第二天,许群英来了,我们提出两个条件:一是撤除大故县据点;二是除掉叛徒。许对第二个条件满口答应,但对撤出据点却不敢自作主张,说必须经过他舅舅冯好学的同意才能撤出。我们考虑撤据点也确实有困难,就改换条件为主动向我们提供东庄敌人的活动情况。许答应了我们的条件。

许群英回去以后,第三天黎明时,许约那个姓张的叛徒到根据地抢东西,在途中埋伏人冒充八路军把他打死了。经我锄奸科验证,叛徒确实被打死了,我们就把杨春释放了。

我们紧紧捉住许群英这条线不放松。不久,通过许群英,我们又打通了与冯好学的关系。那时,干伪军的都有个关系越多越好的想法,形象的说法就是“狡兔三窟”。所以,冯好学为其后路,也乐意为我们送些无关紧要的情报。

关系初步建立起来了,分区政治部敌工科指派连学增同志为我们的联络员,以他家王告村为联络站,往来于敌我之间。以后,为加强其联络工作,又抽调苏化众同志搞联络工作。经我们的不断工作,这条关系为我们以后反扫荡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

伪清乡队长段树梅

段树梅是内黄县西永建村人,20多岁,惯匪。西永建村建据点后,冯好学委任他当西永建据点的清乡队长。

西永建村在毫城稍西北的三、四华里处,紧靠我沙区,是我抗日根据地西北的门口,也是日伪进攻我沙区的前哨。段树梅很混,他自任清乡队长后,活动猖獗,常常窜扰我沙区边沿村庄。后来,段树梅从侧面知道了大故县据点的许群英与我们拉上了关系,并且冯好学也参与了这种往来,自己如果死心塌地的当汉奸,以后没有好果子吃。为了找条后路,段树梅也托人找我们的联络员连学增同志,说他愿意和我们建立联系,提供军事情报,听我们的调遣。

第一次谈判我们提出的条件是:一、要不断的给我们提供各种情报;二、除敌人强逼他们配合到沙区进行“扫荡”外,不准自己到我根据地来抢东西;三、要经常的为我们买些我们所难买到的军用物资,尤其是枪械、子弹。段树梅提出要我们多派部队袭击他们,他们好向上司要子弹卖给我们。后来,段树梅也确实为我们买来了一些我们所急用的东西。

对我沙区的主要威胁来自东庄,自我们与许群英、段树梅建立了这种关系后,大体可以掌握了敌人的活动,日伪的每次扫荡,其兵力、部署及路线等都可以事前得到准确的情报。

1941年秋，分区和地委决定，因西永建据点离我根据地太近，不便于我们开展工作，要段树梅扒掉据点。分区指派我去找段谈判。段树梅再三强调困难，怕上司怀疑他私通八路，实际上是他怕离了窝，丢了权。我说这是分区的决定，你自己不撤出扒掉，以后我们也要攻破据点扒掉。段树梅害怕我们真的去拔他的据点，也就勉强同意撤出据点。

第二天，分区司令员朱程和政委王风梧派我带特务连去西永建赶段树梅走。可是，我们到了西永建，段又变卦了，他搬出很多理由不愿意走。我们从傍晚一直谈到下半夜，段觉得硬抵软磨都不成了，就说，要是叫我这样不声不响的退出西永建，那我没法交待，你们要摆出攻据点的样子，多打枪。并说耗掉的子弹他包赔我们。

说好条件，安排了我们进攻和他们逃跑的路线，我们就向据点猛烈开火（实际是假打），他们也向我们打枪。

这样假打了一个多小时，石光村的民兵听到枪声赶来支援，他们以为我们是真攻打据点，就从段树梅他们背后向据点里扔了两颗手榴弹。段树梅说炸伤他的人了。我把段树梅找来说明情况，段树梅才拉着一部分人撤出了据点。

可是，据点里的队副陈树林却不肯走，他带着几个惯匪出身的伪清乡队员继续顽抗。天快亮了，他们还是不走。我跳到据点的院子里向他们喊话，他们从炮楼向我直投砖头。我们的战士火了，一阵猛攻，就打进了炮楼，把顽抗的几个家伙全俘虏了。后来，我们又把他们释放了。

段树梅撤出据点，跑到冯好学那里，说他坚守不住据点，被撵出来了。冯好学仍要他回西永建守据点。第二天，他们又被护送到西永建。可是，护送他们的人刚走，他就又逃跑了。这样来回送了两次，段始终不敢在西永建住下来。后来，我们见敌人不肯放弃西永建，而且有可能派别的人去当队长，我们觉得还不如让段树梅回去比较对我们有利。这样，段树梅才又回到西永建据点。

这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段树梅突然跑到我军分区驻地程姜村来找我，要我们快点把他抓过来，并要求连同西永建据点一同拔掉。原来是因为他和伪团长冯好学的一个跟班的（警卫）争夺一个女人，段树梅已经把女人弄到手了，他怕对手干掉他，所以就想出这样一个办法，连夜找我商量。我向分区党委和地委汇报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分区和地委觉得西永建据点暂时还没有必要撤掉，可是段树梅说什么也不肯回去。我分区司令员、政委和主任商定，如段不肯回去，就让他队的副队长陈树林代理。第二天，我们派民兵把刚刚回到据点的段树梅捉来了，等了很长一段时间，段树梅才又回到西永建。

段树梅这个土匪恶习严重，反动思想很深，虽然他也曾为我们提供一些情报，做过一些事情，不过这些都在他没有办法下才勉强办的。因为他第一怕我们把他消灭掉，第二怕他的同伙们吃掉他。实际上，段树梅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坏蛋。日寇投降后，段树梅投靠了国民党，在新五军进攻我解放区的时候，杀死了我很多民兵、干部和党员。

调 遣 敌 人

1941年秋天，我们内黄县大队有两个连到俄家、七级一带去执行任务。由于这里离高堤据点太近而被敌人发现了。高堤驻守敌人的一个团发现我县大队后，倾巢而出，在老塔坡沙窝里紧紧咬住这两个连不放。

老塔坡沙窝方圆十几里没有村庄，那里荆棘纵横，荒草丛生。我县大队的这两个连利用有利地形与敌人周旋。但是，因敌众我寡，力量悬殊，整整打了一上午，非但没能摆脱敌人，反而被敌人层层包围起来。敌人越聚越多，圈子越来越小，我们已经有了伤亡，形势十分危机。

我内黄县县长张志同志得知这两个连被包围的消息，到处联

系部队，可是，当时的联络工具非常落后，而且对部队的行踪也不好掌握，所以一时难于找到增援部队。后来，张志同志找到我们的联络员连学增同志，说能否利用伪军关系把我们这两个连解救出来。

连学增马上到大故县村据点去找许群英，叫他带全班人马出发到老塔坡解围。大故县离老塔坡很近，利用没人深的杂草树丛作掩护，向围困我县大队的敌人猛烈开火，以为我增援部队来了，就慌忙撤回高堤去了。我县大队的两个连遂安全解围脱险。

拔据点，活捉陈树林

我们释放了陈树林以后，开始他表现很好，还能主动向我们提供一些情报。段树梅被俘后，陈树林在西永建据点代理清乡队长。可是，到了1942年夏天，陈树林变坏了，他不仅不再给我们送情报，反而时常带人偷袭我们。陈树林知道许群英与我们有关系，他害怕我们利用许群英打死他，就先下手把许群英打死了。因为许群英是冯好学的外甥，陈树林又怕冯好学为其外甥报仇干掉他，所以，陈树林整天提心吊胆的过日子。为躲避冯好学，他不敢固定的住在西永建据点上，时常带着几十个人在西永建附近的村庄里转游。

陈树林变坏，完全是一个叫黑二妮的女流氓挑唆坏的。黑二妮原是河西一个土匪司令的老婆，外号叫黑团长，人黑心更黑，是个有名的母夜叉。后来，那个土匪司令被人打死了，黑二妮要不开威风了，就回到了娘家西永建。黑二妮的弟弟张永录是西永建村的一个恶霸地主，他是西永建据点的后台老板。陈树林没有老婆，黑二妮回娘家以后，就当了陈树林的姘头。陈树林变坏后，我们在一次打永建据点时，逮住了张永录。

当时，我爱人孙伯坚临产，根据地因反扫荡经常东藏西躲，这样，我就把她安置到沙区与敌占区结合部的王告村。那时候，我们

还不知道陈树林变坏,为了安全起见,我特地关照陈树林要保护孙伯坚的安全。黑二妮为了救她弟弟,就怂恿陈树林捉孙伯坚来换张永录。产后的第七天,陈树林就带人到王告村来抓孙伯坚,幸亏事前得到情报转移了,才没有抓住。

陈树林没能捉到孙伯坚,黑二妮拿孙伯坚换张永录的计策落空了,就亲自找上门来向我们要人。

张永录罪大恶极,罪该枪毙。可是,我们觉得陈树林变坏以后比张永录对我们威胁更大。群众的民愤也大,所以我们就提出以捉住陈树林为条件,然后放回张永录。黑二妮权衡了利弊、远近,同意了我们的条件。不久,我们通过黑二妮捉住陈树林把他枪毙了。

打进乔岳村据点

乔岳村是李英的直属据点,据点上人多武器好,有百余条枪。敌人在乔岳村村周围挖了二、三米深的壕沟,出进都是走吊桥,防卫的很严密。据点离东庄只有三华里,这里一出现情况,东庄马上出来增援。乔岳村据点的敌人仗其人多枪好后台硬,以为我们奈何不了他们,所以就经常到我沙区边沿村庄去抓人抢东西。有一次,他们还袭击了我内黄县一区政府,抢走了10多支枪。

乔岳村据点的伪队长叫张文亭,20多岁,土匪出身,不识字,其父早亡,母亲是个蛮不讲理的农村泼妇。张文亭可以直接见到李英。如果能把张文亭争取过来,我们就可以搞到敌人更重要的情报。

分区党委详细的分析了张文亭的情况,觉得他有争取过来的可能,就决定派连学增和苏化众同志当中间联系人,让我们去做他的争取工作。张文亭与苏化众同志原来就认识,经过我们做工作,张文亭愿意为我们提供情报。乔岳村据点的伪乡丁有些人是从我根据地中心村跑来投靠张文亭的,多少懂得一些我军的政策;抗日有功,立功可以赎罪。因此,我们在乔岳村的活动非常顺利。

1941年冬天,张文亭突然反常,不听我们的指挥了。军分区决定要教训一下张文亭,打一儆百。一天夜里,我们偷袭乔岳村,俘虏了张文亭,连同他的老婆也被捉来了。张文亭有罪恶,有民愤,但考虑到他也做过一些有益于抗日的工作,决定对他进行教育后释放回去。可是,在我军从高王尉转移到崔张固村休息时,张文亭和一位姓李的副队长却乘隙逃跑了。地委觉得张文亭的逃跑是放虎归山,对我们的工作将后患无穷。军分区党委指派分区政治部主任魏明伦同志负责把张文亭的问题处理好。后来,魏明伦同志利用关系把张文亭叫到城姜村。记得张文亭来时还带了些礼品,表示请罪的意思。经双方协商,张文亭保证定期向我们提供情报,我们在政策允许下,尽力扶持张文亭再次建起乔岳村据点。

从那以后,张文亭与我们的关系更密切了,每次敌人到我根据地去扫荡,他都要先送出情报告诉我们。后来,张文亭率部起义投诚,建立了我东庄抗日游击队。

击毙伪旅长唐海亭

1942年秋,李英亲自指挥伪军近万人分兵三路到我沙区根据地“扫荡”,西路由鹅家、高固、七级、王尉、姜村、太平一线进攻沙区;东路从内黄县城向碾头、王什、杨固、聂固、后河一线进攻。中路由东庄、乔岳村向毫城、李后、次范、张固一线直攻;旅长唐海亭任中路指挥。当时,我地方党政机关住在李后、路洲、马集一带,军分区部队住在张固、野庄、草坡、赵庄等村。接到情报,我党政机关向南转移,部队留下未动,一则掩护党政机关转移,二则准备寻机歼灭敌人。因一时对敌人这次“扫荡”的意图和兵力部署摸不清底细,我们派苏化众、连学增马上找张文亭去要情报。

弄清了情况,我分区司令员朱程和政委王风梧决定以少数兵力牵制东、西两路敌人,集中优势兵力围歼其中路之敌。

14日凌晨,中路敌人走到张固附近,我主力在颜东山司令员

的指挥下,突然冲入敌群,一阵猛杀,歼敌大部,中路指挥唐海亭在逃窜中葬命。余下的敌人象羊群一样仓惶向北逃窜。后来听说敌军长李英逃跑时把帽子都跑掉了,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三、四百人,俘虏七、八百人,共计千余人。

战斗结束以后,我们把唐海亭的尸体用棺盛好,让群众拿着军分区写的信,把他送到东庄。

西永建战斗

1943年春,形势有了好转。接着,我们又拔掉了敌人的西永建据点,我军占领西永建以后,对盘踞在东庄的李英威胁很大,李英为此坐卧不安。他说:不论是谁,只要能夺回西永建,就让他顶唐海亭旅长的缺。伪四团一个姓金的团副当官心切,自告奋勇要夺西永建。

金团副有30来岁,是国民党派到伪东亚治安军第一路中的一个特务。他带人拼命攻打西永建,从上午一直打到黄昏,我们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傍晚时分,我朱程司令员发现有个拿望远镜的家伙躲在一条路沟里不断指手划脚的说着什么,断定一准是敌人的指挥官。朱司令员把卫河大队一个叫二磨道的连长找来,说:别人都说你是个神枪手,看你能不能把这个拿望远镜的敌人撂倒。这个连长的枪确实靠(即准),敌人对他是闻风丧胆。按朱司令员的指示,他端起一枝三八式步枪,一枪就把那个家伙打了个嘴啃泥。原来这正是那个想邀功当旅长的金团副。旅长没当成,却成了枪下鬼。后来听到他有个漂亮的太太哭的死去活来。

打死金团副,敌人没有了指挥官,就抬起他的尸体向东庄跑了。

从此以后,没有日军配合,李英再也不敢单独与我军作战了。

(张怀恩 整理)

开展敌伪军和敌占区工作回忆

李苏波

开展敌伪军工作和敌占区工作，是争取和瓦解敌人，巩固抗日根据地的重要措施，也是我党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内容。

1941年8月，我调五分区政治部任敌工科长。在我来分区担任敌工科长之前，孙紫方同志是民一旅和分区敌工科长兼敌工办事处主任。当时的工作重点是打通从沙区到太行的地下交通联系，建立地下秘密交通线。

从沙区到太行，在过了卫河后便进入敌占区。日寇在平汉路两侧的占领区约120余华里，截断了我太行和冀鲁豫两区的联系。过去我们干部从冀鲁豫到太行、延安，或从太行到冀鲁豫、华东，都需要两边派两个团的兵力护送，而且时常发生战斗，有时受到严重的损失。1940年8月，闻允志同志赴太行，虽有南支十六团护送，但仍牺牲于卫河。1941年1月，民二团（即十三支队）由张锡珩同志率领由太行来沙区归建，在路过汤阴城东汪流屯汪怀密会匪辖区时，被汪怀密指挥数千名会门伪军阻截，部队受到严重损失。而且，由于我们对敌占区和敌人据点内缺乏可靠关系，以致对敌人兵力、活动、“扫荡”等情况无法掌握。例如日寇对沙区进行“四·一二”大扫荡前，敌人在管辖区抓夫派车，准备来沙区抢掠，但因我们缺乏情报工作，未能早日发觉，没有作好反“扫荡”的准备，结果使沙区根据地基本区受到了惨重损失。这些都说明，开辟敌占区工作已成为非常紧迫的重要工作，必须迅速开展起来。

华北抗日民军一旅由太行到冀鲁豫沙区后，在磁县设有办事处，主任边伯明同志。为了保持沙区和磁县办事处的联系，民一旅政治部副主任魏克仁、曾同参谋黄世贤同志通过安阳敌占区工作关系到达沙区。所以，从1940年5月以后，朱程司令员即命令黄世贤和安阳城东的李业茂、张常慎联系，在李业茂家设立了秘密联络点。八月以后，由太行来冀鲁豫或由冀鲁豫赴太行的干部，即由黄世贤来往护送。随后，又由张建民（安阳城东羊店村人）任情报科长，来往于沙区与磁县之间，开辟敌占区工作。魏克仁、毛定远等同志曾在李业茂同志家住过，对李的父亲（开明士绅、秀才）做了大量思想工作，求得了他的支持，由于来往过路人员的增多，分区还派侯兆璞同志协助李业茂在杨奇村、辛村开设了车马店，进行掩护。仅1941年，这条线护送干部近千。

此外，朱程还派黄连奎、王化棠、郑建国等同志，分别到安阳城内搞情报工作和敌伪军工作，并为沙区部队采购了一批军用物资。

为了加强对敌伪军和敌占区工作的统一领导，地委和军分区成立了对敌伪军工作委员会，由地委书记郭超兼任（后为白潜）书记，委员会吸收有关同志参加。当时要求各县县委设立敌工部，指定一名县委委员负责。并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活动。交通线沿途设有敌工站，分区建敌工总站，由我负责。当时我们抽调干部组成武工队，我任队长兼政委，深入卫河敌占区配合地方政府开辟工作。

我们的武工队只有12人，曾袭击东庄李英军部，摸过内黄城关镇公所，袭击过南乐县的元村集和龙王庙，打了卫河县靳德固，拔掉了韩村集据点，并消灭伪军一排，俘伪军27人。金怀哲同志还通过顿丘县敌工站提供的情报，领着武工队进入濮阳城据点，活捉了3个鬼子和1个日本妓女。但撤退时鬼子又逃脱了。

当时，地委、分区很重视开辟卫西敌区工作。分区为武工队增配了干部，武工队由12人增至20余人，分区政治部主任魏明伦和

副主任魏克仁都亲自作敌伪军工作和敌区工作。政治部的科长张明、肖建波、王凡、门镇中等同志都积极配合。我随武工队外出活动时，即由敌工干事唐纪分管内勤，金怀哲分管外勤。他们认真负责，积极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当时我们对濮阳伪军刘福山、清丰伪军张裕元部都有工作，也有一些成绩。对内黄伪军工作成绩最大，争取了张文亭，并于1942年底反正，改编为东庄游击大队。

我在分区搞敌工和敌区工作约1年时间，沙区办事处建立后，即调办事处任敌工科长。华北抗日民军一旅和分区在卫西和汤阴的敌区工作大部移交沙区办事处。但民一旅和留在磁县的办事处，仍通过安阳敌区交通线开展工作。直到1942年底，第五、六两分区和南进支队合并建立四分区后，五、六两分区的敌伪工作和敌区工作又交给四分区政治部敌工科。敌工科对外称办事处，大部分干部仍是民军和五分区的。魏克仁任科长，张明、耿增泽为副科长。敌工科仍在沙区，配合沙区办事处工作，作出了很大成绩。

我是1942年七、八月间调到沙区办事处任敌工科长的。沙区办事处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负责开展卫河西部安阳、汤阴、淇、浚等县的敌伪军和敌占区工作，开辟交通联络线，沟通太行与冀鲁豫的联系，护送干部过平汉铁路和开展情报工作。同时，还为根据地部队采办军用物资等。

为了打通太行与冀鲁豫边区的联系，我十八集团军彭德怀副总司令指示在太行的林县建立了豫北办事处，积极开展平汉铁路沿线的敌伪和交通工作。同时，指示冀鲁豫军区和区党委，在沙区也要建立相应的机构，加强对卫河西敌占区的工作，接通与太行区的联系。1942年春，军区派王乐亭、魏克仁同志，去太行总部接受任务，配合豫北办事处，在安阳至汤阴平汉线两侧100余里的敌占区，开辟一条交通线。同年5月，成立了卫西工作团，8月，正式建立了冀鲁豫军区办事处（对外称沙区办事处）。军区任命有长期秘密对敌斗争经验，处事谨慎认真的王乐亭同志为办事处主任，李毅

之为秘书长，孙紫芳为办公室主任。同时，还委任刘哲民为交通科长，后为马赛同志。当时，由华北抗日民军一旅建立了从沙区到磁县贾壁民军办事处的两条交通线，也移交给沙区办事处。因此，张建民、王化堂、侯兆璞和长期隐蔽在敌占区工作的李业茂、张常慎、郑建国等同志，即交由办事处来领导了。

马赛和王化堂都是汤阴县人，人事关系和地理情况都很熟悉。他们利用亲友和家属关系，不怕风险，作了大量的工作。区党委机要科的王兴同志，承担党的机要文件的传送任务。作敌工的翟俊家、侯兆璞、张符瑛、叶纪全等同志，都到敌占区和敌伪军内部开展工作。侯兆璞以开杂货铺为掩护，在安阳城东作联络站，张符瑛、叶纪全打入伪自治军三旅程道合部做争取工作。后来，建立了情报科和电台，由林亦中、张殿一同志分别任科长和台长，译电员任汝楨。军区后勤部采购科长王言炳、武世洪同志，也由办事处代管。各县还建立了采购站，深入敌占区购买军火，他们经手完成了大批根据地的军需短缺物资。另外，还有生活队长王保生，保卫干事孟伟和一个警卫连。当时，沙区办事处除警卫部队外，有30余人。

总部和一地委派去的一些同志和当地干部结合开展工作，在安阳的有李业茂、张常慎、张建民、李德成和刘峰等同志；在汤阴、淇县、浚县的有付凌云、胡紫青、孔子林、王桂生、郑建国、杨德普等同志。还有华北抗日民军与磁县办事处边伯明同志单线联系的交通系统的黄世贤、黄连奎，他们经常往来于敌占区护送干部，搜集情报。冀鲁豫边区行署设在井店的贸易总公司经理马一之、监委何幼琦同志，负责对敌占区的经济贸易工作，与我们的办事处进行有力的配合。

我们对敌伪军和敌占区，采取了按照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方针。

由于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抽去了大量兵力，因而日寇的力量从1943年起，在华北有所减少，不得不大力发展和依靠伪军。当

时,从冈村宁茨华北总司令部石家庄,至新乡的小松混成旅团之间,安阳驻一个联队,汤阴、淇县各驻一个大队,铁路沿线兵力很少,其内部十分空虚。所以,则大量扩编伪军。同时,收买和利用地方封建势力,设立自卫团、土局子为其维持秩序。这些土局子的头头都是封建地主土匪流氓,一方面投靠依附于日寇,控制和扩大地盘;另一方面,因在漳南战役中受到过我军的打击,慑于我军的强大威力,又要对我进行应付,表示愿意和我军建立关系。同时,对国民党也暗中勾结,以备日寇失败后投靠。但是,这些伪军和土局子又互相矛盾,争权夺利,为争地盘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而时常发生械斗。王自全为抢占安阳县二区,在1941年打死了李台。王自全和程道合为争边界也相互火并过。我们根据伪匪头目和各自特点,分别进行争取工作。通过派去干部和利用地方开明士绅,开展政治攻势,对他们进行民族大义和爱国一家的宣传,并通过经济上给他们一定的好处,来争取为我们做工作,最低要求其暂时保持中立。经过我们的工作,安阳东部地区的王自全、程道合等,也都表示愿意保护我们过路干部,并向我们提供一些情报,帮助我们采购一些军用物资,与我们初步建立了关系。

在汤阴和淇、浚地区,1940年赵紫阳任冀鲁豫区二地委书记时,集总即派黄友若为卫西工委书记和刘哲民同志进入浚县;做天门会杨贯一的工作。以后赵紫阳又派李先贤,以汤、浚、汲、淇卫西工委为基础,建立了四县边工委,开展敌占区工作。胡紫霄则打入天门会内部任参谋长,直接掌握天门会武装。他们曾先后掩护吕正操率冀中部队赴太行,保护邓小平和大批领导干部安全通过平汉铁路,开辟了由沙区经淇、浚县而到达太行辉县、林县的另一条秘密交通线。

在卫河西部,一地委书记郭超派刘峰、赵振帮等同志深入到楚旺、安阳、汤阴等地工作,以后王乐亭到沙区办事处,与敌占区同志迅速取得联系,很快建立了由任固、辛村、崔家桥至任村的一条主

要交通线。王乐亭亲自从这条交通线上把刘少奇同志安全地护送到了太行。

汤阴东部紧靠卫河的王陵集，驻有施恩民的地方团队，他和孙紫芳同志关系较好，我们争取了施恩民，并掌握了驻该镇的伪军中队长施炳南（施恩民的长子）。施恩民的二儿子施炳乾比较进步，要求到解放区参加工作。我们动员他不要离开当地，做有利于抗日的工作。这样，他配合我党员杨德普同志，掌握了五陵集，使之成为我们掌握的桥头堡。刘少奇同志的爱人，就是由黄世贤护送，从五陵集过卫河到达太行和刘少奇会合的。在鲁西大“扫荡”时，杨勇同志的爱人林彬（过月子）和黄敬同志的爱人范瑾，就隐蔽五陵集，由施炳乾派佃户保护的。1943年敌人“扫荡”沙区，办事处机关转移到卫河边的大刘庄渡口，施炳乾为我们提供了安全保证，在敌人追击中，由马赛同志率领渡过卫河的。当时，我们的便衣人员在王陵集，来往行动无人过问。此外，翟俊家同志对汤阴县的菜园集司华生自卫团，和任固集的土局子，都做了大量工作，保证了我们在卫河的草坡渡口的安全畅通。

1943年春夏之间，皇协军第一军李英部由内黄东庄、楚旺调往安阳，伪东亚同盟自治军王天祥部接防。军部先驻楚旺，后移大名。王天祥任军长，下辖四个旅：一旅旅长李成华，二旅旅长陈希孟，三旅旅长程道合，四旅旅长杨法贤。四个旅分别驻在大名、四隆、楚旺、太保、东庄、南乐、元村等处。王天祥在平汉线驻防时即与我军有过联系，刘哲民同志曾在该部做过工作，其部队深受我党、我军的影响。王天祥本人则与我党党员陈季章在冯玉祥的西北军时是老同事，因此，他委任陈季章为伪三旅程道合部的参谋长。我们又派张符瑛、叶纪全到三旅工作，协助陈季章。我们打清丰时，就是由陈季章等同志送去请报后，制定了作战计划，对夺取清丰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四十军又委任程道合任师长。当时，马法五、高树勋国民党军队已夺

取了我们解放了的汤阴县城，正向北急进。程道合看到国民党大军过来，便拒绝了我们规劝他起义反正工作，并将派去的我党干部陈季章、张符瑛、叶纪全同志扣押起来，送到郑州战区集中营。陈季章同志受刑致死；张符瑛、叶纪全同志也受到严刑拷打，但他们坚持了共产党员的气节，没有向敌人屈服。王天祥于1945年率部反正，走上了革命道路。王自全则把我们派去的代表活埋了。解放后王自全受到人民政府的惩处。

我们在开辟卫西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几年来仅护送干部就超过万人，党中央和边区的许多领导同志及各地区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就是通过我们的地下长城到达党中央的所在地延安的。同时，还取得了大量的情报，购买了大量军用物资。但我们也付出了代价，有些同志在战争中牺牲了，在此，我对于开辟交通线，坚持做敌伪军工作和敌占区工作的同志表示无限敬意，对于献出生命的同志表示深切的怀念。

湖西军分区情报站工作回忆

张北辰 王维恭

我于1943年初由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湖西军分区)调金乡县情报站任站长兼县大队参谋,1944年秋末调军分区司令部任侦察股长兼情报总站站长,1946年2月调第二军分区任司令部情报处主任(股改处团级单位)。在多年情报工作的对敌斗争中,以金乡情报站的工作最实际,斗争最尖锐,因而记忆犹新,现回忆如下:

一、情报工作是对敌斗争的耳目,是打击敌人保存自己取得战绩的重要手段。情报工作做不好,特别在两面作战四面受敌的情况下,等于盲人骑瞎马,到处碰壁,寸步难行。

1942年12月20日,在日酋32师团中将司令统一指挥下,从徐州、丰县、砀山、商邱、单县出动12000余人并有大批伪军配合,从南往北向我湖西根据地实行拉网大扫荡。由于情报工作太差,日军这样大的行动事先不得一点消息,我党政军领导机关正在柏常集开大会演大戏之际,大批敌人打进了我们的大门。这时军分区才紧急通知,令九、十、十一团在保护领导机关安全的前提下,边打边撤。21日,日军拉网到金乡城南仇李庄一线时,幸好日落西山,我党政军民趁天黑的机会,从敌人空隙中利用抗日沟的有利条件向南跳出封锁线,仅有金县县委,政府和警卫连在大棠树附近未动,次日拂晓与敌人遭遇,因寡不敌众而全军覆没。

这次大扫荡虽然粉碎了敌人妄图歼灭我抗日武装,毁我抗日根据地之目的,但损失重大。十团团长肖明、专署专员李贞乾、公安

局长丁志诚、科长任子健、渠伯魁、县公安局长王光等光荣牺牲，金乡县委书记，县长李剑波负伤后和 70 余名战士被俘，物质财富的损失就相当严重了。

二、在总结经验，接受教训的基础上，地委、军分区作出“加强情报工作的领导，健全情报机构，选调政治坚强熟悉本地情况又有一定军事素养的优秀干部任情报站长的决议。”

1943 年初，我任金乡情报站长后，领导非常重视，由县大队副大队长周冠五亲自领导，敌工部密切配合，作出计划迅速开展工作。

(一)健全领导班子，充实交通情报人员，组成坚强有力的战斗集体。

原情报站仅两人还兼地方交通工作。改组后从军分区又调一位老侦察排长(连级)任副站长，县大队任命土生土长机智灵活政治坚强的外勤干事王维恭、内勤干事王维臣，并选拔六名交通员，其中一名会说坠子书，一名绘图员(说书掩护便利侦察绘图工作)，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行政治业务学习，任务明确，分工具体，奖惩严明，及时总结工作，从而提高了认识，积极工作，都能完成领导所分配的任务。

(二)打进去拉过来，发展情报关系和交通员，建立完整系统的情报网络，达到及时、准确得到敌人的情报：

1. 在敌人要害部门建立情报关系：驻金乡城日军司令部的谍报队共 13 人，其中有我敌工部打进去的崔长胜、王邦军、王新良、高志亮四位党员。县委决定：高志亮专做情报工作，由情报站直接领导，接关系时副大队长周冠五、敌工部长李长法亲自介绍，并提出很好的意见和指示。从此高志亮认真负责积极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谍报队的关振山、韩丙玉发展为党员，张振山、芦景河、王广德发展为情报员。至此谍报队 13 人中有 9 人是我们的人，其余 3 人也为我们所掌握，连日本石井司令官的勤务员乔兴友也为我

们服务了。因而敌人的一举一动都能及时准确的被我们所了解。

2. 在敌伪军内部和高级官员中建立关系：金乡县伪自卫团约千余人，团长周亚洲与周冠五是同村同姓弟兄，经过各方面的工作，成为我们的情报关系，如有重大情况和问题，都能及时的传送情报站。

祁保德是土顽第七路的一个旅长，该旅约千余人，投降日本后仍称祁旅，为掌握祁旅的情况，我们仍把与祁保德有亲戚又是老朋友的杨贞祥同志设法打进去任祁旅谍报组组长，名义上搞我们的情报，实际上为我们服务，工作很好，成绩显著，不久发展为共产党员。

3. 利用拜把子，入青红帮，广交朋友，发展情报关系。王维恭经组织批准拜金乡青红帮头子李福臻为师父，并与伪警备大队中队赵瑞亭、宋景玉、闫承元、尚锡柱、汤玉生、赵仲文等为把兄弟，他们不仅及时的供给情报，特别是他们在碉堡楼（封锁线上）驻防时，我们的交通员路过交通口通行无阻，大大方便了人们与情报总站和各方面的联系，保证把情报及时送到领导机关。

4. 济宁是日本极为重要的战略要地，金乡之敌又由济宁所领导，掌握济宁敌人的动向和情报是非常重要的。为此，我们动员赵瑞亭（伪中队长）辞职赴济宁以做生意来掩护负责济宁的情报工作。赵赴济宁后利用敌伪老朋友建立关系，收集情报，由我们的交通员闫坤河父子二人传送。

5. 选好两面的伪乡长为我们的情报员。靠近县城的马集、桃园庄等四个伪乡长是经县委批准担任的，表面是敌人的乡长来应付差事，实际上是我们的地下情报员。

6. 在四通八达的交通要道设监视点。金乡敌伪外出，西门外隅首是必经之道路，北去济宁、南去单县，西去曹县，或从外地进城之敌定从此处经过。为此，我们在隅首的一角设一固定点，以开饭馆作掩护，日夜监视敌人的出入情况，及时向情报站传送，如有重大

消息我(身带良民证)或派交通员住店观察,紧急情况迅速骑车从小道回站报告。

另外,人们在金单公路上的马集,鸡黍集等地交通要道上,设监视点,以摆小摊作掩护,监视敌人的行动。

7. 在群众中选好义务情报员:在金南交通要道的各个村庄,经村支部或村长协助选派积极分子和党员为义务情报员,发现敌人过往或扫荡,一村传一村,这给情报站增添了耳目,便于及时掌握敌人扫荡的动向,便于民兵保护群众转移和他们的身家安全。

8. 认真选好交通点和交通员,点线结合形成严密而系统的情报网络,单线联系绝不发生横的关系。情报关系是绝对秘密的,为把情报及时传送必须建立政治可靠的交通点和交通员。如自卫团长周亚洲由本家侄子周守真家(我们的交通员)传送,祁旅内线杨贞祥由王丕庄张慎萱家交通员传送。日军司令部高志亮由城南八里张暗楼孙连海夫妇家(我们的交通员)传送。

同时,情报站必须设立固定联络点,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接受交通员的情报。为此在金南30里王坑设一固定点,该村党员多,支部领导强,又是王维恭、王维臣的家,同时我们又挖了地道(磨底下是入口,村头外抗日沟内是出口),敌人大扫荡大搜查都不怕,只要情报员送来情报就有人接受,保证及时把情报送到总站。

三、情报站改组后的主要成绩

1. 营救县长李剑波。

李县长被俘后,县委非常重视,确定敌工部(站)和情报站共同设法营救,经内线王邦军、高志亮、王新良了解,李县长和被俘人员400余人关在城内辛家祠堂内,由伪军班长杨朝臣和一鬼子看守,杨朝臣会吸洵洛英,通过杨朝臣的亲戚两面乡长刘效骞送给他几包白面说,他的表哥是老百姓被鬼子抓来,想救他出去,杨一见白面高兴万分说,你们放心办吧,鬼子我缠着他。恰巧祠堂后墙有个用砖临时堵着的洞口,人们把砖扒开把李县长领出来(又把洞堵

上)到崔长胜家里,第二天化装跟崔长胜、王新良同时混出城来,这样把李县长营救出来。

2. 解救被俘人员 400 余人。

日军大扫荡后为实现他们的蚕食政策,在金南和单北大修碉堡楼,我情报人员把鬼子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中队带领被俘人员 400 余人赴周庙修碉堡的时间、地点、路线事先报到情报站,经县委、县大队研究,认为这是解救被俘同志的大好机会,决定县大队全力以赴并有九团一个营配合,在薛凹村东头埋伏。情报准确,作好了准备,敌人进入埋伏圈后,我军突然袭击,敌人伤亡严重,张惶失措,立即退到周楼村顽抗,我被俘人员 400 余人和民夫 300 余人在我军的掩护下逃回各自的家乡。

3. 情报及时准确,作好充分准备,取得反扫荡的完全胜利。

1943 年 11 月×日根据济宁赵瑞亭和自卫团长周亚洲的情报,特别是日军司令部谍报队高志亮以及日本司令石井的勤务员乔兴友听到的消息,日军从济南、徐州等地抽调日军 1 万余人并有大批伪军配合,对湖西根据地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我们提前把综合情报送到情报总站,经军分区领导研究,党政军民立即作好反扫荡的准备,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跳出合围圈,有的插入到敌占区,地方部队化整为零,群众空壁清野,把粮食埋藏起来。在此情况下,日军万余人从四面八方以单东中兴集为中心目标的铁壁合围扑了空,日军又经 10 余天的反复合围扫荡均一无所获,只得掩旗收兵,我们取得反扫荡的完全胜利。

4. 以策反手段利用情报员处死罪大恶极的汉奸李松峰。

日本宣抚班李松峰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迫害我抗日人员,欺压群众,作恶多端,特别对我情报人员威胁极大。经研究决定以策反手段除掉这个害人虫。为此让崔长胜、王邦军设法把我们的宣传品藏到李松峰家里,然后在大街小巷张贴。日本石井知道后令谍报队侦察破案,崔、王领敌人到李家里查出了与张贴宣传品一样的

宣传品。因此石井非常恼火,把李松峰叫到司令部审问,当即用刀刺死。消息传出后,人心大快,而且对汉奸走狗也敲响警钟。

5. 情报员机智灵活智取碉堡吓退敌兵。

1943年冬,在军分区统一指挥下,我九、十、十一团主力及县大队攻打金曹县等地50多个碉堡,金城附近的几个碉堡由我(大队参谋)率领寻楼、郑楼、周楼区三个中队负责解放。在主力部队连续胜利,捷报频传的形势下,我们利用关系除连店、官庄两碉堡之敌劝降外,其他三个碉堡一枪未发智取而得。

桃园庄碉堡离城五里,当夜12时我率区中队进攻,经过部署后虚张声势,除惊起狗咬鸡叫,鸟飞外,我以十团团政委名义向碉堡之敌写一劝降信,让情报站小张(13岁)化装农民小孩去送信,伪军队长问他是什么军队,他说:我也不知道,说话不懂,都是些蛮子。伪军看了信,又听了小孩的一番话,认为是八路主力部队,打了一阵枪向城内逃窜了。我们当即放火把碉堡燃烧,火焰冲天。因此霍埝寺(金单公路)牌坊林、张庄(金鱼公路上)之敌不了解情况真相,吓的丢掉碉堡,偷偷的溜回城去。

俞屯离金乡40余里,离济宁30余里,是汉奸大队长赵坤亮驻防的地方约800余人,对矩野县开展工作影响很大,为此分区领导决定拔除这个钉子,由十团主攻,九团阻击济宁增援之敌,矩野县大队阻击金乡之敌,令我情报站切实掌握敌情变化。为此我们情报站5人由张北辰与王维恭率领,住城东北徐楼伪乡长家(我们的关系)以村西头大相树底下为联络点。当俞屯打响后的当天晚上,金乡出动1500余人,其中鬼子近百人,高志亮打前哨侦察,他借机迅速到徐楼向我们报告情况,并说敌人出城后不敢冒险前进,两小时才走到五里后土庙前,根据此情况经商议以虚代实大张声势来迷惑敌人,让高志亮向日本司令报告,万福河北八路大大的有。另一方面,我们的交通员到万福河北村庄拉铃打电筒引起狗叫鸟飞,日本司令说狗说话了,回城。从而一枪未发吓退了敌人的增援。保

证部队顺利攻克了俞屯，共俘敌 700 余人。

6. 高志亮冒险送情报，使我情报站同志脱险。

济宁嘉祥边境的土顽孙秉贤，闫乾树 3000 余人，在童庙、小山子周围活动并设有据点，为开展济宁边区的工作，军分区决定消灭这股敌人。令九、十团、十一团主攻，金矩、嘉祥等大队阻击敌援，令我站及时掌握金城敌人的动向，保证我军顺利作战。情报站四人由王维恭率领，在城西八里李桥李×家为联络点，由于本村坏人告密，金城敌人派突击队长邓四老虎（凶恶如虎排行老四而得名），带 40 余人赴李桥消灭我们，天明后并有 1500 余人增援孙秉贤。内线王邦军、高志亮得息后，立即让高志亮出城报信，但因天晚，四门紧闭不能外出。为此王把高从城墙上用绳子吊下去，高忍凉受冻淌过胸口深的冰水迅速到李桥送信，当我们刚出庄头不远，敌人就入村到我们住户家围攻，因我们及时离开，敌人因捕空而告终。

我们到第二个联络点大赵楼后，立即派交通员向满洞军分区前方指挥部报告敌人 1500 余人增援的情报，由于敌情变化，我军速战速决，消灭孙秉贤据点外围一个营后就结束战斗。

四、主要体会

1. 党、军领导重视，加强情报工作的领导，是搞好情报工作的关键；

2. 选调得力干部，组成团结战斗的领导班 子和交通员队伍，是做好情报工作的组织保证；

3. 情报站与敌工部队密切配合，打进去，拉出来，在敌人要害部门、高级官员中发展内线关系，在重要交通要道设监视线，选好联络点与交通员，组成严密的情报网络，是搞好情报工作的特殊手段；

4. 依靠群众，建立群众性的情报网络是搞好情报工作的重要环节；

5. 加强情报和交通人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对情报工作重

要性的认识,是搞好情报工作的思想基础。

通过经常的政治教育和思想工作,情报员和交通员树立了三要三不要的思想和决心。

三要:要坚决完成上级所交给的任务;要服从命令听指挥;要抗战到底。

三不要:不要钱(情报关系,交通员每月小米 150—200 斤,情报站交通员每月一元钱的津贴),不要官,不要命(情报人员随时随地都有牺牲的危险)

战斗在敌人心脏

马 东

1941年秋，泰安敌四二九六部队伙同伪军封锁了泰肥山区，泰安(西)县敌伪据点增设到36个，在重点村镇实行保甲制，每十户为一甲，每十甲为一保，百户以上的村庄设联保，按户数颁发良民证，盘查户口十分严格，使抗日活动受到严重的限制，县区干部无处藏身，只好分批转移到黄河以西。留下坚持斗争的同志，也是昼伏夜出，分散活动。同年7月，泰安(西)县由5个区(3个完整区，两个不完整区)划为10个区，我被派到十区当财粮助理员，1942年春，县委将10个区又划分为4个领导单元，以便于开展隐蔽斗争。

1942年1月，泰安(西)县县委书记邹靖国被泰安宪兵队抓捕，叛变投敌，被任命为泰安县特务组长。接着邹靖国给各区委书记写了一封“明捕暗投”的信，使二区区委书记张鹏、四区区长兼区委副书记王仲玉、五区区委书记宿安民、八区区委书记警辉，九区区长于黄兴国、米松喜等人先后投靠到泰安宪兵队当了特务。他们又通知各区的党员到泰安宪兵队排队登记自首，使泰安(西)县党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当时泰安县的伪区政权只有二区因区长人选问题没有解决，故未建立区公所。一天，县委敌工部长崔子明听秦城车站爱护村内线村长毛清典同志说，泰安伪县府将要派区长来二区成立区公所。党组织决定派一名可靠而敌人又能接受的同志夺取二区伪区长职务，以利开展合法斗争，并找我谈话，决定让我扮演这个角色。遂发

动 12 个乡的伪乡长联名打报告,要求泰安伪县政府允许二区从自己区物色区长人选,并尽快派员到二区监选区长。

由于县委分头做好了伪乡长的工作,所以在乡长会议上,我顺利地当选为二区伪区长,由泰安伪县政府发了委任状。驻扎在区部所在地的敌警备队队长高泽通告我去上任,在夏张村正式挂了泰安县第二区公所的牌子,开始对外办公。同时,我要求泰安(西)县委抓住时机,向伪二区区公所多派些共产党员和得力干部来协助我搞好秘密工作。不久,夏张村党支部书记范景云打入伪区部,任二区伪自卫团团团长。从此,我们表面上应付敌伪,实际上是按照我地下县区党组织的指示对敌人进行“合法”斗争。

在开展两面政权工作中,我们和敌工部长崔子明保持着密切联系,按照他的指示,我们对敌伪展开了交、拉、打斗争,分化瓦解了敌人。

“交”,即对敌伪职员、特务采取交朋友的手段,让其为我们提供方便。如对伪县府事务秘书兼新民会主任薛子美,我们经常请他吃饭、洗澡、理发,主动靠近他,终于交上了“朋友”,使其尽量多批拨给我们一些定量供给的食盐、火柴、食用糖等生活必需品,我们买出来后及时转交给八路军、游击队和县区干部。

“拉”,即把敌伪人员拉过来为我们服务。如对宪兵队大特务赵长富、邹靖国的特务耳目李西占,我经常给他们送礼、拉关系,终于将他拉了过来,稍有风吹草动或将要发生危及我们安全的事情时,他就及时给我们通风报信。

“打”,即打击一些不可救药的铁杆汉奸。在成立区队的时候,原我独立营连副、携枪投敌分子宋其田及独立营侦察排长于维辰,要我答应由他俩任伪二区正副区队长,我说已经有了合适人选,他俩一听想通过我当区队长没有指望了,就去找县警备队队长高泽告密,说我是八路军崔子明派进来的共党。没想到高泽把宋、于二人对他说的话告诉了我,使我暗吃了一惊,我立即找范景云商量。

范说：“不把宋、于除掉，必为后患。”于是我们商量好打击他俩的对策，遂向高泽揭穿宋、于的阴谋。我对高泽说：“宋其田原是八路军独立营的连副，于维辰原是八路军的独立营的侦察排长，为了夺取二区的武装，才假投靠皇军。最近，他俩还打着您的旗号，敲诈马家店富户宋筱元400元钱，已交180元，收到条上盖的却是崔子明的手章，不信请您找他们来对质。”高泽半信半疑，遂把宋、于扣起来，又把西牛乡的伪乡长王岱云、马家店的宋筱元一并召集来。宋、于对敲诈宋筱元一事矢口否认，宋筱元一口咬定宋、于是打着高泽队长的旗号要的钱，可把钱交给了八路军崔子明。王乡长当面作证此事千真万确，并补充说明宋、于是打着高泽队长的旗号要的钱，可把钱交给了八路军崔子明。王乡长当面作证此事千真万确，并补充说明宋、于还要他担保宋筱元下欠的220元钱。宋、于还想狡赖，宋筱元便把宋、于打给他的现金收到条交给了高泽，高泽见条上果然盖着崔子明的手章，怒不可遏，我乘机火上加油说：“你俩给八路军募捐，还往高队长脸上抹灰，是八路军的奸细无疑。”高泽的眼睛红红的，下令把他俩拉出去枪毙。这两个汉奸就这样被我们借敌人的枪把他们除掉了。

杀掉宋其田、于维辰之后，泰安县保安队副大队长路文炳和高泽队长商定派他的原部下翻译官明百川（肥城人）到二区任区队长，这对我们的工作十分不利，县委敌工部长崔子明让我想办法除掉他。

明百川走马上任，住在夏张南街，找了一个绰号“三仙洞”的女流氓李××侍候他。一天，我去济南，明百川让我给他买个盛衣物的箱子，我给他买了一个漂亮的箱子。并有意买了钥匙相同的簧锁，回来后只交给明百川一把锁两只钥匙，他十分满意。另一把锁被我扔掉，只藏好了两只钥匙。明百川这小子流氓成性，不断到秦安城杨家胡同张心斋饭店吸鸦片，玩女人，他的薪金不够挥霍的，所以经常向各乡乡长要钱，乡长没钱给他，于是他对马家店的富户

宋筱元进行敲诈。一次，他对宋说：“你和共产党崔子明暗地勾结，我要把你送到宪兵队，就这私通八路的罪名，不死也得掉层皮，说不定花个万儿八千的才能保住这条命。”宋十分害怕，向他求饶，并托王乡长说情，明百川假惺惺地说：“其实我也不愿将宋先生送宪兵队，如果把宋先生押起来，谁供我钱花。”王乡长和宋筱元心领神会，马上交明百川 380 元钱，明百川说：“这样你还算欠我 420 元喽，那就由王乡长担保吧。”王乡长强作笑脸，点头应是，弄得宋先生叫苦不迭。

对明百川这一行径，我立即报告给崔子明部长和我地下区委，组织上决定尽快铲除掉这个坏蛋。我想还是“借刀杀人”为上策。

一天，明百川私自去了泰安城，他走后，我去问敌警备队长安部（他在夏张镇驻防），明队长进城请假没有，安部说不知道，于是我把明百川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讲给安部听，安部非常生气，说什么明百川当了队长根本没把他放在眼里。我趁机说：“安队长，明区队长前些时向宋筱元先生要了 800 元钱，说是送给您的，此话当真？”安部吃惊道：“怎么，明百川造谣造到我头上来了，真找死，回来跟他算帐。”我一看火候已到，立即辞别了安部，叫会计带上 420 元钱，我拿上钥匙来到明百川住处，“三仙洞”让我们进屋，我问她：“百川对你怎样，快结婚了吧！”“三仙洞”骂道：“他光叫姑奶奶侍候他，玩厌了又跑到城里逛妓院去了，真是没良心的东西。”我说：“你别生气，等他回来我劝劝他。”接着我给她钱说：“你到后街买壶好茶，我今天非得等明队长回来给你出出气不成。”她高高兴兴地去了。我吩咐会计看着门，迅速掏出钥匙，将明百川的箱子打开，把 420 元钱塞在他衣服里，顺便把他藏在窗台上的大烟枪也放到箱子里，急忙锁上箱子，然后装着没有事的样子等“三仙洞”回来。

“三仙洞”冲上茶，我们喝了几碗便说有事到区公所里去。“三仙洞”说：“区长，你可别忘了找百川。”我忙说：“忘不了，明百川的事包在我身上了。”我回到办公室，立即差人将宋筱元、王乡长请

来，共商给明百川算帐的事。

当天下午4点钟，侦察员报告说明百川骑自行车回来了。我立即给安部去了电话，安部叫我立即赶到明百川家。当我来到明的门前，安部已带着两个全副武装的兵杀气腾腾地走进了明百川家，这时明百川正在屋里洗脸，只听得安部大吼一声：“明百川！”明百川慌忙从屋里走出连声说：“在，在。”安部说：“头午有急事找不到你，干什么去了？”“去，去了趟城里。”“为啥不请假？”明百川无言可答。这时我暗示“三仙洞”叫她走开，她见事情不妙赶快溜了。安部又问明百川：“你吸大烟、逛妓院哪里弄来的钱？”明矢口否认吸大烟，我说：“明队长，你是不是把烟枪藏在箱子里了？”明冷笑一声说：“如果箱子里有烟枪，我敢以脑袋作保。”安部吼道：“打开箱子！”明百川轻松地开了锁。一个士兵立即从箱子里拿出了大烟枪，接着从衣服里翻出了420元钱。明百川目瞪口呆，豆大的汗珠从额上滚下来。安部问：“大烟枪是你的吗？”明百川点了点头，嘴只动了动，好像要说什么。安部又问：“这么多钱是从哪里来的？”明说：“我不知道。”安部吼道：“混帐，你箱子里的钱你不知道！是不是宋筱元的？”明百川说：“没，没这么多。”安部说：“你死到临头，还敢撒谎”。遂叫士兵去叫宋筱元和王乡长，我派会计给他们带路，不大一会把他二人叫到，宋筱元诉说了明百川向他敲诈800元钱的经过，王乡长从中作证，明百川说：“你没给够我，还欠我420元。”安部气得眼珠外凸，吼道：“拉出去杀头！”明百川大喊冤枉，安部毫不理会。

明百川被杀死在夏张镇西北角土地庙后，崔子明部长事后表扬我这次除奸干得漂亮。

1943年春天，泰安宪兵队的特务骨干汤光亮成立了“华北剿共军山东省剿共团泰安第一团”，并做了大旗，刻制了印信。他们的活动被我火车站爱护村内线村长毛清典知道后，即差人给我送来一封密信。当天下午，汤光亮、段宝瑞贴出布告，要求当地区、乡公所为他们提供给养。我问安部是否知道这个团的成立，他说不知

道,我乘机说:“应该问问上头是否知道,如不知道,应予以取缔,否则对你我不利。”安部点头称是,立即给泰安敌四二九六部队长滨野去电话,汇报汤光亮成立“剿共”团的事,滨野说不清楚。次日,我又找安部,说事不宜迟,应叫滨野问问省里是否知道,如果不知道,这个团肯定是支土匪,会扰乱我区治安。几天后,滨野来电话要我们配合安部抓杀他们。

我带区队配合敌警备小队到卧牛石村捣毁了“剿共”团的团部,抓到8名团员,逐个审问,从他们身上搜出了特务证。恐夜长梦多,立即将他们枪毙,扔在一口枯井里。当时他们的正副团长外出筹集枪支、资金,没抓住他们。几天后,也被我们抓住杀掉了。

同年秋天,泰安火车站西四、五公里外,公路上不断出现歹徒劫路,泰安四二九六部队命令二区队要尽快消灭这支土匪。我找爱护村村长毛清典了解此事,毛说这些路案全是宪兵队的特务下乡冒充八路军干的,应当借机狠狠打击他们一下。

一天,毛清典给我送来了情报,说有5个特务明天黎明到黄水湾劫路。我当夜带区队到黄水湾村北埋伏好。天刚放亮,只见5个持枪的歹徒截住了公路上推车的17个商人,索要钱财后骑车向南而来,我们一提枪将他们打倒在地,迅速扑上去捉住了他们,从这5个冒充八路军的土匪身上搜出了特务证和劫取商人的700元钱。

总之,我在敌人内部进行的巧妙斗争,都是党组织给我的智慧和力量。

泰安城里地下工作片断

张文亚

(一)利用合法身份打入敌人内部

1942年1月,我任泰西县独立营第二游击大队指导员时被捕,经党的营救出狱后,中共泰西县委敌工部长崔子明,指示我利用被捕释放的合法面目,打入到敌人内部作长期地下斗争,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这时,我的公开身份是伪泰安县保安大队第二中队长。

日本宣布投降后两三天样子(注许子杰回忆说1944年夏)我接到中共泰西县委敌工部长曹龙骧的指示信。信中指示:根据新的形势,上级决定,泰西县所领导的地下关系,统归泰城工委领导(中共泰安城对敌工作委员会)。今后叫我和泰城工委接洽工作。当时有点发愁。我对工委不熟悉,叫我怎么联系法?到哪里找工委去?几天来我解不开这个谜。忽于8月22日晚上,侯希章(系我方地下关系)同志领着一个客人到了我家。我对来人虽然陌生,但我猜测一定是工委来人和我联系工作。我正在吃饭,在高兴之余,将在我家吃饭的几个下属军官和士兵支吾到大队部去。家里只剩下我的爱人和侯希章及领来的那个客人。我将他俩让到里屋,进行秘密交谈。侯向我介绍,来人是泰城工委委员许子杰同志。又向许介绍我是张文亚。据许子杰同志指示:他来城里要作长期的打入工作,他提出掩护方法是在我部队里当兵。当时我认为这样作不妥当。因为在伪军里当兵很不自由。出操、站岗,外出要请假,这样不易开展工作。同时假如新插进一个人当兵,也会引人注意。我提出在泰

安开设馍馍铺做掩护较为合适。侯希章很赞成这样做，许子杰同志也同意，就这样定下了。经侯希章租赁了白衣堂街三间房子，筹备了一些用具，即开起馍馍铺来了。为使馍馍铺不被歧视和敲诈。由我出面，当名誉上的东家，侯希章是经理，许子杰用化名韩玉才当管帐的先生，所以泰城都知道韩先生。

我们这个馍馍铺的开设，就是插到敌人心脏里的一把尖刀。它是我们地下工作斗争的前沿阵地。坚持在这个阵地里工作的同志，在许子杰同志的领导下，日日夜夜，机智而勇敢地埋头工作。我们几个人开碰头会，不是在我家里就是在馍馍铺里，我们可以随时交换情况，商谈工作。我们这样频繁的活动，敌人不会发觉，都知道我们在商量买卖。开设馍馍铺的主要目的，是使许子杰同志有合法身份，掩护他开展工作。许指示我负责收集情报，注意保证他的安全。我为保障许的安全，争取了一个伪县政府当传达长的李培吉。我们交情很深，他经常在我家玩。一天他对我讲：“我看韩先生（指许子杰）不简单。”因为他是老实人，我直接告诉他：“许是我的朋友，干八路，你可经常在西门口观察一下，别出问题。”李培吉确实每天认真的在西门口察看动静，秘密的保护许子杰同志出入泰城的安全。我在收集情报时，将各县保安队的人数、指挥官的姓名、各部队住防位置、战斗力的强弱，介绍给许子杰同志。不到半月的时间，我泰城工委对泰安敌人的情况了如指掌。

（二）争取瓦解敌伪军

争取伪军为我工作，是工委重要工作之一。我将几个忠诚可靠的战士、班长、文书一一介绍给许子杰同志。许从中找到潘曰印（士兵）、孙风午（传令兵）、吴成涛（班长）、任华亭（文书）、赵西合（班长）等人，进行个别教育，使他们的思想逐渐觉悟，很愿意接受许交给他们的任务。我可以和他们公开我的身份，在执行我交给他们的任务时，是绝对服从的，从不阳奉阴违，这是我的左膀右臂。在两次

打泰安我作内应时,他们表现积极,和我形影不离。直到我负伤住院,他们才由泰城工委分派到我泰安铁路局警务段工作。

为了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军区派了几个干部,想通过关系到城里来,以争取敌人的起义。但城门卡子戒备森严,对来往行人严密的盘查。许子杰叫我和侯希章,成天到西关粮食市街张五(我方内线,他家里是我方内线联络站)家里,将进城的干部领进西门,再将这些同志按时送出城去。我负责迎送贺德明(系我方指导员,军区派来作路文炳的工作)和曲参谋,使他们顺利的开展工作。

(三)内应外合攻打泰城

1945年9月2日下午,林洪周(即罗国范,系我派入的地下工作人员)同志到我家,告诉我到西关粮食市街张五(泰安宏济堂药店的东家,家里开设馍馍铺,是林洪周接的地下关系)家里去开会。我到张五家堂屋西里间(这间屋是放中药的一个仓库,光线很暗),看到有两个身着军服,佩带匣枪,全副武装的干部。林洪周同志介绍时,没有暴露各自的姓名,他向我介绍说:“这是军区来的两个同志,协助你们打泰安作内应,还带来了一份作战通报,到城里看后研究执行”。又向来的两个同志介绍说:“这是(指我)在城里坚持地下工作的同志。”我看这两个同志身着军装挂着匣枪。心想,这样能进城吗?必须化装。我将他俩的匣枪先带进城去,找了两套伪军军装叫这两个同志穿上,随我进了泰安城里。我们进城后,要找个适当的地方开会研究作战命令。我先领他俩到馍馍铺,我看人多太乱,又到益寿堂药店(老郭家属和他及郭殿五都是我们的情报员),仍然是人多复杂,不能研究工作。我和许子杰同志商量到我家去开会研究工作较好。于是就到了我家。在我家开会时已经6时半,时间紧迫,军区来的两个同志从他的裹腿里取出一份鲁中军区部队作战命令交给我。这份命令的大意,至今我是历历在目。即:我军于9月2日晚9时,开始攻击泰城。城里最可靠关系为张文亚部

队,其任务为我军作内应。张部队与我联络信号以萤火绳为号,待将我军接进城后,张部队出东门在唐庄集合,第二集合点是羊楼。泰安城内关系刘绍文(原泰安市保安大队第八中队长,现为一团三营八连连长),郑树增(现系司令部上校参谋长),统归张文亚指挥。该命令署名是鲁中军区司令员钱钧,参谋长毕兆洪。

许子杰同志亲自部署并和我们共同研究了如何保证坚决地执行命令,会上对人员作了具体分工。军区来的两个同志,装扮成我的两个传令兵,掌握联络信号,负责与我攻城部队联络,随我行影不离,见机行动。许子杰和侯希章负责内线人员的家属安全,待我军进城后,由他们掩护家属出城,他俩(许和侯)在我家待机行动。至于城内的内线关系公开问题,我的意见是,刘绍文是我营的一个连长,我可以随时指挥他的行动。郑树增此人表现很坏,刚当上校参谋长,对国民党抱有很大幻想,我的意见先不通知他。许和军区来的两个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接着,我将营的指挥班和机枪班调到我家里,又从仓库弄了几箱子弹,叫他装备好。我向他们讲了话,叫他们听从指挥,服从命令,先进入城墙阵地待命。

我带指挥班和机枪班上了城墙。我营的警备区域是从东门起,左至东北城角。九时,我军攻击开始。东关和南关守敌,反击我军的进攻;南关守敌是平阴县和肥城县保安队,东关守敌是莱芜县和新泰县的伪军。我军进攻东南门的速度进展不快,敌人始终未被击溃。我军来的两个同志两次发出信号,均未回答信号。至拂晓,日本部队出动,我军随即向东撤退。

(四)掩护同志出城

守泰城的伪军随着我军的撤退,也命令守敌,各归原防地撤下城墙。我带进城来的两个同志怎么办呢?我将他俩领到我的传令兵孙风午家里隐蔽起来。本想到晚上将这两个同志送出城去。突然接到通告,朱茂轩司令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在会上,朱茂轩表

扬了宁茂轩(原伪保安队第一中队长,后编华北先遣军一团二营营长),身先士卒,赤膊上阵,勇敢冲锋。朱正在讲话,泰安警备司令部来电话称:今天12时,警备司令部军警联合稽查处查户口,获悉昨天有潜伏到城里的八路。我听到电话后,确实不寒而栗。为安全之计,先将两个同志送出城脱离虎口,才算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我急中生智,向朱司令请假,谎称有病“报告司令,我感冒不舒,回家吃点药休息一下。”

我回家后,告诉我妻说,我将军区来的两个同志带出城去,大队来人问的时候,你就说我刚吃药正在出汗。我找了两套军衣和便衣放到我的手提包里,到孙凤午家见到这两个同志,问了他们一些情况。我说司令部12点检查户口,我们赶快出城。他俩仍化成伪军士兵,我带着他俩出了西门。在路上走着我想在什么场合换便衣?因为四关都有伪军,他俩要穿着伪军装出四关怕当逃兵抓起来,必须换上便衣才能出去四关。我想了个办法,到广生泉洗澡,在澡塘换便衣最合适了。我们三人在广生泉澡塘洗澡后,他们换上便衣,我们握手而别。他俩回到军区汇报,我的任务也顺利完成。于是我轻松地回到太城里,向许子杰同志作了汇报。在汇报中我向许子杰同志讲,朱茂轩大肆表扬宁茂轩作战勇敢。许指示我尽可能的争取宁茂轩,求得他不为敌人卖命。

日本投降后,泰安的伪军失去了日本主子,引起了一片混乱,使他们惶惶不安。为了投靠新主子——国民党,他们到处奔走去投门子。事有巧合,正在他们盼望国民党的时候,真的从济南来泰安一位不速之客。这天是8月18日,伪军头目都心喜若狂的盛装接待。来的这位客人名叫张辉,是泰安山口村人,自吹自擂声称:“从重庆空降济南,来山东的使命是,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局长,特务头子戴笠手令,一方面收编伪军,另一方面,向泰安汉奸队的大小头目宣布,泰安县伪保安队是国民党的地下军,对曲线救国作出了一定的成绩。因而对所有头目要封官加职。从即日起,伪

泰安县保安队改编为华北先遣军第二总队第一支队。成立司令部，下设八大处，辖两个团。朱茂轩从原泰安县伪保安大队少校大队长，提升为少将司令。身着中山装，佩少将军衔。下边所有大小头目也晋升一级，可谓威武一时。对国民党这种作法，他们五体投地的赞赏，兴高彩烈地接受改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他们加强战备，在泰城周围修筑工事。到处砍树下门板抢粮食，弄得泰城老百姓惶惶不可终日。真是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正在这个时候，我鲁中军区部队正酝酿着向泰城发起攻击。

为争取宁茂轩，我采取慎之又慎的态度和他接近。宁是泰安耿家庄人，是1945年日本投降后提拔起来的一个中队长。这家伙年轻好胜，经常耍他的个人英雄。有好赌、好色、好喝酒的嗜好。我利用他这些弱点，主动和他交友谈心，经常留他在我家作客。从在一起喝酒、打牌的接触中，知道他一心想搞个小婆子。我便托人给他介绍了一个姓田的妇女作他的二夫人。从此，宁对我很感激。拿我当他的知心好友。我看火候到了，可以试探一下。于是在喝酒中间，我问他：“茂轩，兵临城下，何去何从，我们应选择一条稳妥可走的道路。”这家伙对当前形势根本不认识，只凭他的血气之勇对我讲：“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我说这次恐怕不是9月2日打泰安的形势了。他有些激动，问我：“这是什么意思？”我觉得也可向他表明我的身份。我理直气壮的对他说：“茂轩，我是共产党的地下交通员，你愿意升官发财就去告发我。我认为咱是患难与共，富贵相依的真诚朋友，投向共产党这是我的心愿，我向你郑重表态声明。”我这番话引起了他的冲动。他抽出战刀，向我发誓说：“我宁某要有三心二意，可剝去我的手指，以示我的决心。”我拦住他的举动，待空气缓和下来，我就亲切地和他谈了一下我的见解。在我谈话时，我看到宁的表情，每句话他都点头赞成。我和宁公开关系后，他表现很好。1946年6月7日，我新四军解放泰安城时，宁一直听我的。6月10日我攻城部队在我的掩护下登上城墙，我命令所属部

队开了南门。宁茂轩这时指挥的这个连在城东南角，主动跑到南门问我怎么办。我说：“我已负伤，你将你这个连集合在东南城角，放下武器，然后你到泰城工委听从安排。果然他命令所属部队一枪未发，放下了武器。后来，他经泰城敌工部派到济南作打入工作，在济南干了还乡团。泰城敌工部叫他父亲往来济南泰安之间，从中联络。后不知何故，他父亲被泰西县杀掉。而宁茂轩怀恨在心，为报父仇，表现极为反动，共杀害我方人员数百计，造下弥天大罪。1948年110案，被我党镇压。

(五)千方百计营救同志

1945年10月间，朱茂轩带伪军600余人，于拂晓前，将泰安城东杏园、卧龙峪一带包围。事后才弄清朱茂轩包围杏园一带，是县保安队特务队长张涛提供的消息。因这一带有我军的粮食仓库和被服厂，这次，他们将我泰城工委委员武效周同志和通讯员小王逮捕，押在泰安文庙里（司令部驻地）。后转泰安市看守所。武效周同志被捕后，泰城工委委员许子杰同志叫我设法营救。当时我不知道武效周是什么干部。我问许子杰：“武作什么工作？”许告诉我：“是新调来的工委委员。组织决定由他接替许子杰的工作，还未进城即被捕了。”我听到后也有些恐慌，总怕敌人发觉了。我打听了一下，武在法庭上，被伪军法官于伟民打得死去活来，始终不向敌人屈服。武效周在法庭上这种表现，对我很大感动和安慰。我可以理直气装的去营救我们的同志。于是，我买了一份厚礼，直闯辕门送到朱茂轩的公馆里。朱和太太很高兴地留我作客，我正中心怀，也不推辞。我们在喝酒中间，朱吹嘘起来，他如何逮捕我方人员等等。我借此问到朱，这次出发捕来的那两个是干什么的。我这一问，朱茂轩火冒三丈地骂起于伟民来啦。说于伟民是饭桶，再给我审不出来，我就揍他的棍子，撤他的职。他越说越气大，突然对我讲：“文亚，你干过八路，为司令部效劳，你将他（指武效周）提去审问一

下。”我想还是先摸个底，对武效周同志究竟是什么看法。我问：“报告司令，这个人的情况司令知道多少，叫我如何审问他，还请司令指教。”朱告诉我：“政治处认为他不是兵。因为从他身上搜出一份材料是我内部情况。因此我们认为他是来搞地下工作的。从他的口供里，要查出我们这里边谁通八路，必须审问清楚。”我当时表示服从命令，要求司令下手谕，朱当即给我写了手谕。我于当天晚上就到参谋处提审“犯人”。我向参谋长表示，我问案子不用录音，不要旁听。于是我的传令兵将武效周同志带到了法庭，在大众之下的场合，我吹胡子瞪眼地骂了一顿，叫传令兵把武送回牢房。过后我向朱汇报说：“八路军都有自尊心，当着很多人他不会说实话，我想把他叫到我办公室里，和他谈家常，从中套出他的真实身份，岂不好吗？”朱高兴地同意这样办。并说你张文亚真有办法，这个案子交给你了，看着办吧！我摸清了底，问案子也心里有数了。第二天上午，我的传令兵将武效周同志叫到我的办公室。武效周一进门就问我：“你是张文亚同志吗？”我点了点头叫他坐下。那时武效周吸烟，我给他烟吸着，商量着如何对付敌人，使敌人信得过，从中脱险。我将敌人对他的怀疑告诉给武效周同志，使他心中有数。我向他提出：敌人怀疑你不是兵，你可以承认是交通员；又因你身上带着材料，敌人还认为你是地下人员，因此叫你供出谁通八路。我的意见这样：你说你是交通员，区公所交给一份材料送公署，中途被捕。我看这样可以骗过敌人。从而我可以提出释放的意见。编好假供，由武效周签名后，我立即交给朱茂轩。并向他报告说，“这案子我问得清清楚楚。这个人叫吴条州，是泰安城东人，他在八路里是交通员。八路区公所的一份公文叫他送专员公署，中途被捕。”朱对我的汇报甚为满意。他认为该犯不是什么干部，扣押无用，可以释放。还没有释放，政治处的这些家伙知道了，他们要求重审，其理由是：武效周在初审的口供里提到，他当兵是朱××介绍参加的。政治处认为，朱××是八路军高级干部，既是朱××介绍，该犯不可能只当

兵。因此,认为我审的不对,要提到政治处重审。我想真被政治处提去重审,问题就麻烦多了。因为政治处这些家伙都对我党有刻骨仇恨。于是,我在朱茂轩面前,当着政治处的张子文、张华南等大发雷霆。我说:“我同意重审。不过,把丑话说在前头,假如重审无结果,我要和你政治处算帐!起码这是对我的不信任。”朱茂轩当时看我很冲动,怕我和政治处弄出事来,当场宣布结案及时释放。这次争吵就此了结,朱即将武效周同志释放了。

(六)我党的敌工工作

1945年11月底,驻泰安的敌人实力,是各县保安队的总和。敌司令宁春霖为了适应斗争需要。对部队进行了频繁的改编。随着改编的变动,其防御设施,警备区域也在不断变动。这使我们的情报工作更为重要。为此,工委指示,在和谈期间,虽暂时不打泰安,但要作打泰安的准备。要将敌人的改编和部署情况及城防工作及时弄清,写成书面材料,送交工委。我按工委要求,利用职权之便,尽量把这一工作做好。

敌人在几次改编中,对我不重用。这次改编中朱茂轩下台,给他一个城防指挥的空衔,我随着朱的下台,也有很大的影响。这时,徐印川当上了警备团团长。我原系第二中队长,第二中队是全县保安队冒尖的一个中队。人员枪枝都比其他中队好得多。这次改编将我调出了这个中队,去当第二连连长,配备上徐印川的亲信朱钦汉当了我的副连长。面对这种处境,我及时向许子杰同志报告。许指示:要以进为守,应付敌人。所谓“以进为守”就是在敌人面前表现积极,对朱进行拉拢,使其对我有好感。为此,我对朱下了很大功夫。在较长的时间里,我弄清他家是个地主,为逃避我政府的镇压,全家逃到泰城,生活困难。仅凭朱钦汉的薪饷是顾不了全家生活的。在生活无着的情况下,我给他留下200元钱,随后,又叫传令兵给家送去两包麦子。这使朱钦汉对我甚为感激,在感情上有些亲

近。我向他表示：我要参加三青团。朱说：“抽空咱到徐印川那里谈谈，我看会吸收你入团的。”有一天晚上，朱领我到二衙街三青团住地，见到这个反动透顶的徐印川。徐表面上很热情，让我们喝茶，留我们吃饭。他向我寒暄了几句，就吹嘘他是峨嵋山训练班的学生，为效忠党国而来。他大肆诬蔑共产党，破坏统一，制造内战。我当时耳不忍闻，又无权解辩，便借故回家。隔了几天，我向朱钦汉说：“我入团的事，你和徐团长谈了吗？”朱毫无隐瞒地对我说：“徐团长说你和八路有关系。”我听到后毛发倒竖，三魂出窍，感到非常惊异。我将此事又告诉了许子杰。过了几天，我交上辞呈（就是请长假），想试探一下徐印川的态度。徐印川接到我的辞呈后即找我谈话。他问我：“你为什么上辞呈？想是怕打仗吧。”我说：“打仗我不怕，我怕团长信不着我。”他说：“你这话从那里说起，我怎么信不着你？”我说：“团长，我是个直爽的人有感必谈。我听朱钦汉说，团长怀疑我有通八路的嫌疑。我听到后不寒而栗，近日来内心忐忑不安。我向团长应该表白，我干过八路是实事，但我被捕时已自首叛变。共产党对我深恶痛绝，因为共产党不谅解我，使我有家难归。我对共产党不抱任何幻想，我唯一的希望，即在党国的领导下作出点成绩，好有个归宿，即便死后也安九泉。现在团长怀疑我，我不如辞职回家。”随即又掩面而泣。我这么一来，触动了徐印川的心情。他同情的告诉我：“不要听朱钦汉的，我说的是戏言，不要记在心里。刘伯阁就是共产党，现在是县长，不是同样有前途吗！辞呈拿回去，好好干，你是个很有才能的。这一点我信得过。”事后我听朱钦汉对我说：“我向你谈的不该说给徐团长，叫他对我大加训斥。”从此，朱对我的事不再向徐汇报了。朱后来对我们的活动有些觉察，但也不过问。许子杰同志在我家也和朱经常见面，许被捕后押在泰安县看守所，是他登记的。朱只向我谈他，却未向徐印川报告。两次打泰安我的行动很明显，朱仍是听我的指挥，他未将他的怀疑报告给徐印川，使我能顺利地执行任务。

泰兗警备司令宁春霖,来泰安时,只带来一个特务营。各县保安队都和他离心离德,阳奉阴违的应付他。为笼络各县保安队,从中拉拢各县的官兵,1946年3月15日,责令各县保安队保荐一名连以上的干部,到司令部充当联络员,名为见习官。当时我被派到司令部见习了半月。宁春霖对各县派去的军官,除个别谈话外,还和他同吃同住。在一起批阅来往公事,传阅秘密文件。记得当时宁绞尽脑汁,精心地拟定了一份稳守泰安的作战计划。他亲自向各县保安团队传达后,叫我们这些见习人员传阅这份计划。我借传阅的机会,将全文秘密抄录下来,送交了工委。事后据工委的同志告诉我,我攻城部队拟定的作战计划,就是根据这份计划而拟定的。

我们的这个馍馍铺开设了三个月,于1946年春节前即停止营业。主要是城内敌人备战,粮食紧张禁止买卖,许子杰同志又以贩布为名做掩护,来往于秦城。我记得1946年他到城里部署工作,在我家里指示说:“目前和谈有进展,近期不打泰安。工委决定叫我们中队拉出去,这样给敌人一个震动,影响也是很大的。方法是,明天执行小组来泰安谈判,借欢迎执行小组时,将队伍开进解放区。”我对工委这个指示,从思想上非常高兴,我也早想脱离虎口。我和许热情的畅谈着。当谈到我的政治问题时,许叫我写份简历,他到泰西县委去解决,使我更加高兴。这一天,我俩谈到深夜才休息。次日早上,我到队部(这时我这个中队住在大队部,负责大队、伪县府、看守所警卫),朱茂轩告诉我,今天八时中队长来大队集合,欢迎执行小组。我问朱“还带队伍去吗?”朱对我讲:“泰安县保安队只去中队长,其它保安队去一个中队。”我想昨晚的计划落空了。回家后我立即告诉了许子杰。许说:“我马上去西关说给新四军。”饭后,我俩分手,我去大队部,他去西关。我随着欢迎队伍到西关,将执行小组迎进秦城。在城里卧虎街天主教堂里开的会。执行小组我方代表有新四军三旅旅长张翼翔同志。欢迎仪式后,我们这些小官就各回原单位,当时几个中队长要到我家里作客,叫我请客,,在喝酒

中间,我发现妻子面色苍白,有惊惶之状,我猜测是出了什么问题。我妻秘密对我说:“老韩(指许子杰)在西门上被捕了。”我听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后,当时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因有客人还要在表面上装作镇静。好不容易吃了饭,将客人送走,我才详细地问妻子:“你是怎么知道老韩被捕的?”我妻对我讲:“邢西山(我的传令兵在我家做杂务与许子杰很熟)去西门处买菜,在西门外见到肥城保安队在绑他。”不一会,郭展五也给我送信说是许子杰被捕。当时我不清楚许是怎么被捕的,是否有盯梢的。若敌人发觉许子杰从我家走的,难免我也被怀疑。我也必须作好准备,不能坐以待毙。晚上我将侯希章叫到我家商量办法。侯是完全听我的。我提出,请希章和我妻马上去西关,找工委余乐亭书记,向他报告并请示办法。我去找肥城保安中队长李瑞超(李原系我肥城县一区区长和我很早相识,关系较好),问一下许因何被捕,能否保释脱险。希章同意这样做。次日早,我们分头出发。他们去西关茂盛春饭店和余乐亭同志见了面,汇报了城里发生的这件事。据余指示:“工委向执行小组提出,叫执行小组要出来,不叫我们插手。”我为营救许子杰,不惜一切,有门就走。我找到李瑞超,给他送了部分礼物。李瑞超留我作客,在喝酒中间我问他,昨天你们部队在西门外查到一个什么人,李对我讲:“这个人是在长清人,我们保安队有人认识他,这个人干过八路,因此逮捕起来。”我对李讲:“你和我不是也干过八路吗?你们逮的这个人,是我馍馍铺里的一个会计,和我是朋友。过去干八路,和我们一样也自首了。现在有家难归,找到我混碗饭吃,叫你们给抓住了,我看还是放回来,谋他的生计好。”李瑞超听我这么一说,他信以为真。对我说:“既然这样,我找兴三(鲍兴三肥城县保安大队大队长,他和鲍是换贴兄弟,关系密切)叫他放人。三天内你听信,你得请客。”我见李很慷慨,很高兴。对他说:“我静候光临。”饭后,我告辞回了家。

三天后,李瑞超真的到了我家。我看他气冲冲的,火冒三丈。劈

头盖脸就责备起我来。他说：“文亚，我从肥城跑到泰安是求生存，不能把命丢到泰安。你弄的这套戏，使我摸不着头脑，你叫我碰了兴三一个大钉子。”我和颜悦色地说：“瑞超有话请讲，不要误会。”接着他说：“你要保的那个馍馍铺的会计，是个真八路，现在执行小组要他，我不知道，向兴三提出这事，兴三对我大加训斥，说我和八路有藕断丝连的关系。”我向他解释：“瑞超不要冲动，这个人我保险。执行小组要是他母亲教子心切，跪求执行小组要他，这与八路无关系。”我这一说，李瑞超有点泄气，最后表示他不能插手办了。

我从各方面打听，始知许子杰被捕后，在敌人内部引起一片争吵。肥城伪军捕住许子杰，没有向宁春霖报告。鲍兴三的目的，想通过许的口供，破坏城里的地下组织。以显示他的才能。梦想步入青云。当执行小组向宁春霖提出和谈期间双方释放被捕人员时，宁对此事还不知道。竟以查无此人一推了之。宁虽然表面上这样答复，但却又查到肥城保安队。这时鲍兴三才向宁报告。宁听后，即责成鲍部队将许子杰送到警备司令部军法处，由军法处长龚克久进行审讯。执行小组仍催促宁释放许，宁怕执行小组视察监狱（宁司令部监狱）发现许子杰，便转到秦安县看守所（因泰安看守所背静，执行小组来不到，故将许押到该看守所），这个看守所的警卫人员是我这个中队的士兵。

古历正月初的一天，我在家吃晚饭，朱钦汉（我的副队长）到我家，催我快吃饭。我问他有事吗？他说：“你吃饭再说吧！”我吃完饭后，他附到我耳旁低声说：“在你家住的韩先生押到看守所哩。我若无其事的问朱，什么时候押到看守所的。他说今天从司令部转到看守所的。我问因为什么押起来，他说犯人登记簿上是共产党嫌疑犯韩玉才。我对朱说：“老韩（指许）这个人做事太死板，说话不养人，哪有不得罪人的。”我又对朱说：“我去看看，究竟是为了什么押起他来。”我服装整齐带着两个传令兵，到了看守所。我向狱长声称：查看犯人情况。狱长将每个牢房的犯人姓名介绍给我。在一间牢

房里，我看见了许子杰同志，狱长对我说，这个犯人是司令部今天送过来的。我问狱长：他干什么？许子杰同志在牢房里自言自语的说，说我是八路，我是做买卖的。我听见后，对许子杰高声喊着说：“你干八路不承认也不行。”我叫狱长开开临时审讯室。我将许叫到审讯室，将狱长支吾出去。此时审讯室只有俺俩。许告诉我，军法处审讯几次我说是做买卖，并叫我放心照常工作。他表示敌人从我这里什么也得不到。我看到许子杰的表情非常坚决，对我很大的鼓舞。我将工委设法营救的情况告诉给他，又回家叫传令兵给他送去了一床被子。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许子杰被捕刚才稳定，侯希章又于正月十二日被捕了。侯是泰安警察局逮捕的，扣押在警察局里。警察局里我有个熟人，是李景章。泰安七区人，当过七区伪区长，他和万部队关系密切，我和他有些交往。我为营救侯希章，拜访了李景章，我问李因为什么您局逮捕侯希章，李是警察局的督察长，他对我说：“侯希章过去干八路，后来干特务，现在没有职业，生活很腐化，他哪里来的钱呢？我们认为他被八路利用，故对他逮捕讯问。”我从李景章谈话中，始知他们对侯希章的情况不了解。只是估计他有通八路的嫌疑。我当时向李景章嗤鼻以笑。对李说：“我和侯希章是朋友，我对他比较了解。他早期干过八路，被捕后在日本宪兵队当了特务。以此自首叛变，共产党对他恨之入骨，使他有家难归，只有在泰安谋以生计，生活够苦的，完全靠朋友借贷生活。景章老兄，你若不信，可以查问。李景章故意推辞对我说：“我不当家，我和局长谈谈以后你听信。”李景章是个老奸巨滑的人，他这是为了叫我好出警察局，给我留了一个余地。警察局长是欧阳瑞峰，我不认识他，不便找他。事有凑巧，明光林（明光林泰西县大西牛庄人，是明光普县长的亲二哥，我和他关系很好）到我家去玩，在谈话中我向他说：“光林，我拜托你一件事，他问什么事，我将侯希章被警察局扣押的情况告诉给他。并对他说：“侯妻经常来哭我，你和县长兄弟谈一下，

满可以将侯释放回家。”他听后，很有把握的告诉我：“不用叫光普了(县长)，我找欧阳瑞峰，叫他放人，你听佳音。”我对光林这种慷慨行动，甚表谢意。果然不几天，他将侯保出。侯出狱后，在城里无法工作，即调回西关工委机关。当许子杰同志和侯希章相继被捕后，泰安城里的工作，确实处于紧张关头，有的同志吓得不敢露面。幸好，郭家母子表现很好，和我及时联系，往来泰城传递情报。为了更可靠、更方便些，我妻王发英也去工委送情报，传达工委指示。1946年3月间，许子杰同志还在狱中，没有脱险。我妻去西关，在茂盛春饭店，见着工委书记余乐亭同志。余说：“执行小组几次向宁春霖提出释放老韩(即许子杰)，至今仍是‘查无此人，不予释放。’请你(指我)将老韩被押的情况，详细告知工委。”我听到后，叫我妻王发英明天再回西关，向余报告，许子杰押在伪泰安县看守所。事隔几天，执行小组到泰安城里，视察了泰安县看守所。我新华社记者将小牌上犯人名单拍照了像。这才在换俘名单上写上韩玉才的名字，弄得宁春霖哑口无言。只好将许子杰同志释放。

(七)解放泰城

5月上旬，敌人早知和谈无望，早作好备战的准备。他们搞了次所谓“整肃运动”。发动市民和部队官兵进行大检举，到处设了意见箱。凡记名检举者奖金5元。住泰安的军统小组的特务紧密配合，他们装猫变狗，形形色色，走街串巷，登门走访，从中查看动静，企图寻找我潜伏到城里的地下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处境是极端困难和危险的。我告诉我们的情报员，要百倍的提高警惕。敌人现在是草木皆兵，防止敌人盯梢。表现要沉着、大胆，不要带出恐惧的气氛。千万小心敌人狗急跳墙。为了应付敌人，我们活动也神秘起来。我妻去西关工委，为防止盯梢，先到同和成大关街的广货店，伪装买东西，随时化装，将情报放到裹脚里再去西关工委，这样能摆脱尾巴。郭家母子也是神秘的往来西关工委。5月中旬，我接

到泰城工委指示：和谈无望，最近期间围攻泰城，叫我作好内应准备。我利用职权之便，想尽一切办法，将敌人最近的作战部署，城防工事，城墙高厚，敌人固守泰城的打算（王耀武指示宁，要守三到五天，待济南援军接应）等情报分别送到工委。

6月7日中午，郭殿五从西关工委带来指示，内云：“我军于7日晚9时对泰城发起攻击，叫我负责内应，接应我攻城部队。”夜间以抛火球为信号，示意我的警备位置。我接到工委指示后，既紧张又高兴。紧张的是战斗打响后，我应如何采取行动，高兴的是几年来在敌人虎口里工作，担惊受怕，提心吊胆的日子快完了。眼看泰城瞬间解放，我将离开泰城，成为一个名正言顺的为人民服务的人。为保证内应工作顺利完成，我以请客为名，将公开了的内线关系召到我家。我对他们讲，这次攻城，我新四军信心十足，有把握一举解放泰城。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要有所表现，争取主动。从今天起，我们要改装换面，一定要听从指挥，服从命令，齐心协力，使我泰城顺利解放。当时在场的有一连连长宁茂轩，传令兵孙风午、潘曰印，班长吴成涛，文书任华亭。因时间紧迫未找二团九连连长刘绍文。大家情绪饱满，接着我们作了分工。宁茂轩带领全连在东南角待机行动，待我接应得手，即可带全连起义；任华亭随二排在南门瓮城堡垒工事里待命，负责开南门；吴成涛带机枪随我行动，并叫吴成涛监视朱钦汉（副连长）的行动。假如朱抗拒我的命令，或有其他的反动活动即当场击毙。孙风午和潘曰印随我行动，要保卫我的安全。

是晚9时，我军开始攻击，首先向四关之敌进行围攻。四关守敌都是外县保安队改编的。在打响的当夜，他们都溃退到城里。8日，敌我双方进行相持阶段。警备一团（即伪泰安县保安队改编的部队）担任南门左、右和东门左、右的阵地，一营营长张瑞林坐阵南门，景大麻子（该营第三连连长），紧随张瑞林作他的预备队；宁茂轩带一连守在东南城角。我是第二连连长守住南门。李秦春带四

连守在西南城角，宁春霖司令部的特务营一个连住在南门里火神庙，作南门的预备队。8日夜间敌我双方均没有动态。这时我还没有和新四军取上联系，我很着急，于是日夜间，派传令兵潘曰印到南门瓮城城墙上，向下抛三个火球。火球抛下后仍无动静，没有回答信号。10日上午，我心内忐忑不安，焦急万分。为及早与我攻城部队取上联系，我亲自到南门瓮城城墙上炮楼前沿，秘密的出示了我“完成部队”在此的番号。是日过午两点，我攻城部队以雷霆万钧之势，排山倒海之力，展开了强大火力的攻势。在机枪的掩护下，我部迅速爬越城墙。

当我军攻城战斗打响后，我在南门瓮城右侧的掩蔽部里，握有轻重机枪两挺。守在掩蔽部的伪军发现我军在南门左侧城墙上竖上了三部梯子，向城墙爬越。副连长朱钦汉未等我的命令，竟然命令机枪射击，封锁我攻城部队登城。我猛喊一声：“不准开枪！”朱钦汉感到突然，见我貌冷声厉，肃目而视，他立即生畏。问我为什么？我告诉他作战意图，先让不足百人的敌人爬上城墙，待机将敌人的梯子扫倒，封锁敌人前进，围歼已爬上来的敌人。朱唯唯从命，我命令朱在掩蔽部观察敌人的行动。我在连指挥所（设在南门城墙炮楼内），我叫传令兵到城下南门，看看营长是否在营指挥所（设在南门里）。传令兵报告：张瑞林带第三连（景大麻子）去团部。我看时机已到，马上采取行动。叫吴成涛将掩蔽部机枪班调到南门，我叫任华亭传我的命令，叫二排长刘××将南门打开。就在这一刹那间，反动头子徐印川带着特务连，跑步来到南门城下。用手枪指着，命令我堵住缺口。我未等徐印川下完命令，打了他一枪。我大喊：“新四军已打进来啦，还叫我堵他妈的缺口！”接着我命令机枪班向其射击。机枪火舌扑向徐印川所部。徐印川见我抗拒命令公开叛变，便向鸚鵡街狼狈逃窜，所属部队也随之溃散，而住火神庙的特务营不摸敌情（他们不知道新四军已攻进南门瓮城），见我起义，即指挥部下向我猛攻射击，突然，我在城顶上负伤了，倒在阵地上。部队见

我负伤失去指挥，顿时跑散了。在我身边的只有几个传令兵。我强支着精神，叫吴成涛和已登上城墙的攻城部队联系。他给攻城部队作向导，顺着城墙向东挺进。这时宁茂轩赶到南门找我，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我已负伤，叫他和我军联系，以并肩作战肃清残敌。任华亭开了南门后，领着新四军攻进通天街，直闯伪泰安县政府。后续部队拥进城里，有一首长叫着我的名子，这时我还躺在南门城顶上。这位首长来到我负伤地点，很表同情，对我安慰，指示卫生员给我包扎打针，并找担架将我抬到城下，叫卫生员守在我身边进行护理。他走后，工委许子杰同志进城找我。见我负伤，即给办理住院介绍信，是夜，将我抬出泰城，到夏家庄新四军医院去治疗。

从此我告别了泰安古城，结束了我三年多的地下工作。

(阎敬理 韩振才 徐兴传 孙奎整理)

崔子明设巧计 争取利用伪警备队司令路文炳

曹龙骧

1941年3月,受日军委任驻秦城伪警备司令路文炳,带一手枪警卫排,去秦安(西)县所属各伪军据点巡视驻防军务。

情报传出后,秦安(西)县委敌工部部长崔子明果断地决定,趁此良机,以打、拉的斗争策略,争取利用路文炳,为我做点有益于抗日的工作。

3月初的一天,路文炳果真带着保镖来到秦安(西)县东上章伪军地点。据侦察,路早饭后由上章伪军据点去夏张镇向日军汇报驻防军务状况。于是决定在河东上章村庙口设伏截击。按预定计划,由敌工部长崔子明带领十几人的手枪队,埋伏在庙口一旁,县武工队长王雷(王振山)率一个短枪班设伏在庙口直接迎敌截击。

按计划分别设伏后,我侦察人员报告:“敌人来了!”只见路文炳一马当先,率领他的警卫排和驻东上章据点的伪中队长迎面而来。

站在庙门口台阶上的王雷同志,率短枪班英勇迎敌。先与走在前头的路文炳来了个马头相触,手枪口迅速指向路文炳的脑门,并且大喝一声:“不准动!举起手来!”

突如其来的截击,吓得路文炳魂不附体,晃了几晃差点跌下马来。尾随在后边的伪军,此时此景也不知所措,看到四周黑糊糊的枪口,个个象木鸡一样,呆呆地站着一动也不动。

这时，敌工部长崔子明，拉开嗓门，面对路文炳和伪军们，进行政治攻心教育：“今后你们做事，要有中国人的心肠，日本鬼子长不了！你们要多为抗日做点好事。今天是初次见面，宽大你们，不予打击。若置若罔闻，丧失中国人的心肠，效忠日寇，下次严惩不贷！”最后，武工队长王雷同志把枪一挥说：“走吧。”这时路文炳才清醒过来，如惊弓之鸟带领伪军溜走了。

当天晚上，崔子明、王雷，回到南白楼村去找我地下关系马希贤先生。让他找路文炳商定一下，什么时间，在何地点与我们见面会谈。同时告诉他，我们提出的见面的会谈时间、地点，征求路文炳的意见，让路尽快定下来，以免往返徒劳，耽误时机。

马希贤先生将我方计划安排原原本本地告诉了路文炳。路又让马希贤回见崔子明、王雷，明天派人去我家取预约信。

次日早，崔子明派交通员到南白楼村路文炳的家里取来了预约信。主要内容是：“今晚在东上章村东山脚下见面会谈。”

为慎重起见，崔子明对这次与路文炳的会谈，做了多方面的工作和应变准备。提前派人到预定会谈地点，进行侦察和埋伏，以防万一。路文炳未失约。双方按时到达了预约地点——上章村东山脚下。经过商谈，对路文炳定下了约法三章：

- 一、日寇如有大规模的“扫荡”，要及时准确地给我传递情报。
- 二、想方设法给我抗日部队购买武器补增一部分子弹。
- 三、教育所属官兵设法掩护我方干部和抗日部队与家属。

会谈结束，路文炳赠送我“二八”竹节匣枪一支，子弹数十发，以示履行帮助抗日的诺言。

自从打、拉利用路文炳后，他对驻秦安(西)县的伪军做了一些工作，特别是在日寇清剿、捕杀我抗日干部、家属中起到了掩护作用。每逢“扫荡”秦安(西)县时，都能及时准确地给我送情报，为我们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反“扫荡”提供了有利条件。

(韩振才 徐兴传整理)

运西地区的对敌伪工作

宋子健

敌伪工作的概貌

我于1943年10月到1945年7月在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任敌工科副科长、科长，后任区党委社会部办公室副主任、城工科科长。现将这几年我所了解的敌工工作情况回忆如下：

瓦解争取敌军的工作，在内战时期（土地革命战争）叫兵运工作，抗日战争时期叫敌伪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叫国军工作。打击特务奸细和政策攻心、瓦解敌军是相互配合的两个拳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已积累了瓦解敌军的成功经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创造了更多的方式方法。

抗日战争中，日本鬼子的宪兵队各级联络部都是日本的间谍机关。因此，在抗日战争中，我们的对敌伪工作，一方面是揭露日本军阀、财阀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另一方面是教育提高伪军伪组织中的中下层人员，使其通晓民族大义，提高反对外族侵略的思想觉悟。对其上层人物也要通过各种关系，给他们讲明政策，指明出路，使之站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一边来。具体的说，就是既要争取上层，又要争取下层，争取上层是为了掩护下层工作，做好下层工作是为了孤立上层，在一定的条件下，争取上层放下武器、投诚或起义。所以，不能把伪军伪组织都看成是死心踏地的汉奸。对伪军伪组织，平时主要是争取他们掩护我们的干部的活动，掩护我们在敌区、敌占区的征粮征税工作；在敌人“扫荡”时，掩护我们的伤病

员、过铁路的人员和部队的安全转移，以及交通线的畅通；在我们拔除据点时，争取他们放下武器，缴械投降或战场起义。对敌伪的基本政策是：打击最坏的，争取一般的，表扬略好的。在接敌区和敌占区建立“两面政权”时，首先要争取伪军伪组织人员成为“两面派”，即应付敌人，依靠我们。为了教育改造“两面派”，首要的工作是要争取他们所有的亲戚朋友对他们形成政治包围圈。所谓政治包围圈，就是攻心为上，不能把伪军都看成铁板一块，要区别对待，争取他们在各种斗争中发挥作用。×××入党，他在伪军中交了朋友，发展了党员；在济宁战役中，他在济宁南门率一个连战场起义，在城墙上追击敌人，接着下城为我军当前锋。二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段君毅一开始就极为重视这个在伪军内部发展的党员。

对敌伪工作的起步是怎样找线索，就是怎样找到争取敌人的桥梁人物，当时我们把这种人叫“线索人”。这种线索人，开始不是家属，而是能影响和掌握他的亲戚朋友，特别是他的老主人、老上级、老恩人，以及与他共过患难的挚友。对伪军伪组织关系，不到必要时不要求他有大的行动，要他长期潜伏，等待时机，加强做巩固、团结的工作。所以敌工干部切忌急性病，不能急功近利。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准备跃进大别山，区党委城工部指示：为配合这次战役，所有关系的全部起义为上策，部分起义为中策，真正不行的就“摘生瓜”。这说明“时机”对敌工工作是多么重要！

1941年，中央和北方局、冀鲁豫区党委发出加强接敌区和敌占区的工作、加强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加强城市军事情报和特务情报工作、加强伪军伪组织和国军的工作的指示。1942年，从区党委、地委、军分区到县委都建立了敌工工作专门机构，军分区叫敌工科，同时也叫敌工支站，敌工科长兼敌工支站长；县委敌工部，同时也叫敌工分站（受军分区敌工科领导），敌工部长兼敌工分站长。每个机构都有20人左右。当时，二分区成立了敌工委员会，书记段君毅，成员有万里、曾思玉、何光宇、潘焱、宋子健。二分区在郓

东还建立了敌工支站，领导昆(山)张(秋)东(平)汶(上)的敌工工作，站长颜华，共有十几个人，直接受分区敌工科领导。各县敌工部受分区敌工科和县委双重领导，分区敌工科代表分区实现领导。为什么 1942 年后要加强接敌区、敌占区的敌工工作？这是由于日本鬼子回师华北，他们在南方放弃了一些大据点，调部分日军到华北搞“囚笼政策”、“三光政策”、“蚕食政策”，进行连续大“扫荡”，其战术是“铁壁合围”、“拉网合击”、“铁脚合击”，军团长、师团长、旅团长亲临前线指挥，碉堡林立，挖封锁沟，筑封锁墙，妄图把我冀鲁豫部队和边区根据地一口吃掉，一时之间出现了敌伪和顽、会、匪联合闹边区的白色恐怖局面。所以，1942 年以后每年“青纱帐”起来，我们就开展广泛的政治攻势，即以军队为后盾，以政治宣传为先导，分化瓦解日伪军。为了统一对敌伪工作，1945 年，区党委决定：区党委社会部、城工部、行署公安局、军区情报处等机关合并一起、统一为区党委社会部，目的是形成统一的对敌斗争拳头。当时社会部机关有 700 多人，城市建党、群运、军情、特情工作都管。这时区党委的社会部长是刘晏春，副部长万晓塘(区党委委员)、王乐亭，办公室主任王路宾，副主任宋子健。当时，我们有打入国民党内的人，国民党也有打入我们内部的人，斗争极其尖锐、复杂。军事情报工作、国军工作、特防情报工作、城市党的工作、群众工作部门都是严格分开的，互不发生横的关系。城市国军党的工作与地下党组织的工作更是严格分开的，以确保安全。

在上述方针指导之下，运西地区的对敌伪工作有许多典型，我后来虽到区党委作城市地下党的工作，但二地委的对敌伪工作始终使我难以忘怀。

在敌人据点所在村庄隐蔽干部

1943 年 10 月 12 日大“扫荡”前夕，日本鬼子一个骑兵旅团、22 辆坦克、10 辆装甲车、5 架飞机对我运西地区进行大“扫荡”。这

时地委交给我一个任务：掩护新四军 60 多名团以上干部过路去延安，同时掩护办事处主任毛定远等十几位同志和地委、冀鲁豫日报社的几位同志的安全。当时我住在鄆西北武西庄杨拔贡的女婿陈秀峰家中。我接此任务后，经过认真分析情况，分别作了妥善安排：把新四军过路的干部和毛定远等 10 几位同志交由邢屯据点伪乡长兼小队长李凤山和士绅邢克让及其儿子邢洪宾在邢屯村庄安排隐蔽；把地委、冀鲁豫日报社的几位女同志边涛（万里的爱人）、李虹（地委宣传部长白桦的爱人）、孟华轩（专署财政处长边裕鲲的爱人）交由鄆城西门外袁庄据点的伪中队长王文斋（伪县大队长、县长王文宪的叔伯哥）和他在刘庄的拜把兄弟刘明吾负责，把她们从韩桥谷乃庆家接出领到他们家去住。大“扫荡”最紧张时，王文斋又把边涛、李虹转移到鄆城内伪中队长林洪军家住，“扫荡”过后才把她俩送到鄆北根据地，冀鲁豫日报社印刷厂和几位同志也由我安排在鄆北宋楼隐蔽。就这样胜利地完成了保护一批干部的任务。

在保护这批干部的任务中，由于夜间护送，我的双腿被狗咬伤，很晚才回到武西庄。第二天拂晓，我听到了汽车响，判断日本鬼子要进村了，于是立即越过黄河沙滩向南疾跑，而杨拔贡及其侄儿杨伯朋为掩护我们的干部没有出走，结果被日本鬼子用绳子拴在洋马尾部跑了十几里才松开。我从武西庄跑到昆吾县的小李庄，巧遇土顽区长李玉阶的哥哥，我正犹豫时，他即对我说，我把你送到邢屯据点附近的任庄去，那里比较安全（虽是对手，但毕竟有过世交）。两天后，开明士绅韩梦章的儿子韩新安知道了我住任庄，又把我送到邢屯据点的邢克让家。我被安排在东屋住，南屋是客厅，住着国民党的党工队（配合鬼子扫荡的）二三十人，队长是韩西山的儿子韩文卿，因此，我便不能露面。这次“扫荡”，鄆城损失惨重。县大队一连和七区区队在黄口西河滩中被敌骑兵包围，虽经激烈战斗，终因寡不敌众，且地形不利，大部壮烈牺牲，区长董兰阶也牺牲了。敌人“扫荡”以后，新四军过路的干部和毛定远带的十几个干部

由韩新安及其表弟从邢屯据点把他们送到了鄆北根据地，又把我从邢克让家接到韩新安家，第二天我也回到了鄆北。韩新安对我说：毛定远等十几人到邢屯后，把枪弹交给了伪乡长李凤山暂管。李把枪锁在乡公所一个柜子里。大“扫荡”时，伪县警察局的人也到了邢屯，打开李凤山的柜子，把枪全拿走了，韩叫我不担心，他会想法追回的。后经韩新安做工作，枪全部追回来了，但王文宪的队长曹福林留下毛定远的手枪枪簧。解放菏泽时，曹福林被我军俘虏，根据其一贯表现被我们枪决了。

1943年11月，打八公桥后，曾思玉司令员率部回师经过鄆西拔邢屯据点时，指示把李凤山喊来。李凤山来后，曾对李说，今天要拔邢屯据点，你缴械吗？李答：缴械。但他又说，我还没把全排的人都掌握起来。我即插话说，不讲了，你先回去做工作。我知道李凤山排里有个叫张秀端的班长很顽固，李凤山难以对付。李凤山回去后，根本没做工作，带着老婆孩子跑进了鄆城。当夜我们以两个连的兵力包围了邢屯据点，除张秀端突围外，其余全部缴械。

掏心战术，奇袭八公桥

八公桥。是伪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总部的所在地，周围设有据点17处。1943年11月，军区决定发起八公桥战役，拔除孙良诚的巢穴及其据点。战役由杨得志同志统一指挥，曾思玉同志担负前沿指挥任务。主力部队是七团（该团原是红军五团，有很强的战斗力），团长隆世兴，政委杨俊生。战役从11月16日夜间打响，17日黄昏前结束。

战役开始前，分区侦察股长邱克南化装进入八公桥总部，侦察其军事部署等情况。同时，杨得志通过打入孙良诚总部的共产党员吴晓衢和上层人物张履夫等以赠送古画等礼品的手法，接触孙良诚部的军、旅、团长，了解军情。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侦察活动，摸清了孙良诚总部是“外实内虚”，在总部仅有一个警卫团和八大处的

机关人员。16日夜间，部队开始运动时，大风骤起，沙土弥漫，伸手难见五指。曾思玉司令员运用“掏心战术”（亦称刘伯承同志的黑虎掏心战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插孙良诚的总部驻地——八公桥，一举歼灭了警卫团。接着，乘胜攻克了徐镇、王郭村、梁庄、保安集等17处据点。这次奇袭八公桥的战役，仅八分区即毙、伤敌四五百人，俘敌总参谋长甄纪印以下官兵3000多人，副旅长刘侠战场起义，孙良诚因去开封而漏网。缴获迫击炮2门，重机枪4挺，步枪1900余支，短枪90余支，子弹4000余发，电台2部，战马300匹，粮食数百万斤，兵工厂1座，其他物资大批。

这次战役所俘虏的官兵，都集中在濮县南宋集一带。处理政策是，经教育后，原则上一律释放。释放前，办事处主任毛定远和敌工科长张萍对甄纪印做了大量工作，但在释放甄纪印时他不走，要求见杨得志同志，不见不走。张萍报告杨得志同志后，杨得志同志同意接见，指示张萍把甄纪印领到军区司令部来（10华里）。当时杨得志同志住在一户大地主家里，有八仙桌等典雅家具。甄纪印进去后，杨得志同志的背后站有警卫连长、4个警卫员和1个秘书，穿着和杨得志一样，年龄也和杨得志不相上下。甄纪印傻了眼，认为是杨得志不见他（甄纪印当时已60多岁，胡子苍白，而杨得志30多岁，血气方刚）。这时，张萍把杨得志向甄纪印作了介绍。甄说：杨将军，没见您前，还认为您是白发苍苍，今天见了您却是白面书生，我打了一辈子的仗，还不知道您们这次运用的是什么战术？杨得志说，对你招待不周，你的家人一定很挂念你，我们保证你安全回到开封。我们后会有期。甄纪印说，您们解放开封时，我一定等着杨将军。

八公桥战役后，濮范观中心区和二、四、五分区连成了一片，扩大了抗日根据地。

八公桥战役前，孙良诚的伪暂编第五军王清瀚部、河北省保安12中队何冠三部，趁“九·二七大扫荡”之机，占领了濮县城和濮

阳南的柳林集，以两个团的兵力安了两个大据点。我们解放八公桥后，他们自动跑回原驻地。感奋之余，我写了《记八公桥战役》的一首诗：

北风骤起卷寒云，
掏心战术灭妖氛。
将军勇略挥劲旅，
战士赤胆著奇勋。
刀光血色神掩容，
人呼马嘶鬼惊闻。
苍髯敌歆甘拜倒，
文如书生杨将军。

八公桥战役胜利结束后，曾思玉率部回驻地——范县。路过鄆西，乘胜拔除了薛村据点。该据点紧靠黄河大堤，有围子、碉堡、壕沟、鹿寨，出入必须经吊桥，驻有临濮集派出的伪军一个连，连长李连江，同我二分区敌工干事王立仁接过头。夜间，我们包围了这个据点。次日中午，我处理完俘虏赶到薛村。曾思玉在很远就看见了我，招手令我跳入蛇行工事，接近据点前沿喊话。我面向据点边跑边喊：“不要打枪！不要打枪！我是宋科长！我是宋科长！我要和你们的李连长谈话。”我跑近吊桥对面的鹿寨接着又喊：“停止打枪！停止打枪！请你们李连长出来谈话。”枪声停止了，但伪军不答话。我又连续喊：“我是宋科长，请你们连长出来谈话。”伪军仍不应声。我接着喊：“八公桥总部已被我们彻底消灭，总参谋长也被我们俘虏了，旅长也在战场起义了，你们一个连能顶得住吗？缴械吧，我们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保证你们安全回临濮集，临濮集只住有鬼子一个排，他们来不了，就是来增援，你们也要被我们消灭。”这时里面答话说，李连长不在家（实际在）。我立即说，那就请你们的一排长出来谈话。伪军又不答话。这时，曾思玉和参谋处长李觉

先后来到我的身旁，他们穿的是毛毕叽西装式狐皮套装，戴着日本皮帽，伪军可能判定是两位大首长，立即向我喊话：叫他们两个回去！叫他们回去！不然我们就开枪啦！曾、李走了，我又喊：请你们一排长出来谈话。他们答话说：我们派两个班长作代表来谈判，行吗？我同意后，两个班长从吊桥过来，我一手挽着一个伪班长，到了大堤下面。曾思玉指着正要冲锋的两个连和登城梯子问伪班长：你们缴械不缴械？如不缴械，我们马上就发起冲锋。伪班长说，我俩是代表，我们缴械，同时要求不要留下我们当八路军。我们表示同意后，我又一手挽着一个伪班长送他们回围子，并说，要立即缴枪，不能拖延。几分钟后，围子门开了，伪军们身背大包袱蜂拥穿过吊桥，沿着大堤逃生了。伪军跑出不到200米，临濮集的鬼子和伪军前来增援。曾思玉见后，即令特务连从东面跑步迂回，侧袭增援之敌，同时令七团两个连把重机枪架入据点内，司政人员也进入据点内，计划打一个“里应外合。”但鬼子见我军在迂回，发现薛村伪军已沿大堤逃命，扭头就往回跑。曾司令员率部回颜村铺。

间谍落网记实

大约是在1943年的春夏，冀鲁豫军区敌工部抓捕了日本3名间谍分子，交二分区保卫科审讯处理。这3名间谍分子落网的始末是：1942年，日军对我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进行大兵团“合围”、“清剿”、“扫荡”，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见仍不能战胜中国人民时，便采取恐怖手段，妄图谋刺我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将军。1943年上半年，日军联络部在东京挑选了三个狡猾多端的间谍，对其直接交待任务和手段，然后由关东军派遣至驻山东菏泽的联队部，再配一个班，以哗变方式打入我冀鲁豫军区行刺，并在菏泽搜查了一条街以掩入耳目。当我二分区骑兵营将他们送到了军区后，军区敌工部部长李一非洞察其奸，立即转送到在华“日本人民反战同盟”支部书记水野靖夫处管理、监

视。这伙间谍开始打算盗窃、夺取武器或用脖卡子的手段行刺，但见我军区司令部警卫严密，无缝可钻，转而企图谋害水野靖夫。后来根据我敌工人员和水野靖夫了解和掌握的事实，军区敌工部决定逮捕这3名间谍分子。二分区保卫科在审理关押中，一天夜里风雨交加，间谍们趁机吹灭油灯，学着肥猪哼哼地逃跑了。我发觉后，四处搜捕，终于在五里之外的“青纱帐”中捉了回来。这伙间谍所有的幻想破灭了，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认罪，详细交待了日本间谍机关东京大本营联络部的阴谋计划及其对我看守士兵所施金钱、美女、地位三个诱骗手段等等。我掌握这些罪恶事实后，兴致勃勃地写下了“间谍落网记实”的诗：

一，东京受命

日本浪人性昏蒙，
倭华分外受奖崇。
贪功冒险同心态，
孤胆狠狠一脉通。
谋略首脑施恐怖。
间谍能手献愚忠。
东京受命苦思计，
机关算尽处处空。

二，长春派遣

关东军部用死间，
生死荣辱任手玩。
壁上利刃隐杀机，
华厅歌妓舞风髻。

家宴饯别想非非^①

异国风沙各斑斑。

“共区村村尽设防，

知尔此去不复还。”

三，菏泽“哗”变

敌军投诚一个班，

菏泽搜查传哗变。

大佐听命甘象尊。

部长独识庐山面。

内紧外松擒敌纵，

欲速求稳漫推研。

区别对待求分化，

奸凶终于被辨穿。

四，灭灯猪行

碧海连天青纱帐，

细柳拂风将军营。

梦想流血染五步，

妄图锦素传东京。

那知勋章苦无缘，

到头镣铐偏有情。

望乡台上犹自夸，

笑尔灭灯学猪行。

^① 出国前他们家人都分别设家宴邀约亲朋和其上司为他们饯行，家宴上他们都眉飞色舞幻想立功受勋。家人为他们祈祷，上司为他们祝福。

日本天皇的“赠礼”

1945年4月24日至5月17日,我冀鲁豫军区第二军分区接连发起南乐与东平战役。经两天激战,攻克南乐县城,毙日军37名,俘10余名,毙伤伪县长以下300余人,俘伪军旅参谋长、团长以下官兵3000余名。接着于5月17日发起东平战役,19日战役结束,全歼日军一个小队(40余人),日兵3人投降,歼灭伪军1000余人。

在上述两个战役中,都发生过白刃格斗,在日军拼刺不过我军时,日军小队长便大叫一声,接着每个日兵都将揣在怀中有两枚小手榴弹拉响放在胸膛(这是要求,并非每个日兵都这样做),骨肉横飞。据投降日军交待,他们出国前,家里人都要邀约亲朋和1名下级军官参加为之饯行。席间,该军官送出国日兵两个小手榴弹,称这是天皇的“赠礼”,要他们不成功便成仁。但他们投降、被俘后,泉皇的欺骗“面纱”全被撕破。我是两次战役的一线敌工工作者,为记日本军阀对其士兵的欺骗手段,写下了“日本天皇的赠礼”这首诗:

南乐东平起风云,
雄师连战歼寇军。
攻城夺堡灭犬类,
剑鸣戟嘶斩狼群。
飘洋不忘泉皇赐,
魂归无腔恁面君?
可怜尔等死不悟,
自戕为谁碎骨筋?

讨伐汉奸刘本功

郓城伪县长、鲁西五县剿共总司令刘本功，亲自兼任自卫团团长，有 5000 余人，请有日本顾问。1943 年，他在郓城的肖垓、刘口、肖皮口和傅庄等地安据点、驻重兵，妄图隔断我第二军分区与第三军分区之间的联系，苟延残喘，危害抗日人民。其据点的兵力部署是：肖垓，两个主力连，刘口和肖皮口各一个连，傅庄一个营（4 个连）。

1945 年讨刘战役开始前，我敌工干事于凤元常住在刘口据点附近一伪保长家里，以雇工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对敌伪工作。战役临近时，宋子健要求于凤元通过伪保长这个关系去做刘口据点守军连长王克学的工作使之战场放下武器。经多方努力，王克学表示：八路军打刘口时他保证不还枪，缴械投降。我另一敌工干事张景士带着十几个“桥梁”人物去做肖皮口据点守军连长×××的工作，当面许诺，只要他识时务，明形势，八路军不打他。该据点饮水比较困难，张景士便搞了些烟、酒交“桥梁”人物每天送进据点一些，但不送水，要他们坚持到我军打下傅庄后缴械，“死老虎要当作活老虎”对待，以防万一。总的部署是，对这两个据点采取“围而不打”战术和“政策攻心”策略，结果两个据点一枪未放，解决了问题。战役开始时，首先攻打肖垓，以威胁傅庄。刘本功两次调兵增援傅庄，每次都用 5 个奋勇连（奋勇连的士兵人人吃双饷），我则以“围城阻援”战术放他们进入傅庄据点。肖垓当夜被我军攻破，全歼了守敌。第三日下午，傅庄敌人以猛烈炮火向我七团和八团驻地冲击，这时指挥部的平射炮打响了，一下压回了敌人。一时出现“风平浪静”的局面。不一会，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在傅庄南××村东头寨的楼下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分析敌情：敌人原在傅庄据点驻有 4 个主力连，一个伪区部 50 多人（五区，区长王春峰），后增援敌人又

进去 10 个奋勇连,他们又冲了我们一下。我们已知敌人的战斗实力,这样我们外围的部队要坚决阻击再来援敌。最后宣布:夜里一定要打下傅庄。接着下达战斗任务:七团担负主攻,八团、独立团紧紧包围视情进攻。各部队迅速到达了指定位置。这时敌工干部各随一个团,宋子健随分区指挥所。天黑后,平射炮打响了,曾思玉令司号员吹冲锋号,总攻开始,一举突破围子。经一夜激战,伪军纷纷缴械,共歼刘本功部 2000 多人,经教育全部释放。当时冀鲁豫日报记者吴辰全担负战地采访,看了宋子健处理俘虏的全过程,第二天,冀鲁豫日报用一个版面登出了讨伐汉奸刘本功战役的长篇通讯。

在拔除上述据点的同时,郟城的红船、杜庄、白虎集的据点也被拔掉了,只剩刘寺据点还没拔除。该据点有 3 个中队,1 个伪区部,1 个鬼子班。曾思玉率七团和基干团(团长徐翼)当夜去拔这个据点。在我们攻打伪区部时,遭到鬼子班强火力的阻击,封锁了我进攻的主要通道。我军强行突破,占领了伪区部。在突破鬼子班封锁时,我军牺牲了 9 人,包括团长徐翼同志。鬼子班第二天夜间逃到菏泽。讨刘战役宣告结束。

陈克被捕的前前后后

1937 年陈克到了延安。1939 年调冀鲁豫边区分配在三四三旅当民运干事。1941 年调二分区敌工科,搞内勤。经一段时间的实践,发现陈克的政治理论水平和业务工作能力都比较强,决定把他放到一线去做伪军伪组织工作。陈克到了郟城敌工站,通过“桥梁”人物的介绍,被安排住在郟北敌占区王楼小学校长王胖子(王凯同志的叔兄弟)家里。王凯,曾在旧军队当过营长,杨勇兼任二专署专员后,王凯被调任专署警卫连连长。杨勇比较欣赏王凯的活动能力和政治立场,便决定派王凯回家与刘本功部的参谋长阎冠英

接头。阎冠英也干过旧军队，后被红军俘虏，留下到了滕代远部，分配当卫生员，以后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一次行军中他掉了队，无法赶部队便回到家里闲住。阎冠英与刘本功早识，刘本功曾要阎为他干事，阎拒绝。阎得知滕代远部到了湖西，便立即找滕要求归队。滕知阎与刘本功相识，便叫阎去刘本功部干事，并许诺保留党籍。阎冠英开始不愿接受。后滕介绍阎见了杨勇，杨勇知道阎冠英在红军中表现很忠实，掉队回家后表现也很好，他有一些上层关系，与刘本功相识，阎冠英在杨勇跟前不好推辞便答应去刘本功部干事，以后当上了刘本功部的参谋长。

王凯回家后，在郛南发现绅士、商人张合亭利用运河条件做生意，开了客栈，常常是宾客盈门，生意兴隆。他从中了解到张合亭与刘本功、阎冠英有较熟的关系，于是便有意地接近张合亭。通过接触又进一步了解到张合亭曾有个打手混号叫小梁子，当了刘本功部的营级军官，陈克住在王凯家里，对王凯的活动及其关系也有一般的了解。陈开始冒充济南的商人，慕名去见张合亭。通过几次接触交谈便处熟，张合亭不时招待陈克。言谈中，难免议论一些国家大事，这引起了张合亭对陈克的疑心。一次，张合亭直言不讳地问陈克：你究竟是什么身份？陈克见状便不掩饰地说：我是八路军三四三旅的，是杨勇司令员派出来搞统战工作的，统战工作就要广交朋友嘛！张合亭很钦佩陈克为人的坦诚，从此对陈克比较尊重。

张合亭的那个打手小梁子当了刘本功的营级军官后，仍不时来到张合亭家里闲玩。陈克抓住这个机会与小梁子拉关系，也与小梁子交上了朋友。

我运西自卫总队长李学启，被刘本功部抓捕。经刘本功威胁利诱，李学启当了刘本功的兵工厂的厂长。李学启的弟弟李学丰，是我郛城敌工站的干事。为使陈克与李学启接头，宋子健派专人请五分区司令员刘星（李学启当自卫总队长时刘星为二分区司令员）给李学启写了一封信。信中首先讲了当时的形势，接着肯定李学启过

去所做的好事,最后指出,虽然你现在为刘本功作事,但只要幡然醒悟,人民是会欢迎你的,也是会作出正确评价的,希望你与八路军保持接触和联系。李学启接受了刘星的劝告,与陈克接上了头。

一次,陈克向张合亭突然提出,要他领见刘本功。张合亭说:不行;但可领见参谋长阎冠英。张合亭领陈克见了阎冠英。张合亭对阎冠英说:我有一批买卖请参谋长作主。阎冠英看着张合亭身旁的陈克表现比较稳重,便引起了重视。此后,陈克三次打着张合亭的牌号,以商人的身份求见阎冠英,阎冠英从陈克的言谈中已断言陈克并非商人,而是八路军。

第一次讨伐刘本功战役胜利结束后,陈克从敌占区回分区汇报。在准备返回时,组织决定要陈克去做巨野伪县长曾子南的工作。曾子南与我郓东统战对象蒋火浪(共产党员)的父亲是拜把兄弟。因此,要陈克先到郓东蒋楼找蒋火浪的父亲给曾子南写封信带上去见曾子南,与曾子南接头。临行时,宋子健又交给陈克中央关于开展敌占城镇与交通要道工作的十一条指示和日本共产党领袖岗野进《告日本国民书》的中、日两种版本的册子若干本,并嘱咐:中央的指示精神要给王凯传达,中文本转送上层人物,日文本想法送到日本兵的手中。1945年2月,我延安支队陈定根部打下了郓城的程四里屯据点,威胁着郓城杨庄集据点(驻一个营)和刁孟庄据点(驻一个营)的守敌。他们如惊弓之鸟,每天夜里都把队伍拉出来,以防八路军的突袭。这种形势给陈克去见曾子南增添了信心和勇气。当陈克深入敌占区时,忽然下起大雪来,不一会平地积雪有尺把厚,一片白茫茫。陈克迷路了,一下跳进了敌人的封锁沟。当他爬上沟时,杨庄集据点站岗的伪军发现了他,问:什么人?干什么的?陈克无法躲避,便直向伪兵走去,没等伪兵开口便反问伪兵:你们王营长在哪?你见了他告诉他说,我去前面村上看朋友,返回来时再去看望他。陈克骗过伪兵走了。走不多远,伪营长穿着一身毛衣毛裤出来查哨了。伪兵便告诉伪营长说:刚才你的朋友还问你

呢！伪营长问：在哪里？伪兵指着陈克的背影说，就是那个人。伪营长令伪兵把陈克叫回。陈克转回身走近伪营长，若无其事地问：王营长，还认识我吗？伪营长说：没印象。随令伪兵对陈克进行搜查。陈克带的小册子已说明了身份。伪营长便带回审问陈克。问：你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陈克说：我叫朱昌达，是杨勇部队三四三旅的作战参谋，从梁山后方医院来，病治好了找部队去，听说部队在杨庄集附近，所以就来到了这里。伪营长见陈克身穿缎面袍褂，头戴礼帽，脚穿皮靴，便说：你不是参谋，你是参谋长！陈克也没否认。伪营长即向郟城伪自卫团部打电话说：我们抓住了杨勇部队的一个参谋长，叫朱昌达。这时陈克要求“解大便”（乘机处理了身上带的中央指示的抄件）。接着伪营长派了一个排、两匹马，亲自送陈克去郟城伪自卫团部。押送途中，陈克抓住时机进行宣传，说：意大利墨索里尼已经投降，今年要打败希特勒，明年要打败日本。一个人不管是做好事还是做坏事，老百姓都不会忘记，环境决定一个人的行为，给敌人干事的不一定都是坏人，有的人是不得已干的。关云长被俘在曹营还为刘备立功呢？苏武留胡最后不还是到了汉朝吗？人总要从长远看问题，总要留点后路，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少一个冤家少一堵墙，朋友总是到处都有的。伪营长听而不语，士兵们听得入神。到了自卫团部，日本顾问在，刘本功不在。团部放着比较典雅的、分等级的椅子，陈克一进去就坐在高等级的椅子上，然后把放在桌子上的日文版小册子拿起，对日本顾问说：这是送给你的。接着，一个伪团副来审问陈克。问：你是参谋长吗？陈克说：参谋长在旅部哩！这时有人叫日本顾间接电话。日本顾问令伪兵把陈克绑起来，而后带到日军司令部里。一个日军少佐营长审问陈克。问：你是参谋长吗？陈克说：我是三四三旅参谋长。正要押走，日本宪兵队长高山二郎接着审问陈克。问：三四三旅住在哪里？陈克说：住在杨庄集附近。问：你城里有哪些熟人？陈克说：我是外地人，主要考虑打仗。问：三四三旅怎样获得

情报？陈克说：手段多得很，主要靠直接侦察。问：有多少情报人员？陈克说：我们是野战军，靠军分区提供情报。问：郛城有多少共产党员？陈克说：假如你是参谋长，你知道有多少吗？总之郛城到处都有共产党员。宪兵队长问发火了，便说：你老实点，我是中国通。陈克驳斥说：既然你是中国通，何必来问我呢？第二天上午，宪兵队一个汉奸来提审陈克。他手里拿着两个烧饼，一袋花生米，边吃边问陈克：在惠民区烧饼多少钱一个？花生米多少钱一袋？陈克一笑说：你的中国话说得很好哩！汉奸说：我就是中国人。陈克说：你有一点中国人的味吗？汉奸恼羞成怒。陈克接着说：我知道刘本功是杀人魔王，你是这个魔王的爪牙，你要怎么对待我，就请便吧！一天下午，刘本功把陈克提到他的小办公室里，先令伪兵给陈克松绑。然后说：朱参谋长！……。陈克插断刘本功的话说，那好！我就叫你刘县长罗！刘本功说：好！我们就交个朋友吧！陈克说：我也想和你交朋友，可惜，你是杀人魔王，这个朋友难交啊！刘本功说：那是误会。陈克说：你要杀我就快杀吧！刘本功说，老弟，我不会杀你，我想留你干事，我不会亏待你。陈克说：别磨嘴皮了，要杀就快杀吧！

陈克入狱后，监狱长就对陈克说：你在日本人那里讲的话，县长都知道了，他认为你是一条汉子，所以他决心要救你，并要他和他一起干事。如果你不答应，他就把你送到济南反省院去。陈克听后认为，刘本功想拿他到济南邀功，便下决心在那里被捕就死在那里，这样分区首长知道，敌工科战友们知道，郛城老百姓也知道我陈克是为国捐躯的，决不会投降、进反省院。于是陈克进行绝食斗争，并在夜里写了“热血浇春草，中华更新犹。遥祝毛泽东，灯塔照全球……”的绝命诗。监狱长把此情况一传开，引起了伪政机关一阵轰动。陈克在写绝命诗前，想了很多很多，但最主要想的是：为抗日而死比泰山还重，死而无憾。绝食第四天，刘本功又提审陈克，仍是把陈克提到他的小办公室里。问陈克为何要绝食？陈克说：与其

叫日寇杀死,不如自己死。刘本功说:你既然被我要来,我会保护你。这些天我在想:你怎么与我合作,我想要你当我的参谋长,我最近到济南去,就是保你出来当我的参谋长。陈克说:我不能当你的参谋长,我不能侍奉日本人,不能与你们一道为虎作伥。刘本功说:我不是真汉奸,到时候我会和你一道收拾郓城的日本鬼子。刘本功反复劝说陈克都无济于事,于是说:你这也不干,那也不干,反正我决心救你,你想死也死不了。问陈克怎么办?陈克说:我就在你这里坐牢。无非坐两年,曙光就会到来。刘本功说:好,我答应你坐牢。边说边拉着陈克到了外屋,来!来!来!先吃饭,吃了饭我们继续谈。陈克说:你答应我坐牢,我就复食。吃了一碗面条,又回到刘本功的小办公室里。刘本功说:我看你有很多话要说,今天我听你说,你放开说吧!陈克首先讲形势。说:今年肯定打败希特勒,明年肯定打败小日本。目前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上大失利,在我华北也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郓城战斗打得鬼子不敢出来,我军接连取得清丰、南乐、东平、寿张等战役的胜利,这些我估计刘县长是知道的吧,想必也是有体会的吧!再从我山东部队、东北部队、西北部队来说,胜利是一个接着一个,想必刘县长不会不了解吧!接着讲政策,根据目前的形势,说我八路军现在的政策是,谁大先打谁,谁强先打谁,谁坏先打谁。现在回头还不晚。八路军坚决执行民族矛盾第一的方针,你们应该站在人民大众一边,争取为人民立功。应当学习关云长“身在曹营心在汉”心怀自己国家的爱国主义精神……。最后,刘本功说:我要去济南两个星期,回来再救你。你不是想坐大牢房吗?那你就去坐大牢房吧!陈克关进大牢房后,每天都有饭馆的人给他送饭,陈克始终不知是谁安排的。

刘本功提审陈克后,日文秘书张洪光(混号张二歪脖子)、新民会宣传科长国民党特务王吁沫、刘本功的中文秘书李×、伪警察局长等先后提审了陈克。陈克抓住每一个机会大讲国际国内反对侵略战争的大好形势,大讲共产党八路军的政策,揭露蒋介石消极抗

日积极反共的罪行和伪军组织人员如何受蒋介石、中央军的欺骗及其所抱的幻想等等，毫无当阶下囚的气氛。

刘本功从济南返回后，再次提审陈克。刘本功说：你留下当我的参谋长，将来我们一块收拾日本鬼子吧！陈克说：你若真意放我，也可以起义归顺八路军嘛！隔了几天一个深夜，监狱门忽然打开，进来几个手提匣枪的伪军，监狱长令陈克起来。陈克预感刑场就义的时间到了，便求监狱长给个条件写遗书，监狱长答应并带陈克去他的办公室写。刚刚开笔，伪军即把陈克五花大绑起来，背上还插上亡命旗，又带到刘本功的大办公室内，刘本功的几个伪团副正向外出，刘本功对陈克说：再给你谈谈。陈克说：不用谈了。反问刘本功：你为什么深夜来杀我？刘本功说：今晚我真的要放你，我不能明目张胆放嘛！我是杀一个吸白面的坏人来顶替你的。陈克说：用不着来这一套，我视死如归！扭头就走。刘本功说：老弟，我今夜真的要放你，一会儿你便知道，并交待说：你回去以后只能给二位杨司令说（指杨得志和杨勇），对其他人一概不能说。你不要再回来，若再押回来，我一定杀你。接着伪军用毛巾塞住了陈克的嘴，押着陈克向街上走去。只见街上岗哨密布，戒备森严。通过西门，直到西关外的沙滩上才停了下来。这时陈克看见离他不远有一个身穿灰棉衣的人也站住了，伪军很快把这个人推跪在沙滩上，只听闪光的喀嚓一声，伪军马上就脱掉了他的棉衣。与此同时，伪军给陈克松了绑，脱光原穿的衣服，换穿灰棉衣，边推边说：向着正西不要拐弯，快跑！快跑！这时陈克反而像落了魂似的有气无力地跑着，走了很久才过了封锁沟，心情顿觉沸腾起来，万没想到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欲泪不下，欲笑不能。更想到，回到科里，战友们肯定知道我被捕，无比惊异与亲热。自己将沉浸在无比温暖的气氛之中。陈克越想越恨不得三步并作两步走，尽快与亲人相会。然而越是自我欣慰，越是迈不开双腿。这时又想起韩愈“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是痕新”的诗句来。心想他们一定进行了工

作,知道我这个党的儿子要脱离虎口归来了!

次日早晨,即陈克正向敌工科急进过程中,鄂城敌工站在鄂城西关的联系人派人骑着自行车急匆匆向二分区敌工部汇报说:朱昌达同志遇难了!昨夜刘本功在西门外沙滩上杀朱昌达,现在鄂城西门都贴出了布告。

宋子健闻此噩耗,上午立即召集敌工科同志开会,大家义愤填膺,争先报名于夜间去抬陈克同志的尸体。午饭后大家休息了。下午二时,陈克同志突然回到鄂北杨屯敌工科住地。最先见到陈克的是炊事员老刘,老刘惊喊一声陈干事,便猛扑上去拥抱陈克。敌工科的全体同志闻声赶来,不胜惊异,喜出望外,都和陈克热烈握手,有许多话说不出来,都等陈克叙述回来的经过。

陈克被捕后的第二天,鄂城敌工站即报告了分区敌工科。敌工科一面通过敌工干事王凯请阎冠英、张合亭做刘本功的工作,一面通过鄂城敌工站了解掌握陈克被捕后的情况,同时给刘本功去了两封信,告诉刘本功:希望他以民族大义为重,我们将不咎前怨旧恶。一个月后,不见刘本功的反应,又以曾思玉司令员之名义给刘本功去信,要他速放朱昌达,立功解怨,否则要给他双倍的打击。据查,这两封信都到了刘本功手里,为营救陈克起了作用。

陈克回科休息一周后,到了分区,向段君毅政委作了汇报。段政委说“缓兵之计”。接着,组织科找陈克谈话。经过王凯、阎冠英、张合亭等人的证实,刘本功因收到曾思玉的信,一开始就打算放陈克,后又收到第二封信,才想了用冒名顶替的办法放陈克。这样做,刘本功先征求了张合亭和阎冠英的意见。张合亭说:过去得罪八路军的事太多了,这次他们分区司令员又来了信,也讲情也威胁,应该识大体,给情面。阎冠英说:张合亭的意见很好,我同意。之后,刘本功又问国特王吁沫有什么意见。王说:这种人宜杀不宜纵,放虎容易捉虎难。阎冠英闻知后对刘本功说:王吁沫有野心,远水不解近渴,我们可不能听他的胡说。

经过组织上一个多月的详细调查,结论:陈克同志被捕后立场坚定,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和战斗精神。分区决定: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派陈克到郓城敌占区,继续通过阎冠英、张合亭、李学启做刘本功的争取工作。

1945年,刘本功调济宁,被伪山东省主席王耀武任命为暂编第四师师长兼济宁市市长。李学启任团长,阎冠山仍任参谋长,张合亭随到济宁经商。与此同时,分区敌工科请段君毅政委给鄄北黄楼的大学生苏辑五和张殿庄的大学生张兆堂写信,要他们帮助我敌工干事孙乃东、五中来去济宁。因为苏辑五和张兆堂同鄄城伪县长王文宪办了一个商业性的合作社,在济宁设有商店,孙乃东、王中来乘该社汽车去济宁,到他们的商店落脚与李学启联系。

1945年12月末,我晋冀鲁豫军区第七纵队及冀鲁豫军区部队集中鄄城境内,杨勇司令员、张国华副政委、王辉球主任和八分区司令员何光宇、政委万里等,在鄄城天主教堂里对团以上干部作解放郓城、汶上、嘉祥、巨野和济宁等县市的战斗动员报告。12月31日,郓城和巨野解放。1946年1月2日解放嘉祥,汶上敌人弃城逃跑,济宁被我包围。这时陈克穿着一身黑色缎面的羊皮袍子,冒充逃亡地主沿途宣传八路军的声势。于1946年元旦到了济宁市南关张合亭的货栈,与张合亭会面。张合亭问:你怎么在这个时候来了?陈克说:杨勇司令员率大军解放了郓、巨、嘉、汶,要我来济宁争取刘本功起义。我是来救他的。如果他起义,一切前账旧债可销,反之,一切后果自负。张合亭沉思一会说:这个时候不能去见刘本功,只能去见阎冠英。陈克说:不行,非见刘本功不可!陈克拉着张合亭的手说:跟我走,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杨勇司令员的大军马上就要到济宁了。张合亭跟着陈克去到刘本功师部。刘本功一见陈克大吃一惊说:老弟,你怎么又来了?陈克说:我是来救你的,杨勇司令员叫你起义,他说,一切旧帐统统钩销,并且保留你的地位。刘本功自恃有王耀武和兖州和空援,沉默好久说:老弟,请你告诉杨

司令员,请他先打下兖州,把兖州打下,我就缴械投降。否则,我要抵抗到底。陈克说:兖州肯定要打,有别的部队去打,兖州、济宁将会一齐的打下。你曾经不是说有一个师团就要表现表现吗?现在你不是有一个师了吗?是你表现表现的时候了。刘本功说:如果先打我,我要坚决抵抗。陈克见刘本功态度顽抗,不可争取,便说:刘师长,我还能回去吗?刘本功皮笑肉不笑地说:老弟,那里话呀,不送你了。陈克和张合亭出来后,到了阎冠英的家里。张合亭走后,阎冠英对陈克说:今夜你出不了城,四门已关。陈克为及早向杨司令员汇报刘本功的态度,要阎冠英设法让他出城。阎冠英先领陈克见了刘本功的几个团长,而后派人用绳子把陈克从城墙吊下。陈克飞似地向南关跑去,杨勇司令员已到南关,听取了陈克的汇报。

济宁被我包围一个星期,我军重点攻击了南门,其他门以火力压制,敌人龟缩在工事里。济南飞机虽两次前来空投弹药,但空投的弹药物资都落在我军阵地。刘本功开始动摇。他派济宁一区伪区长王春峰到城东墙垛口喊话:不要打枪!不要打枪!刘师长请朱昌达进城谈判。杨勇接到电话,飞马到了东城墙下。敌工科建议让李学启的弟弟李学丰爬梯进城去同刘本功谈判。杨勇指示说:只要刘本功缴械投降,我们保证他身家性命和个人财产的安全。当我军竖起特制的楠竹梯子准备登城墙时,伪军则阻止:这边的喊竖到那边,那边的喊竖到这边。杨勇立即察觉刘本功是搞援兵之计,即令司号员吹冲锋号。我军发起猛烈冲击,一举占领了东城墙,伪军纷纷跑下城墙向北街和西北角溃逃。同时南也被我攻破。原在郛城经敌工干事马文俞、李学丰建立的“内线领导”的伪排长,这时已是连长,率领全连在南城墙起义,并立即带路冲下城墙追歼溃逃之敌。西北门伪军纷纷滑下城墙逃命,但都被我军所俘。1月9日,全歼刘本功师及其地方部队10000余人,解放了济宁市。

战役结束清查俘虏中,没有查出刘本功。后来得知,刘本功溃逃时带了一袋银元,收买了济宁市一个老太婆,在他家藏了下来,

夜里用绳子坠城逃往济南。国民党特务敲诈完他的钱财后，被王耀武以“临阵脱逃罪”枪决。

充分发挥“政治包围圈”的作用

1944年12月5日，寿张县城解放，阳谷成了一座孤城。朝城伪县长刘金山带着残部逃到阳谷；寿张伪县长沈广训，在解放寿张时因事先去济南漏网，此时也带伪军逃到阳谷。阳谷城内盘踞着治安军一个团，团长张育焕，阳谷城内共有伪军约4000余人。

伪军、治安军不时向我根据地窜扰，冀鲁豫军区决定解放阳谷。阳谷本属一分区管辖，因一分区部队主力调出，所以决定把解放阳谷的作战任务交给八分区。

解放阳谷前，军分区决定，阳谷、朝城、寿张三县敌工站暂时合并，统一指挥。当时阳谷只有敌工干事葛忠一，朝城只有李亚，寿张县敌工干部较多，因此确定以寿张县委敌工部为主，由县委敌工部部长杨萃民统一负责，受阳谷县委领导。杨萃民等首先分析了三县伪军和治安军的情况，认为治安军多系异地人，从其内部建立内线关系时间不允许，只能以三县伪军作为工作的重点。接着，在原有基础上，又建立了新的关系。如阳谷伪警备大队副王耀一，曾到军分区驻地见过宋子健，宋领王看了军区文工团演的话剧《前线》，和他建立了一定的关系。同时，杨萃民和分区情报股长邱克南密切配合，进行了搜集情报的工作。阳谷敌工干事葛忠一，通过上层关系，搞到一本阳谷县志，内有一张画得很详细的城市街道图，杨萃民和邱克南把搜集到的敌人的兵力部署和工事构筑情况都标示在这张图上，成为一张完整的兵力部署图。曾思玉司令员指示将该图复制发各级指挥员，在战斗中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945年7月19日，即攻打阳谷前一天，分区部队集中在寿张县金斗营，敌工干事亦集中这里待命。杨萃民带了重要的伪军家属（如阳谷伪县长、警备大队长刘继春的父亲）和几个重要的上层“桥

梁”人物备用。20日下午,曾思玉司令员和万里政委作了战斗动员,口号是:“打上去!打进去!”接着向阳谷城进发,深夜即包围了阳谷县城。后经3次攻城均未得手。23日,调整战斗部署,激战一夜,于24日拂晓攻破了外城,敌人全线从城墙上退到城内。我乘胜追击,伪治安军和刘金山部被我七团分别围在了天主教堂附近和十字路口西北角的小围子里;阳谷、寿张伪军被我五团和八团围在城内西南角的小围里,双方展开激战。这时敌工干部杨萃民、葛忠一、李亚和我随五团进入距城内西南角约200米远的文庙,与阳谷、寿张伪军对峙。此时,敌工干部向刘继春喊话:“刘县长,你父亲在我们这里,他要去看你。”经反复喊话,刘继春同意让他父亲进入他的围子里。我速向段君毅报告。在阳谷南城楼指挥部里有杨勇、宋仁穷、段君毅、万里、何光宇、潘焱、范阳春等领导同志。宋子健事先给刘继春写了一封信,准备在刘同意他父亲进围子时带去。我在向段君毅报告的同时,把这封信稿交给了段政委审阅,修定后交给了刘继春的父亲,并向刘的父亲说,要好好劝降,我军今晚就要攻打他的围子。刘继春的父亲进到刘的小围子后不久,刘便停止打枪,派出代表,领我敌工干部进入小围子。刘继春下令部队放下武器,伪军徒手走出围子。这充分显示了“政治包围圈”的作用。我即令杨萃民率寿张县敌工干部把俘虏带到范县城南冯固集住下,进行审查处理。而治安军的小围子仍在负隅顽抗。杨勇勒马亲临治安军小围子南门口指挥战斗。我和孙乃东紧跟其后。七团二营教导员黎波和三营营长李化南在冲锋中英勇牺牲,部队冲锋更猛,步枪、机枪、手榴弹朝小围子墙上、房上、院落激烈射击和投掷。我部队很快冲进了治安军的围子,伪军纷纷缴械,团长张育焕死心塌地,一枪打死其内弟,一枪打死其妻,然后自毙。我们在打扫这个团长的办公室时,发现他写字台上放着一本曾国藩的“治兵语录”,这是一本汉奸哲学。这次战役,在刘继春小围子缴获轻机枪6挺,掷弹筒14门,驳壳枪150多支,步枪1400多支,寿张伪军残部缴枪

100多支，弹药大批，俘1000多人。在治安军的围子里缴获轻机枪18挺，驳壳枪200余支，掷弹筒20多门，步枪1500多支。缴刘金山部长短枪300多支，弹药大批，俘2000多人，朝城伪县长刘金山被击毙。这次战役，扩大了解放区，鼓舞了广大人民，为冀鲁豫地区对日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战役结束，为歌颂抗日战士为国捐躯的伟烈精神，揭露敌人的丑恶行径，我写了两首诗：

一、官奇割鬚

一纸短柬送内城，
困垒示降息枪声。
伪官逼主思赎罪，
敌首割鬚乞隐情。^①
约法三章将军策，^②
肝血泉涌战士诚。^③
阳谷攻坚每记起，
杀声犹在耳边鸣。

二、汉奸哲学终破产

齐燮元辈无耻尤，
南苑建军遗国羞。
“治兵语录”当天书，^①

① 注，日本顾问官奇剪胡子，向护兵求情，幻想隐瞒身份。

② 战斗中段君毅政委指示伪军代表谈判三条政策。一、保证他们身家性命与个人财产的安全。二、保证日本顾问身家性命与个人财产的安全。三、如果他们提不收编俘虏，则不能同意。事实是伪军代表未提任何条件。

③ 战士看到战友的伤亡，义愤填膺，自动发起杀敌立功竞赛，为战友报仇。

① 指张育焕的奴才思想。

“军机大臣”作钓钩。^①

走狗仗势声狺狺，

沐猴乞怜啼嗷嗷。^②

汉奸哲学终破产。^③

手刃妻室三命休。

国民党军第一个全团起义

国民党六十八军警卫团团长江公干，河北省大名附近张家村人，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老支部书记是同村的张大姐。张公干曾任冯玉祥的侍从副官。蒋冯战争时，冯战败后张公干随冯玉祥到了莫斯科，受到斯大林的接见。回国后，国民党一直怀疑张公干是红底盘（即共产党员），受国民党军统小组的长期监视。因此，张公干在国民党军队里一直担任副职，如团副、旅副，就是不给担任正职。1947年春，蒋介石声言：三个月肃清华北的共产党及其军队。国民党六十八军军长兼河南省主席刘汝明认为，三个月就可消灭华北的共军，张公干还有什么不可以任正职呢？于是任命张公干为六十八军警卫团团长江。

冀鲁豫区党委开封工委委员范毅（曾任县委书记）把张公干任六十八军警卫团团长的消息，报送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部长王乐亭即派城工部干事郭仪提着四封点心去大名张家村找张大姐。去时张大姐正在打豆子，邻居喊张大姐：你家来客人了。张大姐回到家门口一看，不认识来人，便说：你走错了门吧？！郭仪说：大姐，咱们进屋说吧！进屋后，大姐问：你是哪里来的？郭仪说：大姐，我是

^① 曾国藩虽为清王朝军机大臣，但其办公室在故宫金殿旁仅有一间低小的房子，说明这个毕生效死镇压人民起义的奴才在主子面前何其卑微，但张育煥却把他当作崇拜的偶像。

^② 张育煥幻想在其垂危之际，济南日军定会增援，但负隅顽抗七昼夜，终于绝望，畏罪自毙。

^③ “治兵语录”中充满汉奸哲学。

冀鲁豫区党委组织部来给你接组织关系的。张大姐说：你们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蒋介石叫嚷三个月肃清华北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时候来。郭仪说：大姐，这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现在来是党需要你，所以才来找你接组织关系的。张大姐问：组织上要我干啥事？郭仪问：大姐，你认识张公干吗？张大姐说：他曾是我支部的党员，他死了烧成灰我也能闻出味来。郭仪说：大姐，你知道他现在何处吗？张大姐说：谁知他在哪个狗皮匣子里哟？郭仪说：他在开封，是国民党六十八军军长兼河南省主席刘汝明的警卫团团长。我来的任务是请你去给他接组织关系。张大姐问：叫他做什么？郭仪说：你问他，他能干啥就干啥。接着，郭仪把张公干住开封的地址告诉了张大姐。张大姐到开封后，白天找到地址，天黑才去找张公干。见面后，双方都还认识。张公干问：大姐你怎么来这里？张大姐说：冀鲁豫区党委组织部要我来给你接组织关系。张公干说：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蒋介石声称三个月肃清华北的共军这时候来。张大姐说：早不来是为了保护你的安全，现在来是党需要你。张公干问：组织上要我干啥？张大姐说：这一点我倒是注意问了，他们说由你自己斟酌，在不影响你安全的条件下，能干啥就干点啥。张公干凝思一会说：我只能送情报。正好，我现在的传令班还缺三个人，你回去汇报组织上，派三个人来。张大姐把张公干的想法向郭仪回报后，王乐亭部选择了开封工委书记范毅去当传令班长，同时让他与开封工委切断联系，把城工部国军科员、曾经当过营教导员的姜侠夫派去当传令班副班长；把滑县×区委书记老郑派去当传令兵。

1947年6月30日，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二、三、六纵队共约13万人，运动在300里的战线上，强渡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歼灭蒋介石主力九个半旅5万多人，生俘正副师长宋瑞珂、陈颐鼎、理明亚、罗哲东等高级将领，为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建立根据地和吸引敌人向我打大规模运动战创造了条件。

在鲁西南战役期间，我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二、三旅及各军分区部队在配合刘邓大军作战，阻击和歼灭溃散之敌，打击国民党地方武装及还乡团，掩护民兵担架队，转移伤病员和相机收复县城等方面均取得辉煌成果和突出战绩。

蒋介石为拯救行将崩溃的厄运，调动了李弥、孙步月、孙元良、邱清泉 4 个兵团和整编骑兵师以及六十八军共约 30 万人，上从新郑、下至东阿顺黄河一线，采取左包右剿中央突击的战术，声言要在×时消灭刘邓大军于黄河南岸。张公干得此情报后，即指示范毅还派老郑将此情报口头传送第五军分区，电告驻在黄河北岸濮县李桥刘邓指挥部。刘邓首长得到了这一重要情报，部队迅速转移。

为实现上述罪恶计划，担负中央突击任务的邱清泉半机械化兵团的部队，迅速赶赴鄆城西部的黄河岸边，结果扑了个空。当天开封国民党报纸却登出了消灭刘邓部队、活捉了刘伯承的新闻。第二天一早开封的报童又叫卖刘伯承的战报。喊道：卖报！卖报！刘伯承的战报，刘伯承是福将，越咒越旺。蒋介石又下令后追前堵，而我刘邓大军 4 个纵队、2000 付担架并带着上万名俘虏，已从黄河岸边南移而横渡淮河了。五兵团政委苏振华在战后谈及刘邓大军这次背水作战的情况时，激动的说：刘邓首长真是“全身是胆！”

不久，六十八军改为整编第六十八师，张公干被调任三五六团当团长，驻守鄆城。国民党随派一个军统特务小组也驻鄆城，以监视张公干。这时国民党鄆城县长是张伯麟。1947年9月13日，姜侠夫在鄆城北门外遇上老郑，对老郑说：我发现有特务跟踪，我可能被捕。老郑问：你报告团长了吗？姜侠夫说：还没来得及报告。很快，老郑和姜侠夫回到了团部，向张公干作了汇报。张公干说：你们都别再出去了。张公干一面以第二天拂晓打野外为由，派员领取弹药装备部队，一面通知部队×时×地集中。当时驻鄆南的一个营（营长是新调来的）因路远没按时到达。张公干等候这个营一到，便率领全团向北运动，同时派马给老郑，要他火速报告冀鲁豫军区派

部队来掩护。军区得悉后，速派王乐亭带一个营前往掩护迎接。当部队赶到黄河渡口时，张公干已到了黄河北岸。除晚到的那个营长拉走了两个连外，全团 2000 多人全部起义。张公干后被任命为我第四军分区司令员。

(胡人记录整理)

湖西地区敌工情况回忆

李汝太

冀鲁豫湖西地区位于山东西南，徐州市的西北，南靠陇海，东靠津浦，北至巨嘉，西至曹县（五地委），共有十一个县（江苏的铜、沛、丰，安徽的砀山，山东的单、鱼、金、嘉、钜、城，河南的虞城），并受徐州、商丘、兖州三个敌人军事战略据点的威胁和包围。同时，对敌人讲，也受着我党我军的威胁。因此，敌人对这块地区和我方进行了争夺，不管是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期间，这个地区的人民出力很大，受到的战火灾难也很大，最后得到胜利。

湖西地委、军分区当时对这个地区的敌伪军工作，和城市工作下的本钱很大，做出了很大成绩。

1942年前，各县没有敌工部，分区也没有敌工站，部队有敌工股、敌工科。因此，陇海路沿线城市的工作，特别是徐州、济宁的工作，直属地委领导。军队分区敌工科和团敌工股主要负责部队的教育，和战斗中的敌军工作。但对湖西各县城的日军、敌军工作，顽军工作，敌占区党的工作，沿路线城市打入工作，情报工作，大部分都是，由1942年开始的。原因是湖西实行了一元化领导，明确敌伪军工作由部队做，敌工科组织武工队活动在敌占区。顽军的统战工作由部队联络科做，敌占区工作由县敌工部做。徐州城市工作由地委组织工作团，直属地委领导。1942年下半年地委成立敌工委员会，军分区设敌工总站，各县设敌工站。为了领导方便，巨南设了敌支站，管巨南工委领导的几个县。单西设了支站，管单县、砀山、单虞、曹县这几个县，支站归总站领导。我当时是单西南敌支站长，又是

单虞工委敌工部长。因此，西段陇海沿线城市工作和没有开辟的县敌伪军情报工作，敌占区情报工作，发展党的工作，建立地下军队的工作，土匪顽军和会道门的工作，就全揽起来了。陇海线上的商丘市的工作从1941下半年也就开始插手了。下面谈几个具体工作：

一、1940年秋，黄河支队一团为配合开展单西南工作，组织了工作团，我当时是一团敌工股长，执行了这个任务。我记得，团首长指示，一是除奸，二是宣传组织群众开辟新区，三是争取瓦解敌伪军，四是把单县、虞城、商丘的社教工作建立起来。并给了我一个特务连，一个宣传队，还有除奸、民运、敌工干部，住在黄岗集。首先打了单县南刘辛庄的汉奸地主（他儿子在单县城里日本新民会当课长）。罚了他3万元，给部队解决了冬天的棉衣问题。随后在虞城找关系建立了情报站，初步掌握单县城里和虞城县敌人的情报，开展了黄岗集一带工作。

二、1940年11月，工作团结束了，我们回到部队，随团西进曹县，打了国民党黄埔军校（西安分校住胡辛庄），还消灭了顽军朱进勤部队200多人，共俘400余人。随后教四旅首长和团首长决定，七团穿过老黄河故道横扫河南虞城县境内的伪据点，扩大我军在虞城县的政治影响。并派我和地方干部陶懿春同志带了两个侦察员进入了虞城县，对伪四区区部、二区区部，伪商务会长的家，进行了侦察工作。第二天返回曹县青圃集、南卫庙向旅、团首长进行了汇报。当天下午部队进入到虞城，晚上打下了伪商务会长的家——董寨、伪四区区部——袁寨，并俘了100多人，机枪1挺，长短枪40多枝。但，内有伪商务会长的父亲，还有袁寨的祝家敌人。把这些带回到湖西根据地后，伪会长马上找到关系派他儿子来我一团，要求不要杀他爷爷，还有袁寨的寨主参加了八路军，我们抓住这样的机会开展了虞城县的敌伪军工作。并对伪商务会长采取了“打拉”政策，明着打了他的汉奸，给八路军送了3万发子弹，还有洋

布、纸张、油墨、硫磺等；暗地里拉上工作关系，在抗日时期为八路军送情报，掩护干部去虞城工作，购买医药军用物资等。同时通过这个伪商务会长，开展两个伪区长和城里敌人新民会、宪兵队的工作。特别是我们进城都由他负责掩护。

另外，通过原情报站和袁寨祝云峰建立了关系，由祝云峰做商丘的工作，在他哥祝云台货栈建立起了联络站。这个站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这个货栈在商丘市铁路北，靠东叫永生货栈。经理就是祝云台，我们所有工作人员都在他那里吃住，进行工作。前前后后在商丘建立了张岚峰军需刘希的工作关系，在警察局建立了刘西宾的关系，在马车行做工作的有王兴如，又打入到商丘工作的有刘公义、李庆先等。商丘工作开展后，李庆先转入洛阳青年军军部电台当上了班长。范合清在县警察局当上了警察。刘公义转入曹县作商丘还乡团的工作。

三、1941年开始，在虞城县共建情报联络站五个，城东北张楼，城关一区区部，城西苑堤口，城西北赵集、商丘。随后，在虞城开始了发展党的工作，到1942年底，发展五个党员（张凌云、张合印、祝云峰、范合清、魏常娥、宗方亭），培养了一批积极分子，由朱少宾、张凌云的侄子，祝云山等。1942年底，在虞城县，建立了两个党的小组，一是张楼，二是赵集。这时候虞城地下党很活跃，1942年开展过两次大的宣传攻势，城内城外散发1万余份宣传品，震惊了虞城县的敌人，也振奋了虞城县的人民。日寇对城里和农村进行过清查，在清查中地下党打击了敌人。有三个日本鬼子下落不明。这时候虞城地下党和根据地有一条联络线，不管是白天夜晚，下雨刮风，联系是很密切的，交通员8年如一日，老黄牛张合印。

四、在虞城建立党的工作之后，为了长期作好解放虞城工作的准备。根据上级指示，（地委）在虞城建立了两支地下武装。

第一支武装是1941年秋，利用旧的社会关系建立起来的，名义为虞城四区保安队。旧关系曹永年是我根据地单县新滩区区长

陶德春同志的仁兄弟。当时由陶德春同志介绍来根据地商议过后，教四旅十团拿出破长枪 32 支，建立起后，我方为了掌握这支部队，派陶德春同志去领导这支武装。同时，由于这支武装发展得很快（到 1942 年底已有 200 多人），又派了敌工支站外勤干事王忻去城东南赵集联络站加强领导。当时，为掌握这支武装，我们下本钱很大，两个干部都是营级干部，当时曹永年表现也很好。到 1944 年夏，孙良诚部队一个旅，旅长李子义，投降了虞城县敌人，并封他为虞城县保安旅，住在虞城城北 25 里李集，陶德春通过曹作李的工作，在李子义的谋害下，打死了我们敌工干部陶德春，这支武装也被李子义编入他的部队中。赵集联络站由此撤消了。

当时，赵集联络站的任务，除掌握这支武装外，还做孙良诚的工作、商丘的工作。他在曹县虞城和商丘交界处，四面都能连上。

第二支武装，是 1943 年筹建的。是虞城地下党设法建的，我为这支武装去虞多趟，经过研究，推荐党员祝云峰当队长。并批准他和伪四区区长拜了仁兄弟，利用伪区长的关系，和四区保安队的名义建立这支武装。当时，一是由区长牛永山带祝云峰见了县长拉上了关系。二是大造声势，祝云峰卖了 20 亩坏地，买枪。三是我们给了他 20 条破枪，明确兵质要好，不要兵痞、土匪，年老的人等，并命范合清为分队长，敌工总站批准派了敌工支站内勤干事李庆先去做文书工作，实际上为领导小组组长，党的小组长。经过半年多的工作，这支武装在 1944 年春已形成，80 多人，长枪 60 多支，短枪 4 支，并在内部培养了 4 个入党的积极分（班长）子。到 1945 年春，因五分区十三团误会，打掉了这支武装，俘了我们的干部。随后五分区和三分区联系，又设法使这批干部重新打入回去开展工作。重新设法建立地下武装。总之，虞城县的地下党员，没有出问题，解放后都担任了工作。

五、谈一下 1946 年 8 月 13 日在虞城争取蒋嘉宾率领 5000 官兵反内战起义的经过。

1946年8月13日正式起义的。蒋嘉宾当时起义是积极的，主要是他有两个副司令，一个是国民党派来的高一侠，一个是刘耕来，从谈判开始到最后结束，他二人也未有说出个长和圆的。只是在大势之下勉强签上了名，思想一直也未通。

蒋嘉宾本人当时的表现坚决，但也有他的想法，起义过来还是当他的司令。共产党的政策他了解，加上当时形势逼迫，只有走起义道路其它的路子走不通。特别是国民党要整编他，他不干，到国民党那里他没有好结果，起义过来，一不改编他，二官兵不动，只改番号，接受共产党领导，三过来以后冀鲁豫区党委准备研究他的党籍问题，他是有想法和希望的，所以他坚决。其他人认为起义怕不重用，而且国民党派来就是掌握武装的，他受国民党改编有功，有赏，这是高一侠的想法。刘耕来是跟着高一侠跑的人物。因此起义后一直不稳定，新五军到了杨山，他们暗地里也取上联系。8月19日下午，在高刘两个司令的操纵下，又把部队拉回到国民党方面去了。

我回忆这段，12日我奉王幼平同志的指示，叫我带着他的亲笔信。到单南杨里楼找到李连山，让李连山把信送到蒋嘉宾部，并叫蒋本人回信，结果信送到了康楼刘耕来手里，只写了一个收到条，当天下午王幼平同志也赶到杨里楼，告我你代表区党委去见蒋嘉宾，明给他讲，不起义解放军要解除他的武装，同时告诉他，起义后一不改编他的队伍，二给他一个纵队的番号，三区党委研究他的党籍恢复问题。明天早上你到豫东纵队，找到史效昭同志你一块再商议。因史效昭同志已去豫东纵队，我赶到豫东纵队，见到了魏凤楼、刘主任和史效昭同志。他们给我讲，现在送信的还未回来，等送信的回来再进去。可是这天杨山已被我军打下来了，给蒋嘉宾的部队影响很大，震惊了内部，刘耕来回信，蒋司令同意谈判，下午2时，我和史效昭同志去康楼，6点从康楼去虞城见蒋本人谈起义问题，走到虞城正东10里路左右，李庄寨有个庙，在庙上谈的（这个

庄名再落实一下)一直谈到下两点也未统一了思想。这时,蒋嘉宾说进虞城继续谈,骑上马到了虞城城里,蒋嘉宾住县政府里,又开始谈,天明,三个司令签字了。这时蒋本人讲,你不签字我一个人签和你们没有关系,两个副司令看到形势只好这样,签上名。14日上午,我由虞城去七纵向杨司令员、张政委汇报了起义的经过。并把三个司令签字的起义手稿交给了杨张首长审阅。当时杨司令拿起笔来进行了修改。同时让通讯员把宣传部长康建叫来一块研究了通电稿,由康建负责发出:“蒋嘉宾率 5000 官兵反内战起义告全国同胞书”。康建随后又布置大量的印发,下午 2 时半左右,杨张首长告康同志说,代表七纵和汝太同志一起去蒋部进行慰问。这时我和康一块由大杨树出发,天黑后到了康楼—蒋嘉宾司令部,当时王幼平、李公俭都在场。晚上由王幼平同志给蒋嘉宾谈一夜,天明回菏泽汇报去了。15 日下午开的欢迎大会,每人发了两块钱。17 日突然接到杨司令员的命令,叫蒋、刘、高三个司令员去纵队开会,并研究陇海工作问题。这时部队已准备拉走,七纵首长得到了可靠的情报,随后又送信来,三个司令员不接受开会令,你们也注意他们的动态,在他们拉前设法离开。我是拉走前离开的,蒋嘉宾得消息后叫我骑他的马、带他的警卫员走出来的,这时蒋告我说,谁也死不了,就是你活不成,因你是代表区党委来的,部队是我一手搞起来的,刘耕来是我提起来的,他们一定会留一条老命给我。史他三哥在这里,他不会死的,你快走。到豫东纵队汇报,让豫东纵队解决这支部队的问题。实际上已来不及了,原定五点钟拉走,我一走提前行动了。豫东纵队打了截击,俘虏几十个人,部队全部拉走了。最后蒋、史放出来了,我的通讯员被枪毙了。(拿我名义献礼的)

六、武工队问题(另有材料)简单讲一下:

1946 年 8 月 19 日,蒋嘉宾部队拉走后,我很快地回到地委城工部。这时新五军前头部队已进到单南马良集,十一师已占领了丰县城,随分区地委向后撤到金乡县的司马集。突然接到冀鲁豫军区

的电令，上面写着，命令李汝太即组成百余人的武工队向敌人后插，配合大军作战。一搞敌人情报，二破击敌人交通兵站，三组织群众打击国民党、还乡团，为受难的人民撑腰。此电令由王幼平从机要室拿出之后，马上叫我看，下午地委组织动员干部参加武工队到敌后去。这时，部队地方谁也不自动报名。我把敌工干部城工干部，组织起来，选择了70人，第三天下午向敌后插去。这时国民党军大部已占了单县，但坦克、炮兵还在向北来。和敌人交插到敌后面，进行了艰苦的战斗，执行了党交给的任务。我记得，在离开分区地委时，王幼平同志交给我20万国民党票子作插入敌后的活动费。地委分区首长指定我代表地委分区到敌后执行任务，掌握政策。两个多月的艰苦生活，十分锻炼人，上不靠党，下不靠群众（地委，军分区已都搬往黄河北去了，群众不敢接近武工队，地主富农组织成了还乡团，庄庄都是），独立生存在敌后活动，两个月被国民党围剿过七次，武工队活动在曹、虞、单、砀、丰这个东西地带，18天未有进村庄，晚上战斗，白天靠陇海铁路和黄河故道拉来拉去，70多人剩下有32人，病、伤、死都有，武工队一时的情绪也很不好。10月底，军区命令湖西军分区派人和武工队联系，三次派出。一次也无归，最后派八团，并由分区参谋长夏林带领，向敌后插，半路一仗，团长也负伤了，部队损失也很大，但军区任务是找到武工队。这个团经过多次战斗，到了敌后，找到了武工队，由于敌八十八师跟着八团，随时又打回到我后方。武工队也随八团回到了鄂南。在整顿中，军区令我再带10个人马上插回湖西一带，并叫挑选有经验的胆大的去，挑选后，军分区又给了一个老红军营长，当了我的助手。任务二条：了解陇海路以北敌人的情况，搞到敌人的情报；打击敌人还乡团、区乡公所等，把敌人后方搞乱。我们化装成国民党军（也有便衣）突破敌人的前沿。打了一仗，深入到敌人内部。遇上了两起巡逻的也都应付过去了。终究一夜只能走六七十里路。天明前插到敌人（五军）穴里进行隐蔽，天黑又插，又打了仗，伤员也无处放，带

着南下,半路消灭还乡团,天明敌人开大会,宣布八路过来几个人,在谁家不报杀头。我们战斗了28天,大小仗几十次,敌人的情报拿到手了。在砀单公路上专门截击了由徐州向前方送信的吉普车,查出了杜聿明给前方的密电,还有蒋中正给徐州行署的密电。知道敌人已查觉了我军准备渡黄的行动。12月10日前返回后方,这时张玺政委、区党委书记来到武工队,总结武工队几个月的工作。12月30日,武工队全部又一次插回湖西敌后方,进行活动。前后8个月,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七、谈一下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争取瓦解敌伪军、顽军反正和起义情况:

(一)抗日时期:

湖西单县至金县伪军吴本功反正过来一个大队500人左右;鱼台县伪军李正阳反正过来700人左右。顽军起义的有吴品山,3500人左右;徐州交警总队一个队,队长周××,有350人。日本投降后,在黄口有四个美国特务放下了武器。

二、解放战争时期:

砀山蒋嘉宾反内战起义5000人;青年军过来一个营,450人左右。

三、部队打仗被俘的人数后查清再告,因数字很大。

四、经我的手,还有1939年10月争取郟城保安大队侯宪明反正。(当然这个工作还有刘玉胜的大功,有曹子尚功劳,和工作队一块谈判,并见了杨勇司令)

我们协助军区敌工部作了王天祥的家属工作,也派了敌工干事去王天祥部工作。

还有土匪的工作,交枪30多支,重机枪一挺,手枪两支。

七、我们湖西敌工干部300多人,每县一个敌工站,有多少碉堡,就有多少干部。当时200多个碉堡,每个碉堡都有我们的干部。另外打入城市37人(不确),我只知道,砀山—虞城—商丘的,还有

单县几个。利用社会关系和半脱产的不算。

八、抗日时期,牺牲的敌工干部:

成业,徐州工作团长(营级)

陶德春,虞城工作的(营级)

任本喜,单县工作的(连级)

王兴如,商丘工作的(干部)

微山湖区的秘密交通线

张新华 孙新民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驻地沂水,经冀鲁豫边区,通往太行根据地延安有一条重要的微山湖区的秘密交通线。它东起津浦铁路沙沟站的彭楼,西到湖西单(县)虞(城)根据地,水路 15 公里,陆路 100 公里。活跃在这条交通线上的有铁道游击队,微山湖游击大队、沛(县)滕(县)大队。他们紧密配合沛(县)滕(县)边县委、沛(县)滕(县)边联合办事处,安全护送了包括刘少奇、陈毅、罗荣桓、朱瑞、肖华、陈光等领导在内的千余名同志过封锁线,传送文件和情报以及军用物资,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8 年,在微山湖东岸的夏镇三孔桥小学就有了进步的学生组织“读书会”。1932 年,夏镇民众教育馆工作的中共党员张光中,秘密开展党的工作。在发展地下党员时,介绍张新华(张运海)入党,并派张打入津浦铁路沙沟车站当路警,开展党的秘密工作。1933 年 9 月,中共江苏省徐海蚌特委遭受大破坏时,张新华遭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张光中等想方设法营救未成。直到 1937 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再次合作。在中共强烈要求下,张新华等从国民党南京监狱获释。张新华出狱回到夏镇,未找到原来的组织关系,会见了老战友郑安良,一致认为现在国难当头,一边拉武装,一边找党组织。他俩联络进步青年金子良、郑东山等,利用夏镇国民党区长白赤霞组织自卫团的机会,打入其内部积极开展工作,实际上掌握了该自卫团的领导权,金子良当队长。11 月,张新华、郑安良

去湖西，在沛北宋庄找到张光中。他恢复了张新华的组织关系，指示他和郑安良回夏镇发展抗日武装。从此，夏镇的抗日自卫队直接由张光中指挥。1938年2月，夏镇抗日自卫队拉到湖西宋庄，正式编入张光中领导的人民抗日义勇队，为开辟抗日根据地湖上秘密交通创造了条件。

1938年7月，组织上派张新华到滕县接白子明来湖西。白到湖西任区党委书记。张新华奉命留夏镇负责交通联络工作。年底，沛滕边县委成立，王传珍为书记，郑一鸣、张用沛、周牧九、张新华为委员。

1939年春，沛滕边县委在微山湖建立武装，后来发展成沛县八路军独立营，张新华任营长。4月，编入苏鲁豫支队后方办事处第五游击大队。7月，张新华调任沛滕边县委任武装部长。王志成发展抗日武装建成200余人的“沛八”独立营。不久“沛八”独立营也编入第五游击大队。

1939年8月，湖西发生“肃托”事件。郝中生、孙衷文、李毅等蒙诬被关押在一起。他们在狱中写密信请被释放的人带出去交刘昭等，刘到夏镇找张新华一道赶到仓山县，向罗荣桓汇报情况。罗与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司令员张经武带部队赶到苏鲁豫区党委，查明真相，雷厉风行落实政策，释放慰问在押的同志，还做了不少善后工作。

1939年秋，沛滕边县委建立警卫营，张新华任营长，李超然、陈瑞吾先后任教导员，辖5个连。1940年春，调张新华带着警卫营到沛县中心县委工作。

由于国民党反共高潮步步紧迫。1940年6月13日，沛县顽军又制造“六·一三”事件。沛县五区区长李剑波（共产党员）被撤职，沛县警卫营、五区常备队和铜北独立营被包围，一些共产党干部和群众被枪杀，我抗日武装被迫撤出沛县县境。由于丰、沛、铜、鱼、滕五县顽军围攻湖西根据地。沛县中心县委党、政、军机关撤到丰县

一带，湖区部队及地方武装于1940年6月统一编为丰、沛、滕、铜、鱼五县游击大队，大队长许言语，政委郑统一，朱煜如任政治处主任，张新华任副大队长。1940年10月20日随五县工委党、政、军、民撤到湖西根据地。五县大队突围西撤到达单县根据地之后，原警卫营升级编入教四旅独立团一营，张新华任团参谋长。

1941年1月，张新华受湖西党组织的派遣回湖西重新组织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经过多方联系串连，在沛滕边县委的领导下，开始由一支20多人的小部队，逐渐发展到40多人，番号是微山湖游击大队，张新华任大队长，袁振华、梁道友任班长、排长。秋后这支队伍发展到100多人，由张建中任连长兼政指。1942年在高楼组建成3个小队。后来，湖上区中队也编入成立了四小队。同时，沛铜也建立了地方武装沛铜游击队，队长李耕川，政治委员李宾。这支武装有30多人，携带短枪活动在微山湖及其沿岸，编入微湖游击大队第五小队。他们人少却很精干，打起仗来灵活、机智、英勇、顽强，经常以少胜多，出色完成护送干部，传递情报、文件和秘密联络工作，成为远近闻名的李耕川小五队。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阶段，在湖东、湖西地区敌人加修碉堡，筑墙挖沟纵横交错。我们与陕北党中央的交通一度被切断，鲁南到湖西的交通联络时断时续。上级党委一再指出，微山湖的游击队必须排除万难，尽快恢复和加强湖上秘密交通线。

10月间，湖西军分区决定加强微湖大队的领导，从黄河支队调胡桂林到微湖大队任副大队长，由张新华亲自去接。8月，又调115师教导四旅政治部组织科的孙新民任微湖大队政委兼县委委员。告别时，旅长邓克明、政委张国华指示：微山湖一带要建立起隐蔽、巩固的根据地，我们的部队必须加强，做好群众工作、统战工作，分化瓦解敌人，保证湖上交通线畅通，这是你们的首要任务。”

当时县委书记是张庆林，委员陶力民、孙新民、张新华，曾开会研究贯彻邓克明、张国华的指示，“自从1940年湖西形势开始恶化

以来,沛滕边县委和主力西撤后,日、伪、顽气焰嚣张,强行建立起伪政权,进一步鱼肉百姓多次清乡“扫荡”,强化治安,抢劫烧杀,无恶不作,以至造成从湖西到鲁南,从华中到陕北的交通干线迭遭敌人破坏和阻挡。上级指示是及时的正确的,我们必须尽快恢复湖上交通。”

不久,微湖大队在湖西高楼正式建队,共有100多人,短枪40余支,马枪、步枪60多支。下设五个小队,一个手枪班。大队长张新华、政委孙新民、副大队长胡桂林、赵峙宇(后牺牲)。全队指战员都穿便衣,采取分散活动隐蔽游击的方式。上级党委指示:“要服从大局,做好争取瓦解敌人的工作。”经研究以伪军警备队尹洪兴团长为对象,孙新民带战士刘志田趁天黑到伪保长张修业家,因孙曾做过张保长的工作,他答应孙政委的要求,亲自到夏镇与尹洪兴联络,与孙秘密面谈一次,组织上决定先派党员刘家廉医生到尹洪兴团部任军医。由刘家廉、张修业做工作争取尹洪兴,并约定时间孙新民亲自去面谈。双方谈得开诚布公,尹团长试探问道:“听说贵军吃掉郝鹏举一个团,真是正义之师旗开得胜。”孙说:“郝不自量,欺人太甚,不得不教训他。”尹点头称是说:“他罪有应得。”孙新民讲形势,晓以国家民族之大义,盱衡大局,要留条后路。尹欠身靠拢低声说:“老弟尽管吩咐。”孙指出:“为了避免冲突和误会,你部应撤掉南庄附近几个据点,撤换几个欺压百姓常在我们附近活动的头头。请不要阻碍我们的活动,我们也不进入你的防地,日军有什么动静,请招呼一声。”尹点头同意。不久,尹部撤掉南庄附近的几个据点,又撤了坏头头,双方相安无事。湖西减轻了尹部的后顾之忧,湖东根据地逐步恢复和发展,湖上交通也得到加强。东起西万,西到沛县、铜山我军驻地,全长百华里的交通线进一步充实加强。这是连接湖西、华中、山东、陕北的枢纽。当时山东分局、115师、新四军的干部,从苏北去延安在这里护送过封锁线,还经常传递文件、信件、运送药品、物资等,都从微湖交通线秘密通过。

1942年8月初,微湖游击大队接到湖西军分区司令员邓克明、政委潘复生的命令,负责安全接送胡服(刘少奇)。接头人是115师教导二旅旅长曾国华和沛滕大队政委李明。约定的那一天拂晓,张新华会见曾国华、李明。刘少奇和随行人员,谈笑风生,由张新华领路向湖边走去。没走多远,张新华站在芦苇荡旁边放开嗓子吆喝一声,芦苇深处摇来7条小船。刘少奇上船后频频向护送的同志挥手告别。船到浅处,刘少奇下船和大家涉水过滩。询问大旱水枯人民生活,谈锋甚健。没走多远,刘少奇上小船向西南渔邦驶去,然后到刘钦田老夫妇的大船上休息。就餐时,刘少奇拉张新华、曾国华等同桌进餐。晚上,刘少奇在油灯下翻阅批改文件,孜孜不息地工作。晚风瑟瑟,他轻轻地将自己床上的军毯盖在熟睡的警卫员身上。第二天,刘少奇泛舟游弋在大湖西侧,仔细询问湖上秘密交通的情况。后来,他对湖西党委指出,微湖水陆交通是华东、华中通向延安的唯一通道,要加强党的领导,统一行动,坚持斗争;要发动群众不断扩大根据地;要关心群众生活,搞好生产。刘少奇离船上岸前,向刘钦田夫妇等辞行道谢。上岸后主动站在出发的队列中,如同普通一兵,服从领队的指挥。过了微山湖,四旅及湖西军分区派骑兵来迎接,刘少奇上马挥手向微湖大队的同志们告别。

刘少奇走后,沛滕边县委贯彻少奇同志指示,成立了沛滕峰工委,以微湖、铁道、沛滕3个游击队组建成鲁南军区独立大队。张新华为支队长兼微湖大队长,孟照昱为政委。

护送肖华过湖西是1942年10月,那一天,苏鲁支队派武装护送115师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还有肖的夫人王新兰、秘书康矛召及警卫员一行10人。先到685团驻地苍山县,再由沛滕游击队护送到枣庄,接着由铁道游击队护送过津浦路,直送到微湖大队的驻地葫芦头。由于事先得到情报,敌人获悉八路军有个要员路过湖西,加严设防与搜捕。微湖大队派一个分队和短枪班去接送,为了摆脱敌人搜捕,安排肖华等在芦苇荡一间小草房里

隐蔽休息七八天。肖华听取汇报后对张新华等指出：“这里环境非常好，你们的工作已有基础，但不要只图打仗，要缩小目标，搞好统战，确保湖上交通。”

几天后，查明了敌情，决定趁隙过湖。那天下午4点多钟，微湖大队整队分乘几只小船，向王楼驶去。小船前后左右将肖华的船簇拥在中间，驶到王楼上岸。到了接敌地区，由一中队队长张建中带20多名战士护送肖华等走在前面，向丰、单湖西根据地教导四旅的驻地走去。走到谭寨，鹿楼附近。看见有带枪的人快步迎面而来，原来是湖西派来接肖华等同志的。看到刚才有的年轻战士慌张虚惊，肖华主任和葛指出：“遇到情况，千万不要慌张，要沉着，不然真和敌人遭遇就会造成损失。”

肖华夫妇1943年春返回时，过微山湖看见孙新民拄拐棍行动不便，亲切抚肩问候。孙新民说：“那次送你们过湖不久，我带短枪班去湖西整训，途中遇敌被包围，在组织反击突围时腿部受重伤。”肖华对他慰问和勉励，又指示要继续充分地发动群众，继续分化瓦解敌人，确保微山湖的交通安全畅通。微湖大队遵照肖华指示，后来派刘志田到西万、王庄、石坝、郭庄、洛房一带加强交通工作。又派人去争取部分伪乡保长与我们秘密保持联系，其中有两位与微湖大队的同志结拜为兄弟，愿为抗日效力。邓寨的帮会收了一批“徒弟”，这些“徒弟”实际是有志抗日的同志。肖华在过铁路时留下诗一首赞颂道：

神出鬼没铁道旁，袭敌破路毁沟墙。

深入兽穴斩虎豹，飞越日车夺械粮。

汪洋大海游击队，怒火熊熊敌后方。

条条铁轨成绞索，寇灰满载运东洋。

115师代师长陈光赴延安时，罗荣桓指示鲁南司令员张光中，要他安排护送，保证安全过敌人封锁线。铁道游击队的政委杜季伟带领部分队员和短枪班共50余人，护送陈光和他的家属向津浦路

西进,顺利通过了敌人的层层封锁,安全送到微山湖,由微湖大队护送交给教四旅。湖上交通取得成绩后,山东分局、山东军区的陈光、罗荣桓、黎玉、肖华4位领导联名来信表扬。内容是:“张新华、孙新民同志,你们在敌人重兵把守、碉堡星罗棋布,日伪顽四面包围的严峻情况下,正确执行了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放手发动群众,分化瓦解敌人,建立了隐蔽的抗日根据地,象一把尖刀插在敌人的心脏,用你们的勇敢和智慧,打开了湖上交通线,护送了大批干部,保证了安全,特向你们表示慰问和感谢,希望你们再接再厉,确保湖上交通畅通无阻,争取更大的胜利。”

陈光 罗荣桓 黎玉 肖华 1943年×月×日

护送朱瑞带黄金给中央。那是1943年9月,有一天微湖大队得悉山东分局书记朱瑞要去延安参加“七大”,同行的有湖西地委组织部长陈璞如和陈的爱人苏健等一行9人,将路过微山湖,由微湖大队负责护送。他们从山东分局所在地沂水出发,昼伏夜行,由铁道游击队的双枪战士护送,安排朱瑞骑一头大黑驴,趁隙过铁路封锁线,到微山湖畔的蒋集休息一天,微湖大队派10多个队员去迎接上船,隐蔽在芦苇荡中,接到地委交通员送来潘复生的机密急件,日军进湖西大“扫荡”,建议暂时隐蔽在湖中。这一滞留竟耽搁了10多天,同志们加岗放哨,严防敌人进湖“扫荡”,保卫领导同志安全。

有一天,朱瑞悄声对苏健说:“你帮我到老乡家借根针线来,我有用。”苏健将针线借来了,朱瑞从腰里解下个黑布小袋,沉甸甸两个破洞露出耀眼的金光。朱瑞低声对苏健说:“这里面是金砖,要保密,主要担心坏人见财起歹心,这是上交党中央的经费。我们的财政太困难了。处处需要钱啊!”苏健一边点头,一边穿针引线将黑袋上的破洞密匝匝地补好,由衷地感谢朱瑞对她的信任。

朱瑞滞留在微山湖的日子里谈笑风生,博学多闻,豪情满怀又

平易近人。他是江苏宿迁人，曾留学苏联，回国后曾任长江局军委参谋长兼秘书长。他对秘密交通联络工作的重要性谈得头头是道。他介绍交通工作的经验，原来他在江西苏区 1931 年担任过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二科（侦察）兼三科（交通）科长。他指出，湖上交通的环境条件很好，这是一条至关重要的秘密交通线，必须继续加强。后来收到潘复生政委的来信得知敌人“扫荡”已撤回，微湖大队送朱瑞过湖，恋恋不舍与朱瑞告别。

陈毅将军过微山湖是 1943 年 12 月，微湖大队由孙新民、胡桂林亲自率部负责护送。当时日伪军已察觉湖上我方有条秘密交通线，撤换了铁路以西据点里的伪军头目，加强防范，只剩下沙沟火车站尚可设法利用。该站伪军副队长，尚有爱国之心，与我们有过往来，他嗜赌如命，微湖大队的领导与铁道游击队研究决定，采用“调虎离山”的办法，深夜派熟人去请伪军副队长赴宴喝酒、关门赌博。在赌博的喧嚷声中，铁道游击队的同志护送陈毅过了铁路封锁线，微湖大队在接头地点迎接陈毅等到微山湖边的葫芦头休息。陈毅在微山湖时，诗兴大发，留下了一首《七绝》：

横越江淮七百里，微山湖色慰征途。

鲁南峰影嵯峨甚，残月扁舟入画圉。

陈毅在船上不知疲倦地看文件，询问湖区的情况。当他了解到微湖大队的险恶处境时，很关心说：“你们活动在敌人的心脏里，武器太差了，我写个条子你们到军区去领些新的武器、弹药。人的因素固然重要，但武器必不可少。”同志们欣喜地接过条子一看，拨给微湖大队 20 响驳壳枪 40 支、马大盖子枪 40 支，还有 4 挺轻机枪。陈毅还到微山岛看望坚持反“扫荡”的英雄人民和军队，凭吊了微子古墓，留下掷地有声的不朽诗句：

泛湖遥瞻微子墓，千古尧称周之顽。

而今滕薛踞侯寇，投敌最觉应自惭。

微山湖上的秘密交通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依靠人民群众战

胜各种困难,为完成任务做出了不平凡的贡献。同志们称赞这些通讯联络点是“红色堡垒”,是“交通员之家”,他们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

冀鲁豫区党委军区 豫鲁办事处工作概况

李苏波

一、办事处组建前身

1943年,党中央指示:“加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准备战略反攻。”为此,1944年2月,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决定将军区司令部情报处、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区党委社会部及外线关系统一领导。机构合并后,建立城工部,由政治部主任朱光同志领导,军区敌工部长李一非同志主持,我和闫海同志参加筹办。抽调党政军干部60余名。指定我负责在菏泽组织其学习,进行整顿。同时,了解开封及陇海路沿线敌伪动态。后军区通知,将已调人员组成区党委、军区豫鲁办事处,由军区配备电台报务译电人员,由鲁西南军分区派武装警卫。向敌占区陇海铁路沿线大中城市、交通要道,开展工作。

(1)办事处机构名称为冀鲁豫区党委、军区豫鲁办事处,对外称军区陇海办事处。先后任命李苏波为主任,牛连文为副主任,马达为秘书长,付亚平为办公室主任,还有秘书王文勃、田淑同志等。敌工科长戴德,情报科长刘振国,联络科长张敏,机关勤杂人员80余人,进驻鲁西南根据地中心区菏泽县大杨湖办公。

(2)为加强陇海路沿线工作,统一领导,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党内建立工委,由李一非同志兼书记,李苏波为副书记,主持常务工

作,吸收有关地委和军分区领导及有关同志参加组成。同时,确定将陇海路沿线,党内和敌伪工作关系交给办事处统一领导,并向各地委、军分区提供战略情报,积极配合根据地对敌斗争。

①鲁西南地委、军分区在民权、兰封、考城建立工委会,常委李冠卿同志领导民权县内黄集敌工站,成员有王丹臣、张金山、崔润生、韩德甫、张贯一、管沛生、崔子玉等同志。在开封工作的姜达生、芦毅然、陈秀峰等同志,后又与杜新民同志(伪四方面军十八师师长,我地下党员)取得联系。

②水东地委和军分区,由杨育英、于秀民同志领导开封和淮太西绥靖公署魏凤楼的关系。同时,将在商丘工作的王飞霄、王继贤(张岚峰部五十五师副师长,我地下党员)、贾子义(伪第四方面军教导团教育长,曾参加过共产党)、郭永照、程培兆、魏一博、田白健(上述四位同志均为中共党员)等同志的关系均介绍到办事处。

③敌工部派刘庭章同志去徐州与侯方若接上关系,与湖西地委和军分区派到徐州工作的同志配合开展工作。

④豫北地委和军分区,在1944年末和1945年春,先后派李庆堂、李庆斋在开封北书店街组建皮革厂为掩护,建立了联络站。

⑤十八集团军总部在郑州的联络站,由王××同志取得联系,配合在郑州一带工作。在开封作情报工作的郭有义、曾洁光等也建立了党组织。

从以上关系的介绍交接过程中,了解到各大中城市和火车站都有我地下党员和同情者进行活动,做了大量工作,促进了抗日运动的发展。铁道南北的联络交通站,比较巩固可靠,处处有武装掩护,民权、内黄由管沛生同志负责武装掩护,商丘、杨集由王继贤驻军掩护,徐州西黄口(属肖县),在敌伪碉堡、炮楼林立、壕沟纵横,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也开展了工作。新四军和水东军分区与冀鲁豫地区保持了交通联络,有了一定的工作基础。

(3)1944年6月,中共中央指示:“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

作为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准备担负起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和交通要道的责任。”据此,对铁路线组织进行了整顿,在原有工作基础上,建立开封工委、徐州工委,我兼书记,在伪军中由机关派工作人员,实行单线领导,一般不建立党的组织,以便隐蔽埋伏。

组织简况如下:

1944年6月建立开封工委,李苏波兼书记,李冠卿为组织部长,不久提升为副书记,宣传由张金山负责,部长由军区另调配,联络工作由王丹臣负责,为扎根开封,确定李冠卿同志率王丹臣、张金山及民、兰、考等有关同志进入开封市,由李常驻开封主持工作。由姜达生同志建立了特别支部,打入敌人内部,开展工作。

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十分重视开封工作,亲自听取汇报,指示工作。城工部李部长亲自去开封具体指导,不断加派干部车阴棠、桑巨人、王炳如(他们都是北大、南开大学毕业的)等同志进入开封。同年张金山同志进行文化教育工作,组建党支部。1945年2月,王振海组建西城党支部,陈秀峰组建东区党支部,王吉升在南关组建党支部,在市民和社会各阶层中深入工作。并加强敌伪宣传工作,争取瓦解敌伪军,孤立死心踏地的汉奸。扩大爱国统一战线,为了进行长期隐蔽活动,由城工部投资开设开封酒店,李冠卿同志为经理,李声皇为管事,以合法职业作掩护。

由于陇海路地处中原,是东西交通枢纽,南北过渡桥梁,为日、伪、顽和我军争夺的战略要地,斗争十分尖锐复杂。根据军区城工部指示,办事处工作重点放在开封,以便今后控制陇海铁路。1945年,重点加强商丘驻军伪四方面军张岚峰部工作,派丁盛伟为开封工委书记,李冠卿为副书记,范毅为委员。次年,元月丁盛伟调走,派于子元为书记,李冠卿仍为副书记,刘子民(豫北办事处主任)、范毅、张金山为委员,于子元1946年1月调离,李冠卿同志为书记。又充实了西城、东区、南关、学校四处党支部,新建了公路局党支部。

1945年8月15日,日军投降,国民党派要员来开封强占抗战胜利果实。阶级矛盾斗争激烈,姜达生同志被迫撤离开封,回到办事处。1946年9月李冠卿同志被捕,范毅、王振海、刘洪、陈秀峰同志安排善后工作,组织掩护李冠卿同志的家属子女撤到太行解放区。张金山同志转移,区党委派孟起为书记,李铁林为委员,在文教界重新建立支部,李铁林为书记。郭海长1946年创办“中国时报”,任社长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与王振海、陈秀峰、鲁开泰接上关系,使开封工作进一步开展。1947年9月孟起调回解放区,次年5月,派戴德、王文勃进入开封。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我军撤离,戴德为书记,王文波、王振海为委员,开封遂于1948年10月解放。

水东地委和军分区派在开封工作的杨春美,在淮太西地区协助魏凤楼开展部队基层工作,争取团结西北军爱国军人,反蒋内战阴谋。另外,仍留于秀民及其他同志在开封活动。“孩子剧团”的几位家长表现很好,姓名记不清了。开封城工小组和农村党小组张本初为组长,次年10月建立党支部,张方明为书记。

地委于1946—1947年派李庆斋等六位同志进入开封,建立工作组,由王同印为组长,在龙亭区域活动。

还有总情报处,派鲁洁光等到开封工作,发展党员,建立组织,宣传我党政策,取得良好成绩。

商丘地处陇海路要冲,驻有日军重兵,加上伪顽,敌我力量悬殊,蒋汪合流反共,矛盾尖锐。水东根据地为坚持这块地区,准备战略反攻,加强敌伪工作,提到战略地位。我们派精干得力干部,打入敌人内部,采取隐蔽发展方针和单线联系。重点在伪四方面军开展军运工作。

①指定戴德同志配合淮太西敌工站长县委常委叶本瑞同志作魏凤楼部工作,由杨春美同志住魏部与我联系,动员刘学孔、李治清、刘尚文、理改善等同志协助魏整顿部队,改造成为灰色隐蔽武装力量。魏凤楼系中共特别党员,跟随冯玉祥先生从事西北军多

年,从卫士副官到团、师、军长,冯失败后,为国民政府中将咨议,受蒋排斥,道路坎坷。抗日初期为第一战区第一纵队司令。当鹿邑县长时,彭雪枫、张爱萍等领导同志对他进行启发,使之走上革命道路。一纵队失败后,弃军还乡赋闲,被日寇抄家。后,再次建军为淮太西绥靖公署司令,收编地方民团和黄泛区难民,发展到3个团,向张岚峰要了7000枝枪,共发展到有三、四千人。

②指派王飞霄同志协助杜新民在伪十八师开展军运工作。王飞霄和在该师的党员陈子良、卢谓、姜显和等同志建立了党支部,进行活动。杜新民于1940年到张部,先任教导团长,后任十八师师长。杜原为西北军人,具有军事知识和才能,为张岚峰信任。他在二十六路军受到革命影响,抗日初期,在二十六路军,受共产党嫌疑被捕。出狱后,委托刘鲁民同志,找党的关系,刘鲁民到新四军四师工作后,与杜新民接上关系,加强了十八师内部的起义准备工作。

③指派张敏同志负责与王继贤联系。王继贤先在西北军跟冯玉祥当随从副官,后到汾阳军官学校,第一大队任三中队分队长。1931年3月经张公干同志介绍加入共产党。他一贯表现对党老实,执行任务决定。大队长贾子义参加过党,听党的话。1941年经周总理同意来张岚峰部作争取工作,利用他与张岚峰旧西北军同事关系,又是在日本士官学校同学关系。约定在汾阳军官学校参加过党组织的同志,王继贤、郭永照、程培兆、邓连淮、金永康、邢宋汉等到张部,他们曾与张岚峰西北军校师生关系,为张岚峰信任,任用王继贤先为五十五团长,后升为五十五师副师长(实为师长)。张敏同志去商丘住在魏一博、田白健同志家,进行联络工作。

④指派王文勃、王治惠、王炳如同志分别作十七师工作。王翔九为师长,丁葆仁为旅长(后王、丁均我地下党员),马连淮为独立团副团长,程培兆同志掌握特务营,帮助进行基层工作。

⑤苗杰同志以军区办事处秘书身份,广泛开展商、柘、鹿一带

社会统战工作,配合水东地委和军分区对张部开展政治攻势,争取瓦解伪军。同时,由李铁林等同志,在商业中学进行革命活动,内外配合,取得良好的结果。

③徐州工作。我与侯方若同志取得联系,大力开展淮海省郝鹏举部工作。侯方若以扫荡报为阵地进行革命活动,与湖西地委和军分区联系,按照区党委和军区意图,由他抽调干部进入徐州,建立充实工委,加强领导。

二、豫鲁办事处的基本任务

根据党中央指示,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建设两大任务,准备担负起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提出开展全面对敌斗争,发展各种武装力量,为反攻作准备,对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具体要求:

1、派干部进入城市坚持长期埋伏,隐蔽发展,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组织群众,武装起义,配合我军里应外合占领城市。

2、加强对伪军工作,提到战略地位,削弱其斗志,争取伪军反正。

3、粉碎敌人交通封锁,压缩陇海敌占区范围,巩固重点交通联络网站,保证交通安全。

4、搜集敌人战略情报,掌握敌伪动态,配合根据地武装斗争和政治攻势。

三、1944年陇海线敌伪军国民党军队态势

1、日寇侵略军。新乡属华北派遣军,冈村宁次独立混成旅团,陇海线华中派遣军畑俊六,开封住铃木旅团,商丘住独立第十四骑兵旅团二个联队,徐州十七师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规军先后南调,日军所剩无几,防务由伪军接替。

2、正规伪军都是原国民党正规军队。汪伪政府一方面军总司

令庞炳勋(又号晋冀鲁豫剿共军),分驻豫北、晋东南 1 万多人,二方面军总司令孙良诚为开封绥靖公署主任,1 万余人分驻开封、濮阳一线,四方面军总司令张岚峰为新生反动武装,驻商丘、亳州一线,10 余县,约 5 万余人,五方面军总司令为淮海省长郝鹏举,1 万余人,驻徐州一带。加上各县伪警备队、游击队称 20 万之众。

3、日本特务机关。开封、商丘属华北系统,徐州属南京。蒋政府特务头子戴笠于 1943 年秋,派王兆槐到商丘签定协议,合流反共。1944 年 5 月,二十八军副军长到商丘密谈,敌伪顽三方商定,军事上互相配合。苏鲁豫皖军政委员会主任、战区司令官汤恩伯,与国民党游击武装及降军连通,共同对付新四军、八路军。

敌伪特点:日军兵力不足,不得不利用伪军守备,伪军在我军震慑下,处于守势,他们互相依靠,互为利用。由于日军太平洋战争失利,伪军看到前途危机,军心动摇。大股伪军多数为西北军旧部,过去曾受蒋政府排挤,对蒋不满,又对我党、政府存有疑虑,处于动摇状态。张岚峰曾交待,事秦乎事楚乎?我真是犹豫难决,为自己和本军的前途,就不能不作种种考虑。从表面上看,陇海线周围 20 万大军,在国内外反法西斯正义战争节节胜利情况下,敌人内心是空虚的。但是,反动势力灭亡之前,矛盾是尖锐的,斗争是艰苦复杂的。黎明前的黑暗是暂时的,我军民团结的优势,人心所向,是我们开展陇海线斗争的有利因素。

四、陇海前线工作付出的巨大代价和很大成绩。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李一非部长积极向总政治部建议,抽调一批精干干部,进入城市,打入伪军内部,各级党委建立敌工机构。这一建议,为区党委和军区领导重视,决定地、县区委都建立敌工部或城工部、敌工站等,对开展敌伪政治攻势提到工作日程。被抽调的干部,以党的利益为重,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只身打入敌人内部,孤军英勇奋战,不计较得失,不顾个人安危,为党的秘密工作而

贡献出一切。

他们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惨淡经营，依靠人民群众，宣传我党政策，瓦解伪军，争取伪军同情帮助。日军投降后，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在时局转变的重要关头，我党组织发动了伪张岚峰部三个师和一个营武装起义的光荣壮举，对开辟豫东、皖北起到重要作用。

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为加强河南省会开封的工作，在日寇投降前后，派李冠卿同志主持工作，1947年派孟起任书记，团结在汴地下党员王振海，刘洪等同志，向人民宣传我党政策，组织对敌斗争，提供战略情报，有力地配合了我军正面作战，粉碎了敌伪对根据地的扫荡。并动员大批知识分子到解放区学习，有的留下参加建设，有的回开封坚持工作，均取得很大成绩。

争取伪军方面是争取联络上层，为了掩护基层，团结爱国志士，孤立分化敌人，打击死心塌地的汉奸，我们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

通过豫北大商人石恩民与伪省长陈静斋联系，了解此人抗战前是日商买办。1938年豫北沦陷，先为安阳县维持会长，为日寇欣赏，当上河南省长，是依靠日寇升官发财的典型人物。他自己讲：当省长为了做买卖发财。日寇若失败就逃往日本，保财保命。我与其接谈，警告其少做坏事，保护人民利益，为自己留条出路。

姜达生同志，工作大胆泼辣，利用九名把兄弟关系，掌握敌特国特的动态，对分化瓦解军宪特伪组织，掩护我党工作，起到很大作用。城工部支援500元伪币为活动经费，买了个开封市警察署警法课长，利用合法身份，安排开封工委负责联络的王丹臣同志当卫生稽查员，把搞交通的郑文学安排当侦缉员，王保祺当保安课长（我地下党员），警察署四个课，我们掌握二个课，掩护我们的同志，出入开封，十分有利。日寇投降之时，组织地下军，姜达生为军长，

王保淇为副军长,范毅为参谋长,组织武装群众,配合我军第一次围攻开封。因我军转移,工作暴露,撤回解敌区。

张公干同志在西北军有很大影响,在党员中有很高的威信。日寇投降后,由大后方来到开封、商丘陇海前线,与冀鲁豫党组织取得联系,他四处奔波,联络原西北军从事秘密工作的党员同志和爱国人士,到刘汝明部,上层下层做了大量工作。向我军提供重要情报,在开封掩护我们工作。我们共同商讨对张岚峰部的争取工作。参与杜新民、王继贤同志率部起义事件。

1947年在鄆城率三五六团起义,均为刘邓大军渡黄河南下,作出重大贡献。

李冠卿同志被捕后,孟起同志为开封工委书记,恢复开封地下党组织与开封地下几处党支部接上关系,开封工作有了新的进展。1946年12月,豫皖苏区党委和军区成立,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在开封的工作关系,移交给豫皖苏区党委,并派刘鸿文同志来开封领导,争取瓦解国民党军队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配合我军自卫战争做出了贡献。

拆散敌伪叛顽 向我联合进攻的一例

张经五

1943年2月26日,伪二方面军在日寇掩护下侵占我东明、濮阳地区,到本年11月16日我军奇袭八公桥,歼灭伪二方面军总部,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一个转折,冀鲁豫边区的抗日战争由困难走上胜利。

伪二方面军,原为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的部队,号称5万人,实有不到3万人,由三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兼鲁西行政公署主任孙良诚统辖。在“曲线救国”的招牌下,1942年4月22日,孙良诚率部公开通电投降日寇。南京汉奸头子汪精卫将该部编为伪二方面军,委任孙良诚为总司令。由于日军兵力不足,1943年2月26日,由日军掩护孙良诚部由定陶、曹县一带向北进犯东明、濮阳地区,接替日军在这一地区的防务。濮阳是我边区的腹心地区,孙部人数众多,指挥统一,对边区威胁很大。当时整个边区日伪军据点已增加到上千个,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军队也有数万人,加上地方土匪、会道门的势力,边区被封锁分割,根据地变为游击区,游击区变为敌占区的情况非常严重。还有旱灾造成的困难,斗争非常艰苦。因此,1943年初,边区实行第三次精兵简政,许多党政军机关精简合并。但是,由于对伪二方面军的斗争取得了胜利,不仅消灭了他们的有生力量,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而且我们的根据地迅速扩大,濮、范、观中心区与二、四、五分区联成了一片,大大鼓舞了

边区军民的斗志和信心。

对伪二方面军斗争的胜利不是偶然的。是边区党委正确执行党的政策和策略的结果，是边区党政军民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各方面斗争的结果。1942年10月，中共北方局发出《对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工作的指示》，并决定黄敬同志任冀鲁豫区党委书记。统一了边区党政军民的思想，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针对边区敌、伪、叛、顽、匪、会门等敌情的复杂情况，区党委成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黄敬同志任书记，军区敌工部长李一非同志任副书记，由于伪二方面军是一股人数众多的由国民党蜕变过去的伪军部队，而今又侵占着边区的腹心地区，于是在1943年四五月间决定成立“冀鲁豫军区第二办事处”，专门对伪二方面军进行工作。四分区副政委张国华兼任办事处主任，副主任是毛定原同志。办事处机关常驻濮阳东南与濮县之间的王称固、杨集一带。伪二方面军，又是旧西北军，孙良诚曾是西北军的名将，当过山东省主席。于是我们搜罗了一些与伪二方面军（主要是过去与西北军时期）的人共过事或有过交往的人，打通联系，了解情况。采取派人打进去与外部配合的办法，把伪二方面军的动态、军事部署、工事构筑情况等掌握得一清二楚。同时，濮阳、昆吾、尚和等县积极开展斗争，县大队、区队、村的民兵模范班加强了对伪二方面军的围困，反对派粮、派款、拉兵。

这一期间，我们采取的一项重要行动，就是对伪二方面军直接进行谈判。过去我们对他们往往只知道打，特别是对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如石友三、高树勋和投降日寇以前的孙良诚等部，几次作战讨伐，争取瓦解工作很少。区党委认真贯彻北方局的指示，加强对敌、伪、叛、顽军事斗争的同时，加强政治斗争。我当时已由军区敌工部调到第二办事处工作。1943年六七月的一天，李一非同志领着我到了红庙（龙王庄、颜村铺？）区党委驻地黄敬同志那里，只有我们3个人，当时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黄敬同志穿着便衣，说

话既明确肯定，态度又随和，他对我说，现在就是要拆散敌、伪、叛、顽向我们的联合进攻，要派我去直接与孙良诚谈判，讲明大义，要他们不要再向我边区进攻。我听了之后，全身马上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压力，这是一项事关边区全局的任务，与孙良诚谈判，又打又拉，有利于各个击破敌人，是英明的斗争策略。到敌人心脏中去，情况复杂，自己能应付得了吗？同时也要冒着莫大的风险。但为党甘当一切的心情油然而生，我没有讲任何价钱，也没有提什么要求，就把任务接受了下来。

同孙良诚谈判，是一个名叫张履福的人从中牵的线。张履福是黄河南岸鄆城董口附近的张庄人，与我驻地只有黄河故道之隔。当时他已有五六十岁，身材清瘦，说起话来平缓而又连连不绝，在西北军中当过混成旅长，参加过北伐战争。他与孙良诚是旧交，对孙良诚以大哥相称。这次伪二方面军侵占濮阳地区以后，经常出入八公桥一带，是孙良诚的常客。他与我党政机关有联系，做为地方士绅名流，经常参加地方召开的会议。第二办事处成立，请他出来帮助工作，所以，他也常到第二办事处来，我也去过他家。现在要同孙良诚谈判，他就成了穿针引线的人。

为了进出敌占区，我化名张振武。托人办了一张通行敌占区的“良民证”，相片是在濮县县城拍照的，濮县当时是我根据地。这张相片我现在还保存着。我是八路军军人，这时换上了便衣大褂。张履福同伪二方面军联系，说是由伪三十八师师长孙玉田同我谈判。孙玉田是孙良诚的叔伯弟弟，又掌握着兵权，是孙良诚的亲信，由他当谈判代表，说明他们对谈判是重视的。我也去中共昆吾县委，同县委负责人史向光联系。昆吾当时是濮阳地区之一部的划县，是同伪二方面军斗争的前沿的一个地区。我一方面向史向光同志通报与伪二方面军的谈判问题，另一方面商谈我们如何进出敌占区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得到了史向光同志的完全赞同和热情支持，给了我很大鼓舞。

七八月间的一天，由张履福先生引路，我们向伪二方面军行进。在我方地区，有人护送，在前沿有民兵武装监视对方动态，所以没有盘查我们就过去了。进入伪二方面军防区，只见村寨深沟高垒，碉堡遍布，没有树木，很少见有行人，一片死气沉沉。我们走到路口，伪方派有一名副官来接我们。当天上午我们到了濮阳县城东南的徐镇。这是伪二方面军三十八师师部所在地。进入敌占区，我各方面都感到不一样。我想，这不是演戏，也不是在梦境，而是真的单身闯敌营了。

孙玉田接待我们。此人约40来岁，白净面皮，便装打扮，纺绸上衣，显得洒脱随便的样子。开始我有些拘谨，对他们的环境不适应。我努力控制自己，尽可能的表现稳重一些，很少说话。略事寒暄休息以后，便开始了对谈。我要说的话是已准备好的。我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你们又是老西北军，是冯玉祥将军的部下，应当发扬西北军的光荣传统，学习冯玉祥将军，不要为日本帝国主义卖命，日本人要你们进犯边区，吃亏的终归还是你们。

孙玉田为他们投降日寇辩解，说是为了等待时机，并用手画半个水平环型，说：你们看，在我们这儿能见到日本人吗！

显然是强词诡辩。他们同一切反动派一样，看上去好象有点气势，政治上却是一个穷光蛋。这时我的心情已安定下来，对谈判也摸到了一点门路。我说：日本人是靠不住的，苏德战场上，斯大林格勒一战，歼灭德军几十万，日本人在南洋也只有招架之力，这是你们也看得见的，他们的命运都不长了。

孙玉田回避这样的问题，无言以对。实际上正是触到了他们的痛处，他们也在想，抗战胜利后靠蒋介石又怎样？

在谈到实质问题时，孙玉田说如果他们不到濮阳地区来没有别的办法，今后不再进攻边区，但粮秣、兵员有困难。意思是说不放弃进攻边区的打算。

我说，怎么能向艰苦抗战的边区要兵要粮呢，是帮日本人的

忙，边区老百姓是不会允许的。

他们自己也明白，没有日军的配合掩护，伪二方面军无力对我进行大的军事行动，他们早已是我们的败兵。他们与日寇有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对蒋介石也非常仇恨。蒋介石和日寇都把他们在对付八路军的第一线上，最害怕我们消灭他们。现在谈判，我们有理有节，在这些复杂的背景条件下，我耐心磋商，孙玉田终于明白表示不再进攻边区，双方商定以现有防地为界，互不侵犯。因为是口头协定，又有张履福先生做中间人，我们没有再谈各在对方派驻联络员等问题，就算达成了协议。

吃饭时，孙玉田以盛筵招待我们，把当时比较难于搞到的涮羊肉、对虾、鲜蟹等摆在筵席上。这时我的心情虽然缓和了一些，还要看孙玉田的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席间，孙玉田提出他们马匹困难，希望我们给他们一些马。提出这个要求，口气和解，不像要胁，也不像要对我进行加害，或者把我做人质扣留起来。我说，你们的意见我回去向领导上汇报，你们以什么为交换呢？孙说，你们（指我方）无线电器材短缺，我们（指孙方）给你们收发报机。我们没有停留，当天又回到我方驻地。随后我去军区向李一非同志做了汇报。过了两天，李一非同志告诉我说，谈判的目的达到了（指“君子协定”互不侵犯），领导上同意给马换取他们的无线电器材，并说这件事仍要我办。接着我就在军区办调马的事情。几天之后马调齐了，一共调了15匹马，都是由骑兵团和军区直属单位调来的。我又和昆吾县委史向光同志商量送马的方法。这件事不能声张，虽然青纱帐已经起来，如果白天有这么多马通过，必然造成很大风声。确定黎明前通过伪我接合地区。通知沿途的地方武装，包括村的民兵模范班，要掩护，要监视对方动态，不能打枪，不能拦截。又告诉孙玉田我们送马的日期和时间，要他们的哨兵不要打枪，并做好接收马匹的准备。

一天夜里，我带着送马的干部和战士，牵上马按照规定的路

线,悄悄地朝前行进。我们不经过村庄,免得引起狗叫人惊。没有月光,马也不鸣,大地一片寂静。阵阵凉风吹来,高粱、谷子簌簌作响,阵阵清馨,吹得人们毫无睡意。马虽只有十几匹,但也成群结队,昂头扬蹄,黑影中煞是好看。将要黎明的时候,我们到达徐镇附近的一个村寨,是伪三十八师的前沿防地。他们的接马人员早已等候在这里。我们把马交给他们,他们把三部无线电收发报机交给我们。我们当即转回我方地区,接着把收发报机交给了军区。谈判任务,也就是后来人们传说的“君子协定”圆满地完成了。

与伪二方面军进行谈判,事实证明上级的指示和果断措施是正确的。就我所知,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在伪我交接地区,一般是比较安定的。伪二方面军对我没有大的进犯,我军主力只有一小部监视伪二方面军,其大部可以比较机动的对付其他方面的敌人。同时,我抓紧有利时机,进行其内部工作,交朋友,搞情报,绘制地图,甚至掩护我地方武装。9月下旬和10月上旬期间,日寇对边区进行秋季大“扫荡”,要孙良诚部配合。这时,我们打击伪二方面军的条件已经成熟了。敌人“扫荡”被粉碎以后,军区召开了作战会议,确定了袭击八公桥伪总部的“掏心战术”。11月16日,我军出其不意袭击八公桥,一举歼灭伪二方面军总部,毙伤数百人,生俘伪总部参谋长甄纪印以下3200多人,缴获战马300余匹及其他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收复大片土地,边区被封锁被分割状况有了很大改变。冀鲁豫边区抗日战争渡过难关,打开了胜利的的新局面。

可歌可颂的南线交通

冯占林

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对我各个根据地实行强化治安的政策。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沟通和维护冀鲁豫抗日根据地通往太行山和延安地下交通线的畅通,保障我党政军干部往来的安全和中央、北方局文件的及时传递,当时在冀鲁豫地区先后建立了四条交通线路通往太行山老根据地;第一条线是由大名、成安、磁县到太行山;第二条线是由内黄县的井店镇、楚王、固县镇到太行山;第三条线是由内黄县的井店镇、玉龙、汤阴,淤泥罐到太行山老根据地。这三条地下交通线建立得较早,是由马赛负责的。但,这三条交通线经常因日伪军的强化封锁而受阻,使我党地下交通不能正常进行。

1943年的初春,冀鲁豫区党委派王东亮到四地委所辖区建立了通往太行山老根据地的第四条交通线。这条交通线是最南边的一条,又称卫南交通干线。这条交通线是在冀鲁豫四军分区办事处的领导下进行工作的。为了保障这一工作顺利进行,军分区办事处相应建立了交通线,王东亮任股长。交通线是由当时的卫南县(现滑县的孟庄)为依托经过杨兆村、延津县四区原屯、尚小集、浚县的灰岩军营村、下马营、牛场、大小双庄等,到太行山的塔岗口进入太行五军分区所在地塔岗镇。这条交通线上的工作人员,当时除王东亮外,其余10人均是当地人,四县边工委李先贤帮助选配来的,记得有孔庆堂、张智松、牛才、王洪宪、吉清明、张华、赵勤、孔宪德、赵玉山等。这些同志对这一带的地理、人事均较熟悉,利用这些当地人的有利条件,这条线很快地建立起来了。开展工作以来,很好的

完成了通信和护送干部往来的任务。

当时,形势发展得很快,交通工作的任务不断加重。以冀鲁豫军区政委苏振华为首,建立了平原分局党校,并率领整风干部到太行山区,这样,往来也就更加频繁了。

原王东亮领导的和以李先贤的社会关系为主体的交通人员就不能适应这样繁重的任务。由于这个交通股是属于冀鲁豫第四军分区办事处(实际是情报处)的下设机构,为了加强该交通股的力量,而我是属于部队干部,即第四军分区情报处的人员,因此就相继派遣我和刘振华、郑国华、郝怀俊、祁存义、王培成、李子久等同志来充实这条交通线的外围力量。并指派我任副股长直接掌握外线(即敌占区)的全面工作。我们这条交通线初具规模,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王东亮调回了冀鲁豫区党委。这样,分区办事处就指定我为股长。路线上的来往交通工作就由我领导。除了工作的艰难外,更困难的是交通人员每月只有一元钱的鞋袜费和菜金,没有其他待遇,交通股也没有活动经费,就连来往过交通线的干部的吃、喝、用都要由我们交通股负责筹备。在根据地两边的交通站的供给还有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支援;而在敌占区的中转站供给就困难得多了。特别还有不少重要首长和一些身体有病的同志过交通线,生活上还得略有改善。在四分区办事处的正确指导和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下,这些困难得到了适当解决,圆满的完成了任务。这条交通线路一直使用到抗战胜利,受到过表扬。

这条交通线由东向西到太行山区根据地,路线总长共百十余公里,再加上由冀鲁豫区设立交通站到太行山的塔岗口交通站约100余公里之长,与当时的平汉铁路成天然屏障。卫河两岸和这段铁路沿线日伪军还设有流动哨所和碉堡,每年初夏时期,在我交通线的中心区大约20华里方圆的自然水灾区,这时候我们的交通人员和过这条交通线的干部还要趟水数十里,才能到达卫河和铁路的封锁线。由于这条交通线在敌占区的面积较大,必须及时掌握敌

占区的情况变化。有时为抓紧有利时机尽快通过敌人封锁线,需要把过路干部化装成伪军人员,把女同志化装成伪军官太太。在白天走过较长一段敌占区的路程,特别是在淇县地段的自然水灾区,纵然是夜晚也是不易通过的。敌人经常在白天趟水过水灾区,夜晚再过铁路封锁线。如果我们一个夜晚过不了敌人的封锁线,就必须在敌占区住上一个夜晚或是一个白天。有时候卫河和铁路封锁严密,不得不多住几天。我们这条交通线上除在冀鲁豫地区和太行山的塔岗口有交通站外,还在敌占区设立中转站。

中转站是1943年6月份建立的,为了地下交通线畅通和安全,分区办事处指示:利用伪新六军独立第四旅王国藩的关系,建立中转站,地点设立在军营村的阎度和家里,公开名称是独四旅的兵站工作人员。在王国藩伪部,与我们有联系的有王国藩的本家侄子王培成和王国藩伪军中的一个连长李子久,及我们派去王国藩部工作的交通——祁存义,还有房东阎度和等人员,我们的组织与工作筹备齐全后,我们交通线上的这个中转站建立起来了,对外是伪旅长王国藩部独四旅的兵站。我们的交通人员全部化装成伪军并带有武器,因公开身份是兵站工作人员,有时也以伪军的名义在周围村庄征集一些粮食作为我们这个中转站食用。把中转站建立在军营村,是由于我们找到的阎度和忠实可靠。这个村庄又是浚县和淇县的结合部,往来方便。特别是每年麦收之后,卫河水泛滥成自然的水灾区。这时候住扎在浚、淇两县的日伪军从这里撤出。我们趁此护送过往这条交通线的干部也就更为安全。因我公开身份是伪军兵站的工作人员,并身着伪军服装还带有武器,当地群众不敢多问。由于我们在这个村庄住扎,少数的伪乡政人员不敢在该村胡闹,这也起了保护该村群众的作用。再加上我们和本村群众和睦相处,开展一些群众工作,当地群众也保护了我们。所以有时来往过路干部多达十几名,要在军营村兵站食宿也能妥善解决。

后来由于交通线上过往干部络绎不绝,交通人员送往迎来任

务非常繁重,交通股包括股长在内共有工作人员 10 余名,在长达百余公里的交通线上来往不断,没有轮换休息的时间,少数的交通员因而劳累成疾。如刘振华是 1938 年的老干部,当时护送徐向前将军,执行带路的任务,爬山涉水辗转 20 余日,一直护送徐向前将军到达目的地,返回冀鲁豫区后就病倒了。当时虽不能执行护送任务,但带病还得在交通站负责来往干部们的接待工作。又如王培成、李子久俩同志,他们是从王国藩伪部争取过来的同志,当时都很年轻,他们除在中转站服务外,还指挥伪军来掩护我们的干部过卫河和过铁路封锁线等工作。有时,他们两人轮换在伪军部队值班。当其他交通员忙不过来时,他们也得往返几十公里,到中转站亲自带领通过封锁线的干部去太行山根据地。有一次,王宏坤的爱人过这条封锁线去太行。她一看是“伪军”护送,觉得布置周到,比较安全。故她提出有事要到汲县城里去一趟再走,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交通人员满足了她的要求。由王东亮筹建的另一条交通线用的交通人员是吴方森等,从这条秘密交通线建立后使用的次数很少,一般不走这条线,但他们利用乡土关系建立的往返线路作为副线在使用。吉庆福的家就住在卫河口南岸上下马营,掌握渡口情况比较及时。有时来往干部较多,也有从这里通过卫河的。孔庆堂家住在铁路西边,由他家配合护送一些干部,虽然他在敌占区没有合法的身份,但仍能克服许多困难,随机应变完成任务。有时渡口有船,就用船过河,没有船时就用筐萝飘在水上,两头拴上绳子,用绳子来回拉过河去。或者先派一个人浮水过河,又将要护送的人员和文件放在筐萝内,再由别的交通员凫水推着过河。这些交通员都穿便衣,以当地群众面目出现的,熟悉地理和人情,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1943 年初,我们这条地下交通线建立后,护送往来于平汉铁路西边解放区的干部的任务很大,经过这条交通线的干部有首长和一些女同志,并有不少同志年老体弱,有的还带病,而大多数还是身强力壮的干部。因此,我们得准备车马和担架。如杨得志和黄

敬去延安时，特别是黄敬，过这条交通线时，不但不能走路和骑马，就是躺在担架上还得有专人看护。由于我们是秘密交通线，抬担架的人不能雇佣民工，全部都是我们的交通员和干部承担的。还有鲁西区一个商业局长是个女同志，又是小脚妇女。跨过这条封锁线时，正处在水灾区泛水时期，这位女局长走不动了，只好由我们的交通员相互帮助将她背着趟水十余里到达安全区。有时，有些高级干部跨过这条交通线时，我们的交通员同时也担负着侦察员的重任，先把敌情摸准，再由太行山区和冀鲁豫区派武装部队迎送。如1944年秋罗荣桓，滕代远等20几位领导同志从延安经过太行到冀鲁豫区，都是从这条交通线护送过去的。领导同志的文件和随行物品都是我们交通员挑过来的。当时，我们的交通员有营级干部、连级干部。交通员虽然担负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心为革命，仍是心甘情愿的。

还有华中、华东、冀南和冀鲁豫区去太行山学习和工作的同志，也有是从太行山返回冀南等区域的。护送县以上领导干部共计有2000余人次，这么多的领导同志途经这条交通线路，绝大多数同志都能遵守交通线上的纪律，按交通人员带领的路线顺利通过，但也有极个别的，在交通员带领的行进路线上，不听交通人员的安排，就会发生意外。如冀南五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在出发前交通员祁存义就告诉他：“这是白天通过敌区，如果路上遇到伪军时由我们去应付，你不要说话，更要沉着。后边还有我们股长冯占林作掩护。”但这位副专员在通过第一个伪四十军驻防的李源屯据点附近时，正好有伪四十军李团长所部到庞岩村催粮，我们的交通员上前与之接头并进行了交涉，本可安全通过，可是这位副专员认为情况不妙，拔腿就跑，伪军看见有人逃跑，立即派兵追赶。结果这位副专员被抓住送到李源屯伪四十军李团长的据点内，押送到了团部。这是我们这条交通线唯一发生的意外事故。一位副专员让敌人抓走了，特别这次还是由我亲自护送，不好向组织交待。当天夜里即派

交通员向冀鲁豫四分区办事处汇报。第二天一早,我又亲自进了伪四十军李源屯据点打听这位副专员的下落。幸亏这位伪军的李团长尚有民族观念,想留后路,不愿意和真正抗日的共产党人对立,同时在谈话中,李团长得知副专员还是同乡,都是河北省衡水地区人,就释放了他,还派兵把他护送到我们的中转站。这样一来,把我们辛苦近两年时间建立起来未出过任何问题的交通线,完全暴露给敌人了,不能再用了。幸好形势发展很快,根据地不断的扩大。不久伪四十军李源屯据点也站不住了,撤回到了安阳。我们的这条交通线继续使用,至日本投降再也没有出其它问题。

回忆卫西工委及四县工委的对敌斗争

李先贤

一、中共卫西工委的成立和演变

1940年的10月,我们从濮阳回到地委之后,当时,地委把我和赵良珍、肖国贤同志派往敌占区工作,确定成立卫西工委,我任书记,赵良珍同志任组织委员,肖国贤同志任宣传委员,但肖因病未到职,只有我和赵良珍同志去卫西敌占区了,赵良珍同志在淇县李希文家里住到1940年底,他回地委汇报工作,以后不再来了,只剩我一个人。1941年春天,我回地委汇报工作,紫阳同志不在机关,地委宣传部长魏晓云同志告诉我说:赵良珍要求坚决不去卫西了,勉强叫他去,万一出了问题不好,地委只好又把他调到濮阳了,以后有合适的再给你配吧。

直到秋天,地委将宣传部石侠风同志调到卫西,后又调来孔森同志,我们三人组成了卫西工委。当时孔森同志任书记,我任组织委员,石侠风同志任宣传委员。我们在浚县的尖山玉皇顶开了一次工委,汇报了卫西情况,研究了卫西的工作。

没有多久,到1942年初,孔森同志回地委汇报时失踪了。他家是濮县人,后来才听说他探亲时被敌杀害。

1942年5月地委又把组织部的朱天德同志调来,重新组成卫西工委,由石侠风任书记、朱天德同志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

同年又调来艾林青同志参加工委任青年委员,后来军区敌工部派来宋再明同志打入“天门会”任参议,参加工委为委员。

当时工委会分析研究了卫西的斗争形势和周围的工作环境，认为环境虽然复杂，敌占区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愿当亡国奴的，就是皇协军和日本人也有矛盾，其中很多人是为了生活所迫而干敌伪事情的。利用民族矛盾，仍然可以开展工作，要广泛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国民党“曲线救国”的反动本质，争取团结各阶层人士，尤其知识分子，和我们共同抗日。工委会根据上级党委会指示精神研究决定当时四项主要任务：

(一)发展地下党组织；(二)成立地下军(主要争取和掌握天门会的灰色武装)；(三)维护冀鲁豫平原地区与太行山的交通联系；(四)搜集敌人情报，建立情报网。

工委成员的分工是：石侠风同志负责领导全面工作，朱天德同志负责汤浚边区的工作，我分管浚县西南乡、淇县、汲县和延津地区的工作。

卫西工委会工作和活动范围，当时所谓卫西是指卫河以西地区。地委活动在濮阳以西、内黄县以南、浚县以东、滑县以北的上堤沙区，卫河以西是敌占区。卫西工委会活动范围是汤阴县、淇县、汲县的东半部，即平汉铁路以东，浚县、滑县和延津县的结合部，实际工作地区不单纯是卫河以西地区了。

二、对敌斗争形势变化和中共四县边区工委会的诞生

我到达敌占区，虽然第一步在敌占区站住了脚，工作开始开展，但环境十分复杂。1940年到1942年，我们所活动的几个县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太行山与冀鲁豫两大战略区的咽喉。因此，敌人对这一地区统治较严，敌我友三方面都加强对这一地区的工作，国民党在这个地区有相当的基础。日寇由于侵华兵力不足，则用“以华制华，以战养战”的办法，利用伪军、伪会团、土匪武装统治这一地区。例如：汤阴县城以东地区除天门会武装外，还有土匪武装。郭育、韩老俊、汪怀密等土匪到处杀人截货，拦路抢劫，经商如不贿

赂难以通过，形成各霸一方；淇县除伪警备大队（大队长薄采云）外，就是有名的土匪头子朱继春、刘玉春、高荣卿、高荣派、老大王、张平（字治邦）等土匪武装。日寇占领县城以后，他们摇身一变，美其名曰：日寇统治下的保险自卫团，朱继春、刘玉春等组成铁路以西保险自卫团，张平等为铁路以东保险自卫团团。保什么险呢？保证不在他们所统治的地区对老百姓绑票（把人绑架走花钱赎回的意思），实际成了日寇统治下的官土匪，公开向老百姓派粮派款，敲诈勒索，日寇利用这些武装镇压统治人民。又如：浚县城里只住几十名日本兵，二、三百名伪警备队。广大乡村是利用伪会团武装统治，城西、城北和东北是天门会的势力范围。日寇驻浚县的水顾问和伪县长潘景阳，与天门会总会长杨贯一称兄道弟；城东是以孙步月、赵福九为首的红枪会势力范围；城南小河集一带是大仙会王钦甫的势力范围；新镇、淇门镇一带是伪区长牛英德的势力范围；巨桥集一带是土匪头子扈全禄的势力范围，买卖客商经过一地都得送礼行贿，方能通过，形成各霸一方的局面。再如：延津县敌人利用封建地主武装来维持他们的所谓“治安”，实际是统治人民群众，全县成立了四个民众自卫团，总团长贾子和，以王堤胙城为中心，这是贾团的势力范围；通村周围以张力享为团长；大吴村周围以周道明为团长；小店周围以李锡三为团长。这些封建地主武装，代替了日伪军。靠近延津东北部的滑县牛屯集是自卫团长李荣卿、外号李小孩的势力范围。沙店集驻有伪军二十三师，师长董风海。堤南驻伪军一个团，团长杨清川，还驻有滑县伪保安团刘华州的第三大队苗青华部。

汲县是新乡的外围据点，平汉铁路以西是封锁沟，北有卫河，驻有日军和伪军。总之，从豫北上述几个县的情况看，正是日寇“以华制华”政策的具体实施。日寇对平汉沿线的统治较严，除驻有日军外，还有宪兵和特务武装。新乡驻有华北派遣军刚田竹支队一四八一部队，这些特务武装有时还到各县去，如曾派到淇县一个班，

住城内西街鲁班庙内，当时日寇驻一个中队，大尉队长叫“小山田”，住在阁北街路东（称日本司令部），当时新民会顾问黑田、伪县政府顾问后腾、伪县长关巨珍。新乡日寇还驻有特务机关，特务机关长山川一成和豫北佛教总会会长安部忠夫都是搞特务工作的。淇县设有特务股，负责人苗文田、何占勋、李爱民，经常下乡敲诈勒索人民群众，敲诈的名目繁多，而且出奇。例如，他说你家有棵“摇钱树”，如交不出来就得请人说情花钱方能了结。另到一家说你有个“聚宝盆”，同样得请人说情谈交易，答应给他多少麦或钞票才算了事，诸如此类举不胜举。

国民党和它的顽杂部队力量很大，林县以南辉县一带驻有正规部队四十军庞炳勋部和孙殿英的新五军。浚县国民党的县党部和县政府都设在太行山，介熙之、王协和、陈克诚、王国藩等掌握党政和武装大权。淇县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张景元，顽县长李延（淇县大李庄人），也驻在太行山，其特务长申长山经常下山到铁路以东敲诈勒索民财。浚县县党部书记王振延、顽县长盛朝汉，经常在本县活动，王振延派县党部的负责人齐跃先、朱茅廷常住天门会内部，并让党部办事人员李善初也在天门会内活动。除企图掌握天门会武装外，还利用天门会掩护国民党活动。王振延和牛英德、王钦甫、孙步月等伪会团组织的负责人来往密切。国民党的中统特务机关——“华北调查统计局”（主任孔繁露）就住在浚县的交卸村，伪区长牛英德派伪军一个连（连长李光宇）专门保护。国民党的专员公署专员杜淑也在这几个县公开活动，打着中央军招牌的顽杂司令多似牛毛。浚县的大土匪头子扈全禄号称司令，常派其暗杀团长宋佩到县城以西地区派粮派款进行敲诈勒索，稍有违抗即遭暗杀。扈全禄在浚县抓到一名群众，说他给八路军送信，用刀在他脸上刺刻“八路”二字，真是残忍之极！1948年在浚县的赵岗村，被扈全禄一次用铡刀铡死30多名群众。八支队司令王森，1943年在延津县王堤一带对人民群众进行大烧杀，烧毁很多民房。十八支队司令阎

希梦，他的士兵劫路竟劫着阎司令本人（士兵不认识阎希梦）。人民群众对十八支队编一首歌谣是：“十八支队，吃饱就睡，驻到哪村，翻箱倒柜”。这个形容一点也不过分。他们活埋抗日群众，杀害进步人士。如浚县淇门镇的王明宇同志就是被暗杀的。类似这样的土匪司令很多，如李旭东、李效忠、王振远、“老白头”，什么叶司令、王司令等等，就象顽专员杜淑，带着武装不打日本，到处搜刮民财，每天在大烟灯下生活。他的部下说：杜专员好吸“黑驴打滚”（即烧大烟时把大烟外边滚上一层海洛因，土话白面）。吸的都是人民的血汗。

敌占区人民遭受着日寇和汉奸走狗的勒索迫害，多么盼望着中央军来了打跑日寇过太平日子啊，实际事与愿违。因此，在敌占区人民到处传着这样的顺口溜：“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称中央军为“遭殃军”，国民党为“刮民党”。代表着大地主、大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大唱“曲线救国”的论调，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实行“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在这种反动方针的影响下，1943年1月，日寇扫荡太行山区时，国民党的正规军四十军军长庞炳勋、新五军军长孙殿英率部公开投降日寇，由中央军变成了皇协军。从1940年到1943年，不到3年的时间里，国民党的所谓正规军中，叛国投敌的中央委员达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万人，占伪军总数的一半以上。

庞炳勋投敌后当了日伪华北剿共总司令。孙殿英被任命为副司令。由于庞、孙公开投敌，在豫北活动的打着国民党、中央军招牌的顽杂部队，也都纷纷公开投降敌人，伪华北剿共总司令部任命杜淑（原国民党的专员）为伪六军军长，李旭东任副军长，收编许多股投降日本的顽杂部队、顽政府、特务。任命扈全禄为第三旅旅长，王凌阁为第三旅参谋主任；任命王国藩为第四旅旅长，苗兴之为副旅长，下辖两个团一个特务营，一团团长申泽远，二团团团长牛德超，特务营营长高恒久，副营长孙国安；任命李效忠为第五旅旅长，任命

兰灿然为第六旅旅长，任命王协和为第七旅旅长；任命何甫为特务团团团长；任命牛英德为保安联队司令，裴子祥为副司令，刘洁平为参谋长。国民党淇县县长李延和中统特务宋希儒带领县政府全班人马投降日寇，成立太行东区剿匪第四支队，李延任支队司令驻在淇县，下辖3个大队，第三大队是国民党县党部派王重宇组成，驻在城西大马庄，后被我淇县区委会配合太行部队将其消灭。其中统分子宋希儒在开封解放后，由冀鲁豫区党委社会部豫北办事处布置侦察，在郑州捕获，交淇县处理。

伪六军组成后，倾巢而出，向我四分区大举进犯，于1943年夏天窜犯到我卫南县（滑县南部），军部驻大樊庄，扈全禄旅驻孟庄，王国藩旅驻瓦岗寨，特务团驻马赵庄，李效忠、兰灿然旅驻耿庄、袁庄、焦虎等村，牛英德保安联队驻周道村，使当时的卫南县多半沦为敌占区。针对上述情况，我军分区司令部组织了讨伐伪六军的战役，经过焦虎战斗，耿庄、袁庄战斗，给李旭东、李效忠的部队很大打击，俘虏敌人3000余名，缴获机枪30余挺、步枪3000余支。瓦岗战斗歼灭了王国藩旅，俘虏副旅长苗兴之、团长申泽远等官兵2000余名，缴获机枪、步枪2000余支。孟庄战斗除扈全禄带十几人逃跑外，其余全部消灭。瓦岗寨战斗后，我军分区司令部在滑县高平集召开了讨伐杜淑、李旭东誓师大会，随后就对伪六军军部发起进攻，歼灭敌人一部分后，杜淑、李旭东率残部溃逃到浚县的淇门镇，我分区部队追击到寇庄、罗滩，西到延津的班枣村一带。

我从1943年春就主要是做对敌人的情况搜集和敌伪军工作，一直为我军分区司令部消灭伪六军而奔走在伪军内部。由于斗争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军区部队打退了伪军的进攻，取得了讨伐伪六军战役的胜利，解放了卫南县、延津县、浚县等大片土地，把延、浚、汲、淇四县边区，由敌占区变为我游击区，并和卫南县的游击区联成一片，当时的地委书记张国华同志提出把卫西工委会分为两个工委会。1943年夏天，经地委决定我工作的地区成立中共

延浚汲淇四县边区工委会(对外叫八路军工作团),由我任工委书记,刘耕夫同志为委员,当时马上配备了干部,由新四路政委王伟同志参加工委会委员,四县边区政权建立后,地委调张经同志任四县边区办事处副主任,参加工委为委员,,从此以后王伟同志不再参加工委会了。

根据地委决定,我和石侠风同志商量,以浚县铜山为界,铜山以北归卫西工委会,铜山以南、淇县、汲县、延津地区归四县边区工委会,从此,四县边区工委会诞生了,1945年5月地委调范泽同志到四县边工委会任组织部长兼抗联主任。

三、争取伪军伪会团工作和情报工作

从卫西工委会成立到四县工委会结束,大约5年时间,我们在上级党委的正确领导下,5年来,我们所处的工作环境相当复杂,大体分为两个阶段:从1940年10月到1943年前半年,这一阶段,主要是在敌占区工作,对敌人进行政治的、非法的、隐蔽的斗争,从1943年后半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前,为第二阶段,我们工作的地区发生了很大变化,即一部分地区(四县边区)由敌占区变为游击区,我们对敌斗争,既有隐蔽的、非法的斗争(未解放的地区),又有公开的、合法的政治和武装斗争。

古语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不管在敌占区工作和游击区工作,都需了解和掌握敌人情况,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从卫西工委会成立,我们就重视争取敌伪工作和伪会团工作,以及做好情报工作。五年来,我们作了哪些工作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天门会”的争取工作

“天门会”原是一个封建迷信会道门组织。据说,1927年左右由林县传入浚县三角村,其宗旨和口号是“抗匪保家”。20年代初豫北大灾荒,加之军阀混战,因而在地方上匪盗四起,民不聊生。1927年春三角村遭匪盗抢劫后,村众公议赴林县学“天门会”,并

推举该村杨贯一为传师。这是浚县“天门会”的起源。几年后,随着时局的变化,大概是在1932年,“天门会”就解体了。这是浚县“天门会”的前期阶段。其实何止“天门会”一家,如浚县以小河集为中心的“大仙会”,浚县城东的“红枪会”等,比比皆是。这些会道门都是在社会混乱局面下的产物。当时在兵荒马乱、盗匪蜂涌的情况下,封建地主和乡绅为保护其生命财产的安全,打着保家自卫,维持地方秩序的旗号,利用封建迷信活动而组成的有不少群众参加的会道门,便应运而生了。不过,后来属“天门会”发展的人数最多,势力最大,所控制的范围也最广,并且具有群众团体性质的色彩,日寇也惯于利用会道门来进行反共活动。如“一贯道”、“圣贤道”、“天仙妙道”等。“天仙妙道”在淇县城内公开成立,挂出牌子,组织武装,配合日寇到冀鲁豫边区进行扫荡,其头子冯树宽等被我打死(冯树宽是城南杨庄人)。

“七·七”事变后,日寇疯狂地向我华北地区进犯,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兵败如山倒的局面。国民军队,望风披靡,一溃千里,纷纷南逃。如当过河南省主席的刘峙号称飞将军,日退800里。1937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即南渡漳河,向我中原大举进犯。当时社会局面十分混乱,各地土匪乘机兴风作浪。哄抢掠夺,一日数村,致使人民群众东奔西逃,无以生计。如浚县的大土匪头子扈全禄,1938年春招兵买马,自称司令。此时“天门会”重整旗鼓,再度恢复并且发展得相当快,不仅在浚县、汤阴发展了许多村庄,并且也传到了滑县一部分村庄。“天门会”在土匪李台对汤阴到处抢劫时,曾组织会众打过李台。38年初,日寇进犯浚县时,“天门会”也曾组织会众进行抗击。这说明杨贯一是具有一定的爱国思想和民族气节的。这时的“天门会”是联庄社的性质。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天门会”的第二阶段。

由于“天门会”的发展较快,势力范围又大,因此引起了各方的注意。

日寇由于侵华兵力不足，企图利用“天门会”这股力量推行其“以华治华，以战养战”的政策。当时驻在浚县的日本顾问清水和伪县长潘景阳，对“天门会”会长杨贯一称兄道弟，百般拉拢，妄图通过“天门会”达到维护平汉铁路路线的安全和统治这一地区的目的。

国民党也企图利用和控制“天门会”这股势力。国民党浚县县党部在日寇占领县城时，随即搬到了乡村。不久，就很快地派县党部的两名委员齐耀先和朱茂亭钻进“天门会”里，还有个叫李善初的也是县党部的人，协助齐、朱办具体事情（齐是浚县西关人，朱是浚县城内南街人）。齐耀先担任过“天门会”参谋长的重要职务。另外，国民党员、伪镇长贾东园（浚县裴庄人）担任了“天门会”副会长的重要职务。国民党企图利用“天门会”的合法地位掩护他们的活动，并通过“天门会”向各村群众摊派粮款。

我党对“天门会”的争取工作是从1940年开始的。在此以前曾对“天门会”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了解，开始是浚县抗日政府县长孙自方（1940年5月，任华北抗日民军政治部政工科长）派我们的工作关系傅凌云（曾任抗日政府秘书）、常仙甫同志进行了解，接着是通过冀鲁豫军区敌工部和民军司令部派侯兆璞（王质夫）和胡紫青同志在浚县西北乡元厚村程润民同志家建立情报站，对“天门会”作进一步的调查了解。后来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又派黄友若同志到“天门会”地区去，李一非部长指示黄友若同志的任务是：了解该地区的敌伪及社会情况，同时看一看原有的关系（常仙甫、胡紫青、傅凌云）的情况。黄友若同志了解情况后，随即向李一非部长作了汇报。经李一非又向军区领导汇报后，决定利用“天门会”作掩护，在“天门会”地区开展秘密工作，并对“天门会”武装开展工作。军区政委崔田民同志指示黄友若同志在“天门会”地区开展工作的方针是：“长期隐蔽，秘密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并决定由黄友若同志去搞这项工作，同时决定胡紫青同志利用常仙甫与杨贯

一的关系进入“天门会”。当时,是以“浚、滑、汲、淇四县工作团”的名义进行工作的。黄友若同志任团长,胡紫青同志任副团长(任命书上盖有军区政治部主任唐亮的章)。工作人员有郑建国等同志,胡紫青同志打入“天门会”后,向杨贯一建议,对“天门会”进行了整顿,并且建立了系统组织和扩大了常备武装。当时命名为“浚滑汤天门会总办事处”。下设十二个分处和四个常备大队。杨贯一任会长,常仙甫任副会长。胡紫青任参谋长,傅凌云任秘书长,常啐然任驻浚办事处主任,李子明任驻滑办事处主任。以后陆续派入“天门会”不少党员干部,并且又在“天门会”发展一批新的革命力量。如宋再明、姜侠夫、田启明、李志儒、杨敬斋、孙自省、李文明、傅学恕、傅学冉、郭清治、常绍唐、胡寿乔、胡经武、张本生等。这样“天门会”就逐步为我们所掌握和控制了。一直到1945年8月在浚县屯子起义。这一阶段可以说是“天门会”的第三阶段。

我是从1941年春天和胡紫青同志接上关系的。通过胡紫青同志介绍认识了黄友若、刘哲民、郑建国、傅凌云等同志,又经胡介绍认识了杨贯一、常仙甫(胡的岳父)、程润民(胡的房东)、胡寿乔(胡的哥哥)、胡经武(胡的弟弟)、胡与三(胡的弟弟)、常啐然(胡的内兄)。此时,胡紫青同志担任“天门会”参谋长。“天门会”的工作主要由黄友若同志领导,我是地委派到这一地区进行发展地下党组织工作的。但通过各种关系,对“天门会”上层人员也作了些调查了解,为了争取杨贯一同情抗日救国,我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曾给杨贯一写过信。常仙甫同志原是我工作关系,1938年曾上太行山找过陈赓司令员,要求派部队到浚县开辟工作。傅凌云同志在学生时代,思想进步,曾以共产党嫌疑被开除,也是我原来的工作关系。胡紫青同志于1941年春经黄友若、刘哲民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当时有了这个工作基础来掩护,我们在卫西开展地下党的工作,是非常有利的。

1941年冬,黄友若同志调回军区工作,“天门会”的工作交卫

西工委领导。当时工委会由孔森同志接替黄友若同志的工作。从此,工委会研究决定,把成立地下军,掌握“天门会”灰色武装这个艰巨任务提到了重要议事日程上来。这一任务成为工委会四大重要任务的第二大任务(第一大任务是发展地下党组织;第三大任务是维护冀鲁豫平原地区与太行山、延安的交通联系;第四大任务是搜集情报,建立情报网)。我们根据地委和军区敌工部的指示精神,对天门会上层人物,如杨贯一,争取他依靠我们,对付敌人。凡有名有利、出头露面的事情,都让杨干;我们打入“天门会”的内部的同志,埋头工作,和杨贯一没有名利冲突。团结杨贯一工作的主要任务交给胡紫青同志来做,我们的工作重点放在掌握“天门会”的武装方面。工委争取直接掌握“天门会”的警卫大队(下辖两个营)。因此,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派中共党员工委委员宋再明同志(原任“天门会”参议员)亲自抓警卫大队的工作,并派姜侠夫同志、李子明同志到警卫大队工作;对四中队、五中队派党员干部打进去进行工作,并派胡寿乔同志任四中队长,胡经武同志任五中队长;还派李义同志打入十二中队任文书。经过艰苦细致的开展工作,逐步取得了领导权。

第二,工委会为了掌握“天门会”这个灰色武装,于1942年秋决定以“天门会”名义成立十八中队,派些党员骨干到十八中队工作,由工委会直接掌握。

第三,在“天门会”武装内部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以便加强对这股灰色武装的领导。

工委会对“天门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但当时情况相当复杂,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天门会”内部进行着激烈的三角斗争。日本鬼子妄图把“天门会”进一步伪化,把“天门会”武装改编为皇协——“兴亚义军”。曾把“天门会”武装调离浚县、汤阴地区开赴徐州,其名曰:参加检阅。后经胡紫青同志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又把武装拉了回来。

国民党对杨贯一也是百般拉拢,封官许愿,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真是什么卑鄙手段都使出来了。驻在太行山的国民党四十军、新五军也想把“天门会”纳入他们的领导之下。1942年春,国民党四十军曾多次派人鬼鬼祟祟到“天门会”来,商量要把师长委任状塞到杨贯一家里,妄图利用“天门会”来导演“曲线救国”的丑剧。我和胡紫青同志研究如何应付此事。最后让胡紫青同志以杨贯一的名义写了一封婉言拒绝的信。第二天以利害关系向杨贯一说明,杨同意这样办,把信由四十军来人带回。

那时“天门会”成了日伪和国民党互相争夺、互相利用、明斗暗合、同流合污的政治赌场。蒋帮日伪合流是一家,在“天门会”这个赌场上,真是活龙活现,毕露无遗。

浚县屯子镇是日伪区政府的所在地,也是“天门会”管辖的中心地区。国民党浚县县党部利用各种关系,把地主分子、国民党员、大汉奸周文谋运动成了日伪屯子区(伪五区)的区长,这对我们在“天门会”地区的工作威胁和危害很大,因为屯子地区是延安和太行解放区通往冀鲁豫沙区根据地的咽喉。因此,必须把这一地区牢牢控制和掌握到我们手里。经工委研究,由胡紫青同志和杨贯一商量,请杨贯一在日本人和伪县长潘景阳那里活动,结果撤掉了周文谋的伪区长。从而达到了我们的目的。经研究,决定派常啐然同志(常仙甫的儿子)出任这个伪区长(当时常不愿担汉奸名义,表示不干,后经胡紫青、宋再明、傅竣云等同志说服了常啐然同志),经杨贯一向日伪疏通,常啐然同志担任了伪五区区长。随后又派李子明同志出任了该区副区队长和郭耀斋同志任该区文书的职务。后来,根据工作需要同杨砚田同志(杨贯一的长子)接替常啐然同志任伪区长,这个斗争是胜利了。周文谋是个反共分子、汉奸、国民党员,不要小看当时换掉这个伪区长的斗争,这对我们开展那一地区的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中共卫西工委会在上级党委和军区敌工部的正确领导下,对

“天门会”的争取工作是成功的,并且在争取掌握“天门会”的过程中,很好地完成了上级交给的艰巨任务,其间建立了秘密交通线,掩护和护送了大批领导同志和革命同志安全通过“天门会”地区;建立情报网,搜集了大量的日伪情报;并且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由于“天门会”所处地理条件,所以不宜过早起义。上级领导权衡利弊,如过早起义对我们工作不利,只能起到拉出几百条枪的作用,对保持地下交通线是不利的,同时也会使地下党组织遭到损失。因此,上级党组织选择日寇投降之际,即1945年8月由军区政工部副部长王乐亭同志亲临敌区,召开会议,部署“天门会”起义,指挥“天门会”武装集合到屯子镇,召开大会,宣布起义。起义后,将起义武装改编为浚汤支队。任命杨贯一为浚县民主政府县长,胡紫青同志和宋再明同志任副支队长,王一明同志为支队副政委,乔瑞宜同志为支队参谋长。在集结“天门会”武装于屯子镇的过程中,除二处武装在李子彬、于成之、李清夫三名反动家伙带领其部下投靠国民党外,其余武装全部起义。后来,浚汤支队整编为军分区基干第三团。

(二)对浚县伪保安联队司令牛英德匪部的策反工作

牛英德是浚县新镇人,日寇侵略军占领浚县县城后当了汉奸,成为新镇区的伪区长,牛系国民党员,与县党部和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华北调查统计局关系极为密切。牛开始当伪区长时只有几十条枪,到1942年已发展到千余人,已成为浚县伪保安联队司令兼伪区长,其武装编为3个营,1个特务连。

驻在太行山的国民党四十军军长庞炳勋,为了掌握牛匪武装,曾于1941年到1942年两年派到牛部的军官达10名之多,上自副司令裴子祥,下至教官、连排长。

我们对牛部的策反工作是从1941年开始的,先派李翰轩、刘玉甫打入牛部。李翰轩任牛的连长,刘玉甫在李连当特务长(即事务长),又派罗燕堂打入牛部特务连跟连长李光宇当传令兵,这个

特务连常驻后交卸村专门保护华北调统局。李翰轩于1942年调牛司令部任参谋。

被派遣打入牛部工作的同志，甘当无名英雄，几年来，埋头工作，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华北调查统计局的负责人孔繁露等活动情况提供了有价值的情报；对国民党豫北专员公署和杜淑的情况提供了很重要的情报；对国民党浚县党部以及他们与敌伪如何勾结等情报。除此之外，还有配合我军事行动有力打击敌人方面作出了贡献，主要有以下三次：

第一，摆圈套伏击牛二阎王。

牛英德的二哥，依仗其弟的势力，也在伪保安联队混上一名营长，经常仗势欺人，到处敲诈勒索，当地人民群众对他敢怒而不敢言，真是恨之入骨，因此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牛二阎王。

1943年夏天，当我分区部队活动在延浚汲淇四县边的时候，群众纷纷控诉牛二阎王。我和李翰轩同志研究，如何铲除牛二阎王的问题，李汇报说：牛英德已去新乡与日寇联络，趁他不在部队，我明天派二阎王去侯屯催粮，说保长已将粮食准备好了，不敢送，怕八路军将粮食截走，故派你这个营押运粮食。让我部队埋伏在侯屯村，待牛二阎王进村后活捉。

我返回分区司令部（驻罗滩村）向赵东寰司令员汇报此情报和计划，赵司令员令新四路执行此任务，于明天拂晓到达侯屯封锁消息，部署伏击，规定等牛二阎王这个营全部进村后，再进行歼灭，活捉二阎王。牛二阎王对我伏兵毫无察觉，于第二天早上骑着马跟随部队进村了。这营伪军只进村三分之一，战斗就打响了，几十分钟全歼进村伪军一个连，其余未进入伏击圈的敌人，听到村内枪声，回头纷纷逃命溃不成军。

清查俘虏时，没有查到牛二阎王，就在村内进行搜索。伏击战前就给战士布置，说牛二阎王骑的什么颜色的马，脚穿白鞋。战士一面搜查，一面吵嚷说牛二阎王穿的白鞋，牛二阎王进村后一听枪

声，察觉中了埋伏，吓得顾不得指挥部队，下马就藏在柴草堆里，我战士搜查时说的话，牛听得清楚。我部队打扫战场后返回罗滩，牛二阎王狼狈逃回新镇，声言内部有共产党奸细，牛说：这次去侯屯，八路军怎样知道这样清楚？战斗中找着活捉二阎王，连我穿的白鞋他们都知道，没有奸细他们怎么知道？”

这次伏击战，因战士没有等到敌人全部进村，就和敌人打响了，因此，只歼敌一个连，没有达到全歼活捉牛二阎王之目的。

我立即通知李翰轩要提高警惕，沉着镇静，作好一切应变准备。

第二，夜袭中统特务机关。

1943年，国民党中央华北调查统计局，有20几部电台分散各地。伪匪牛英德为了保护中统特务机关，派一个连的兵力，驻浚县后交卸村李光禹家里。在反扫荡中我分区司令部到达延津县的班枣村，我将上述情况向分区首长汇报后，决定让新四路派三、四个连进行偷袭。为了捉到敌负责人，让我于10月28日先去交卸了解情况，如敌负责人在交卸村，我随部队前往夜袭，规定当天夜里部队在淇门西门外等我。

10月28日晚我到达交卸村，先找到靖润生同志，让他通知打入伪军李光禹连部的地下党员罗燕堂同志取得联系，核实情况后，我连夜返回淇门，随部队从淇门过河，直奔后交卸村，将李光禹家包围。因是敌占区，敌人门外不设岗哨，夜里在院内有值勤人员，我翻墙入院内，计划开门，因脚步声惊狗咬，被敌发现，我立即上房顶，我军冲入院后，消灭敌人一个连，查获一些重要情报资料，由分区敌工科长魏克仁同志带走。当时，由于搜查不细，敌方几个重要头目，均未捉到。

第三，关于牛英德匪部被歼经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冀鲁豫第四军分区张国华政委，让我随分区搞情报，办理日伪受降事宜。当时，我向驻在浚县之卫贤

集、新镇一带的牛英德匪部发信，限他 24 小时内缴械投降。此信让寇庄集寇献之送去。牛匪接信后，不仅不投降，随令其全部匪兵逃往淇县境内的西岗一带，企图逃避其覆灭之命运。

同时我让李翰轩同志给牛匪三营营长李玉秀去信，让他作好准备，在消灭牛匪时配合。旧历 8 月 14 日夜（阳历 9 月 20 日），我分区部队从曲律过河，当夜将牛匪包围于西岗，15 日拂晓，攻进西岗寨内。当时，我分区指挥部设在留店寺，天亮后，我随张国华政委、王晓参谋长到西岗寨内前线，谭贺庭、李翰轩同志也跟着去了。这时敌外围阵地已被摧垮，敌人被迫缩进大地主张老灿的楼院固守，我让李翰轩同志向敌人喊话（李曾在牛部任过参谋），让其缴械投降。喊话后，牛部三营营长李玉秀从墙洞钻了出来，我领他去见张国华政委，张政委说：“你是一喊话就过来的，快把你的部下全带过来，按起义对待。”张政委还让李玉秀向牛英德转告我分区司令部的命令，让他们赶快投降，放下武器，听候处理。这时为谈判受降，我方暂停攻击。李玉秀向牛匪转达了我分区司令部命令后，牛匪不但不放下武器，却趁我方中午暂停攻击之机，带着他的特务连企图突围逃跑。刚到村外，即被我骑兵冲散歼灭。牛匪本人潜藏在玉米地的绿豆秧下，待天黑后，只身逃往淇县城内。

由于牛匪拒不投降，我军又发起攻击，除李玉秀率领三营起义外，其余 100 多名官兵全部被歼灭。这次战斗活捉了牛部副司令裴子祥、参谋长刘洁平、国民党浚县县党部书记长王振延等。缴获了其全部武器弹药。

西岗战斗，是日本开始投降，而日伪军拒绝向我军投降而被歼灭的一仗，对敌人震动很大，这一仗又是我军在淇县境内消灭敌人最多的一次战斗，我军的纪律严明，威力之大，淇县人民是亲身体会、亲眼所见的。因此，这一仗对淇、浚两县人民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淇县县城以东地区解放了，划为卫滨县五区，李翰轩同志任区长、常文轩任副区长、李清泉同志任区委副书记。李玉秀起义后，其

部队编为五区区队。李翰轩同志兼区队长、李玉秀任副区队长。为继续和敌人作斗争，地下党组织和非党员工作人员仍未公开，到一九四七年解放后，由李清泉同志介绍给县委（县委指派公安局长王平山接收）。

（三）四县边区抗日游击大队的诞生和成长

沙店虽然是滑县的一个集镇，但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因为它是日伪修筑的公路交叉点，西通李源屯、汲县两个敌伪据点，东通马兰集、上官村和老岸一连串敌伪据点，南通牛市屯、封丘县城敌伪据点，北通道口镇、滑、浚两县城敌伪据点。因此，驻有伪军第二十三师董凤海部；另一股伪军杨青川的一个团驻沙店南边堤南；还驻有滑县伪保安团刘华洲部的第三大队（大队长苗清华、大队副刘尚德）。所以有这些敌人据点就形成了切断我延、浚、汲、淇县边区和军区联系的状况。因此，我们四地委和军分区司令部，为了扩大解放区，决定拔掉沙店的敌伪据点。1944年3月下旬，当时地委书记兼分区政委张国华同志对工委指示说：为了解放沙店，你们要利用伪军内部关系，除搞好情报工作外，要组织伪军反正，拉出来一部分武装，这样你们就有了自己领导的队伍了。工委会派刘耕夫同志执行这一任务。他带着侦察人员化装到沙店敌伪军据点内，并与伪保安团第三大队的大队副刘尚德和苗清华的三姨太太取上了联系（苗清华当时在滑县城内）。结果把敌的军事部署、地形、地物等绘制了草图送交分区司令部，于1944年3月30日拂晓，我军分区部队进攻沙店的战斗打响了。我军先从南、北两寨门突击，守备南、北两门附近的敌军肃清，攻入沙店寨内，把董凤海的骑兵和特务营都压缩在寨内西北角之高楼院内，经过两天的激烈战斗，眼看快要全歼这股敌人，但因伪六军和伪四十军的增援，未能全歼沙店之敌。董凤海率残部逃窜到汲县的李源屯，杨清川逃往滑县城。伪保安团第三大队在刘尚德率领下，于4月1日反正过来。此次战斗我军共俘虏伪军官兵500余人，缴获机枪10挺、

步枪 600 余支、战马 20 余匹、弹药一部分。这样，沙店周围的村庄就全部解放了，使卫南县和四县边区联成了一片。

刘尚德反正后 20 余天，苗清华也返回这个大队。我军分区司令部遂即对这股反正武装进行整编，命名为：延浚汲淇四县边区抗日游击大队，任命苗清华为大队长、刘尚德为大队副、刘耕夫同志为该大队副政委、由我兼政委。对反正过来的人员，如有不愿在部队干的发给路费令其回家。通过整编，这个大队原有人数 200 余人，令其回家一部分，其余的只编一个连，连长张中朝、会计冯子云、管后勤的叫邓天四。为了加强这个大队的战斗力量，我们把工委的警卫排和军分区的一个武工队，都编入这个大队，充实了骨干力量，在连队建立了党支部，派了指导员和文化教员。从此，这个大队在工委的领导下，战斗在四县边区，与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经历了无数的大小战斗，抗击着比我们力量强大数倍、甚至数十倍的敌人。这股武装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

日本投降以后，四县边抗日游击大队，升级为军分区的部队，不久即又升级到正规军，开赴山东参加解放战争，全国解放后又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四）对延津县民众自卫总团贾子和的争取工作

贾子和是延津县城北王堤人，是当地地主。但贾本人没有文化。1937 年“七·七”事变后，日寇侵略军向我华北地区大举进攻，蒋介石的军队纷纷南逃。1938 年春黄河以北地区沦于敌手，但日寇只占领了县城，广大农村已成为无政府状态，盗匪四起，到处抢劫，民不聊生，豫北各县地主豪绅打着保家自卫的旗帜，招兵买马，组织所谓民众自卫团或者会道门武装。延津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全县共组织了四个民众自卫团，张子亨、周道明、李锡山都各霸一方，成了自卫团的团长，贾子和在王堤、胙城一带的民众自卫团也相继成立，在日伪统治下贾子和成了全县自卫总团的总团长兼任胙城区的伪区长、苏子英为副团长，汪子成是贾团的参谋主任。

对贾子和的争取工作,开始是我四分区七县办事处副主任郭省吾同志利用关系派孙英同志以贩卖棉花为名打入贾团内部工作的。1943年夏我四军分区武装部队,粉碎伪六军的进攻,挺进到延浚汲淇四县边之后,为争取贾子和走上抗日道路,我和郭省吾同志亲自到贾团找贾子和进行说服教育工作,对贾进行了形势教育我党的政策教育,指出只有抗日才是唯一的出路,贾子和在党的教育下,从思想上逐渐靠近我们,但是争取贾子和走上抗日道路并非易事,是经过激烈地三角斗争的。

日本人对贾子和采取封官许愿、软硬兼施的两手,妄图利用贾子和的民众自卫团武装,来防止共产党八路军从县城北面突破防线,使自卫团为“皇军”效劳,以达“以华制华”之目的。

国民党反动派,对贾子和地方实力派,采取“双管齐下”办法,早已派人混入贾团内部企图篡夺领导权,对贾团上层由国民党顽县长左介甫亲自出马,带着延津县的教育局长徐钦成混入贾团,并把县城以北有名的地主豪绅孙敬轩、刘敬轩、张本轩、布嘉轩、岳亮轩等等塞进贾团,这些人成了贾子和的高级参谋,这些人能够参谋使贾子和抗日吗?不!他们宣传的是蒋介石的“曲线救国”滥调,救什么国?说穿了就是当汉奸反共。在国难当头之际,他们这些人不抗日钻到贾团内部吃喝嫖赌,花天酒地挥霍人民的血汗,这叫救国吗?真是不知羞耻二字!

国民党四十军为了拉住贾子和,还往只有两个连、一个加强排的贾团派了六名连、排级军官。企图从上到下篡夺领导权。但是国民党内部并不统一,他的杂牌司令外号“老白头”率领八支队也想吃掉贾团这股武装,软的不行来硬的。因此,造成八支队和贾团矛盾激化。从经济上派粮派款到政治上对贾子和欺压,使贾子和无路可走,因此,铤而走险,作出打魏邱的决策(八支队驻魏邱),当时我们劝告过贾子和,不让他主动进攻八支队,但贾听不进去。魏邱一仗贾团被八支队打得七零八落,遭到惨败。但贾子和还说:“总不能

拉倒”。后来变成群众的话柄：“贾子和打魏邱，总不能拉倒。”

国民党八支队对贾子和的家乡王堤一带进行了一场大烧杀和抢劫。特别是对贾子和家烧抢一空，这个反面教员教育了贾子和。

贾子和打魏邱的那天，我随新四路住在刘寨村，苏子英与汪子成带贾团残部百余名到了刘寨村，他们在打魏邱时与贾子和失掉联系，我和新四路政委王伟同志商量，在贾团困难时我们应加以帮助，即令供给处拨给他们粮柴，请他们做饭吃，等他们什么时候与贾子和取上联系，让他们返回。

1943年秋后，我军经常活动在贾子和所辖的地区班枣、王泗坡、水口、野厂、吉安、宋庄等村。一天夜间我带领办事处的同志和新四路到了野厂，村里的自卫团不让进村，我们应在寨外休息，同时向守护寨门的群众宣传，我们是共产党八路军来了，是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打日本的，是人民的子弟兵。经过宣传和交涉让我们进村了。我们所到之处，借物送还，损坏者赔偿，一切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去做，对群众秋毫无犯。这样走到哪村，哪村欢迎。秋天生了蝗虫，我们部队天天帮助群众打蚂蚱，这些村庄有很多人在贾团干事的，如苏班枣就是贾团副团长苏子英的家乡，我党政军的一切活动都对贾团有影响。

1944年4月1日滑县伪保安团第三大队大队长苗清华、大队副刘尚德在我四分区的武装部队拔掉沙店伪据点时率部队反正，编为延浚汲淇四县边抗日游击大队，苗清华仍任大队长，刘尚德任大队副。这对贾子和震动很大，我们抓住这些有利时机，对贾子和进行争取工作，使贾子和看到周围环境的变化，迫使他不得不早决断。他认识到投靠日本是没有出路的，血的教训使贾子和也认识到国民党决不能依靠。在这种形势下，经过我们的工作，特别是贾团部的苏子英、汪子成等人都为贾子和投靠共产党、八路军起了不少作用。尤其贾团的下级官兵绝大多数人倾向投靠八路军，里外结合，上下结合，促使贾子和下了决心，于1944年7月举行起义，公

开宣布投靠我们。

原在贾团的所谓高级参谋，国民党的顽县长、局长老爷们和那些土豪劣绅等等，听到贾子和宣布投靠共产党的消息，都灰溜溜地跑掉了，只好找他的日本主子去了。这些人今天是贾子和的高级参谋，明天就变成了贾团的敌人。对国民党四十军派来的所谓教官，也都被说服动员送走了。

我四分区司令员赵东寰同志对贾子和率领自卫团武装起义，在黄塔召开了欢迎庆祝大会，对起义的民众自卫团，命名为延津县抗日游击队，任命贾子和为总团长、李先贤兼任政委、苏子英为副团长、汪子成为参谋主任、高××、孙英同志为政治干事。

1944年秋末，我获悉投敌的李小孩（李荣卿），从汲县派一个营到牛市屯运粮食的情报。我们准备截击敌人，和分区骑兵团联系，请他们支援一连骑兵，我们到达延津县小庄、胙城进行截击敌人。刚起义不久的贾团参加了这次战斗。等到李小孩的一营人马从此通过时，截击战打响了，有我骑兵团的支援和军威，有贾团战士的英勇奋战，战斗迅速结束，全歼了敌人这个营；我四县边大队同时也全歼了李小孩的另一部分——教导队于小庄西地，这两次战斗共歼敌人四百余人，缴获敌人机枪10余挺，步枪300余支，弹药粮食一部分。

这次战斗的胜利大大鼓舞了贾团的士气，从此以后贾团和四县边大队并肩战斗在四县边区，经过无数次的大小战斗，使贾团得到锻炼和成长。到1945年，分区把贾团改编为基干十四团。贾子和的起义使四县边的政治形势变得更好，马庄、原屯、班枣一带的根据地得到巩固，而且王堤、胙城一带由游击区变为根据地。因为贾团的士兵和干部多数是当地人，所以到国民党撕毁“政治协商会议协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时，在环境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仍能够掩护我党干部在这一地区活动，贾子和的起义，对开辟延津县的工作，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也显示出敌伪工作的重要性。

(五)对敌斗争中的情报工作

在对敌斗争中,情报工作相当重要,它起眼睛、耳目作用。五年来,中共卫西工委和“四县边区工委会”。在复杂的环境中,对敌、伪、顽、会、匪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使我们的地下党组织,不但没有遭受敌人的破坏,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在与敌人进行公开的武装斗争中,我们的干部和武装部队也没有遭受大的损失;这是和我们重视情报工作分不开的。

中共卫西工委会从成立开始,上级党委就把搜集敌伪军事情报,建立情报网,作为工委的一项主要任务。因为当时的抗日根据地周围,日寇碉堡林立、封锁蚕食,并不断地对我根据地疯狂抢掠、扫荡、残杀无辜群众。我们要对日本鬼子进行反扫荡,要让群众进行坚壁清野、避免不应有的损失。因此,必须有可靠的情报工作,才能战胜敌人。五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情报工作,不能一一举例,仅举几个事例可以说明。

第一,1941年4月,日寇准备对我抗日根据地——沙区(濮阳县以西、内黄县以南,浚县以东大沙区)进行大扫荡(即4月12日称“四·一二”大扫荡),我们通过“天门会”获悉这一情报,又从淇县敌人那里得到“每保派马车三辆,各带斧锯”(敌人准备砍伐枣林)的情报,立即向沙区地委汇报了。

第二,1941年8月底,汤阴县地下党员李学清在县城附近教书(当小学教员)被捕,在敌人审讯时叛变,供出石侠凤同志(化名张俊杰)。我打入汤阴宪兵队的郑建国同志,立即向工委会作了汇报,为了避免敌人的搜捕,工委指示李学清家乡的大批党员都武装起来到“天门会”的十八中队里,工委成员也作了转移等,因此在卫西地下党组织未遭受任何破坏。

第三,我们使家住淇县北关在电务段工作的王路中同志与淇县火车站电务段的日本人拉上了关系,通过火车站这个关系搜集敌人情报,同时还通过日本人,购买我解放区急需的军用电料物

资，我们还通过淇县稻庄刘云滨（我专署参议）与淇县特务股负责人苗文田拉上关系，通过苗文田给刚从军区受训后返回淇县的刘秉毅同志办了敌人的“良民证”，也给我办过“良民证”。在敌占区工作，有了“良民证”就能合法存在，就可以合法活动，进城、乘火车可到处通行。对苗文田的工作由李清泉同志负责，有这个关系我们了解情况和淇县地下党的活动是很有利的。

第四，1942年春，我派淇门镇王明宇同志利用他和王凌阁的关系打入扈全禄匪部（王明宇是太行五分区敌工科长王舒苗的弟弟，王凌阁是王舒苗同志的学生，当时王凌阁是扈全禄的参谋主任）。我通过王明宇同志介绍认识了王凌阁。当时王凌阁家里很穷，他父亲以卖红薯为生，经教育后与王凌阁建立了工作关系，通过王明宇、王凌阁搜集敌人情报。1943年扈全禄率部投降日寇，编为伪六军的第三旅（扈全禄任旅长，王凌阁仍任参谋主任），在扈全禄率其匪部随伪六军向我解放区进攻，窜到我卫南县（现在滑县）的孟庄驻扎后，同年夏天被我分区部队将该旅全部歼灭，扈全禄带七、八十人逃跑到浚县的双鹤头村。孟庄战斗的胜利，也显示出我情报工作的作用。

第五、我通过汲县白河村张梦九同志（和王国藩是儿女亲家的关系）。与王国藩建立了关系，王国藩答应为我党工作，并同意我们派干部到他部队工作，王国藩为了表示诚意，还给我分区首长写信表达了他的心愿，此信让我转达。

1943年，王国藩投敌后编为伪六军第四旅任旅长，苗兴之为副旅长。在副旅长苗兴之率领下随伪六军进攻我解放区。该旅占领我卫南县的瓦岗寨（王国藩在淇门住未去）。我和张梦九同志于1943年夏天去分区司令部，经过瓦岗寨时，在王国藩旅部搜集了不少情报，并将王旅在瓦岗寨的军事布置了解后去分区司令部（张梦九留在瓦岗寨王国藩旅部）汇报，当时瓦岗寨逃出来的党员和群众纷纷控诉伪六军的残暴罪行，向分区请愿要求解放瓦岗寨。我分

区司令部正开会动员组织解放瓦岗寨的战斗,我提出返回叫张梦九同志出来,分区首长说:“已经来不及了,待打开寨找他吧。”

我随部队第二天从滑县的九女岗出发,夜里向瓦岗寨发起进攻,经过一夜天的激烈战斗,除王国藩带一连驻淇门外全歼驻瓦岗的第四旅,俘虏副旅长苗兴之,一团团长申泽远等官兵 2000 余人,缴获全部武器弹药。

瓦岗寨的战斗,做到了知彼知己,获得全胜。以后对王国藩仍保持工作关系,通过王国藩,我们继续搜集敌人情报。

第六、1943 年伪六军第七旅旅长王协和和与十八支队芦云甫在汲县的白河村路北大地主张××家商量,计划去八支队王国然那里,他们没带武装,我获悉此情报后,与新四路政委王伟同志商量一个班到白河村东头庙里埋伏,待王协和出来时活捉这个伪旅长。按此计划部署后,王协和和芦云甫果然从地主家里出来,一枪未发 2 人均被我俘虏,缴获手枪两支,随后将王、芦押送到冀鲁豫军区。

第七,1944 年秋,青纱帐起来了,伪四十军冯书堂师驻汲县,该师一个团驻封丘县,冯书堂给这个团一部电台,用武装护送,怕我游击队截走。为此,他们用一辆汽马车,把电台放在车内,又装一车大蒜,上边坐一位军官的姨太太,化装成家庭妇女,我情报人员将此情况及时送出,说汽马车套三匹骡子,上装大蒜下放电台,什么时候从汲县出发,从汲县到封丘的公路上通过,我带领四县边大队从原屯出发,到了延津的小庄,立即派两名侦察员到这条公路上等候,并把汽马车上坐着一位妇女,装一车大蒜等情况告诉了侦察员,让他见到即将人、车带回来。中午,果然汽马车过来了,侦察员连车带人带到部队,下午我们又返回马庄、原屯、战士们纷纷议论,怎么截一车大蒜?莫明其妙,将大蒜卸下来露出电台,大家兴高采烈,遂把电台交给分区司令部。对伪军官的小老婆和赶车的教育释放。

5年来,我们通过“天门会”,浚县伪保安司令部,扈全禄匪部,汤阴县敌宪兵队,淇县火车站,伪新民会,特务股,汲县的王国藩、扈俊峰,延津县贾子和的民众自卫团等内部关系,搜集了敌人大量情报,加上四县边区的上层关系和敌伪军、伪会团关系,形成了情报网。所以在对敌斗争的过程中,显示了巨大的作用。正如前面所说的宋村伏击战,小庄伏击战,侯屯伏击牛二阎王等等,都由于有了准确的情报工作,才稳、准、狠地打击了敌人。

又如1943年的12月份。我们分区的十六团政委郑鲁同志找我说:“快阳历年了,能否给部队改善一下生活?”我说:“等机会吧。”一二日汲县送来情报说:“日寇向滑县敌人送洋面有三、四辆汽车,几十名伪军押送。”把情报告诉十六团,商量派一个连埋伏到柳位村,封锁消息,待敌人进村后,将寨门关闭,以免敌人跑掉。柳位村内街道是深沟。敌人汽车开过村后,以手榴弹为号,东门听到了手榴弹响,立即将寨门关闭,我部队向汽车上的敌人冲杀,很快解决战斗。未打死的举手投降;命令敌汽车司机将白面拉到班枣,将汽车放火烧毁;用马车将白面拉走,并押送着俘虏,这个小小的胜利也显示了情报工作的作用。阳历年我十六团在卫南县过了个欢乐的新年。

(六)开辟第二条地下交通线

卫西地区是冀鲁豫平原通往太行山两大战略区的交通要道。这条地下交通线,主要是由冀鲁豫军区敌工部(即军区沙区办事处)负责开辟领导的。

卫西工委成立后,把维护冀鲁豫平原通往太行山——延安的地下交通线畅通,保证我们的党、政、军干部往来安全,作为他的主要任务之一。地委为了护送干部更加安全,于1942年以后,曾派一个分队穿天门会的服装常驻李黄庄,以天门会武装出现作掩护,组成地下交通站,负责接送干部过路工作。几年间,护送了大批干部,其中有中央负责同志,如皖南事变后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

少奇同志去延安路过卫西，当时由卫西工委会领导的灰色武装——“天门会”的武装负责护送，刘少奇同志通过平汉铁路安全到达太行山的抗日根据地。

通过这条地下交通线过路的领导同志有：陈毅、肖华、杨勇、朱瑞、舒同等。经过这条交通线来往接送的干部约 2000 人。

上级党委为了预防浚、汤地区交通线万一遭到敌人破坏，不影响与太行山区的联系，让我从延、浚、汲、淇四县边区开辟第二条地下交通线。于 1943 年开始，到 1944 年正式建立了交通站。地委派王东亮同志任站长，交通员有：王鸿宪、张吉祥、赵玉山、孔庆堂、张智松等同志。这条交通线通往太行山汲县的石豹，由延、浚、汲、淇四县边工委领导。

第二条交通线建立后，往来护送有时也采取武装护送办法，如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和冀鲁豫军区政委苏振华同志带整风队去太行山，以及又返回冀鲁豫，都是用武装护送的；在 1945 年旧历 8 月中旬，杨得志、罗荣桓、滕代远等 27 名领导同志从延安到太行山的麻田，又从太行山来冀鲁豫也是从塔岗过铁路，太行山派独立营的同志送，我们派武装接过来的；还有化装经交通员护送的共约 2000 人。

第二条交通线建成后，冀鲁豫区党委与太行山整风队的联系，主要是通过这条交通线。

争取王天祥起义始末

王乐亭 李苏波

一、王天祥部队的发展和脱离新五军后的情况

王天祥原来是个旧军人。开始，他在石家庄以北招兵买马，拉起一个中队，自任中队长；这时张磐石从保定监狱出来，任中队指导员。后来这个中队到林县一带活动，发展成为一个团，归建孙殿英的新五军，而且是新五军中能打的一个团。当时，这个团抗战比较积极，冀鲁豫军区曾派刘哲民同志跟他们联系。1941年“四·一二”大扫荡之后，杨得志司令员派刘哲民到沙区见了朱程同志。朱程给刘哲民出了个点子，让他以机要秘书的名义，经天门会到淇县一带找到了王天祥。

那时，王天祥部队中已有张磐石等不少共产党员。我们和王天祥联系的主要任务是争取他们坚持抗日。后来张磐石调离，到北方局搞党的宣传工作。王天祥部队中还留下三个党员，一个姓王、一个姓乔、另一个是洛阳人（记不得名子了）。

王天祥是个小野心家。他曾派他的参谋长陈季章（保定陆军学校学生）到安阳以东的楚旺一带活动。陈到太保找程道合，到回隆找陈希孟、到半截砖找杨法贤、杨贯一等，用王天祥的名义搞换贴。他用这种方式 and 这些土匪拉关系，想把他们团结起来，扩大自己的势力。

王天祥和安阳以东的几个土匪头头成为不见面的换贴朋友以后，于1941年下半年派人来冀鲁豫军区，说他准备把他的一个团从太行拉到回隆集一带。很显然，他是想在这里发展势力，扩张地

盘。(据王化棠回忆：王天祥为什么要脱离新五军呢？有材料说王与孙有矛盾。孙不相信王，要剥夺他的兵权，把王从他的团里调出来去当副旅长，使他成为光杆司令，好收拾他。王的几个营长，都是他的心腹骨干，联名上书给孙殿英，一再挽留王。但孙不答应。王任副旅长后，形势紧急了，他又回到他原来的团队，并将部队拉下太行山。)王下山依靠谁？他自己目的也不明确。依靠国民党还是依靠共产党？他是想脚踏几只船。他认为只要有了势力，有了资本，投靠谁都行。实际上几只船都可以撑的想法并不可能。他脱离了新五军后，即不靠日本，又不靠国民党，也不靠共产党，三不靠。他从安阳以南、汤阴以北过铁路，三方都不联系，成了孤军。在这种情况下，被安阳的日本(一个连队或是一个大队)打了一家伙。日本人有七八百，将他打得一塌糊涂。王天祥在美梦未能实现的情况下，没有去回隆集，而带着人到了井店一带。这时，他和我们接上了关系。我们派五分区政委王凤梧和他接触。王凤梧试探性的给他提出几个问题。问他对冀南边区政府什么看法？还问他对冀南票什么看法？王天祥后来曾给我说：“我是当兵的，提这些问题干啥？我的论点是武官不怕死，文官不爱财，不谈政治问题，只讲朋友。日本人打我，你们接济、援助我就行。”

当时我们的兵力都分散开了，王天祥觉得我们不是靠山，看不起我们，可又怕日本人收拾他。于是在井店没呆多久就不辞而别了。离开井店后，他的第二个野心是回徐州西北的单县老家一带，与地方实力派勾结，借以发展自己。可是，当路过濮阳以东的留屯地区时，被高树勋拦截了。因为王天祥下山后，孙殿英就给国民党中央军委发了电报，转告王拉部队下山一事。国民党中央军委马上向各地发出通告，命令不论谁在那里发现王天祥，即行扣留，就地正法，部队缴械。高树勋接到电令正寻找他，王天祥却自投罗网。高树勋在留屯将王天祥扣留、缴械，但没有枪毙他。这时，王部队中的几个党员跑出来，同我们接上了党的关系，汇报了王天祥被缴械、

扣留的过程。我们听了汇报以后，认为王已被下了枪，无法挽救了。（当时接关系的姓乔。）下步文章怎么做？他们汇报说，陈季章参谋长被高放了出来，还有些士兵也放了。于是我们成立了个收容所，让几个党员回去串连，动员他们去根据地。被下了枪的士兵正走投无路，听说我们这儿有收容所，给饭吃，就都过来了。一下子收容了200多人，每人每天供应一斤半小米、五分钱的菜金。后来，王天祥也被放了出来（据王化棠讲：有个材料记载说，当时蒋鼎文给高树勋的新八军下了个命令，让枪毙王。高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王投靠他，是个朋友，不能枪毙。他便有意地给了王一匹马，让他“训练”。王天祥在西北军时曾当过骑兵连长，骑术熟练，便乘马而逃了）。实际上高树勋让王看了“就地正法”的电报，等着被枪毙。高不枪毙他，而且给了点盘缠，让他跑掉。这是很够朋友的。过去土匪一般都采取这种办法。他出来以后，直接跑到太保一带。在太保、楚旺、回隆一带活动。他还派参谋长陈季章来冀鲁豫军区，感谢我们对他的支持。后来，陈经常跟我们联系。这里要澄清一个问题，当时太保、楚旺一带是敌占区和游击区。有人说王天祥到那里去是通敌，是我们指示他去的。这种说法不对。是王天祥派陈季章告诉我们，他要到敌占区拉武装。我们认为太保、楚旺、回隆一带是游击区，我们在那里不好开展工作，因此，同意他去拉武装。但拉什么样的武装呢？王天祥到回隆以后，我们派毛定远去给他说：你可以搞灰色武装。如果公开打出汉奸牌子，我们不支持，就是说不支持他搞汉奸土匪武装。后来他搞个了“东亚同盟自治军”，不叫皇协军，也不叫“剿共”两个字。他虽然不讲“剿共”，但因讲“东亚同盟”，接受了日本的公开委任，所以我们也不公开支持他。1942年8月，“东亚同盟自治军”在邯郸宣告成立，日军华北方面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长铃木向这股武装的军官进行了授旗仪式。

按照日军规定，“自治军”由4个旅（8个团）组编成，军长、副军长授中将衔，旅长授少将衔，团长授上校衔。军长王天祥，副军长

程希孟,第一旅长李成华,团长程海波、师建业;第二旅长程乾,团长程坤、郭德惠;第三旅长程道合,团长程兴华、程道生;第四旅长杨法贤,团长王文香、路景文。军部突击团团长张履亭。

“自治军”组建完毕,日军派岩桥秀男上尉为军事顾问,子磨上尉为经济顾问。松本以部队长名义指挥全军,各旅均有日军一个小队监督。凡军长下达的命令,文件必须有顾问的签署方能生效,实际上,日军是凌驾于“自治军”头上的太上皇。日军把元城县作为“自治区”建立“行政公署”,任霍计芝为主任。

二、我党对王天祥部采取的方针政策

根据1940年7月6日总政治部《关于伪军工作的指示》中提出的“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组织有力的伪军,对已有的伪军进行瓦解工作,削弱其战斗意志,争取伪军对抗日的同情与帮助,争取伪军反正。”根据是总政治部对伪军工作的总方针,我党对“自治军”采取了具体的斗争策略。

第一,针对“自治军”上层分子两面派的特点,针锋相对,采取以武装斗争为主的革命的两面政策。

“自治军”是日军的傀儡,汉奸组织,消灭日军当然要消灭“自治军”。但是,参加“自治军”的成员极端复杂,其下层多是些为生活所迫而被裹胁进去的劳动者,其中上层多是些两面人物。死心卖国求荣的只占少数。两面分子的特点是动摇于敌我之间,同日军有矛盾,同我党也有矛盾,与国民党也有矛盾,脚踏敌、顽、我三只船、他们明投日军、暗靠国民党、应付共产党。当然在两面分子当中,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各自的态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只要我们抓住抗战的中华民族求生存的本质和特点,有针对性的去做工作,争取其爱国不当亡国奴的一面,反对其卖国的一面,就有可能促使其向好的方面转化。

为此,在政治上,我们利用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同上层分子

取得联系,争取以“合法”身份向其内部派出代表或联络员,以上层关系作掩护,做下层工作,在其内部发展我们的力量,待条件成熟时,组织其一部或全部反正。当时我冀南一分区派张瑞符(化名王殿杰)先到王部一旅旅长李成华的一大队唐维部工作,通过唐维的一连长连廷洁(原我漳河县工作人员)建立了我党领导下的一支地下武装。王殿杰又作了李成华心腹人李德裕的工作,疏通了和李成华的关系,后来名义上是李成华的“秘书”,实际成了李的参谋长。冀鲁豫军区在程道合部派张符英(化名张复玉),叫纪全同志,我们向他们开展政治攻势,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晓以民族大义,陈述爱国与卖国之利弊,指明只有爱国才有出路。劝其:“人在曹营心在汉”,不要做民族的罪人。我们还通过各种社交活动,笼络感情,如冀南一分区桂干生司令员和李成华换了“兰谱”,请李德裕到我冀南根据地参观,并请他担任冀南一专署的“参议员”,以争取他们向我党靠拢。

在经济上,我们以民族斗争为重,不改变他们现有的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缓和彼此之间的矛盾,尽量照顾他们的利益,必要时还可以给予资助。

在军事上,我们始终以武装力量为后盾,把我们革命的两面政策放在军事斗争的基础上,利用伪军两面,“既能当官保家又不被消灭”的心理,经过谈判,向他们提出“约法三章”:①互不侵犯,恪守防地,不准到我根据地抢掠、骚扰群众;②不能危害我方工作人员的活动,保证过往人员和物资运输的安全;③及时给我方提供情报等(实际内容不限于这三条)。如果他们遵守照办,我们保证不危害本人及家属安全。日本投降后,对其实行将功折罪,立功受奖的政策。“约法三章”对他们起到了一定的约束作用。

由于我们以抗日大局为重,利用民族的主要矛盾,坚持了革命的两面政策,化敌为友,化友为我,少树敌人,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抗日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日寇,实现了全民族抗战这一总的战

略目标。因而我们的工作取得很大成效。如我们利用伪军的掩护，成功地开辟了横跨平汉铁路、连接太行、冀南、冀鲁豫根据地的地下交通线，几年当中没发生过大的差错。

第二，在争取、分化、瓦解和消灭“自治军”的总原则下，根据伪首不同的态度和表现，加以区别对待：争取同情的，控制两面派，打击孤立顽固的，把政治上的争取、瓦解和军事上的打击、消灭结合起来。当时我们对“自治军”的主要人物进行了具体分析：军长王天祥是我们的抗日朋友，愿意接受我党的领导，是争取和依靠的主要力量；一旅长李成华倾向我党，应该积极争取和帮助；三旅长程道合是个惯匪，具有十足的两面派特征，需要在争取的前提下加以孤立和控制；四旅长杨法贤也是惯匪，投靠国民党特务，与我党严重敌对，必须给予一定的打击，方可将其孤立起来；最顽固的是程希孟、程乾父子，长期与我党为敌，是打击和消灭的主要对象。当然，这是斗争的侧重面，不能把它绝对化，我们以有礼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实行拉中有打，打中有拉，又打又拉，打的立脚点还在拉。随着战局的发展，伪军首要人物的态度有所变化，我们的对策也必须相应而变，不能死守定规。不仅如此，在头面人物之间，还存在着又相互勾结又相互排斥的矛盾。他们表面上称兄道弟、拜把子、认干亲，实质上争权夺势，互相抢占地盘冲突，往往刀兵相见，暗害谋杀。我们将这些矛盾统统利用起来，以分化互解敌人。如李成华和程家父子之间矛盾重重，李打算借助我军的力量除掉程家，以便独占回隆；王自全有向东发展的野心，极力想扫清程家这个障碍。在这一点上，李成华和王自全是一致的，二者便联合起来。对我们来讲，消灭程家正符合斗争需要。于是，我军确定了争取李成华，打击和消灭程家父子的指导方针。

三、我党和“自治军”斗争的经过

1、元城战役：

“自治军”成立之后，日军划卫河以东的元城地区为“自治军”的防区，并设立了“行政公署”，霍计之任主任（霍后来加入共产党）。日军在邯郸召开军、旅长会议，决定东进。军部由回隆迁至龙王庙，松本率一个中队相随，并令王天祥立即进犯我根据地。元城县是当时我冀南一分区仅剩下的一小块根据地，日军这样部署的目的，一是迫使王天祥东犯我元城根据地，造成“自治军”与我军对抗作战局面；二是叫这些伪军离开老窝，失去立足之地，以便听从调遣。王天祥深知，如果他按日军的命令行动，必然受到我军的反对，他立即派人到一分区找桂干生司令员、吴建初政委联系，希望我军给他腾出一点地盘，去应付一下日军。由于日军命令急迫，联系的人员尚未返回，王天祥军部在日军的催逼下，已抵达龙王庙一线，李成华率程海波团进驻了大名以东卫河以西地区，师建业团占据了金滩镇，伪二旅程坤团占领了南李庄，伪三旅程兴华团占了小村，伪四旅王文香团在龙王庙东南一个有寨的村庄安了据点，突击团进驻了孙甘店。

为打击敌人东犯元城，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亲自指挥，发动了元城战役，调来了骑兵团、二十六团，卫东支队及附近各县武装。8月15日，在南李庄全歼程坤团，程坤只身化装逃脱。8月31日，强袭全滩镇，消灭了师建业团，师本人溺水漏网。此时，程道合，李成华已和我有关系。我军在对伪二旅军事打击之后立即向程、李进行政治瓦解，经一分区敌工科副科长阎之青和我方派驻李成华部代表王殿杰（张瑞符）说明利害，表明我坚决保卫根据地的严正立场，如背信弃义，必将受到惩罚。在我方争取下，李成华主动率主力程海波团从前线撤退，程也撤回大部兵力，元城战役结束。日军驱使“自治军”进攻我根据地的图谋遭到失败。我军乘胜扩大战果，打回了路南，恢复了失去的根据地和游击区。

2、两打回隆

日军宣布李成华“临阵逃脱”是“叛变”，李也宣布脱离该军。其

实,这时李已没有多少兵力,程乾占据回隆,李失去了地盘,暂住在张庄、六上。不得已把队伍大部分解散,把枪插起来。李同“自治军”留守回隆的程希孟、郭德惠原来就有矛盾,现在就更加激化。在李成华的请求下,我军根据争取李成华、打击程家父子的方针,决定攻打回隆,伺机消灭程部和郭德惠团。

一打回隆是在1943年9月23日(农历八月十三,回隆镇大集),由桂干生司令员指挥八旅肖永智政委和孔庄德副旅长率二十六团、二十二团参加战斗。战前,由连廷洁连长将我侦察人员带进镇内,按规定时间开镇门把我部队接进去。巷战一夜,我军消灭二旅程乾的一部分,但因缺乏攻坚武器,西街程家碉堡和东街郭德惠的碉堡,均未攻破。崔桥的大土匪王自全从李成华处得知我军一打回隆的情况,想借机从中搞掉程家父子,让李成华从中介绍,会见桂司令。在王的请求下,桂干生在崔沙庄会见了王自全,主要商谈二打回隆之事。这样,我冀南一分区通过李成华同王自全建立了正式联系。由于王自全的掩护,我冀豫边地下交通线比较顺利地开展起来。

二打回隆镇是在同年11月4日(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回隆镇大集),陈再道司令员、宋任穷政委亲临指挥,骑兵团、二十团和地方武装参加。战斗前一天,连庭杰连长佯装到镇外征粮,将本连带到附近村里,脱下伪军服,让我二十团侦察战士换上,傍晚再由连庭杰带回镇内,按约定时间打开南门,引我军主力入寨,立即投入巷战,迅速把伪二旅一部缴械生俘,程家父子突围逃至太保伪三旅处,后来经程道生从中周旋,程家父子向我军求和。我们本着斗争“适可而止”的原则,派阎之青同其谈判。从此,没有发生大的军事冲突。

四、智取大名和王天祥起义

1943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日军在太平洋和中国战

场上接连失利,面临着灭顶之灾。为了挽回在华北的危局,1943年5月26日,日军向我冀南广大路南根据地,发动了一次大扫荡,我一分区遭到了严重的损失。大扫荡后,日军龟缩兵力,放弃卫河以东元城据点,1943冬日军令王天祥军部转移驻楚旺镇,为迎接反攻,整顿“自治军”,我八路军总部派来了靖任秋同志。靖是共产党员,在孙殿英部任过副师长,同王天祥关系密切,王给靖以高参名义,便于活动。1944年4月,日军又令王将军部移驻大名城里。三分区(一、三分区已合并)敌工科长张勋到大名与靖、王在北关美国教堂办军官教导团,目的是加强思想工作,相机去掉坏军官。在一次旅长、参谋长会议上,靖讲了形势及今后部队前途,被军参谋处长、国民党特务邱效天所怀疑。为除隐患,王以邱有讹诈民财罪将其处决。三旅参谋长程兴华公开提出质疑,说:“日本人占不住,国民党又过不来”,是不是叫我们投共产党?王除患心切,即以程兴华挑拨三旅长与军长的关系为名,将程交军法处查办。程兴华当过旧军队下级军官,抗战后随郭好礼参加八路军,任过我三八六旅十八团副团长,后回家不归,投伪军程道合部任团长,因程道合对他有顾忌,改任旅参谋长,由薛登宽接任团长。薛闻讯率部示威,声言不过程兴华即攻城。日军藤冢也觉有异,出面干预,并乘机派日本特务刘崑为副军长,吴寿彭为参谋处长,又派檀松甫为军参谋长,对王天祥进行牵制、监视。1944年8月,日军乘王天祥留住邯郸公馆之机,将王天祥软禁,强行解职,宣布刘崑为军长。日军逼王天祥供认私通八路,王坚决不承认,因无确证,将王天祥押到保定,宣布王天祥为河北省省长高凌尉的“高参”,并警告王天祥不得再插手军内事务。王天祥借口看病到了北平,几经周折摆脱了日军的监视,到了冀鲁豫根据地。1944年10月,王正式参加了八路军。

1944年,抗日战争已进入到战略反攻阶段,为适应战局的发展,攻克大名,摧毁“自治军”这支庞大的伪匪组织,已势在必行,且时机已经成熟。大名为冀南重镇。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大名城墙

高而坚实，城河深而宽，城门高大，城垛林立。1937年11月日军占大名城后，在城内经常保持驻军一个中队的兵力，并在十一中学校内，构筑工事，自成防御体系。1944年4月，“自治军”军部移驻大名城内，王天祥令他的突击团控制了四门，由突击团团团长张履亭任城防司令，还配有伪警备队，伪警察防守。刘崑当上军长后，还没有敢马上将突击团撤换下来。

我冀鲁豫军区详细分析研究了大名城易守难攻的特点和敌兵力部署的情况，制定了发动突击团起义，里应外合夺取大名的作战方案。王天祥派陈济黎，张蔚林进入大名组织突击团起义。为联系方便，派任玉巧(女)随张蔚林进城，同突击团团团长张履亭取上了联系。1945年1月16日晚，王天祥和三分区首长率参加战斗的二十三团来到大名城东三里店村。零点，里应外合起义成功，击毙刘崑、檀松甫、吴寿彭。同时还歼灭日军一个小队，推毁了伪军和伪组织，“自治军”从此土崩瓦解，一蹶不振，开始走向复灭。

附注：1945年元月突击团起义后，王天祥任冀鲁豫军区抗日游击第一纵队司令员，后为二纵六旅旅长。1946年6月，王天祥由冀南二纵司令员陈再道介绍加入共产党。1947年被分配到冀鲁豫军政大学任大队长。华北军区成立后，调蒙绥军区察蒙军分区任司令员。不久调蒙绥军区干校任副校长。1954年转业，任河北省文化干校校长。1956年调任河北省体委副主任。1958年12月病逝，享年53岁。

(邯郸地委、大名、内黄县委党史办供稿)

与张岚峰的三次谈判

李苏波

第一次谈判

张岚峰利用日寇侵华时机积极发展其势力,是个新生的地方军阀和善于投机的政客。其内部派系矛盾层层,各怀鬼胎,自找出路。张岚峰原为西北军旧部,受到国民党的排斥,为保全实力,动摇于我党与国民党之间,持观望态度。抗日初期他投降日寇,暗勾国特,同时又采取应付我军的两面派伎俩。我们则以革命两手,对付其反革命两手,针锋相对,采取孤立顽固分子,打击日特国特,争取上中层军官,瓦解下层官佐和士兵,配合我军消灭其有生力量。

1944年秋,利用柘城一中中学校长、民主人士吴茂斋的关系,李苏波和苗泽生同志直接与张岚峰谈判。先到柘城由张岚峰叔父张映辰接待,在其陪同下到了商丘张岚峰总部。李苏波向张岚峰阐明了战争形势,我党我军抗日救国主张,指明了张部前途,应即刻悬崖勒马,事关大局和其全体官兵的命运,要早作决断,向人民靠拢,未为晚矣。张岚峰却以曲线求国反动谬论作回答,应付我们,以拖延时间,观望形势。李苏波进一步以冯玉祥将军领导西北军,坚持革命传统说明民族大义,是军人大德大义的行为。张岚峰一口答应他的部队原地不动,愿意与我军联系,并派代表到八路军、新四军去联系。第二天,张岚峰指定由五十五师师长王继贤随李苏波去冀鲁豫军区,并通知十八师师长杜新民去新四军联系。王继贤师长到了军区,受到李一非部长热情接待。军区首长杨勇司令员、苏振华政委、朱光政治主任等领导同志接见王继贤师长,向他进一步指明

张部前途,规劝张岚峰早日回头,靠拢人民,是唯一光明出路,王继贤师长受到很大鼓舞。王继贤师长在军区时,李一非部长做了大量思想工作,增强了依靠我党我军的信心,表示一定利用他在西北军的关系,大力开展工作,整顿好本师工作,加强与我党我军的联系。王继贤师长由商丘往返沿途,亲眼看到三百里根据地爱国抗战、生产建设蓬勃新气象的情景,更加强了对张岚峰部斗争工作,准备武装起义的信心。

第二次谈判

王继贤师长回到商丘张岚峰总司令部,向张岚峰报告他受到军区首长热情款待的情景,耳闻目睹根据地的一切。并将带回来的杨勇司令员给张岚峰的亲笔信交给了张岚峰。信的大意是:认清时局,深明大义,走向人民,共同抗日,将功赎罪,既往不咎。

根据军区领导意图,李苏波与王继贤师长商定,提出逼张岚峰要有明确行动表现的几个条件:

1、张岚峰部队应撤出已侵占睢、杞、太、夏、永、亳根据地的据点,保证不再向根据地抢掠;

2、保卫商丘地区抗日工作人员的人身安全;

3、提供日军和国民党军事情报联系。

张岚峰当面表示,赞成我党我军的宽大为怀,而背后却搞鬼,说什么要给他时间做下边的工作,其实是想以应付我们了事,从而加强其内部的控制。王继贤师长利用张岚峰派他与八路军联系的代表身份,广泛开展宣传我党抗日救国主张,以及对张岚峰部的官兵政策,先后争取了陈扶民军长、邢剑五团长、王翔九师长、郭永照团长、程培兆营长等人与我党我军的联系。争取他们共同对张岚峰斗争,促使内部分化,促进张岚峰向人民靠拢做了不少工作。

第三次谈判

1945年秋，“八·一五”日本宣布投降，我军奉命向敌伪军开展全面战略反攻。这时，张岚峰部遇到极大的困难，呈现出异常恐慌不安状态。张岚峰为保存实力，“事秦乎？事楚乎？”为自己的前途打算，依靠国民党以他们自己的实力，不能长期存在；依靠共产党，他认为当时共产党的力量不如国民党，对共产党抱怀疑态度，所以他采取应付我们的手段。于是便着王继贤师长邀请李苏波同志到商丘张岚峰总司令部再次谈判。

当时，我们已经获悉蒋介石已派西北行署办公厅主任熊斌带着委任状收编张岚峰部队，委任张岚峰为第三路军总司令。张岚峰妄图在蒋介石大军尚未到来之前，借谈判为名，拖延时间，苟延残喘。军区决定李苏波同志以第十八集团军总代表身份再次与张岚峰谈判，李苏波同志去谈判时携带着朱德总司令给张岚峰的信件，交给了张岚峰。信件的大意是：中国解放区、中国沦陷区的一切抗日人民武装力量，有权根据波茨坦公告和盟国规定的受降办法，接受被我们所包围的日、伪军投降，收缴武器、资财，并负责受降后的处理的一切规定。规劝张岚峰部队对蒋介石丢掉幻想，原地接受我军整编。戳穿蒋介石以假和平为名，真准备挑起全面内战，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阴谋，讲明我党主张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此时，张岚峰十分尴尬，表面上答应部队原地不动，至于怎样接受整编再作商议。随后，张岚峰又要了一个花招，请李苏波同志到他的部队防地视察，借以稳定军心。我们也将计就计，借此机会宣传我党主张，开展对上中层军官的联络。

第二天，李苏波同志与张岚峰乘一辆吉普汽车到宁陵、太康马头镇、柘城驻军防地会见丁保仁旅长、杜新民师长及一批军官。李苏波同志借此机会向张岚峰官兵宣传我党中央对日本投降后的和平建国主张，以及对敌伪军的政策，扩大了政治影响。

张岚峰应允部属当与我军民联系，部队原地不动，避而不谈撤退接受我军的整编，其实质是，待机等蒋军的到来作为靠山，充当蒋介石打内战的炮灰。尽管我党曾先后派申伯纯、黄友若等同志到商丘数次与其谈判，他总是采取两面派的伎俩对待我们，其结果必然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死路。

发动魏凤楼部起义的经过

杨春芙

1945年春，魏凤楼在淮阳柳林一带招兵买马，要重整旗鼓拉起队伍，他并去商丘面见了大汉奸张岚峰，张给了他一个五十六师的番号，让其负责淮阳一带的绥靖治安。这里距我淮太西根据地很近，对我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极为不利。冀鲁豫军区决定，做好魏的工作，把他的队伍拉过来。此举如能成功，一方面打击了汉奸张岚峰，另一方面可使我根据地的形势大有好转。为此，冀鲁豫军区敌工部派人到第十二军分区专门研究这一问题。鉴于当时我党在魏部已无地下组织，决定让我先去寻找魏的旧部，特别是魏信得过、并受到我党影响的人，动员他们重回魏部，以便建立我党在该部的群众基础。

我接受这一任务后，决定去找魏凤楼原司令部警卫队的队长李子善和魏的近身警卫刘学孔。那时我对此二人当时的情况还不太了解。为了越过日寇的封锁线，我化装成了老百姓。行至周口西门时，遇到了日军岗哨，把我给李、刘买的礼物全部抢走了。我见到李、刘之后，暗庆幸虎口余生。在李、刘处我转弯抹角地给他们讲了解放区军民情如鱼水，共产党很得人心，还讲了日本、汉奸经常进攻解放区，百姓不得安宁等，劝他们回到魏部，说服动员魏与解放区搞好关系。刘立即问：“这是不是共产党叫去的？”我只好所答非所问地说：“你们先去，停一停我也去。”最后，他俩总算答应了。他们去魏部后，因当时魏正扩建队伍，见他们又是亲信，故将他们安置在司令部里。

我回到十二军分区，向组织汇报了以上情况。组织上向我传达

了王幼平同志(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兼敌工部部长)的指示,要我同原魏部特务营营长高时贤(我党的同情人)一起去魏部,争取魏凤楼起义。一天早上,我们化装成老百姓,绕过汉奸的三道封锁线,天近黄昏时,到了魏部的驻地柳林。我让高时贤先去见魏,将我们的来意告诉他,高去了不久即回。并且魏的贴身卫兵王丙申也跟来了,请我到一个大地主的院内。我刚坐定,魏就带着几个人来了。随他进院内的只有王丙申等二人。我与魏整整谈了一夜,开始他顾虑重重,最后总算说服了他,并约定三天后再来会面。天将亮时,我对高说:“我先回去汇报,你暂时留在魏部。”我回到根据地,向党组织作了汇报,组织上很满意。

三天后,组织决定仍由我带领军区敌工部的戴德同志和十二军分区敌工部杨木林(现名叶本瑞)等五人一同前往魏部。这次还给魏带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文件。借以从理论上提高他的认识,促使他早日认清形势,下决心尽快起义。我们一行五人在夕阳西下时,催马前往柳林。约在夜晚十点多钟到柳林寨外,有两个魏的贴身传令兵按约定时间迎接我们。进寨后来一片空旷地的井边上,魏正在等待我们。见到魏后,我和戴德、杨木林向他转达党组织对他的关怀和问候,并向他分析了国内时局,我说:“日本侵略者长不了啦!张岚峰当汉奸与人民为敌决无好下场。只有中国共产党才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又对魏讲了他是彭雪枫、张爱萍同志介绍入党的,现在党组织欢迎他回去。魏表示,回去是要回去的,只是单枪匹马,不带队伍回去无法见张爱萍同志。我们说:“只要你回去,带不带队伍组织上都欢迎。”深夜时分,魏的妻子王志贞也来到井边。我与王是多年的交情,过去在魏部做工作,不少事就是先做好她的工作,再做魏的工作的。此时,故人重逢,倍感亲切。我们向她讲明了来此目的后,她也表示愿同魏一起到解放区去。

当时传闻,蒋介石也正拉拢魏凤楼,他在给魏的电报上说:“只

要‘魏凤楼’三个字能过去,就任命他为河南省主席。”我们在同魏的谈话中也了解到他虽无顾虑,但是还没有下决心马上起义。因此,争取魏的工作是很紧迫的。

我们与魏凤楼商谈后,在返回十二军分区的第三天,魏突然派其弟凤喜(留苏学生)带着几个人来到十二军分区。组织决定,魏既然派人来了,要热情接待。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魏克仁副部长接见并盛宴招待。询问魏部需何物资,需多少?说大军区已准备好了一批物资和款子。魏凤喜亲眼看到了解放区的情况,又目睹了共产党如此热情,甚为感动。当即说:“我哥虽是老粗,但粗中有细。我回去将如实转告这里的情况,劝他早日到这里来。”第二天,魏凤喜高高兴兴地回柳林去了。

魏凤楼派其弟来根据地已经充分说明了争取魏的工作已前进了一步。

王幼平同志果断地指出: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要抓住时机,充分做好魏的工作,只要魏凤楼来,带不带人都行。为此,组织上又派我与戴德、杨木林三人到魏部。这次见面后,立即开门见山地谈了起义的问题。问他要干什么,魏说,“我什么也不要,请解决我的入党问题吧!”我们向组织汇报了这一情况,王幼平同志说,“这个我们无权批,需请示中央。”这时,组织上一面请示中央,一面决定先将其家属接到解放区。我和魏克仁副部长等3人又到了魏部向魏说明先接家属的原因,他表示同意。

日寇投降的第三天(8月17日),我带一个连的武装,套三辆太平车,连夜赶到柳林寨外的胡子元(魏的三团长)家,接回了魏的家属。

8月18日,魏凤楼率领约3000人的队伍起义了。王幼平同志亲自带队夹道迎接。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胜利的乐曲响彻天空,人民的队伍又壮大了。

(杨静琦整理)

鄆城起义

张公干

1941年我和邹桂五、纪清濂(桂五爱人)、赵先旭(公干爱人)到国民党六十八军搞统战工作。六十八军是原西北军冯玉祥将军旧部,有较浓厚的爱国主义思想,对蒋介石卖国独裁消灭异己不满。军长刘汝明升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后,刘汝珍继任军长,邹和刘都在苏联学习过军事,我和刘1929年就在冯玉祥将军传令队(随从副官)一起工作过。刘当师长时邹是参谋长,我是副官长,张文彬是参谋处长(张是刘当旅长时的副旅长)。1934年在江西二十六路军独立四十四旅工作时以共产党嫌疑被捕,经我们营救出狱后,到六十八军工作的。我们几个人在一起工作,一起生活,海阔天空,无所不谈,进行工作比较便利。刘的升任军长也是我们这些人出谋划策多方面活动,又亲自跑到重庆请冯玉祥将军向军事委员会推荐办成的。因此,我们的关系就更密切。刘的爱人王兴洲有进步思想,纪清濂、赵先旭就经常和她来往,做她的工作争取他们,坚持抗战,坚持团结,走革命道路。

六十八军的一部份军官,特别是中上级军官中封建思想比较严重,有的有嗜好,排斥进步军官,不利于团结抗战,我们就逐步提拔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军官,如刘钧初调任炮兵营长,米德山任步兵营长,庞绍绪任副团长,张乾任团副,张传炯任副营长,周霞云任连长等等。对国民党军官学校派来的学生,我也以老同学的资格(我是中央军校高教班毕业),从各方面帮助关心他们,和他们搞好关系。六十八军一般舆论都认为以刘汝明为首的一些老军官是老

派,以刘汝珍为首和我们一些人为新派,认为新派有新气象新作风。

1941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的几年中,六十八军在随县天河口、信阳明港、南召、方城,以及淅川的多次对日本作战中都是比较积极的,和我新四军五师未发生过摩擦。这一段工作我们贯彻了中央统战政策,团结教育提高了部分军官的思想认识,为下一步工作打下了基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六十八军由淅川开到开封、陈留一带,军部住陈留。晋冀鲁豫军区派人到陈留和我联系(我在军部任副官长)。我要求把关系转到附近地区,随后冀鲁豫军区派王凡同志与我联系。四六年初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派孟起(当时化名杨振民)同志与我联系。四五年冬我任开封城防司令后,城工部派开封工委军事委员范毅同志来六十八军帮助工作,据邹桂五同志谈不久汴郑工委刘鸿文、林恒等同志也来同邹桂五联系由邹桂五出面建议刘汝珍委刘鸿文为六十八军中校咨议,林恒在六十八军副军长王志运家当家庭教师,以利工作而便于掩护。桂五同志先后介绍吕向辰、朱晦生、刘鸿文、林恒与刘汝珍会谈起义问题。1947年春,桂五同志动员刘汝珍给刘伯承师长写信表示愿意利用机会起义,由林恒转交刘师长,林恒由解放区回来转达刘师长给刘汝珍口信:火车到站快上火车,不要让火车拉下。刘汝珍表示感谢。我们从各方面作了刘汝珍许多工作,希望他走革命道路。但由于他官大钱多,优柔寡断,没有决心,终于被时代拉下,湮没在人民革命的波涛之中。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令六十八军向水东睢杞太解放区进攻。六十八军八十一师师长葛开祥出发前,我告诉他蒋介石一贯利用机会消灭杂牌你是知道的(葛师是韩复榘旧部),部队打完了,就一切都完了,你要注意。葛说:我心中有数,应付应付就算了,谁去给他卖命。1949年,我军打过长江,葛随副军长王志

远在江西率部起义。

1946年冬,我调任三五六团团团长,率部队担任开封城防和警备任务,就抓紧时间练兵。主要是加强思想教育和改善士兵生活,除必要公事外,每天深入连队和官兵座谈了解连队生活,改善伙食看望病号,并及时给以治疗。告诫军官,不准打骂士兵,苛扣兵士伙食。针对士兵亲身体会,揭露蒋介石抓兵加税,不打日本,发动内战的种种罪行。同时指出停止内战和平建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启发他们的觉悟。在当时乌烟瘴气的黑暗军队中,我们初步树立新式军队雏形。辘重营营长刘茂奎对此不满,向军长刘汝珍说,张某人不讲吃、不讲穿、不要钱、不要官,一天和兵混在一起,不是共产党是啥。由于我和刘汝珍的私人关系,他练兵作战,对内外都需要我们,就没听刘茂奎的话。

1947年夏,开封学生响应全国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举行游行示威。事前国民党住汴特务机关来警备司令部要求制止学生游行,我们不予理采。学生示威游行时,砸了特务的力行报社,事后特务找到警备司令部提出抗议,声言要上告。我们反复解释,他们一直吵闹不休,大兴问罪之师。我们就严厉对他们说:你上告有权,我们只有手枪手榴弹,你看着办吧!兵荒马乱年头他住在我们防区内,暗箭难防,他得罪我们,日子也不好过,只好软下来。总部副官长郭天民乘机打个圆场说,都是自己人明天我请客。就这样我们暗中支持了学生的反蒋运动。

1947年8月,刘邓大军羊山战斗歼敌九个半旅后挺进大别山,开始战略反攻。六十八军奉命开菏泽一带防止刘邓大军北渡黄河。三五六团奉命在鄆城及以北沿黄河南岸设防,同时清剿我地方政权。

三五六团到达鄆城后,一部住城南,大部住城内严防和我地下党政机关和地方武装冲突。一天师里通知说,共产党临泽县政府现在鄆城××村,三五六团派队围剿,我们就派范毅同志马上去通

知,然后派副团长率队前往进剿,以应付敌人。又一次,我地方武装在箕山一带进行宣传征粮活动,地方来人报告,要求部队前往清剿。我就集合部队讲话,咱们这样部队有兵就有官,没有兵就没有官,作战要保存实力,爱护士兵。你们谁损失一个兵我就唯你是问。然后我就亲自带队出发,在距箕山远远的地方,就打了几炮,我县大队马上转移,避免了冲突。再如随刘邓大军南下的担架队,部队向大别山挺进后他们陆续北返,有人主张扣留,经过我们说服动员,把他们送回河北解放区。像以上事情不断发生。我们考虑到长期这样下去总有一天会发生问题,不是和地方发生冲突,伤了自己同志,就是被敌人发觉影响了全部工作。究竟如何处理适当,经与范毅同志研究由范毅到军区请示。9月11日下午4时左右,范毅回来传达军区指示:军区、区党委决定三五六团今夜12点起义,届时三野一纵三师刘云师长率队来接。这时距起义只有几个小时,我们立即打电话把城南十几里的一个营调回城内,防止和接应友军冲突。秦副团长不同意把部队调回,他说:我们的任务是清剿,都住在城里去清剿谁呀!我说你听命令好啦!回来再谈。到月出东山,副团长把部队带回城里,临时安置城东南角的小学里。夜10时左右我在城东南角城墙下集合营长开会,我痛斥蒋介石发动内战、排斥异己、祸国殃民种种罪行,现已面临全线崩溃即将覆灭的下场,为国为民,为了弟兄们的前程,我们决定起义参加解放军,已和三野一纵联系好,今夜他们派部队来接我们,看看你们有什么意见。三营营长米德山当即表示坚决拥护,一营营长吴海珠说咱们干八路,军长(刘汝珍)知道嘛,他同意不同意?我说军长那里由我负责,你们不用问。二营徐营长没表态。他是刘汝明的老人,他不会同意,但又不敢反对,只好说听团长的。我鼓励他们这样干没有错。叫他们回去照应部队。在我们一起往回走快到一营住地的时候,一营营长把二、三营营长领到一营去了。我马上跟上,他们进到院里回头看见我也跟进来,吴海珠有些紧张,忙问团长来干什么?是不是对

我们不放心,我说你们都跟我到团部来。到团部后,我把副团长找来,安排他们一起打麻将,防止他们到下面活动,同时我派人把有线电、无线电控制起来,上下电话电报都接到我这里。12点到了,我到城上听听看看毫无声息,两点三点过去了,仍无消息。吴海珠说,人家部队没来咱们把部队拉回去吧(回菏泽师部)。我说:你们都回去休息掌握好部队,听招呼好了,对任何人都不乱说。早饭后旅长张勋庭来电话说绥靖公署刘主任(刘峙)派来两个谍报参谋要到鄆城你那里去。我考虑昨天晚上的事情他们不会知道得这样快,不管怎样以不来为好。我就对张勋庭说,前方情况都给旅里报啦,没有什么新情况,他们要情报你给他们说说,不要来啦,前方危险,安全不好保证。张勋庭和我的关系比较好,政治上也是可以争取的人物。记得有一个晚上我俩在旅部偷听我邯郸电台广播,当时我广播员大骂蒋介石发动内战残害人民的时候,曾说蒋贼如何如何,张勋庭深受感动,立即站起跟着大喊蒋贼。他喊了以后马上出门看看有没有人在外面听着。他看看门外无人回到屋里,我们相见一笑,彼此心领神会,同意蒋介石是人民公敌。这次我提议不叫谍报参谋到前方来,他马上转告那两个参谋,但那两个参谋坚决要到前方来,他只好派骑兵把他们送来。他们到团部,我说:你们来我欢迎,可是前方危险,随时都可能发生意外,安全我不好负责。谍报参谋说刘主任要我们一定要到这里来,不来我们交代不了任务。我说好,就这样吧。叫副官给他安排地方好好招待。

9月12日,这一天非常紧张,因为部队没有建立党的组织,又长期受国民党的反动教育,军官惦念在蒋管区的妻子,虽然经过我们的教育有一定影响,但到关键时刻,可能动摇。当时团部和旅部电话直通,谍报参谋又忽然来团了解情况,如果走漏一点风声,就会酿成大祸。我和范毅昼夜不停地到连队观察了解情况,看到军心稳定,也就放心了。一天过去了,一夜又过去了,仍不见一纵队到来,真是令人着急。13日早起旭日东升,约在八九点钟,我在东城

上远远看见部队浩浩荡荡向鄆城急进，我顿时心花怒放，欢呼：可把你们盼来了。

三师开到鄆城城外，即派参谋长冯少白同志进城联系，我们紧紧握手互致问候。我当即把部队情况作了介绍，共同研究了起义的有关问题。确定后，我立即集合全团官兵讲话，我痛斥蒋介石投靠美帝国主义发动内战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共产党、八路军是救国救民的，我们坚决和八路军站在一起，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打倒卖国贼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为了全国人民过和平幸福生活，为了我们全团官兵弟兄们的光明前途，现在我们宣布起义，参加八路军。全团官兵热烈鼓掌。这时刘峙来的两个谍报参谋立即跪倒在地哀求饶命。我说前天我不让你们来，你们非来不可，我说出了危险我负不了责任，现在看非对你们负责不可了。当即把他们交给三师。

13日晚，起义部队奉命北渡黄河到观城一带休整。中途二营营长徐继业趁夜暗潜逃。天亮渡河时，蒋介石飞机狂轰滥炸，我们毫无损失，只能算是为我们送行了。

14日。三五六团全体官兵进入我们解放区，受到沿途村庄群众锣鼓喧天的热烈欢迎，并送了许多慰问品，使全体官兵深受感动。到达观城后，区党委、行署、军区组成代表团迎接并召开盛大的庆祝联欢晚会，《新华日报》、《冀鲁豫日报》纷纷载文祝贺。我代表三五六团全团官兵发表了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通电。三五六团改编为西北民主联军三十六师，张公干任师长，秦玉珊任副师长，阎学增任政治部主任。旋又改调冀鲁豫四分区部队与分区部队合编为三五六、三五七两团，在豫北继续与国民党反动派战斗。

在通知我们起义的同时，军区派通讯员张喜顺同志到开封市，通知开封工委撤退家属。工委派王世懋同志绕道新乡，跨过卫河，将赵先旭同志和孩子们安全护送到根据地。

敌军工作回忆

卢子杰

(一)

我做敌工工作是从1942年2月调到菏泽县第二工作队开始的(原在二地委九区任区委书记)。菏泽第二工作队(即南华县前身)原在菏泽西北、东明东北两县结合部圈头一带活动,从事抗日工作。后来这一地区逐步被国民党菏泽县长张志刚五个团,国民党菏泽第二专署专员孙秉贤部三个团及东明保安司令郝子端部(共约7千多人)占领。这么多敌人聚集在这一地区,迫使菏泽县不得不从圈头一带转移到菏泽城西王浩屯一带活动,我菏泽五地委(驻曹县刘岗一带)与冀鲁豫区党委(驻河北范县一带)的南北交通也被敌人切断了,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为了重新开辟这一地区,加强敌工工作,1942年2月组织上把我调到了菏泽县第二工作队。

到菏泽以后,组织上研究决定,让我打入当时最为反动、对我们威胁最大的东明保安司令郝子端部。接受任务后,我化装回到家乡。在白虎集找到了在国民党县政府住闲的刘学孔。刘原在国民党石友三部当旅长,东明的县长谢麻子原来曾跟他当军需官,两人关系极好。我跟刘学孔有点亲戚,找他就是想利用他与谢麻子的关系打进郝子端部。当我提出愿到郝子端部混事并请他帮忙时,他有点犹豫。我看出他的意思后说:“你怕我是共产党?放心吧,我不是共产党,只不过嫌在家里没意思,想出去找点事做,你不相信就算了”。我的话他相信了,写了封信把我推荐给了东明县长谢麻子,

谢麻子又亲自找到郝子端作了介绍，我被安排到东明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当了指导员，分管伤兵工作。

打入敌人内部以后，我一方面了解敌人的兵力、武器、编制以及内部矛盾情况，向我们的部队提供详细情报。另一方面利用敌人对我比较信任，工作、外出比较自由的条件，积极联系原来的一些党员，恢复党的关系。不长时间我便与岗峰区组织委员邓洪慈，临河区区长李玉亭，宋楼村支部书记刘汉杰以及郝子端司令部侦察班的地下党员孙本悟等同志接上了关系，传达了县委重新开辟这一地区的决定。从此我们的一些党员又在敌占区活动了起来，发动群众，抗捐抗粮，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机智的斗争。

到8月初，县委派人给我送信说：冀鲁豫区党委、军区指示，由五分区、二分区联合消灭或赶跑东明菏泽结合部的敌人，打通冀鲁豫与五地委及水东地区的南北交通。五分区司令员赵基梅的部队已进到靳楼一带，先消灭郝子端和孙建福部，你的任务是尽快摸清郝子端的军事情况，前去汇报。我接到信后，进行了详细的侦察，以看望敌伤兵为名赶到了靳楼，向赵基梅司令员以及县委领导朱先舟等同志详细汇报了郝子端部在于潭寨一带的驻防情况。赵司令听完汇报，决定让我带领部队立即赶赴于潭寨消灭郝子端。我们部队是晚上赶到于潭寨附近的，这次行动扑了个空，狡猾的敌人已经从于潭寨转移到了耿黄庄一带（距于潭寨10里），赵司令员决定放弃这次行动，把部队撤回到城南王浩屯一带待机。

我们的部队撤走的第二天，郝子端部又窜回到于潭寨，我也回到了政治部。为了避免敌人怀疑，我一见到政治部主任耿云峰和书记长张建甫，就先发制人地说：“主任，你们昨天转移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害得我晚上回来没找着你们，还差点让八路逮住。”耿云峰一听忙笑着对我说：“卢指导，我们昨天得到八路偷袭的消息后马上转移，走得仓促，没有来得及通知你，你没事就好”。我听了这番话，知道敌人没对我怀疑，心里暗暗高兴，准备继续侦察敌人的情

况，尽快向军区汇报。

本来朱先舟让我一周内去军区汇报情况，因军区首长怕郝子端逃跑，要求尽快搞清敌人的情报，朱先舟同志第三天便派了一个姓王的战士来找我联系，让我去军区汇报。那个姓王的战士又黑又麻还瞎一眼，路上装扮成要饭的。在过吕陵店时，由于说话不注意，被孙建福的便衣看出破绽抓了起来。王麻子在孙建福的严刑拷问和利诱下，当了可耻的叛徒，并交出了朱先舟同志让他给我的信。信上写的我的化名—苏克，孙建福搞不清苏克是谁。王麻子又说朱先舟交待他说如找不着苏克就把信送到卢海村他家，让他父亲转交。孙建福一听，马上领了四、五个便衣，让王麻子带路找到了我家，把我父亲和我三弟绑起来，送到了菏泽专署专员孙秉贤那里。敌人用鞭子抽打我父亲，用杠子压我弟的腿，让他们说出苏克是谁，干什么的。但我父亲和我弟只说不知道，别的什么也没讲。后来由于我庄上去了几十人充当保人，敌人才罚了我家 300 元现大洋把我父亲和弟弟放了出来。

由于这件事牵连着父亲，当郝子端、耿云峰、张建甫知道以后，敌人对我产生了怀疑。国民党党部书记长张建甫（与我有点亲戚）不仅有意躲着我，而且脸色很难看，我知道事情对我有点不妙。敌人所以没立即对我下手，主要是他们没抓住我什么确凿证据，再加上我是刘学孔、谢麻子介绍的，他们也不敢轻易下手，但我的行动已受到孙建福等人的监视。面对这种情况，我如果再去军区送信，敌人的监视很难走脱，继续呆在政治部，敌人迟早会对我下手。经过一番考虑，我决定离开政治部，汇报情况的任务交给司令部侦察班的地下党员孙本悟同志（因他没被敌人注意，又有自行车，去分区也比较快），我便悄悄找到孙本悟后，讲了我的处境和打算，然后又对他说：“我走后敌人很可能要转移，不管转移到那里，你都要设法搞清敌人的驻防情况，尽快向分区汇报”。他听后对我说：“你放心吧，我一定完成任务。”晚饭后我找到政治部主任耿云峰，对他

说：“我想到勤庄伤兵站看看伤兵，一会就回。”他听后迟疑了一下，说：“可以，不过晚上不安全，带两个传令兵一起去吧。”显然他是让两个传令兵监视我，我欣然表示同意。勤庄离于谭寨六、七里地，到勤庄时天已经完全黑了。我简单问了一下伤兵的情况，倒上水让两个传令兵喝着，我说想小便一下便出去了。说也巧，我刚走到伤兵站外边一个土掘堆后面，就听庄上一片狗咬声，不一会孙建福领20多便衣来到了伤兵站，孙建福一进门就大声问：“卢子杰来了没有？”一个传令兵回答说：“刚出去解手。”我一听知道敌人已经对我下手了，便趁夜幕的掩护悄悄地溜出了勤庄，一气跑了七、八里地到王庄我姑家躲了起来。

事情不出所料，孙建福没抓住我，郝子端部便连夜转移到距谭寨十五、六里的崔寨一带。第二天下午孙本悟同志便骑车赶到了五分区，向分区领导详细汇报了郝子端部的军事情报。这天拂晓，我五分区二十团和二分区九团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包围了郝子端及孙建福、卢崇尼部，向敌人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敌人还没弄清情况，便溃不成军，一小部分被击毙，其余全部做了俘虏，无一漏网。这一仗共毙俘敌人1700余人，罪大恶极的郝子端被当场击毙，孙建福藏在了豆棵里，也被我们抓获枪毙了。

郝子端、孙建福被我们消灭以后，张志刚、孙秉贤恐蹈覆辙，仓惶逃往菏泽城北关庙李一带。东明、菏泽结合部地区的主要敌人基本肃清了，从此南北交通也畅通了。为了更好地巩固这一地区，1942年10月初，成立了中共南华县委和南华县政府。二十团政委胡华居同志主持县委工作（当时胡华居带两个连暂时留南华帮助工作），朱先舟同志任组织部长，林善华同志任县长，我被分配到临河区兼义聚寨区委书记。

（二）

我南华县根据地建立以后，东明、菏泽的敌人都不甘心。他们

在我根据地两边建据点，修炮楼，挖封锁沟，蚕食我根据地。在我根据地的西边（从北到南）有菜园集、沙堆、宇宙屯、表耿庄、姚寨、五霸岗等炮楼；东边（从北到南）有临濮集、江苏坝、白虎集、高庙、刘庄、肖老家、耿海、解元集、马岭岗等炮楼。南华根据地东西宽不过10多里，南北长60多里，处在敌人的夹击之中。为保卫南华，保卫南北交通，我们一方面建立县大队和各区区队，针锋相对地同敌人开展武装斗争，另一方面加强敌工工作，瓦解敌军。我就是在1943夏天被调到南华县敌工站当站长的。

南华敌工站由张广仁、李宪文等七、八个同志组成，我带着几个同志负责外勤，主要深入敌人据点内部，做瓦解敌军的工作。当时在南华周围的诸多炮楼据点中，白虎集炮楼最大，人称山东第一炮楼。鲁西反共警备大队部设在这里，大队司令王兆州，旅长赵兴汉，下分三个营，还有骑兵便衣中队共七八百人。这个大队原是国民党宋哲元的部队南撤时留下的一个连发展起来的，后来投降了日军，接受了鲁西反共警备大队的封号。这帮人背靠日军，加上炮楼修得非常坚固，反动气焰十分嚣张，经常到我南华根据地抓人抢粮，袭击我南北过往干部。尤其是1944年初，敌人强行在我南华境内高庄集和李集修筑了两个大炮楼，由白虎炮楼派兵把守，三座炮楼成犄角之势，遥相呼应，卡断了我南北交通，对我解放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成了我们敌工工作的重点。

为了做这几个炮楼的工作，我与朱先舟商议后。便和薛庄的伪乡长朱明山、白虎集的伪乡长郑克仁、肖明镜以及原在宋哲元部当过连长，在白虎集住闲的刘喜清接上了关系，做通了他们的工作。这几个人都与白虎集有关系，利用他们逐步与白虎炮楼营长刘宝贵、王秃子、郭振喜以及骑兵连长刘雨秀、步兵连长张果勋等熟悉起来，开始我打着刘学孔亲戚的名义与他们“称兄道弟”，后来逐步地给他们讲些抗日爱国的道理。经过多次地做工作，刘宝贵、郭振喜、刘义秀、张果勋等都有很大转变。如郭振喜在负责守高庄炮楼

时,很少外出骚扰百姓,对我们的区队和其他人员的活动也很少过问,偶而发生冲突也很好解决。有一次我们岗义区队去高庄征粮,恰巧碰到了高庄炮楼的一个排外出巡逻,双方发生冲突。当时我正在高庄炮楼,有个内线叫胡明亮的跑回来告诉了我,我立即找到郭振喜说了这件事,他听后马上命令把那个排撤了回来。还有一次,我们敌工站的通讯员高二去圈头一带送信,被高庄炮楼的敌人抓住了,我听说后,马上和朱先舟(敌工部长)同志一起找到郭振喜,顺利地把高二救了出来。

白虎炮楼的敌营长王秃子是土匪出身,比较顽固,我们虽多次做工作,他仍然反动。1944年春天,当杨得志司令员带冀鲁豫七团一举拔掉对我南北交通影响最大的李庄集炮楼后,王秃子慑于我军的威力害怕了,要找我谈谈。我想这是做王秃子工作的最好时机,答应在白虎炮楼上的一个姓郑的汉奸医生(家住白虎集上)家里与王秃子见面。

这一天,我先到了姓郑的家里,不一会王秃子来了。来时他带了一排人,先包围了院子才进屋见我,这些我都看在眼里。他一进屋我便先发制人地对他说:“王营长,你今天带那么多人是找我谈话,还是来抓我,如果是来抓我,我现在就跟你走。不过你也应该放明白点,我既然敢来,就不怕你抓,我们的人可也敢抓你。”他听后忙笑着说“哪里哪里,兄弟我今天是特意来向你认错的,原来你说的话我都没听,给共产党、老百姓找了不少麻烦,都怨我糊涂,今后我一定改好,还望你在八路军那里替兄弟多说几句好话,日后给兄弟留条后路。”我说:“那好,只要你今后改好,不再与共产党八路军为敌,不再祸害百姓,我们对你过去的罪恶可以不加追究。但你说话可要算数,如果你说假话,搞缓兵之计,我们决不会轻饶。现在李庄炮楼被我们拔掉了,你的炮楼我们也能拔掉,只是暂时给你留点改过的机会,希望你不要执迷不悟。”“不敢不敢”,他连忙说。后来我又给他讲了许多抗日救国的道理,并向他了解了一些白虎炮楼

情况,然后便让他回去了,自从这次教育以后,王秃子有了很大转变,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通过我们的敌工工作,白虎、高庄等炮楼的敌人都变得比较老实了,这不仅为我们南华县的抗日工作及南北交通的畅通创造了较好的条件,而且为我们后来拔掉敌人的炮楼时减少了许多流血牺牲。如1944年9月份,根据冀鲁豫军区的统一部署,我鲁西南几个县同时开始了扫除敌人外围据点的军事行动。我二分区的七团把白虎炮楼包围以后,我对白虎炮楼上的敌人喊话,指名让刘宝贵、王秃子下来投降。他们不敢下来,刘宝贵回话让我上去谈谈。我给团长一请示,团长不同意进去,恐怕出意外。后来还是刘宝贵、王秃子派胡明镜下来传话说:炮楼兄弟都想投降,怕敌人报复,为了掩城里汉奸的耳目,想让你们打几枪,上去把枪收了就行了。我们听后便放了一阵排枪,上去把敌人的枪全部缴了。敌人投降后,刘宝贵又带着我们的部队到了白虎西北角的千佛阁炮楼,亲自喊话,守炮楼的敌人也一枪未放全部投降了。和白虎、千佛阁炮楼差不多同时被拔掉的还有高庄、高庙、刘庄、肖老家、耿海等炮楼。

除了做南华境内的敌工工作,东明的敌工工作我们也去做。当时东明有个沙圪堆据点,据点里不仅住着许多汉奸,而且还有日本兵。这个据点的敌人不仅在东明境内作恶多端,而且常到我南华境内抓人抢粮,为了做这个据点里敌人的工作,我了解到沙圪堆伪乡长阎志荣与据点里敌人关系很密切,我先去做他二哥阎茂荣的工作。阎茂荣和阎志荣尽管是兄弟,但他比较同情革命,他答应共同做他弟弟的工作。1944年春天的一天晚上,我到了阎茂荣的家,阎茂荣把他弟弟叫回来(住在炮楼),当面介绍说:“这就是菏泽敌工站卢站长”,我们坐下后,我便开始给他讲革命道理。最后我又给他们指明:“你现在名声很坏,群众很恨你,如果你执迷不悟,将来日寇完蛋了,你也只有死路一条。还会连累你哥、你们家。你如能改邪归正,将来人民群众会给你留条活路,何去何从,你要好好掂量

掂量。”阎茂荣也在一旁帮着说：“兄弟，你看卢站长说这些，可都是为你好，要不是为教育你，人家早把你抓起来，你觉得炮楼上人枪挺多，可在人家八路军眼里不算啥。”通过几次教育，阎志荣终于转变了，不仅悄悄地给我们供钱供粮，而且还在炮楼里悄悄宣传我们的政策，一些汉奸为了给自己留后路，敌人一有向南华境内侵扰的行动，就给我们报告消息。

1944年春天的一天，我永华区的区长邓保治来敌工站对我说：“东明保安警备队内部发生了内讧，有个叫二黑豆的小队长把一小队汉奸（20多人，十五六支枪）拉到菜园集村，准备去当土匪。”我听了这个消息后，觉得应利用这个时机去争取这帮汉奸。经县委同意后，便亲自去菜园集做这帮汉奸的工作。为了减少危险，我先通过关系找到了秦庄的秦洪举，此人是个光棍痞子，也是个土霸王，远近闻名，让他带我找到二黑豆。当二黑豆知道我是南华县敌工站长时，马上沉下脸对我说：“我不跟共产党合作，你赶快离开我这里，不然的话，可别怪我不客气。”面对二黑豆的冷淡和威胁，我对二黑豆说：“老弟，我这次和秦老兄一起来，是想来看看你和弟兄们，交个朋友，至于跟不跟共产党合作，我不勉强。”秦洪举接着说：“卢兄不仅是共产党的敌工站长，还和菏泽刘学孔、东明的谢县长是朋友，人家找你谈，是为你好。”二黑豆听后想了一会，答应让我住下谈谈。我和秦洪举一连在菜园集住了三天，一方面做二黑豆的工作，一方面做下面当兵的工作。给他们讲日本鬼子、国民党必然失败，共产党、八路军必然胜利的道理，给他们指明：从汉奸队拉出来是好事，再去当土匪，没有出路，只有投奔八路军、共产党才有光明的前途。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最后二黑豆终于明白了道理，带领全队参加了南华县大队。这帮人过来后，多数表现较好，壮大了我们的力量，为革命做出了贡献。

1945年，敌人的外围据点大多被我们拔掉，剩下的撤回城里去了，我们的敌工工作转向了菏泽城里。一方面用朱庄的朱香纪、

李宪文和伪县长魏景山到城里找到白虎、高庄炮楼上的一些熟识的汉奸，搞军事情报。另一方面由我负责去城里做刘学孔的瓦解工作。我通过魏景山潜进了城里，住到了城西关魏景山亲戚肖三的家（肖三的哥哥肖子楚是国民党的一个军长）。这期间，我几次找刘学孔，给他分析形势，促其弃暗投明，为菏泽的解放作点贡献。由于他对国民党仍抱有幻想，也没有成功。1945年10月底，我军包围菏泽城，开始了解放菏泽的战斗，南城门我们攻城部队采取地道爆破办法，攻破南门冲进城里。菏泽解放了。

（三）

菏泽解放后，组织上调我到郛（城）巨（野）、嘉（祥）济（宁）4县办事处当副主任（范蕊卿当主任），继续做敌工工作。当时郛城、巨野、嘉祥、济宁未解放，尤其是济宁住有大批的敌人。刘本功原是郛城的伪县长，日寇投降后，他又投靠了国民党，一变而成为国民党暂编第七师师长，驻守济宁，统领36个中队，共七八千人枪，与共产党为敌，我们办事处敌工工作的重点在济宁。

为配合我军解放济宁，我们4县办事处派我去济宁城里找阎冠英了解敌情。阎冠英是巨野的县长，当时是刘本功的参谋长，我党地下党员。当我向他说明我军准备消灭刘本功解放济宁时，马上向我详细地谈了城里敌人的兵力、武器装备及部署情况，他还主动地建议说：“为了随时掌握敌人的军事变动情况，你回去后最好派个年青的同志来给我当跟班，让他来传递情报”。我回到办事处，马上把我的通讯员郑凤亭派给了阎冠英，城里的敌人兵力部署有什么变动，郑凤亭便及时出城向我们报告，这对及时准确地了解敌情，消灭刘本功起很大作用。

1946年初，我军围攻济宁城的第二天，狡猾的刘本功提出要和我军谈判，他们可以接受八路军的改编，但人员枪支都不许动，八路军暂时也不准进城。这显然是缓兵之计，毫无诚意。我军向他

们提出限定 24 小时内无条件投降,否则便要攻城。第三天拂晓我军发起了攻击,南门攻破后,东门也破了,战斗很快结束,这一仗除刘本功和少数几个头头钻地洞逃跑外,其余敌人无一漏网。

(四)

济宁战役以后,我调任豫东纵队当营教导员,1947年1月,纵队开往河南准备参加解放鹿邑的战斗。组织上派我去鹿邑了解敌情,当时守鹿邑的有河南大汉奸头子张岚峰的一个主力营和两个保安团,近 2000 人。敌主力营长姓张,倾向革命,与我们有过联系,这次我去侦察的目的,一是侦察敌人兵力部署,城防工事情况,尤其是侦察敌主力营防守的西关的地形情况;另一方面想争取张营长率部起义。我去的那天是阴历的大年三十,敌人防守比较松,我没费劲地找到了张营长的家。见了张营长,说明了意图后,他详细给我介绍了城里的兵力部署和防御情况。第二天,他又派了他的副官带着我,趁敌人都过年不太注意,仔细察看了城里的形势,绘制了城西关的详细地图。但当我军决定解放鹿邑时,发现敌加强了防守;仅城外就加设了 12 道岗,每个城门上都新架设了两挺机枪。组织上派我第二次进城侦察,我打扮成阔商,尽管敌人把守很严,我顺利地闯了过来,到了张营长的家一问,张营长已被敌人怀疑,被撤了职,并被人监视着。新上任的营长很凶,已命令在西关各家凿枪眼,准备巷战,我听到这一消息后,马上回到部队做了回报。部队首长决定实行强攻,战士们乘柘城胜利的东风。一夜之间便全歼了守敌,解放了鹿邑。

(杨得起整理)

新乡和平解放经过

刘世英

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以后，我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挥戈南下，1949年4月底兵临新乡。被我华北野战军七十军（原十四纵队）长期围困的国民党第四十军，慑于我军的强大威力，被迫签字，接受和平改编，5月5日宣告和平解放。

一、基本情况

解放战争时期，新乡是国民党黄河以北的桥头堡和兵站基地。设第十二绥靖区，隶属郑州绥靖公署指挥，军队频繁的调进调出。

从1947年以来，国民党走向被动，由全面进攻的战略，改为向我山东、陕北解放区重点进攻。因兵力不足，这时豫北地区国民党的正规部队，只有四十军驻防新乡、安阳，一直到豫北全部解放。

日本投降以后，四十军奉命由河南灵宝县境出发，在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率领下，以接收为名，经郑州沿平汉线向我解放区进犯，1945年10月邯郸战役，高树勋起义，四十军被击溃，军长马法五，副军长刘世荣、参谋长李辰熙被俘。残部退回安阳后和投降日本的庞炳勋、伪四十军合编为整编四十师（后又改为军）师长李振清，整39旅旅长高元恺，整一〇六旅旅长董升堂。

1947年4月，我解放军发动新乡至安阳的破击战，攻克汤阴等县城，活捉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司令孙殿英。安阳孤立，四十军军部以及一〇六师全部空运新乡，接替国民党第三十军防区。6月

底,刘邓大军过黄河挺进大别山,四十军奉命由安阳、新乡各抽调一部分主力,向我刘邓大军追击。1947年10月,在湖北广济以西的高山铺被歼,残部经收容整顿,沿平汉铁路返回新乡。

新乡第十二绥靖区领导机关(原绥靖区司令六十八军军长陈鼎勋),从1947年以后,已名存实亡,只残留下一个勤务营,后编入三一六团。

四十军到达新乡以后,军长李振清兼任十二绥靖区司令。新乡国民党驻军计有四十军4个直属营,一〇六师所属三一六、三一七、三一八3个步兵团,一〇六师师长由副师长赵天兴代理,三一六团团团长庞庆振,三一七团团团长南吉祥,三一八团团团长郭维俊,另有三十九师的一一五团团团长梁××总兵力1.5万余人。另外地方部队有第四专署、张敬忠的保一旅,地主土顽武装王三祝的保二旅,县区保安团队等数千人,地方单位计有:河南省第四行政专员公署、新乡县党部,县政府以及附近各县流亡的县党部,县政府等。特务组织计有:隶属于国防部第二厅魏鸿钧的“国光社”及予北站直属组、随军组,牛平章的“明远社”和“建华社”,CC系统的新乡组,以及绥靖纵队刑警队等。

二、围困新乡

我刘邓大军从1946年秋到1947年春,在鲁西南进行了一系列重大战役,取得了七战七捷的光辉胜利。

1947年3月—5月,又发动了豫北攻势,先后解放了濮阳、封丘、延津、阳武、滑县、淇县、浚县、汤阴等县城,解放了豫北大片地区。6月30日,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国民党四十军抽调主力追击我刘邓大军,豫北敌兵力空虚,我太行军区于7月份发动道清战役,解放博爱,攻克木栾店,解放了道清路以南大片地区。同年11月至1948年4月,我太行冀鲁豫两军区组成“豫北指挥部,”先后向铁路线两侧之敌发动进攻,首先攻克了长垣县城,

相继肃清残余的地方土顽武装,迫使国民党军队,退编到安阳、汲县、辉县、获嘉、焦作、新乡等少数据点。

1948年5月,我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华北野战军第十四纵队,在太行四、五军分区配合下,于10月初发动道清战役,解放了焦作、修武、武陟歼敌5000人。11月10日,解放获嘉,7日,解放汲县,各歼敌上千人,同时我军已完全控制了新乡以南铁路线,切断了新乡到郑州的铁路交通。

1949年初,我华北野战军14纵队改为七十军,太行四军分区部队改编为华北军区独立第七旅,这两支部队以七十军为主,配合地方武装,对新乡进行围困。1949年2月4日,辉县城解放,守敌千余人全部投降。

至此,新乡外围的敌据点全部清除,豫北的国民党军队被压缩在新乡、安阳两座孤城,以及封锁沟外其少部控制区内。

为了彻底对新乡之敌实施围困,切断敌空中通道,1949年3月,我华北野战军第七十军在政委甘渭汉,副军长石志本,参谋长高厚良的指挥下,在西郊飞机场附近的村庄与敌展开激战。3月10日开始,我独七旅进占城北、西北各村庄。七十军除一个团在黄河桥担任守备处,其余部队全部占领飞机场西、南两侧村庄。11、12两日,战斗最为激烈,特别是八里营距机场最近,反复争夺,阵地失而复得。国民党四十军遭受我军这次打击后,经过喘息,于17日又向我军阵地进攻,战斗更加激烈,主阵地仍然是八里营、唐庄一带。11、12、17日三天的战斗,敌死伤被俘500余人,我缴获一批枪炮弹药。战斗中我军虽有伤亡,但机场却完全置于我军大力控制之下;切断了敌人从空中逃走的唯一通道。

三、内线外线密切配合,打击敌人抓兵抢粮

新乡之敌被我围在狭小的圈子里以后,吃的烧的成了重大问题,官兵厌战,开小差的日益增多,再加上战斗伤亡,兵源补充也成

主要问题。

当时我新乡外围之解放军吃掉敌人还有一定困难。新乡守敌苟延残喘，不甘心失败，经常外出抓兵抢粮，甚而对我军发动突然偷袭。围困反围困的斗争，1948年下半年日益尖锐。

1948年底，敌人为了稳定民心，维护其控制区的社会秩序，以第十二绥靖区的名义成立四个民运督训处，张贴布告，严禁抓兵、派夫、抢粮，企图组织群众“防奸、防谍”达到其征兵征粮之目的。四个民运督训处的主任分别由四十军四个主力团的政工室主任兼任，副主任由专署和新乡县政府派人担任，下有若干工作人员。所需部队由四十军各团调派。第一督训处设在杨岗，主任刘世英，第二督训处设在东关外，主任孙凤鸣，第三督训处设在西高村，主任闫风群，第四督训处设在尤家坟，主任×××，督训处寿命不足半年，只是对封锁沟内外其控制区的秩序稳定发挥了一点作用，因为限制了地方团队和特务们的敲诈勒索，胡作非为，又加深了他们对四十军不满和矛盾。预防敌人到我解放区抓兵抢粮和偷袭，首先要掌握敌人的动态，要有准确的军事情报。

抗日战争后期，我冀鲁豫城工部在新乡设立情报站，负责人是王占友（郭子青）。解放战争时期，以狗不理包子铺为据点，开展工作，1947年初，王占友同志因工作不慎，暴露了身份，被迫撤回机关，工作一度受到影响。日本投降前夕，打入国民党四十军内部的刘世英同志，于1947年4月下旬，由安阳随四十军军部到达新乡，经组织介绍成为我新乡站负责人之一。老刘同志的情报代号（5），以其优越的社会关系和条件，先后担任新乡车站军警联合检查站站长，封锁口检查站站长，第十二绥靖区第一民运督训处主任等职，日夜活跃在敌人中上层，完全掌握了敌人的军事行动，不管敌人外出抢粮或对我军偷袭，都能及时地由情报站将情报送到我领导机关和七十军敌工部，因此，敌人每次冒险外出抢粮或执行其他任务，都遭到我军的打击。敌人吃亏次数越来越多，官兵怨声载道，

相互猜疑,敌军师领导认为是因行动前抓夫派车,泄漏行动机密。进入1949年以后,敌人的军事行动,改为夜12点下达命令,拂晓前出发。这就增加了情报工作的难度。但我获取军事情报的渠道是直接来源于敌人的大本营,再加上一年多的实际经验,已经掌握了敌人的军事行动规律。

我七十军首长每天都要看(5)号情报员的情报。交通员外出送情报,要经敌人封锁口检查,傍晚外出还要注意敌人的布雷,特别是敌人便衣谍报的盘查。我情报站交通员共产党员张凯同志,(1980年病故于三门峡)完成这项任务是出色的,他输送情报的方式方法,是使人难以想象的。情报是用最薄的棉纸写成,卷成火柴粗的纸卷,外边包上锡纸,然后插到肛门内部送出。为了安全地完成任任务,就这样想办法给自己找痛苦。

崔佩玺同志是我军区办事处的交通员,负责和情报站联系。1949年元月下旬的一天,他从小冀办事处到新乡城外刘庄营找联络点送信,走到段村村头,遇上了他邻村一个姓缙的,这个富农分子在王三祝保安旅当兵,老崔同志知道事情不妙,快步刚到刘庄营村头,被王三祝的骑兵追上。被捕以后,在孟营王三祝的旅部受到严刑拷打,一连审问10多天,老崔同志坚贞不屈,始终按预先规定的口供应付敌人。王部派政工人员到刘庄营调查,使用一切手段,想从我联络点打开缺口,均未得逞。王三祝匪部在向安阳逃跑的夜里,将老崔和另一个同志拉到孟营南地杀害,先把那位同志的头砍掉后,又来杀老崔同志,敌人先把棉衣领子往下掖了掖,叫跪下时,老崔同志用力把棉衣领搓了起来,一刀砍下去,虽然砍倒了,因衣领挡了一下,头没被砍掉,刽子手们说“活干得不利索,”在黑暗中又补了两刺刀,但都没有中要害。听到孟营王部集合出发了,崔佩玺同志起来辨别了一下方向,爬过外封锁沟,忍受着刀口流血的巨痛,连走带爬,用了三四个小时,在八里铺附近遇到我哨兵。经我野战医院抢救,伤愈后,回到原籍滑县担任公社党委副书记。老崔同

志从死神那里活了过来，又辛勤地为党为人民工作了 30 年，1979 年春病故。

在围困新乡守敌的过程中，许多解放军官兵和地下党员以及派到新乡做经济工作的同志们，为了全国的解放事业，流血、牺牲，他们是我党我军的优秀儿女，他们的献身精神，永远值得我们敬佩和悼念！

四、守敌动摇、最后接受和平改编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结束，敌人内部上下都知道大势已去。围困圈越缩越小，每外出抢粮都遭我军打击。国民党派飞机空投物资和粮食，大部落到我控制区。这时敌内部日益惶恐混乱。在我强大军事围困、政治攻势下，下级官兵逃跑成风或向我投诚。敌辉县特务营官兵，不到半月就跑光了；合河镇长李鼎文于 1948 年 11 月率全镇武装 80 余人携机枪 4 挺、步枪 60 多支，投向解放区；保一旅大队长谢贞绩率部携枪支弹药于 1948 年 12 月向我投诚；1949 年元月份，第十二绥靖区勤务营、保一旅一团各数十人，携带机枪和长短步枪先后向我投诚。还有一些零散官兵携枪投诚。都受到我解放区军民欢迎。

四十军三一六团的起义，对敌人内部震动最大。三一六团是四十军的主力团。团长庞庆振是最早的四十军军长原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的儿子，军校炮科毕业。庞炳勋投降日本后，庞庆振担任过伪警备旅长，年轻傲气，是四十军少有的少壮派，有他爸爸的关系，四十军的军师领导对他都另眼相看。其出身地位，又决定了他的反动顽固性。顽而不固，最后还是起义投诚，走向了光明之路。

三一六团也曾经受过邯郸战役、大别山之战两次重大歼击，在历次战斗中不少官兵被俘，教育后释放，但在庞庆振的反动教育统治下，部队还是有一定的战斗力。八里营飞机场的争夺战，三一六

团给我军造成了一定的伤亡。这次战斗庞庆振因擅自调动城内守军,不仅没有邀到功,反而遭到代师长赵天兴的训斥,庞愤愤不平。

1948年12月份,我军某部四五百人,刚移住大召营西南某村,即被敌便衣谍报察觉。敌计划以3个团的兵力并配属搜索营,野炮营想吃掉我这支部队。三一六团是主攻团,庞庆振夸下海口:“要看我的”“要为党国和四十军建立战功”“明天听胜利消息。”他万没想到美好的愿望,又彻底破产。敌人的偷袭阴谋,情报连夜送到我领导机关,部队夜12时安全转移。庞团扑空以后迅速回撤,沿途又遭我小股部队侧击,受到伤亡。庞回到城里,既失望又恼恨,屡遭失败,再加全国形势急转直下,反动顽固立场开始动摇。庞庆振的起义,徐绪景(人称徐小姐)起了一定作用。正当庞犹豫徘徊,烦乱苦闷的时候,突然接到徐绪景的信,徐是庞早年同学。徐的父亲徐世芳是北洋军阀徐世昌的堂弟,和庞炳勋是结拜兄弟。徐绪景是军统特务,1944年底在太南被我解放军俘掳。经晋冀鲁豫社会部漳河训练班的长期学习,愿意为人民做事。1948年3月,我豫北办事处派她到汲县敌区做特情工作。汲县解放后,又利用她去做庞的策反工作,让徐借用卫辉市委的名义策动庞庆振起义,经徐牵线庞与我七十军取得联系,几经往返,庞决定乘机率部起义。

1949年元月中旬,呈请批准“东进征粮”,除三一六团外尚有三一九团等其他部队,下旬离开新乡向东北方向进发,我七十军派部队策应。三一八团团长沙维俊中途感到情况反常,率部折回,遭我七十军拦击。三一六团等长途行军,队伍逃散不少,到道口附近,剩2500余人,正式宣布起义,加入人民解放军行列。

自庞庆振率部起义后,新乡敌人内部更加慌乱,化装南逃,或向我投诚者日益增多。

1948年底,敌特曾策划破坏电厂、面粉厂和车站等重要建筑设施。由于我向敌军首脑提出严重警告,未遭大的破坏。

国民党四十军原是西北军,是庞炳勋发家的资本,蒋介石虽多

次收买利用它,但一向受排斥,属于杂牌军,吃不开。这支封建式部队,抗日战争以前,多次在河南的新乡、南阳一带驻防,因为还有冯玉祥将军西北军的传统,部队军纪和声誉还好。抗日战争期间,台儿庄战役,四十军守临沂城,表现还可以。1943年3月,日军进犯驻林县以南的国民党第二十集团军,孙殿英投降,庞炳勋被俘,四十军调黄河以南,日军这次进攻,受到四十军阻击;1944年5月,日军进犯郑州、洛阳,汤恩伯几个军一触即溃。四十军还是打了一下。总的来说,这个部队还有一定的战斗力。解放战争当中,曾两次被我军击溃,加上平时战斗中被俘过的官兵,占其部队数量的很大比重,有的下级官兵多次领过我释放证,对我党我军政策比较了解,加上抓的新兵数目很大,部队的战斗力,远非昔比。

1948年10月,郑州第一次解放时,四十军军长李振清在黄河岸负伤。1949年初离开新乡去南京。第十二绥靖区和四十军的工作由副军长李辰熙(旭东)主持。李辰熙河北高阳人,保安军校毕业,一直在四十军任旅、师、军参谋长,邯郸战役被俘释放后任副军长,对我党我军政策了解。

四十军驻安阳的第三十九师(缺一一五团),扩充为军,投入淮海战场后被我们歼灭。新乡守敌在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情况下,苟延残喘,垂死挣扎。

天津解放后,原四十军副军长刘世荣两次写信给李辰熙,晓以大义(刘是李旅、师、军的直接上司);华北解放军总部曾派原国民党军长范龙章到新乡,住在鲁定华的成兴纱厂内,做李辰熙及其上层人事的工作。

李辰熙支撑新乡残局时,曾多次以第十二绥靖区名义,召集党、政、军、特首脑会议,商讨对策。特务头子魏鸣钧、牛平章以及张敬忠这些人的反动立场是鲜明的;地主武装头子王三祝对我们有刻骨仇恨;(后企图到太行山打游击,被我阻击退回安阳)四十军的动态,特务机关随时都向南京国防部电告;李振清负伤后去南京,

四十军仍受南京的庞炳勋、马法五、李振清遥控。这些，都是李辰熙摇摆不定的主要因素，总之，大局已定，但投降条件和时机在李辰熙看来还不成熟。

平津战役结束后，由程子华司令员、肖华政委率领的四野十三兵团南下，决定在南下过程中由四十二军攻打安阳，四十七军解放新乡，军长梁兴初，政委周赤萍，4月底率部到达新乡城郊，和华野七十军将新乡守敌包围，采取“围而不打”的方针，争取和平解放。当我大军南下途中，4月23日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解放；4月24日，我军攻克太原；5月1日，大同守敌不战而降。华北全境，只残留安阳、新乡两个孤立据点。

新乡的和谈工作是在我十三兵团政治部主任刘道生和四十七军首长梁兴初、周赤萍具体部署下进行的。由我炮团副团长冉影（李辰熙的表弟）做劝降工作，并派军部侦察科长李希才随冉影同志在部队南下前先行一步，他们到达新乡前沿阵地，见到七十军政委甘渭汉，随即以冉影个人名义给李辰熙一信。李接信后怕特务得知，一面封锁消息，一面派亲信将冉影接到李的办公室密谈。冉向李讲明形势，指出只有接受和平改编，才是一条光明出路。李辰熙仍有顾虑。冉及时向首长们汇报情况后，又反复讲明利害和优待政策，李辰熙才派代表赵天兴出城向我军求和。

1949年5月4日，在新乡城北我四十七军军部驻地陈堡镇，正式举行和谈签字。我军出席代表有刘道生、梁兴初、周赤萍、甘渭汉等。国民党代表有四十军代军长李辰熙，政工处处长杨博仁（？）等。

5月4日晨，李辰熙把国民党新乡各界代表人物召集到一起，有商会会长原芝生、副会长张绍夏、邮政局长陈肇烈、电信局长韩东海和大中日报社社长刘炳华等十数人，讲明情况，决定放下武器，走和平解放的道路。接着由冉影带路乘车前往陈堡，受到我军热烈欢迎和款待。

和谈内容主要是我军事前拟定的《关于处理新乡国民党守军的协定》。协定共分两项,每项6条,主要内容是:国民党四十军官兵开出城外,听命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政工人员撤离部队;地方武装开赴指定地点,放下武器,人员听候处理;不得有任何骚扰行为;对所有建筑、物资、档案,不得有任何破坏和转移、隐藏,应完好无损地移交人民政府或解放军;所有党政机关人员应切实登记,听候处理;保证四十军人员生命财产安全,参加人民解放军者与解放军同等待遇,返回原籍者发给3个月原薪,开给证明。

李辰熙等接受条件,同意签字。当天下午2点15分,双方代表在协定书上签字。我方设宴招待四十军及各界代表。李辰熙提出要去北平养病,我方同意他的要求;李又提出让冉影进城帮助他执行协定,我方亦同意。当天下午李等返回城里,随即召开连以上军官会议,宣布和平协定书,部队当即按指定地点撤出城外。除当夜留在城里的留守人员及少数散兵,彻夜对天鸣枪以外,没有发生其他骚乱。

5月5日上午,我解放军举行入城仪式,接受改编的国民党四十军官兵共计1.6万余人,其中军官2100多人,士兵1.4万余人。携带武器:榴弹炮12门,野炮5门,曲射炮3门,化学炮2门,战防炮4门,迫击炮12门,六0炮51门,掷弹筒113个,重机枪70挺(不包括库存),轻机枪437挺,冲锋枪224支,骡马671匹。

国民党地方武装,指定到新乡西南十公里的岗头,由华北七十军受降。地方土顽4000余人,除一部按指定地点放下武器外,大部分于3至5日夜,乘我南部一时防备不严,突围向原阳一带逃窜。

新乡解放的翌日—5月6日,我四十二军攻克安阳。至此,华北全境宣告解放。

5月10日,我四十七军离开新乡,继续向南进军,接管工作由地方党政军进行。

五、接管工作

了解情况不多，提不出意见。

几点说明：

1. 受征求意见稿启发，在很仓促的情况下提供上述草稿，仅是做了些补充和修改（仅供参考）
2. 解放军入城仪式是6月5日（不是6日）
3. 庞庆振不是代理团长，投诚时任“东进纵队”司令，没听说过。
4. 魏鸿钧向我投案一说，确否？
5. 征求意见稿，有些敌军数字偏高。（歼灭，投诚等）
6. 王三祝张敬忠是保二旅和保一旅，第九第十纵队在印象中已模糊。
7. 1948年12月40军奉命南逃之说不了解。当时有调淮海战场之说。四十军的39师调去被歼。
8. 莫博仁，没听说过此人，当时政工处也不叫主任。处长杨博仁，（姓完全可靠，名字不一定准确）
9. 我当时主要是搞军事情报工作，其他方面了解情况不多。

对敌伪顽斗争的回忆

马一鸣

一、水东地区的环境和基本情况

1940年1月至1946年1月,我在水东地区工作。水东地区处在陇海铁路和新黄河交叉狭小的三角地带和敌伪顽夹击中,是战略要地,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联系的枢纽。水东地委下属睢县、杞县、太康、通许、陈留、淮阳、鹿邑、柘城、宁陵、民权、兰封等县。在党的组织方面,除地委组织外,睢县、杞县、太康、淮阳、民权、通许等县有县委组织,有的县有区委、支部和地下党员。在军队方面,有独立团、县大队、区队和联防队(后改民兵组织)及办事处、警卫连等。在政权方面,有水东办事处,有县办事处和区分会(即区政权),在我们经常活动的地区建立了革命的两面派村政权。在群众工作方面,地委下设民运部,独立团政治部设有民运股,及党政军所有干部都采用流动办法作工、农、青、妇工作。以上县城和主要集镇都住有日本人或汉奸。黄泛区(即新黄河里边的村庄)都住有国民党的正规军和顽专署、顽县政府机关及地方武装。当时我们是以杞县、睢县、太康、通许、民权为活动中心,由于我们活动地区狭小和敌伪顽不断向我们进攻。我们处在敌伪顽夹击中,因敌强我弱,斗争残酷,无法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我们长期处在分散的游击活动环境中,在最紧张的时候,在高粱地里活动和一夜住两个宿营地或分散隐藏在一家一房住。党政军穿的是粗布衣,吃的是派饭,冬天睡草窝,夏天席地而卧、走路是靠自己的两条腿。以上就是我们在水东地区所处的环境和基本情况。

二、我们是怎样对敌伪顽进行斗争的

我们根据上级指示精神,要保住这块战略要地和采取隐蔽发展的方针,水东地委对敌伪顽斗争采取了以下几种办法:

1. 党的建设

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加强党的领导,以保证对敌伪顽斗争的胜利。在地委领导和帮助下,除睢县、杞县、太康、淮阳、民权、通许等县建立了县委,区委和支部组织外,鹿邑、柘城、宁陵、兰封等县也发展了地下党员,没有建立县委、区委组织。水东地区在上级党和水东地,县委领导下,取得了对敌伪顽斗争的胜利。

2. 武装斗争

(1)以水东独立团为主,结合各县县大队,区队和联防队(即民兵),对敌人进行分散的游击战争,必要时集中力量打击和消灭敌人。

(2)宣传教育群众(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宣传将来要建立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新社会和结合当地具体事实揭露敌伪顽的罪恶和旧社会的黑暗,教育群众帮助新四军有利于抗日工作和搞好农副业生产等)。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组织联防队配合部队对敌伪顽进行多种多样的斗争)。动员群众参军扩大武装力量,保家卫国。

(3)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得到了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常说:“得人者昌。失民者亡”,这是我们能够在敌伪顽夹击中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

(4)组织武工队打击敌人,武工队穿便衣带手枪,在城市、集镇和农村活动,除了侦察敌情外,专门打击敌伪顽危害群众、危害新四军和新四军家属的人。使敌伪顽不敢轻易危害群众、危害新四军和新四军的家属,除掉了参加革命的人后顾之忧。

(5)挖路。我们在平原地区打游击,必须挖路,以阻止敌人的

汽车和马队快速前进，以便打击和消灭敌人，保存自己。

(6)建立秘密联络站。因为敌强我弱，我们采取分散的游击活动，为了便于对敌斗争，必须建立秘密联络站，以便我们内部通讯联系和传送情报，有利于工作，有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和消灭敌人。

(7)枪支弹药和医药的补充。一是打击和消灭敌人缴获；二是通过各种关系从敌伪顽方面购买；三是以物换物的办法解决，如用缴获和没收的毒品等物换敌人的枪支弹药和医药等；四是抓获敌人或坏人，以人换物充实自己的力量。

(8)关于治疗和保护伤病员的问题。我们的医院采取隐蔽分散和流动的办法，治疗伤病员，在情况紧急的时候，把伤病员送到地主士绅或保甲长家里，暂时躲藏保护起来，因为他们都和敌伪顽方面有关系，我们允许这些人作革命的两面派，因为我们是处在游击区，敌伪顽都可以到他们村子里来，不允许他们作革命的两面派他们也无法存在。有时也请专科医生和有秘方的人，给伤病员看病。

(9)封锁消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在游击区宿营必须封锁消息。封锁消息，采取两种办法：一是部队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先派一部分包围村庄，以免走漏消息，然后部队再进村庄，管理人员小声分别把门叫开，根据房子情况再分头进去休息。从封锁消息起，只准人进村，不准人出村，到太阳快落的时候才放行。天明派便衣战士在村外伪装老百姓干活，一方面向远方了望监视敌人，另一方面迷惑麻痹敌人。二是在敌人扫荡最紧急的时候，就分散为班和排为单位，天黑人都睡了觉的时候，到地主士绅或保甲长家，使人轻轻跳过墙去，把外门开开，人进去再把外门闭上，小声叫开房门，说明在他家躲藏一天，就是敌人到村里，他也不敢报告给敌人，敌人走了，天黑没有人的时候，部队再集合起来进行活动，连村里其他老百姓也不知道村里住有新四军。

(10)敌工工作。除了公开的党政军和专门作敌工工作的同志作敌工工作外，还有地下党组织敌工工作。我们作敌工工作主要采

取以下几个办法进行工作：一是弄清敌人方面的情况和情报工作；二是利用与敌人有亲朋关系的人，争取和瓦解敌人；三是利用敌人内部矛盾，各个击破；四是党政军直接给敌人写信或给宣传品对敌人进行政治攻势，叫他们认清形势和后路，使他们认识共产党必胜，敌伪顽必败和得人者昌、失民者亡的道理，使他们作一些有益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工作。给他们立功赎罪的机会。在敌工工作方面，我们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把韩达生从汉奸那里营救出来，就是一个明显的成绩之一。敌伪顽几次向我们大的进攻和扫荡，我们都事先得到了情报，如顽军进攻聚台岗时，我们事先得到了情况，我们有准备和安全的退出了聚台岗。1940年麦黄的时候，我们部队住官庄附近的一个村庄，准备在那里休息开会，顽专署知道后，便集合队伍，准备向我们进攻，日本人也知道我们在那里休息开会，也调动了部队准备向我们进攻。双方面向我们进攻的情报我们都得到了，为此我们便大张旗鼓地宣传我们要开大会，恰巧顽专署的队伍已出动向我们住村进攻了，日本人也赶到了向我们住村进攻，我们已事先转移了，就这样日本人和顽专署的队伍碰头打起来了，打的顽专署的队伍溃不成军，死尸遍野，战斗结束后，我们又回原地看了一下，真是惨不忍睹，这也是顽专署打内战的下场。1940年6月敌伪向我们扫荡一个礼拜和1943年春唐克威到水东敌人扫荡杞南等我们都事先得到了情报。

(11)党政军各级领导和战士与工作人员在对敌伪顽斗争中的衣食住行问题。除独立团有时穿灰色军装外，其他一般的都是穿粗布便衣。我们在游击区活动，因为流动性大，一天一个或两个宿营地，夜里行军之后，拂晓到一个新的宿营地，需要休息，因为白天还要准备打击来犯的敌人，不便于自己做饭吃，因此每到一个村庄，由保甲长根据各家贫富情况给我们派饭吃，富一点的多管几个人的饭，差一点的少管几个人的饭，贫穷户就不派他的饭吃。送好吃好，送坏吃坏，不准乱吃别人送的饭，这是一条纪律，采取合理负担

的办法派饭吃，群众满意，毫无怨言。1940年春，躲敌人扫荡到黄泛区和1942年冬1943年春过灾荒年的时候，麦苗、高粱皮、花生皮、杨花、棉籽、谷糠等我们都吃过，有的吃了拉不下大便来，因为没有被子盖，冬天都是穿着棉衣睡在被窝里，夏天借老百姓的薄席等在院子里席地而卧，早晨起来送还借的东西，坏了要赔偿损失，帮助群众挑水，打扫卫生和作其它一些家务劳动活，我们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结果，得到了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党政军各级领导和战士与工作人员都是靠自己的两条腿走路，一般的没有牲口骑。上级规定每人每月五角钱津贴，由于经济困难都没有发过，我在水东地区工作六年，没有吃过瓜果梨枣，没有用过牙刷牙膏和肥皂，以上是水东地区党政军所有人员在敌斗争中衣食住行的情况。

3. 政权建设

1941年秋，为了配合部队镇压和打击敌人，维持社会治安，实行合理负担，保证党政军供应和处理行政事务等，地委决定先建立了水东办事处，以后又先后建立了杞南、杞北、通许、睢县、太康等县办事处，有的县还建立了区分会（即区政权组织）用合理负担的办法，征收粮、布、款供应党政军所有工作人员，各级政权建立之后，在对敌伪顽斗争中和保证供应等各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4. 统战工作

党政军各级领导和所有工作人员利用各种关系都作统战工作，因此各级统战工作都获得了不同程度的成绩。地委和独立团与办事处首先作上层人士的工作，如孟三老四、孟海若、胡国斌等人的工作，使他们靠近我们帮助我们，作一些有益于党、有益于人民的工作。其次是作地主士绅和保甲长的工作，使他们不死心塌地倒向敌人一边，让他们作革命的两面派。再次就是作顽军和国民党各级政府的工作。向他们说明大敌当前，应共同抗日，挽救国家危亡，应互不侵犯和打内战，我们既作争取团结工作，对顽军向我们进攻也作了有理有利有节坚决的斗争，因此，我们在统战工作方面，也

获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抗战也是有贡献的。

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和我们所处的环境与自己的情况,从以上 4 个方面对敌伪顽进行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保住了水东地区这块战略要地,发展和壮大了抗日战争和反顽斗争的力量,打下了抗日战争和反顽斗争胜利的基础。

以上是我在水东地区工作期间,对敌伪顽斗争的初步回忆,如有不当之处,请指正。

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的覆灭

高千钧 杨志勇 段峰岭

一个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国民党的国防部绥靖纵队直属第三中队第十组(番号 4364 部队),于 1948 年春从洛阳(已解放)迁到新乡。其主要任务是搞我们的军事情报,监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以及破坏我地下党组织和我解放区,搞暗杀行动,活动范围是新乡市和市周围各县(大部分县已解放)。

该特务组织到新乡后,其组织编制和人员情况是:组长李延海,副组长李再臣。下设一个交通站,一部军用电台,一个行动队,三个情报组,三个潜伏组(潜伏在市周围各县),一个办公室,共计 52 人。其中基干(正牌)特务是少数,多数是杂牌。交通站长秦安民,电台台长张庆温,内勤孙自立,行动组长方世贤,情报组长靳秉仁、莫武、李兴初。基干特务都发有巴朗宁手枪,杂牌特务有的也有自备手枪。

我们三人是这样打入该特务组织的。1948 年春,太行五地委城工部(彰南办事处)派到敌区的党员高千钧,在新乡偶而遇见旧同学(日伪时期同学不同班级)秦安民(原系该特务组织副组长,后为交通站长)。经与冀鲁豫八分区(八地委)敌工部情报员杨春堂(高、杨二人是同乡、同学、朋友)商量后,就主动和秦安民接触来往。5 月初,高向太行区五地委城工部敌区党支部书记王汉华汇报,后来杨也向冀鲁豫四地委敌工部李清泉汇报。经批准后,高、杨二人于 7 月 1 起打入该特务组织(高千钧改名为高志荣,杨春堂改名为杨志勇)。为加强我们的力量,冀鲁豫四地委敌工部李错禄同

志,于8月又派段清同志来新乡,我们通过秦安民又把段清打入该特务组织。

我们三人打入该特务组织后,作了如下几件主要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一、我们首先取得了敌人信任后,把我们都编入交通站当交通员,站长是秦安民,三个交通员全是我们。这样我们就全部控制了交通站这个部门。交通站的任务,主要是向他的上级、“兄弟”组织、内部各部门各组织联系,通情报,自己也收集情报(由冀鲁豫区党委新乡敌工站主任唐纪同志供应假情报或过时的情报)。由于取得了敌人的信任,李延海又看到段清同志老实“可靠”,勤勤,于9月把段清要到了李延海办公室当勤务兵(此事当即向唐纪同志汇报同意)敌人的机要文件、情报材料、电台都放在办公室。这样我们就掌握了特务头子李延海的一切活动和办公室的所有情况,敌人内部组织编制情况,敌情交流情况,人员来往情况,电台收发电文内容等等。

二、由于把段清同志打入了特务头子办公室,很快就了解到该特务组织的机要文件、情报材料、组织编制人员名册存放地方。10月有一天乘李延海和电台台长外出机会,由段清在院看人,由高千钧在屋偷抄,没用半个小时,就把该特务组织的全部组织名单抄完。当时该特务组织已发展到40余人,设一个交通站,一部军用电台,三个情报组,三个潜伏组(注有组长姓名、潜伏地点)。抄出后,当天晚上高千钧即用软铅笔写在一本《上论语》的背面(双层纸),第二天早晨即让段清送到敌工站(在新乡南30里小冀镇)交给唐纪同志。

三、多次及时地向我敌工站、新乡市公安局(也在小冀镇)汇报,提供敌四十军军事情报和新乡市特务组织活动情报,提供了敌四十军三个炮兵阵地地图的情报等等。

四、1948年秋,李延海派杨春堂同志到郑州(已解放)与第三

中队郑州潜伏组(小小烟酒店)联系后,杨随向住在郑州的我冀鲁豫四地委城工部郭自清、陈桂凡同志汇报,不久该潜伏组即被我郑州公安机关破获。

五、1948年10月,李延海派杨春堂去武汉与绥靖第六大队联系时,把李延海写的请示和汇报的新乡敌军动态、特务组织活动情况及其他重要情报,都首先到开封(已解放)让冀鲁豫区党委开封办事处(即城工部)李清泉等同志看阅和摘抄后,再送到武汉。回来时把第六大队特务头子给李延海的指示、武汉敌特情况等也首先到开封向李清泉汇报,然后才回到新乡向李延海汇报。这样,新乡、武汉特务的上下级组织双方的情况,都首先到了我们的手里。

六、1948年4月底,李延海听到新乡要和平解放时,随向宁波他们的上级特务机关写电文,说四十军要投降,要求立即派飞机来轰炸新乡(他们对军队的监督的任务)经段清同志向电台台长张庆温作说服工作(他全家住在新乡),说明飞机轰炸与他全家的利害关系,没有把电文发出去,但向李延海报告已经发出。

七、新乡解放前夕,即1948年4月底,由于新乡将要和平解放,李延海害怕敌四十军把新乡特务组织交出来,就首先要机要文件、情报材料全部烧毁,让段清把电台埋起来,把手枪交给敌四十军一军官给藏起来。这一些处理之后,就让段清与他一赴南逃,经过小冀镇时,由段清向我军报告,逮捕了李延海,部队又把李延海交给新乡市公安局(住小冀镇)。新乡刚解放,段清同志随即回新乡报告市公安局缴获了电台和手枪。

八、新乡和平解放前夕,交通站长北逃安阳。安阳解放后,随被高千钧同志找到(混入叶县教师训练班),立即向叶县(现又归安阳县)公安局报告。经高千钧、杨春堂与叶县公安局侦察科长共同商量,把秦安民交给叶公安局暗地监视起来,以“放长线钓大鱼”(当时叶县的特务活动很活跃)。1950年春,安阳破获了一个庞大的特务组织“豫北剿共司令部”(下设八大处)。据我们了解,副司令姚鸿

钩原是秦安民在洛阳时发展的特务，二人在洛阳、新乡来往都很亲密。所以监视秦安民与破获“剿共司令部”，很可能有关系。

行动队长方世贤、内勤孙自力也在新乡解放前夕逃跑，经段清同志提供地点，后来也都被公安局找到并作了处理。

从1948年7月到1949年5月，仅仅10个月的时间，这个军统特务“第十组”即被破灭，并全部结了案。

湖西军分区几次情报工作会议情况

刘存忠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间，形成了湖西根据地，湖西区位于津浦铁路以西，陇海铁路以北和济荷公路之间的曹县、定陶以东的三角地带，包括苏北的沛县、丰县、铜北、砀北、鲁西南之单县、金乡、鱼台、城武、巨野以及河南的虞城一部地区。这一地区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抗战期间是国民党反动派向我山东进攻的门户。于学忠、李仙洲等都曾率大军侵扰过我湖西根据地，也是我党中央与山东、华东联络的重要通道。刘少奇、陈毅同志和大批干部去延安，往返都是经过这里。抗战期间，敌人为了确保津浦、陇海两大铁路大动脉的安全，并堵死这个通道。在徐州、商邱、济宁都住有重兵，为了控制这一地区，曾集中大军进行数次大扫荡，日伪军的据点碉堡、封锁沟布满全区。

解放战争期间，湖西地区又是蒋军进攻解放区的重点地区之一。蒋军号称五大主力(军)其中有两个军(新五军、整11师)长期窜犯在湖西及其周围地区。龙凤、金乡、鲁西南等几次重大战役都是在这一地区进行的，我军几次破袭陇海路都是以湖西区为依托；刘邓大军跃进大别山区，陈粟大军挺进豫皖苏地区，都是以湖西根据地为跳板，越过陇海铁路的。

不论在抗日战争或解放战争中，湖西区的斗争形势，都是非常尖锐复杂。特别是和两支土顽的斗争时间更长，也更为残酷。近10年，被其杀害的党员干部和基本群众何止万人。

一是以冯子固(沛)、张开岳(沛)、吴品山(鱼)、耿继勋(聋子

铜)、黄体润(丰)等为首的苏北土顽,其兵力有万余人,在各界有深厚的社会基础,一次两次打击歼灭后,他又很快地发展起来,与我军磨擦斗争达10年之久,直至淮海战役开始后,才被彻底消灭;另一股是以朱世勤、曹班亭、时锡九等为首的鲁西南土顽,为国民党山东十一专署部队,名曰“七路”。这股土顽在单县地区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比苏北土顽要弱,但也是经过多年的斗争和数次战斗才将其消灭的。

由于湖西地区战略地位重要,斗争形势尖锐复杂。在敌强我弱四面受敌的环境下,为了战胜敌人,立于不败之地,加强情报工作是非常必要的。

1942年冬季,敌人由徐州、开封和山东、济南集中了两万多兵力,对我湖西根据地实行拉网大扫荡。由于我情报工作薄弱,事前没得到消息,党政军民没有作反扫荡的准备和布置,根据地军民,在这次大扫荡中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党员李贞乾等数名领导干部壮烈牺牲,对根据地的震动是非常大的。

大扫荡后,湖西地委和军分区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教训,作出了加强情报工作的决定,加强了各县情报站的建设和领导,并重视了各战略据点的情报工作。1942年底,湖西地委决定成立徐州地下工作组,派李冰、王家襄、闫振华、裴盛德等同志打入徐州;同年,军分区派丁富亮等同志到微山湖建立徐州战略情报站,各地地下党委派往敌区的工作人员,都有搜集敌人情报的任务。由于加强了情报工作,情报来源多了,对敌人大的动向基本上能掌握。如1943年秋,敌人又纠集了开封、商邱、徐州和附近各据点的兵力数万,在飞机配合下,再一次对我湖西根据地进行大扫荡。由于我事先掌握了敌情,作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所以遭受的损失就很小。

湖西地区的情报工作在党委重视和领导下,在广大人民群众大力支持下,是有很大成绩的,1948年冀鲁豫军区召开情报工作会议。分区情报总站站长袁文超同志参加了会议。在大会上,军区

刘致远司令员表扬了湖西军分区,说全军区情报工作做的最好的是湖西军分区,其次是第五、第七军分区。

我是1944年秋,我军东进讨顽战役胜利后,由地下党徐北中心县委推荐,任湖西军分区沛铜情报站站长,后调军分区情报处任情报参谋,直至1948年冬全区解放。在此期间,湖西军分区召开过四次全区性的情报站站长会议,我参加了三次,对几次会议的主要情况,回忆于下:

第一次会议是1945年初在单县东孙小庙军分区驻地召开的。当时的形势是:经过1944年下半年我军东进、西扫,苏北和鲁西南土顽主力,已基本上为我歼灭,残部龟缩在徐州以西靠近陇海铁路线上,靠近日伪军各修据点,保存力量,各县正面之敌,主要是日伪军,在军事上,我军已变为主动。

会议由军分区参谋处长李静同志主持,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潘复生都到会讲了话,参加会议的人员有军分区司令部侦察股长李大中;情报总站站长张北辰;各县情报站长有:砀山情报站站长虞唤民,丰县情报站站长陈雷,沛县情报站站长王益民,华山情报站站长袁文超,沛铜情报站站长刘存忠,鱼台情报站站长宋哲,金乡情报站站长孙标、王子文,单县情报站站长时克堂,单虞情报站站长许育之,巨南情报站站长郑振华等。

会议首先学习了毛主席整风报告有关文件,以整风精神作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了思想提高了政治觉悟。

总结工作,吸取了经验教训,通过情报活动中的典型事例介绍,启发与会人员的业务水平。

会议共进行了一周,最后由情报总站站长张北辰同志根据形势和上级的指示精神布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1、各县情报站认真掌握本县日伪军的动态,监视敌人的活动,紧急情况,先报告附近的部队,以便相机打击之,并加强与情报总站的交通联系;

2、将县城及所属据点的工事构筑、兵力配备等绘成详图，限上半年上报分区，为大反攻做好准备；

3、加强徐州和陇海铁路沿线的工作，掌握铁路运输情况，为配合盟军反攻作准备；

4、加强土顽的工作，特别是苏北土顽，要加强监视。

会议后，各县情报站根据这一布置很好的完成了任务。如1945年7月初，得到了丰县日军撤走的情报，我军分区主力十团，进行长途奔袭，一举攻克丰县城，歼灭了汉奸和刚投敌当汉奸的顽军廖伯仁部。这也是抗日战争中，我湖西区解放的第一座县城。同年7月中旬，在沛县西南罗安子战斗中，我12团一举歼灭淮海省伪军郝鹏举部一个主力团，活捉师长乜廷宾，粉碎了敌人稳住沛县，收复丰县的企图。这些胜利都和及时得到准确可靠的情报分不开的。

第二次会议，是1946年初，在丰县城内南关召开的。

当时的形势和情况是日本投降后，湖西除沿陇海铁路边沿地区外，已全部解放，国民党反动派一面积极派重兵进抵徐州，并向陇海—津浦两铁路线扩展，名曰受降，实为进攻解放区作准备。另一方面，与我进行假和谈，以掩护其进攻解放区的阴谋。各县土顽仍猬集在陇海铁路线上，都在招兵买马，积蓄力量，并扬言要打回各自的县城。特别是苏北土顽，铜顽耿继勋部，尚有三个多团的兵力，正加紧备战，蠢蠢欲动。

日本投降后，随着县城的解放，境内已无敌人。今后解放区的任务，主要是经济建设，这种思想，当时是大有人在的。各县情报站撤销，情报干部改行，全区仅保留了沿陇海铁路线，沛铜、华山、砀山、单虞等四个情报站。另一方面，党中央对敌人的和谈阴谋是有所警惕的，军区加强了对情报工作的领导，从组织上、机构编制上，予以扩大和增强。军分区司令部编为三处九股，参谋处、情报处、军政处，三处平行分开。情报处设情报、侦察、内勤（整理）三个股，从

而加强了领导和人员的配备。

会议由军分区副参谋长罗林主持，军分区副司令员戴元仁、副政委廖亨禄都到会讲了话。参加会议的人员，有边沿部队的团、县大队的参谋长，各县情报站长。计有军分区情报处主任虞唤民，情报股长袁文超，九团参谋长陈绍清，华山大队参谋长朱敦诰，沛铜情报站长刘存忠，华山情报站站长刘培生，砀山情报站站长时克堂，单虞情报站站长许育之等。（上述两县大队参谋长也参加了会议，名字忘记了）。

会议首先学习讨论了形势，统一了认识，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不让八路军投降，我们虽然和国民党进行了谈判，和平有多大希望，并没有把握，眼前看到的是：敌人正在调兵遣将，拼命的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反动派大军源源不断的向我区周围开来，并占据了交通线和大城市，更为突出的是国民党土顽，对根据地经常进行小股窜扰，全区差不多每天都有基层干部、共产党员和基本群众被杀害，所以我们不能和平麻痹，必须提高警惕，要加强对敌人的了解，并作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准备迎接粉碎敌人可能的进攻。会议进行了五天，由情报处主任虞唤民同志布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根据冀鲁豫军区的指示，湖西军分区负责徐州—朱集（商邱）沿陇海铁路线之敌情掌握。军分区情报处直接掌握徐州和商邱两据点的战略情报。各县情报站的任务是：沛铜情报站，徐州和新围子，及其周围地区；华山情报站，黄口—李庄车站及新围子地区；砀山情报站，砀山—马牧各车站及其周围地区；单虞情报站，商邱—朱集和虞城周围地区。

加强现有情报站的力量，根据形势发展，恢复或重建一个情报站，改行的情报干部，业务熟悉者，调回一个到情报部门，会议结束后不久，原金乡情报站长王子文同志已改行后勤工作，又调回任沛铜情报站站长。到了夏天，重建沛县情报站。

工作要求：对现有情报关系，加强教育，以适应形势的转变。过

去主要敌人是日伪军,现在是国民党反动派。过去是民族敌人,现在是阶级敌人,情报人员要很快的转过弯来。以便能在新的条件下,坚持下去。

日本投降后,原在敌区的情报人员,已回解放区做公开工作,时间不长,又目标不大,而在敌区有可靠的关系作依靠,可重派回敌区,如沛铜站的赵品阶同志,就是在此期间,重回敌区的。

在国民党正规军高中级干部中,发现有与当地群众、我党政干部中,有这样和那样的关系。要积极了解线索,从中物色对象,进行教育训练,打入敌人内部去。如周庆祿(超)就是在会议后,由分区情报处去信派往徐州的。

除大量的、多方面的、作好派出人员的工作,同时要加强秘密交通的建设,一旦形势紧张,能保证及时得到敌人的情报。

会议结束后不久,国民党正规军已在徐州和两大铁路线展开,整八十八师方先觉部布防于徐州以西地区;整二十八师李良荣部布防于徐州以东地区;整五十八师鲁道源部布防于徐州以南地区;九十八军王毓文部防于徐州以北临城一线。敌人吞占解放区的阴谋,已暴露无遗。1946年春季,土顽对根据地的窜扰人员和次数都增多,并到沛县北和丰县东北地区,拉夫抓人杀人。4月间,铜山县顽军耿继勋部派李乐文团1000余人到丰铜边的草楼安设据点,被我主力部队七纵攻克歼灭。6月间,国民党反动部队围攻我中原解放区,我加强了陇海铁路沿线的重要地方、工事构筑等调查了解。8月间,我军破袭陇海铁路后,蒋军大举进攻我湖西解放区,我军被迫北撤到巨野西南一隅,进行游击活动。湖西军民进入最困难的时期,情报工作遇到了严重的危机。

旧历8月中秋,我九团由沛县北撤到微山湖东,沛县、沛铜两县情报站随两县工委一同撤退到湖东。当时我正在沛铜地区布置徐州的工作,同时随撤退部队到达湖东。正巧,分区情报处刘毓华同志来鲁南执行任务,我们一起,沿湖而上,通过敌人刚占领的地

区,返回军分区。

10月间,分区派袁文超(当时在金乡南隐蔽)、侦察参谋王继恭、情报参谋刘存忠、单虞情报站长许育之、砀山情报站长时克堂,带侦察交通员10余人,由巨南到丰、单、金、鱼边区坚持开展情报工作,在敌人反复清剿下,许育之同志被敌人捕捉杀害,壮烈牺牲,时克堂叛变投敌,剩下袁、刘、王三人,又在敌人围捕中跑散,展转在敌区近3个月,才绕道返回军分区。

北撤期间,华山情报站站长刘增生开了小差,所以各县情报站有的瘫痪瓦解,有的离开本地区,不能发挥作用。原有的情报工作关系,大都中断了联系。有的是在观望,多数是想联系而没法联系。

1947年春,虽在敌新五军等部反复拉锯和不断清剿下,我军分区部队仍回单县以东地区(老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到了夏天,形势已初步好转,根据上级指示和斗争需要分区机关已撤销了情报处,改为侦察股,虞唤民同志任股长,刘毓华同志任副股长。同时重建了情报总站。袁文超任站长,王忻任政委,黄杰任副站长,我当参谋,在单县东南候楼一带活动。随着形势的发展,各县情报站也逐步的恢复和建立起来。老情报关系得到了恢复,新的关系又发展起来。到了1948年,形势就更好了。

第三次会议是1948年秋季在单县东杨庄情报总站驻地召开的。军分区副参谋长余克勤主持了会议,分区司令员王根培到会讲了话,参加会议的有总站站长袁文超,政委崔孝堂。砀山情报站站长吴继观,华山情报站站长李性克,丰县情报站站长袁西成,袁西纯,沛县情报站站长李克俊,鱼台情报站站长胡守义、柏连溪,金乡情报站站长邵进步,金巨情报站站长杨清平,成武情报站站长王伯约,单县情报站站长李遵杰,单虞情报站站长高显臣,虞成情报站站长赵金城,情报总站参谋刘存忠、王鹏飞等。

会议期间,与会人员到地委驻地,听了军分区政委陈璞如作的形势报告。通过学习讨论,提高了认识,树立了胜利信心。当时正

处在济南战役前夕，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已处于主动和优势。在湖西地区，敌新五军虽仍在陇海铁路线上但已失去战争初期的优势，各县土顽都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军分区机关和情报总站可在单县以东地区，相对的稳定下来，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已响亮的提出，全区解放，胜利在望，已为时不远。会议总结了过去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近两年中，在极端艰险困难的环境中，情报工作渡过了种种难关，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终于完成了任务。

最后由情报总站站长袁文超同志布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对各地当面之敌，认真监视其活动，防止其狗急跳墙，并准备及时提供情报，以便我军相机歼灭之。

对陇海铁路站线之敌加强监视，特别是监视敌新五军的动态。

对徐州、商邱两地，继续加强工作，继续寻找关系派进去拉出来，并派骨干到两地掌握情况，李鹤亭同志就是在此期间由金乡抽调转派往商邱去的。

物色条件较好的人员，可向敌人纵深、长江以南派出谍员。

会议结束后不久，就开始了济南战役，在此期间，湖西地区的情报工作是非常活跃的，晋冀鲁豫大军区津浦情报站到湖西地区活动，遵照军区指示，湖西情报总站在徐州、商邱两地重要关系移交给津浦情报站领导使用。如周庆祿（超）、雇沛、雇华、李鹤亭等同志都是这次移交的，同时华东野战军机关领导同志带工作组到湖西地区专门搜集徐州地区的情报，为淮海战役作准备。当时敌人准备集中兵力于陇海一线。新五军经常派骑兵向单、砀地区侦察窜扰，情报总站和地方机关经常被追赶。形势还是很紧张的，但敌人已到了强弓之末，不久淮海战役就开始了。

第四次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是1949年初在军分区前指驻地，徐州西北的敏安集召开的。会议由情报总站站长袁文超、政委崔孝堂主持，军分区前指首长、副政委廖亨祿，到会讲了话。参加会议的人员除增加了一个铜北县情报站站长周庆祥外，基本上还是

48年秋季参加会议的原班人马。(我因在徐州处理情报善后工作,没参加会议)据会后了解:会议主要内容和任务是:处理好情报善后工作,作好情报干部南下、北上的思想准备工作,会议进行了10天左右,对下一步情报干部随军南下、北上奠定了很好的思想基础。

会议过后不久,1949年3月间,袁文超和我调中原军区情报处。以后知道,湖西军分区情报干部,一部南下贵州,大部北上平津,少数留平原省军区,大都改行作其它工作了。

邯郸战役前的一段敌军工作纪实

陈竞波

1945年日寇投降后,国民党违背《双协定》,沿平汉等铁路线向我大举进犯。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部第三十军、四十军和新八军共4.5万余人,由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副司令长官兼第八军军长高树勋率领,集结在新乡、汤阴一带,企图打通平汉线。为反击国民党的进攻,消灭沿平汉线北犯之敌,晋冀鲁豫军区集中第一、二、三纵队和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共6万人,准备消灭沿平汉线进犯的敌人。但是集中几个军区的部队须一定的时间,当时我军无运输车辆,纯靠走路急行军赶赴战场,时间分秒必争。为了设法阻滞敌人前进,通过敌伪军工作,利用国民党与杂牌军的矛盾,挑起其内部争论,以拖延其进犯的时间,晋冀鲁豫军区派朱穆之,冀鲁豫军区派陈竞波执行这一任务。任务规定要设法阻止敌人迟一星期的进犯时间。朱、陈接受任务后,即设法由新乡打入敌军内部。那时驻新乡的部队有高树勋和孙殿英等杂牌部队,他们内部矛盾很深,各有自己的打算,并不是铁板一块。通过孙殿英部一位牛师长(我们的关系),见到了孙殿英,他把朱、陈安排在后花园,前厅是为马法五组织的舞会,正在鼓乐升平大跳大闹,谁也不知道孙殿英的后花园正隐藏着两个八路军。朱、陈从孙殿英那里了解到高树勋想编掉孙殿英部,马法五想让高树勋打头阵,因而互相有些戒备。朱、陈想通过孙殿英介绍去见高树勋,孙殿英非常滑头,他不出面介绍,只告诉了高树勋住地(新乡中国人民银行)及高起居活动的时间,让朱、陈自己去闯。朱、陈不得不冒

着风险去叩高树勋的门。上午9时许,到了中国银行,冒充从北方来的老乡求见。停了一会高树勋派人来接朱、陈,大家见面毫无诧异,心照不宣,直接了当地就谈起了国民党军队向北进犯的问题。高树勋有个想法,他说国民党让他的部队打先锋,通过解放区到石家庄受降(接受日寇投降后的武装部队的武器),他要求我们让开他一条路,由我军打击后续国民党部队,他到了石家庄受降后即可宣布起义。我们估计国民党把高树勋放在进犯平汉线的前头,是借刀杀人消灭杂牌军的一种办法,胜了国民党孙良元等可以邀功,败了消灭的是杂牌军,正合孤意,其用心狠毒之极。朱、陈向高树勋讲明了这个道理,并坚决表示不管谁进犯解放区都会受到迎头痛击,歼而灭之。所以建议高树勋向国民党上司要求因他们部队战斗力不强,希望国民党主力开路,他们随后跟进,高树勋接受了这个意见,与国民党上司讲价还价,这样就把时间拖下来,比原来进犯的预定时间晚了10多天。10天以后我军已组织好钢铁一般的包围圈,一举歼灭国民党三十军、四十军大部,俘国民党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四十军军长马法五以下2.3万余人,争取了高树勋率新八军1万人起义。

马庄交通站回忆

刘振华

1943年秋,我从冀鲁豫四军分区办事处调到马庄交通站任站长,原交通站站长郑国华调回办事处(自我调马庄交通站至日本投降、在马庄住了2年多没有转移过)。当时马庄属四县边(即汲县、淇县、延津、卫南县,1948年卫南县合并为滑县了),这个站上的人员有我、孔庆堂、赵玉山、周山领、苏永保、王会文、王洪现(王洪现管理这个站上的事务,催给养还做饭)。这个站是四军分区办事处的下设机构。这个站和太行五军分区办事处设在塔岗口的交通站联系,塔岗站是通往延安党中央的交通线。塔岗交通站到马庄交通站的距离有100华里,其中绝大部分是敌占区,这条线传递党中央的重要文件和迎送两地的过行干部和家属,这些干部参加整风的多,敌人发现了我们在这里来回过路人联系,便想法切断我们两地的联系,加强了对卫河的控制,部分地段敌人开挖了封锁沟,白天派出巡逻队,不叫群众在河里捕鱼和停船,晚上也不叫在河里停船,如看见谁家的船在河里停留,就给谁家扣上通八路军的帽子,抓走人罚款或者把船毁坏。因此,河里一只船也找不到,给我们的交通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困难,夏天困难还小些,天不冷会游水的可以脱衣下水过河。冬天困难最大,不能脱衣下水过河,如果有时间用木料捆绑成筏撑杆过河。以后我们在河南沿伏君庙找个社会关系侯方琛搞了个象小船一样大的箔箩,用油把箔箩底油了油,不进水了,可以当小船使用,很轻,可以一个人扛走(为此侯方琛在日本投降后被国民党的镇公所抓去杀害了,他为了革命献出了生命)。因

为有这个渡河工具,解决了我们的渡河困难,方便了交通工作,特别是冬季,利用夜幕的掩护来回渡人和文件,一直坚持到1945年日本投降。

办事处除了设在马庄的交通站,在敌占区军营还有一个以敌伪兵站的名义,实际是我们的交通站,这个站由冯占林同志掌握(我和冯占林同志都是一块从武工队合并到办事处的,队长是曹有荣同志)。我军在焦虎袁庄的一次战斗中,俘掳了伪六军独四旅旅长王国藩的爱妾和他内弟,办事处郭省吾主任对她姐弟二人进行了政治教育并写了一封信,叫他们亲自交给王国藩。当天派人把他二人送到敌占区边沿。由于我们对他们的优待,二人很感激。王国藩看信后,对我们的宽大政策也很感动。他要求我们派人去帮助他,办事处就派冯占林同志打进去了。先是搞情报,后因交通工作需要征得王国藩的同意,在军营设立了独四旅兵站,冯占林是以王国藩的副官为掩护,实际是我们军营交通站的站长,为了加强这个站的工作,办事处郭主任又派去了祁存义同志,还有在独四旅争取过来的两个伪军官李子久和王培成(王国藩的侄子)。

郭省吾主任叫我们二人负责这条交通站,冯占林同志负责军营交通站,叫我负责马庄交通站。需要叫军营办理的交给冯占林同志,他们都是以伪军官面目出现,并带有武器。(徐帅从这里路过的前几天,冯占林同志派人到卫河去找船,因敌人对卫河控制很严没找到船)。不需要叫他办理的,交给马庄交通站。

马庄交通站有两条线路:一条是以孔庆堂同志为主,从马庄往西北走,走原屯西边(离马庄1里)走班枣,在李源屯北边过去到下马营一带过河。这一带夏秋季节有积水,这条路比较艰苦,有时遇到雨天,再刮大风,上边下的雨把衣服淋透了,大风吹到身上,下边趟着冷水,冻的全身发抖,还得绕着封锁沟走,敌人对铁路控制的不严,所以用这条路传递中央文件多。

另一条线路,是以吉清明同志为主的,从马庄往西走尚小集、

野厂、口上村(吉清明舅家村),在吉清明他舅家门前的路上往西北直到上马营不过一个村庄就到河边了(口上村离李源屯 18 里、在李源屯南边)。这条路比较好走,路上没有积水,没有封锁沟,从马庄到卫河边只走三个村,过了口上 20 多里不走村庄。虽然好走,每次护送过往干部和家属都有准备,为了迷惑敌人假装走亲戚,看朋友,手提篮子,假装赶集、赶庙会。一边走,一边唱着本地的小戏。马庄到卫河边 50 多里,走这条路下午出发的时候多,这样一来走到卫河边已是天黑时了,在这里河南边没有村庄,吉清明他家在河北沿的河湾里住,他家两间房,离河北沿 10 来米远,也没邻居。在河南沿喊吉清明他弟弟的名字,他家就出来人了。河北沿别的人家离的远,听不到喊。会游水的,水不冷时脱衣下水过河。如果不会游水,吉清明家有个园箔箩,他弟弟的脚板很宽,就象一块板子,并且水性很好,不会游水的,他就在水中推着箔箩过河渡人。过了河就住在吉清明家,第二天再走,还有一半地。100 华里分两天走,身体弱和妇女都能坚持。敌人对铁路控制的不很严,从 1943 年秋我到马庄交通站至日本投降这段线没出任何问题。

郭一峰同志原是办事处会计,1980 年我去安阳林业局看他,郭一峰说孔庆堂是正式工作人员,是我介绍的,孔庆堂是塔岗火车站西南一里路大双人。

1944 年严冬,徐向前首长去延安(中央)路过这个站,有新四路两个连武装护送。马庄交通站是我和孔庆堂随部队去护送的,部队到达尚小集(离马庄 300 米),天已经黑了。这一天夜里没有月亮,在行军的行列里就徐帅一个人骑着马。因我穿的便衣不能在行军行列里走,只能走大路边上的小路。走的王似坡,在李源屯(李源屯住一团伪军)以北过去。在离河三四里地时,有一条大沟,绕过大沟到河边。这时塔岗火车站的敌人向部队的方向打了两枪,但以后没动静了。河两边的水有一丈宽结了冰,部队来到河边以前,部队前边传来话,脱衣准备过河,河边附近地势很底,夏天积水没有了,

但留下一些脚泥印。脱衣后身上很冷，有一点风就冷的全身发抖，又没穿鞋，泥脚印扎脚，虽然离河不远，这段路走的很艰难，身上冷不说，脚下还有很多高粮茬在脚下扎脚，好不容易到了河边。河两岸各埋了一根木桩，用一根豆条粗的铁丝横过河去拴到两根桩的上端，人过河时一手攀着铁条，一手拿着自己的衣服等物。当我下水过河时，脚下沾水就冷的钻心刺骨，到河中间的水流的很急，当我攀着铁丝游到水深处，人成了半躺着，稍不注意，手抓不紧铁条就要被水冲走。游到河中间时身上有点麻木的，到西岸时全身都已冻麻木。我被岸上的人拉上去了，如果没有拉我，就被水冲走了，上岸一直没有暖和过来，穿衣服时手脚都不灵便了。因两个连 200 多人都是攀着这一根铁条过河，误了一些时间，部队过完河，过铁路时很顺利，没到塔岗口时天就亮了。因首长已安全到达根据地，我们没有再往里走，就留到塔岗站了。第二天夜里回到马庄站。孔庆堂从此得了关节炎，从此我喝热水胸部闷气，落下了气管炎后遗症。1945 年日本投降后交通站撤消，我回到办事处。

曹城地下三人小组活动情况琐记

殷 群

接受任务

1944年10月间,五分区曹县敌工站长莫君同志对我说:“曹县城内有位老战士沈建华同志,可以通过关系,给党派去的人在伪警察所安排个伪警官的职务,我们决定派你打入伪警察所,地委、分区领导已经同意,你看看还有什么意见?”

我在八路军教导七旅兼鲁西南军分区任锄奸、敌军工作干事已近三年,和日、伪、顽分子打了不少交道。经我专署参议、国民党爱国人士王子舫(王道)先生安排,曾以八路军联络参谋李洁清的化名代表地委书记、分区政委刘星同志和专员张耀汉同志,访问过土顽苏鲁豫皖挺进军第二十五纵队张盛泰部,和该部队支司令王茂德、参谋长王子材等进行过面对面的斗争,我深知打进曹县城有不少困难和危险。但是,一个决心献身于共产主义伟大事业的共产党员,难道能遇险不前吗?我说:“我坚决执行党的决议!”

不久,沈建华、刘会庵同志由曹县城来到曹西北敌工站驻地。莫君同志介绍我们认识后,对入曹作了交谈。我和建华、会庵3人又一同到马寨分区敌工站,接受分区敌工科长丁一同志的指示。

丁一同志亲切地跟我说:“殷群同志,派你打入敌警察机关,这个任务可不轻啊!你在隐蔽战线常和敌伪人员打交道,暴露的可能和危险是有的,但这又是你的有利条件,比较熟悉敌情,敌、伪、顽、我之间的斗争错综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真假假。刘迪(敌工科长)、陈跃先(组织科长)、王光美(保卫科长)等同志都反复斟

酌过，刘星同志也曾亲自派你到顽匪张盛泰部执行过任务，党相信你能够依靠组织和人民，在敌人巢穴中站住脚跟，也希望你们有所作为。”党的信任和鼓励，使我心中热乎乎的，更决心奔赴火场，闯入敌巢。

在丁一同志主持下，我们在马寨组成了“鲁西南地委、分区曹城地下3人小组”，负责人是我。但丁一、莫君同志一再嘱咐：“建华同志阅历丰富，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为人稳健练达，应该主要依靠他和会庵同志，依靠敌占区革命人民开展工作。”我的任务首先是“落户”，先站住脚，取得合法身份。我们第二天就动身。我进曹县的良民证是在开封的李冠卿同志通过民权地下党在商邱（朱集）给我搞的，化名为殷笑风，充作建华的表弟，投奔表兄谋职业。

11月中间，一个阴沉寒冷的下午，我们3人告别了首长，骑上自行车，离开了马寨，争取在黄昏前闯进县城（马寨离城60华里）。当我们穿过武楼离城尚有2里之遥，不料从北关向我们走来一群队形不整的伪军，我们就下车步行。在相离不到10米时，一个伪队长模样的人枪口指向我们，粗声大气地喝道：“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会庵同志胸有成竹地答道：“我们是武楼、杜庄的小学教员，进城开会。”他不以为然地质问：“怎么，这么晚去哪开会？”“我们接县教育局通知，今天进城报到，明天上午开会。”他又审视一阵才放过我们。

闯入敌巢

曹县北门是两道重门，戒备严密，大砖石城墙，高10余米，吊桥两旁设有三角铁丝网，护城河看来宽不少于8米，建华悄悄指点着告诉我：“水深不少于2米。”在北门，伪军验了良民证，两个鬼子哨兵还搜查了我们。鬼子司令部就在北门里路东，两个荷枪实弹、上着闪亮刺刀的东洋武士，站在岗楼里，虎视着北大街。

晚上，建华安排我住在南门里“源涌泉酒店”。他的五十四、五

岁的老父亲在店里管帐，他当然知道没有我这样一个“表侄”，我们商量过，还是把我的身份跟他讲明。老人家正气感人，叫小伙计沈秉铨给我准备了晚饭，陪我洗了热水澡，我就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建华领我到大隅首一个小店喝有地方风味的豆沫，吃大饼油条。接着他和会庵一连几天，陪我逛大街，给我介绍周围的环境和情况。

靠北门路东，鬼子圈了40多户人家的房舍，把他们赶得流离失所，就在那里北凭城墙，东临水坑占为兵营。这时是鬼子庸田司令官在主宰曹县，他率领1个中队，150余人，携9挺轻机枪，9门掷弹筒。建华告诉我，这个部队属菏泽山口少将指挥的第四旅团官尾联队。

再向南，建华带我窥察了第一任伪自卫团长朱晓楼的住宅，又察看了石蛤蟆西街路北当时任伪县长兼自卫团长朱晓堂的总部。原第一高小旧址是伪自卫第九团的驻地，钟楼街路西是伪警察所。东关是最繁华的街道，朱晓堂在东关天齐庙和乡师大楼驻有重兵。

曹城落户

建华、会庵先使我对曹县有个粗略印象，同时又积极活动，就着沈秉锐买了四匣点心，陪我到城关伪警察分所所长李御卿家去拜见。秉锐见了这个瘦高个就叫“二大爷”，说：“这是我建华兄的表弟殷笑风，建华哥说已托你帮忙给他找个差事。”我说：“李所长，兄弟知道安排个差事不易，建华哥说，李所长慷慨好义，很够朋友，请多费神。”说着我又递过一封信，从容地说：“这是建华哥的便条，今晚请到南门里酒店坐坐，务必赏光！”这信封内有建华塞的五十元联合票。晚上，建华的堂叔伪镇长沈君垣陪李御卿吃酒，又一再相托。李答应先给我补个三等警，每月7元饷。李说：“叫笑风先委屈点，不让他当苦差，帮办文书，警官出缺再提拔他。”

就这样，我在城隍庙东路北伪警察所，当上了三等伪警，算是

在曹县落户了。穷苦人民，穷知识分子在敌人统治下谋个饭碗，难得很哪！我，一个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进城3天，就站住了脚，沈建华同志和刘会庵同志顺利地完成了地委、分区交给的第一步任务。“家里人”——莫君、丁一同志知道后，都非常高兴，认为这是一个小小胜利，带信来嘱我们“好好干！”

我有职业掩护后，“三人小组”以大隅首南路西“崔家油坊”作为联络点。主人崔景林先生，老中医，六十多岁，和建华友谊颇笃，多年都掩护我党的工作同志。我们常以聚餐、打麻将为名，开碰头会，分析敌情，商讨工作。

长久在公开的武装斗争中和敌人周旋，可能会认为敌占区神秘、危险，但真钻进敌人内部，反而有安全感，处之泰然。确实有少数死心塌地的民族败类，甘心事敌。仇恨我党我军，欺压人民，还美其名为“软性救国”，即汪精卫的“曲线救国”，还有什么“和平抗战”云云。但是，人民是向往共产党和解放区的，大多数伪军警宪对我党我军极为恐惧，军心动摇，敌伪报刊也无可奈何地哀叹：“中共与我军交战斗志昂扬”。伪《新民报》惊呼“共产党确有不可漠视之独特战术”，“可怕之赤魔政治力”，“潜行于地下，像霉菌那样可怕”，真是风声鹤唳。我们这些在敌人心脏中战斗的同志，确也从敌人的惊慌哀鸣中得到鼓舞。

我们这个微不足道的“三人小组”在半年间交了一些朋友，开展了“耳语活动”，传播了人民的胜利和党的主张。建华、会庵利用社会关系，搞了敌情和社会调查，向地委、分区反映了曹县、商邱等地的一些情报，利用敌人矛盾和弱点，争取伪军回头，削弱敌人。建华、会庵埋头苦干，冒风险、掏腰包，为党和人民做了有益的工作。为我们大反攻时解放曹县作出了贡献。

巧取地图

我只身入曹城，又是个小兵身份，活动能量有限，而建华和会

庵同志在接受地委、分区任务陪我入曹后，工作是很努力的，他们在敌区活动有一定经验。而我呢？缺乏经验，又幻想轰轰烈烈，急于求成，没有当上警官，有点泄气，又加上生活太苦，不想长期呆下去，急于抓一把，安下身后就天天跑“表哥”家，催促他们搞关系、搞情报、搞资料。

建华、会庵很尊重我的意见，没有多久，建华就搜集了一批济南、徐州出版的《山东新民报》、《大阪每日》(中文版)等敌伪报纸，通过宣传奴化思想的曹县新民会事务部长沈阁臣，搞了“新民会章程宣传计划”，“第五次强化治安运动宣传要点”等资料，转送根据地敌工站，这些对研究敌伪宣传动向，制订我党我军宣传方针策略，有针对性地拟写宣传品，都是很有作用的。这类文件携带转送难度不大，也能及时送出。

难得的是建华同志搞到军用地图。我们常碰头喝茶的崔家油坊隔壁，就是伪商会，建华和商会长韩星宸的有私谊，偶然一个机会，他为联系生意托此人给写便函时，瞥见那人开抽屉时，里边有一叠道林纸的印刷品，从纸背面隐隐约约可看到正面弯弯曲曲的线条。建华心里一动，原来他听说韩复榘第三路军的一个团部曾在商会驻过，是不是日军进攻时，韩军仓惶撤退，丢下什么文件图表？他回来诱导崔景林老先生 13 岁的孙子崔东初，从门槛下钻进去取了一叠，拿出来一看，原来是 6 张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是曹县、商邱、青枫集一带的村落道路详图。当把这份崭新的军用地图转送给分区司令员赵基梅同志时，他感到真比缴获敌人一批枪炮还令人高兴。

1945 年春，会庵也从伪建设科科长崔灿缨处搞了一份伪建设科绘制的曹县城区街道图，他原要在图内标注敌伪军警机关部队驻地分布情况。建华和我未同意这样做。为什么？那时候敌人在中小城市的特务活动，也还没有很多的先进技术装备和训练，不要说收集和传递情报的无线电微型照相机等没有，按现在的军事科

学衡量,我们是“土情报员”,连普通的密写技术也没使用过。我们靠的是“土办法”,靠人的忠诚勇敢机智,靠责任心,靠细心和精心的记忆,我们决不能给敌人留下有形的证据。这图还是利用一个伪军给东关的朋友送礼物夹带出城,隐藏下来。1945年夏,建华、会庵有被朱晓堂逮捕的信息,建华于8月间来到曹县东南高桥,把这份城关街道图带来标注,于9月中旬带到曹县东关交给我军作战指挥部,赵基梅司令员高兴地说:“二股(司令部侦察通讯股)也早搞到城区街道图,你们又搞来一份,很好嘛!”

购买弹药

地委、分区给我们的任务,主要是争取敌伪军,其次搞情报、购买物资等。

只是我们工作不得力,成效甚微。我们得知伪第九团团长王秋濯在苏联红军节节胜利,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日趋被动的形势下,慑于八路军的威力,有所动摇,我们曾通过建华的堂叔沈君普,利用他和王的私谊,几次试探,以图为我所用,王某反动本质不改,又割不断和朱晓堂的感情,没有成效。

朱晓堂的教官吴寿成,行伍出身,有带兵经验,朱晓堂这些地主兵痞流氓武装,毫无正规训练和作风,他要利用吴的军事才干,又嫉妒防范。吴是陕西人,客座,我们没有找到直接介入人选,从侧面作了一些反间工作,也无成效。形势发展很快,日本8月投降,我军9月就解放了曹城。争取瓦解敌军工作没有成效,我们也不灰心,建华、会庵同志表示,只要对革命有利,对工作无害,我们能干的尽量干,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因此,在1945年上半年,建华还通过常来崔家油坊的崔景林先生的亲戚刘洪魁买过几次步枪子弹。有一次,刘托日本司令部的翻译,他小学的同学刘正文,买了两箱步枪子弹,建华由刘洪魁陪同,把子弹由常为我们做事的赵中元用架子车拉到曹西北曹楼后,王健民同志派通讯员一同送到驻魏湾

附近陈胡同的陇海支队收用。

从健民处得知,根据地后勤部门急需石印用的药石,建华、会庵托人在济南、商邱都未能买到。县府前街十字路口南边路西,有青山集的武清山开的石印馆,这时停业关门,主人又住在青山集老家,来往交涉很麻烦,就干脆约了给我们有交往的东关宝塔烟厂经理崔同峰和大隅首沈家饭馆经理沈君亮,先行撬锁,窃取药石,运到曹西北。

根据地经费困难很多,会庵薪水少,子女多,多出力气;建华在东关经营个小杂货店,就周转点经费,支持工作和根据地急需。1945年曹县解放后,武清山索要药石,也是由沈建华同志和崔同峰、沈君亮垫出小麦1500斤作为赔偿药石的费用。搞到这些物资,伪装转运,历经艰难,却使人感到敌占区人民、店员、学徒、拉车工人、商界都有不少爱国分子,同情和赞助我党我军,这是我们战胜敌人的可靠基础。

迎 接 解 放

我一进曹县,就十分凑巧,遇到了我二十团一个文化教员李××,他开小差到伪警备队当文书。那天是北关庙会,警官叫我和几个弟兄去“弹压”,回来时,正好李出城,看见一怔,张了张嘴,我目不斜视,进城到西街吃馄饨。他跟进来坐在我边上,也要了碗面,见我没有别人,悄悄凑过来叫了声:“殷干事!”我和组织干事赵璜同志在他那个连帮助工作一个多月,硬不认帐是绝对不行的,我指指黑警帽:“我现在叫殷笑风,在城关警察所。”

“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你怎么来了?看样子混得不错!”

“我吃不了苦,到这找表舅找点事干。”

“我也是!”

“锄奸干事都是信得过的干部,还会开小差?”

“信不信由你。”

他诡秘一笑，摇摇头，但又似乎不怀恶意地说：“我不管别人的闲事，只管自己混饭吃，你放心！”

我想甩开他，再看看有什么后果，就说：“干过八路到这边混事的何止我们2人，谁管谁？我下午还要执勤，改天咱再聊。”

他说：“我来找你吧！”我想了想说：“也好！”就约了个日子。

过了两天，他果然如约来约我去一个酒馆，我勉强舔着热辣辣的烧酒，跟他光扯哪家馆子好，哪里烟熬得纯，哪家妓院又从归德来了苏州姑娘之类，显得我是个十足的市侩。他似乎听不进，带点恳切的样子说：“殷——啊！笑风哥！兄弟不成器，想升官发财，吃碗热饭；才走了这条路，可我是书香门弟，诗礼传家，品行还是讲究的，你不要跟我转弯磨角了，我对你可没有坏心眼。”

在这种鬼地方，我的每根神经都日夜警惕，我越是不着边际地说：“我怕什么，你也害不了人。我在那边干过就是公开出来也不稀罕，谁是真过来，谁是假过来，还能光怀疑我？”

“我倒是真开小差过来的，我表舅知道，也跟上头讲明的，可是我到底会落到哪一步！”他似乎真动了感情。我还是不能轻信，一味冷言冷语地说：“这不挺好，辣子鸡，粉蒸肉，总比啃豆饼、吃榆树皮面好过！”

他唉声长叹，吃了几杯闷酒，看着我，我还是不即不离，朝他笑着，叫他摸不着深浅。他只得无可奈何地拉着我的一只手说：“交往不深，难言肺腑，日久见人心，日后有用得着我的地方，我不帮忙，你把我当狗看好了。”

我同班有个伪警赵启增，东北流亡学生，国破家亡，流离失所，我们在爱国上有共同语言。他流落曹县五、六年，警备司令部有熟人，打听到李××投靠开洋车铺的表舅，通过一个伪副官介绍当了伪文书，嫌官小钱少，看看鬼子汉奸前途不乐观，很苦恼。分析情况，他可能出卖我，也可能不危害我留条后路，我不抱幻想，但也不

能不去争取可能争取的人。我军已处在大反攻的前夜，苏联红军挺进柏林，毛主席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锄奸政策，给失足者指明出路。去年春天，我奉开封敌工站李冠卿同志之命，去会见和我在赵支队宣传队比较要好，后来投敌在开封红部（南关日本特务机关）当特务的一个叛徒王×，也象这个李××的情绪。

主意定了我就约他去东关赶了个集，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溜达，作了一场严肃的谈话。

“小李，我要给你交底了。”

好像心照不宣，他并不惊疑。说：“我就盼着呐！”不过，我一摆我们在曹县的力量，他也有点吃惊。我说：“你一见就猜到我是干什么的，对了，是地委、分区刘星、张承先和戴晓东同志派我来领导这里的特迁网，发动群众，准备反攻。”

“特迁网？”

“对！就在敌人的心脏，伪军警宪特都有，日军司令部也有，日本反战同盟配合我们。”当然我的夸大不完全真实，但斗争需要，就本质上讲，我们党的力量在人民之中，那是无形的，不能用数据估量的。

他诚恳地说：“我一直相信城里有地下党，日本人和警备司令部也常常惊慌不安，朱晓堂跟亲信们也常说，共产党都是能人，对着面你也认不出。你说吧，笑风哥，我能不能回头是岸？”

我于是跟他谈了很多形势、政策，要他争取立功赎罪。我没有放松警惕，而党的政策和策略，在这里显示了力量，这个小李子没有危害我，提供的一些情报和建华、会庵兄搞的敌伪情报相印证，也有一定价值。

冀鲁豫五分区情报站活动片断

宋春和

1943年,我在第五军分区司令部担任交通员。同年9月,王场战斗失利后,由王道、贾双河和我成立了通讯站,通讯站设在孙王庄孙百全、孙新成家,主要任务是从菏泽——千王一带将报纸、宣传品和信件转交分区司令部。

不久,日寇对我解放区实行了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和大扫荡。为了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军分区决定将通讯站改为情报站,由刘迪同志(当时十七团作战参谋)负责。

情报站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搜集日伪的作战方案、兵力变化、行动路线,瓦解分化日伪汉奸及争取开明绅士等。

1944年8、9月间,我接受白耀奎(梅守信)指示,到商丘车站成立情报点。接受任务后,我就在朱集南门外以打壮馍、卖丸子为公开身份(当时还有一个伙计),搜集情报。时间不长,我又接到新指示,让我到楚天集一带学习(学习了24天),主要学习情报员纪律以及业务技术训练。

学习回来后,原来和我一块做生意的伙计已将家具卖光,人也早已离开朱集。无奈,我又在南门外找了一间木房,以打袜子做掩护,活动在朱集大街小巷和火车站,记下了日军每天从商丘上下车的人数,装卸的军用物资和地点,日军下车到营地的具体时间,以及他们的武器装备等情况。我无文化,只能口头向上级汇报。后来,白耀奎站长便让我找一个有文化又忠实可靠的人协助工作。我即找到王广印,让他当我的文书。

1945年春天,日寇在朱集到处抓人,为了摸清日军营园子内的兵力布防、工事构筑等情况,我便故意让日军抓到营园子。到那以后,才知道日军战后有些伤员,让抓去的人给输血。经过实地侦察,我发现营园子里面很空虚,只有些伤兵和看守。此外,我还记下了里面的一些设施。事后,我把这些情况汇总,向上级作了详细汇报。

当时,日军对出入朱集的人都要严格检查,一些汉奸便衣也在朱集内窜来窜去,这给我做情报工作带来很大困难。不能把情报及时送出去。怎么办?我就让我儿子(当时七、八岁)以玩耍为名,乘日军不注意的时候混出寨外,把情报交给在外边等候的同志。不久,接到白耀奎同志指示,他让我们立即撤出寨内,到外边继续开展工作。于是,我们便把张将文留在朱集内继续搜集日军情报,我和王广印则到沈庄建立了情报点。

有一段时间,日军在朱集兵力增多,为了搜集到准确数字,张将文整天奔跑在火车站及大街小巷,他儿子小信也装作拾破烂,到营园子侦察日军兵力情况。张将文父子的行动受到了白耀奎和参谋的表扬。

为了消灭日本侵略者,帮助上级和总站搞军需物资,我们经常出入在朱集内外。当时我军子弹和印制宣传品的器械、油墨、纸张等异常紧张,我和张将文、王广印三人便经常出入日伪机关,从汉奸、警卫中购买子弹。当时,我们共买手枪子弹三百余发,并在朱集买了些纸张、钢笔、油笔、油墨、毛笔等物。为了不让敌人发觉,我们分头零买,然后集中,按时上交给总站。

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当时,驻扎在曹县境内的国民党顽杂军也趁机活跃起来。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有力地配合我军作战,1946年夏,上级要我把国民党孙性斋部刘梅村团的敌情搞清楚。刘的团部当时在黄河以北李庄,其军队常在刘园子附近活动。由于该团距孙性斋旅部较远,加之战斗力不

强,如能吃透敌情,我军就能将其一举消灭。接受这一任务后,我即回到商丘(朱集沈庄)和王广印进行商议。当我们知道白宝轩(和王是师兄弟关系)就在刘梅村团的消息之后,我就让王以探友为名,到楼李庄与白联系。终于摸清了敌情,并立即向我总站作了详细汇报。在一天黑夜,我军出敌不意,一举歼灭了楼李庄之敌。

1947年,解放战争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我军西克开封,在鲁西南、睢杞太一带也接连取得胜利。国民党控制的陇海铁路线不断被我破坏,沿线敌军也一股股被消灭。在朱集寨北的沈庄、司庄及许堂一带,我游击健儿活动频繁。当时,驻扎在朱集的国民党新五军二十四师、交警队等部,皆惶惶不可终日。由于朱集北郊处于森林寨(老城区)与商曹公路之间,常有我游击队活动,被敌人视为隐患,就借口有碍于军事行动,于6月20日这天派一排人荷枪实弹到沈庄,喝令群众自带麦秸柴草,系于房门案头之上。并大肆叫喊:“要打仗了!谁不走,就放火把他烧死在庄里!”晚上,敌人就把沈庄点着了,寨内的敌军见沈庄火起,就立刻打枪、开炮予以配合。

面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我胸中怒火燃烧!作为一个八路军的情报员,不能眼看着反动派火烧群众的房子!于是一个救火的念头在我头脑里油然而起。敌军由庄东往西顺路挨门放火,我就不顾个人安危,一面躲着头上飞来的子弹,一面尾随敌人后面,一户户的将点着的火扑灭。这样一直闹了大半夜,除庄西南角十余户因正处于敌人的正面监视之下无法抢救外,其余之火均被扑灭。天刚蒙蒙亮,乡亲们就回来了。当他们得知我半夜救火的事情后,感激得热泪盈眶。自此以后,我和沈庄的群众关系更加密切了。八月,刘邓大军再度南下大别山。上级指示,情报站已完成了光荣的使命,应予撤销,我的情报工作也就此结束了。

(高淑芳、沙启道整理)

吴屯敌工站活动片断

吴天性

一、搜集情报

情报是我党我军的耳目,要取得对敌斗争的胜利,就不能不了解敌情。当时日本鬼子主要集中在商丘、柳河,经常对我解放区实行扫荡。但他们稍有动静,商丘和柳河的情报就会送到吴屯。我接到情报后,就马上出发,送到解放区,使解放区的军民作好反扫荡的准备。商丘方面的情报主要是程渊月派人搜集,由韦振友送来。民权方面的情报是通过马心田、胡同礼从敌人内部了解,各方面获得情报后,送交袁治洪。袁治洪先将情报综合分析整理,然后由我直接送到程窑,交程秀鹏(程渊月的五叔)送到军分区情报科。1943年以后,则由我直接送交民、兰工作队负责人李绪三。

1943年,袁治洪让高文成搜集顽杂军张胜太部的实力情况,将其所有人员、武器、兵力布置及活动规律等情况汇编成册。袁治洪将它密写在一本“四书”的里页,我送到解放区姬堂,交给李绪三。这对于我地方部队后来几次打击张胜太的部队起了很大作用。

1946年,地方顽杂司令石步启的队伍被我军击溃后,逃跑到吴屯附近。吴屯党组织派黄孝文打入郭起云团,当了解到石步启伪顽司令部驻扎在乔楼、申瞎子团驻扎在张员庄、郭起云团驻吴岗、董万红(董二扁食)团驻袁庄和赵庄的敌情后,我便把这一情报送到解放区。袁治洪闻讯后便亲自率领我主力十四团于夜里长途奔袭,一举消灭了申、郭两团,取得了很大胜利。从此以后石步启的队伍再也不敢驻在吴屯附近了。

二、为解放区搞军需物资

1940年到1943年,是抗战最艰难的年头。在这段时间内,日本鬼子加紧对解放区的扫荡,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我解放区实行经济封锁。当时,我军急需的物资如:电台、电池、弹药、油墨、纸张、药品和医疗器械等,都要从敌人那里搞。因解放区的货币(抗钞)不能在敌占区使用,就把解放区的农产品黄豆、花生、大枣、土布等,雇用小车子运到商丘等地去卖。一般都是夜间由袁治洪、黄玉振和我领着成帮的车子队。在通过封锁线时,不能让车子发出一点响声,以免暴露目标。土产品卖掉后,我们通过各种关系,购买军用物资,如:电台、子弹、纸张、磁碗、药品及医疗器械等。为了这些物资的安全,都是自己想法推回来。如批量过大时,便由胡同礼带领伪自卫队中的党员战士押运到吴屯,然后再送到解放区常乐集等地。

我们曾以盖有“吴屯西药店”印章的单据,在商丘城里买过很多药品和医疗器械,出城时则由伪军的一位军医官护送。

袁治洪通过很多渠道给军分区购买军火,他从张员庄大地主、汉奸队长吴治民那里买了许多子弹(袁和吴是同学)。子弹是分批交付的,都是我一箱一箱用小车推到解放区姬堂交给陈培芝。

解放区印钞票、地图,缺少精制的纸张。张心田的四叔马瑞亭在开封任东莱洋行的经理。利用他的关系,给我们买过许多批模造纸和其他物资。运到柳河车站后,由胡同礼派人护送到解放区,有时是郝曰勋派人护送。

我经常往姬堂、王堂、刘常玉、张康、陈胡同、常乐集、韩集一带进行联系。有关党的文件和情报一般直接送给“合作社”的姬传信。“合作社”就是民、兰工作队的代号。有关运送的物资,大都送到常乐集“战委会”,或送交叉兴祥商店的徐经理(义兴祥商店就是当时鲁西南根据地的外贸机构)。

三、掩护干部跨越陇海路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鬼子扫荡时,鲁西南解放区有些病弱干部在疏散转移中到了吴屯。陈丽泉同志曾化名“姜在此”,在吴屯致和祥商店住了20多天。李绪三、徐经理、程渊月等,也曾到吴屯隐蔽或就医。为配合根据地反扫荡,我们并非消极地掩护干部。在敌人兵力空虚的时候,我们也常主动进攻,骚扰敌人。如由胡同礼、张启贤等同志组织小武装到小坝车站(即谢集)和孔集之间进行割电线、砍电杆等破坏活动,或油印一些标语口号和简短的传单(袁治洪家中有油印机),到铁路沿线散发。

当时,铁路沿线日寇、汉奸封锁得很严。我们去华中的同志主要从野鸡岗和孔集东边的李颜楼两地通过。因为胡同礼、张启贤被派到伪军第四大队当小队长,他们曾先后被调到以上两地驻防,执行铁路沿线护路任务,这就为过路人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解放区每次将干部送到吴屯,便由我送到胡同礼或张启贤那里越过铁路到水东地区。不仅如此,连解放区的群众到南边买盐,也是一批批的推着车子从小坝和孔集之间通过。如有乘火车到开封或太行地区的人员,便由胡同礼到柳河车站找伪警察所长李玉显给办理良民证,有时也请马心广、李玉亭代办。

四、分化瓦解敌伪军

作敌伪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分化和瓦解敌人,宣传政策,争取起义。吴屯敌工站在袁治洪同志领导下,灵活运用非法、合法、秘密、公开的各种形式和有利条件,在敌伪军中开展错综复杂的斗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1939年,根据吕明堂提供的情报,王洪恩同志率武工小组插入柳河车站锄奸,将伪军一个连长杀掉。1942年初,袁治洪同志去开封执行任务,利用电影院散场时人员拥挤之机,将一个写有革命口号的纸条贴在伪军的大衣上,搞得全城敌人惊恐不

安。为了在敌伪中顺利进行工作，我们在伪自卫队中发展了党员（如张启贤、陈家俭、秦和平、武长成就是这时发展的）。当地伪区长郝曰勋领导着一个拥有五、六百支枪的伪自卫队，我们便让王洪恩同志利用他和郝的社会关系，对郝进行争取工作。1941年，组织上派王洪恩同志到郝曰勋部当副官，他根据郝崇尚民族英雄的特点，对其进行抗日救国教育，终于促成了郝曰勋率部起义，使其走向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但不幸的是，1942年在汪楼和谢园子与日寇的两次作战中，郝曰勋与王洪恩均壮烈牺牲。当时，高文成被派到底朗斋伪司令部工作，在那里当副官，为革命作了许多贡献，后因身分暴露，被敌人逮捕，活埋在商丘车站郊外。他就义时宁死不屈，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的高贵气节。

1944年，袁治洪因身份暴露调到解放区后，五分区敌工科负责人刘迪指示：由胡同礼负责吴屯地区的敌伪工作。我们坚持斗争，直到豫东解放。

神出鬼没 威震敌胆

程渊月

1938年10月下旬,日寇占领广州和武汉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冀鲁豫区党委为了发展人民抗日武装,有效地打击日寇和汉奸,于1940年8月在鲁西南的曹县、单县以南和陇海线以北,西从兰封,东到马牧集的广大地区,建立了曹、商、民、兰、考五县边区工委,任命李济民为工委书记,调我(时任曹县西北大寨区副区长)任工委统战部长兼任敌工站站长。敌工站根据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规定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和争取分化瓦解敌伪军的策略,以商丘为中心,在陇海铁路沿线的伪军、汉奸、土顽和地主中开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分化瓦解敌军,孤立打击顽固的地主及死心踏地的汉奸卖国贼,以壮大人民抗日力量,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

开展政治攻势 分化瓦解伪军

敌工站根据党的政策,对陇海路两侧的伪军、土顽开展了政治攻心战。我们在吴屯集致和祥杂货店油印了大量传单,采取“走亲戚”、“串朋友”等办法,将传单放在点心盒内,直接送到伪军和汉奸的门上。对于在日伪军控制较严的封锁线上,有时采用射箭的方法,把传单送到敌方。传单的内容图文并茂,有的写着“身在曹营,心在汉”、“上马金,下马银,曹操难买关公心”;有的写着:“人有脸,树有皮,为人家的奴隶没出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间不到,到抗战胜利后算总帐”;有的写着“日本鬼子心真狠,屠

杀咱们中国人，伪军拍心想一想，同胞受难心何忍”；有的写着“我们生在中国，祖祖辈辈埋在中国，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人人皆有卫守国土的天职”等等。在开展政治攻势的同时，对汉奸中顽固分子也进行了狠狠打击。1942年2月，敌工站组织武装狠狠打击了贾寨的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以后，商丘城里及朱集车站的伪军、土匪、汉奸，龟缩在据点里不敢出动。由于政治攻势的胜利，陇海路两侧不少伪军头目与敌工站暗地联系。如：民权的郝曰勋^①主动送给敌工站枪五支、子弹数箱。朱集车站的马心田，掩护我地下党员袁治洪、陈丽泉等人。陇海铁路以北的一部分敌伪区长，借口黄河故道以北不是其辖区，拒绝向北出兵骚扰。通过政治攻势，教育了伪军汉奸，锻炼了当地群众，提高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从1942年到1943年间，先后在孙付集、潘口一带发展党员18人。

打入敌人内部 发展革命力量

敌工站在工作中经常运用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打入敌伪军内部，通过开展政治工作，扩大力量，发展抗日势力。例如：党员胡秀之打入张岚峰便衣队当“特务”；党员范子成打入保安旅中任团长；党员赵俊雅、王占云打入八纵队任营长等。打入敌人营垒内的同志，通过积极工作，扩大了进步势力，并发展党员多人。如：派胡同礼打入伪自卫队任队长，胡又发展副队长张启贤为中共党员，并在伪自卫队中建立了党的组织，通过伪自卫队为我提供了重要情报，转送许多子弹、枪支等军用物资。水泥厂工人陈进才积极为敌工站工作，冒着生命危险购运子弹、枪械，被发展为党员。小商人樊玉坤、樊玉合，利用做买卖的便利条件，不仅为我们的手榴弹厂买丝绳、弹滚，还多次利用老海、大烟换回敌工站需要的物资。1942年2月，上级党委要敌工站通过关系搞一些子弹。敌工站通过安插

^① 郝曰勋，是个有实力的伪区长，他拥有几百支枪的自卫队，经过我们争取，举旗起义，公开宣布抗日，最后，郝与其子都在对日作战中牺牲。

在敌伪营垒内的同志，用大烟、老海一次便弄到新子弹 40 余箱。这 40 余箱子弹由胡同礼集中运往吴屯集。由于敌工站采用了“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的战术，发展的关系到处皆是，因而对敌人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就连豫东大汉奸张岚峰的干儿子吴建雄（日本人），都被我们掌握利用。每逢日寇增兵、换防、扫荡及其他活动，他就给便衣队讲，结果很快就传到了敌工站里。其他，如开封的原田部队、柳河的三本部队、商丘车站的小池部队等，其人数、装备和活动概况，都为敌工站所掌握。

拔除敌伪据点 惩一儆百

1944 年，敌工站的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日伪势力。敌人为了消除来自我冀鲁豫根据地的政治影响，防止革命势力的渗入，先后增强了其北部防线的部署。刘口驻扎汤道河一个营；裴武庄驻郑义之一个营，并设被服厂、炸弹厂及中学各一所；蒙墙集驻一个连；商曹公路南边的郑庄、谢集、梁堤头分别驻有伪区队。他们一时将我革命根据地通向商丘的道路全部堵死，对我开展工作十分不利。敌工站为加强同商丘地下工作者的联系，继续开辟陇海铁路以北的抗日游击区。根据分区指示，首先拔除敌人有影响的据点，给别处的伪军以警告。敌工站于 1944 年 4 月，派高学敏、王兴光二人，以伪营长的朋友身分，带着礼物（点心、烟土、老海等）“拜访”了伪营长郑义之。经一天的调查了解，摸清了敌人的实力与防御设施。敌工站将情况汇报后，军分区组织一个营的兵力约 500 多人，于一天晚饭后从青甄集轻装出发，奇袭郑庄。战斗从 9 点打响，半个钟头即告结束，歼敌 80 余名，并获得了被服厂、炸弹厂的全部机器及部分弹药武器。接着，我军又打了小刘庄，剿了顽固汉奸王心远的家，杀了作恶多端的地主刘保湖。驻扎在陇海路以北的各处汉奸队及伪区队闻风丧胆，各自寻找与我军联系的途径。从此，他们再也不敢死心塌地的与人民为敌了。

破坏敌交通 支援我大军

1946年6月底,蒋介石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首先,他以数倍于我的10万兵力,进攻我中原解放区中心地区,妄图围歼李先念部。为了配合李先念部转移,阻止徐州之敌西援,刘邓大军出兵陇海铁路沿线。五分区动员组织临铁路的县、区武装和民兵及广大群众4万余人,分编4个纵队,把碭山至谢集之间长达130余里的铁路来了个大翻身,并割断了沿路的电线,将徐州之敌困于苏鲁豫皖交界地。由于敌人失去了联络耳目和运输车辆,华中我军李先念、郑位三等率部顺利地进行了战略转移,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围歼计划。1947年7、8月间,为配合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我们又一次组织数万民工,将陇海线上的这段铁路来了个大翻身,并炸毁桥梁数处。使刘邓大军于8月中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跨陇海路,飞越黄泛区,冲过汝河、淮河,击破沿途敌人的层层防堵,千里跃进,长驱直入,挺进大别山,揭开了我军战略反攻的序幕。这年12月,为配合华野十纵围攻商丘,我奉命率队攻打敌谢集区政府,由党员李恭剑率先头部队插入,并牵制敌军7辆坦克,配合我华野部队围歼了商丘车站以北的敌军。

忆高唐“成丰车行”秘密情报联络站

解宝成

1940年，鲁西三地委、三大队被迫撤离高、恩、夏、平、禹边抗日游击根据地之后，白色恐怖笼罩着高唐。面对新的险恶形势，我唐北县委积极贯彻党中央关于敌占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开展地下对敌斗争。于1941年春，在县城成丰自行车行建立了党的秘密情报联络站，派我与赵立富同志，以车行商人身份为掩护，负责党的秘密情报联络工作。

成丰自行车行座落在高唐县城东西大街的西部，东邻日军司令部，西靠城隍庙（即现在粮食局所在地）。该车行除修车、售件外，兼营干鲜果品（罐头、糖果）等商品，请书法家写的牌匾十分醒目，门市壮观大方。我三叔解金芳任经理，他是社会上有多方面关系的知名人士。我的公开身份是成丰车行的“少掌柜”，共产党员赵立富则负责车行的外交，外人称其为“赵二爷”，还有服务员傅登峰（党的同盟人，协助做党的工作），会计傅登岭。我和赵立富头戴礼帽，身穿长衫，脚蹬皮鞋，眼戴墨镜，看上去很像通官气的商人。为了掩护工作，便于在社会上活动，经党组织批准，我们还拜伪县长李九的卫队长高德岭为师，致使社会上的上层人物都对我们高眼相看。

开业头一天，商店内挂满社会名流、商界以及朋友们送来的庆贺镜匾、中堂，其中伪县长李九的卫队长高德岭送来的长大玻璃镜匾，悬挂在商店北墙正中的地方，店内真是琳琅满目，耀眼闪光，煞是一派买卖兴隆的景象。开业伊始，一场新的战斗就摆在了我们面前。

“交友”与“结盟”

夏季的一天，打入敌“剿共班”的王洪达来到成丰车行，我们俩人商定了主动与伪警察所剿共班长赵俊岭结盟。因赵是伪警察所特务股股长姚俊堂的亲戚，拉拢他可进而接近姚俊堂，便于随时了解掌握敌情。

第三天晚上，我事先在成丰车行摆好糕点、鲜果供品，做好结盟准备。王洪达邀剿共班长赵俊岭来到成丰车行，举行结盟仪式，由我点蜡、上香、焚纸、助盟，赵俊岭、王洪达二人面北叩拜，共同盟誓，接着，按年龄长幼，赵为仁兄，王洪达为仁弟，王洪达向赵俊岭相拜，然后两人又向我这个助盟叩拜，最后，饮酒畅谈。从此以后，由赵引荐，王洪达逐渐接近特务股长姚俊堂，并取得信任，为后来被提拔为剿共班长，掌握伪警察所特务股的权力打下了基础。由于王洪达、赵俊岭经常出入成丰车行，在外人眼里成丰车行是串官商、通官气的场地，这等于给党的秘密情报联络站，蒙上了一层绿色保护纱，我们开展党的工作更加有利了。

启封敌密信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日伪顽疯狂活动。秋季的一天，云团的一名青年人外水（即采购东西为掩护进行侦察），来高唐城里成丰车行买东西，买了自行车零件之后，他见天已过午，从身上取出一封信说：“天不早了，我得赶回去，烦你让付登峰把这封信送到师范学校，交给赵多三先生。”我接过信后，心想这准是云团国民党特务们的密信，其中必有敌人的活动情况。赵多三是国民党高唐三青团书记，成天东窜西蹦，以谋害共产党员为能事。这封来自云团国民党特务的信必定隐藏着敌人的秘密。这时，我中共唐北县委书记解金声正在内室听取我地下党员王昀的敌情汇报（当时王昀已打入国民党秘密联络处——同生药店），我

立即走进内室把信交给了解金声。

解金声将信用水润开，取出信纸，果然是驻云团国民党高唐县党部书记戚镇三写给赵多三的密信，信中指示赵多三注意高唐共产党的活动，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以除后患。解金声看完之后，将信重新封口晾干，派付登峰送往高唐师范。针对敌人的阴谋，我地下党组织及时采取措施，通知我地下党员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坏。同时针锋相对，抓住赵多三到师范与一位女教师鬼混之机，开展了一场“捉鬼除赵”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猖狂气焰。

设计除敌特

1942年，敌剿共班特务李××经常化装成羊倌到高唐北部、平原、腰站一带刺探我党政军情况。一天他侦察回来后，向特务股长姚俊堂汇报了腰站一带有八路军活动的情况，姚听后如获至宝，高兴异常，并夸奖他有胆有谋，鼓励他进一步把八路军活动情况搞清楚，以便采取措施。

我打入剿共班的王洪达得知此情后，心急如焚。一天下午他来到成丰车行，找我商量对策。经过我们研究决定，为了确保我军安全，必须尽快除掉李××这个铁杆汉奸。随之我们商定了一个以敌制敌的方案。一天，王洪达来到姚公馆，装作十分尽心的样子，对特务股长姚俊堂说：“我有一件事想汇报，不知该不该说。”姚说：“尽说不妨。”王洪达接着说道：“李××在大田庄与一女人成天喝酒鬼混，不干正事不说，他还捏造假情况，谎报军情，骗取上峰的信任，望股长明察。”姚俊堂沉思了一会儿，发火道：“李××这小子竟敢戏耍我，真是瞎了狗眼！要不是你汇报，不然我要吃他的亏。”王洪达跟着说：“此人不可重用”。姚愤言道：“别说重用，干咱这行的就不能要他这样的人！”

王洪达见姚上了钩，便假意恭维说：“开除李××，股长真是高

明,省得让他给咱剿共班惹是生非,丢人现眼”。

于是第三天姚俊堂召集剿共班的全体特务宣布:“咱们剿共班里,竟有人不干正事,向我汇报假情况,谎报军情,搅乱人心,这人就是李××。现在我宣布把他开除回家。”

会议一散,特务们便议论纷纷,有的说:“李××干不该万不该欺骗领导。”有的说:“干咱这行就得踏踏实实地干,一五一十地说,欺骗领导等于犯罪啊!”王洪达听了打心里喜欢,就这样,在紧急关头,采取智斗的办法,除掉了铁杆特务,保证了我军的安全。王洪达也由此进一步得到了伪警察所特务股长姚俊堂的信任。

商情隐密信

在抗日战争中,为了加强运东地区与渤海地区的配合,遵照上级指示,我高唐党组织沟通了与禹城铁路工委的联系,中共禹城铁路工委负责人王林祥(现任河北省邯郸市外贸局长)以禹城新记花行经理的身份,与我单线联系。在日军的严密控制下,为了防止泄密,我们采取了以“商号对商号”互报行情的特殊方式来进行联络。信的内容从表面上看,是禹城新记花行写给高唐成丰车行的商业行情,如玉米多少钱,高粱多少钱,谷子、小麦、大豆、棉花多少钱……等等,而将党的机密,用淀粉水写在书信字里行间。他再用碘酒擦拭信纸,隐写在信中的机密字迹就显示出来,这样既迷惑了敌人的检查,又稳妥地传递了我党的秘密情报,因而圆满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掩护与营救

1942年春,七区地下党员刘英福在隐蔽斗争中,身份有所暴露,敌人盯梢并企图将其逮捕。党组织得知后,决定调他去运西党校学习。在敌人的严密控制下,为了能让刘英福顺利通行,赵立富随即找打入到伪警察所的地下党员,给刘英福弄个“良民证”,使刘

英福脱险转移到了根据地。

同年秋，国民党邓协忱部特务连长任怀训，长途奔袭高唐一区姜庄，暗杀了我地下党员鞠学诗之后，又窜到刘海子学校，企图对一区区委书记王育民（原名王立名，时在该校任教员）实施暗杀。当时王育民因事外出未在学校，得以幸免。

几天后的一天傍晚，王育民来到成丰车行，根据党组织指示，我派成丰车行的付登峰将育民护送出东门，并借商人北去运送棉花之机，将其藏到棉花车内带出县境，致使敌人的暗杀计划落空。

是年4月的一天，我打入伪警察所的地下党员刘本贵和打入伪新民会的柳本良，不幸被敌人逮捕。事情发生后，我运东地委非常重视这一事件，派地委敌工部长庞均来高唐组织营救。庞均进城后，先到果木市街郭宗辉家（郭是打入到伪四区区部的地下党员），让郭到成丰车行通知我去和他见面。我随即安排了一下，带了些桔子、苹果，装作出门看人的样子，拐弯磨角的来到郭宗辉家中，向庞均详细汇报了情况；刘本贵出事后，我即到菜市街他家中，代表党组织对其家属进行了慰问，并叮嘱其家属要保持冷静，对外不要透露本贵的任何情况；同时汇报了敌人还从他家中抄走了一些良民证，以及我去找伪县长李彩题的卫队长高德岭（我与本贵为工作方便曾拜他为师）寻求搭救的情况。据高透露说，事情还没有头绪，日本顾问追得很紧，本贵、本良也受了些苦，现他正托四区伪区长庞长申作保搭救。

庞均听了汇报后，经过认真分析，认为本贵、本良他俩很坚强，敌人还没有弄清他们的真实身份，如果把良民证的问题扯到经济上去，就好搭救了。他还告诫说：“鉴于目前情况，要高度警惕，同志之间不要再发生横的关系，以确保党组织和同志们安全，随之，庞均对营救工作作了周密安排。经过党组织的多方努力，加之社会关系从中协助，终于把刘本贵、柳本良同志营救出狱。

欢欣迎解放

1945年9月7日,我冀鲁豫二团等部队,解放了临清、夏津之后,挥师东进,一举消灭了高唐五区蒋家铺、河涯庄据点之敌,活捉了伪五区分团长郝兴魁(即郝五),声威大震。国民党张栋臣部弃高唐北逃,我军乘胜解放了高唐县城。解放高唐的先头部队,是冀鲁豫二团二营,该营营长是李国钧(原名李文同),进城后即住在成丰车行秘密联络站的隔壁的酱菜铺里。我与李国钧是同学,胜利见面,倍感亲切。我当即领他到成丰车行叙谈,并送给他仁丹等。我们正叙谈之际,有人向他报告说,有一股伪治安军正由博平向北溃逃。李国钧闻讯立即集合队伍向城南跑步进发,一举消灭了全部溃逃之敌缴获了机关枪和辛巴式步枪百余支以及其他一些战利品。战斗胜利结束后,部队才回城吃午饭,这是我与李国钧一次胜利的会见,也是最后的一次会见。后来国钧升任副团长,带部队南下,在四川剿匪时不幸牺牲了。

县城解放后,高平县委分开,高唐县委重组,县政府也随之成立。这时,我接到县委通知,骑自行车赴城西于庄李海传家接受任务。到达后,见到了县长解金声,县委组织部长唐兴文。我高兴地向他汇报了我军解放县城以及伪团长陈耀泰、国民党团长云茂才派人进城侦察的情况。解金声听后说:“眼下最要紧的是赶快把县政权建立起来,你马上回城去做准备。”

我接受任务后,立即返回城里,找到刻字工人杨朝山,请他刻制了高唐县民主政府及各科局的印章,与此同时,并四处联络人员迅速组建了工作队。参加工作队的人员有王洪达、李海传、解宝成、王昀、赵立富、郭玉芝、王佩林、储文兴、王之贵等十余人。随后,我们开展宣传工作,发动组织群众,查封没收敌伪资财,筹集粮秣被褥,组织民工支前。时间不长,县委书记卢云青、副书记李学实、副县长刘乃因也都来到高唐。各科、局、行、兵站等组织机构相继建立

健全起来。从此，我党建立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成丰车行”秘密情报联络站，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张金洪整理)

争取伪顽朱九文团起义始末

朱九武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八路军一二九师一部组成东进纵队，西出太行山，横跨平汉铁路，开赴冀南、鲁西敌后，建立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继而以孙继先、孙超为首的津浦支队，冀鲁豫边支队，东渡运河，开辟了以夏津、高唐、禹城、平原、恩县为主要活动区的鲁西北抗日根据地，领导各县的抗日救亡斗争，使鲁西北各县出现了驱日寇、灭汉奸、除匪霸、复失地、一片生动活泼的抗日斗争新局面。可是同时鲁西北各县也出现了许多打着“抗日义勇军”旗号的杂牌队伍和民团武装，其中不少是出于抗日救国的义愤组织起来的。有的则是地方惯匪拖“杆”；有的则是国民党部队的散兵游勇和地主武装，他们以实力地位寻找依附国民党或投降日寇，趁机发国难财“光宗耀祖”。这些遍地蓬生的杂牌武装，除少数接受了共产党的领导，变成了真正的抗日武装力量之外，大部在一段时间内挂上了国民党的招牌，变成了蚕食根据地、残害抗日人民的反动武装，或被日本人“招安”了去，变成日本人的帮凶。

我的家在鲁西北的高唐县官道朱庄村，我有个哥哥叫朱九文，他本来是赶马车、拉脚出身的。抗战开始，土匪遍地，他为了拒抗土匪的敲诈抢劫，在全村人民的支持和怂恿下，集中了40多枝民枪，结股自卫，稍有名气。1938年初，我八路军挺进鲁西北后，他率部接受了共产党的争取，参加了孙超、彭天琦、王克寇领导的冀鲁边支队，任特务连连长。我也在他带领下参加了八路军。但他过不惯八路军艰苦抗战、与人民同甘共苦的“清贫”生活，便编造理由，要

求回家务农。领导上批准了他的要求。他回家后，日、伪、顽各方对他威胁很大，他便又拉起了一支有 200 多人枪的队伍，并接受了国民党陈盛堂的团长委任。

我参加了八路军冀鲁边支队后，先在部队工作，以后为了开展地方武装斗争，又调高唐六区任区队长兼锄奸组长。后高唐县委书记庞均同志交给我一项特殊任务：要我赶快回家转入地下，争取迅速打进我哥哥朱九文团，把这几百人枪掌握到我党手里，以便形势变化、条件许可时拉过来，迅速把这支武装力量改造成抗日反顽的革命武装。

就这样，一切按照党的运筹和安排，我离开了战友和同志，独自一人回到家里，开始了长达 4 年半之久的特殊环境中的战斗生活。

我回家后，能否迅速打进朱九文团，迅速肩负起党交代给我的派遣任务，必须过好三“关”。第一“关”是能否使自己按预先编好的回家遁词站住脚，求得乡邻敌友的相信，先“生存”下来，然后才能徐徐图进；第二“关”是争取我哥哥朱九文的同情和谅解，允许我到他团里去“混事”；第三“关”是争取朱团第二把手——副团长刘富成信任、合作和支持。这三“关”中最难的是第一“关”起步难，突破第一“关”，再前进就具备了基础和条件。

第一“关”。我回家时正处于革命低潮，高唐县全党转入地下，疯狂的国民党反动分子陈盛堂、邓协忱等杂牌武装，在石友三指示下，配合日伪汉奸大量捕杀共产党人，全县一片白色恐怖。国民党部队也吹嘘高唐、禹城、夏津等地是他们蒋日伪合流的“模范区”。这时，如我一公开露面——“共产党的区队长兼锄奸组长的朱九武潜回家来了”，这风声一传出，立时就有被国民党反共分子捕杀的可能。因之，我回到家的第一步是严密“匿藏”。虽然也乘黑夜

经常被庞均同志指定的联络员接出来，到地下党员鞠学舜同志家中几次开会，研究斗争形势，但仍不能公开露面。我藏在家中，只有我父母、姐姐知道。那时为了防匪盗，家家晚上要打更，有时我姑念父亲年迈，就替他打更守夜，想不到自己年轻敲击梆子的声音有力而清脆，我侄子和邻里已听出那不是我父亲敲出的声音。我只好对乡亲们说：“八路都走了，我吃不了他们的苦，不愿跟着他们才逃回家来的，怕八路的人回来抓我，只好躲避一时。”说这话已是我回到家中四、五个月以后的事。幸好，这个阶段真正自动离队逃回家乡的，几乎每村都有。我的遁词自然也能成立，虽然有些人痛恨我这个“逃兵”，说些责备的话，但我无权向他们说出实情。这样，渐渐舆论平息下去了。

第二“关”。我哥哥当时任国民党的区长兼区团长，不常在家。不久，他知道我已“逃跑”回到家，便责怪我“不该在这个时候回来”，但仍父兄情怀地说：“既回来了，先不要抛头露面，先在家呆着吧，少和外人接近，少谈论国共两党和抗日救国的事，若惹出麻烦来，我也照顾不了你”。关于我回家的真实目的，他并没有深究或考问我。我哥哥是个充满了矛盾的人，他心中想些什么很少和我说。渐渐地我能出面了，舆论也平息了，我哥哥的杂团也“壮大”了一些。一天，我向哥哥提出到他团里去混一碗饭吃，他因忙于“区上”的事多，无暇多顾及队伍，也愿意有个亲信替他去掌管枪杆子，所以就同意了，派我到他团里担任了“军事指导员”这个专为我设的、属于团长代理人的职务。因为我是团长的胞弟，所以我这个“军事指导员”不仅军事事宜，而且一切方面都可过问，实际上是朱团的实权人物，与副团长刘富成共同治理发展着这个团队。

第三“关”。副团长刘富成是我们朱家的亲戚朋友，但也是伪顽陈盛堂旅派来的。所好，刘富成的岳父是我本家哥哥朱九余。刘比我大几岁，学生出身，有文化。据说抗战前读中学时曾参加过我地下党，但他从没有向我说过此事，当然我也不便问及。交谈中，他对

我党的政策有称道同情之词,对我党的高级将领都比较钦敬。我们间,从阅历、年龄上讲,他比我大,成熟老练;但从辈份上讲,他处于“贤倩”地位,我是他的“叔丈人”。在相处中,我能尊重他,有事多向他“请教”商量;他也比较能尊重我的意见,不以年长“位显”而自傲。所以,“逃回”之事,他从来不提。有一次旅部政训副旅长找我,审查我的来历,他便替我解围,说:“朱九武是个青年学生,吃不了八路的苦开小差回来的,又是朱九文的胞弟,八路方面也不会再信任他”。很快,我便与这个“上头”派来的人物密切了关系。

这就是我“回家”后到朱团任职先过的三“关”。

二

朱九文团这支最初属于民团性质的地主武装,虽然名义上挂上了国民党杂牌陈盛堂旅的一个团的招牌,实际上是以领导人为私有的土顽匪类性质的部队。我要在这样一个性质复杂的武装里发挥作用,一旦时机成熟要能把这支部队带得走,只吃“荫功”饭,只靠我哥哥的团长头衔,靠我是团长弟弟这“二老爷”的身份,是万万完不成党交给我的任务的。部队内部良莠不齐,藏污纳垢,鱼虾混杂,不以“仁”笼络他们不行,不以“威”镇住他们也不行。当时杂团林立,伪顽混杂,一个区有几种招牌的政权,一个招牌下在一个区拥挤着几个杂团争食掠地,对这些各路“英雄好汉”,不和他们上上下下打通关节也无法立足。党的任务在身,必须迫使我对内外都要十分考究地立身处世,稍有疏忽和不慎,就会给党的工作招致重大损失。在“仁”的一面,我不摆架子,和手下人以同胞手足相待,讲义气、守信用,宽宏大度,关心部属的疾苦。特别重要的是手枪班(即“近身卫兵”),不免要任人唯亲,挑选精明可靠的,但也要以义气、正气为重。与各山头的杂团头目,广交朋友,取“义”取“信”,互通友好,相互协调,以免相互鲸吞之患。为了在这群乌七八糟的杂团中立足,也要打击对“我”有害的。如王修纯团十分反动,反共积

饭，并且还打过朱团的埋伏，造成朱团伤亡。在我军的配合下，朱团袭击了王团一下。其他杂团头目认为我有魄力，博得他们的赞扬。他们主动要求与我友好，我也逢场作戏，扩大“联络”范围。如一次平原杂团刘宝忠之弟刘宝珠请我吃酒，结果去后，他们摆上黄表香纸蜡烛，在坐的还有恩县六区杂团头目尤克温、平原四区大绅仕张××，他们要和我“拜把子”、“永结金兰之好”，杂团结成姊妹团，有事相互支援。我也欣然同意了。所谓人缘不错，就是这样形成的。如树敌过多，就不能完成党交给我的派遣任务。

要治军，还必须有“威”和“严”的一面，否则，对外这个团不能生存，对内我这个“人”就将无用。比方，我给这支杂牌队伍规定了纪律，不准打家劫舍，不准随意杀人放火，不准盗卖枪支，不准强奸民女，如有违抗胆敢肇事的，一律严加惩办。事也有凑巧，我刚宣布了纪律不久，一个士兵公然又去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苦主找上门来。我调查清楚了这件事，立即召集部队，亲手处决了这个罪犯，对我属下的部队震动很大，不敢再藐视我宣布的“团”的纪律了。当地群众拍手称快，苦主又找上门来表示感谢。这在那些无法无天的土匪杂团中是根本做不到的。不仅在本团产生了杀一儆百之效，其他杂团也不敢轻视朱团了，都说“有法度才能治军”。又一次，我的亲信手枪班里有个人一天晚上潜回家去，杀了两个人。我知道被害的是两名地下党员后，就立即下了他的枪，捆绑起来，经调查属实，当晚我召集全团大会，当众宣布他的罪状，亲手把郭枪决了。有人说：“平时对亲信手枪班最宽厚的朱九武把身边的犯罪分子也枪毙了”，震动了全团，再不敢有人明目张胆地扰民害民了。由于这些措施宽严得当，树立了“我”掌握部队戎柄的威严。

三

我在朱团立足之后，为了更有效地了解日伪汉奸的活动情况，搜集敌人的军政情报，及时送回“娘家”，供县委和活动在恩城、平

原一带的我军团长马立朝同志掌握敌情，我分别以投资入股等方式，在恩县城内开了一个鞋店，在平原县城东关开了一个粮店，在恩县六区门吴庄开了一座油坊，在津期店设了一个联络站。这些站点，除津期店是用耿际厚同志的家属作掩护外，都是正经八百的买卖人开设的，我是他们的大股东，通过他们为我弄枪、弄子弹、弄药品、弄钱、弄情报。因为我是“玩枪的”，各杂团都有这种“不规”行动，都要通过各种社会关系、从各种渠道上弄枪、弄子弹，所以纵然叫他们秘密为我办这些事，他们也不会怀疑我是为八路办事的。恩县鞋店的掌柜是我一个熟人，为了更有效地利用这个鞋店，我们在成交合股时就谈判妥了：他领东当掌柜，我出钱股。但我要派一名管帐先生。为此，我派了党派给我的交通耿际厚同志去充任管帐。耿际厚同志是平原五区孔庄人，我们很早就认识。我派他到恩县城里之后，又把他妻子从咱们控制区的孔庄迁到津期店。耿妻是一个有觉悟的抗日积极分子，在津期店当联络员，成了我和县委、和马立朝同志联系的中转点，有不少同志受到她的保护和掩护。这时，县委又通知我，我的亲信护兵耿安贞是共产党员。我身边有了“二耿”像有了左臂右膀，如虎添翼，再不感到孤独了，遇事有人商量，与县委和马立朝团的联系更密切及时了。

平原粮店在买子弹药品方面起过更重要的作用。这个店的经理叫郭长江，与各界交游很广，能量较大，通过粮店给“我”从平原、德州、济南购进一批又一批的弹药。例如一次我从特务机关一四一五部队刘心浓手中买回几千发子弹。这些子弹或药品到我手以后，有的运回朱团，但大部及时派我弟弟朱九升同志、耿安贞同志和我的亲信护兵鲁文才用自行车送到门吴庄和孔庄，送到我们部队手里。如给马立朝同志送去的子弹累计就约1万余发，医疗器械和药品在外。输送子弹药品到解放区，门吴庄油坊起过重要作用。津期店地处平、恩、高、夏四县交界，耿际厚同志的“家”，为传送情报，也起过积极作用。

四

没有做过地下工作的人，很难身感实受地体会在敌营中处人处世的煎熬心理。我是抗日反顽的共产党员，但我必须与凶恶的敌人称兄道弟交“朋友”；而对同志和战友，却要以“敌人”来对待。与敌人交“朋友”这关好过，反正为了党的工作，为了最后争取、改造或消灭他们。而要把同志当敌人，这关就难过了。强行的忍耐、心理的压抑和刺激，真不是滋味。我是从部队派出做地下工作的，在遇到部队的战友和同志们时，很容易流露真情实感，稍有不慎，就会给整个工作和长远的计划招致重要损失。为此，我在指挥朱团“讨伐”、抢粮的联合活动中，尽量采取其他杂团认为的我是“狡猾”的真正的“游而不击”战术。凡我知道有咱们部队活动的地区我不去，如在夏津、高唐地区活动的马立朝，在禹城、茌平坚持斗争的王克寇等同志领导的活跃于运河以东的部队，都与我订有彼此心照不宣的“攻守同盟”，非迫不得已，我们彼此绝不“接触”，以尽量避免造成自己同志的无谓伤亡。

我的任务是把朱九文团拉到革命队伍中来，但我必须利用自己在敌营任职并握有一定权柄这种有利条件，营救不慎落入敌人虎口的同志。单纯营救被敌人追捕的同志较易处理，如地下党员鞠学舜同志，遭恩县日伪军追捕，我知道后，便亲自陪送他到小董庄据点，把他掩护起来，风声过了，又亲自送他出去。而在突然遭遇或在大众下被我的不知情的部下捕获的同志，他们往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骂不绝口，闹得很多人都知道他们的存在，处理起来却要很费周折。一次我带着伪军由恩县马王庄去河圈村宿营，在路经陈营村时，刚进陈营村公所，手枪班长尹世杰向我报告：“抓住一个八路！”我立时训斥他：“哪有那么多八路，你叫八路吓破胆了，还不赶快把人给我放了！”尹世杰认真地说：“是真的，身上带着八路军的文件”。我听这话，知道事情不好办了，文件已证实他的真实身

份,我只好先下命令:“还不把八路赶快给我捆起来,在这里叫唤什么!”人押到我跟前,我看了他携带的文件,知道是我们的同志无疑了,为了保障属下和陈营村长的耳目,我只好“训斥”手枪班长:“人赃俱在,还不准备镐锹,把他拉到河圈村外活埋!”

我带亲信把那位同志拉到河圈西北角的沙土岗后,叫耿安贞给他松了绑,把文件还给那位同志。我向他说:“念我们都是中国人,你赶快走吧,但念我这样处理你是失职,也很危险,我请求你一定要绝对保守秘密,保证我的安全。”那位同志开始是骂不绝口,这时对这突如其来的死里逢生又不敢轻易相信,仍然严词揭露我的“阴谋”。高声喊叫:“要杀就杀,要剮就剮,要活埋就赶快刨坑子,共产党人是不怕死的,既被你们汉奸抓住,就不准备生还!”我从内心更加敬佩这位同志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的气节,但我无权利把我的真实身份告诉他,也不能对他的凛然大义加以同志的赞语,只能好言相劝他:“不要说那些了,赶快走吧,我朱九武说了话是算数的,绝对不在你背后下毒手。”但那位同志还是不信我这“伪军军官”的保证,万般无奈,我只好向他跪下,“对天盟誓”:“如我有害你之心,不得好死,时间不早了,你赶快走吧!”这时那位同志才看出我的诚意,从我弟弟九升手中接过文件,侧身也跪在我身旁说了声:“我们都是中国人,后会有期,望你保重。”我又派耿安贞和我弟弟送他一段路才回来。回村后我宣布把那个八路活埋了。当夜我派耿际厚同志去夏津支队找马立朝同志,要求他赶快把那位同志调离,以免惹出麻烦。马立朝同志很快把那位同志转移到其他地区去了。

哪知事也凑巧,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到区上开会,陈营村那个村长陈长尹也来了,他有意凑到我身边,附在我耳边说:“朱指导,那天你在陈营抓住活埋的那个八路军,前几天我在那边见到了,没有死,人还活着。”我一听这话立时和他变了脸,厉声训斥他:“你造谣什么,你要胡说八道是要负责任的。”他一见我变了脸色,

不敢再申辩了，只好改口说开玩笑，是看错人了。我又警告他：“不要嚼舌头，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这才算把这场风波平息下来。

这件事过后不久，我的部下又在恩县辛庄派到一个小八路，只有十二、三岁，带一支手枪，骑一辆自行车，后椅架上捆着足一尺半高一大捆印刷品。我记得有三种，其中一种的书名叫《谁革命，革谁的命》。这个小家伙落入“虎口”后，气宇轩昂、大义凛然。他见我是个当官的，大骂我是“汉奸、卖国贼、日本鬼子的走狗”。这次我身边的人都可靠的，所以我只是笑，和颜悦色地说：“你不要骂，哪有那么多的卖国贼！”那位小同志立即反驳我：“曲线救国，也是汉奸！”我从这位小同志身上，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力量，看到了党的事业深入人心。我离开部队后，一直非常想“家”，想早点完成任务，拉着队伍回部队，我的急躁，不正是一种不愿再坚持敌营斗争的懦弱心理吗？与小同志的气质相比，我不如他。此刻我真想不顾一切把这位小同志抱在怀里，嘉勉他。但我不能，必须克制自己的感情。最后，把他所带的三种小册子每种留了一本作纪念，然后我亲自把他送走了。

五

高唐县反革命地主武装实力最强的一股，是八区的陈盛堂，他受委国民党石友三的一个旅长后，大肆招兵买马，扩大实力，拉拢人枪，给我哥哥这支无名杂牌委了一个团的称号。我哥哥这个杂团里有个队长叫陈耀泰，是陈盛堂的亲侄子，这两叔侄，叔暴侄残，侄不义叔不仁，兵戈相见，不共戴天。我哥哥归顺陈盛堂不久，陈盛堂给我哥哥下了一道密令，叫我哥哥秘密把陈耀泰处死，借刀杀人。他们至亲相残，我哥哥是局外人，不愿替陈盛堂杀人，就从中调解，以解他叔侄的家仇宿怨。陈盛堂坚决不从，三令五申要我哥哥替他雪恨。我哥哥一时糊涂，终于在陈盛堂的权势胁迫下，接受了

指令，布置了刺杀陈耀泰的计划。时值秋深，我哥哥以请吃晚饭为由，宴请陈耀泰。陈耀泰赴约来见，所带卫兵则由我哥哥的护兵以在家庭院里摘红枣吃为由，抱着陈的卫兵往上举，乘机用枪口对住背心，下了全部卫兵的枪。这时，预伏在窗外的枪手用驳壳枪对准陈耀泰射击，但枪手枪法不准，一枪没有击中陈耀泰，陈一拳打灭罩子灯，一脚踹开烂窗棂，破窗逃走。随后，陈耀泰带上他所控制的七八十人枪，逃到城里投了日本鬼子。伪县长李彩题加委为高唐二区（即我哥哥任国民党区长的这个区）的区长兼区团长。发生这件事时，我还在家中藏匿，还没有到朱团任职。当我知道我哥哥的做法造成的恶果后，我曾婉言批评我哥哥不该为陈氏报私仇，恶了陈耀泰。

陈耀泰受任区长后，经常出城讨伐、扫荡、抢劫民财，惨杀、活埋我抗日军民。此害不除，实为我高唐人民之大患。我到朱团后，陈耀泰投敌三、四个月了，我说服我哥哥和副团长刘富成，同意相机铲除陈耀泰股匪。陈耀泰的副团长叫曲捷清，是个叛徒、特务、国民党员，外号曲瞎子。刚好曲母死了，我们估计曲瞎子为其母办丧事的时候，陈耀泰也会去吊唁。于是，我带上三、四十人袭击了曲庄，打了他个措手不及，打死曲瞎子两名护兵，缴收长短枪四支。因曲瞎子拳术好，有些硬功夫，体魄健壮，在我追击他时，有一个七、八尺宽的巷子，他在空中纵身一跃而过。我在跳这个巷子时，跌落下来摔断左腿，终于使罪大恶极的曲瞎子逃掉了。

朱九文因夜袭朱瞎子，在高唐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打得好；也有人说该袭其母丧。但一致的结论是：朱九文团是要真正抗日的。这一名声的传出，有得也有“失”。“得”之是民众的爱护；“失”之是日伪联合对我。

结果是，1942年春节前夕，陈耀泰、曲瞎子二贼亲自领着日本鬼子山口中队长，结成300余人的日伪联队，分三路突然包围了我家的村子官道朱庄。我和我哥哥都驻防外村。朱庄村里没有一兵

一卒。日伪军鸣枪开炮(掷弹筒)向村里进攻时,全村男女老幼鸣锣击鼓,一齐拿起了红缨枪、大刀片、菜刀和少数手榴弹,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在同敌人的肉搏中,杀死日伪军19多人,但我父亲朱友堂、刘富成的岳父朱九余、我的护兵鲁文才的父亲鲁其俊等10余人惨死于日伪军的刺刀之下。敌人占领朱庄后,将全村的房屋、财产烧成一片焦土,朱庄人民在抗日斗争中,谱写了一曲悲壮、威武的战歌。

朱庄遭血洗,父亲和其他乡亲壮烈殉国。这是国仇、民族仇,但我哥哥却认为是源于为陈盛堂报仇而招致,本寄希望陈盛堂的嘉奖、同情或感激。但陈盛堂却与伪县长李彩题串通一气,指令朱九文团“化整为零”,“以免被日伪军消灭”,企图以这些借口解散朱团。我看出陈盛堂这一阴谋后,向我哥哥陈述。我哥哥不愿和陈盛堂见面,我便同刘富成一块去“晋见”陈盛堂,“请求”移防外地,以“减轻旅长的供给负担”为名,“求”他收回叫朱团“化整为零”的成命。陈盛堂既还挂着“抗日”的招牌,不便反对我们到外县去抗日的请求。这样,我们被迫离开高唐,北移到恩县吕井开辟新防区。我们在高唐的旧防区即被陈耀泰、曲瞎子占领,从此朱团与陈旅脱离了关系。

1943年春,我们移防恩县以后,斗争形势继续恶化,许多挂着国民党招牌的杂团,纷纷当了伪军。坚决不改旗号的李文魁,被日本人消灭了。这时恩县伪县长王化三向我哥哥招手了。王化三,抗战初期曾是范筑先将军指挥下的第三十四支队的司令,不久降日,当了伪恩县县长。我哥哥与王化三本不认识,王化三就通过已降日的区团长纪希文和恩县警察局长孟宜萱来争取我哥哥同去“曲线救国”当汉奸。我得知这一消息后,先作好了刘富成的工作,又让他带着我的委托,去做我哥哥的工作。但我哥哥说:“陈盛堂欺骗了我们,高唐不能呆了,我们来到人地两疏的恩县。这里是日伪势力“强盛”的地盘,如不走王化三、陈耀泰、纪希文的道路(指当汉奸),就

必须走李文魁的道路(指被消灭)。我并非忘了杀父之仇,而实在是处境艰难。”这时,县委也指示我要完整地保存朱团,以待反正的时机。终于朱团也改换了招牌。

六

我打入敌营后,最初只受县委书记庞均同志单线领导,随着鲁西北斗争形势的逐日好转,在鲁西北坚持斗争的马立朝、王克寇和胡永昌等同志领导的武装力量也都活跃起来。朱九文团先在高唐、后转恩县。盘踞区地处高、夏、恩、平四县之边,和咱们武装部队的接触逐日多起来。这些领导同志知道了我的身份和任务,总是积极主动的支持、配合、指导我的工作,特别是马立朝同志对我教育、指导和帮助最多也最及时。不只是我从顽伪方面给他那里送去了情报、子弹、药品,他也经常把敌伪的情报通知我,使我自明耳聪,及时了解敌我双方的斗争形势。不仅如此,他还为了我的安全和加强朱团的实力地位,亲自批发给我轻机枪 1 挺、长短枪 10 多支。

不管在陈盛堂那边,还是投了王化三,朱团从来不主动攻击我军部队,我军也从不主动攻击朱团。所以各杂团攻击朱团的谣言甚多,说:“朱九武通八路”、“与八路军间是真正的游而不击。”

有如下两件事,是我永远忘怀不了的。

一件是朱团在顽军陈旅时,陈盛堂召集属下各杂团到王克寇同志活动区的禹城、茌平一带去抢粮。其中以实力最强的李连祥团为主,包括云茂才、吴春阳、朱九文团在内。这次活动陈盛堂搞突袭调集,我们事先不知道,无法及时报告上级通知我们部队,只有依附陈盛堂“出征”。记得前进到禹城八区时,进犯顽军与王克寇团接上火,王团迅速派李文同同志领导的一个连迂回到我们背后包抄。顽军腹背被王团夹击,又正处在河沟一片盐碱开阔地段,我乘机下令我指挥的一个连向八路缴枪,也迫使陈盛堂另一个连缴了械。王克寇同志听说俘虏了朱九文团的人,一见到李文同同志的面

就问：“朱九武来了没有？”李文同反问团长：“客人给你请来了，你怎么招待吧？”这次会见是“久别重逢”，老战友关切爱护之情溢于言表。是日下午八点，李文同同志带着我见到了老首长王克寇同志。王团长一见到我，就握住手不放，激情地问我：“怎么样，是还走呢，还是留下来？”我说：“一切听从组织上的分配和安排。”王克寇说：“先谈谈朱团的情况吧！”当我向王克寇同志汇报了朱团、陈盛堂旅和周围各杂团的情况后，他坚定地说：“回，立即回去，一定要牢牢把朱九文团这400多人枪掌握在我党手里，等待时机成熟，把这支伪顽武装拉回来。”我问老首长：“什么时候才算时机成熟呢？”王克寇说：“一切听候县委和地委敌工部长庞均同志对你的指令和安排。”他还专门给我包了饺子，是晚就派团部侦察参谋赵毅民同志带两名侦察员送我“逃回”了朱团。

另一件事是朱团到了恩县吕井的事。

朱团到恩县吕井后，虽然不久就受王化三的“招安”，当了伪军。但王并不相信朱团，说：“朱九文团并不可靠”。想动武消灭又有些畏怯，就巧生奸计，下了一道调朱九文任武城区长的命令。武城是我八路军力量较强的地区，实际上在我民主政权控制之下。显然，王化三是想“一箭三雕”，即借八路之刀替他除患，又用朱九文团去给他扩大进犯解放军的“战果”，我陈述了我的看法后，我哥哥说：“我们在王化三的卵翼之下，不从就是违抗，如果恶了王化三，我们再到那里去？”他主张“明知是井，也要向里跳”。我再三陈词，最后我哥哥同意我不随他去，任我挑选精良武器和可靠的亲信，“化整为零”，把枪支匿藏起来，把人员分散暂且回家。我哥哥只带了200多人枪去“走马上任”。但是他只到恩县旧城就被滞留住了，不能再前进，只好当“流亡区长”，客居旧城。旧城村中有一条公路，路南驻王化三伪军一个中队，路北驻伪警察黑狗子20多人。我哥哥的部队就客居路北，以加强伪警察的防务。

这时，我亲自回到马立朝同志那里，和他商量解救朱九文的办

法。我提出的方案得到马立朝同志的支持和批准，他便通知部队把平原四区让出来，特别要保证我带队从旧城回平原辖区大张庄刘宝珠据点间的沿途“安全”，以免同我八路军遭遇，双方误会，发生火并。这样，我就独自骑自行车，到了旧城。借口家中有事，先送我哥哥去大刘庄“盟弟”刘宝珠那里。一切依计而行，开始我与伪警察所的头目打牌“取乐”。以我掷牌于地为信号，朱团的200人对付伪警察，轻而易举地就把伪警察捆绑起来了。伪警察头目企图反抗，我郑重告诉他们：“电话线已割断了，寨墙上都是我们的人，你们不老实，就休怪我朱九武不仁了。”我还告诉他们：“待我带部队走半个小时以后，你们才可以鸣枪报警。如果不信守我规定的时间，以后我就把你们都消灭了，叫你们死无葬身之地。”伪警察完全应允了。我带上朱团的全部人枪并新缴获伪警察的20多枝枪，沿途安全、顺利、毫无阻挡地撤到刘宝珠那里。第二天上午，我们到了平原四区大张庄，我哥哥和刘宝珠正焦躁不安地望着我们呢，他怕行事不利或在途中被八路拦阻了。

王化三借刀杀人，坐收渔人之利的计划落了空，又恶了朱团，就三番五次派纪希文、孟宜萱等说客来疏通，还派他的代表带着礼品到大张庄来慰问我哥哥，承认调朱团去武城处置不当，欢迎再进吕井驻防。只要求发还旧城伪警察武器，以解怨仇，成全孟宜萱的面子。我只挑选了八、九枝次枪退给他们。他们仍要求“全部退还”。我说这就是“全部”。他们只好接受这条件。朱九文团又胜利地返回吕井旧防区。

这件事在恩县震动很大，王化三再也不敢任意糟蹋朱九文团了。但是这件漂亮的“以进为退”的自卫仗，如果不是经过党的支持，朱九文恐怕早就不复存在了。党要保存这支武装力量的完整不被其他杂牌吃掉，是花费了心血的。

七

恩县六区小董庄伸进游击区六、七里路，位置比较重要，几个杂团都觊觎它，想到那里修据点，扩大他们的地盘。我亲自去会见马立朝同志，和他商量是否早点由朱团先下手，以控制在我们的手里。他支持我的意见。我说：“但是有一个问题：别的杂团来修碉堡，经常遭到我军的打击，如果我修，部队不来打一打，那不是宣布我私通八路了？”马立朝同志开玩笑地说：“你朱九武给我送来多少子弹？我的子弹都要用到日伪汉奸头上。”我说：“咱们的部队不打下我一下，我去那更不好处啊！”他一本正经地说：“办法自己去想，困难自己去克服。”然后他又补充了一句：“我没有子弹浪费。”

在马立朝同志的启发下，我终于想出了自我克服“困难”的办法：叫耿际厚同志带领耿安贞、朱九升、鲁文才等亲信，假扮成“八路军”趁夜晚“攻打”小董庄正在修建中的据点。我朱团连续“击退”了“敌人”的进攻，连连向王化三报告“战果”。又很快修成了董庄据点，其他杂团也不敢肆无忌惮地攻击“朱九武通八路了”。

记得朱团从旧城回吕井不久，我带一个连从邱小李庄移防到阙庄。还没进村，尖兵报告在村口大庙前有便衣行动。我猜想可能是我们的部队，便立即下令朱团后撤，但部队已从正面村里冲出来开火，我手抢班的鲁文才被打死。我手下的人立即还击，双方都有伤亡。我当机立断迅速设法撤出战斗。战斗结束，我亲自督促给鲁文才买好棺新被，华服装殓。

是夜我赶到马团长那里，向不幸死难的同志致哀悼之意。在我没去之前，我军缴获了鲁文才佩带的手枪，这支驳壳枪是马立朝同志使用过，又转赠我的。所以当那支手枪一出现在马团长面前时，他就流了泪，痛苦异常地说：“朱九武同志被打死了！”及至午夜我到立朝同志跟前时，他悲喜交加地说：“九武同志，你不要难过，我知道你还活着，大家就都放心了。”我说我是来接受组织处分的。马

立朝同志说：“都怪我消息不灵，不能怨你。”听他这样说，我更难过了。我说：“半路遭遇，不能怨咱们的部队，我在那边，责任在我身上。”当他知道朱团遇难的就是曾多次给马团送过弹药的鲁文才时，异常难过地说：“这个青年人回到革命队伍里来，一定是个勇敢的好同志，他为抗日救国做了不少工作，应该被我们永久怀念。”

虽然这次遭遇战，死伤的都是为抗日救国效力的同志和进步青年，实属不该。但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二重性，立朝同志一再说：“这也好，愈打，你在那边的‘地位’愈巩固，可以消除敌人对你的怀疑。”当晚我返回朱团。第二天隆重给鲁文才办了丧事，以扩大朱团“打过”八路的政治影响，并向王化三报告了我们“讨伐”的战果。我们很好地利用了这个痛心的事件，反击了敌营屡屡密报我勾结八路的“谣言”。

八

随着抗日斗争的深入发展，从1944年开始，我各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发布的“削弱敌寇，发展我军，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的指令下，开始了局部反攻。我鲁西北地区的抗日军民也积极出击，不断拔除敌人据点，扩大解放区，相继成立和恢复民主政权。就在这时，地委敌工部长庞均同志亲自召见我，指示朱团放弃地处高、夏、恩、平四县交通要道上的津期店据点，以利我抗日部队的运动。我立即执行地、县委的指示，迅速从津期店撤出朱团。1945年6月29日庞均同志再次召我去他的驻地，向我传达地、县委要求我迅速把朱九文团拉回到解放区的决定。庞均同志问我，需要多长时间？我说保证在7天内做好反正起义的准备工作。这时，朱九文团的全部人枪已完全控制在我的手里，把这支杂牌武装拉回自己的部队里去，我有较成熟的把握。但重要的是对我哥哥怎么办？是撇下他不管呢，还是首先把他的工作做好，争取他再次参加八路军呢？庞均同志从统战工作和我党一贯关心和营救曾与我合作过的

人士的大局出发,坚定不移地指示我必须充分做好朱九文来归的工作。就我个人来说,不仅与他有兄弟手足之情,不容我把他丢给敌人代“我”受过,就他与党的关系来讲,他对我“逃回”家没有追究一句,而对我到朱团后的一切与我党我军的接触活动,他也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来没有责备或阻难过我。我作为党的派遣争取他的代表,党的政策也不容许我把象朱九文这样与我党“合作”(不管他有意或无意也好)过的人丢下不管。所以,我接受庞均同志的指示后,返回朱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做争取朱九文同意“带队”起义反正的工作。

我回到朱团,第一次和他谈过我的意见后,他慨然同意4天内把部队拉到解放区。但到第2天,却变了卦,要求与我分“家”,任我挑选精良人枪带回八路军那边去,他却要坚决去恩县城里躲藏。他为了说服我,请来一位“德高望重”的于八爷,来担保他进城后安全。哪知这位对我党政策深表过钦佩的于八爷却对他说:“城里人是不讲信用的,你应该听九武的话,不能进城去。”这样,朱九文又同意了我的要求。

我把争取朱九文的情况,派联络员回复给庞均同志,言定4天之内(即7月1日)拉回部队。庞均同志并派联络员来到我的驻地胡庄,以便我和庞部长之间的及时联络,并具体研究迎接朱团反正后开赴解放区的事宜。

那知到了第4天,1天内,我哥哥又变卦四次,坚决不跟着我走。我向他哭诉:“念兄弟之情,请你陪我这一次。上一次(指1938年初我们共同参军)不是你带我参加八路的吗?”他耍起了赖皮说:“你带上八路军来攻打我,我也不投降。”

我看他主意已定。这是最后一天了,我就向副团长刘富成说了实话,请求他的合作,去做我哥哥的工作。刘富成说了个口干舌燥,可我哥哥仍无回心转意。

我又做我嫂嫂的工作。她是一位深明大义、头脑清醒的人,完

全支持我，帮我规劝丈夫要全国全家重手足情，听兄弟的话走光明道。我哥哥仍以“妇人之见”来训斥我嫂。嫂嫂恳切明快地对我说：“兄弟，咱们全家走，把你哥哥一人丢在这里，嫂嫂带上两个闺女听你的，跟你一块走！”这样，我哥哥才最后同意了我和嫂嫂的恳求，表示不再反悔，同意率部起义。我立即飞车回到胡庄，请联络员最后向庞均报捷。

7月1日，我去吕井，把全团人员召集起来讲话：“我向大家宣布一件大事：经朱九文团长、刘富成副团长和我共同研究决定，我们这个团从今天起宣布弃暗投明，举行反正起义，参加到八路军队伍里去！……”

全体人员中无一人起来骚事或反抗。

地委派恩县独立团许团长和胡永昌政委带部队到离吕井3里路的陈营迎接我们。为了解除朱九文的疑虑，7月1日，许团长和胡政委没带一个警卫，又亲自到吕井拜会朱九文。当天我们带领全部人枪、马匹、弹药，撤出吕井，向解放区开进。部队拉到肖里长屯，庞均等首长带领解放区军民夹道欢迎我们。两天后，又在新盛店召开隆重盛大的欢迎会，冀鲁豫六分区刘华清副政委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讲了抗日反攻的斗争形势，并宣布命名这个团为“冀鲁豫军区第六军分区（因驻地夏津亦称夏津军分区）特务团”，任命我为团长，党派来蒋怀玉同志为政治委员。

10天后，我和蒋怀玉政委率部参加了攻打新桥镇敌据点，围歼汉奸王纯修杂团的作战。由于朱团和王纯修之间有所谓“宿怨”，当敌人弄清由我带领原朱团人马参加这次作战时，王纯修怀着“新仇旧恨”，宣称朱九武的杂牌不是真八路、战斗力不强，组织敢死队于黄昏之后猛烈攻击我们驻地，企图从我这里打开缺口，杀退我军的进攻。一度，我们被王纯修部队包围了，形势极为严峻，大有敌人想把我们一口吃掉之势。在这种敌我态势下，我当机立断，也组织了精干兵力，把蒋政委交给我弟弟朱九升排长警卫，我带上几十

人,迂回到敌人背后,端着刺刀,和敌人白刃格斗。一场肉搏下来,刺死敌人 10 多人,缴获轻机枪 1 挺,10 多支步枪,终于杀退了王纯修的敢死队,最后配合兄弟部队,消灭了王纯修一部,解放了新桥镇。

再后,这个团奉命调回高唐,参加了消灭高唐各杂团和拨除敌伪据点的战斗,为对日作战的最后反攻贡献了力量。解放战争中,这个团升为正规军,编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二纵队,参加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

(张金洪整理)

智送情报 巧护亲人

孟静明

我是1943年10月参加革命的。我父孟文参(系伪虞城县贾寨区区长)与边区民主政府八区区长陈继鲁(共产党员)相识。陈劝我父帮助八路军做工作,我父欣然同意。那时我20多岁,尚未出阁。为了方便工作,我和父亲商量,决定利用亲戚的关系,在商丘车站复兴大街六号以开“盛泰粮行”为掩护,建立情报联络站。站长是阎东立、刘富建,情报人员有刘福轩、杨文行、杨香亭、王玉民和刘春章等。

我搞敌军情报的活动范围,主要是在商丘车站和虞城之间。活动的方法:一是亲自去敌军营房周围侦察敌人的数量。从1944年到日本人投降前夕,我经常去朱集复兴大街伪警备队长李文盛家(李是我父亲的朋友),利用和他谈话的方式,刺探日军出发扫荡的时间、地点和人数。搜集到这些情报后,便由阎东立送给陈继鲁,由陈转交八路军十三团。

1944年,曹东南情报站南分站站长马好学也在我家建立了情报点。我们预先商定:如果被敌人发现,好学就说是我弟弟的朋友。不久,马好学同志被捕,敌人把他绑去交给伪队长孟宪章(我的本家侄子),孟要活埋好学同志。当好学同志说出和我弟弟是朋友时,孟随即赶到我家问我:“大姑,你了解马的身份吗?”我说:“前几年我母亲死的时候,光知道有个姓马的和我弟弟是同事,还给我家带过一次信,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孟宪章听后信以为真,就说:“他叫马好学,你说放不放?”我故意说:“我可当不了你的家,反正他是

你昭玉叔的同事，那你就看着办吧！”结果，孟宪章回去就把马好学放了。

1945年，刘福轩同志来贾寨侦察敌情，他骑的自行车是缴获伪保安旅的。他把自行车放在我家，我表侄陈海军骑出去，结果车子让保安旅认出给扣留了。保安旅的董黑留立刻带人包剿我家。福轩这时还在我家里，情况非常紧急。我急中生智，果断地对董黑留说，车是赵云清给的（赵是伪团长曹永年的跟班，平时吸毒品和零花钱多是我家给的）。我说罢后，董立即将赵云清找来对质。我暗示赵承认车是买来还我家帐的。后来，我又拿出六十斤小麦，换成烟土送给赵云清和董黑留，才平息了这场风波。

1942年8月，刘福轩又一次来取情报。我把当晚保安旅要抄袭八路军的消息告诉了他，并让他立即向上级报告。谁知，刘却回家吃过晚饭才走，当他行至中途时便与敌人相遇，结果被伪保安大队长安克明抓住，绑起来押送到曹永年处。曹一听汇报，便下令“活埋”。我听说后，立即再托赵云清去和安克明交涉。安坚持不放，赵又找到曹永年，请他出面交涉，最后才把刘福轩放出来。

1945年初冬，我弟弟孟昭玉在伪张岚峰部通信营当副官（该营驻在商丘城里，伪营长韩同钦原系国民党虞城县七区区长，同我父亲是故交），在那里，他除了了解敌情之外，并给八路军十三团买了不少弹药。

同年，我军准备攻打商丘，需要市内的军事布置图。我接到任务后，就叫粮行会计王英华画草图一张，经杨文行交阎东立送往部队。

一九四七年，刘邓大军南下时，我接到上级指示，叫我弟弟在敌军内部搞一张地图。昭玉趁敌人吃饭之机，在营部将压在办公室玻璃板下的一张地图偷出。敌人发现地图被盗，便立即进行搜查。待三天之后事稍平息，昭玉把地图交给我时天还没亮，他又安排勤务兵雇黄包车送我出城。我到朱集东闸口过铁路时，被敌人哨兵拦

住并扬言搜查。我说：“俺爹是区长，弟弟是副官，我是未出阁的姑娘，不能搜！”敌哨兵说：“不管小姐、太太。过岗哨都要搜！”这时我吓唬他说：“搜出东西来你杀我，搜不出东西我要杀你！”哨兵一听便胆怯起来。此时天已大亮，赶集的人多了，哨兵忙着去搜挑柴的、卖面的，我便趁机过了哨卡。回到家，我将地图交给杨文行，由杨交给了我军。

1947年4月，我十三团医助杨德胜同志的岳母、爱人、内弟三人，被保安旅头目韦国珍抓去带到刘庄。敌人把他们吊起来毒打一顿后，准备就地活埋，杨文行送信给我，我和父亲商量后决定：先以父亲的名义给韦国珍去封信，求他释放杨德胜的家属，接着再给韦送去大烟，并设宴招待，终于使杨的三位亲人脱离了险境。

我在商丘车站地下联络站工作期间，还为我军购买了许多弹药和各种军需用品。如：油墨、蜡纸、复写纸、电池、电灯、磁碗以及制药用的烟土等。

1950年冬，复程县六区奉军分区指示捉拿伪队长×××。我区武装部长张汉臣同志将任务交给我，经多次到伪队长家找其父做工作，结果于1951年1月2日，将伪队长抓获，交复程县公安局。经教育后，伪队长又供出伪团长1人及伪旅长和他的马车1套、牲口3头。在商丘市，他又交出20响手枪1支和子弹若干发。

(兰忠诚整理)

日本教官管昭投奔解放区的经过

谢保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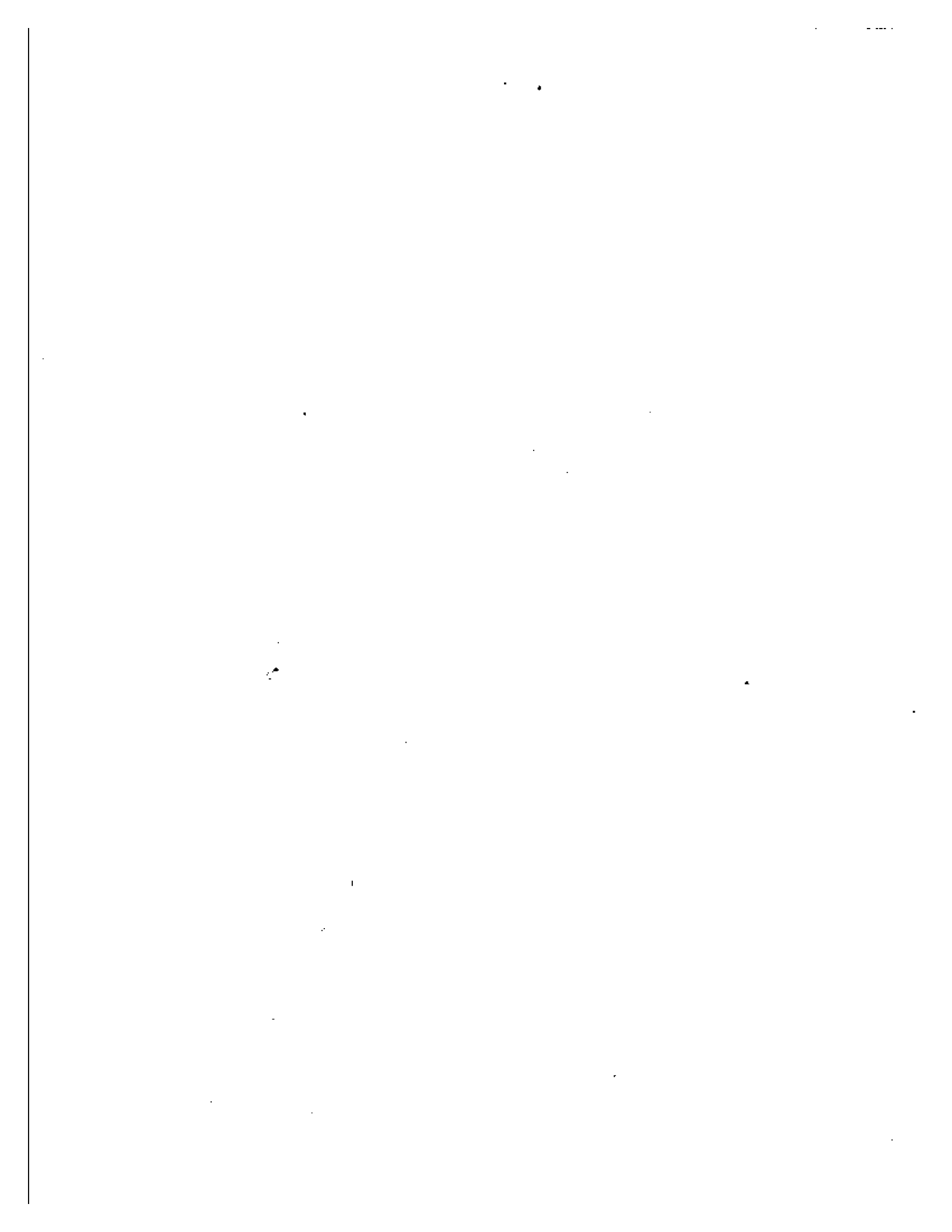
事情过去整整40年了。那年夏天，我在伪警备队十一中队当兵。一天中午，警备队副队长朱东勤到我们十一中队，说是要一个去商丘带路的。我们中队长派了我，按照朱东勤的命令，我赶忙到伪县政府大堂外等候。去那里等候的还有五中队的陈义生、万五荣，马车行的王三能和一辆四轮马车。从中午到下午，一直等到天黑，才从大堂里走出两个人，一个是日本教官管昭，一个是从商丘日本宪兵队来的高翻译。高翻译问我是不是带路的，我点头称是。他说：“跟我来吧！”我跟随他走进大堂。高翻译先拿出三支日本大盖枪，让我放在马车上，又拿出两支匣枪，分别交给我和陈义生佩带。然后令陈义生、王三能赶车先行，到大隅首等着。管昭、高翻译领着我走向张家包子铺（今曹县影院门西）。管昭、高翻译在包子铺呆了不到半个钟头，就领着两个朝鲜妓女出来，手里还掂着一个提包。我们几个到大隅首坐上马车，就朝南门驶去。管昭、高翻译和两个朝鲜妓女坐在当中。我和陈义生分坐在两边车帮上，王三能坐在前面赶车。刚过白衣阁，高翻译令我下车喊门，吩咐我就说司令官出城。我赶紧下车，朝南面大喊：“门上谁的岗？”岗上回答后，我又喊：“司令官出城，快开门！”城门很快便打开了。马车出城以后，高翻译问我：“去大义集的路可知道？”我回答：“知道”。他又叫我把走的路线说了一遍，才放心地点点头。马车一溜东南，途经小朱楼、火神庙、木瓜园，天刚放亮，就顺利地到达了大义集。我们从北门进寨，在隅首南面的胡家烟店停车。烟店掌柜胡老头出来招呼，管昭、

高翻译等相继下车。街上群众见状，以为是日本鬼子出来扫荡，吓得乱跑乱窜。高翻译令我到甜秫秸孙庄找八路军的胡连长联系。我说不知道路，他便让胡老头领着去。我们刚出南门，就碰上一位八路军的班长。胡老头认识他，把情况给他说明。那位班长说，胡连长已在东边迎接。我回来一报告，高翻译道：“好！”随令驾车前往东门。离东门不远时，突然枪声大作，高翻译急忙起身大呼：“不要开枪，是司令官来到，早就有联系！”那边的一个官长也大声说：“司令官来了，谁也不准再开枪。”枪声停止后，马车出寨，八路军战士纷纷迎上前来。经人介绍，那位官长就是胡连长。管昭、高翻译把三支长枪交出，接着又要交两把匣枪。胡连长说：“长枪我们收下，匣枪你们自己带着！”管昭不同意，坚持全部交出。胡连长道：“好吧，都上车，首长还在柏园等着你们哪！”于是马车继续东行，去柏树园。

还未进村，八路军的团长等七个领导就迎出村来，跟管昭、高翻译和我们几个人一一握手问候。团长说：“算着你们昨天就该来到，已经接你们三次了。”接着我们跟随团长进村，八路军特意用西瓜、凉面条招待了我们。之后，管昭、高翻译等留在八路军里。我和陈义生、王三能赶车回城，当天下午就被日本鬼子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马龙臣、朱东勤。

（曹县党史办整理）

专 题 资 料



冀鲁豫军区第二办事处

濮阳县委党史办公室

冀鲁豫军区第二办事处(简称“二办”),也叫对孙(良诚)办事处。

“二办”是冀鲁豫军区根据区党委和军区召开的全区第一次敌伪军工作会议精神,为了对付伪二方面军孙良诚这一大股敌人,特设在昆吾县(今属濮阳市郊区)的一个秘密敌工机关。于1943年5月建立,至同年11月,杨得志率部奇袭八公桥,全歼伪二方面军孙良诚总司令部后,合并于军区敌工部,历时半年多。

四分区政委张国华同志兼二办的主任,毛定原同志任副主任,主持具体工作,正式工作人员有李苏波、张经五、王贯一、王冰如等十来个人。军区敌工部部长李一非同志常住二办亲自指导二办的工作。二办没有科室设置,也没固定的办公地点,主要活动在临黄堤两岸,伪二方面军前哨之里,总司令部驻地之外,群众环抱之中。

“二办”的主要任务是,收集传递孙部的情报;拆散孙部与其他伪、叛、顽、杂的联合;分化瓦解孙和总司令部、八大处、兵工厂、各军、师部和直属团,最后挫败伪孙良诚部、巩固冀鲁豫边区根据地。

一、敌我斗争形势与二办的建立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日寇为了挽救其败局,垂死挣扎,一方面加紧对国民党当局诱降,一方面驱使伪军对我革命根据地实行空前规模的“扫荡”、“蚕食”,以实现其“变华北为巩固的兵站基地”的狂妄计划。日、伪、叛、顽、杂互相勾结,狼狈为奸,

纷纷打起“剿匪”、“灭共”的破旗，建立据点，修筑工事，扩充地盘，郟城的刘本功把住冀鲁豫的南大门，侵占了贵楼、旧城等重镇；朝城的文大可大挖冀鲁豫的后墙根，蚕食了贾庄，虞铺一带；特别是伪二方面军孙良诚卷土重来，由山东曹县、定陶挥师北犯，大举进攻我冀鲁豫腹心地区一两濮（濮阳、濮县）。冀鲁豫的形势急剧恶化。

孙良诚原是国民党正规军第三十九集团军副司令兼鲁西行政公署主任。1941年底至1942年初，孙被我军连续击败南逃。在“曲线救国”的幌子下，孙于1942年4月公开投降了日寇，被委任为伪二方军总司令，经日寇、汪伪的精心扶植又复活起来。1943年初，孙自以为羽毛丰满，便率两个军，号称五万雄兵，实则不过三万人，重犯我冀鲁豫根据地，其先头部队窜至濮阳以北，抵达清丰、观城，总司令部设在濮阳城南45里重镇八公桥，扬言全占两濮，吞掉冀鲁豫，反动气焰十分嚣张。

孙良诚坐阵八公桥，南临黄河天堑，北依濮阳古城，又有两门、徐镇两大重镇做左右翼，军事防范十分严密。镇内人字街心筑起了大碉堡，架起了轻重机枪，指挥全镇，镇周围修了一丈多高的围墙，挖了一丈多深、两丈多宽的壕沟；沟外又扎了鹿砦；再外是二华里的开阔地，扫清了隐蔽物，难攻易守。直辖三十八师两个团和一个特务团守卫总司令部。精锐新五军王清翰部做前哨，嫡系新四军孙雨田部做后盾，军械装备精良，工事坚固，碉堡林立，步步为营。再加上孙与总参谋长甄纪印是老同事，新五军军长王清翰是老同乡，新四军军长孙玉田是堂兄弟，与相当一部分师旅团长有瓜葛。他们之间，既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又有同乡、同学、同事、同族的私人关系，既有军事上的指挥协调，又有感情上的互相辅助。孙认为本部是铁板一块，既占有地利又拥有人和，坐拥雄兵，虎视眈眈，不可一世。于是他便肆无忌惮地抓丁拉夫，抢粮逼款，伐树拆房，断桥破路，拚命四出“扫荡”、“蚕食”，扩充地盘，以实现其围剿冀鲁豫根

据地的狂妄计划。昆吾原来是一块比较坚固的革命根据地，而现在面积在一天天缩小，人心在动荡，恶虎卧门，对冀鲁豫根据地中心区威胁很大。因而。乘敌立足未稳，拔掉八公桥这个“钉子，”挫败孙良诚这一大股敌人，保住两淮对整个冀鲁豫和全国各个抗日战场都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然而，仗怎样打？“钉子”怎样拔？不光是个战术问题，也是个战略问题，就当时敌我双方军事力量对比，敌人处于优势，我们处于劣势，要想以劣胜优，就必须对敌人开展分化瓦解工作，把孙良诚这块“铁板”敲炸缝儿，使其支离破碎，失去协调，指挥失灵，士气低落，把战斗力压到最低限度。

“二办”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二、二办的主要活动与成绩

“二办”独立存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所作的工作却不少，取得的成绩也很显著。

1、利用西北军旧部，迅速沟通与孙良诚部的关系。

孙良诚原属西北军旧部。冀鲁豫这一带在西北军当过师旅团长的大有人在。这次孙部北犯，大量吸收西北军旧员，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二办”紧紧抓住这个良好机会，积极动员曾在西北军混过事的社会名流来“二办”帮助工作，利用这些人员尽快沟通与孙部的联系。

首先是山东鄆城的张履福。张本来是个农民，在家无以为生，逃荒到了山西，当了土匪。后来投靠西北军，当了混成旅长，参加过北伐，解甲归田后，又成了鄆城一带的大绅士。军阀、官僚、地主、土匪、流氓他都通。张与孙良诚的关系甚笃。张称孙良诚大哥，孙则唤张老弟，二人无话不谈，亲密无间，张一来便成了孙的座上客。孙的司令部、八大处、兵工厂，各师、旅、团部等很快被张沟通了。孙部的兵力部署、武器配备、工事修筑，军师团各部的关系，士兵情绪情

报,张一一介绍给我们。

其次是赵明甫。赵是濮阳柳屯人,曾当过旧民团局长。(后来曾任冀鲁豫边区参议员)。赵在濮阳一带颇负盛名。孙良诚想利用赵的地方实力,又有旧情,孙赵二人也打得火热。赵不便在孙部直接出头露面,便把自己的同乡、亲信、旧军人张连仲介绍到孙部工作。张连仲既有旧军人的感情,又有浓厚的乡土观念,遂把濮阳一带的兵痞、流氓,落草的官僚等荐到了孙部。这些人是革命的对象,社会的渣滓,但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也能为革命做一些有益的工作。濮阳四一、四二连续两年大灾荒。赤地千里,粮食奇缺,人民群众糠菜难以饱腹,伪二方面军的官兵吃粮也很困难。“二办”通过这些入用粮食收买,也沟通了各部的一些关系,得到了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

2、利用“交朋友”,打进敌人内部。

孙良诚部的总参谋长甄纪印,河北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书生气十足,凭着与孙良诚的乡土旧情掌握了伪二方面军的军事大权,为人处事总好以“友情为重”。我们利用甄的这些弱点派吴尧衢同志打进甄的总参谋部。

吴尧衢同志北伐后曾任过宁夏省教育厅科长。这时甄纪印任该厅厅长,吴与甄在一起工作期间关系搞得很红火,互以朋友相待,往来没有戒心。这次故交异地相逢,又当孙部望才若渴之时,甄见吴分外欢喜,坦然地说:“你来了,很好!咱们是老朋友,请你就在参谋处任机要科长吧!”

吴尧衢同志担任总参谋处机要科长以后,不顾个人安危,积极开展工作,利用合法身份,千方百计与孙部的各处、部、室搭线联系,拜朋友,賤人情,关系搞得热热火火,而后,便把我们的侦察参谋、敌工人员安排到孙部各个要害部门。

从此,孙部完全被我所控制。

3、开展争取工作,签订“君子协定”。

张履福,吴尧衢等的积极活动,流散在冀鲁豫一带的西北军旧员的大量荐入,我们的敌伪军工作的大力开展,伪二方面军因军机的泄露,组织的失控,指挥的失灵而导致“扫荡”、“蚕食”的失败,使孙良诚部的上层人物大为震惊。于是,孙良诚恼羞成怒,准备采取大规模的军事冒险行动,对我冀鲁豫边区展开全面进攻。但是,另一方面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开展,人民武装力量的日益壮大,对小股敌人的不断袭击,也促使孙良诚对自己的冒险行动计划不得不慎重考虑。

正当孙良诚左右维谷,前后为难,心意难决的时候,李一非、冀炳南、吴尧衢,张履福等积极疏导、联络、牵头、接线。于1943年七、八月间,张经五同志代表冀鲁豫军区,孙玉田代表伪二方面军总部,张履福从中作保在徐镇伪二方面军三十八师师部进行谈判,共同申明了团结抗日的大义,拯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重任,并交换了电台、马匹。对伪二方面军官兵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达成了团结抗日互不侵犯的“君子协定”。

这次谈判,特别是“君子协定”签订,稳住了敌人,使两淮地区的军事磨擦暂时缓和下来,但是,这种缓和是暂时的,孙良诚对团结抗日并没诚意。不久,《协定》便成了一纸废文,明的小股敌人不断向我出击,暗的孙部署大的军事行动。故我们也只好做和与打的两手准备。

4、密切配合地方党群,摸清敌情,绘制八公桥战略图。

“二办”除利用西北军旧部人员,濮阳当地的社会名流开展工作外,还密切配合当地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与原属地方上的情报机关保安队,八公桥等联络站取得了联系,结成了一个情报网,及时准确地收集传递了孙部的情报。军区参谋长闫揆要,回民支队作战科长李国栋,二分区参谋老魏、侦察股长丘克难等同志经“二办”牵线,都先后与昆吾县委、三区区委,八公桥联络站等取得了联系,选定了可靠的情报员,部署任务,了解情况,到现场观察敌情,为奇

袭八公桥提供了大量的情报。

昆吾三区区委委员靳志海接受任务后，利用其在八公桥当过几十年长工，人地两熟的有利条件，组织了以八公桥党支部为核心的联络站，专门收集孙部的情报，情报员郭建武以伪村长的身份，拿着称、帐本、算盘装着催粮派款，在八公桥镇内走街串巷，挨门查户观察敌情，在他的帐本上密密麻麻地记着某院柴草垛一个，某家高粮杆五十斤，某户豆子一百斤……。这些“柴草垛”、“高粱杆”、“豆子”、分别代表炮楼、枪支和伪兵。

经过几天紧张而机智的工作，孙部的兵力、火力、工事及防范措施等等全部摸得一清二楚，几个情报人员对收集到的情报又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周密的设计，一天的晚上，在郭建武家的羊屋里，用一块压豆腐的案板做桌子，神不知鬼不觉地绘出了一张详细的八公桥战略图。在这张战略图上，不仅孙部的兵力、火力部署一目了然，而且连哪里有眼水井、水坑，哪里有堵墙，有座庙，哪条街有几道胡同，甚至谁家养着一条狗都清清楚楚地显示出来。

这张战略图很快转到了杨得志司令员手里，对奇袭八公桥起了重要作用。

5、分化瓦解敌人，拆散孙部与日、伪、叛、顽、杂的联合。

“二办”的工作既巧妙又灵活，搞真情报也造假情报，各有各的用场。

伪二方面军孙良诚部盘踞的地区正处日寇华中与华北派遣军的接合部。日寇驱使伪军对两淮地区几次大规模的“扫荡”后，退回了原驻防地（华中派遣军退驻开封，华北派遣军退驻大名），一时还不易统一行动。我们对日寇则封锁消息。部队秘密向孙部的纵深处迂回推进。

而对郟城的刘本功部则虚张声势，实行佯攻。各部队开展热烈的练兵运动，日夜擦枪磨刀，造梯攀登。有的敌工员找到伪乡保长，故意恫吓：“我军在这一带集结，走露了消息要找你们算帐！”有的

敌工员告诉来往的商贩：“你看见了我军造梯子，可不准告诉敌人！”还有的把敌人的岗哨抓来，讯问后放回，故意让他们做“舌头”（来回传话），特别是政治部和任尹斌同志让我们的敌工科长通过内线关系把假情报送到刘本功的指挥部，这以来，刘本功慌了手脚，连忙收缩部队，向各部呼救求援，孙良诚看不到我军的动静麻痹起来，正如丘克难同志在一封报告情报的信中所说：“敌人（指孙部）本来天天向乡保长要伙子赶筑工事，最近听说我们要打刘本功，伙子也要得不紧了，围墙只筑了一丈多高……”这一真实的情报使我们的指战员认识到攻打孙良诚部的时机已经成熟，良机不可错过，因而，士气大增，群情激昂，临战之风顿起。

对接近八公桥，盘踞在徐镇、两门、庆祖等据点的伪、叛、顽、杂部队。我们一方面动员地方武装一县区基干队、乡村民兵分路阻击，分点包围，准备实战，一方面分头作分化瓦解工作，使敌人各保自身，互不相顾，这样孙良诚的总司令部八公桥就成了大海中的孤舟，一触即倾。

就孙良诚一向认为铁板一块的总司令部，八大处，直属团、特务团、兵工厂也都打入了我们的敌工人员。

是年11月16日下午，数十名伪兵从濮阳来八公桥送东西，我们按照予先得到的情报进行了截击，换成了我们的人打入了敌部。战斗打响后做了内应。

同日天快黑时，一批化了装的送柴草大车来了，按照孙部防范惯例天晚了不能进镇停到镇外，战斗一打响，连柴草带大车填到了壕沟里，敌人开挖的“天堑”变成了“通途”。

午夜时分，指挥部红灯挂起，奇袭八公桥的战斗全面展开。回民支队、老七团……各路勇士一齐冲进八公桥。伪军官兵有的还在打麻将；有的在睡梦中做了俘虏；有的摸枪捞炮想着顽抗，可枪炮变成了哑吧。他们哪里知道，我们打进工厂的敌工人员早已做了“安排”。

17日9时许,战斗胜利结束。悉数战果:“16日晚,我军主力攻入孙的总部驻地八公桥(濮阳南),激战12小时,将孙逆总部直属队全部歼灭,毙伤伪数百名,俘伪二方面军甄参谋长、慕团长以下官兵1600余名,缴获轻机枪17支,步枪1600余支,子弹4万余发,电台两架,战马百余匹,粮食数百万斤及兵工厂一所(机器全部)。(1943年11月28日,延安《解放日报》)。

三、“二办”的归宿与深远影响

八公桥战斗胜利结束后,毛定原同志外出学习,其他人员合并于军区敌工部。“二办”虽然不再单独存在,但其活动并未停止,仍在沿用旧关系,继续做孙良诚残部的工作。尤其是政治影响更为深远。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短短的12个小时的战斗,端了伪二方面军孙良诚的老窝,这在冀鲁豫抗战史上是一个范例。从这个范例中悟出了一个道理,政治上的瓦解与武力上的攻打同等重要。

孙良诚虽然侥幸漏网了,但他思想上做了我们的俘虏,低头认了罪,并派出代表调停。其残部龟缩了,再也不敢向我根据地越雷池一步,其他小股的伪、叛、顽、杂也找关系,搭引线,纷纷向我们通款抒诚。冀鲁豫根据地巩固了,抗日的力量壮大了,局势好转了。

在此形势下,盘踞在濮阳古城的伪二方面军主力新五军王清翰部,也向我们抒诚,1944年该军撤退时,密约我军进城,一枪未发,濮阳全境获得解放。

中共冀鲁豫边区委员会 在开封的敌军工作

武智敏

开封地处豫东平原,陇海铁路横贯东西,是国民党河南省省会所在地。1938年6月6日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后,成为日伪统治中原的政治、军事、经济中心。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开封东北部邻近冀鲁豫边区西南地区,南边、东南边距水东^①地区仅有百里之遥,战略位置十分重要。

抗日战争初期,在中共河南省委领导下,建立了中共开封市委和党的基层组织,。开封沦陷时,市委成员随省委撤往豫南竹沟,基层支部的党员大都随所在职业掩护机关撤退,开封党组织的活动暂时中断。

1940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的通告》^②要求全党把开展敌后大城市工作,视为党的最重要任务。中央成立敌后工作委员会,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临近敌区之区党委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加强对敌工工作的领导。根据中央指示精神,1942年12月,中共冀鲁豫边区委员会专门召开关于日伪军工作的讨论会;1943年1月30日区党委做出《关于目前敌伪军工作的决定》按照决定要求,区党委、地委设立敌工委员会。县委设立

^① ①水东,泛指河南省东部睢县、杞县、太康、通许、淮阳、柘城、宁陵这一地区。1938年6月,蒋介石炸开黄河花园口大堤,黄河改道向东南流入淮河,因该地区位于新黄河以东,故称水东。

^②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0集,第489页

敌工部,军分区、县设敌工支站和分站。

在中共冀鲁豫边区委员会指示下,1942年,1943年,鲁西南地委^①、水东地委^②分别派出干部进入开封,从事地下工作。先后建立了情报站(后扩建为工委会)和城市工作小组(后扩建为支部)。他们遵照上级党组织的指示,隐蔽战斗在敌人内部,领导所属党员和广大群众,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一)冀鲁豫开封工委建立前后的组织沿革情况

1942年10月,中共鲁西南地委和分区派李冠卿(化名徐景春)到陇海线从事敌伪情报工作,经过实地调查了解,于12月,在民权县内黄集建立了陇海路汴商敌工站,李冠卿任站长,成员有王丹忱(化名张海运),张金山等。为了便于工作的开展,地委还任命李冠卿参加民(权)兰(封)考(城)工委并兼任敌工部长。主要任务是收集情报,瓦解伪军和建立交通线的工作。1943年春,地委敌工科指示陇海路敌工站要把工作重点转向城市,李冠卿等进入开封,在新华街与人合办一家皮革厂作为职业掩护,并在营街8号找到住处,陇海站改为开封情报站。随着形势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1943年12月,经地委批准,开封情报站改组为开封工委(开始称汴商工委不久改称开封工委),李冠卿任书记,王丹忱、张金山为委员。

1943年7月,十八集团军总部保卫部(锄奸部)所属北京特别支部书记姜达生(化名胡贵民)随所打入的新民总会开封调查支部来到开封。不久,与李明浩(朝鲜人,由冀鲁豫区党委领导的“朝鲜

^① 鲁西南地委,原属苏鲁区党委领导,1940年4月,划归冀鲁豫区党委管辖。先后改称四、三、七、五、十地委,本文统称鲁西南地委。

^② 水东地委,1941年建立,隶属豫皖苏区党委。1941年5月,“三个月反顽斗争”发生后,形势恶化,水东地委与上级失去联系,1942年划归冀鲁豫区党委领导。先后改称十二、六地委。1946年12月又划归豫皖苏区党委领导。本文统称水东地委。

抗日联盟”派来开封做地下工作)、王飞霄(水东地委派其打入伪军张岚峰部做地下工作,时任少校参谋)、陈秀峰三人相遇(1938年姜达生在延安抗大任指导员、党支部书记,是王飞霄的入党介绍人,李明浩、陈秀峰均是抗大二分校学员),经过接触、互相说明了身分,经姜达生同意,李明浩向区党委汇报了姜的情况,要求将其组织关系转到冀鲁豫区党委来。李冠卿根据地委指示,派王丹忱与姜达生联系。1943年底,姜达生的组织关系由“集总”保卫部转至冀鲁豫鲁西南地委,姜达生被任命为中共开封特别支部书记,受地委和开封工委领导。1945年8月,因环境恶化,姜达生遭到迫害,被迫撤回根据地,特别支部停止活动。

1944年6月5日,《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①指出:“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根据中央指示,为进一步加强城市工作,于1944年10月决定,将鲁西南地委所属的开封工委改由区党委直接领导,派豫鲁办事处工委副书记李苏波兼中共开封工委书记,李冠卿改任副书记,王丹忱、张金山为委员。

1945年4月,李苏波调离,区党委派丁一(现名孙盛渭,在开封化名王文汉)任工委书记,李冠卿任工委副书记,范毅(范钦宁)、张金山、王丹忱为委员。区党委托鲁西南地委具体领导工委工作,至日本投降前,丁一、范毅未进入开封,由李冠卿代理工委书记。

从1943年12月,开封工委建立,到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工委除领导上述特别支部外,随着组织的发展,还先后建立三个支部。

1. 中共文教界支部:1944年5月建立。工委委员张金山兼任支部书记,车荫棠、桑菊人为委员。

^①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2集,第494页

2. 中共西区支部：1945年2月建立。由居住在西米城的王振海、王丹忱、刘鸿3名党员组成，王振海任支部书记。

3. 中共南关支部：1945年夏建立。由民权（内黄集组织被破坏）撤回开封的党员组成，马吉升（马成、马威）任支部书记。

1945年9月，开封工委书记丁一和工委委员范毅进入开封，丁一在开封工作约一月，便奉命撤回解放区，工委仍由李冠卿主持工作。

1946年1月，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成立，开封工委由城工部直接领导，李冠卿任书记。1946年6月，在李冠卿要求下，区党委派于子元任工委书记。因他在抗日战争初期，曾任考城抗日民主政府的县长，不便于做秘密的地下工作，进城未及半月，即奉命撤回，仍由李冠卿任工委书记，张金山、范毅为委员，王丹忱调走做其它工作。1946年9月，李冠卿被捕，工委委员范毅安排善后工作后回区党委汇报，李冠卿家属由西区支部和东区支部同志帮助安全转移。后工委委员张金山自动脱党。

李冠卿被捕后，区党委任命城工部交通联络科科长孟起兼任中共开封工委书记，范毅、李铁林（1946年4月，由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派到开封《中国时报》社做地下工作）为委员。1947年3月，孟起进入开封，对工委组织进行了整顿。工委下辖4个支部：1. 西区支部，书记王振海；2. 东区支部，书记陈秀峰；3. 文教界支部，书记李铁林（兼）；4. 公路局支部，书记鲁开太。

1947年9月，孟起调回解放区参加整党。11月，工委委员李铁林在回解放区途中在郾城被捕。

1948年初，整党学习结束，时值区党委城工部与社会部合并，孟起调社会部任城工科科长，不再兼任开封工委书记。

1948年5月，区党委派戴德进入开封，负责对国民党上层人士进行统战、瓦解工作。6月22日，开封第一次解放，26日部队撤离。区党委决定任命戴德为工委书记，王振海、王文波为委员，未及

正式宣布,开封遂于1948年10月24日第二次解放。

(二)工委的主要活动

1. 建立安全交通线,护送干部进出敌占区。

情报站首先抓了建立交通线工作,经过多方活动,于1943年春,共产党员管沛生出任民权县人和区伪区长。接着又派一些同志担任伪区队长、伪联保主任等职。人和区位于民权县西走廊,掌握这块地方的伪政权,对建立通过陇海线南北交通便有了安全保证。过去过往陇海线的干部,必须有武装部队护送,时有与敌人遭遇的危险,现在由于掌握了伪区公所和联保处,根据地南来北往的干部就可以安全越过陇海线。次年,乘民权县伪警备队扩大之机,派管沛生打入县警备队任大队长,人和区区长改由同情关系戴鹏程担任。这样,掌握了武装和政权,更为交通线提供了安全可靠畅通无阻的条件。

在抗日战争时期,工委先后在民权县内黄集韩明修家、柳河(车站)李东城处、兰封县城南门里张本烈家,开封王世慧、陈光和杨进俊家等处建立了交通联络站,并在陇海铁路开封、民权、内黄车站的铁路警察中发展了翟威、张心田、王登科等成为工委的交通。由于交通联络的安全可靠,工委在护送干部和工作人员、传递情报和文件指示中,从未发生过问题。1944年秋,新四军四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冀鲁豫区军区敌工部长李一非、五分区司令员昌炳桂等同志先后来开封,工委均派交通线上的同志安全接送。此外,还护送“反战同盟”的朝鲜同志与进步人士上百人出入解放区。

2. 收集情报、策反伪军政人员

1943年春,冀鲁豫军区获悉日伪军准备扫荡冀鲁豫根据地的消息,军区政委苏振华指示开封情报站设法收集日伪这次军事行动的指挥部位置和作战计划等军事情报。要搞到如此重要的情报,只有打入日军驻开封的师团参谋部才有可能。当时,驻开封的日军原田师团部,住在河南大学,周围一里地之内是戒严区,一般人员

要想进去是很困难的。情报站了解到第四巷名妓菊红被日军师团参谋部几个参谋军官专包,经常乘坐日军小汽车出入师团部。站长李冠卿通过关系争取了菊红。并给她重金作为活动经费。菊红出于爱国之心,勇敢地接受了任务。她进入原田师团部背着那几个参谋军官忍辱冒险,结识并收买了专管保险柜的日军士佐,搞出了日军的作战计划,行动地图等重要情报,及时送往冀鲁豫军区。

1943年5月,李冠卿、王丹忱在冀鲁豫军区敌工部长李一非的指示下,积极开展争取伪省长陈静斋,使其为我们做了一定的工作。1944年初,日军发起打通平汉线南段的河南战役之前,陈静斋参加了日伪高级军事会议,会后他将日军为了集中兵力西进要抽调收缩33个据点的日伪军的情报提供给我们,使我们乘机扩大了抗日根据地的范围。

1944年1月,中共开封特别支部书记姜达生到商丘伪张岚峰部通过王飞霄将王在该部联系的教育团长杜新民、队长邢剑五等4名共产党员关系转到冀鲁豫五地委,后五地委指示开封工委令姜达生直接领导其工作。同年3月,姜达生又到商丘向王飞霄传达了地委和工委指示,令杜新民利用他与张岚峰原是西北军老同事的关系,竭力争取抓枪杆子。经过活动,5月,杜当了张部第十八师师长,并提拔邢剑五当了团长,另两名同志当了营长。五地委派姜显和(士平、姜达生之弟)进入该部,任杜新民的随从副官负责传递文书。此后,根据地陆续派人打入该部。8月,姜达生以伪河南省剿共委员会荐任视察专员的身份,到永城调查该城被新四军包围告急的情况,乘机收集了日伪永城的设防情报,由杜新民转交新四军。1945年4月,该部的工作转交冀鲁豫区党委豫东工委。1945年9月,杜新民率该师起义。

1947年初,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派开封工委委员范毅到国民党六十八军三五六团协助该团团团长张公干(地下党员)做瓦解敌军的工作。该团当时驻开封担任城防及警备任务,范毅在团部负责管

理警卫班和机要文件,以此为掩护将一些机密电报、简报和电报密码等重要情报及时送给工委书记孟起转送冀鲁豫根据地。范毅还对该团副团长和一、二营营长做了争取工作,1947年7月,六十八军奉命开往山东菏泽一带,三五六团驻防鄆城。9月13日,张公干率该团两千余人在鄆城起义,并向全国发出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通电。张公干住在开封的家属,开封工委派王洽慧将其辗转安全送往解放区。

1948年6月,开封第一次解放,人民解放军主动撤离后,工委书记戴德为迎接开封的最后解放,在陈秀峰的帮助下,积极做国民党河南省田粮处处长徐鉴泉的工作,通过徐的关系,戴德、陈秀峰、丁玉璞都在田粮处挂了名,任职领薪,掩护工作,并掌握了3万余斤粮食,于1948年10月开封第二次解放时交给我军。

3. 打入敌特组织,掩护党的工作

1944年5月,中共开封特别支部书记姜达生利用关系打入日伪华北剿共委员会任荐任视察,掌握了调查处的情报大权。同年冬,伪民权县长康成下了手谕,要撤换民权县保安大队长管沛生(共产党员)、人和区区长戴鹏程(同情关系)的职务,工委得知后,即派姜达生以剿共委员会荐任视察专员的身份到民权县与伪县长康成拉上关系,结为“朋友”,使其收回成命,保护了我地下组织的安全。

1945年五、六月间,姜达生、王宝祺先后进入伪省警察署,分别当上了警法科长和保安课长,掌握了把守城门的警察中队和发放良民证的权力,并将王丹忱、郑文学(地下交通员)安排当了侦缉员和卫生稽查员,为我们的地下活动提供了便利条件,这年春天,冀鲁豫五分区副政委陈云凯指令开封工委为军分区英模大会制造1000枚奖章,这是一个十分艰险的任务,工委设法用重金请工匠制造。之后,由姜达生身着警装带出城外交给工委书记李冠卿。李又派打入日伪火车站的武装警察翟威送到内黄集联络站,由交通

员曾宪玉送到五分区。

1944年,高绳祖打入伪河南省警务厅搞庶务,利用工作之便,收集了省警务厅、各县警察署治安工作和特高课逮捕人员情报及警务厅内部动态等情报。

1947年,工委派阎凤歧打入中统特务组织联合新闻社,先后任新闻社记者、采访主任,并参加了开封各新闻社组成的联合会。他以此职业为掩护,揭露国民党统治黑暗,教育群众,进而激化敌特内部矛盾,使开封县警察局刑警队长罗玉卿等5名军统特务,因强奸杀人之事败露而遭枪毙。此后,他继续在国民党中统、军统特务之间周旋,收集情报,掌握敌特7个潜伏小组(点),为开封解放后公安机关肃特镇反,创造了有利条件。

4. 争取宣传阵地,开展《中国时报》社的工作

《中国时报》创刊于1945年12月1日,1948年6月19日停刊结束。这是一家民办报纸,报社社长郭海长曾于1937年10月在新乡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因党组织遭破坏而失掉关系。1945年底,工委委员张金山以同乡身份与郭海长接触。工委根据郭的表现和要求,向冀鲁豫区党委汇报,建议考虑恢复其组织关系。1946年5月,区党委城工部派李铁林到开封《中国时报》社(李和郭是河南大学文史系同班同学)通知郭海长经组织研究同意接受其为中共党员,实行单线联系,由城工部直接领导。李铁林在报社以编辑和记者身份为掩护进行活动。先后在报社、学校发展了10余名党员。

《中国时报》社在党的领导下,逐步成为由共产党员和进步新闻工作者为基础力量的宣传活动阵地,该报能够坚持正义,揭露国民党黑暗的统治;反对内战,刊登我党的和平建国纲领;支持学生运动,为被捕学生呼吁;秘密印刷党的文件和宣传品等,有力地配合了党在白区的斗争。

5. 领导和支持爱国学生运动

抗战胜利后,开封的三青团猖狂活动,强迫中等以上学校的学

生参加其组织。开封工委发动、组织进步学生进行抵制。1945年八、九月间,三青团在大华剧院(今开封剧场)举行入团宣誓仪式时,进步学生乘机挤塌了二楼楼梯,砸伤多人,会场一片混乱,学生哄拥而散,迫使入团仪式停止进行。

1946年春,国民党特务、三青团河南省干事长李汉箴等到河南大学和一些中学搞反苏活动。工委派人联系河大的进步教师和学生,秘密散发传单,揭露敌人的阴谋活动。3月2日,三青团举行了反苏游行。途中,进步学生贴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标语、传单,反动分子李汉箴见势不妙,惊呼有“奸匪”活动,慌忙停止游行。

6. 参与黄河归故斗争,挫败国民党以水代兵的阴谋

1946年,蒋介石借堵郑州花园口大堤使黄水流入故道之机,阴谋以水代兵,淹没黄河故道下游冀鲁豫、渤海解放区军民。周恩来亲自和国民党政府、联合国救济总署代表谈判,签订了先复堤后堵口的黄河协议,但是国民党不执行协议,加紧单方面在花园口堵口。上级指示工委设法破坏国民党蒋介石的阴谋,工委派王振海通过亲戚关系进入花园口石料转运处任办事员,利用反动当局贪污腐败的特点,鼓动石料转运处管理人员少装、慢运、多报开支的办法,降低了石料运输效率,拖延了工程进度,推迟了堵口时间。

(三)工委发生的两次被捕事件

1. 李冠卿被捕。1946年9月8日,开封工委书记李冠卿被国民党河南省特务机关逮捕,施以酷刑,逼其招供,李只承认是商人,未暴露真实身分,被以嫌疑犯名义关押在河南省保安司令部监狱,后又转郑州、武汉等地集中营,1948年12月,在被押往四川途中越狱逃往大别山解放区,李冠卿在狱中经受了严刑拷打,受尽折磨,使敌人一无所得,保持了共产党员的高尚气节。

被捕的原因,是由曾当过东明县还乡团长刘玉亭传达兵的孙平世(此时已是河南省三青团特务机关的情报员)持伪造的中共冀

鲁豫豫东办事处主任李苏波的信件，找李冠卿要情报，孙只知道李冠卿是共产党干部、李苏波的朋友，并不知道详情，接头后，已引起李的怀疑，并立即布置交通杨世梭找房子搬家，以防不测。就在找房子时，在东大街被特务逮捕。李冠卿身陷囹圄坚贞不屈，工委未受丝毫损失。工委委员范毅及西区、东区支部做了善后工作，及时将李冠卿的家属转移到解放区，范毅回冀鲁豫区党委汇报了情况，工委基层组织继续活动。

2. 李铁林被捕。1947年11月，由于打入商丘朱集车站的豫皖苏情报员梁茂林和商丘师范学校教员刘子威（进步关系、曾任《民国日报》社编辑）相继被捕叛变，供出李铁林、刘士明、陈承铮和《河南日报》社李灼等4人，李铁林在去豫皖苏解放区途中经郾城时被捕，刘、陈、李在开封被捕，均关押在郑州绥靖公署。次年元月，刘世明等三人由开封新闻界出面保释，李铁林被送往南京监狱。经过一年多的狱中斗争，李铁林于1949年1月，终因查无实据（叛徒刘、梁已死），被保释出狱。

二

（一）中共水东地委开封支部的建立

1943年春，中共冀鲁豫水东地委派张方明（张会文、张耕耘）到开封开辟地下工作。张接受任务后，先到大营村其姑母家住下，在杞县西和通许一带开展活动。4月，张在通许栗岗村发展返乡进步青年张本初（原和张是同学）入党。这年夏为了让张站住脚跟和取得职业掩护，地委拨给4000斤麦子，在杞县西临近公路的晁村集开设一家粮行，张自任经理兼会计。此后，张即以粮行经理的身分活动于城乡之间。

同年10月，张方明进入开封，仍以粮行经理的身分为掩护开展工作。12月，张发展进步青年马忠先（高峰）入党。1944年底，开封城市工作小组成立，张方明为负责人。1945年8月初，日本帝国

主义投降前,张发展李蔚人(赵力)入党。10月,经地委批准,成立中共水东地委开封支部,张方明任书记,马忠先、李蔚人为委员。11月,发展王运廷(梁亚夫)入党,次年夏,王被增补为支部委员。

支部先后由地委书记李中一和郑华直接领导和布置工作,往来联系,初期地委派有交通,后交通发生事故,由张方明、李蔚人亲自回地委汇报工作,听取指示。支部的主要任务是:1.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2.开展学运,宣传教育群众;3.收集敌情动态,配合解放区斗争。

(二)支部的主要活动

1.开展隐蔽斗争,多方收集情报。支部按照党的“长期隐蔽,发展组织,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地下工作方针,一开始就注意隐蔽斗争。1946年夏,蒋介石撕毁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大举进攻,白区环境日趋恶化,水东地委指示:要求支部党员和所联系的进步关系,都要设法取得职业掩护以利斗争。经过活动,李蔚人打入合作社训练班,后来转移到开封县黄龙寺小学教书,王运廷打入省高等法院,段民乐打入开封县同乐乡任副乡长,王民森在邮电局,王鹏凡在省统计局,安孚麟在《中国时报》社,武永祯打入省保安司令部特务营,这些同志在公开职业掩护下,收集了涉及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情报。王鹏凡在省统计局搞综合统计,负责财政、民政、建设、农业、保安、警务等统计资料的整理汇总工作,他及时的将这些机密、绝密资料提供给支部;武永祯在省保安司令部特务营任军需,他随时将河南省主席刘茂恩的活动与城防司令部的戒严情况向支部报告;安孚麟在《中国时报》社负责抄收延安电台广播的战报,改用外国通讯社的电头在时报上发表,宣传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消息。支部及时将这些情报汇总报送地委,在对敌斗争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2.开设小开书店,联络进步学生。1946年春节后,地委指示,支部不仅要在大学生中发展党员,还要注意在中等学校中开展工

作,并交给支部5万元经费让开设一个书店,作为联络中学生的桥梁。经过筹备,1946年7月中旬,小开书店在新街口23号开张营业,这里是中等学校较集中的地区,开封高中、开封师范、开封女师都在附近。书店除出售一般的进步书籍外,还设有租书部,将收藏的为当局所禁读的红色书报杂志,如《新华日报》、《新民主主义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及苏联的文艺作品等,秘密借给内部同志和党外积极分子阅读。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书店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学生,后来有十几人被送往解放区,有两人被吸收入党。9月底,由于环境条件不断恶化,支部奉地委指示关闭了书店。

3. 建立联络点,输送进步青年去解放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下,经过支部的宣传教育,不少进步青年学生痛恨国民党,向往解放区,纷纷要求到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去学习、工作。为了安全输送进步青年到解放区去,支部先后建立了四个联络点,沟通和解放区的联系。一是通许栗岗张本初家,张方明进入开封后,张本初到大营村小学教书,仍由张方明单线领导,他的家就成为地下工作的联络点。张方明等从开封回解放区汇报工作,都先到这里落脚,这是他们回解放区的第一站。二是贾好同、张志远在开封宋门里开的“康明”诊所,通过这里送两第三批青年去解放区。三是开封县同乐乡范庄。四是郑州扶轮二小葛云中处。从这几个联络点到解放区形成几条交通线,通过这几条交通线,输送到解放区去的青年学生有40余名。支部还护送新四军突围时掉队干部朱虹、曾言、刘炬等5名同志回解放区。

4. 支部还为水东地区多次购买药品器械和其它物资器材。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水东地区处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包围之中,敌人对解放区的封锁、禁运和频繁围剿,使得水东地区物资十分缺乏。支部多次为解放区购买各种药品及医疗手术器械还购置图书、油墨、纸张、文具用品和架子车下盘、汽马车轮胎等交通器材。从而部分地缓解了水东地区物资奇缺的困难。

此外,1944年底1945年初,冀鲁豫四军分区敌工办事处先后派李庆斋、李庆堂到开封,以开设体育用品商店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在中共冀鲁豫边区委员会领导下,开封工委和水东地委开封支部,从建立到结束^①,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时期,长期隐蔽战斗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的开封,在发展组织,建立交通线,搜集情报,瓦解策反敌伪军,送青年学生去解放区的斗争中,取得了重大成绩。

^① 1946年12月,水东地委划归豫皖苏领导后,开封支部的工作活动未作叙述,到1948年10月开封二次解放,支部发展320余名党员;在1947年5月开封爆发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中,支部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我党对张岚峰部的争取和分化瓦解工作

商丘地委党史办公室

商丘县委党史办公室

盘踞豫东长达 10 年(1938—1948)之久的张岚峰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是日寇扶植起来的伪军,在解放战争中摇身一变成了蒋介石打内战的国民党军队。我党在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不同的政策和策略,对张岚峰部,一方面进行公开的尖锐的武装斗争,从军事上歼灭之;另一方面通过长期的秘密的政治工作,加以争取和分化瓦解。这两个方面的斗争是相互配合进行的,工作是成功的。它是豫东军运史上的一件大事。

(一)

张岚峰,1902 年出生于河南省柘城县林张村。1922 年加入西北军学兵团,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19 期,曾任西北军炮兵团团长、军官学校校长。1929 年 12 月,经冯玉祥做媒,与李德全之外甥女张志兰结婚。1934 年二次赴日留学,与日本第七师团的参谋长松室孝良建立关系。1936 年回国后,任刘汝明部参议,在察哈尔负责与日军交涉。1937 年冬返回柘城,假借抗日名义,组织抗日自卫军,任副司令(司令是县长兼任)。1938 年 6 月 3 日柘城沦陷时,公开投敌,充当汉奸,任县维持会顾问。7 月中旬,经日军第十师团长矶谷廉介的介绍,携妻张志兰和绅士牛乾初同赴北京参加成立所谓“新中国政府。”其间亲受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大迫少将等人

的招见,接受其抓军队、抓政权的旨意和“豫东招抚使”的委任,选择以陇海路沿线为基地发展伪军和伪政权。据1951年3月8日张岚峰在狱中供称:“我所以选择陇海线一带,作建军基地,第一因为考虑时局的现状,日占据华北,当然一时不能放手,蒋政府退到西南各省,反攻决非易事,长江下游各省为日军所占,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乘中日战争的矛盾向西北发展。根据以上考虑,陇海线一带是中央蒋政权、日本各势力之缓冲地带(三角地带)。我看准了这个缝子,所以以这里为根据地,图谋发展。第二,我是豫东人,这一带的风土人情比较熟悉,各县的士绅、地方干部有不少是我幼年时的同学,在这里求发展,可收地灵人杰之效。第三,旧西北军的干部多是这一带的人,并有不少是直接受过我的训练的。自西北军被蒋分化后,失业的很多,在这建军可以解决干部缺乏之困难。”张岚峰选择在陇海沿线发展军事实力,这既是他适应日军“以华制华”政策的需要,也有他独霸一方、长久盘踞豫东的政治目的。

1938年11月下旬,张岚峰携眷属及随行人员曹大中(张志兰之堂妹夫)李中毅(李德全之弟)、牛乾初和日本顾问松室正宪(松室孝良之弟)等,回到商丘组织“豫东招抚使公署。”他利用官位、金钱、毒品等手段和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在商丘、柘城、鹿邑、亳县、夏邑、睢县、宁陵等地,收买国民党残余势力,拉拢失意的西北军人,收编地主、土匪和游杂武装,共凑集了1500人,于1939年春成立“豫皖剿共军,”自任总司令。5月,改任“中央和平救国军”第一军军长。1940年6月,又投靠南京汪伪政府,任汪伪苏豫皖边绥靖总司令部副司令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1942年1月,张部改编为汪伪第二集团军。1943年秋,又改为第四方面军,张任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商丘。在这期间,张岚峰利用“曲线救国”的名义,诱降了大批国民党军政官员,其军力亦达到顶峰,归其指挥的有伪第一军、第八军和涡北挺进军(即十九军)等,还有一批地方保安团队,共约9万人。分驻睢县、民权、杞县、通许、太康、淮阳、鹿邑、柘

城、商丘、宁陵、夏邑、虞城、永城、宿县、涡阳、亳县等16县。成为日军在豫东的忠实“看家狗”，也是协同日军向解放区进攻“扫荡”的主力之一，对我豫皖苏、冀鲁豫和睢杞太革命根据地危害极大。

(二)

张岚峰部是一个由复杂成份组成的伪军。从政治方面看，其中有代表大地主大绅士利益的亲日派，但这些民族败类毕竟为数较少。为数较多的是受蒋介石排挤的原西北军失意军官，其中不少的曾受过我党的教育和影响，有的当年还是中共党员，他们内心隐藏着极大的爱国热忱，有寻找党组织的迫切愿望。但为数最多的是属于动摇状态的中间势力。他们一部分是受张岚峰拉拢的青年学生和灾荒之年失去土地的农民；大部分是在“曲线救国”的名义下，被张岚峰诱降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游杂武装。他们中间的很多人是不愿甘当汉奸做奴隶的。在我党发动和领导的反分裂、反投降的强大政治攻势下，加之蒋介石、冯玉祥直接密函劝告张岚峰“反正”，1940年6月29日该部一大批高级军官，率部1万多人投蒋，使张部当时只剩下了几千人。作为张岚峰本人，是一个典型的政客。他既要依靠日军，发展自己的实力，又不敢与蒋介石完全破裂，以便留一条后路。张部盘踞的区域，东、西、北三面都与我根据地接壤，我之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压力，使张也不敢与我公然对抗，表示愿意与我保持接触。随着国内外形势日益对日军不利，张的内部离心离德倾向严重。1943年以后张部已基本形成四派：一是西北军校派，以贾子毅（总部教育团教育长）、卫西周（总部参谋处长）、廖佑明（军参谋长）、商大可（特务团团长、旅长）等为首，与张岚峰关系密切，又有张志兰直接支持，多在总部直属任职，势力较大。二是二十六路军派（即原孙连仲部），以黄秀甫（总参议、副总司令）、陈扶民（总部参谋长、副总司令）、刘扶霄（师长、总部参谋长）等为首，一般都身居要职，掌握兵权。三是地方派，以牛乾初（政务

厅厅长)王新民(师长、军长)、韩循先(师长)等为首,因系张的同乡、同学和亲朋,一般都受重用。四是第三路派,以杨树森(军长)等为首,人少势薄。各派虽有共同的利益,但又各有一套人马,互相排斥打击,争夺官位,防地和财物,矛盾非常错综复杂。1944年5月,张岚峰派人将杨树森暗杀正是这种矛盾尖锐化的表现。

基于上述分析,我党按照“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思想,确定对张岚峰部的工作,采取争取和瓦解并重、以争取为主的方针。1941年豫皖苏区党委和睢杞太特委派人打入了张部,建立了立足点。1943年6月中央下达了“关于加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通知”,冀鲁豫区党委和新四军四师据此进一步加强了对敌伪军工作的领导。区党委设有城工部,军区设有敌工部,地、县设有敌工科(站)。1944年2月,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建立豫鲁办事处和工委,军区敌工部长李一非兼工委书记,李苏波任办事处主任、工委副书记,并从地方和军队抽调一批干部,如马达、付亚平、戴德、张敏、刘振国等,到陇海沿线开封至徐州段做敌伪军工作。不久,又建立开封、徐州两个工委,派李冠卿、姜达生、刘廷良等一批干部,分别到这两地开展敌伪军工作。下半年,冀鲁豫区党委和军区决定将豫鲁办事处和工委由鲁西南的大杨湖迁到陇海路南的轩庄,李苏波任主任兼书记,牛连文任副主任,办事处又充实一批力量,如苗泽生、王洽惠、黄育林等,主要做张岚峰及其部下魏凤楼(五十六师师长)、杜新民(十八师师长)、王继贤(五十五师副师长)以及程培兆(独立团营长)等人的争取工作。1944年冬,新四军四师主力打回津浦路西后建立了永商亳办事处和工委,赵彤任书记,刘鲁民任副书记,刘廷良任敌工科长,负责做张岚峰、陈扶民、王继贤、杜新民等人的争取工作。1946年5月,冀鲁豫区党委城工部副部长王乐亭来商丘、柘城,筹建了豫东敌军工作委员会,王飞霄任书记,史少亭任副书记,主要做王翔九(团长、旅长)、丁葆仁(团长、旅长)和刘效倡(五十六师师长)的起义工作。通

过这些专门机构,组织各方面的力量,全面开展了对张岚峰部的斗争。

(三)

我党对张岚峰部的工作,主要是从三方面进行的。

首先是打入内部,培养骨干力量,从组织上分化。从1941年起,豫皖苏区党委和睢纪太特委,先后派了陈子良、王飞霄、汤绍禹、杨坤、王延庆等一批地下工作者,通过亲朋及其他社会关系,打入张岚峰内部,与其当时任教导团长的杜新民、二路一团团长的王继贤取得了联系,开始了争取工作。1943年中央发出加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工作的通知后,冀鲁豫区党委、军区和新四军四师又派大批敌工人员,先后打入张岚峰内部。一方面在上层,由李苏波、贾子毅、张公干、牛连文、刘鲁民等,通过西北军校及亲朋关系,负责做张岚峰、张志兰的争取工作。另一方面在中下层,由姜达生、杨春美、杨木林、魏一博、郭永照、张朝栋、陈振声、姜士平、刘廷良、李俊彦等,通过各种关系,分别做魏凤楼、杜新民、王继贤、陈扶民、程培兆、王翔九、丁葆仁、邢宗汉、刘效倡等人的争取工作。其内容:一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政策,使其认清形势,提高觉悟,树立起决心;二是发展党员,和党的同情组织,先后吸收杜新民、邢剑五、魏凤楼、王继贤、丁葆仁、王翔九、刘汉民、张振林、谢全中等入党,建立了地下党支部;三是帮助他们整顿部队,掌握兵权,作待机起义的准备。

第二,进行谈判,申明大义,从政治上争取。在日军投降前夕,正是张岚峰选择光明与黑暗道路的关键时刻,也是国共两党争夺张岚峰部的最紧张阶段。蒋介石为了抢占胜利果实收编伪军,于1944年9月就把国民党第三路军总司令的委任状送给了张岚峰。我党获悉后,分析了张岚峰在抗战前跟冯反蒋多年、在抗战期间与中共保持联系的一贯态度,认为他在日军投降后归向人民的可能

性是存在的,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争取整个张岚峰部上。于是,冀鲁豫军区即派李苏波、牛连文、张公干、苗泽生,四师派刘鲁民等到商丘,动员张岚峰认清形势,识破蒋介石准备打内战的阴谋,劝其加入人民阵线。张表示接受我党劝告,并派代表与八路军、新四军联系。他派其所信任的师长王继贤随李苏波去冀鲁豫军区参观回来后,王禀报了我根据地的情况,带回了杨勇司令员给他的亲笔信,大意是:认清时局,深明大义,走向人民,将功赎罪,既往不咎。张岚峰当时表示很受教育。

1945年春,八路军派代表申伯继、黄发若到商丘,劝张早日率部起义,以加速抗战胜利的进程。通过谈判,达成协议,中共先派联络员驻该部,互通情报,绝对避免实力对消。

1945年秋,在日军投降之际,应张岚峰的邀请,李苏波以八路军总代表的身份,到商丘与张岚峰谈判,并带有朱德总司令给张的信,大意是:劝张岚峰对蒋介石丢掉幻想,原地接受我军整编。谈后,张岚峰又邀李苏波陪同到柘城、宁陵、太康等部队驻地视察,以稳定其部队情绪。同时也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1946年12月,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周恩来、董必武受冯玉祥、李济琛的委托,派代表谢华先到商丘后转到柘城,与张岚峰谈判。说服了张岚峰以民主同盟军的名义率部起义,并策动冯治安、刘汝明、孙良诚等部参加同盟军。最后还商定了起义时间与暗号。

在上述谈判中,张岚峰的表现是阳奉阴违的两面派态度,对中共他不拒绝谈判,但没有最后的诚意;在谈判时他表面上接受一些条件,但实际又不执行。正如他1951年3月8日在狱中供称:“抗战胜利后,依靠日寇发展的本军,遭到一个极大的危机。事秦乎,事楚乎?我真是犹豫难决,依靠蒋介石方面呢?还是依靠共产党方面呢?为自己和本军的前途,就不能不作种种考虑。依靠蒋介石,以我过去反蒋投敌的一切事实,纵能争取一时的苟延残喘,早晚也是不能存在的。依靠共产党,当时我认为共产党的力量还不如国民

